地缘看世界系列精品图书



地缘看世界

——欧洲（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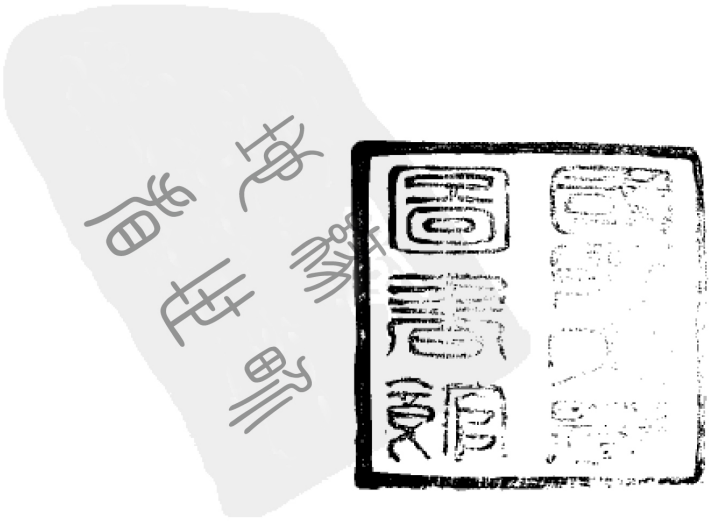
第　九　册

温骏轩◎著

地缘看世界

欧洲（下）

温骏轩 著



整理说明

本书整理自天涯社区贴子——地缘看世界，作者为温骏轩，其在天涯社区的 ID 为鄙视抢沙发的。整理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的阅读和交流，禁止用于任何商业用途。版权属于著作所有人温骏轩所有。

在整理的过程中，进行了文字校对，划分章节，图文排版的工作。由于贴子是在线写的，故文字错漏不可避免。对于这方面作了相关的修改，当然是在尽量不改变文章原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可以不修改的也尽量不会作改动。至于一些异议的地方，也会添加脚注予以说明。

本书所用地图基本上来自原贴子，只是这部分图不可能满足所有内容的需要，为了更方便理解文章内容，故增补一部分地图。这部分增补的地图有的来源于网络，包括其他的实景图片。另外一些地图则是自制，即个人制作，当然只是作为参考。

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在整理的过程中不免有一些不足之处和错漏，如果发现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出说明。毕竟大家的初衷都是一致的，也就是更好的阅读和理解文章。能够完善的整理内容出来供人阅读是每一个人的期待。

最后感谢作者（温骏轩）一直以来的分享。这个贴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世界，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鸿风

前言

大家可能认为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来专门研究地缘政治的。其实不是，我自幼喜欢读史，地缘方面的研究最初只是用来解读历史的一种方法。

小时候读史只是喜欢里面的人物和情节，长大以后也如一般人那样升华去体味史中人物的思想。不过看得越多，心中的迷惑就越多。中国历史的思路是“人本历史”，例如在历史中只能读到诸如孙刘联盟略施小计，便能以数万之众击溃数十万敌人的经典故事。但却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长江那么长，曹操一定要从赤壁过江？从《三国演义》中我们看不到答案，从《三国志》当中我们也找不到结果。有的只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类的人定胜天的论调（不过三家归晋这一段收得甚急，避开了解释为什么人气最旺的蜀汉政权，却是第一个被北方政权灭掉的原因）。

中国从来不缺乏“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只是讲述历史的史家们多是祖传的职业，自太史公以列传的形式将史书的模本固定为人物传记后，记录名人的行为和观察人际关系，就成了史家们分析历史的不二法门（他们甚至不屑于分析，这些历史人物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只习惯于根据其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来简单的划分黑白）。当年明月曾经说他是从人性的角度，来重新观察历史人物的选择与放弃。这种角度已是一种突破，并让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只是这仍是站在历史重要人物角度来解析历史，仍不能够解开我心中的迷茫。

偶然间又看到了《窃明》的作者试图从军事的角度来解析历史（他用的是穿越小说的方式），亦是很有新意，但仍感觉这种方法偏战术性了。我需要一种能站在“人性”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的方法。这种“人性”不是个别伟人的性格，而是人类或者说一个族群的性格，也可以说是“人民的性格”。 直到我重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才找到“人民历史”的感觉。“大历史”观必须将视线从具体人物和事件上移开，才能够从更深层次上感受历史的规律和必然。

于是我试着从“人性”（人类的性格）的角度，沿着古人的思路去探寻历史的真相。这个人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趋利避害”的本能。既然人是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么人最能直接感受到的利害关系，就是周边的环境。这需要暂且抛开人定胜天的勇气，而直接去感受地缘对人类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我曾经说过，现实的国际关系是历史的延续。因此无论是对地缘还是对历史的研究，都不能只是为了显示学问的高深。它要能够服务于现实社会，即为我们的现实生活起到指导作用，这样研究才有意义。

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并不会解决所有问题，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分析利害关系。为民族生存空间的扩展，找到一个成本最低的方向（例如你可以从地缘的角度知道，中国目前将

精力放在东南亚，会比放在墨西哥身上重要得多）。这就好像在图上找到可行的道路一样，至于路怎么修，修好以后用什么交通工具走，就要靠其他的专业人士配合了。

完全从客观环境角度，去解读人类历史是不够科学的；但这并不代表不要重视客观环境的影响。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有思想，也就是说能够总结出经验反过来改变环境。因此也需要从人文的角度解读历史，地缘和人文并不互相矛盾，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人类最初的文化产生是与周边的环境相适应的。前面说过有机会我会开个贴细说的，切入点应该是宗教。

很多初看帖子的朋友，会回帖表示这个帖子所表达的是“地理决定论”，或者认为这是一个普及地理知识的帖子。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地理也好，环境也罢，都只是“地缘”这个概念中的一个要素罢了。“人”才是地缘这个概念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也就是说，当我们用地缘视角去审视一件事情时，不光要去考虑物理环境，更要考虑“人”在其中的作用。而地缘研究的终极目的，也是希望“人”在了解地缘规律的情况下，能够作出事半功倍的决策。

与一般的历史、政治研究，习惯着眼于精英人物有所不同，地缘视角下的“人”指的是群体性的人。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用各种属性划分的人类群体身上时，那些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由于生存环境和相互博弈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属性，比如种族的划分，民族的认知；宗教、语言、文字等文化特征，就成为了“地缘”的一部分，并成为地缘研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研究、解读这些地缘要素产生的环境背景。但在大多数时候，这些要素会直接运用在地缘研究中去。

要想甄别哪些反映在群体身上的特性，能归入地缘的概念中，有个很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它有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按照这个标准，根植于绝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基于农耕文化所产生的对“家”的眷恋感，就是研究中国地缘时所必须考虑的要素；而那些阶段性流行的所谓“日风韩流”，就不在考虑的范畴中了。

明确了地缘研究所需要考虑的要素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地缘视角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了。由于这些要素都是相对恒量，所以解读出来的观点，也就不可避免的偏向战略层面了。比如我们可以从地缘的视角来分析出，中国有哪些城市具备成为区域中心，或者“国际金融中心”的潜质，有可能直接辐射哪些区域，但具体要达到上述目标，就不光是做地缘研究能够做到的了。

这个帖子能一直写下去，初始的目的倒也不是为了著书立说，只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拿出来分享（一个人一旦有了些新的想法，却不能找到同道之人分享是很难受的，也无法再做提升）。你不能指望周围的人跟你有一样的爱好，好在网络可以把有共同爱好的人聚在一起。还是那句话，认同的捧个人场，不认同的砸个砖场也无妨。

温骏轩

目录

第一部分 欧洲各封建王国的建立

第一章 查理曼帝国的扩张…… 1
第一节 阿拉伯帝国占领伊比利亚半岛…… 1
第二节 基督教的分裂…… 3
第三节 丕平献土与教皇国的建立…… 5
第四节 查理曼在日耳曼尼亚扩张遇阻…… 7
第五节 查理曼帝国在周边的扩张…… 9
第六节 查理曼帝国的分裂…… 12
第二章 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及向外扩张…… 17
第一节 德意志民族的形成…… 17
第二节 奥托一世统一德意志并入侵意大利…… 19
第二节 神圣罗马帝国向摩拉维亚扩张…… 22
第四节 神圣罗马帝国向北德平原扩张…… 27
第三章 波罗的海周边地区的族群结构…… 33
第一节 波兰王国的崛起…… 33
第二节 波罗的人的分布区域…… 37
第三节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日耳曼人…… 42
第四节 乌拉尔人早期的分布范围…… 44
第五节 乌拉尔人的迁徙…… 47
第六节 乌拉尔人由渔猎生活向游牧生活转换…… 50
第四章 匈牙利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的建立…… 54
第一节 马扎尔人从西西伯利亚进入欧洲…… 54
第二节 马扎尔人建立匈牙利王国…… 56
第三节 匈牙利王国建立对欧洲的影响…… 58
第四节 保加尔人入主多瑙河下游平原…… 60
第五节 保加尔人建立保加利亚王国…… 63
第六节 保加利亚王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博弈…… 65
第七节 保加利亚皈依东正教…… 67
第八节 保加利亚攻打君士坦丁堡…… 69
第五章 基辅罗斯的建立…… 71
第一节 瑞典人登陆东欧大陆…… 71
第二节 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贸易商路…… 74
第三节 瑞典人在伊尔门平原建立诺夫哥罗德城…… 76

第四节 瑞典人南下第聂伯河流域建立基辅罗斯…… 78
第六章 哈扎尔汗国在南俄草原的崛起…… 82
第一节 南俄草原上的突厥人…… 82
第二节 草原丝绸之路开通的地缘背景…… 85
第三节 哈扎尔人建立商业王国…… 88
第四节 哈扎尔汗国皈依犹太教…… 90
第五节 哈扎尔汗国的立国基础和面临的地缘压力…… 93
第七章 基辅罗斯对周边地区的征战…… 97
第一节 基辅罗斯为贸易权攻击君士坦丁堡…… 97
第二节 基辅罗斯进攻保加利亚和伏尔加保加利亚…… 98
第三节 基辅罗斯皈依东正教…… 101

第二部分 维京人侵扰西欧

第八章 挪威人的海上扩张之路…… 105
第一节 挪威向海外探险的地缘背景…… 105
第二节 挪威人发现并殖民设得兰群岛…… 107
第三节 挪威人发现格陵兰岛和冰岛…… 109
第四节 小冰河期对欧洲的影响…… 112
第九章 维京人对西欧的侵扰…… 115
第一节 挪威人入侵不列颠…… 115
第二节 丹麦的历史地理结构…… 116
第三节 丹麦人侵扰欧洲大陆…… 120
第十章 丹麦人入侵并殖民不列颠…… 123
第一节 英格兰的七国时代…… 123
第二节 康沃尔地区的沉浮史…… 124
第三节 维京人登陆英格兰地区…… 126
第四节 阿尔弗烈德大帝抵御丹麦人…… 128
第五节 不列颠岛上的民族融合问题…… 130
第六节 维京人入侵对苏格兰地区的影响…… 133
第十一章 丹麦人建立诺曼底公国和入主英格兰…… 137
第一节 诺曼底公国的建立…… 137
第二节 丹麦王国征服英格兰建立北海帝国…… 139
第三节 诺曼人入侵并征服英格兰…… 142
第四节 英格兰大宪章产生的历史背景…… 146

第三部分 十字军东征

第十二章 十字军东征前的地中海政治格局…… 150
第一节 十字东征的地缘背景…… 150
第二节 诺曼人进军南意大利地区…… 151
第三节 诺曼人在南意大利建立西西里王国…… 154
第四节 威尼斯城的形成背景…… 156
第五节 威尼斯命运改变的契机…… 158
第六节 威尼斯参与地中海的海上争霸…… 161
第七节 意大利半岛西海岸开展海洋贸易的地区…… 165
第八节 比萨和热那亚在海洋贸易上的竞争关系…… 168
第十三章 阿拉伯帝国的兴衰 …… 172
第一节 伊斯兰教早期继承人的推选…… 172
第二节 伍麦叶王朝的建立…… 174
第三节 阿拔斯王朝的建立…… 176
第四节 波斯人与突厥人在阿拔斯王朝的地位…… 179
第五节 什叶派穆斯林建立伊德里斯王朝…… 180
第六节 法蒂玛王朝的建立…… 182
第十四章 伊朗和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演变…… 185
第一节 白益和萨曼王朝在伊朗高原的分治…… 185
第二节 伽色尼王朝和喀喇汗国的崛起…… 187
第三节 伽色尼王朝吞并锡斯坦并向印度扩张…… 189
第四节 迦色尼引入塞尔柱人…… 191
第五节 塞尔柱人入主阿拉伯帝国…… 193
第六节 塞尔柱从绿衣大食夺回西亚裂谷带…… 195
第七节 塞尔柱人征服高加索地区…… 197
第八节 塞尔柱人进取亚美尼亚…… 198
第十五章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203
第一节 十字军东征的组成人员和进军路线…… 203
第二节 十字军建立埃德萨伯国…… 206
第三节 十字军建立安条克公国…… 209
第四节 耶路撒冷王国和的黎波里伯国的建立…… 210
第五节 古拉姆军人建立赞吉王朝…… 212
第十六章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215

第一节 第二批十字军的组成结构特点…… 215
第二节 第二批十字军的进军路线…… 216
第三节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无果而终…… 218
第四节 十字军骑士国和拜占庭结盟并进攻埃及…… 220
第五节 萨拉丁建立阿尤布王朝并攻取耶路撒冷…… 222
第十七章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226
第一节 德皇腓特烈一世领军参与十字军东征…… 226
第二节 狮心王理查从海路出发东征…… 229
第三节 狮心王理查与萨拉丁的对决…… 230
第四节 威尼斯与热纳亚争夺海上贸易权…… 233
第十八章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237
第一节 威尼斯将十字军引向君士坦丁堡…… 237
第二节 十字军攻下君士坦丁堡…… 238
第三节 拉丁帝国的建立…… 240
第四节 拜占庭帝国的复国…… 242
第十九章 北方十字军战场的开辟…… 244
第一节 十字军三大骑士团的建立…… 244
第二节 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最终命运…… 246
第三节 条顿骑士团帮助匈牙利抵御钦察人…… 248
第四节 条顿骑士团应波兰人之邀征战普鲁士…… 250
第五节 条顿骑士团完成对古普鲁士的征服…… 252
第六节 圣剑骑士团的衰弱…… 254
第二十章 条顿骑士团与立陶宛及波兰的博弈…… 256
第一节 立陶宛人维持独立地位的方式…… 256
第二节 立陶宛向白俄罗斯地区扩张…… 257
第三节 波兰与立陶宛的结盟…… 260
第四节 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 261
第五节 格伦瓦德战役…… 263
第六节 十六年战争…… 265
第七节 汉萨国盟的形成…… 267
第六节 卡尔马同盟的建立…… 270

第四部分 蒙古西征

第二十一章 西辽和花剌子模在中亚的兴起…… 274
第一节 辽王朝的崛起…… 274

第二节 契丹余部征服东喀喇汗王朝建立西辽…… 275
第三节 西辽与塞尔柱人展开卡特万之战…… 278
第四节 花剌子模的崛起…… 280
第五节 花剌子模的对外扩张…… 283
第六节 西辽的衰弱与蒙古的兴起…… 285
第二十二章 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及对欧亚的探路之行…… 287
第一节 蒙古人西征并灭亡西辽…… 287
第二节 蒙古攻灭花剌子模…… 290
第三节 蒙古侵入印度追击扎兰丁…… 294
第四节 蒙古西征军进入阿塞拜疆…… 297
第五节 格鲁吉亚人抵抗蒙古西征军队…… 301
第六节 北高加索地区复杂的民族结构…… 306
第六节 蒙古人进入北高加索并击败阿兰人…… 308
第七节 蒙古人进入南俄草原…… 312
第八节 罗斯军队与蒙古远征军的交战…… 314
第九节 蒙古人与保加尔人短暂交战…… 317
第二十三章 蒙古人西征欧洲…… 320
第一节 蒙古人进攻罗斯伏尔加河流域…… 320
第二节 蒙古人围攻辅及放弃对诺夫哥罗德的征服…… 322
第三节 蒙古人进攻前的多瑙河中下游局势…… 325
第四节 蒙古人进攻匈牙利王国…… 327
第五节 匈牙利人失败的原因…… 332
第六节 列格尼卡战役…… 333
第七节 蒙古人在匈牙利扩大战果…… 337
第八节 拔都结束西征的返程…… 339
第九节 蒙古军经保加利亚返回南俄草原…… 341
第二十四章 蒙古西征西亚…… 343
第一节 蒙古人对西伊朗的征服…… 343
第二节 蒙古入侵罗姆苏丹国…… 345
第三节 蒙古人攻灭木剌夷国…… 348
第四节 西辽和花剌子模在西亚的复国…… 350
第五节 马穆鲁克军人在埃及的上位…… 353
第六节 马穆鲁克的崛起与十字军东征的关系…… 354
第七节 蒙古进攻巴格达和叙利亚…… 356
第八节 十字军与蒙古人关系的交恶…… 359
第九节 马穆鲁克骑兵与蒙古骑兵的对决…… 360

第二十五章 伊尔汗国的建立及与周边的关系…… 364
第一节 旭烈兀建立伊尔汗国…… 364
第二节 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 365
第三节 马穆鲁克王朝和伊尔汗国的博弈…… 367
第四节 蒙古帝国的分裂…… 370
第五节 窝阔台和拖雷在中原及漠北的封地…… 371

第五部分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与扩张

第二十六章 奥斯曼的兴起及向欧洲的渗透…… 375
第一节 奥斯曼的独立…… 375
第二节 奥斯曼夺取拜占庭领土…… 376
第三节 奥斯曼人向巴尔干半岛渗透…… 378
第四节 巴尔干半岛的地缘政治格局…… 381
第五节 威尼斯与热那亚展开贸易权的争夺战…… 384
第六节 奥斯曼登陆加利波利半岛…… 385
第二十七章 南斯拉夫民族演变与巴尔干半岛地缘结构…… 388
第一节 斯拉夫人进入文明期及其扩张方向…… 388
第二节 南迁的斯拉夫人的命运…… 389
第三节 克罗地亚王国的建立…… 392
第四节 克罗地亚王国并入匈牙利…… 394
第五节 波黑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地缘结构…… 396
第六节 大摩拉瓦河上游的地理结构…… 399
第七节 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在马其顿的扩张…… 402
第八节 塞尔维亚人渗透黑山地区…… 405
第九节 黑山地区的地缘结构…… 408
第二十八章 奥斯曼进军巴尔干地区…… 411
第一节 奥斯曼人占领色雷斯地区…… 411
第二节 奥斯曼在马里查战役击败基督教联军…… 413
第三节 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的地缘关系…… 415
第四节 奥斯曼在科索沃战役击败塞尔维亚人…… 417
第二十九章 新十字军与帖木尔帝国进攻奥斯曼…… 420
第一节 奥斯曼与新十字军展开尼科堡会战…… 420
第二节 帖木儿帝国的崛起…… 422
第三节 帖木尔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决战…… 424

第四节 帖木尔欲重建蒙古帝国并计划远征明朝…… 425
第五节 波兰匈牙利联军进攻色雷斯…… 427
第三十章 奥斯曼征服巴尔干半岛…… 431
第一节 奥斯曼围攻君士坦丁堡…… 431
第二节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434
第三节 奥斯曼攻灭塞尔维亚王国…… 437
第四节 奥斯曼在被统治区的民族和宗教政策…… 438
第五节 奥斯曼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扩张受阻…… 441
第六节 奥斯曼征服阿尔巴尼亚地区…… 443
第七节 杜布罗夫尼克在海洋贸易的异军突起…… 445
第三十一章 奥斯曼向黑海沿岸地区扩张…… 448
第一节 奥斯曼吞并原拜占庭帝国其他地区…… 448
第二节 奥斯曼羁縻克里米亚汗国…… 449
第三节 奥斯曼征服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 451
第三十二章 波斯萨非王朝的兴起及与奥斯曼的对抗…… 454
第一节 阿塞拜疆突厥人建立萨非王朝…… 454
第二节 萨非王朝在民族和宗教的政策…… 456
第三节 库尔德人的历史渊源…… 458
第四节 库尔德人登上历史的舞台…… 461
第五节 库尔德人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的角色…… 463
第三十三章 奥斯曼向埃及和多瑙河中游扩张…… 466
第一节 奥斯曼灭亡马穆鲁克王朝…… 466
第二节 奥斯曼帝国在东西线的的控制范围…… 468
第三节 奥斯曼向多瑙河中游平原扩张…… 470
第四节 奥斯曼在匈牙利扩张对欧洲的影响…… 472



第一部分

欧洲各封建王国的建立

第一章 查理曼帝国的扩张

第一节 阿拉伯帝国占领伊比利亚半岛

摩尔人灭亡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哥特王国

“日耳曼战国时代”与中国的“战国时代”历时都为200年以上。这样长的时间跨度，足以体现出地缘影响力，并且帮助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来探究王朝兴衰的幕后推手了。虽然阴谋论者非常愿意相信，历史是由一些事先谋划的阴谋决定的，但在现实世界里，即使是大帝级的英雄人物，能做的也只是顺势而为。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复杂了，没有人能够想到，一只亚马逊森林的蝴蝶扇动翅膀后，可能会在两周后的千里之外，引发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

公元610年，引发日耳曼战国时代终结的这只“蝴蝶”，在阿拉伯半岛赛拉特山脉中部的一个山洞里，扇动了一下翅膀。25年后，一个强大、空前的西亚帝国崛起于荒漠，并开始同时挑战拜占庭、萨珊波斯两大帝国。说到这里，大家肯定都已经知道这只引发连锁反应的“蝴蝶”，是曾经在“希拉山洞”（麦加附近）顿悟，并随即创立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诸部的先知——穆罕默德了。

阿拉伯帝国与西方的博弈，是整个中世纪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后面还会花很多时间，来解读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对于公元7世纪中叶的日耳曼人来说，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宗教还很遥远。即使进入文明进程的日耳曼人，已经学会了“以史为鉴”，历史经验也会告诉他们，来自亚洲的威胁，至多只会威胁到希腊半岛和埃及。然而仅仅在阿拉伯先知走出“希拉山洞”后的第101年，日耳曼人就惊讶的发现，荒漠游牧者们居然出现在了欧洲的最西端。

在阿拉伯帝国扩张到西北非之前，源自西北非的那些游牧土著（柏柏尔人），被称之为 “摩尔人”，而当阿拉伯人出现在这片土地后，摩尔人就成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统称了。很显然，欧洲人并不认为这二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其实无论从地理还是气候环境看，阿拉伯半岛完全就是与北非一体的。农耕的埃及人、在西北非游牧的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犹太人一样同属原始闪含民族的后代。事实上如果不是强大的尼罗河文明横亘其间，地缘属性相通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之间的融合应该会更早。

当然，从政治和文化角度看，欧洲当下所遭遇的是一场来自亚洲的，打上阿拉伯和穆斯林标签的战争。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帝国能够从伊比利亚方向入侵欧洲，那些拥有共同祖先的西北非土著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最起码在汉尼拔时代，他们就已经开始作为雇佣军出现在欧洲的土地上了。公元711年，摩尔人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本来地缘位置最安全的西哥特王国，突然发现自己经营了将近300

年的西班牙地区，居然成为了日耳曼世界的前线。仅仅在 3 年之后，摩尔人就灭亡了西哥特王国，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土地。

法兰克王国阻止阿拉伯帝国向高卢扩张

不过西哥特王国虽然灭亡了，却并不代表日耳曼人完全退出了伊比利亚。西哥特人的残余力量，随后退至西班牙北部组建了一个叫做“阿斯图里亚斯”的王国（后来又陆续分裂、扩张出几个日耳曼小国）。这片为西哥特人保存火种的沿海山地，一直以来也是伊比利亚半岛内，最难征服的地区。在迦太基部分，我们曾经解读过伊比利亚半岛的地理结构。总的来说，这是个高地为主的半岛（梅塞塔高原），除了边缘自然形成的沿海低地以外，低地主要集中在一些源出高原的大型河谷地区。其中西侧由葡萄牙入海的特茹河、西班牙南部的瓜达尔基维尔河，以及东北部哺育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埃布罗河，是伊比利亚半岛境内的主要大河。相比之下，缺乏大型河谷平原的半岛北部，对征服者的吸引力也就不大了。比如当年的汉尼拔，在巩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统治后，就开始翻越比利牛斯山脉了。



伊比利亚地缘结构图

摩尔人入侵伊比利亚之举，完全就是当年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的翻版。很显然，他们也不会一定要在完全控制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再北上富庶的高卢。尤其西哥特王国，本来也就控制着法国南部，那条连接意大利半岛的沿海通道。仅仅在入侵伊比利亚的第二年，摩尔人就扩张到了这一地区。然而不管阿拉伯人的下一步目标，是复制汉尼拔的壮举，还是准备北上高卢，他们都将面临比汉尼拔困难得多的局面。

在汉尼拔准备远征罗马的时候，凯尔特人统治下的高卢地区，还属于未开化的、

松散的部落结构地区。由于深受罗马的压迫，高卢人甚至成为了汉尼拔最坚定的盟友。可以说，如果没有从战略层面上，预判高卢人会站在自己这边，汉尼拔是绝对不可能进行那场史诗般的远征。然而阿拉伯人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却恰恰相反。此时的高卢，已经统一在法兰克王国手中。更为不利的是，无论从民族、宗教，还是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法兰克人都只会成为阿拉伯人敌人。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人想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法兰克王国的强力反击，阻止了阿拉伯帝国在高卢的扩张。并且通过 20 年的拉锯战，迫使对手战略上放弃了继续征服高卢的想法，转而将精力放在消化伊比利亚半岛上（尤其是半岛北部还存在日耳曼势力的情况下）。至于法兰克人，也很自然的“接收”了原属西哥特王国的，塞文山脉以南地区，打通了通往伊比利亚和意大利半岛的沿海通道。按照今天的行政划分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法兰克人藉由抵抗阿拉伯入侵的契机，完成了对法国的统一。

上述一切都发生在未来的查理大帝，夺得法兰克王权之前。这也意味着，国王查理要想成为“大帝”，一定要在法国以外有所作为了。至于法兰克王国的扩张方向在哪里，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二节 基督教的分裂

拜占庭帝国提高罗马主教的地位

对于法兰克人来说，现在的战略形势不是好，而是太好了。西哥特王国已经被阿拉伯帝国灭亡，其残余在西班牙北部的势力，更多是在为法兰克王国牵制摩尔人；意大利的伦巴底王国，还在为统一意大利的事情而烦恼。未来的查理大帝所要思考的，无非是自己应该从哪里下手。问题在于，一个强大帝国的理想边界到底在哪？“大帝”们自己也未必知道。对于很多征服者来说，他们更相信战场上实力能决定一切。

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征服者会以自己的“国家”为起点，向各个方向尝试。直到有一天在某个地区碰壁，才会停下远征的脚步。查理大帝就是这种情况，在其为法兰克王国开疆拓土的近半个世纪中，与法兰克接壤的每一个板块都燃起了战火。首先成为他征服对象的，是意大利半岛的伦巴第人。应该说，战争本身并没有什么悬念。不到一年时间，伦巴第人统治下的北意大利，就成为了法兰克的领土。这场战争中最值得关注的，也最有地缘意义的，是法兰克人发动战争的理由（虽然理由总是会有的）。

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来自于一个特殊的政治体——教皇国。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境内，仍然能够看到的以“梵蒂冈”为名的国家，就是教皇国的遗产。这个世界最小国，也是为数不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可以从后面的内容中找到原因）。对于历史和国际政治略感兴趣的人，应该都知道基督教经历过两次大分裂。第一次分裂出天主教、东正教两大派别；第二次，又从天主教世界分裂出“新教”（16 世纪）。罗马则是

天主教教皇和教廷所在地。这种超脱政治的宗教地位，也是其至今仍拥有超然地位的原因所在。

基督教的第一次正式分裂，是在 11 世纪中叶。当然在此之前，东、西教会之间早已貌合神离了（这其中的地缘背景，也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主教，又称“罗马天主教”。所谓“东正教”的正式名称则为“正统天主教会”，只不过为了区别前者，被加上方位简称为东正教了。从这个角度说，二者在分裂之前都算是“天主教”。至于分裂的种子，则在君士坦丁大帝东迁之时，就已经埋下了。

当拜占庭成为“新罗马”后，罗马帝国的政治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了。在日耳曼人实际控制西地中海，并且架空西罗马皇帝的公元 5 世纪，东、西罗马人都意识到，提升罗马教区的地位，有助于帮助混乱的西地中海重新建立秩序。也就是说，罗马人仍然希望以双中心的方式，统一地中海世界。只不过君士坦丁堡承担的是政治中心任务，而罗马则用宗教中心的价值，来补足政治控制力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主教的地位上升为了“教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教皇”了。为了维系教廷的运转，教廷在罗马所在的台伯河流域保有一定领地，而为了统治这些领地，又诞生了直接听命于教廷的贵族政治体系，并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教皇国”。

在拜占庭已经意识到，既不可能把日耳曼人赶出地中海，又不可能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把那些日耳曼王国变回行省的情况下，设计的这种政、教双中心模式，有其技术上的合理性。身处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认为（他们可不认为自己只是什么东罗马的皇帝），如果日耳曼诸王国都信仰天主教（从而受教宗控制），而身处罗马的教皇又受他们控制的话，那么君士坦丁堡的皇权，就仍然可以在西地中海延伸了。

罗马教廷避免成为伦巴第人的傀儡

就传教这点来说，罗马教廷还是做的不错的。最起码西哥特、法兰克、伦巴第这三大日耳曼王国，都先后归依了天主教。不过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宗教的力量，而是各大日耳曼王国内部融合的需要。当征服者在人口、文化都处于弱势时，选择接受被征服者的信仰，有助于与之拉近心理距离，从而赢得政治稳定。回顾中央之国的历史，大家就应该很好理解日耳曼人的选择了。

然而即使日耳曼人都信仰了天主教，也并不代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就此延伸到西地中海。事实上，这也是拜占庭帝国在面临伦巴第、萨珊、阿拉伯的多重压力时，仍然还在竭力在意大利半岛保留据点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拜占庭需要为罗马的教宗提供看的见的“保护”，才能保证自己的皇权能够置于教权之上。问题在于，东线牵扯了拜占庭帝国的太多精力，尤其是阿拉伯帝国崛起并从拜占庭手中夺取北非后，君士坦丁堡再想维持在意大利半岛的存在，就变得异常的困难了。

由此看来，当年飞出“希拉山洞”的那只蝴蝶，不仅从伊比利亚方向影响了欧洲的命运，还间接影响了意大利半岛的地缘政治格局。当拜占庭无力维持在意大利半岛

的存在时，直接受益的自然就是一直试图统一意大利半岛的伦巴第人了。公元 751 年，伦巴第王国攻陷了拜占庭帝国在波河平原的领地，开始了意大利统一之战。正常情况下，当拜占庭的势力逐渐被挤出意大利半岛后，伦巴第人并不会驱逐罗马教廷，而是会顺势成为教皇和教廷的新保护者，并以此来号令其他奉天主教为国教的日耳曼王国。按照中国人的说话，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并不能真的让其他竞争者臣服，一切都还是要靠实力说话，但能够让教皇听命于自己，在政治上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参考曹操的案例）。对于那些笃信天主教的民众来说，到底是听命于世俗的统治者，还是教廷会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明智的统治者，最好是让自己和罗马教廷达成共识，形成利益共同体。

从罗马教廷的角度来看，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伦巴第人统一意大利。因为这样的话，被一个国家完全包围的罗马教廷，将成为真正的傀儡。依照地缘政治原则，教廷宁愿选择与意大利半岛之外的日耳曼王国结盟，以避免出现伦巴第一家独大的局面。由于西哥特王国已经亡于阿拉伯帝国之手了，能够成为选项的其实就只有法兰克王国了。至于法兰克王国，当然是没有理由拒绝这个机会了。

第三节 丕平献土与教皇国的建立

法兰克王国军队击败伦巴第并扶持教皇国

最先受罗马教皇邀请，入侵意大利的，并非未来的查理大帝，而是他的父亲“丕平”，史称“矮子丕平”（西方重名的太多，只能用外号区别）。公元 753、756 年，法兰克王国的军队，在他的率领下两次击败伦巴第王国。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丕平只是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正是凭借操办与教廷的政治交易，而公私兼顾的上位成为了法兰克国王。之所以要特别介绍一下查理曼的父亲，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查理帝国奠定了基础，更是因为所谓的“教皇国”，是在他的主导下成型的。

当法兰克王国将教廷视为可以“远交”的盟友时，帮助盟友在对手（伦巴第王国）的势力范围内做大、挤压对手的空间就成为了选项。为此，法兰克王国将从伦巴第人手中夺取的大片意大利中部的土地（其实是拜占庭的了）送给了罗马教廷，史称“丕平献土”。从此以后，教廷的地缘价值，就不再是一个拥有少量采邑自给的宗教组织，而成为了一个有实力发动战争，与邻国争夺领土的，真正的国家了。

实际上，从所附的《查里曼帝国地缘结构图》中，大家就可以看出，从罗马一直延伸到波河平原南部的“教皇国”，相当于从中部将意大利半岛一分为二了。尤其中间还分隔着亚平宁山脉的情况下，以这样的地缘结构立国是很不稳固的。然而正是因为教皇国宗教权力的存在，才使得其能够如此突兀的存在。这一点，与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领地横亘于韩国境内，却还能长期存在的情况是一样的。

教皇国的建立虽然对西欧的政治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于意大利半岛本身的地缘政治完整性，却是致命的伤害。这意味着，谁想统一意大利半岛，都将遇到教皇国，以及那些以保护教皇为名（实际是不希望对手做大）的天主教国家的反对。攻灭伦巴第王国的查理大帝，会怎样处理与教皇国的关系？



查理曼帝国地缘结构图

如何处理与教皇国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君权与神权谁置于其上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说，拜占庭的选择是君权大于神权的模式。一方面，帝国半部领土在亚洲，东方世界原有的君主制模式（包括埃及也是），不可避免的对拜占庭帝国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罗马帝国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人已经花了数百年时间，渐进式的适应从共和到帝国转变。这一进程也使得罗马认同的稳固程度，远高于它的对手。对于一个板块结构复杂的帝国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反观日耳曼人，则没有这种政治遗产了。即使是一个日耳曼王国内部，也只是由松散的部落体，升级至封建制结构。这里所说的“封建”，当然不是我们多年来被教材所误导的那种中国式“封建社会”了（其实是中央集权）。虽然为了对应古代中国的爵位分封，欧洲的爵位也会翻译成公、侯、伯、子、男几级，但在中国的所谓“封建社会”中，这些爵位基本是不会对应封地的（而是一个级别）。至于欧洲则是真正的层层分封，各有领地。这种结构下的欧洲，就像一个个模块组合在一起。那些各自拥有运营系统的大小模块，虽然要宣誓对自己的上一级封建主效忠，但从技术上看，重新排列组合的难度要小的多。

罗马教廷存在的必要性及对意大利统一的影响

这样看起来，罗马教廷倒是很有存在的必要了。最起码日耳曼人基本都已经归依了天主教。从技术上看，你只要取得在天主教世界内部的相对优势，就很有机会与教

廷达成共识（教廷也是识时务的）。相比去打破那些政治藩篱，成本要低的多。基于这一理由，即使法兰克王国已经吞并了伦巴第王国，并有机会让教皇国成为自己的附庸，也没有必要去损害教廷的利益。作为交换，教皇在公元 800 年为日耳曼人加冕了第一位皇帝——查理大帝。有了这一超越王权的封号，查理曼在理论上成为了所有日耳曼天主教国家的最高领袖。

当然，所有的联盟得以形成，都是因为双方能够恪守自己的利益边界，客观上不让自己威胁到盟友安全为前提的。如果一方觉得联盟的最终结果，是被对方吞噬，那么就会寻找其他合纵连横的组合了。从这一层面来看，法兰克王国想要通过“神”的授权晋升为“帝国”，仅靠承诺是不够的。反映到地缘政治格局上，就是查理曼帝国在战略上需要放弃征服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想法。这种放弃，并不仅仅指拜占庭所占领的“大希腊地区”，也包括教皇国南部，与拜占庭之间的中南部地区。这样的话，不管法兰克人在西欧大陆如何强大，教廷所在的意大利半岛，都还处在一个小战国状态。而拥有最高宗教权力的教廷，则拥有巨大的外交空间。

意大利半岛的这种破碎的地缘政治格局，一直贯穿了整个中世纪。一直到 19 世纪中叶，悲剧的半岛才重新建立统一王国。不过如果不是对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的话，大家倒不必去强记每个时代，出现在意大利的各个政治体。只需明白，教皇国的存在是这一切的根源。另外通过上述解读，我们最起码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世纪的意大利半岛本身，已经不再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主导者了；二是基于意大利半岛乃至整个欧洲破碎的地缘政治结构，神权置于君权之上的格局，将一直延续到新纪元的到来。

第四节 查理曼在日耳曼尼亚扩张遇阻

法兰克王国扩张至易北河

既然意大利半岛已经不再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主导者了，那么谁会取而代之呢？很显然罗马帝国和日耳曼人先后经营了 800 年的高卢地区，是条件最成熟的。在解决了意大利半岛的问题后，法兰克王国将扩张的方向投向了日耳曼尼亚。事实上，早在公元 6 世纪，法兰克王国就已经控制了整个莱茵河流域。那些莱茵河流域以东的日耳曼尼亚人，比如留在易北河下游的那部分萨克森人，巴伐利亚高原的巴伐利亚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示愿意成为法兰克王国的附庸（以比“王国”低一级的“公国”的名义），但对于一个未来的帝国来说，这种羁縻统治显然是不够的。

总的来说，查理曼对日耳曼亚的征服算是成功了一半。不过这位伟大的查理，将帝国的边界扩张至了今天的德、波边界（奥德河——尼斯河）后，很快又退回了易北河西岸。也就是说，法兰克王国最终的东部边界是在易北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现在的易北河之东，已经是另一个民族——斯拉夫人的世界了。前面的内容我们曾经提过，斯拉夫人的发源之地，是在中欧平原最东部的大河——维斯瓦河流域。

在匈人入侵所引发的那场民族大迁徙中，斯拉夫人也向西扩张至了奥得河、易北河流域。这倒不是说，匈人直接给斯拉夫人造成了多大压力。而是日耳曼人既然大举向西罗马渗透的情况下，他们身后所留下的空间，总是要有人来填补的。



查理曼帝国地缘结构图

关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恩怨，大多数人是通过德、俄之间的博弈了解到的。对于这两大民族或者政治集团来说，最大的问题永远是，哪里才是双方的平衡线。在波状起伏的“中欧平原”上，并没有高大山脉分割这两大民族。唯一能够帮助大家划分边界的，只有一条条北流入海的河流。至于到底是哪条河流，谁也不好说。

斯拉夫人渗透至巴尔干半岛北部

对于罗马人来说，日耳曼人是不折不扣的蛮族。不过在与罗马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之后，即使是身处中欧的日耳曼人，也已经变得“文明”一些了。最起码他们已经学会模仿罗马的一些方式，组建自己的国家，并且将农业开发作为重心了。相比之下，远离地中海文明的斯拉夫人就仍然处在原始公社状态。这也使得长期以来，斯拉夫人成为了日耳曼人眼中的“蛮族”。说起来这也颇具讽刺意味，每一个完成文明进化的“蛮族”，都会反过来鄙视那些文明层级更低的民族。比如在中央之国，完成汉化的“鲜卑人”，就鄙视的称蒙古草原上的柔然人为“蠕蠕”。

有日耳曼人横在中间，斯拉夫人想要沐浴地中海的阳光，看起来机会应该很渺茫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没有谁规定，斯拉夫人只能向西扩张。既然当初日耳曼人能够南下多瑙河中、下游，那么斯拉夫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要知道，如果按照这样的路径走，斯拉夫人就能接触到罗马文明的真正继承者——拜占庭帝国，而不是日耳曼人这样的二道贩子了。事实上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在查理曼发力扩张之时，斯拉夫人已经渗透到了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那些山地当中。

按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我们可以把这些南下的斯拉夫人称之为斯洛文尼亚人、

克罗的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不过从地缘角度看，大家并没有必要一定去分清他们之间的区别和源流，因为“南斯拉夫人”这个标签，就足以将渗透至此的斯拉夫民族概括进去了。当然，鉴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复杂的地形，试图以共同的族群归属将之整合为一个国家，困难也是很大的。最起码“前南斯拉夫”失败的案例，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既然南下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被我们归类为“南斯拉夫人”，那么在中欧平原的斯拉夫人，就是“西斯拉夫人”了。至于东斯拉夫人，很不幸，他们所处的位置是最远离文明区的东欧平原北部，也是最后完成文明进行程的。不过后来真正让斯拉夫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却正是以俄罗斯族为代表的东斯拉夫集团（还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人）。

从日耳曼人的角度，他们当然很希望征服整个中欧平原了。在整个中世纪，“宗教”成为了地缘博弈的最显性特征。或者说，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竞争，都被掩盖在了宗教这面神圣的大旗之下。比如查理曼帝国对东部的扩张，就打着传播天主教的旗号。只不过，想让一个语言、文化迥异的民族接受融合，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最起码查理曼是没有时间看到这点了。

既然融合斯拉夫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查理曼可以选一些相对相容易的点下手。那么下一个又会是谁呢？

第五节 查理曼帝国在周边的扩张

查理曼未能真正征服布列塔尼

需要说明的是，查理曼帝国的东部边界最北端，跨越了易北河口，扩张到了日德兰半岛南部。不过帝国并没有试图征服北欧，毕竟这个世界还有太多可供扩张的方向了，实在没有必要去招惹那些野蛮的远亲。更何况要想占领波罗的海沿岸这片苦寒之地，没有强大的海军是做不到的。其实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那些以“维京人”为标签南下的北欧海盗们，是如何反过来在那些先行者的碗里分一杯羹的。

对于法兰克人来说，要是真有海战的想法，倒不如把不列颠作为远征的方向。只是在此之前，他们需要先解决号称“小不列颠”的布列塔尼亚的问题（布列塔尼就是“小不列颠”的意思）。虽然从实力对比来看，这应该是最没有难度的了。然而事情的进展，却未能如预想中那么顺利。查理曼在这个方向所取得的成就，只是让布列塔尼王国短暂的从王国改称“公国”（以表示归顺查理曼帝国），并没有真正完成征服。即使是这种表面臣服，也在查理曼死后宣告结束。事实上一直到 15 世纪，布列塔尼都拥有政治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否表面臣服于法国国王）。

以布列塔尼本身的纵深来说，本来是没有机会长时间独立生存下去的。此类小国能够独立，往往是因为处在两大政治板块相接之地，需要被充当跳板或者缓冲。从地



查理曼帝国地缘结构图

缘位置上看，维系布列塔尼独立地位的幕后推手，很显然来自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在查理曼征服时期，帮助小不列颠人的，是坚守在不列颠西部的凯尔特同族。而当历史进入英、法相争阶段时，出于左右欧洲大陆局势的目的，热衷于维持布列塔尼独立地位的，就变成英格兰人了。

要想彻底解决布列塔尼问题，法兰克需要从一个陆权大国，转变为一个海权强国。问题在于，对于这个迅速扩张的国家来说，大陆事务已经够多的了。事实上，这也是后来的法兰西（法国）一直以来的困扰所在。在欧洲大陆的相对优势，总是让他们在向海外扩张时患得患失。好在能否彻底征服这些小布列颠人并无伤大局，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帝国来说，查理曼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法兰克人对抗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摩尔人

前面我们也说了，“宗教”已经成为中世纪地缘博弈最华丽的外衣。查理曼能够登上帝位，技术上得到了教廷的“神授”，扩张也是以传播天主教为名的。既然如此，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的控制权，就是查理曼最优先需要考虑的了。其实即使不考虑宗教原因，为了维系在日耳曼世界的领袖地位，法兰克人也不可能和阿拉伯帝国和平相处的。从地缘关系上看，如果说法兰克人是在再造罗马，那么阿拉伯人就是加强版的迦太基了。说起来历史也是一个轮回，当年建立迦太基的腓尼基人，也是从地中海之东的亚洲而来的。这些专注海上贸易的商人，与从沙漠中崛起的阿拉伯人，本身也拥有共同的祖先。

要想彻底将“摩尔人”赶出伊比利亚，最大的问题在于阿拉伯人同时还控制了北非。尽管和基督教世界一样，阿拉伯世界内部也分裂为了大小不等的国家，但这同样不妨碍他们在伊斯兰教的大旗之下，共同对抗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在这种泾渭分明的

对抗格局之下，伊比利亚半岛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地区。前后共用了 800 年时间，直到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取代阿拉伯帝国入主北非后，基督徒们才算借着这个穆斯林世界内乱的战略窗口，最终推进到了直布罗陀海峡。

查理曼自然是不知道，基督徒们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夺回伊比利亚的控制权。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帝国在这个方向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曾经一度推进到了埃布罗河，也就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母亲河。不过在查理曼死后，帝国在伊比利亚的防线，也被迫进行了收缩。加泰罗尼亚东北沿岸的巴塞罗纳城，成为了法兰克人对抗摩尔人的前沿。当然，法兰克人其实并没有在伊比利亚有太大作为。真正在伊比利亚半岛反击阿拉伯人的（包括加泰罗尼亚地区），还是那些西哥特贵族和遗民。他们在半岛北部所组成的那些小国，最终整合成了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

查理曼进攻多瑙河中游平原的阿尔瓦人

现在，通过上述解读，我们已经为新生的查理曼帝国划定了西、北、南的边界。在这向个方向，不列颠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摩尔人）这几个背后拥有纵深的族群，成为了日耳曼人进一步扩张的阻力。然而在上一个纪元，这些民族可都不是日耳曼人最可怕的敌人。在那时，震憾了整个欧洲的，是那些来自亚洲的“匈人”。尽管来自南俄草原的威胁，主要由拜占庭帝国去应对，但不要忘了，在多瑙河中游，还有一片曾经作为匈人西进基地的草原——匈牙利草原存在。即使无力控制这片草原，查理曼最起码也要拿下与之隔岸相望的潘诺尼亚平原，才能确保帝国（尤其是意大利半岛）不受游牧民族的威胁。



查理曼帝国地缘结构图

实际上，查理曼并不用等到入主潘诺尼亚，才会感觉到游牧民族的威胁，因为在伦巴第人入主意大利半岛之后，潘诺尼亚就已经被游牧民族所控制了。这支控制了整个多瑙河中游平原的游牧民族，被称之为“阿瓦尔人”（作为交换，阿瓦尔人也对伦巴第人西征，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关于这支游牧民族的来源，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唯一比较有共识的是，他们应该也是一支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各种说法中最吸引眼球的，是阿瓦尔人就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统治蒙古高原的“柔然”人。在突厥崛起之后，柔然人最

迫西迁南俄草原，直至入主匈牙利草原，占据潘诺尼亚。

我们一直说，草原上的事情连游牧民族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实阿瓦尔人到底来自哪里并不重要，因为这支游牧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过客，真正对历史和地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是在阿瓦人之后入主匈牙利草原的马扎尔人（后面我们会对此有所解读）。当然，如果柔然人是被一个华夏王朝所击败的话，估计阿瓦人在欧洲的这段历史，在中国的知名度就会高的多了。就像很多中国人，都知道有个“上帝之鞭”叫阿拉提，并得意的认为，中国人曾经间接左右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一样。

从地缘角度看，游牧民族占领农业区的难度，要远小于定居民族统治草原。这点从查理曼对阿瓦尔人的战争也可以看出。尽管凭借强大的实力，帝国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回了整个潘诺尼亚，并一度攻至匈牙利草原中部蒂萨河，但帝国还是希望遵循以多瑙河为边界的传统，并未试图直接占领匈牙利草原。只不过，今日不同往日，即使要做到这点也已经很困难的。在查理曼死后，陷入分裂的帝国最终还是放弃了潘诺尼亚。

在罗马时代，潘诺尼亚虽然在北、东两面，一直遭受着游牧民族和日耳曼人的重压，但最起码西面的意大利半岛、南面隶属巴尔干半岛的“伊利里亚”，能够给予这个边缘之地以支撑。这种平衡在罗马帝国陷入分裂后方被打破，日耳曼人、游牧民族先后成为潘诺尼亚的主人，并将此作为进一步渗透西欧的跳板。

对于已经统一西欧的法兰克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潘诺尼亚南、北两侧，都已经不属于日耳曼人的控制区了(虽然他们曾经做到过)除了东面的阿瓦尔人以外，西、南斯拉夫人，分别从波希米亚、伊利里亚两个方向，对潘诺尼亚形成了一个反 C 型的战略包围圈。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居于这些“蛮族”之间去耗费精力，倒不如让潘诺尼亚成为斯拉夫和阿瓦尔人之间的博弈舞台（尤其在帝国面临分裂、重整的情况下）。

第六节 查理曼帝国的分裂

查理曼帝国分割成三个王国

从东哥特人攻入罗马算起，至查理曼坐上帝国“皇帝”宝座，日耳曼人前后用了差不多 400 年时间，终于在西罗马的废墟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需要注意的是，教皇为这位法兰克国王加冕的是“罗马人的皇帝”。对于双方来说，这又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查理曼通过这一称号，将自己的帝国[1]“嫁接”到了罗马身上；教廷也可以因此让拜占廷人知道，自己仍然是整个“罗马”的宗教领袖（而不是只是蛮族和神之间的桥梁）。

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是有点难以调和的，那就是神权和君权谁大的问题。虽然

1 查理曼帝国是法兰克王国的一个鼎盛时期。法兰克王国包括了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其国祚到王国分裂后西法兰克王国进入卡佩王朝改称法兰西王国为止。查理曼帝国属于加洛林王朝的一个时期，又称加洛林帝国。

从技术的角度看，教皇是新“罗马皇帝”的加冕人，看起来应该是神权大了，但从现实来看，法兰克人在西欧独霸天下的局面，让教廷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根本无法找到制衡他的力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为了避免受控于拜占庭），教廷甚至伪造了一份文件，声称当年君士坦丁大帝已经将整个西罗马的政权移交给了罗马教廷（史称“君士坦丁的赠礼”）。以此推论，查理曼和后面称帝的人，就只是教廷的政治代理人了。

当然，此类说词能否起到作用，关键还是在于教廷将要面临的世俗竞争者是谁。如果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那么神权不可避免的会依附于君权，就像拜占庭那样。对于罗马教廷来说，最希望面对的是一个全民信仰天主教的、分裂的欧洲。法兰克人并没有让教廷失望，因为法兰克人并没有做好中央集权的思想准备。即使名义上建立了帝国，查理曼也仍然认为，以血缘为联系纽带的“分封制”，而不是赢家通吃的“中央集权制”，才是解决内部矛盾的最好办法。

帝国实际上在查理曼死后，就陷入权力斗争。公元 842 年，查理曼的儿孙们终于决定坐下来，根据公平原则签订了裂土封王的“凡尔登条约”。根据条约，查理曼帝国被分割为了三个部分，分别是：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很多时候这三个法兰克王国会被和现在法、意、德三国对应起来，并且被认为是上述三国分立的雏形，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先来看看查理曼是如何分配他的帝国的。



查理曼帝国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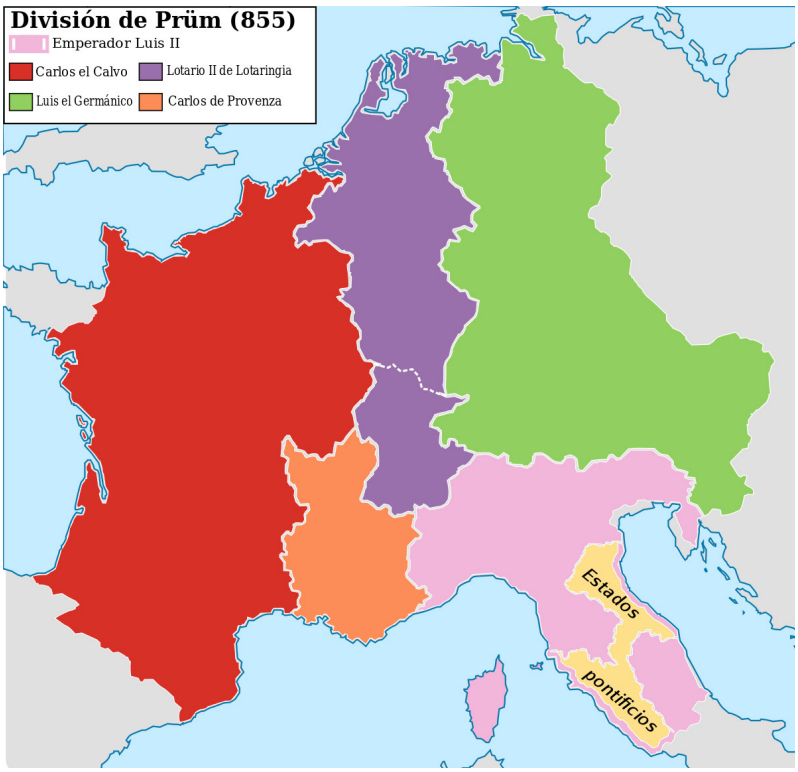
查理曼帝国地缘结构图

首先是西法兰克王国，除了延伸到巴塞罗纳的那个突出部，王国的领土都在法国境内。从这个角度看，法国人将自己国家的源头，上溯至西法兰克王国倒也有道理。不过当年的西法兰克王国在其东境，却没有延伸到莱茵河。有三个板块：普罗旺斯、勃艮第、以及洛林，并没有归入西法兰克境内。上述板块在之前的内容中，都曾经具体解读过。所谓普罗旺斯全称为“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意指阿尔卑斯山西南侧，至罗纳河三角洲的那片沿海地带；勃艮第的地理范围，则是包括索恩河在内的，除瑞士高原、罗纳河三角洲在内的“罗纳河流域”了。至于洛林，大家首先跃入脑海的，肯定是阿尔萨斯西侧，那片为摩泽尔河、马斯河上游所滋养的高地——洛林高地了（上述两条河流，皆为莱茵河左岸支流）。不过在中世纪，“洛林”这一地缘标签所指的范围要比现在大的多。包括洛林高地、阿登高原在内的，摩泽尔河、马斯河流域，以及整个比荷低地，都包括在“洛林”的范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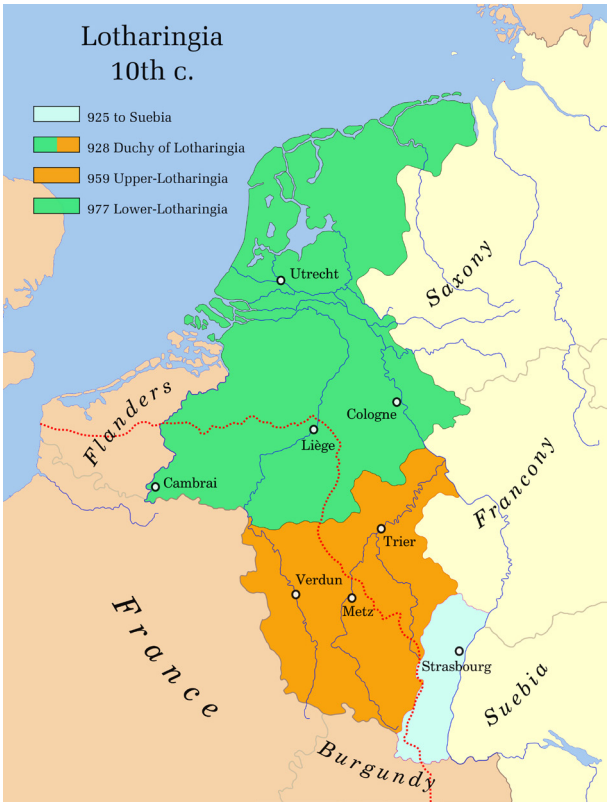
上述三个板块之所以没有成为西法兰克王国的领土，是因为他们和意大利半岛北部一起，成为了中法兰克的领土。事实上，做出这种安排的直接原因，也正是因为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领土，离三分之一的份额相去甚远。至于东法兰克王国，则大致继承的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尼亚”地区。除此之外，法国阿尔萨斯之北，隶属德国的那段“莱茵河中游河谷平原”，也整体属于东法兰克王国。

日耳曼人的拉丁化

三个法兰克王国分割的细节，大家可以参照《查里曼帝国地缘结构图》来细细品味。对于从地缘和大历史角度来观察这一切的我们来说，最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与东、西两个邻国相比，中法兰克王国的地缘结构明显缺乏稳定性。如此狭长且地缘结构复杂的国家，要是能够长时间屹立不倒，反倒是奇迹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



分裂的查理曼帝国



洛林王国示意图
洛林王国的分裂在 959 年
蓝色：阿尔萨斯，925 年转交施瓦本公国
橙色：上洛林（928 年）
绿色：下洛林（977 年）

法兰克王国内部很快通过继承权的平均分配，再次分裂为了洛林、勃艮第（包括普罗旺斯地区）、意大利三个王国。紧接着，离政治中心最远的洛林又被东、西法兰克王国所瓜分。很显然，意大利半岛 + 罗讷河谷的结构依然不可能保持稳定，加上教皇国在半岛中部的存在，中法兰克王国的继承者们，很显然没有机会成为主角了。所谓的法兰克“三国演义”，实际成为了东、西法兰克的两强对抗。

与其说查理曼的地缘遗产，奠定了法、德、意三国立国的基础，倒不如说是为后来法、德两国的领土之间，埋下了导火索。在后面的历史中我们会看到，高卢雄鸡和日耳曼战车，为了争夺中法兰克王国的北方遗产发动了多少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纯粹从找一条明确政治分割线的角度来看，当年凯撒以莱茵河为界划分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决定，反倒算是简单明了。事实上今天法德之间的边界，也的确更像是继承了凯撒大帝而不是查理大帝的遗产。当然，法德之间的边界问题，本质上还是由于二大板块之间缺乏明显、且能有效分割二者的地缘分割线的原因。相比之下，地缘政治结构更加混乱的意大利半岛，因为阿尔卑斯山脉能够起到有效分割作用，反倒在陆地边界上没有那么大的结构性矛盾。它所遇到的问题，更多是如何克服教皇国的影响，完成内部统一。

从地缘文化的角度来看，法兰克人的

影响力也远没有罗马人大。一个成功的民族是否完成对一个板块的征服，并不取决于政治上是否成为那片土地的主宰者，而在于有没有真正融合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们会看到，罗马帝国对高卢数百年的经营，以及其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已经让这片土地深深的打上的“拉丁”的烙印。即使法兰克人以及其他日耳曼部族完成了对高卢和意大利的征服，也未能将这两大板块日耳曼化。其中最显性的地缘特征，就是今天的法国和意大利，并不像德国那样属于“日耳曼语族”，而都属于“拉丁语族”地区。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即使被日耳曼人、阿拉伯人轮番统治，今天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也还是属于“拉丁语族”的成员。换句话说，除了留在日耳曼尼亚以及北欧的日耳曼人之外，那些深入西、南欧的日耳曼人，不管政治上曾经取得的多大成就，最终在文化上都被拉丁化了。唯一成为例外的，只有孤悬海外的不列颠。海洋的阻隔，以及北欧日耳曼人源源不断的输入，使之有机会消除罗马的影响，完成日耳曼进程（虽然还不算完全成功）。

尽管内部陷入了分裂，但查理曼为法兰克人争取来的帝位，还是名义上被保留了下来。在整个公元 9 世纪，“罗马皇帝”的称号，都在三大法兰克王国内部流转。然而正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法兰克人并没有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完成“法兰克化”或者说“日耳曼化”的进程。西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大部），被拉丁文化所融合。唯一能够保持日耳曼文化的，只有从未被罗马真正统治的，西法兰克王国治下的“日耳曼尼亚”。一个世纪以后，日耳曼尼亚与高卢地区的地缘博弈，终于撕去了“法兰克内斗”这层面纱，彻底回归了地缘博弈的本质。一个全新的，真正被现在日耳曼人视为“第一帝国”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开始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

第二章 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及向外扩张

第一节 德意志民族的形成

德意志内部的诸公国

今天“德意志”一词，已经取代了“日耳曼”成为了阿尔卑斯山以北这片土地的地缘标签。 “德意志”这一概念，最早正是出现在查理曼帝国建立后，所指向的是东部日耳曼人以及他们的语言。从心理上看自认为最有资格继承罗马文明，并且语言已经拉丁化了的法兰克人，会从很多方面瞧不起他们在莱茵河以东，以“德意志”为会签的远亲们。事实上直到今天，法国人仍然认为自己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语言、文化上的疏远感，让法兰克人在日耳曼尼亚的统治始终不是很稳固。日耳曼尼亚地区的地方事务，仍然由那些坚持日耳曼传统的地方势力所掌控。这种情况就像之前我们曾经举过的鲜卑的例子。当入主中原的鲜卑开始汉化进程后，他们再想直接统治北方那片游牧之地，就变得异常困难了。虽然高卢和日耳曼尼亚之间的地缘差异，并没有长城南北那么大，但在地缘结构本来就呈现破碎化、模块化的欧洲，其差异已经足以大到孕育出两个民族了。

东法兰克王国的建立，并没有对日耳曼尼亚的拉丁化进程有所促进。王国的绝大部分土地，被按照“封建”模式，置于了四个自治“公国”的统治下。他们分别是：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巴伐利亚。鉴于“德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我们很有必要对这些标签的地缘背景做一个了解。

在之前解读日耳曼尼亚的地缘结构时，我们曾经为之划定了一个由南向北的三级地形结构，分别是巴伐利亚高原、中德山地、中欧平原（西部）。观察东法兰克内部这四大板块的位置、结构，也正与这三级地形相合。其中领地北接日德兰半岛，西临莱茵河，东至易北河、波罗的海，南至中德山地北缘的，是萨克森公国。很显然，留在中欧平原西部的萨克森人，与西迁至不列颠的族人（撒克逊人）一样，地缘属性中最明显的标签为“低地”。

在查理曼以传播天主教为名进行的战争中，萨克森人的抵抗是最为顽强的。鉴于这片土地的位置，是日耳曼尼亚诸板块中最边缘的，萨克森人对“文明”表现的最为抗拒（“天主教”代表文明的话）也情有可原。如果把历史再向前追溯，最早占据的这片沿海平原，是曾经给罗马造成第一波冲击的日耳曼部落——条顿人。在很长一段历史中，“条顿人”曾经成为日耳曼人的另一个标签。这片土地和这个标签所代表的攻击性，是它能够传世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正是由于环境相比南部高地区更为恶劣、离最初的文明中心（包括继承其地位的罗马教廷）最远。在德意志民族内部，南部高地部分，对北部低地区在心理上一直颇有优势感。今天德国境内，高地德语成为标准



神圣罗马帝国地缘结构图

德语的基础语言（类似普通话与中国北方官话的关系），而低地德语的地位不高（甚至受到歧视），就与它们的地缘背景有关。

位于萨克森之南，占据中德山地主体的是“法兰克尼亚”公国（包括相对应的莱茵河谷）。据信这个名称的来源，是因为这片山地曾经是法兰克人的祖地。在法兰克人移居高卢，并且希望成为罗马人时后，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就和法兰克人无关了。不过从地缘角度看，法兰克人放弃这片土地，去往高卢开辟一片新天地也是明智之举。因为仅从日耳曼尼亚内部的结构来看，前有中欧平原，后有巴伐利亚高原的“中德山地”，也是危机四伏。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位置很容易成为周边板块博弈的舞台。

背靠阿尔卑斯山脉的“巴伐利亚高原”，算得上是地缘条件最好的了。一方面，与意大利半岛和教廷的距离最近，使得这片高原比其它板块更有机会升级文明。实际上，巴伐利亚高原大部（多瑙河以南部分），曾经一直是罗马帝国的边境区；另一方面，高度和纬度，决定了巴伐利亚高原上的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多的阳光（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点很重要）。在东法兰克王国的版图里，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东、西向分为了两个部分。西部（德国奥格斯堡市所在的莱希河以西），包括阿尔萨斯、瑞士高原东端（苏黎世一带），为“士瓦本公国”。所谓士瓦本人，其实就是之前被法兰克人灭国后，南迁的阿勒曼尼人（他们也是今天瑞士东部德语区居民的祖先）。至于占据巴伐利亚高原大部的，自然就是“巴伐利亚公国”了。

德意志脱离法兰克体系

东法兰克王国正式从“法兰克体系”中分裂出来，正式成为日耳曼人国家的时间，被定位在了公元 911 年。这一年，法兰克尼亚公爵（康拉德一世），被四大公国共推为东法兰克国王（而不是从查理曼所传的“加洛林家族”选取）。这一年，也被后来

的德国人，认定是德意志民族的开端。从地缘角度看，德意志概念的确立，意味着将以法兰克人为代表的，拉丁化的日耳曼人，剔除出了日耳曼人的概念。也可以说，从此之后日耳曼的标签，仅仅属于那些仍然说着日耳曼语的民族。

在地缘博弈的各种表现形式中，国家之间的博弈是最容易被人理解的。东法兰克王国的“德意志”化，也被认为是法、德恩怨的开启。不过德国人所认定的“第一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却并非始于公元 911 年，也并不是在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带领下创立的。前面我们也说了，法兰克尼亚地缘位置过于尴尬。强邻环伺的结果就是，其内部的政权结构都还不够稳定。将其推上最高权力宝座，更多是过渡阶段，诸侯之间的妥协。

最终帮助“德意志”完成第一次统一，并且升格为“帝国”的，是萨克森公国的统治者。这位公爵也因此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的第一位大帝——奥托大帝。

第二节 奥托一世统一德意志并入侵意大利

奥托一世完成德意志政治统一

帝国的形成，本质就是一个权力集中的过程。虽然并不是说权力集中，就一定有机会建立帝国，但试图靠一个松散联盟成为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强者，更是不现实的。从政治层面上，对于完成“去法兰克化”的日耳曼人来说，需要有一位像查理曼那样有大帝级人物出现，顺势带领德意志民族成就霸业。

公元 936 年，法兰克尼亚人手上的王权，被和平移交到了萨克森人手上（法兰克尼亚成为了萨克森的坚定盟友）。应该说，对于正在形成的德意志民族来说，强势甚至有些野蛮的萨克森人的确更适合承担领导者角色。经过十几年的政治、军事博弈，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巴伐利亚四大公国，以及原属中法兰克王国，后为东法兰克王国吞并的洛林公国，都被统一在了奥托大帝旗下（此时的奥托大帝还未晋升帝位，称其为“奥托一世”会更会准确）。

如果奥托一世，所谋求的只是一个君主的名号，他其实是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的。好像查理曼为法兰克人所谋得的“罗马皇帝”称号，虽然一直在几个法兰克王国王室中流转，但已经仅仅是个虚名了。很显然，萨克森人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强大而且集权的国家。在中央之国，地方官员由中央政府委派的郡县制，取代爵位、土地世袭的分封制，是中央集权的一大标志。试图做大王权的奥托一世，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段，那就是打破各大公国的权力世袭体系，改由王室直接任命各公国的公爵。当然，后面我们会看到，在欧洲尤其是德意志想真正做到这点，有多么的困难。

不管怎么说，抓住历史机遇的奥托一世，还是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第一次政治统一。不过仅仅整合好东法兰克的遗产，显然无法让德意志人一尝帝国滋味。好在奥托一世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此之前查理大帝已经用亲身经历，告诉他下一步应

该怎么做了。这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进军罗马”。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能够占据意大利，那么德意志在实力上就可以压倒他的竞争对手——西法兰克；更为重要的是，罗马天主教已经成为西欧各大板块的共同信仰，获得教皇的任命，无论从法律还是民众认同感上看，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奥托大帝与教皇国的博弈

此时的意大利半岛，也已经是邦国林立，并无力阻挡德意志人的入侵。在统一德意志后的二十多年间，奥托一世先后三次入侵意大利，并且在第二次入侵时（公元962年），从罗马教皇手中接过了“罗马皇帝”的皇冠，这一年也因此被认定为是“德意志第一帝国”的开始。看起来，这又是一次查理曼式的帝国成长史。不过从技术角度看，“德国人”所建立的这个帝国，与法兰克人还是有所区别的。

首先奥托大帝并不认为自己是从法兰克人手中继承的帝位。这种情况就好像伊斯兰教作为“一神教3.0版”，虽然创立时间最晚，但绝不会认为自己系出基督教或者犹太教一样。为了让自己的帝国区别于查理曼帝国，奥托大帝为自己所继承的“罗马帝国”前面加上了“德意志民族”，以及“神圣”二个前缀（全称“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简称“神圣罗马帝国”[1]。这样的话，新生的帝国既不同于之前法兰克人所建立的帝国，也能够与依然在使用“罗马”名号的拜占庭帝国区别开来。

其次，相比拉丁化的法兰克人，日耳曼文化的继承者们，虽然也认为取得教廷的任命，对于建立帝国至关重要，但却并不认为君权应该置于神权之下。换句话说，与法兰克人和教廷达成双赢协议，并帮助教皇国扩大领地和权力不同，德意志人所采取的手段要直接的多。奥托大帝甚至直接替换掉了不听从他指令的教皇，然后再从新教皇手上接过帝位。通过这一事件，任何人都能感觉到，奥托大帝希望为德意志人建立的帝国模式，是君权位于神权之上的模式。

最终从法律上确定神圣罗马帝国与教廷之间关系的，是一份名叫“奥托特权”的协议。在协议中，德意志人非常“大度”的给予了教廷及其他主教领地以世俗权力，并且成为他们的保护者。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教皇国”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算是真正成为了一个“国家”（德意志境内的主教区，也因此成为了“诸侯”）。当然，教皇和主教们也都清楚，这实际上是将他们置于了，与各大公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所谓特权，无非是可以在自己内部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罢了。

应该说，无论是在内部打破领主的世袭制度，还是在最高权力架构中，建立君权在上，神权在下的模式，奥托大帝带领下的德意志民族，都在向建立一个真正帝国的道路上迈进。然而问题在于，并不是说你做出了正确选择，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的。

---

1 神圣罗马帝国的名称是经过几个世纪逐步形成的。奥托大帝只是沿袭查理大帝的皇帝奥古斯都称号。奥托二世始称“罗马皇帝”，康拉德二世时，国号始称“罗马帝国”，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时定国号为“神圣帝国”，在迤后的岁月里，两号合一，遂称“神圣罗马帝国”。到腓特烈三世称帝时，国号改称“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

最起码“神圣罗马帝国”想把罗马教廷傀儡化，还得看看西法兰克人的反应（包括后来的西班牙）。只要天主教世界的世俗权力，还是出现群雄争霸的局面，教廷就仍然有着合纵连横的空间。

法兰克王国的终结

“进军罗马”后的奥托大帝，除了要收服那些原属中法兰克王国的邦国、教皇国之外，还必须考虑如何定位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从地缘结构的完整性来看，能够让拜占庭人完全退出意大利半岛当然是最好的。为此奥托大帝在加冕后不久，就尝试进攻拜占庭所控制的意大利半部。然而在没有海军支援的情况下，试图凭借一两场陆地战役，就把拜占庭的势力赶回希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总的来说，目前拜占庭海军在地中海是一家独大的局面，虽然迫于东线压力，无力向西拓展更多的领土，但自保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新生的帝国一定要在这一线纠缠，只会让自己迅速崩溃。来自中欧的德意志人很快意识到了这点，并与拜占庭达成了和解。对于拜占庭人来说，本身也早已放弃了恢复罗马帝国版图的想法，只要不影响他们在西地中海的利益，是法兰克人还是德意志人“继承”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都无关紧要了。

当然，法兰克人、德意志人都拿拜占庭没有办法，并不代表君士坦丁堡在意大利的利益，就不会受到挑战了。因为拜占庭此时在巴尔干半岛，已经从另一支更加“原始”的日耳曼人——维京人那里，感受过日耳曼人的海洋基因了。只不过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应该还没有想到，维京人的后代，有一天竟然能够在地中海做大，并且把他们赶出意大利半岛。

早在查理曼建立帝国之初，维京人就开始大规模入侵欧洲大陆了。需要应对来自北欧的压力，也是在东法兰克德意志化后，西法兰克王国无力恢复查理曼帝国版图的重要原因。后面的内容会有章节详细解读这些北欧海盗的扩张路线，以及波罗的海的地缘结构。到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事情远比我们所了解的复杂。

在东法兰克德意志化，并且“晋升”为帝国后不久，查理曼的子孙又丧失了另一笔重要遗产——西法兰克王国。公元 987 年，西法兰克的地方势力，也如德意志人一样，推选出了自己的代理人，并且建立了新的王朝（卡佩王朝）。虽然一直到 12 世纪末，新王朝的统治者都还声称自己是“法兰克人的国王”，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此时已经是一个新的时代了，“法兰克”这个标签，更多只是一个历史遗产了。为了更好的继承这笔遗产，后来所使用的“法兰西”之名，很明显也是源自于此。

公元 987 年，也因此被认定为是现代法国历史的开始。就像德国人认为，他们自公元 911 年摆脱查理曼的子孙控制那一刻起，就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一样。不过说起来，相比德国人长时间以“神圣罗马”这个标签来维系自己的国家认同，法国人把法兰克王国和查理曼当成自己历史的一部分，倒还说的过去。最起码法兰克人的确是在高卢而兴，并且完成拉丁化进程的，与今天的法国人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

从地缘角度看，法兰克诸王国的终结，意味着法兰西、德意志两大民族的形成，同时拉开了德、法两国拉开了长达千年的博弈史。莱茵河流域的洛林地区，以及罗纳河流域的勃艮第地区，成为了二者争夺的中间地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莱茵河下游所处的“比荷低地”，一直有海洋势力介入争夺（维京人、西班牙人等），所以在法兰克王国淡出历史舞台后，“洛林”这个地缘标签的范围也逐渐萎缩至莱茵河中游，直至现在专指法国东北角的那片高地。

第三节 神圣罗马帝国向摩拉维亚扩张

西斯拉夫人渗透摩拉维亚并在此立国

鉴于高卢地区的历史，扛着“神圣罗马帝国”大旗的德意志人，在西线并不能取得太大的成就。勉强为之，也无非是再重蹈一次法兰克人拉丁化的复辙。然而在东线，德意志人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因为在这个方向，他们所要面对的，是文明层级比自己更低一些的“斯拉夫人”。事实上奥托大帝和他的继任者们，也有充足的理由东扩。一方面，既然已经通过罗马教廷，从“神”那里取得了罗马帝国的政治遗产，那么帝国就有义务，向那些身为异教徒的斯拉夫人，传播天主教；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公元5世纪，匈人到来所引发的那场民族大迁徙，日耳曼人的覆盖区，原本延伸到奥德河流域，而不是现在局限在易北河之西。神圣罗马帝国代表日耳曼文化向东收复失地，从民族、政治角度看都有充分的理由。

在解读查理曼帝国的形成时，我们曾经将帝国在易北河、巴伐利亚高原以东，所面临的斯拉夫人归类为“西斯拉夫人”，以区别于那些南迁至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人”。中欧平原东部，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流域，是斯拉夫人民族的形成之地，但要说到在政治和文明上最先成熟的，则是同样归属西斯拉夫板块的“摩拉维亚”了。在今天的地缘政治板块中，摩拉维亚位于捷克的东南角、奥地利的东北部。这是一片被波希米亚高地、苏台德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包夹而成的低地。低地中南北纵横的“摩拉瓦河”（及其支流），是摩拉维亚标签的来源。

从地缘位置上看，摩拉瓦河是连接中欧平原与多瑙河中游平原的天然通道。沿奥得河或者维斯瓦河而下的斯拉夫人，可以从苏台德山脉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缺口，切入今属捷克的摩拉维亚低地，然而再顺河而下，在奥地利境内接入多瑙河。正因为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摩拉瓦河上游（贝奇瓦河）与奥得河之间的山口，也被称之为“摩拉维亚门”。

摩尔维亚地区的斯拉夫人，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主要都是从“摩拉维亚门”南下的。日耳曼人在公元6世纪面向西罗马故地的大迁徙，除了把易北河以东让给斯拉夫人以外，也给了他们进驻摩拉维亚，并最终透过潘诺尼亚平原，入驻巴尔干半岛的机会。只不过，来自匈牙利平原的游牧民族，始终在潘诺尼亚平原更有优势，

阿瓦尔人很快便控制了整个多瑙河中游平原。尤其在法兰克、德意志完成内部整合东扩后，斯拉夫人再想入主潘诺尼亚平原，就变得更加困难了。缺失了潘诺尼亚一环，南斯拉夫最终也就只能与西斯拉夫人分道扬镳了。



摩拉维亚地区示意图

如果说南斯拉夫人能够不被周边民族所融合，得益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复杂的地形，那么摩拉维亚这片战略要地，能够一直为斯拉夫人所覆盖，则是因为能够通过摩拉维亚门，与斯拉夫人在中欧平原的大本营保持沟通。受益于地缘位置，在公元 7 世纪上半叶，进入摩拉维亚的斯拉夫人，开始建立第一个斯拉夫人国家——萨摩公国。只不过，在日耳曼人和阿瓦尔人的双重压力下，这个公国很快便瓦解了。

当查理曼统一日耳曼世界，并开始向东扩张时，摩拉维亚的西斯拉夫人，也迎来了自己的历史机遇。查理大帝在多瑙河中游的征战，削弱了阿瓦尔人在潘诺尼亚的势力（从而减轻了摩拉维亚的南部压力）。旋即又进入内斗模式的法兰克人，更无暇去侵入西斯拉夫人的领地了。在这种情况下，摩拉维亚人不仅得再次立国（公元 830 年，大摩拉维亚公国），更开始对周边的斯拉夫人地区进行整合。那么整合的结果如何，摩拉维亚人又有没有机会熬到神圣罗马帝国时代？

大摩拉维亚国整合周边地区

最先被摩拉维亚所整合的，是今天的斯洛伐克地区。与摩拉维亚的地形结构相似，斯洛伐克板块内部的两条主要河流：瓦赫河、赫龙河也是发源于北方山脉，南向注入多瑙河的。这种情况跟拥有四条平行排列，且独流入海河流的“马其顿”颇为相似。

换句话说，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可以划入一个板块。事实上，最初摩拉维亚概念也的确包含斯洛伐克在内。一战结束之后，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诞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基于这个地缘基础而建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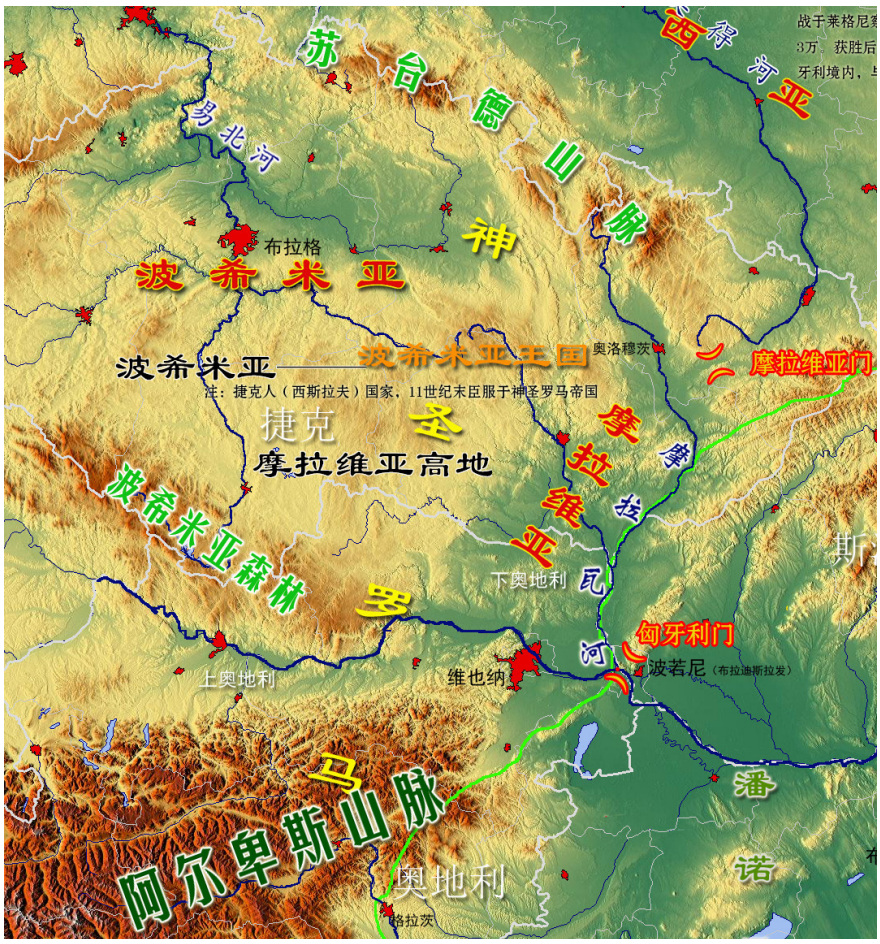
如果不是因为摩拉瓦河流域特殊的地缘位置，它今天应该还是可以和斯洛伐克“在一起”的。问题是，它的位置实在是太“中原”了。不仅斯拉夫人可以从中欧平原透过摩拉瓦河，直通潘诺尼亚，从巴伐利亚高原向东扩张的德意志人，也可经由摩拉瓦河——多瑙河河口，附近的“匈牙利门”（阿尔卑斯山脉与喀尔巴阡山脉分别延伸出了两段支脉，隔河口相望所形成的天然关口）进入潘诺尼亚。



西斯拉夫地缘结构图

现在我们知道问题的尴尬性了。无论日耳曼人还是西斯拉夫人，都有强烈的动机控制整个摩拉瓦河流域，背后也都有庞大的民族集团，为之提供支撑。最近一个世纪所达成的妥协，是摩拉尔河下游以西地区，归属日耳曼系的奥地利，以东及上游地区则归入捷克、斯洛伐克两个斯拉夫国家。换句话说，如果以摩拉瓦河流域，来定义摩拉维亚范围的话，它应该是被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三国所瓜分了。只不过捷克占据了最大份额，并控制了摩拉维亚门，所以成为了“摩拉维亚”历史的继承者。今天我们再提到摩拉维拉板块，也就专指捷克部分了。

现在问题又来了，为什么看起来更有机会“在一起”的斯洛伐克，只是和奥地利对分了摩拉瓦河下游？这是因为摩拉维亚的西部，还有一个与德意志地缘关系密切的斯拉夫板块——波希米亚。今天我们提到波希米亚，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那种源自吉普赛服饰的“波希米亚风”。在解读辛布里战争时，巴伐利亚高原东北部的那片高地了，已经被我们标记为“波希米亚高地”了，其与巴伐利亚之间的相隔的那条山脉，则为“波希米亚森林”。



波希米亚地区示意图

然而波希米亚的核心地区，并不是波希米亚高地，或者波希米亚森林，而是高地与厄尔士山脉、苏台德山脉围就的那片盆地——“北波希米亚盆地”。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因为森林覆盖的高地之上，并不利于开展农业生产，人口潜力相应较小，只有山前的低地，才能够进行深度开发。今天捷克首都“布拉格”，正处于这个北波希米亚盆地中南部。

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波希米亚一词的来源，是最初占据于此的凯尔特人“波希人”，在凯尔特人消失后，日耳曼人曾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不过现在覆盖波希米亚地区的，是与摩拉维亚人同属斯拉夫人的“捷克人”（所以“北波希米亚盆地”，也会被称之“捷克盆地”，波希米亚高地，有时也被称为“捷克高原”）。将波希米亚（捷克）内部，高、中、低三个亚板块串连起来的，是在这一阶段曝光率颇高的易北河。从流域上定义，所谓波希米亚地区，所指向的就是易北河上游了（布拉格在易北河上游的伏尔塔瓦河畔）。

严格来说，广义概念下的“波希米亚高地”，应该被称之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高地”（或“捷克——摩拉维亚高地”），其东部隶属摩拉瓦河流域的部分，算是摩拉维亚的一部分；高地的中西部，易北河上游的，才算是波希米亚高地。由于核心低地体量相当，且分列于高地两侧，波希米亚和摩拉瓦河流域其实是两个地缘实力相近，并且相互独立的板块。至于说每能吃掉谁，决定权很大程度并不在彼此手中，而是要看外部的地缘环境对谁更有利。

在“大摩拉维亚国”立国之后，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很快也被迫成为这个斯拉夫国家的一部分。然而相比山地环绕、自成一体的波希米亚，处于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乃至游牧民族三方包夹之下的摩拉维亚，有着更多的不确定因素。虽然有机会凭借与外部交流的更多机会，在斯拉夫体系中拔得头筹，但要想保住胜利果实，却是千难万难。公元 10 世纪初，在东法兰克的德意志人酝酿从法兰克人那里独立出来时，斯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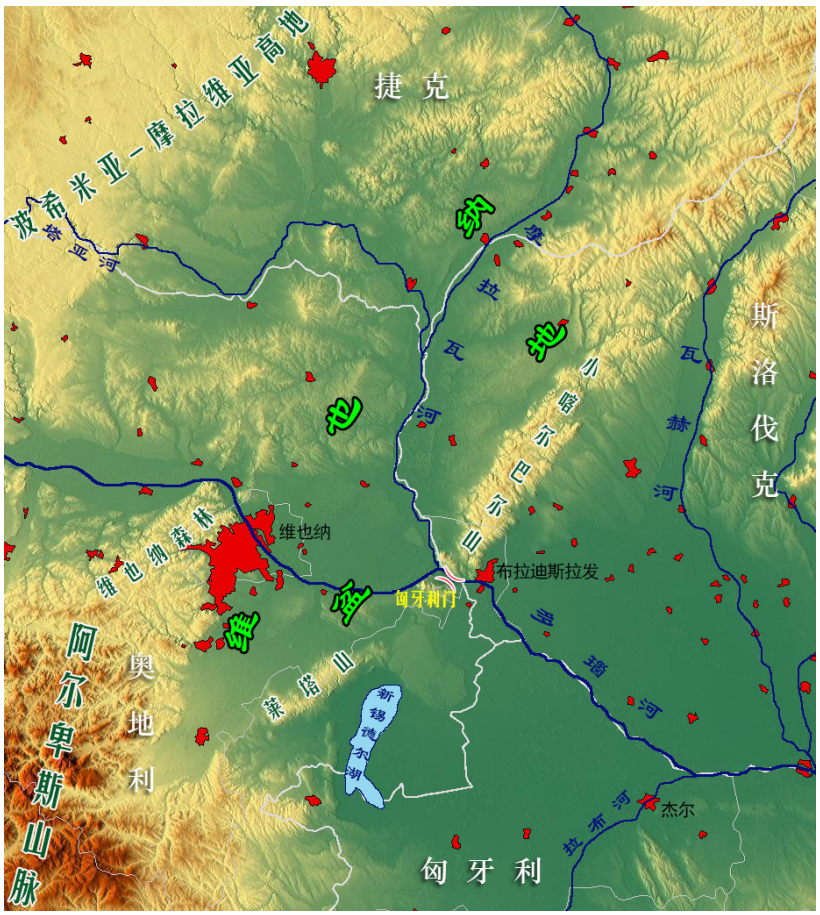
夫人的大摩拉维亚国，却在取代阿瓦尔人，成为多瑙河平原之主的“马扎尔人”的冲击下解体。

奥托大帝控制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

大摩拉维亚国也是斯拉夫人所建立的，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以其所处的位置来看，这样的选择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然而与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所信仰的罗马天主教不同，摩拉维亚人最初的选择，是从拜占庭而来的“东正教”（虽然双方还未正式分裂，但早已是两套体系了），并以希腊字母为基础创造出斯拉夫文字。很显然，这是一个从地缘政治角度，以“远交近攻”的外交原则为标准的选择。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位置尴尬的摩拉维亚，并无法摆脱日耳曼人的影响。在大摩拉维亚国还未因马扎尔人的入侵而彻底崩溃时，顶着罗马教廷授权的日耳曼人，就已经让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渗透并取代拜占廷的传教士，在摩拉维亚国的土地上传播“福音”了。

当奥托大帝开始为德意志人争取“罗马皇帝”的宝座时，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也先后成为了帝国的势力范围。不过新生的帝国并未能跨越匈牙利门，将大摩拉维亚国的另一笔遗产——斯洛伐克地区收入囊中。因为此时包括斯洛伐克、潘诺尼亚在内的多瑙河中游地区，已经整体为游牧的马扎尔人所占据了。神圣罗马帝国，暂时还没有实力解决这些野蛮的游牧者。

尽管奥托大帝所建立的帝国，控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但却未能将这两个板块中的斯拉夫人日耳曼化。德意志人对这两个板块的统治，更多是从政治、宗教这种上层建筑着手的。以至于千年之后，捷克仍然有机会以斯拉夫国家的面目独立。当然，德意志人在东线也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 “维也纳盆地”，完成了日耳曼化进程。



维也纳盆地示意图

所谓维也纳盆地，所指向的是匈牙利门以西，在摩拉瓦河下游与多瑙河共同作用下，所淤积的那片平原（包括多瑙河南部）。需要注意的是，维也纳盆地与摩拉瓦河流域有重叠之处。如果从地缘角度划分板块的话，在

德意志人扩张至此之后，摩拉维亚的范围，就退缩为摩拉瓦河中、上游地区了。维也纳盆地（及附属的部分阿尔卑斯山区）则成为了德意志人的“奥斯特马克”[1]地区。

奥斯特马克的位置，相当于一个十字路口。日耳曼人或者斯拉夫人，可以通过这一地区，沿阿尔卑斯山东麓，经现在的斯洛文尼亚进入意大利半岛或者巴尔干半岛（南斯拉夫民族，正是沿这样的迁移路线南下巴尔干的）；也可以向东跨越“匈牙利门”，进入潘诺尼亚，乃至匈牙利草原（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奥斯特马克地区，包括阿尔卑斯山东麓，一直为神圣罗马帝国所经营的边境地区（因为打通与意大利半岛的连线，对于“罗
马帝国”来说最重要）。事实上同样的事情，当年查理曼也做过。不过在查理曼帝国分裂、大摩拉维亚国崛起之后，这条战略通道曾经一度为摩拉维亚人所控制罢了。

奥斯特马克，也就是今天奥地利的“下奥地利”地区了。这一地区和奥斯特马克的标签，也正是“奥地利”这一地缘概念的源头。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前期，管理阿尔卑斯山东麓这些边境区的，是巴伐利亚公国。由于地缘位置极为重要，并且地理上独立于巴伐利亚高原之外，在公元 12 世纪中叶（红胡子腓特列一世时期），“奥斯特马克”得以脱离巴伐利亚的管制，升级为独立的“奥地利公国”。

事实证明，提升奥地利在德意志体系内的地位，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最起码维也纳的统治者可以独立思考，背靠整个德意志的自己，到底是应该北上摩拉维亚、波兰，去夺取斯拉夫人的土地；还是应该跨越匈牙利门，将整个多瑙河中游平原作为自己的扩张方向。至于结果，相信对欧洲历史略有了解的朋友都已经意识到了。曾经在欧洲近代史中叱咤风云的“奥地利帝国”（及转型后的“奥匈帝国”）得以建立，正是受益于“下奥地利”地区的地缘位置。

第四节 神圣罗马帝国向北德平原扩张

奥托大帝将控制线推进至奥得河

相比在南部高地区的扩张，神圣罗马帝国在低地区所取得的战果，地缘影响力要更为深远。我们知道，当年以巴黎盆地为中心的查理曼帝国，并没有把帝国的东部边界，推进到奥得河，而是止步于日耳曼人所控制的易北河西岸。现在，萨克森人所主导的神圣罗马帝国，无论是从自身还是整个民族的利益考虑，都会把易北河——奥得河一线作为扩张的重点。今天的德国，东部与波兰的国境线（奥得河——尼斯河线），大致与当年奥托大帝的扩张线重合。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德国控制的这片中欧平原，统

1 公元788年，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大帝扩张至现在的奥地利地区，命名为奥斯特马克(Ost，东；mark，边区)。后形成独立的公国，名为奥斯特利亚，奥斯特马克转化为拉丁语而成，现奥地利名上承这个古名，只是采用了英语读音。

称为“北德平原”（东半部就是“波兰平原”了）。

让那些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斯拉夫人归依天主教，是神圣罗马帝国东扩最正当的理由。在奥托大帝取得易北河——奥得河下游之间的那片平原之后，他并没有急于将之并入自己所属的萨克森公国，而是建立了几个享有世俗权力的主教区。这种做法，与很多帝国（包括中央之国）在新扩张的边境区，建立军管体系的做法异曲同工。只不过，在宗教斗争成为地缘政治博弈主要表现形式的中世纪，从阿拉伯半岛到不列颠，大家都发现，以一神信仰为基础，优先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整合，是最为有效的融合方式。

过于注重意识形态问题，把信仰是否统一，作为衡量是否完成地缘融合工作的最主要标准，背后隐患也是很明显的，典型的案例就是波希米亚。虽然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存续期间，波希米亚都是帝国重要的组成部分。德意志贵族和德意志化的捷克贵族，也一直能够控制波希米亚的局势，但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下层民众，却依然能够在语言、文化上，传承斯拉夫文化。这种顾上不顾下的结构，使得一战之后，波希米亚能够携手斯洛伐克，并入德意志化较为成功的摩拉维亚，成立斯拉夫人的民族国家——“捷克斯洛伐克”。

同样的问题并没有发生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下游之间的低地上。这一区域的德意志化程度，在各方面要成功的多。其北部沿海地区，最终成为了德意志的“梅克伦堡”，中南部则成为了包含柏林在内的，更为著名的“勃兰登堡”。从最初的地缘政治划分来看，梅克伦堡的统治阶层，是德意志化的斯拉夫人；勃兰登堡的控制者，则是来自萨克森的贵族。

将易北河下游整体纳入德意志范畴，对于帝国来说至关重要。这可以让德意志民族从巴伐利亚——奥地利，以及中欧平原两个方向，对波希米亚高地形成包夹之势，以避免这一重要高地成为入侵者的跳板。需要注意的是，对波希米亚和整个西斯拉夫民族来说，最大的压力源并不是来自于巴伐利亚高原，而是“北德平原”。通常我们会认为，高地比低地更有地缘优势。不过这一优势，更多是体现在被动的防御层面上，就主动的侵略性来说，并不准确。准确的归类，应该是环境相对恶劣的区域，相比环境舒适区要更有向外迁徙、改善生存空间的欲望。

在中央之国，北高南低的地形走势，与北高南低的纬度划分相合（纬度越低，气候越好），使得我们容易有个误区，认为高地拥有较强防御力的同时，生活在上面的族群，也会有更强的侵略性。然而问题上，整个中欧地区的地势，呈现出的是截然相反的，南高北低的“三级阶梯”地形。地势低平、纬度偏高的中欧平原，在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积温问题上，比之南部高地有着明显的差距。仅从这点来看，生存环境就已恶劣了许多。

另一个影响北德农业效率的因素在于土壤。前面我们曾经多次提到过，中国核心区内的平原，基本都是冲积平原。依靠这些河流从上游高地带下来的肥沃土壤（尤其



西斯拉夫地缘结构图

是黄土高原），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农业国家。然而在纬度颇高的中欧平原，土壤的情况就要差上许多了。这一地区的地貌形成的基础，缘自于最后一次冰期冰川消融后堆积在底部的碎屑物。此类平原被称之为“冰碛平原”。

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欧洲大陆冰川的中心，所以与之相邻的中欧平原，在人类迁入这一地区之前，曾经反复被冰川所侵蚀，以至于今天你甚至很难找到，原生于欧洲北半部的高等级动物。同时在冰川的作用力下，低地区土壤层的累积也成为了大问题(所以不要怪黄河无常，黄河才是真正的生命摇篮)。也就是说，冰川越晚消融的低地，土壤条件越差（土壤层的累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非常不幸的是，易北河以东、直面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这部分中欧平原，是欧洲大陆受冰川影响最为严重的区域，其距离最后一次冰川作用力消失的时间，仅仅只有一万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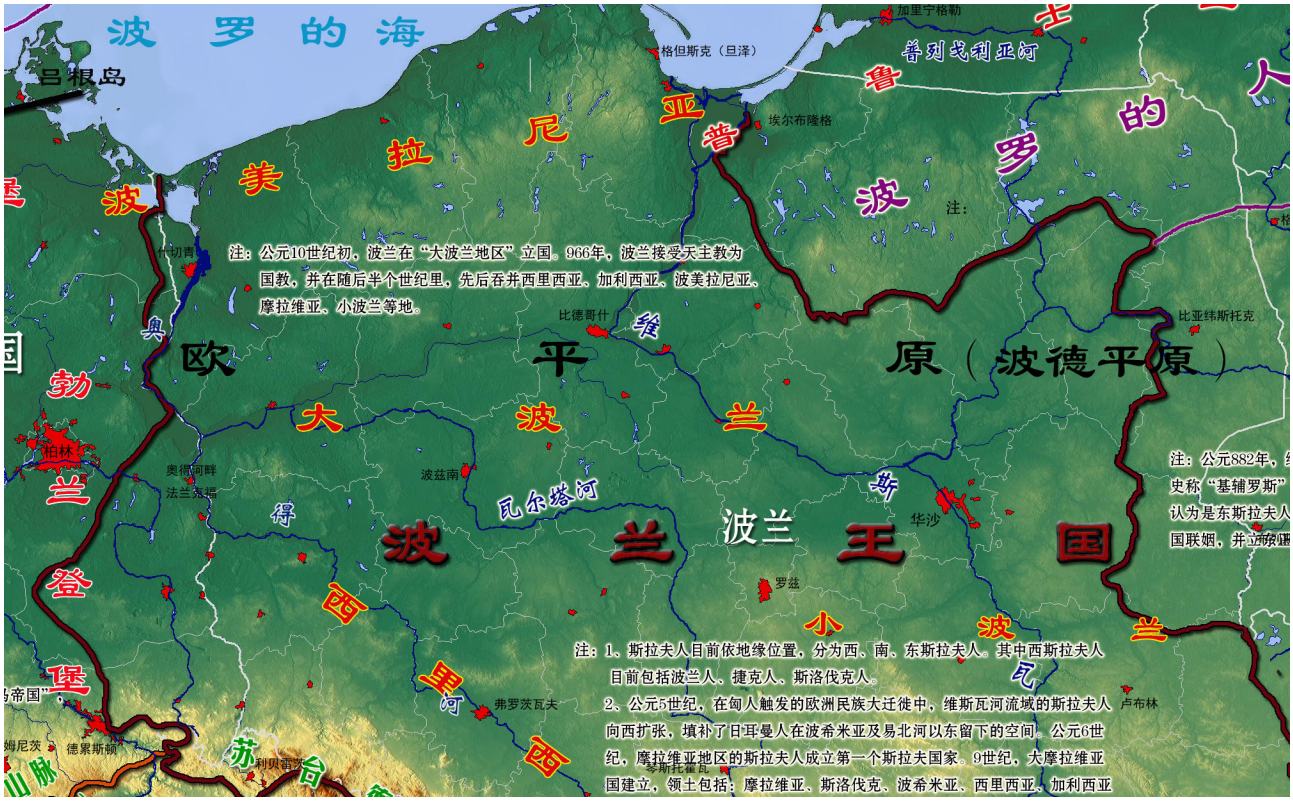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易北河以东，沿波罗的海的低地带，看到大片的冰碛湖带。基于上面的分析，大家应该感觉得到，这一区域应该也是中欧土壤条件最差的区域了。事实上，德意志人在越过易北河后，之所以优先整合中南部勃兰登堡地区，而把北部梅克伦堡，先交给臣服的斯拉夫土著经营，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征服者总是要先挑走最好的土地的）。当然，后来随着德意志民族，在中欧平原的持续东扩，变身为大后方的梅克伦堡，也完全融合成为了德意志的核心区了。

波兰人在奥得河右岸的存在

对于准备顶着“罗马”和教廷授权光环东扩的德意志人来说，奥得河并不会成为他们征程的终点。如果德意志人再想越过奥得河，入侵“波兰平原”的话，他们的下一条征服线，应该就是中欧平原的另一条南北向大河——维斯瓦河了。不过在此之前，神圣罗马帝国必须先解决奥得河右岸的斯拉夫人。在奥托大帝东扩之时，占据奥得河

右岸的核心斯拉夫部族，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经常上演悲剧的波兰人了。

波兰人最初在中欧平原所经营的核心之地，是奥得河右岸支流，位于平原中部的瓦尔塔河河谷（政治中心在瓦尔塔河畔的“波兹兰”）。这条发源于西喀尔巴阡山脉北部丘陵地带的河流，也是连接奥得河、维斯瓦河的纽带。由于是波兰民族的兴起之地，在波兰内部的地缘结构划分中，以瓦尔塔河为核心的西部区域，被称之为“大波兰”。如果神圣罗马帝国能够拿下大波兰地区，他们也就能够把国境线推进到维斯瓦河畔了。



西斯拉夫地缘结构图

事情最终以一种妥协的方式得到的解决。在奥托大帝从罗马教皇手中接过桂冠后的第四年（公元 966 年），波兰人出人意料的接受了罗马天主教，成为了教廷治下的天主教国家。这一年也被认定为波兰的国祚之始。结合之前的内容，大家会发现，公元十世纪成为了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之纪。法国、德国、波兰、捷克等国，都在这个世纪形成了最初的民族国家。

引导波兰人受洗成为天主教徒的，并不是大军压境的神圣罗马帝国，而是与之相接，在大摩拉维亚国时期，就引入了天主教的捷克人（波希米亚）。为了共同应对来自德意志的威胁，波兰人不仅与捷克人联姻，还试图通过主动融入天主教世界，釜底抽薪般的，消除神圣罗马帝国东扩的最大理由。波兰人相信，既然现在大家都是罗马天主教世界的一员了，德意志人应该也就没有理由再动刀兵了。

今天西斯拉夫民族的主要成员，也就是波兰、捷克，以及斯洛伐克人了。随着波兰人的加入，西斯拉夫人事实上已经整体成为了天主教版图的一部分。在意识形态高

于一切的时代，这种做法也的确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地缘矛盾绝不是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统一，就能够调和的。面临生存的压力，德意志人始终还是要向东扩张生存空间的，但西斯拉夫人的妥协，也的确为他们赢得了时间和生存空间。即使政治征服仍将重启，最起码也不至于进行种族清洗了。

就政治层面来说，波兰最终还是取得了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相比更高的地位。简单点说，就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并在政治层面必须接受德意志人的渗透。波兰，则在表示愿意效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情况下，保持了独立状态。对比中央之国所主导的古代东方世界，相当于取得了朝鲜的地位。不过很快，德意志人就将为他们的决定感到后悔了。

神圣罗马帝国因封建制形成政治分割

任何一个帝国，都不可能无限扩张它的领土。从地缘本质上来看，每一片新征服的土地，都需要时间来消化。步步为营的做法是，把一片土地消化为熟地之后，再以之为跳板征服下一片土地。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够在建立之初，就控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因为与之相邻的巴伐利亚高原和中德山地，是德意志人核心板块。早在摩拉维亚与东法兰克王国博弈时期，就已经开始强势渗透了（天主教取代东正教，就是成果之一）。也就是说，这样的结果更多是水到渠成。至于奥得河以西的波兰人，神圣罗马帝国最起码得先思索，如何把梅克伦堡和勃兰登堡的斯拉夫人稳定住。

当然，如果实力够强的话，一定程度的跨越式扩张也是可能的，毕竟波兰平原与北德平原的地理属性一致。德意志人到奥得河以东生活，也不会有什么不适。不过奥托大帝建立的帝国，和查理大帝建立的帝国都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内部处于分割严重的“封建状态”。相比之下，进入文明体系时间更短的德意志人，对权力集中的“君主专制”要更为排斥。以至于法兰西人开始建立王权世袭的政治体系时，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诸侯们，还在不停的争论谁才更有资格，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尽管与真正的罗马帝国相比，法兰克人和德意志人建立的所谓“罗马帝国”，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完成政治统一的帝国，但任何事务都有两面性。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一个地中海帝国，无论罗马人最原始的属性中，有多么显著的农业成分，在罗马帝国的经济中，贸易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治下的土地，罗马人更注重的是，每一地区有多少“土特产”，去与帝国其它地区进行交换，而不是去试图让每一个行省，依靠基础农业，形成一个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圈。也就是说，某一板块可能一粒粮食都不生产，但却通过贸易同样可以发展经济，甚至富甲一方。

反观查理曼和神圣罗马帝国，则带有明显的大陆属性。我们知道，大陆国家要想打通贸易通道的难度，要远大于海洋国家。分封制所形成的政治分割状态，不仅会让打通贸易通道变得更困难，同时亦会逼迫各级领主，以及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得以专注管理、经营的土地。因为只有实现自给给足状态，才有可能不受制于人。这使得在查理曼之后，中、西欧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出现了大幅提升（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数

量的提升了）。

类似的情况，中国人其实是很熟悉的。基于更加纯粹的大陆属性，华夏文明甚至形成了主动抑制贸易，而专注发展农业（重农轻商）的文化。不管这样的形式有多么的保守，多么的缺乏活力，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人由此成为了世界上最会种地的民族。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虽然我们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农业技术有了显著进步，但这一进步仅仅是纵向与自己对比。比如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行将结束之下，大部分欧洲农民甚至都还不能拥有一件金属工具。对耕地的利用上，也还谈不上用主动改良土壤肥力的方式精耕细作。更多还是用休耕、轮种这样的方式，让土地自然恢复肥力。

另一个促使欧洲农业、人口水平出现上升的因素，是气候的变化。法、德两大民族集团形成的 8——10 世纪，世界范围内气温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年平均气温大约提升了 1 摄氏度左右）。在欧洲，温暖的气候一直待续到 13——14 世纪，这一时期也被气象学家命名为“中世纪暖期”。随之而来的是气温下降的“小冰河期”（中国人知晓这个概念，多是因为有研究认为，明朝的灭亡时间，正好与中世纪后期的小冰河期相合）。在公元 7 世纪初，欧洲人口仅有 2000 万左右，而到了中世纪暖期行将结束的 14 世纪中叶，则上升至了 7000 多万人。这些增长的人口，主要就是由那些曾经饱受苦寒困扰、无法享受地中海阳光的欧洲地区贡献的。

能够享受气温升高所带来好处的，并不仅仅是德意志人和法兰西人了。斯拉夫人当然也从这一变化中同时受益了。因此环境的变化，更多是让欧洲的地缘重心整体北移。至于谁能在阿尔卑斯——喀尔巴阡山脉以北地区占得优势，还是要看其它的地缘因素了。现实的问题是，德意志人总是在为谁做皇帝的事纠缠不清。即使是后来又出现了某位能暂时统一帝国的皇帝，也会把注意力放在“进军罗马”这件事上。在这一地缘政治背景下，德意志人很难集中力量向奥得河以东地区扩张。

第三章 波罗的海周边地区的族群结构

第一节 波兰王国的崛起

波兰内部的地缘板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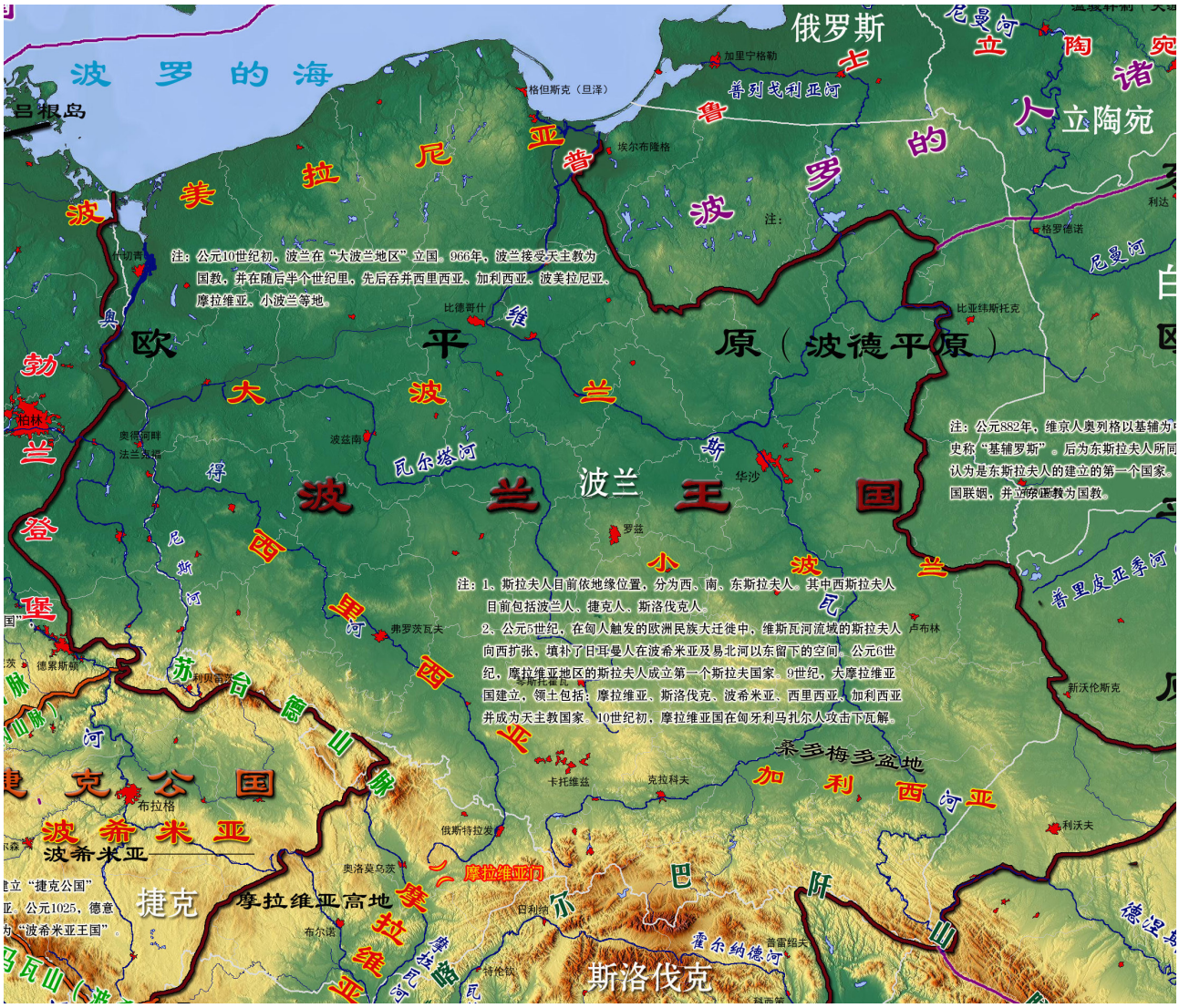
既然波兰人已经成为了天主教徒，又在政治上愿意服从“罗马皇帝”，那么接下来为“神圣罗马”和教廷，完成归化其他斯拉夫部落的，就是这些“带路党”责无旁贷的任务了。问题是，当向东方传播天主教福音的大旗，被波兰人扛起后，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呢？

尾大不掉的局面，在波兰人受洗成为基督徒后第 59 年（公元 1025 年）就出现了。在这一年，做大的波兰人决定彻底摆脱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把自己的国家直接置于教廷管辖之下。简单点说，波兰人决定把自己的国家，从依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公国”，升级为由教皇直接加冕的的“王国”。对于这一变化，远在意大利半岛的教廷，更多是乐见其成。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个强大而又能够统一天主教世界的世俗政权，并不符合教廷的利益。在法兰西和神圣罗马之外，出现第三股强大的力量，能够让教廷拥有更大的纵横空间。

当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把自己升级为王国，甚至帝国。只不过，你并不能指望教廷能够给你提供保护，能不能做到、活下来，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实力。既然波兰人已经明白无误的脱离神圣罗马帝国体系，肯定是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本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在一甲子时间里，波兰人究竟向扩张了多少战果。

按照命名原则来推理，既然有“大波兰”，肯定就有“小波兰”了。所谓大、小波兰的命名，依据并不是各自的面积，而是一个老、新概念的对照。其中大波兰是“波兰民族”的起源之地，所对应的是维斯瓦河以西的“瓦尔塔河”流域；小波兰则对应的则是是华沙以北的维斯瓦河上游地区。因为位置上偏南、更靠近喀尔巴阡山脉，整个小波兰地区的地势较大波兰地区，要稍高一些。这片高地的主体，也被称之为“小波兰高地”。

包括小波兰高地在内的，整个维斯瓦河流域，都是波兰的扩张方向。这项工作在进入公元 11 世纪之前，基本就全部完成了。需要注意的是，在维斯瓦河最上游，紧邻喀尔巴阡山脉的部分，很多时候并未被归入“小波兰”的范畴，而是被单独称之为“加利西亚”。在这一地区，喀尔巴阡山脉与山前丘陵一起，围就了一个桔瓣形的盆地区——桑多梅盆地。从喀尔巴阡山脉上流淌下来的上游支流，先在盆地中合流，然后再切入小波兰高地。这一具有独立地理特征的地理单元，就是“加利西亚”成为独立地缘板块的基础。对加利西亚东部的征服，也是波兰人在维斯瓦河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



西斯拉夫地缘结构图

参看《西斯拉夫地缘结构图（公元 1025 年）》，大家应该能够发现加利西亚的战略价值了。这个盆地的西南角，正对着摩拉维亚门。要是摩拉维亚人或者德意志人，通过摩拉维亚门，进占加利西亚的话，整个小波兰地区及维斯瓦河流域，就将面临极大的压力。同时，如果加利西亚的占领者想向南发展的话，也可沿喀尔巴阡山北麓东出盆地。这样的话，就能对接上摩尔多瓦丘陵东部，南入黑海的德涅斯特河。事实上，当年的哥特人，正是通过这样的路径进入黑海流域，并最终祸乱罗马的。

北出摩拉维亚门后，加利西亚并非是唯一的扩张方向，实际上与摩拉瓦河谷更为接近的，并非维斯瓦河上游，而是奥得河上游。发源于拉维亚门西、苏台德山脉东麓的奥得河，在西北方向与苏台德山脉大致平行流淌至今天的德国、波兰国境线处时，与发源于苏台德山脉西端的“尼斯河”合流，转而向南注入波罗的海（途中汇入瓦尔塔河等支流）。尼斯河以东、瓦尔塔河流域之北的奥得河流域，地缘标签为“西里西亚”。公元 9 世纪，大摩拉维亚国强盛时期，摩拉维亚人曾经北出摩拉维亚门，控制了西里西亚及加利西亚地区。而在德意志人控制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后，这两个与之相邻的枢纽板块，也成为了他们北入中欧平原，所势在必得的桥头堡。

波罗的海沿岸的冰碛湖带

与今天的波兰领土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公元 11 世纪初的波兰王国，如果只是征服上述板块，那它的潜力将大打折扣。因为到目前为止，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还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上一节我们曾经说过，易北河以东，由于末世冰川的作用，在波罗的海沿岸，遗留了一条带状的冰碛湖带，并将之与中南部平原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亚板块。德志意在易北河以东所吞并的“梅克伦堡”地区，就是这条冰碛湖带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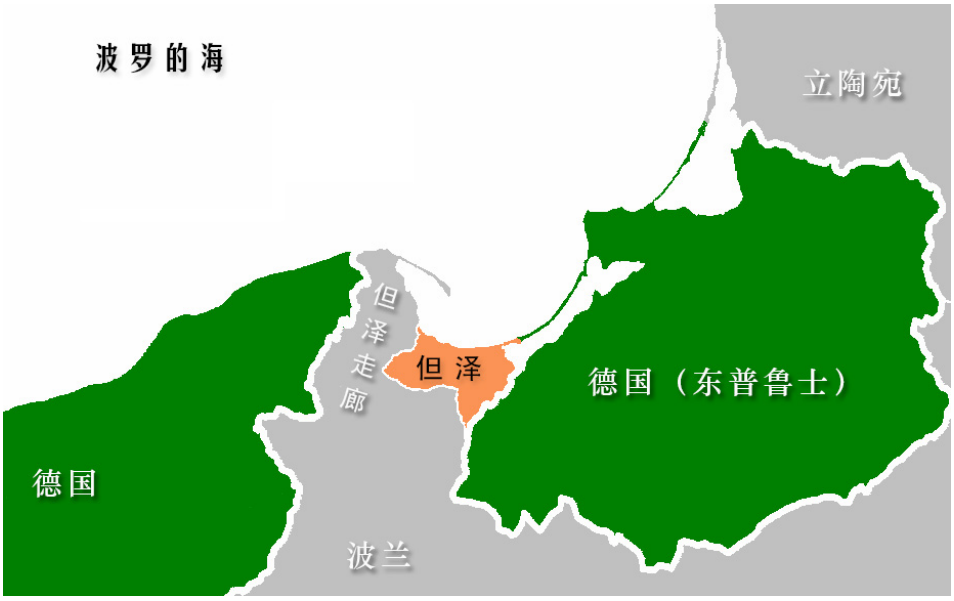


西斯拉夫地缘结构图

实际上，这条冰碛湖带本身，并不与海岸线相邻，而是与波罗的海之间，相隔了一条沿海低地带。这与整个欧洲北部平原的形成原因有关。我们知道，冰川对地势的抹平作用，远不如水流。因此所谓“冰碛平原”的地貌，整体呈现出丘陵广布、波状起伏的形态。只是由于海侵的作用，此类波状平原的沿海地带，能够出现一条明显、平整的沿海低地带。海水不仅淤积平了低地上的冰碛湖，还能沿海岸线推就而成一条沙丘带，为之提供天然防护。在这种情况下，冰碛湖的遗存，则退至其身后的丘陵地带边缘了。

波罗的海东、南沿海平原身后的这条“冰碛丘陵带”，也有人将之称之为“波罗的山脉”。然而以其平均 200——300 米的海拔来看，将之称为山脉实在是勉为其难了。更何况如果不是那些冰碛湖密集点缀其间的话，这些丘陵根本就和身后的丘陵地带融为一体，看不出任何“脉”的痕迹。有鉴于此，我们将之称为“波罗的丘陵”会更为准确。其中波兰人所面对的，奥得河口——维斯瓦河口之间的“波罗的丘陵”及沿海低地带，被称之为“波美拉尼亚”。

波美拉尼亚之名，在拉丁语之中即为“沿海国家”的意思。在斯拉夫人到来之前，这一地区究竟为何族所覆盖，已经很难查找了。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 10 世纪初，波兰吞并整个波美拉尼亚时，这一地区已经是斯拉夫人之地了（今天仍有非波兰族的斯拉夫原住民遗留，名为“卡舒比人”）。对于波兰人拿下波美拉尼亚，最为不爽的肯定是德意志人了。在后面的历史中我们会看到，德意志人围绕这条沿海走廊，投入



但泽走廊示意图

了多么大的努力。

顺便说下，波兰在 18 世纪曾经三度被德意国家普鲁士、奥地利，以及东斯拉夫人国家俄国瓜分。而在一战结束后，为给复国的波兰留下一个出海口，战胜国在维斯瓦河西岸划出了一条长约 80 公里的沿海走廊——波兰走廊，就是波美拉尼亚地区的东端。由于波兰走廊的核心城市叫“但泽”（波兰语称“格但斯克”），所以这条走廊也被称之为“但泽走廊”[1]。了解一、二战历史的人，对这段典故想来不会陌生。

波兰与波希米亚的关系

公元 1025 年，天主教波兰王国的诞生，奠定了今日波兰的版图，以及民族基础。可以说，二战之后再次复国的波兰，其版图很大程度就是参照 1000 年前来划的。事实上，当时如日中天的波兰王国，还将摩拉维亚、斯洛伐克两个西斯拉夫之地，变成了自己的领地。也就是说，如果再进一步占领（或者联合）波希米亚的话，今天的整个西斯拉夫地区就完成统一了。

实际上，波希米亚与波兰之间的关系不可谓不密切。波兰人最初就是从捷克人那里，通过王室联姻引入天主教的（统一波兰的波列斯拉夫一世，还是老捷克公爵的外孙）。问题是，捷克人之所以对与波兰人结成同盟有兴趣，并不代表他们愿意成为波兰的一部分。恰恰相反，在摩拉维亚衰弱之后，捷克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斯拉夫人的领袖，并扛起向不信教的斯拉夫人传教的大旗。如果成功了的话，波希米亚也就能够彻底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自立门户了。然而事与愿为违，真正能够直面那些“野蛮”斯拉夫人的是波兰人；能够有扩张空间，并从这一地缘关系上受益的，自然也是波兰人。

在这种情况下，波希米亚并不愿意成为波兰的一部分。在整个 11 世纪，波兰也

1　根据《凡尔赛条约》，把原属德国领土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间、沿维斯瓦河下流西岸划出一条宽约 80 公里的地带，称为“波兰走廊”，作为波兰出波罗的海的通路，并把河口附近的但泽（格但斯克），划为“但泽自由市”，归国际共管，使德国的国土分成两个不连接部分。该地区在 10 世纪至 14 世纪曾经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 (1453 年 /1466 年至 1772 年)，直至波兰被普鲁士瓜分。1939 年，希特勒借口收回走廊，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曾经数次试图吞并波希米亚。斯拉夫人之间这层微妙的关系，德意志人自然是能够体会到的。神圣罗马帝国深知，一旦波希米亚成为了波兰的一部分，那么波兰人就有足够的实力，与之相抗衡了。复制当年奥托大帝与法兰克人决裂的路径，进军罗马、谋求“罗马皇帝”的宝座也不是不可能的。

最终在波希米亚的争夺当中，捷克人还是选择了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人为此付出的对价就是，承认捷克公爵为“波希米亚国王”（公元 1086 年）。其实德意志人，之所以用一个消失民族（凯尔特人波希部）的标签，来命名这个斯拉夫人王国，其中所隐含的地缘政治企图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捷克人，曾一度改称捷克王国）。在此之后，波希米亚王国在神圣罗马帝国中的特殊地位，也多次通过不同的形式予以确认（帝国内唯一的“王国”级诸侯国、认可波希米亚国王由地方贵族选举）。当 14 世纪，完成上层融合的德意志人，终于做到让捷克人能够接受一位德意志裔国王后，帝国的政治中心曾经移至波希米亚，并且由波希米亚王室，诞生出了几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同一民族并不一定会统一在一个政治体下。这种情况日耳曼人，包括他们的直接继承者德意志人，都曾经碰到过（比如奥地利与德国）。从政治角度来看，神圣罗马帝国对波希米亚的整合还是成功的。最起码促成了西斯拉夫人的分裂，避免雄心勃勃的波兰人坐大，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要知道，波兰人所希望得到的，并不只是波希米亚。相比地理结构上更为安全的波希米亚，勃兰登堡和梅克伦堡的斯拉夫人，对于波兰的崛起要兴奋的多。他们热切希望波兰人能够将之从德意志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可以说，如果波希米亚和波兰合为一体的话，那么德意志人几乎无可避免的，会退回到易北河以西。有鉴于此，给予捷克贵族一点超国民的政治待遇，以换取地缘政治形式的反转，还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第二节 波罗的人的分布区域

斯拉夫人的分化

通过对波兰、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斯洛伐克的解读，大家应该已经对“西斯拉夫”的范围以及源流有所了解了。应该说，相比被夹在中间的德意志人来说，斯拉夫人的空间要更大些。前者无论向西、南方向，其实都没有民族扩张的机会了。执意要做的话，也无非是为法兰西和意大利，再输出些金发碧眼的基因（到头来还是会拉丁化）。至于北欧这片苦寒之地，历来只有更加“纯正”的日耳曼亲戚向温暖的南方迁徙。反观斯拉夫人，还有大片的东欧平原可供开拓。一旦半个中欧能够和东欧平原统一在一起，那么斯拉夫人的实力，就不仅仅是 PK 德意志人的问题，而是能够和德意志 + 法兰西相抗衡了。

事实上，早在公元 1 世纪，斯拉夫人就已经向东欧平原渗透了。然而斯拉夫人的空间扩张，并不代表以波兰人为代表的“西斯拉夫”人就是最终受益者。正如法兰克

人进入高卢后，最终演变成“拉丁化的日耳曼人”——法兰西人一样，谁又能保证，进入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就不会演变为一个新的民族，并诞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来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要知道，中欧的斯拉夫人之所以被称之为“西斯拉夫人”，就是因为那些渗透到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最终演变成为了地缘独立的“东斯拉夫人”。后来的“俄罗斯”，则是东斯拉夫人最强有力的地缘标签。

在波兰王国崛起之时，东斯拉夫人也已经在公元 9 世纪下半叶，以今天的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中心，统一东斯拉夫诸部，建立了最早的国家——基辅罗斯。基辅罗斯，也因此被今天的东斯拉夫民族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视为共同的源头。然而最初“帮助”东斯拉夫人立国的，却是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归属日耳曼人体系的“维京人”。因此要想搞清东斯拉夫的地缘结构，我们又得先把视线拉回到那片地缘结构复杂的波罗的海。之所以说波罗的海地缘结构复杂，是因为分布在这片内海周边的，并不只有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两大族群。最起码波兰王国在向东扩张时期，他们还必须在波罗的海沿岸面对一支独立的民族——波罗的人。

波罗的人也是原始印欧人的一支（其语言也是印欧语系），不过他们从南俄草原北上的时间，要早于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进入文明视线之前，波罗的人的所占据的范围，应该要比现在更大。不过在斯拉夫人开始扩张之后，波罗的人的空间，就只限于波罗的海东南沿岸地区了。从地理角度来看，波罗的东南、东北沿岸地区，都属于东欧平原的一部分。只是由于地缘上的特殊性，这一区域往往在地缘政治层面上，又不隶属于东欧。要解释这个问题，又必须先弄清一点，哪里才是地理概念上的“东欧”。

东、中欧平原的划分

经常有人会问，所谓东欧平原和中欧平原的分割线到底在哪？简单点的分割方法，可以在地形图上，以波罗的海东南角、黑海西北角为起始点画条直线。直线以西的平原算是中欧平原，以东则是东欧平原。还有个更简单，也更精确的方法，就是以乌克兰、白俄罗斯，与波兰的国境线为基线，划分中、东欧平原。当然，从地缘方面来说，只知其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知道，这样切割的地理依据是什么。

山形、水势是划分地缘板块的基础，中、东欧平原间的切割依据也在于此。按照刚才的两种方式，在地形图上切割两大平原的话，我们会发现中欧平原在所依托的，是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脉西段（西喀尔巴阡山脉）。这使得中欧地区整体呈现出南高北低的走势。尤其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更是体现为明显的三级阶梯地形；反观东欧地区，除了东侧充当欧亚分割线，平均海拔 500——1200 米的乌拉尔山脉外，基本处于无山可依的情况。行走在黑海——里海——北冰洋——波罗的海之间的这片土地上，你根本感觉不到“山”的存在。换句话说，地理上的东欧与东欧平原，几乎就是重叠的。

东欧平原的基础也是属于冰川作用下形成的波状平原。除了沿海低地以外，中部

大部分地区，为海拔 200 米左右的丘陵所覆盖，一条条狭长的河谷平原交错其间。东欧平原的地势，因此整体呈现为中间高、南北低的走势。这样的地势，同时也使得东欧平原的河流，与中欧平原的河流尽皆北流有所不同。中部高地所收集的雨水，最终分成了三个方向。一路向北注入北冰洋；一路向西注入波罗的海；另一路则向南流入黑海、里海。事实上，这其间的落差也无非 100——200 米，如果不研究河流的走向，你甚至很难在地形图上，找到东欧平原的高点在哪里。



中欧和东欧地区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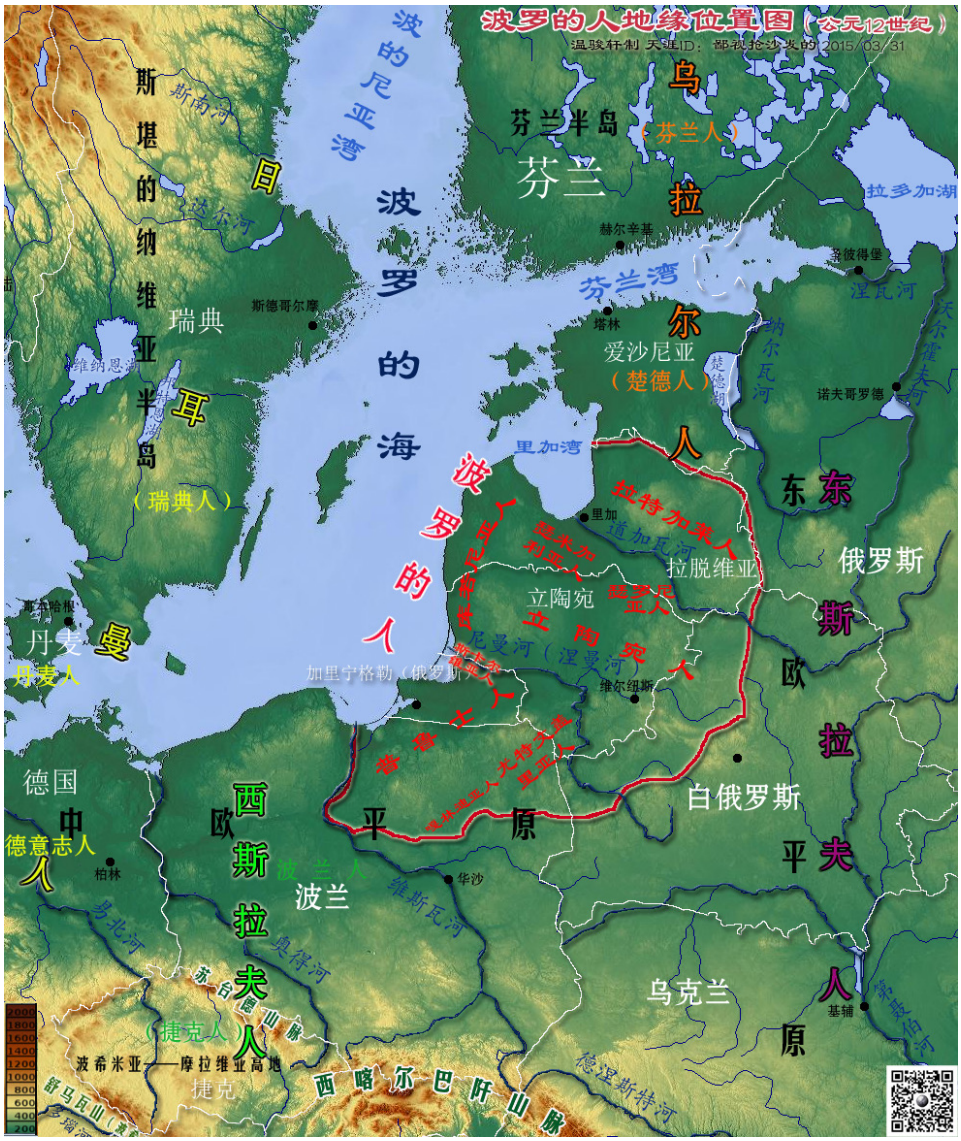
从水势角度来研究中、东欧的地理分割线（乃至地缘分割线），会让问题变得更清晰。简单点说，发源于西喀巴尔阡山北坡的，孕育出斯拉夫民族的维斯瓦河及其流域，就是中欧平原的最东部。维斯瓦河以东，则是东欧平原的范围了。根据这一标准，再对照乌克兰、白俄罗斯，或者说前苏联与波兰之间的国境线，大家应该能够发现，这条国境线其实就是按照这样一个地理标准来划分的。

东普鲁士的位置

回到波罗的人的问题上来。就流域的面积来看，东欧平原南流地区，要明显大于北流和西流地区。这其中，流域面积最小的是波罗的海河流。这一方向入海的河流，源头大都并未深入丘陵腹地。其核心集水区，只是那条狭长的冰碛湖相间的“波罗的丘陵”。也就是说，所谓“波罗的地区”基本就是维斯瓦河以东的“波罗地的丘陵”，及与之相对应的沿海低地带了。

今天提到“波罗的”这个标签，除了那片海之外，大家能够想到的肯定就是“波罗的海三国”了。按照今天的地缘政治结构来看，波罗的地区的范围相当于波罗的海三国，加上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然而这一地区却并非全然是“波罗的人”的天下。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抱团取暖的波罗的海国家中，位置最北的爱沙尼亚人并不是“波罗的人”，而是属于另一支对欧洲地缘政治影响更大的族群——乌拉尔人的后裔（乌拉尔人的问题，我们后面会解读）。至于俄国人的那块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现在也已经是俄罗斯人的天下了。

提到“加里宁格勒州”，估计很多朋友会感到陌生，但如果说到他的前身，德意志人的“东普鲁士”，相信对世界史略有兴趣的人，都会有如雷贯耳的感觉了。所谓“德意志第二帝国”，正是在 19 世纪由普鲁士人所建立的。德意志再次统一之前，与法国所进行的战争，也因此被称之为“普法战争”。然而大多数人却并不知晓，原来“普鲁士”这个标签，其实是源自于古波罗的人的。在波兰东扩之时，说着波罗的语的“普鲁士人”，正生活在这片后来让德、俄两国打破头的土地上。



波罗的海人地缘位置图

分割波罗的海东部海岸线的，是一个以“芬兰”命名的，深入大陆 400 公里的海湾——芬兰湾。芬兰湾与维斯瓦河下游之间，就是“波罗的地区”。整个地区有数十条体量不大、源自波罗的丘陵河流，独立流入波罗的海。今天充当立陶宛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界河的“尼曼河”（也译涅曼河），在当年也是普鲁士板块的北方边界。所谓“普鲁士地区”所初所指向的，就是维斯瓦河——尼曼

河之间的沿海平原。

不过后来在德意志人以“飞地”的形式，殖民普鲁士并立国之后，为了打通与德意志本土的通道，吞并了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波兰领土，“普鲁士”的概念也扩展到了这部分土地上（西普鲁士）。原来的普鲁士，则被命名为了“东普鲁士”。由于这段历史大家会比较熟悉，为了不至于引发混乱。在后面的行文中，会让“东普鲁士”这个标签提前几百年出现，以代表这片“古普鲁士”之地。

苏联对中东欧国家边界的划分

东普鲁士目前已经跟德意志人没什么关系了。在苏联代表斯拉夫民族，击败德意志人之后。东普鲁士故地，又被苏联和波兰所分割。更由于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俄国斯所占据的这部分东普鲁士领土（加里宁格勒州），最终演变成为了一块被波兰和立陶宛包围的“飞地”。一直以来，俄国人对地缘政治的研究，都是非常深入的。他们几个世界以来的扩张行为，也堪称地缘政治层面上的，教科书式的扩张。这一点，从对东普鲁士的切割上就可以看出。

按照我们以流域来分割东、中欧平原的标准来看。东普鲁士属于典型的缓冲地区。其西部的维斯瓦河三角洲，属于中欧的范畴，东部则属于东欧的地理范围。前苏联拟定的苏、波边境线，其实就是按照中、东欧的地理分割线来划的。至于波兰与德国的国境线，同样也是按照 1000 多年前，波兰王国立国之时，以奥得河划分斯拉夫人、德意志人领地的标准来做的。

当然，如果再往前追溯若干年，上溯到东法兰克王国，或者神圣罗马帝国初创时的时代，苏联人也可将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之间的政治分割线，定位在易北河。不过德意志人经营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地区已有千年，勃兰登堡和它的中心城市柏林，甚至成为了德意志人的政治中心。真要这样做，地缘政治风险实在太大了（尤其西方不会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不过苏联人也并没有放过这片，原来曾经被斯拉夫人经营过的土地。以勃兰登堡地区为核心建立“东德”，并将之纳入社会主义阵营，正是俄国地缘政治思维的体现。

将时空后移千年，提前触及东普鲁士的话题，主要是这段历史大家相对比较熟悉，波罗的人的早期历史，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事实上，由于与地中海文明相距甚远，波罗的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直到波兰人进入国家状态，并开始向东扩展空间，欧洲的天主教国家，才算对这支古老族群有所了解。在这一阶段，被记录下来的波罗的人部落，包括普鲁士人、立陶宛人在内的有七、八支（具体分布参见《波罗的人地缘位置图》）。

今天的话，消失的消失，融合的融合，最终整合成了当下的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了。至于后来德志意人，是怎么跨越波兰控制下的“波美拉尼亚”，跑到波罗的地区去建立殖民飞地的，我们将在十字军东征阶段具体解读。现在的话，另一支跨越式殖民的日耳曼人——维京人，才是地缘政治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明星族群”。

第三节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日耳曼人

维京人的分别扩张方向

日耳曼民族北支被打上的“维京人”标签，原意指的是“来自海湾的人”，以地理位置来命名的话，又可称之为“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还有一个更通俗的名称——北欧海盗。不过不管是维京，还是“北欧”的范畴，都不只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是还应该包含之相对的日德兰半岛（包括附属岛屿）。以今天的地缘政治结构来看，就是挪威、瑞典、丹麦三国了。

维京人开始为害欧洲的时间，始于查理曼时期（8 世纪末、9 世纪初）。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 11 世纪，他们逐渐融合于天主教世界之前的 200 年时间里，西方人对他们的恐惧心理，并不亚于那些被称之为“黄祸”的，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匈人、蒙古人等）。不过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都是那些对西欧海岸线进行劫掠渗透的维京人，却不一定知道维京人其实在公元 9 世纪，曾经纵横东欧平原，建立了东欧平原最早的国家——罗斯国。

从地缘角度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一方面在维京人南下之时，西欧地区已经被罗马人、日耳曼人开发成了熟地，并且建立了文明国家。维京人的“恶行” 有机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反观东欧平原，当时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土著处于原始部落联盟阶段的土地。维京人具体做了些什么，很难被具体的记录下来。更重要的一点是，维京人最初建立的“罗斯”国，已经被东斯拉夫人认定为自己国家的源头。从民族感情上看，俄国人是绝不愿意认定，罗斯国最初其实是一个日耳曼殖民国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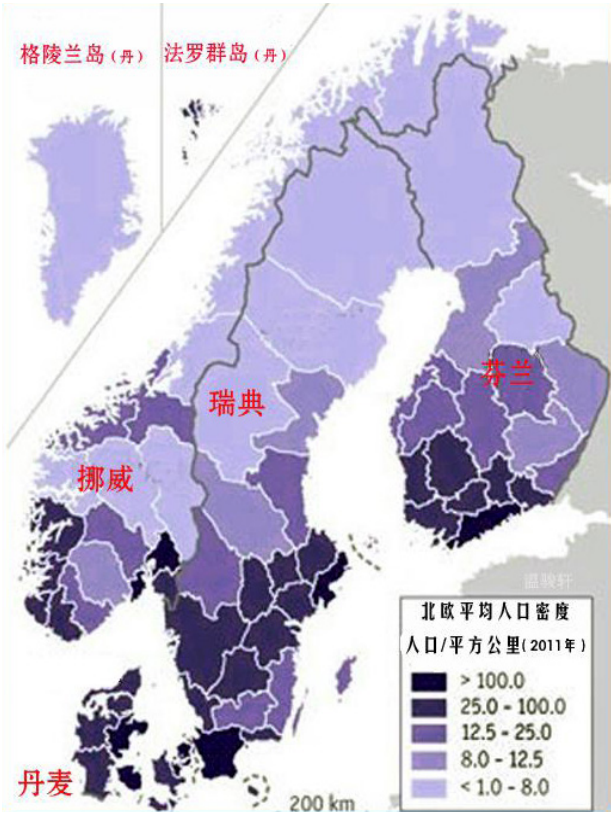
俄国人到底怎么想的，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抛开现实的地缘政治束缚，做出客观分析才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实际上，维京人只是一个统称。渗透东欧平原的维京人，与为害西欧的维京人，其实在地缘分布上是有所区别的。简单点说，向东方扩张的是瑞典人，而沿大西洋海岸线南下的，是丹麦人和挪威人。

与大多数半岛一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实质上也是一条延伸入海洋的山脉——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加上沿海平原所组成的。其中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山脉西麓，面向大西洋一侧的维京人，演变成了今天的挪威人；向东面向波罗的海一侧的维京人，则成为了瑞典人。至于日德兰半岛，就是丹麦了。从地缘位置来看，面向西欧海岸线扩张的机会，属于丹麦和挪威，瑞典人则更有机会建成一个环波罗的海王国。只不过，波罗的海周边并非只有维京人。想一统波罗的海，最起码还得看看竞争对手的情况。

在解读过中欧、波罗的地区之后，我们对波罗的海南部、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地缘结构，已经有所了解了。当下比较陌生的，是北部的情况。波罗的海的北部海域被称之为“波罗的尼亚湾”。海湾西岸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东部则是另一个半岛形半岛——芬兰半岛。芬兰半岛的南部，则是将之与波罗的地区分隔开来的，面积只有



波罗的海地区示意图



北欧平均人口密度图

波的尼亚湾四分之一的“芬兰湾”。

维京人的海洋属性

说起来，芬兰湾的面积和纵深，本来有机会大大增加的。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芬兰湾东部，顺着其延伸方向有两个面积巨大的湖泊：拉多加湖、奥涅加湖。其中前者是欧洲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我们后面会说到，这一地理特征，对波罗的海东部的地缘政治结构，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维京时代，日耳曼人主要分布在气候相对温暖的半岛南部。至于中、北部地区，则和芬兰半岛、爱沙尼亚地区一样，为“乌拉尔人”所覆盖。然而二者的实力并不是由土地面积来决定的。斯堪的纳半岛东南部与日德兰半岛，不仅纬度相对较低，亦拥有大片沿海平原。能够为维京人发展农业（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提供好于北部的基础。即使今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北部，人口密度也远低于南部地区（参看《北欧人口分布图》）。

一般来说，基于环境原因，高纬度地区的民族比之低纬度民族，要更有迁徙的欲望。然而这种迁徙的欲望，并不一定意味着侵略性。如果身处的环境过于恶劣，不能维持一定人口数量，你基本上就只能努力去适应恶劣气候了。比如蒙古高原所能维持的人口基数，足以让游牧民族对东亚

地区造成压力，但纬度更高、气候更恶劣的西伯利亚地区，就有心无力了。

将维京人比作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乌拉尔人对应西伯利亚渔猎民族，相信会更有利于大家理解，二者之间的地缘差异。当然，维京人与游牧民族，在技术上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生存之地是一片草原，他们进行扩张时所凭借的，是基于游牧生活而生成的，依靠驾驭“马”而得来的机动性；至于维京人，要想征服其他民族，就得先具备征服海洋的能力。

一个民族并非临海，就一定具有海洋性的。要想征服海洋，首先需要有天然良港。一般来说，依山靠海的地区，更有机会形成天然的峡湾，并被人类开发为良港。就这一点来说，维京人比之波罗的海沿岸的其他民族，优势要明显的多。作为欧洲北部唯一的山脉，斯堪第纳维亚山脉的存在，使得整个半岛沿岸破碎曲折，造就了很多天然良港（尤其是西侧挪威境内）。相比之下，波罗的沿岸的其他地区，尤其是气候上更具竞争力的波罗的地区、中欧平原沿海地区，则在冰川和海洋、河流的作用下，把海岸线打磨的十分平缓。

天然港口的大量存在，使得维京人的地缘属性中，具备了浓厚的海洋气息。借驾驭船只的能力，维京人不仅成为了波罗的海的主导者，更把触角伸向了大西洋沿岸地区，以及东欧平原腹地。相比之下，维京人对西欧沿海地区的劫掠、殖民要更容易理解。驾船出海的维京人，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沿着海岸线航行，就可以进行他们所善长的“渔猎”活动了。比较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瑞典人是怎么出现在东欧平原的土地上，并且在后来威胁到拜占廷帝国安全的。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接着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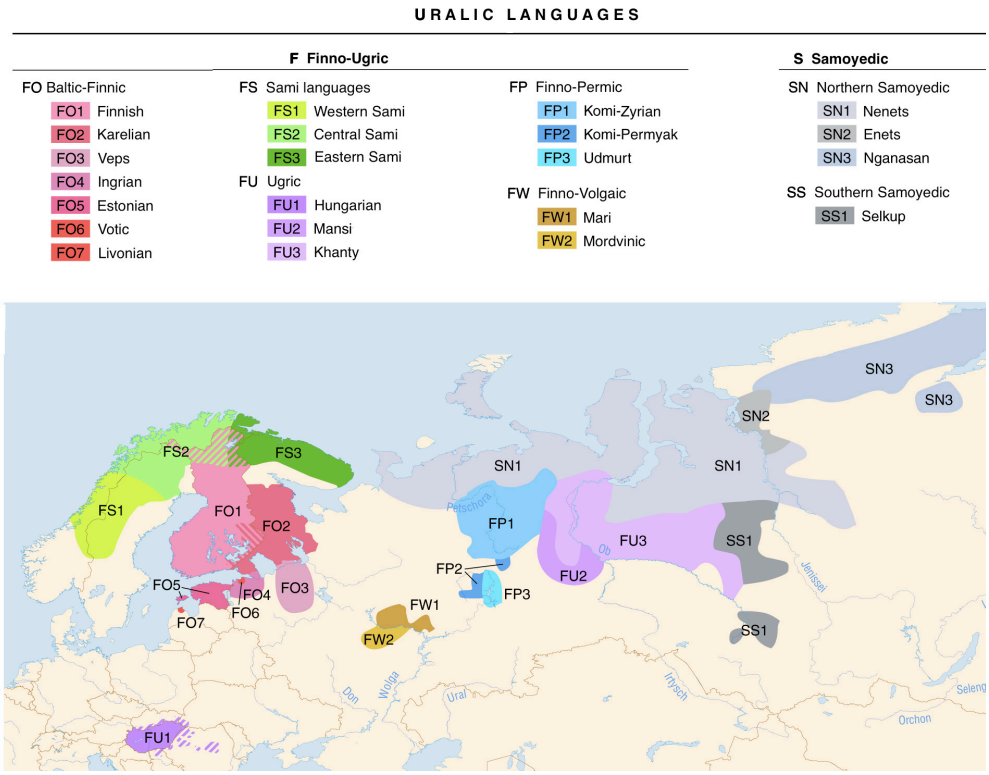
第四节 乌拉尔人早期的分布范围

之前我们曾经提过，如果地质运动出现些许偏差，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应该很有机会，成为芬兰湾的一部分的。果真如此的话，芬兰半岛的地理独立性应该要比现在强很多，也会对今天的地缘政治结构，造成很大影响。比如俄国人在与芬兰切割这部分国境线时，就很有可能以水域中线为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渗透到两湖以北；生活在爱沙尼亚的，也许就是波罗的人，而不是与芬兰人同属乌拉尔人的爱沙尼亚人了。

乌拉尔人已经在我们的行文中出现过多次了，鉴于波罗的海周边的其他民族都已经出场，也是时候给这个边缘族群一个平台展现自己了。与印欧、闪含、突厥这类族群概念一样，“乌拉尔人”也更多是通过语言而不是基因来归类的。所谓“乌拉尔语系”，是一个与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闪含语系平级的语言分类。（在语系之下是“语族”的概念。比如突厥语、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也就是阿尔泰语系下属的三大语族）。

大多数情况下，语区的分布规律和种族的分布规律是相一致的。除了那些明确可以归类于几大人种的族群以外，在一些板块相接之地，也会出现混血种族。最典型的，

就是身处欧洲草原与北亚草原之间的中亚地区了，今天覆盖于这一地区的突厥系民族，明显呈现出黄白混血状态。事实上，乌拉尔人也一定程度呈现出这样的特质。不过早在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之前，初始为黄种人的乌拉尔人就已经生活在欧洲了，所以对于身处亚洲的我们来说，欧洲乌拉尔人血液里到底带有多少黄种人基因，其实并无助于提升民族或者种族自豪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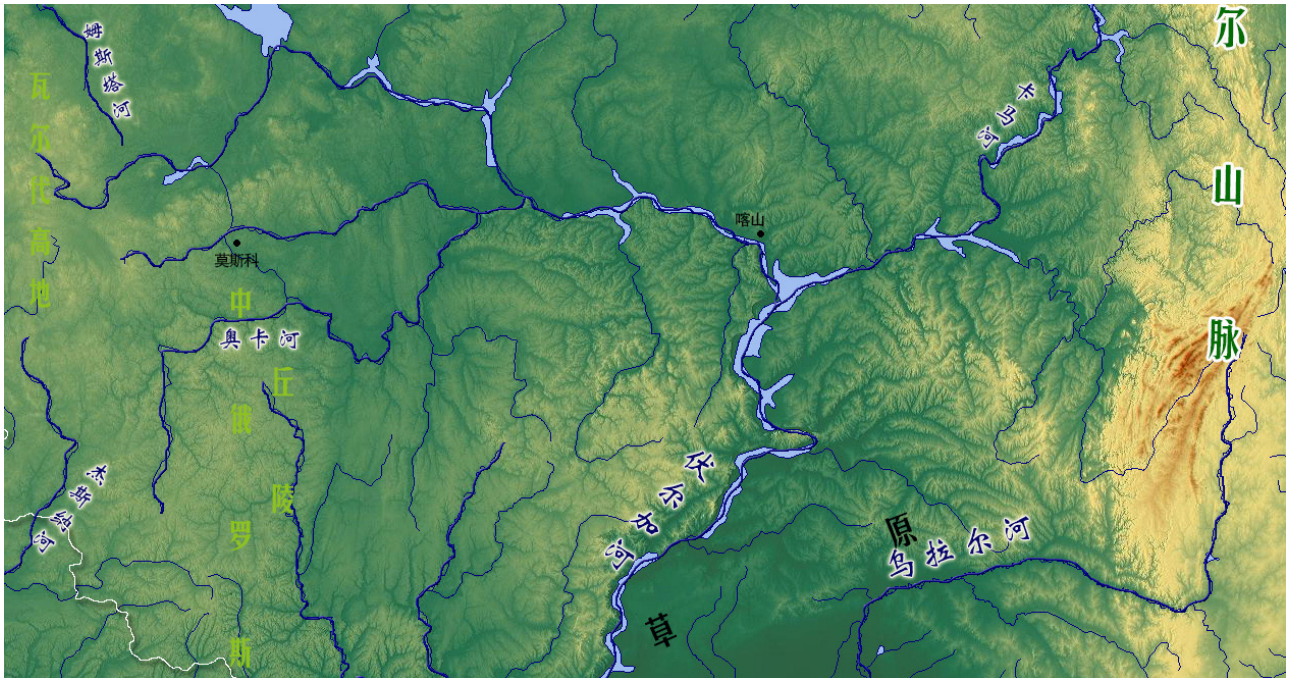
乌拉尔语系分布图

从“乌拉尔”这个标签来看，这个族群的生存之地，肯定跟欧亚大陆的分割线——乌拉尔山脉有关了。今天在乌拉尔山两侧，俄国人建制的行政区中，如：涅涅茨自治区、科米共和国、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汉特－曼西自治区，都仍然带有乌拉尔人的印记（涅涅茨、科米、汉特、曼西等，都是乌拉尔语民族）。不过乌拉尔人最初聚集之地，可能跟另一个地理标签－伏尔加河联系更为紧密。大约 7000 年前，原始乌拉尔人已经生活在乌拉尔山脉西侧，伏尔加河中上游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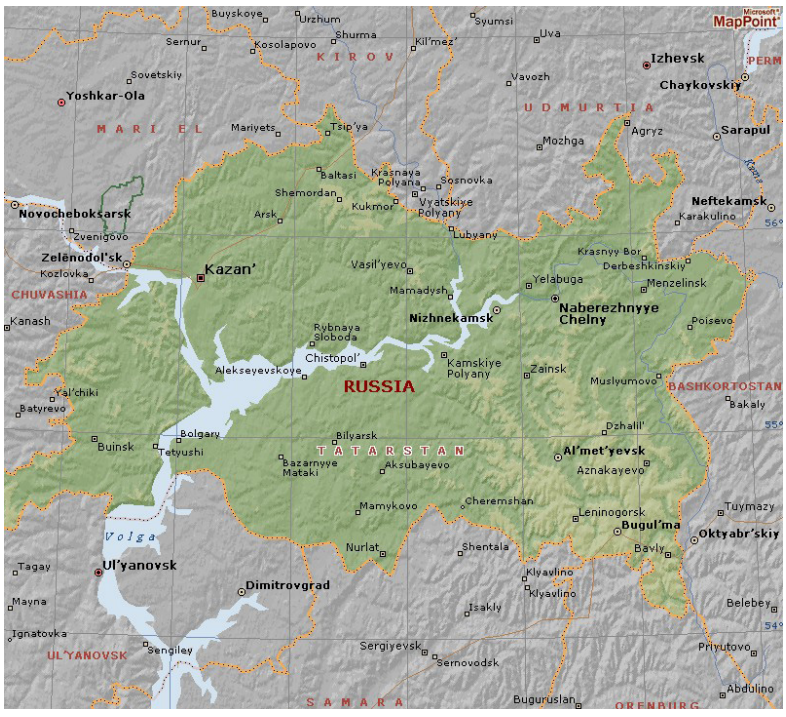
伏尔加河有两个源头，东源即发源于乌拉尔山西坡，被称之为“卡马河”；东西向横切俄罗斯中部丘陵地带的西源，则被认定为是伏尔加河正源。作为欧洲最长、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伏尔加河流域的总面积就占了东欧平原的 1/3（136 万平方公里）。仅从这点来看，也能看得出伏尔加河对俄罗斯的重要性。俄罗斯人也因此把伏尔加河称之为“母亲河”。

伏尔加河与卡马河合流之处，位于今天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境内。合流之后的伏尔加河，开始向南穿越南俄草原，并最终注入里海。就地缘政治地位来看，今天“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首都，河口附近、伏尔加河畔的“喀山”，与圣彼得堡、

莫斯科处于同一等级（此三城也是俄罗斯三大历史名城）。很显然，“伏尔加河——卡马河口地区”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得益于它在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中的枢纽位置。斯拉夫人要想控制伏尔加河流域，仅仅渗透到上游地区的莫斯科肯定是不够的。



喀山位置图



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

不过从“伏尔加河——卡马河口地区”今天仍然挂着一个，带有异族属性标签的“鞑靼”，大家也能感觉到，斯拉夫人对这一地区的整合还称不上彻底。事实上，这个地缘枢纽一直以来，都在接受着来自亚洲的影响。最早占据于此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乌拉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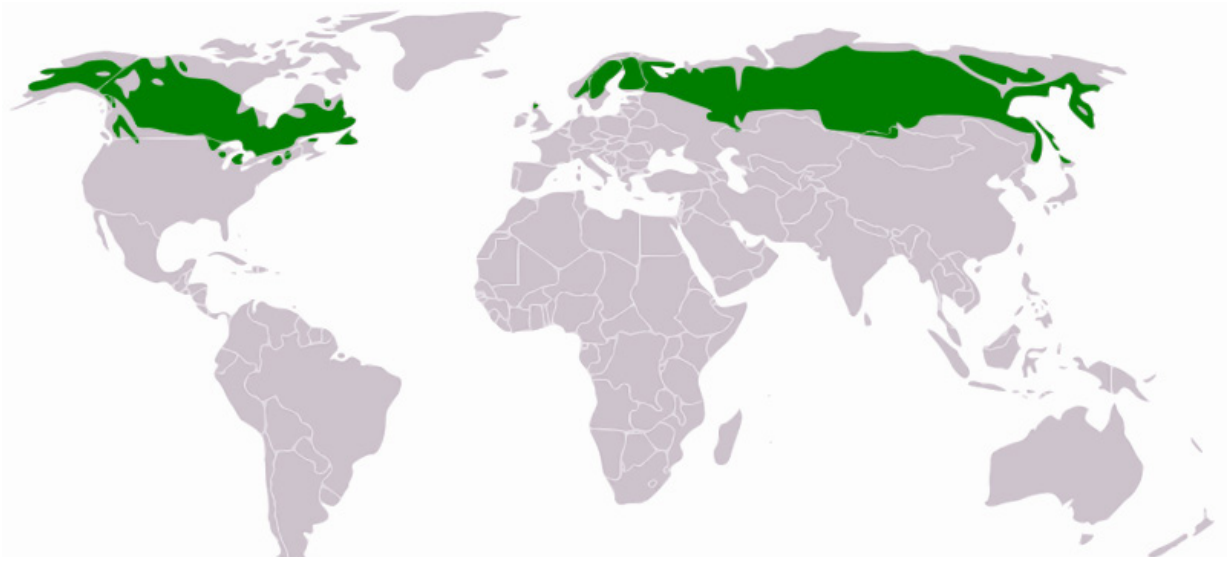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属于南俄草原，是欧洲大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大多数人眼中，草原游牧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手段，但从生产力来看，比起纯粹靠天吃饭的“渔猎”还是有很大进步的。尤其在“马”被驯化之后，草原的经济、军事优势都被进一步的挖掘出来了。然而尽管后来的确有部分乌拉尔人，加入了游牧民族行业，但乌拉尔人的整体属性却更偏向于渔猎。

第五节 乌拉尔人的迁徙

欧亚大陆植被带的差异

乌拉尔人没有能够成为欧亚草原的主人，是因为原始印欧人的存在。最初的乌拉尔人有可能与原始印欧人共同生活在南俄草原（并开始出现混血），然后在与原始印欧人的竞争中落败，被迫退出草原北上。而原始印欧人之所以能够在竞争中获胜，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最先驯化了“马”。凭借这一划时代的技术优势，印欧系游牧民族，曾经长期控制着“西干草原”（南俄草原 + 中亚草原）。这种情况，直到以匈人为代表的，来自亚洲的阿尔泰系游牧民族崛起后才得以改变。

“伏尔加河——卡马河口地区”（或者说“鞑靼斯坦”）的年平均降水量约在 500 毫米左右，相对较高的降水量，也使得这一地区的所覆盖的植被，变成了森林。今天河口之南的伏尔加河干流上，已经筑坝蓄水形成了俄罗斯最大的水库——古比雪夫水库。如果你一定需要一个座标，来标定这条森林地带南线范围，那么大坝本身应该可以承担这个责任（需要注意的是，草原与森林之间，还有一条宽约跨 100 多公里的“森林草原”地带为之缓冲）。没有入主草原的原始乌拉尔人，最初就是在伏加尔河流域的这片森林地带聚落，并继续向西、北、东三个方向扩散的。因此也可以把伏尔加河中上游这片森林之地，定位为乌拉尔人的起源之地。



亚寒带针叶林带分布图

从环境来看，能够一直生活在伏尔加河中上游流域的乌拉尔人，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侧，相同纬度已经是臭名昭著的“亚寒带”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熟悉的亚寒带地区就是“西伯利亚”了。在解读东亚文明时我们曾经说过，甚至连更适应恶劣气候的游牧民族，都不曾真正征服过被亚寒带气候覆盖的西伯利亚地区。即使在今天，亚寒带也是人类进行农业开发的的禁区。在这片气候寒冷、湿度相

对较高（蒸发量小）的土地上，最适合生长的植被，是以落叶松、云杉等树种为代表的，耐受严寒的“针叶松”。亚寒带气候区，也因此被称之为“亚寒带针叶林带”。至于动物的种类，显然也不会太多。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都要有能够抵御严寒的毛皮。

由于东西伯利亚高原及沿海高大山脉，对海洋暖湿气流有阻隔作用，而欧洲大陆整体的地势较为低平，更容易让大西洋暖湿气流渗入大陆腹地，所以欧亚大陆北部的“亚寒带针叶林带”，并非起始于同一纬度。总的来说，地势低平的欧洲大陆、西西伯利亚平原，针叶林带的南线在北纬 60 度——55 度之间。越往东，起始线的纬度越高（位置越靠南）；北亚的中西伯利亚高原、东西伯利亚山地，起始线则在北纬 50 度附近。在外东北的滨海地区，由于锡霍特山脉的向南延伸，针叶林气候带甚至向南延伸到了北纬 45 度（相当于中俄边境的“兴凯湖”一线）。



欧洲地形及植被带示意图

与“亚寒带针叶林气候”相对应的，是四季分明、积温较高，适合农业开发的“温带落叶阔叶林带”。易北河以西的中、西欧平原，能够接受更多大西洋暖湿气流的地区，就属于它的范围。至于易北河以东（包括波希米亚高地在内）、亚寒带以南的森林地带，则属于过渡型的“温带针阔叶混交林带”。除了紧贴乌拉尔山脉的卡马河北部以外，伏尔加河流域都属于这一“不上不下”的混合气候区。

一个地区的气候环境，总是能够通过植被的生长状态反映出来，并且直接作用在人类身上的。中国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是这个道理。以欧洲的气候环境而言，身处亚热带范围的地中海气候区，肯定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了，由此也诞生了欧

洲最初的希腊、罗马文明；次之的，则是易北河、波希米亚高地以西的中、西欧地区（包括英格兰地区）。这一地区，也正是查理曼代表日耳曼人，“重建”罗马帝国的版图所在；至于斯拉夫人的地缘渗透方向，则定位为了统一 “温带针阔混交林带”。问题是，他们在这个方向上，一定会遭遇到乌拉尔人的阻力，那么双方博弈的结果到底如何呢？

乌拉尔人向温带地区迁徙

当我们在地图上，把草原线和亚寒带针叶林带画出来，我们大致就清楚“温带针阔混交林带”的范围了。从地理的角度看，德湿斯特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区，以及波罗的地区都属于这个范围。按东欧平原现有的政治格局划分，包括波罗的三国、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北部；拉多加湖——卡马河以南，顿河以北的俄罗斯领土。

没有证据表明，乌拉尔人曾经全面控制东欧平原所有的“温带针阔混交林带”。根据地缘位置看，波罗的人最初应该是沿着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上溯到今天的白俄罗斯境内，然后对接入尼曼河、道加瓦河等波罗的海河流的。这意味着，在斯拉夫人东扩之前，说着波罗的语的部落，很有可能散布于第聂伯河中上游地区的森林中。至于乌拉尔人，他们如果还想享受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伏尔加河上游地区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再往西渗透的话，乌拉尔人还能在芬兰湾南部，也就是爱沙尼亚一带切割掉一段海岸线。

上述迁徙线路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的波罗的地区，同时分布有波罗的人和乌拉尔人。如果不是因为斯拉夫人的强势插入，这一切本应更好理解的。斯拉夫人是在公元一世纪，开始从维斯瓦河流域向东扩张的。基于气候和与文明区（拜占庭）距离的原因，东斯拉夫人选择了条件更好的第涅聂河流域，作为渗透方向。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在维京人开始介入之前，波罗的人的空间已经被压缩到了波罗的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北部也完成了斯拉夫化进程。

在印欧系民族的挤压之下，种族、语言与之都有明显区别的乌拉尔人，并没有太多机会，扩大他们在温带地区的影响力。不过在让人望而却步的亚寒带地区，能够对乌拉尔构成障碍的，就只有气候了。然而我们永远不能低估人类的适应性，虽然亚寒带地区几乎没有农业潜力，但针叶林和依附它生存的动物，还是足以支撑人类最基本的温饱需求的。只是依靠最原始的渔猎生产方式，亚寒带乌拉尔人的人口数量将极其有限，基本没有可能对外部地区构成威胁了。当然，恶劣的环境也会大大降低外族对这片土地的兴趣，使得乌拉尔人有机会在封闭状态中，延续自己的民族文化。

原始乌拉尔人在公元前，肯定就已经覆盖了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西西伯利亚平原的亚寒带针叶林带。不过乌拉尔人和印欧人一样，由于迁徙时间不同，分裂成了不同的部族。今天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西西伯利亚，生活在森林气候区的乌拉尔人，最初都是由伏尔加河中游开始扩散的，我们可以将之称之为“伏尔加乌拉尔人”，以

区别于更早的，来自亚洲的族源。

以语言归类的话，“伏尔加乌拉尔人”也可以称之为“芬兰－乌戈尔人”（芬兰－乌戈尔语族），归类为这一语族的乌拉尔人中，最为让人熟知的应该就是芬兰人了。不过“芬兰”这个标签已经成为了所有芬兰人标签，纯粹从民族角度划分的话，将之称为“芬人”会更加清晰。芬人是在公元 1 世纪迁入芬兰半岛的。迁徙的导火索，很可能和斯拉夫人的东进有关。而之前覆盖芬兰半岛，乃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北部的，则是另一支更早到达北欧乌拉尔人——萨米人。

第六节 乌拉尔人由渔猎生活向游牧生活转换

萨米人驯养驯鹿

在芬人和日耳曼人的挤压之下，今天萨米人已经成为一个“寒带”民族了。北极圈成内极度严酷的气候，成为了他们最后的保护者。在这片极限之地上，树木因为寒冷基本已经无法生存了。只有那些紧紧贴附地面生长的草本植物、苔藓、地衣等，才有机会适应出耐寒品种。依据这一植被覆盖情况，亚寒带针叶林带以北的这片土地，也被称之为“苔原”（或“冰原”）。对于生存在苔原之上的民族，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生活在北美大陆最北部（白令海峡西岸的东西伯利亚山地也有分布）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了。



苔原地区植被类型

在新大陆被发现之前，整个美洲都是地球上的一个地缘孤岛，无法与多样性的“世界岛”（欧亚非大陆）交流，更别说是生活在苔原之上的因纽特人了。地缘环境的封闭，使得因纽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一直处在“渔猎”阶段。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

觉得奇怪了，在如此极限之地，靠天吃饭难道不是唯一的选择吗？答案是否定的。最起码身处欧洲，有机会与其他文明接触的部分萨米人，学习到了另一种生产方式——游牧，以增加他们的食物来源。当然，凡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萨米人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成为了“芬兰－乌戈尔语族”的一员。



萨米人分布区域图



萨米人

在不同的地区，游牧民族会因地制宜驯养不同的有蹄类动物。雨水较多的“草甸草原” 可以养牛（曾经让红军吃尽苦头，青藏高原东部的“若尔盖大草原”就是草甸草原与沼泽地的混合体）；相对干旱的“干草原”以牧羊为主；更加干旱的荒漠草原可以养骆驼。至于“苔原”上最有机会被训养的经济动物，就是“驯鹿”了。

萨米人大规模游牧驯鹿，是中世纪结束之后的事情了。不过这支极地民族驯养“驯鹿”做为交通工具的历史，肯定要远早于这个时间了。这一奇特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融入了欧洲民间传说，并最终演变出了孩子们喜欢的“圣诞老人”。今天萨米人所在的芬兰、挪威北部拉普兰德地区，也被公认为是圣诞老人的故乡（萨米人也被称之为“拉普人”）。基于圣诞老人为世界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在这个只关心强者的文章中，也应该为他们留下一席之地。

乌拉尔人从渔猎民族变身为游牧民族

回到竞争激烈的温带世界。受到印欧人挤压，逐渐边缘化的乌拉尔人，并非完全没有机会让文明世界记住他们。只是他们要是一直呆在森林里，出头的机会就不大了。然而机会在哪呢？加入游牧者的行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受环境开放性的影响，游牧者对于接纳外来族群的态度，比之定居者要开放的多。换句话说，只要你愿意在草原上生活，那你就有机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然，前提是你自己要能适应艰苦的游牧生活。

游牧生活对于定居者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即使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加入游牧阵营，也会一直思念故土那相对富庶、安定的生活。然而对于层级更低的渔猎者来说，这种身份转换障碍要小得多。一方面游牧生活所能提供的食物，要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森林渔猎者出于机动的需要，通常也已经变身成为了“马上民族”（除非没有养马的条件），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事实上，很多游牧部落都有过这种身份的转换。比如我们熟悉的“鲜卑”，最早就是游牧的东胡民族的一员。在东胡被匈奴击败之后，他们选择退入了大兴安岭北部，被迫以渔猎为生。而在匈奴帝国遭遇汉帝国重压而崩溃后，鲜卑人又成为了蒙古草原的主人，甚至进而入主中原。

正常情况下，渔猎民族向游牧民族转换，有一个自然过渡过程。前面我们也说了，森林和草原之间存在一条过渡性的，森林、草原相间的“森林草原”地带。比如大兴安岭和燕山山脉之间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就是典型的“森林草原”地带。从这里走出的乌桓、契丹等民族，最初都具有鲜明的，渔猎、游牧混合结构的特点。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南俄草原与乌拉尔人所处的温带森林之间。也就是说，乌拉尔人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选择游牧生活的。在印欧系游牧民族统治南俄草原时，肯定已经有乌拉尔人这么做过了，只不过他们并没有机会保留自己的文化（结局是被更为强势的草原民族所融合掉）。

愿意走出森林，进入草原打拼的乌拉尔人，终于在公元 4 世纪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机会。当匈人挥师西进，让整个欧洲都为之战栗时，游牧者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也

在欧亚大陆西端，迎来了自己的盛宴。这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上，有着足以让所有游牧者分配的土地和利益（降低了内部竞争度）。在这种大背景下，一部分乌拉尔人也有机会分上一杯羹。他们中的一支，甚至成功的在欧洲地缘政治舞台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以至于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喀尔巴阡山之南，看到一个带有乌拉尔人基因的地缘标签——匈牙利。

第四章 匈牙利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的建立

第一节 马扎尔人从西西伯利亚进入欧洲

阿瓦尔人从高加索进入多瑙河中游平原

说到“匈牙利”，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匈人，并认为今天的匈牙利人是匈奴的人的后代。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匈牙利人，其实是另一支游牧民族——马扎尔人的后裔，马扎尔人不仅不是匈人后裔，同时也不是其所属的“阿尔泰语系”成员。事实上，马扎尔人正是我们这阶段所重点解读的“乌拉尔人”的一员。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匈牙利草原之前是什么情况。在强大的阿提拉帝国崩溃之后，从多瑙河中游到南俄草原都曾经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当初被匈人裹挟，加入游牧盛宴的各个部族，也开始为瓜分匈人的遗产而大打出手。这其中，最先重建匈牙利草原秩序的，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阿瓦尔人”。中国研究者更愿意相信，阿瓦尔的标签，最早属于一支来自蒙古高原，并且与华夏文明发生过联系的游牧民族——柔然。不过，从地缘关系上来看，阿瓦尔人最初的来源地，很可能是另一片高地——高加索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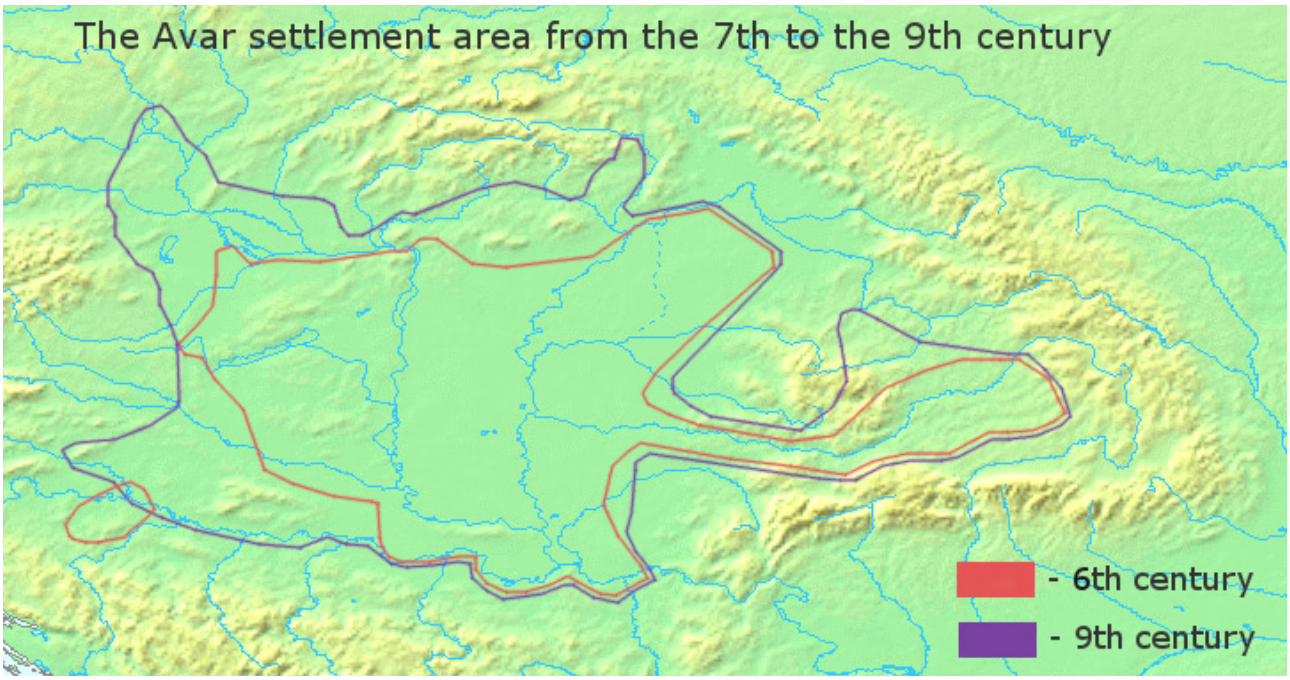
所谓高加索地区，指的是黑海与里海之间，南俄草原之南，由大、小高加索山脉所组成的那片高地。今天的“高加索国家”，通常指向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个前苏联国家。另一个经常与“高加索”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的，是种族问题。在四大人种中，白种人又被称之为“高加索人种”，最早做出这项定义的人类学家相信，白种人最早起源于高加索地区。不管这种诊断是否准确，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封闭的高加索地区，的确有一些独特地缘特点。

高加索地区的土著语言，与高加索人种普遍所属的印欧、闪含语系不同，属于独立的“高加索语系”。在我们已经解读过的历史中，比印欧人更早迁西迁欧大陆的“伊比利亚人”，其语言就是属于这一语系。今天，古伊比利亚人留在比利牛斯山脉西端的后裔“巴斯克人”，依然还顽强的保留着这份高加索基因（因此高加索语系，又称“伊比利亚——高加索语系”）。单从这点来看，如果说欧洲各大民族，最早是以高加索地区为源头，也的确有一定的逻辑性。

鉴于高加索地区的面积和环境，这个语言孤岛中仍然属于高加索语系的人口，数量并不太多（尤其亚美尼亚语和阿塞拜疆语，还分别属于印欧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今天在高加索地区，属于高加索语系的民族，大约有 3、40 支，比较为人所熟知的，有格鲁吉亚人、车臣人等。除此之为，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小民族，这其中就包括一支以“阿瓦尔”命名的，人口数十万的民族。

在阿提拉雄据欧洲草原之时，除了把主攻方向定位为欧洲以外，也曾经试图跨越高加索山脉，入侵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为了让祸水东移，付出了巨大代价）。虽然

这一计划，执行起来并不顺利，阿提拉也很快又把目标指向了欧洲。不过却让高加索山地的部落，有机会搭顺风车，前往欧洲去一试身手。我们并不知晓到底有多少高加索部落前往欧洲“掘金”，不过阿瓦尔人肯定是最成功了。在匈奴崩溃之后的草原世界，他们不仅击败了那些系出匈人的嫡系部落，也凭借和伦巴底人的结盟，成功的在后者入主意大利半岛后，接手潘诺尼亚地区。可以说，当时占据整个多瑙河中游平原的阿瓦尔人，看起来很有希望再现匈人的辉煌。



阿尔瓦人在多瑙河中游平原的势力范围

不过阿瓦尔人并没有做到这点，在查理曼整合除不列颠、北欧以外，几乎所以日耳曼人的力量之后，阿瓦尔人的草原帝国，也被法兰克人击溃了。可以说，正是凭借帮助西方世界解除来自匈牙利草原的游牧威胁，法兰克人的声势达到了顶峰，并且得以建立帝国。然而这片草原终究还是属于游牧民族的，阿瓦尔人消失后，一定会有新的游牧民族填补他们的真空。而这次异军突起，胜者为王的，就是乌拉尔人中的“马扎尔”部。与来自高加索的阿瓦尔人一样，马扎尔人原本也不是纯粹的草原民族。不过他们并不是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来自伏尔加河中游，而是来自于亚洲的西西伯利亚平原。

马扎尔人由西西伯利亚渗透至南俄草原

前面曾经说过，芬兰——乌戈尔语族的“伏尔加乌拉尔人”曾经向北方针叶林带扩张，将原本生活在此的乌拉尔人，挤压到了苔原地带（当然，肯定也有部分被同化了）。不过针叶林带并不仅仅存在于乌拉尔山脉以西的欧洲，在这条平均海拔不过 500——1200 米的山脉之东，同样纵横着贯穿整个亚洲北部的“亚寒带针叶林带”。那些从伏尔加河流域，迁往西西伯利亚的乌拉尔人，标签就是“芬兰——乌戈尔语族”中的“乌戈尔”。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称之为“乌戈尔人”。

与东欧平原略有区别的是，远离大西洋，并且有山脉阻隔的“西西伯利亚平原”，气候要更加的严酷。由于气温过低，下游河流迟迟不能解冻，奔流而下的河水只能漫流而出，使得西西伯利亚平原甚至有半数土地常年处于冰冷湿地状态。气候的影响也体现在植被带上，在西西伯利亚南部，针叶林带几乎没有经过温带阔叶林带过渡，就与中亚草原相对接（中间当然还有过渡的“森林草原”带了）。今天生活在这片针叶林带的“乌戈尔语族”乌拉尔人，主要有汉特、曼西两族（北部的苔原地带，则为不属于“芬兰——乌戈尔语族”的涅涅茨人），俄国人还“大方”的为他们设立了个“汉特——曼西自治区”。

马扎尔人最初应该生活在西西伯利亚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不过与来自高加索的阿瓦尔人是在匈人的带领之下，变成了一支驰骋于欧洲的游牧民族不同。马扎尔人走进草原的时间则是在匈人之后。我们知道，自匈人打通了西进之路后，亚洲游牧民族就开始一拔接一拔的向南俄草原渗透。这之后，最成功的当属蒙古人了。而如果要论匈奴和蒙古两大帝国之间，最成功的草原帝国最哪个，那肯定就是“突厥”了。只是相比蒙古人和匈人的西征，很多人并不知晓，也曾经亦有突厥化的游牧民族，在南俄草原建立过草原帝国。

突厥语族的游牧民族渗透南俄草原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 6 世纪末。这一时期西突厥帝国开始在中亚草原崛起。至于最终渗入欧洲的突厥人，是以什么样的政治标签留下自己的印记，等到具体解读基辅罗斯时会一并揭晓。现在我们还是先解决马扎尔人的问题吧。依附于突厥人的马扎尔人，曾经长期在南俄草原滞留。并且在突厥系民族的相互倾轧中求生，这种情况直到公元 9 世纪末才得以改变。

由于无法在南俄草原上应对阿尔泰语系部族的竞争，马扎尔人在公元 9 世纪末被迫退入了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不过很显然，马扎尔人暂时还不想改变他们的游牧属性，曾经帮助阿提拉横扫西欧的“匈牙利草原”才是他们的目标。此时在匈牙利草原游牧的，仍然是在本世纪初，被查理曼击溃了的阿瓦尔人（自那以后，阿瓦尔人内部一直处在分裂状态）。至于与之相邻的潘诺尼亚平原，则是以斯拉夫人为主。

第二节 马扎尔人建立匈牙利王国

马扎尔人进占多瑙河中游平原并袭扰欧洲各国

马扎尔人命运改变的契机，出现在日耳曼人与摩拉维亚人之间的博弈中。我们知道，公元 9 世纪初，摩拉维亚人曾经代表斯拉夫民族，建立了第一个强大国家——大摩拉维亚国。摩拉维亚、斯洛伐克、波希米亚，乃至西里西亚、加利西亚、潘诺尼亚，都曾经为大摩拉维亚国所染指（上述地缘板块都曾详解过）。对于西斯拉夫人的坐大，最不能容忍的当然就是同在中欧的日耳曼人了。从地缘结构上看，要是让摩拉维亚人坐实了潘诺尼亚，那么西斯拉夫与南斯拉夫地区就将连成一片。到那时，跑到罗马去

和教廷讨论“罗马皇帝”归属问题的，就可能是斯拉夫人了。

出于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日耳曼人迫切希望匈牙利草原上，能够出现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从背后夹击摩拉维亚人。最终这个战略机会，被马扎尔人抓住了。在进占匈牙利草原后，马扎尔人也像匈人、阿瓦尔人那样，开始向潘诺尼亚扩张。斯拉夫人的空间，则再一次的被迫向潘诺尼亚的边缘收缩。

从战略层面来看，匈牙利草原的再次崛起，的确极大的损害了斯拉夫人的利益。10 世纪初，大摩拉维亚国，被穿越“匈牙利门”的马扎尔人所攻灭。此后不久（公元 911 年），固守日耳曼传统的德意志人也选出自己的国王，与拉丁化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分道扬镳。然而这个世界，即没有永远的敌人，也不会有永远的朋友。当德意志人与马扎尔人之间隔着斯拉夫人时，彼此可以因为利益走到一起。而当马扎尔人已经控制了整个多瑙河中游地区，并且跃马摩拉维亚时，这些来去如风的游牧者，又有什么理由不溯多瑙河而上，去富庶的巴伐利亚高原劫掠一番呢？

遭遇马扎尔人威胁的，并不仅仅是巴伐利亚，如同当年阿提拉帝国的扩张一样，“多瑙河中游平原”再一次成为了游牧民族入侵欧洲腹地各板块的最佳跳板。意大利王国、拜占庭帝国，乃至法兰西东部的莱茵河地区，都曾经遭遇马扎尔人的侵扰。整个 10 世纪上半叶，西欧大陆都处在新的“黄色恐怖”中。当然，没有南俄草原为后援，马扎尔人所能集合的力量，并不足以让那些日耳曼天主教国家臣服（至多十万骑兵）。他们更多是以劫掠者的身份，出现在欧洲各国的土地上。

马扎尔人皈依天主教及建立匈牙利王国

如果是在查理曼时代，马扎尔人并不足以对欧洲各国造成威胁。问题是，查理曼帝国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现在的欧洲，正处在各自为战的封建割据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有新的帝国出现，才有可能集合起足够的力量来反制马扎尔人。那么，这个新帝国在哪呢？看看马扎尔人纵横欧洲的时间点，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它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事实上，奥托大帝一生中最重要的战役，就是集合德意志诸国的军队，一举击溃再次入侵巴伐利亚的马扎尔人（公元 955 年）。

一如当年查理曼凭借击败阿瓦尔人，而在天主教世界获得无上荣耀，并登顶帝位一样。击败马扎尔人的奥托大帝，也代表德意志人进军罗马，并成为了天主教世界新的守护者。不过客观来说，法兰克人要做的更漂亮，他们上次可是横扫潘诺尼亚（甚至攻陷了阿瓦尔人在匈牙利草原上的王庭），彻底击跨了阿瓦尔人；而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比之“查理曼帝国” 毕竟少了高卢，这次只是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御战，并没有实力在“匈牙利门”以东地区有所作为。

不过当初查理曼虽然在多瑙河中游取得大胜，但终究也没能占住潘诺尼亚（反而缓解了斯拉夫人的压力，让摩拉维亚做大）。虽然以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来说，西欧国家还是有机会夺取潘诺尼亚，并与匈牙利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划江而治（就像罗马帝国当年在这里做的那样），但要想入主匈牙利草原，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

么这是否意味着，多瑙河中游地区会一直会成为西欧身边的定时炸弹呢？当然也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于马扎人的态度了。

其实有一片草原在身边。西欧诸国的固然不得安宁，但这片草原的主人也同样有他们的无奈。要知道身处喀尔巴阡山脉之西的匈牙利草原，相当于欧亚大草原在欧洲腹地的一片飞地。一方面，自己必须独立面对整个西欧的压力。如果对手能够一定程度统一的话，自己能否坐稳潘诺尼亚都成问题，更别说继续向西扩张了；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内部的分裂性，比起基督教国家来说要厉害得多。南俄草原当下已经是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的天下了。今天马扎尔人可以取代阿瓦尔人，成为匈牙利草原的主人，他日突厥人一旦整合好了南俄草原，也一定会试图跨越喀尔巴阡山脉。

为了不步匈人、阿瓦尔人的后尘，在历史跨入新千年的时刻（公元 1001 年），马扎尔人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接受罗马天主教为国教，并从罗马教皇手上，接过匈牙利王国的王冠。也就是说，游牧的马扎尔人，从这一刻起变身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匈牙利王国”。 “匈牙利”这个标签，并非得自于乌拉尔语，而是很有可能是源自于“匈人”，毕竟阿提拉就是从这里，对欧洲发动强大攻势的。

在马扎尔人到来之前，欧洲人就已经将这片土地称之为“匈牙利”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拉大旗作虎皮，对马扎尔人都没有坏处。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了，最终成为这片土地常住民的，却是草原上的异类，说着乌拉尔语的“马扎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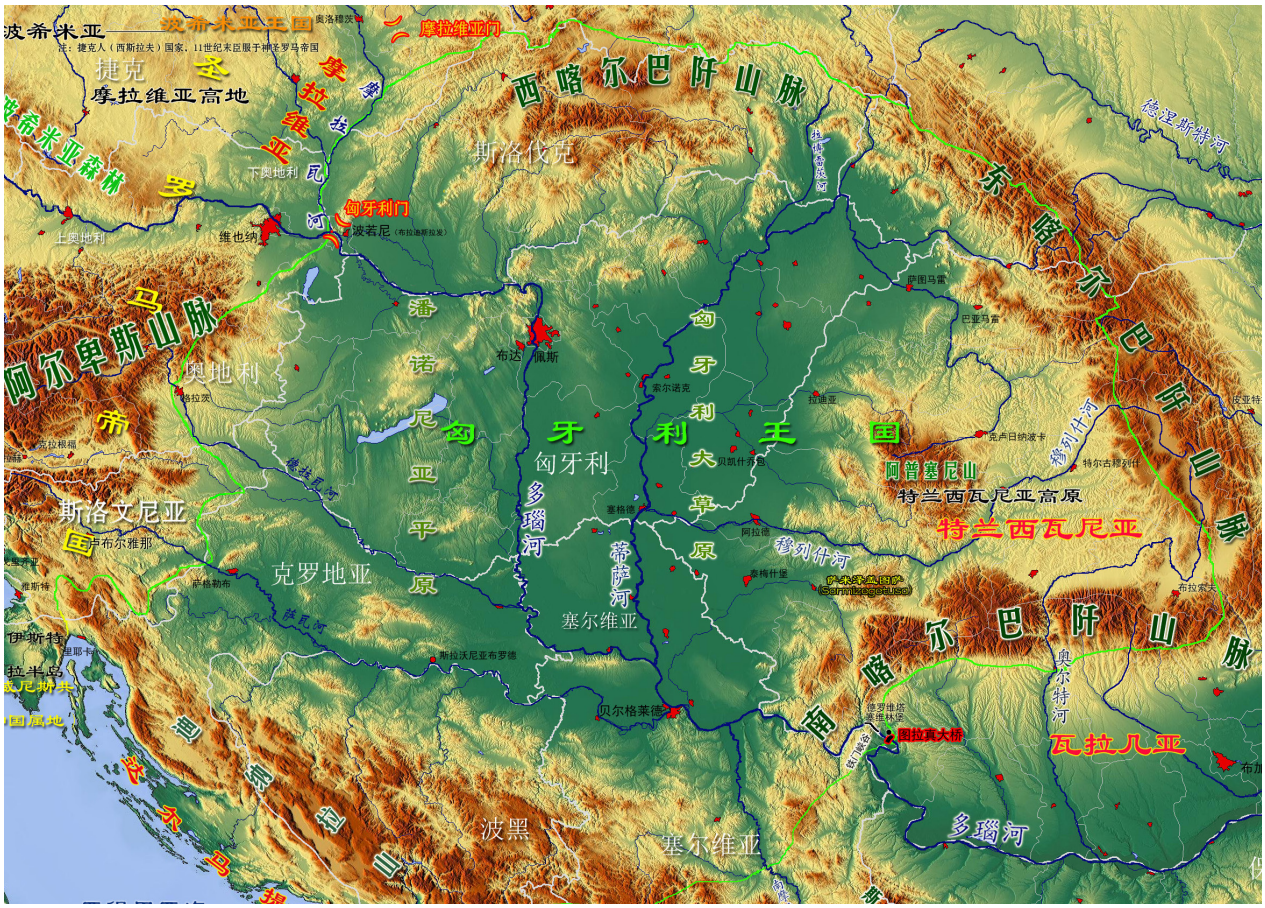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匈牙利王国建立对欧洲的影响

匈牙利王国的建立，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地缘大事件。匈牙利草原乃至整个多瑙河中游平原，从游牧民族入侵西欧的跳板，华丽转身为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为此，匈牙利也在基督教世界享有了“基督教之盾”的美誉。同时，马扎尔人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地缘利益。由于马扎尔人的归附，西欧诸国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将潘诺尼亚作为抵御游牧入侵的前线了。换句话说，匈牙利王国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潘诺尼亚地区的所有者。

从地缘结构上看，把潘诺尼亚的利益让给马扎尔人也是十分有必要的。毕竟你要是仍然把他们限制在草原之上，那么这个民族终究也还是不可能融于基督教世界的。在教廷明确把潘诺尼亚交给匈牙利王国后，马扎尔人势必会将自己的重心向西偏移，大部分马扎尔人，也将完成定居化、农业化进程。不过这一进程，对于马扎尔人来说却未必是坏事。要知道，被罗马开发了数百年的潘诺尼亚，人口潜力相比匈牙利草原，是有很大优势的。在日耳曼大迁徙之后，填补空间的是来自北方的斯拉夫人。

马扎尔人所面临的风险是，人数较少，属于文明程度更低的游牧、渔猎民族，虽然有能力完成征服工作，但却总是更容易被人数较多、文明程度更高的被征服民族所融合。然而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出现在马扎尔人身上。这首先是由于马扎尔人通过成

为“基督教之盾”，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获得了特殊的地缘地位。简单点说，马扎尔人血液中的游牧文化，现在非但不再被贴上“野蛮”的标签，反而成为了各方认可的、必须保留的基因。在这种情况下，马扎尔人也没有必要，为他们独特的语言、文化感到自卑了。



匈牙利王国示意图（绿线范围内）

其次，马扎尔人在潘诺尼亚所面对的优势民族（人数上），是长期被日耳曼人视为蛮族的斯拉夫人。这些斯拉夫人成为天主教徒的时间，并不比马扎尔人早多少，因此在马扎尔人面前也没有文明优势。第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系出日耳曼民族的西欧诸国，也绝不愿意看到一个斯拉夫化的匈牙利王国，出现在多瑙河中游。一个明显不属于斯拉夫文化的匈牙利王国，横亘在西斯拉夫与南斯拉夫之间，才最符合西欧诸国的利益。

正是由于匈牙利王国的特殊地缘地位，今天我们才能够在喀尔巴阡盆地中，看到一块乌拉尔人飞地。当然，在长达千年的融合过程中，马扎尔人也改变了很多。这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通过与原住民族，尤其是斯拉夫人的融合，马扎尔人的种族特征已经明显高加索化，以至于我们甚至不得不将之定义为混合民族了。不过对于身处欧洲腹地的马扎尔人来说，这种改变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他们的存在，不会显得那么突兀了。

其实匈牙利王国的成立，为马扎尔人带来的地缘利益，并不止于坐实了潘诺尼亚。

最起码马扎尔人，还可以染指同在喀尔巴阡山脉之西的特兰西瓦尼亚高原。而如果控制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也就对与之同属“达契亚”板块的摩尔多瓦丘陵、瓦拉几亚平原（多瑙河下游平原）拥有了地缘优势。对于罗马教廷来说，他们倒是很乐见这种情况出现的。基于地缘位置的原因，东正教世界会对达契亚更有优势。尤其在匈牙利成为天主教国家前十几年，东欧草原上的“东斯拉夫人”（基辅罗斯），刚刚宣布接受东正教成为国教。



匈牙利人

在上述背景下，匈牙利王国不仅是“基督教之盾”，也是罗马天主教对抗东正教的前线。匈牙利王国能否控制达契亚的地缘意义，由此也上升了一个层级。至于匈牙利人究竟有没有做到，他们所面临的主要对手又是谁，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四节 保加尔人入主多瑙河下游平原

拜占庭利用斯拉夫人固守边境

从地缘关系上看，匈牙利这面立足多瑙河中游的“基督教之盾”，所庇护的主要是建立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的，日耳曼——天主教世界。至于身处东地中海的拜占庭帝国，要是也想有面“盾牌”，帮助抵御来自南俄草原的压力，也可在多瑙河下游，建立一个信仰东正教的缓冲国。当然，以拜占庭帝国所奉行的东方集权体制来看，初衷肯定是希望有一支政治、宗教上都服从自己的边缘民族，帮助自己固守北方边境了（而不是让其单独建国）。

在拜占庭所面对的诸多边缘民族中，从中欧森林中走出来的斯拉夫人应该是最适

合承担上述任务的民族。公元 6 世纪，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后，斯拉夫人开始在欧洲地缘政治舞台上，承担新的“蛮族”角色。大量斯拉夫部落，从中欧平原向多瑙河中游地区迁徙。公元 7 世纪，斯拉夫人开始向巴尔干半岛北部山地，及多瑙河下游扩散。对于以罗马继承人自居的拜占庭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只不过之前罗马所面对的，是日耳曼人罢了。

将愿意服从自己管理的边缘民族放入边境地区，以抵御更加“野蛮”的边缘民族入侵，在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是通行的做法了。日耳曼人就曾经长期承担这样的角色。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果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容易在边境地区形成半独立的、有别于主体民族的“自治区”。在帝国控制力下降时脱离中央政府的管控，甚至反客为主、觊觎中央政权。然而问题在于，决策者并非看不到这点，而是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毕竟资源是有限的，将一部分入侵者变成帝国边境的守卫者，技术上可以起到“以夷制夷”的效果，减少中央政府的资源投入。

从战略层面来看，北线并不是帝国经营的重心所在。拜占庭所面临的主要压力，始终还是来自东方（萨珊波斯、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因此帝国会更倾向于吸收部分斯拉夫人，乃至游牧民族加入军队，并让他们出现在东方战场上（而不是与他们的同族对抗）。这样做的话，地缘政治风险要更小一些。不过对于拜占庭来说，这样的做法，本身并无助于缓解北方压力。换句话说，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渗透，终究还是会影响到帝国安全的。

保加尔人和多瑙河下游的斯拉夫人结成共同体

从地缘关系上来看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西北山地，乃至潘诺尼亚的渗透，并不会对自己造成太大威胁，他们在这一地区所威胁到的，主要是意大利半岛的安全。不过迁徙到多瑙河下游的斯拉夫人，就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因为多瑙河下游，到君士坦丁堡之间，并没有足够的障碍。不管是斯拉夫人还是游牧民族，都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帝国中心的安全。当然，拜占庭帝国还是可以用“以夷制夷”的手段，让斯拉夫人和游牧民族互相牵制，以缓解自己的北方压力。问题是，在“三国杀”局面里，组合永远不会只有一种。从平衡角度看，两股相对弱势的力量，反而会更容易结盟。

让拜占庭人最担心的局面，出现在公元 7 世纪末。多瑙河下游的斯拉夫人和一支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保加尔人，结合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保加利亚”。当然，这个所谓的“结合”，最初肯定是经历了一番博弈的，只不过双方很快就发现，基于所处的地缘位置，只有联合起来、取长补短，才有机会在这块“四战之地”生存下来。

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结合的案例，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日耳曼入侵西罗马时期，日耳曼系的“汪达尔人”，以及被匈人挤压出草原的部分“阿兰人”，就曾经结盟西迁，并最终在北非建立“汪达尔－阿兰王国”。不过两支属性完全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并不多见。除非他们各自需要对方的长处，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就这一点来说，斯拉夫人的选择很好理解。因为从技术上看，一马平川的多瑙河下游平原并

不能给斯拉夫人提供保护，不被拜占庭帝国所整合，也会被游牧民族所侵扰。比较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游牧的保加尔人，会选择在多瑙河下游定居下来，并且与斯拉夫人达成和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压力，让他们做出了这不同寻常的选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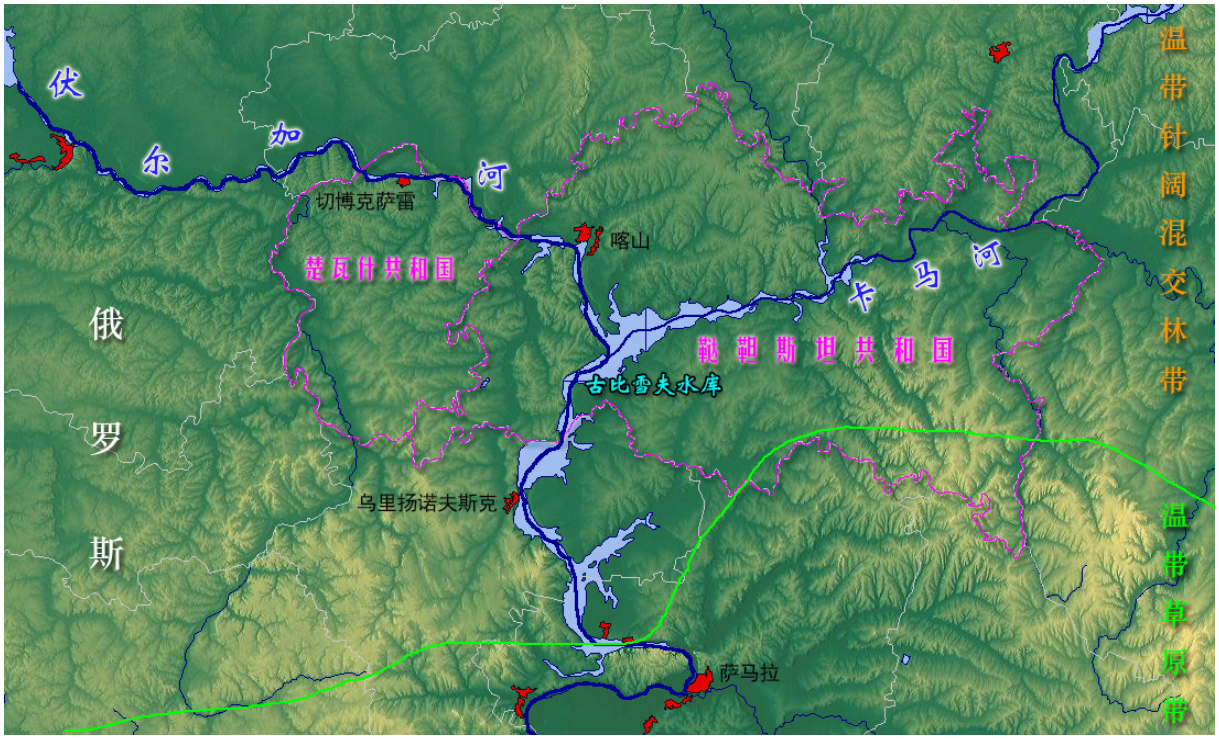
突厥人的压力迫使保加尔人向外迁徙

保加尔人的压力，来自于在中世纪初期，横扫亚洲草原的“突厥”。公元 6 世纪末，突厥人统一亚洲草原，并随后以蒙古高原、中亚草原为基础，分裂为东、西突厥。与此同时，南俄草原也未能躲过这股突厥化浪潮。在那些突厥化的民族中，保加尔人要显得特别一些。因为他们并不是在突厥崛起之后，再借势进入南俄草原的，而是在匈人西征时来到欧洲的“老移民”了。也就是说，最起码从政治角度看，保加尔人可以算是匈人后裔。



保加尔人的迁徙

现在的“保加尔人”，已经算



楚瓦什共和国位置图

是斯拉夫人 + 保加尔人的混和体了，所以游牧阶段的保加尔人可以区别称之为“古保加尔人”。在阿提拉帝国崩溃后的南俄草原，古保加尔人最初是游牧于顿河一带。不过在新的突厥系游牧民族进入南俄草原，并且坐大后，古保加尔人的生存空间，就被

迫向草原边缘的温带森林地带转移了。多瑙河下游并不是保加尔人迁徙的唯一方向。处在森林边缘的伏尔加河、卡马河河口一带，也是保加尔人的迁徙方向，在这里他们融合了部分乌拉尔人，并为这个地缘枢纽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伏尔加保加利亚”。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当下以喀山为中心的伏尔加／卡马河口地区，俄国人建制有“鞑靼斯坦共和国”，地缘标签也转变为“伏尔加鞑靼”了。尽管有时伏尔加鞑靼人也会被称之为“新保加尔人”，但他们其实更多是蒙古西征的产物（当然肯定融合了部分保加尔人，就像保加尔人也融合了部分乌拉尔人一样）。真正还能算是古保加尔人后裔的是一支被称之为“楚瓦什”的民族。今天在鞑靼斯坦共和国西北部，与之接壤的“楚瓦什共和国”，就是“伏尔加保加尔人”在地缘政治版图上的遗存。




楚瓦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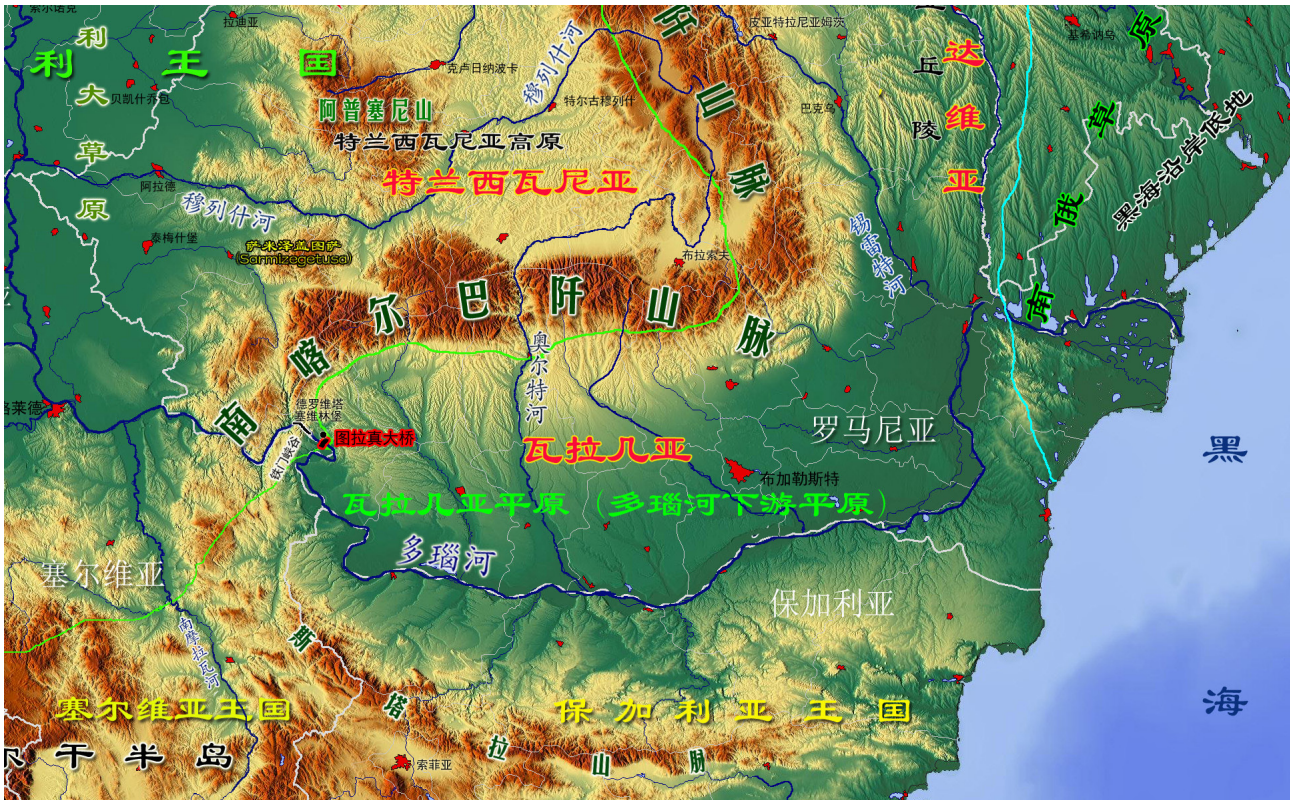
楚瓦什人，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现存的，最有可能的匈人后裔了。这支把族源上溯到“伏尔加保加利亚”的民族，也是唯一仍在使用古保加尔语的民族。尽管楚瓦什语被归入了突厥语族（保加尔语支），但它与那些真正的“突厥语”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简单点说，从塔里木盆地到黑海之滨的土地上，分布的各个突厥系民族，在语言大体上都能互通（相当于方言的区别），只有楚瓦什人说的所谓“突厥语”是个例外。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楚瓦什人和古保加尔人，是匈人西征而不是突厥西扩的产物。

相比“伏尔加保加利亚”以及楚瓦什人，大家更为熟悉的应该是成功把民族标签，保留进当代地缘政治体系的“保加利亚共和国”了。然而今天的保加利亚人，虽然还挂着这个标签，却早已失去了继承匈人地缘遗产的资格了。原因很简单，入主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尔人，并没有像马扎尔人那样同化掉领地范围内的斯拉夫人，而是反过来被斯拉夫人所同化，变成了“南斯拉夫”民族的一支。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第五节 保加尔人建立保加利亚王国

就地理结构而言，多瑙河下游处在喀尔巴阡山与巴尔干山脉所围就而成的一个，面朝黑海的开放式盆地。其中巴尔干山脉也是多瑙河下游平原，与“巴尔干半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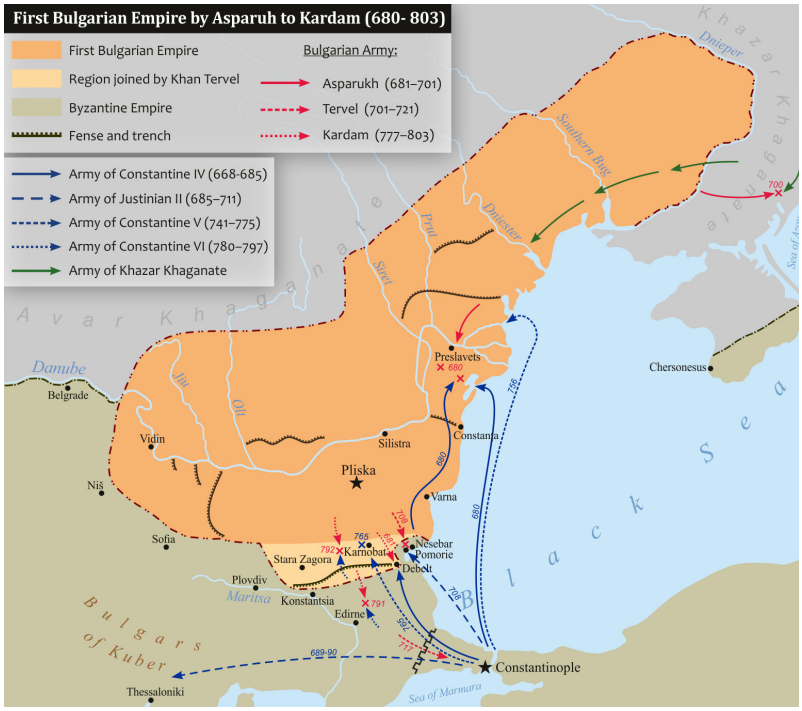
地理分割线。从内部结构上看，多瑙河下游可以分为三部分。除了东北部的多瑙河三角洲以外，多瑙河将整个下游地区一切为二，分为了南北两部分。北部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地势平、纵深宽。狭义的多瑙河下游平原，即意单指这部分平原（今罗马尼亚境内）。14 世纪，这里曾经建立有“瓦拉几亚公国”，因此亦可称之为“瓦拉几亚平原”；南部则与巴尔干山脉距离较近，地势较高、纵深较窄，整体呈现平原、台地相间的地貌（今保加利亚境内）。



多瑙河下游平原示意图

对于拥有机动优势的游牧民族来说，从多瑙河三角洲，进入地势平坦的瓦拉几亚地区要相对容易。这也使得当年图拉真为帝国吞并的达契亚行省，只能控制瓦拉几亚平原的西部。不过大部分时候，罗马包括后来的拜占庭会更倾向于依靠多瑙河下游这道天然防线，划定自己的北方边境（代价就是而放弃瓦拉几亚平原）。从多瑙河中游迁徙而来，为拜占庭帝国固守北方边境的斯拉夫人也分布于多瑙河南岸。

不过罗马对达契亚地区一个半世纪的经营，也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包括瓦拉几亚平原、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以及摩尔多瓦丘陵在内的达契亚地区，完成了拉丁化进程。那些由罗马－色雷斯人融合而成的“拉丁化达契亚人”，之所以在罗马放弃多瑙河北岸之后，仍然愿意以拉丁人自居，根本原因在于罗马文明的优越感。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则成为了这些罗马尼亚人祖先的庇护地。即使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地区，受到外族强力冲击，造成拉丁人口大量减少，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也能很快在对手势弱时，为这两个关联区域补充人口。这也使得不管是匈人、阿瓦尔人，还是准备接受定居生活的保加尔人、马扎尔人，都没有办法真正合并达契亚地区。



保加利亚第一王国示意图

古保加尔人在多瑙河下游建立国家的时间，是在公元 7 世纪末。按照这些游牧者的最初想法，他们应当是希望建立一个游牧——农耕混合体国家。多瑙河下游的气候环境，看起来也可以满足这一需要。其中多瑙河三角洲为核心的区域，属于降水较少的温带草原性气候，过渡性的森林草原地带，一直向西延伸到喀尔巴阡山麓。长久以来，这一区域也是游牧民族南下巴尔干半岛的跳板（也是欧亚草原的西部起点）。理论上，古保加尔人占住这个风水宝地，然后再控制巴尔干半岛的农耕民族，应该有机会建立一个兼具农牧优势的王国了。

维持一个游牧、农耕二元结构的王国，并非没有可能。不过如果游牧者希望在保留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成为主导者，领土内就需要有远大于农业地区面积的草原。就这一点来说，公元 10——12 世纪与宋共存的“辽”，算是做的比较成功的。为了协调游牧、农耕两股力量，契丹人开创了一国两制模式——“两院制”。以两套体制分别管理华北地区北部的汉地和蒙古草原。反之，如果境内没有足够的草原，势必将无法维持游牧人口、文化存在感。其结果就是导致被农耕民族所同化。就这一技术要求来看，多瑙河三角洲一带的那点草原，显然是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有鉴于此，保加尔人索性彻底摆脱了对草原的眷恋，选择了与多瑙河南岸的斯拉夫人融合，变身成为一个定居民族。这样的话，多瑙河这道曾经庇护罗马数百年的天然防线，也就成了新生的“保加利亚王国”的守护者。

第六节 保加利亚王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博弈

保加利亚的出现对拜占庭的影响

对“保加利亚”的出现，最感不安的当属拜占庭帝国了。失去了多瑙河这条天然防线，巴尔干山脉以南，直至马其顿的“色雷斯”地区，就完全暴露在了保加利亚人的面前，位于东色雷斯（今属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自然也是压力倍增。不过在公元 7 世纪末，还带有强烈游牧基因的“保加利亚人”并非是唯一出现在帝国边境的新生力量。在亚洲方向，借力伊斯兰教实现统一的阿拉伯人，已经在半个世纪前攻灭了

萨珊波斯，建立了面积更广、更为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在古保加尔人跃马多瑙河岸时，阿拉伯人也从拜占庭人手中，夺取了包括埃及、利比亚东部在内的北非地区。这些原本更熟悉在沙漠中穿行的游牧者，甚至开始打造属于自己的海军，从海路直接对君士坦丁堡发动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庭并没有精力阻止“保加利亚”出现，只能暂时承认它的存在。

虽然保加利亚的出现，让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多瑙河防线，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保加利亚也可以成为拜占庭与南俄草原之间的缓冲国，让帝国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当然，每个国家都会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站在保加利亚的角度来看，肯定不想让自己只是去充当别人的屏障。这些游牧者之所以选择渡过多瑙河，更多是垂涎于拜占庭帝国的富庶。往小了说，他们希望不时的前往拜占庭打打草谷（或者逼迫拜占庭以金钱换和平）；往大了说，既然日耳曼人有机会继承西罗马的衣钵，为什么保加尔人就不能在东罗马有同样的想法呢？

不过，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在阿拉伯帝国的挤压下，拜占庭已经失去了亚洲和非洲的领土（如果将小亚细亚视为欧洲的话），但仍然还保有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权。当然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在地缘结构上已经不能算是横跨东地中海的“东罗马帝国”，而是一个希腊化的“爱琴海帝国”了。拜占庭人应该对这种变化，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他们甚至在公元 7 世纪初，就让希腊语取代拉丁语，升级为帝国唯一的官方语言。

保加尔人在文化上的斯拉夫化

与拜占庭的希腊化一样，游牧的保加尔人在进入多瑙河南岸后，也必须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学习适应定居生活。基于斯拉夫人在这方面更有优势，保加尔人的斯拉夫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不过从伏尔加保加尔人，以及后来马扎尔人的案例来看，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尔人，应该还是有机会保留更多自己的文化基因，而不是到后来，仅仅留下一个阿尔泰游牧民族的标签（保加利亚）。问题在于，哪样做对保加尔人更有利？

语言是最显性，辨识民族身份的标签。比如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看起来有 56 个民族的国度，但“多数民族”与那些在语言上没有差异的所谓“少数民族”，彼此之间基本不会有心理距离感。古保加尔人斯拉夫化的一大标志，就是在语言上斯拉夫化了。至于保加尔人为什么要主动这么做，看看他们所处的地缘位置就会明白了。

作为匈人的继承者，保加尔人是因为受到新移民欧洲的突厥民族的挤压，才被迫南下的。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有机会，从草原上吸收新鲜血液补充自己。拜占庭化或者说希腊化，也是一种选择。不过以拜占庭所奉行的集权体制来看，这意味着保加利亚将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在这种南有狼、北有虎的境遇下，已经渗透到巴尔干半岛北部，“帮助”拜占庭人防御匈牙利草原压力的“南斯拉夫人”，成为了保加利亚人壮大自己的目标。

实际上，纯粹在多瑙河下游比较古保加尔人与斯拉夫人的人口，后者并没有太大优势（共有 7 个部落）。也就是说，如果保加尔人不作出妥协的话，他们其实还是有机会让这些斯拉夫人变成真正的保加尔人的。不过，当你把整个南斯拉夫地区都作为扩张方向时，就会发现在语言、文化上斯拉夫人化（同时在政治上保持统治地位），会更具可操作性。也许满洲人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进程。假如当初满洲人没有入关，而是只立足在在关外建立一个类似高句丽的王国，那么明帝国留在辽西、辽东的遗民，最终势必会满洲化（或者说八旗化）。然而当整个中央之国展现在满洲人面前时，面对被征服民族绝对优势的人口，再坚守自己原本并无优势的语言、文化，就会人为设置政治扩张的障碍了。

从拜占庭手中夺取巴尔干北部控制权的进程，前后延绵了将近 100 多年。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进行了无数残酷的战争。拜占庭的军队曾经多次横扫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也几度兵临君士坦丁堡。总的来说，保加利亚人还是成功的扩张了自己的空间。及至公元 9 世纪上半叶，塞尔维亚（多瑙河以南部分）、马其顿北部高地（也就是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部分）、巴尔干山脉之南的北色雷斯地区（今保加利亚南部），成为了保加利亚王国的新领地。至于拜占庭帝国则力保包括东、南色雷斯、南马其顿等板块在内的，爱琴海沿岸地区不失，以避免帝国崩溃。在这个过程中，拜占庭的优势海军起到了关系作用。

在与拜占庭博弈的这 100 多年时间里，保加利亚也全面完成了它的斯拉夫进程。唯一还能体现出游牧基因的，就只有保加利亚之名，以及最高统治者所保留的“可汗”称号了。然而纵观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俨然成为“南斯拉夫”代言人的保加利亚，处境却并不乐观。在斯拉夫化之后，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民族命运再作出一项新的选择。至于为什么要做，又究竟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第七节 保加利亚皈依东正教

保加利亚的所面临的抉择，就是应该信什么教。中世纪的西方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在西方古典时期相争的几大板块，都已经先后抛弃了多神信仰。其中欧洲成为基督教的天下，亚洲则青出于蓝的创立了“一神教 3.0 版”的伊斯兰教，并从欧洲人手中夺取了北非的控制权（甚至渗透至伊比利亚半岛）。

在公元 9 世纪以前，基督教世界暂时并没有以宗教为武器，向外扩张的想法。君士坦丁堡方面在这方面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对罗马教廷的控制上（以力保在日耳曼世界的影响力）；内斗不休的日耳曼世界，也有先知先觉者意识到了，可以通过与罗马教廷的结盟，合法继承“西罗马帝国”的衣钵，进而统一日耳曼世界。这个先知先觉者相信大家都知道是法兰克人了。

公元 800 年，查理曼被罗马教廷加冕为罗马皇帝。并与拜占庭帝国达成和解，把

统治范围限定在了西罗马的土地上。罗马教廷也因为有了法兰克人作为新保护者，进而脱离了君士坦丁堡的控制。尽管双方在公元 12 世纪中叶才算正式分裂，但事实上，从查理曼帝国建立那天起，拜占庭帝国就已经清楚，再无可能恢复在西罗马故土上的影响力了。因此我们也可以在现在，就使用天主教、东正教的标签，来区分彼此。

从本质上说，教派的分裂是缘于地缘上的割裂。反过来，分裂的格局也会让双方刻意强化彼此的不同。至于东正教和天主教发展到后来，到底有多少细节差异，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对于被洗脑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能够意识到的，估计只有一点，那就是东正教是用希腊语在传播教义，而天主教的传教士，用的则是古拉丁语。

当整个欧洲被分裂为泾渭分明的两大世界：法兰克——天主教；拜占庭——东正教世界时，位于欧洲中东部的斯拉夫世界，就成为了双方都力图开拓的“蓝海”了。在这个问题上，拜占庭帝国稍稍占了点先机。基于远交近攻的原则，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强大国家——大摩拉维亚国，主动选择了东正教。问题是，东线“压力山大”的拜占庭帝国，甚至在控制巴尔干半岛北部都力不从心，更别说为远在中欧的西斯拉夫人提供支撑了。很快，包括摩拉维亚、波希米亚、波兰等在内的西斯拉夫板块，还是成为了天主教世界的一员。而东正教传教士所做的最大贡献，应该就是为斯拉夫人创造了一套源于希腊字母的“斯拉夫语字母”（西里尔字母）了。

当摩拉维亚人试图统一“西斯拉夫”世界时，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站稳脚跟的保加尔人，也在对“南斯拉夫人”做着整合工作。同样的，需要摆脱“蛮族”身份的，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亚也需要在宗教问题上做出选择。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参考摩拉维亚人的逻辑，一直与拜占庭相争的保加利亚人似乎应该选择天主教。然而最终，保加利亚的统治者还是力排众议选择了东正教。

在大摩拉维亚国，代表西斯拉夫人引入东正教的第二年（公元 864 年），保加利亚的大汗也宣布皈依东正教，并且去除掉最后的游牧印记——“大汗”的尊号，改称为“大公”。对于保加利亚人的这种转变，拜占庭当然是十分兴奋。基于帝国“政教合一”、君权高于神权的架构，这意味着这支斯拉夫化的游牧民族，正式承认了拜占庭的宗主权。帝国与南俄草原，乃至日耳曼人之间，从此拥有了一面坚实的“盾牌”。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高兴的有点早，因为保加利亚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

保加利亚人之所以没有选择罗马，是因为那样做的话，他们的空间至多和后来的马扎尔人一样，成为一面“基督教之盾”。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即使保加利亚统一了整个南斯拉夫地区，也无法取代日耳曼人在罗马教廷的地位。比如后来的波兰，至多也不过从罗马那里，谋得了一个王国的地位。反之，要是把视线投向南方，保加利亚人会发现，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机会将远大于进军“罗马”。既然日耳曼人能够“鸠占鹊巢”的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继承人，那么保加利亚为什么不能引领斯拉夫人，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呢？更何况希腊化的拜占庭，说自己是“罗马人”，看起来

也不那么理直气壮。

第八节 保加利亚攻打君士坦丁堡

希腊人能够坐上罗马皇帝的宝座，保加尔人的大汗也同样坐得。在这一心理预期下，向拜占庭示好、皈依东正教只是一个过渡罢了。三十年后，韬光养晦的保加利亚人终于在他们最伟大的君主——西蒙一世（也译“西美昂一世”）的率领下，发动了“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战争（公元 894 年）。不过，要想真正完成这一计划，与法兰克人达成默契是必须的。为此，保加利亚人虽然一直力图把塞尔维亚稳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却避免在克罗的亚、斯洛文尼亚问题上，引发法兰克人的不满（法兰克人需要这两地作为门户）。同样的，拜占庭在对这二地施加影响上，也没有意大利半岛位置有利。这直接导致了，今天的克罗的亚、斯洛文尼亚成为了天主教国家。

面对保加利亚人的强大攻势，拜占庭帝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毕竟君士坦丁堡离保加利亚太近了。为了达到目的，西蒙一世后来甚至还和远在亚洲的阿拉伯人结盟。基于同样的外交原则，拜占庭也在保加利亚后方积极寻找盟友。这个盟友大家并不陌生，他们就是和当年的保加尔人一样，受到突厥人压迫（虽然并且不是同一支突厥人），需要南下寻找空间的马扎尔人。然而马扎尔人并没有帮到拜占庭的忙，因为保加尔人很快也和马扎尔人背后的突厥人结成同盟，把马扎尔人逼入了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后面所发生的故事，大家也都清楚了。

当这场一环扣一环的合纵连横战尘埃落定后，保加尔人发现自己并没有成为赢家。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本来也算是保加尔人的势力范围。现在，突厥人的介入，使得保加利亚不得不暂时放弃多瑙河北岸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南线倾尽全力，以图在成为拜占庭之主后，再考虑北线的问题。然而不管是保加利亚人还是阿拉伯人，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无法攻陷君士坦丁堡。而做不到这点的原因，还是在于无法取得制海权。

类似的情况，在当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就曾经发生过。拥有强大陆战实力的斯巴达人，虽然连续发动针对雅典的战争，却始终无法攻破有海上支援的雅典城。虽然在拜占庭帝国疲于应对保加利亚人的时候，占据了北非的阿拉伯人，从拜占庭手中抢得了西西里岛，但在爱琴海，优势始终是在拜占庭一方。阿拉伯人甚至在爱琴海的海战中，损失了一整支舰队（公元 908 年）。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制海权的保加利亚，即使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他们所能建立的，至多也只能是一个“巴尔干帝国”。只是在战争延续了三十年后，君士坦丁堡仍然牢牢的掌握在拜占庭人的手中。这场战争对巴尔干半岛地缘结构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彻底将“北马其顿”彻底剥离出了希腊化的拜占庭。在保加利亚人的主导下，完成了斯拉夫进程。这也导致我们今天能够在巴尔干看到南、北两个马其顿。一个是主

体民族为“马其顿斯拉夫人”的马其顿共和国；一个是仍然归属希腊的，有资格继承亚历山大遗产的希腊马其顿地区。



沙皇西蒙一世

功败垂成并没有妨碍保加利亚人，在名义上完成自己的罗马帝国梦。公元 925 年，西蒙一世宣布自己为“罗马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皇帝”。从凯撒一名转译而来的“沙皇”，成为了保加利亚君主的称号。也正因为如此，从公元 7 世纪末至 11 世纪初，这一阶段的保加利亚，有时也会被称之为“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只是很显然，保加利亚人的这个所谓“帝国”，并不符合我们的认可的帝国标准（称之为“第一保加利亚王国”更准确）。它的存在意义，更多是为后来的俄罗斯人，开拓了思路。

与之前称帝的查理曼，和之后称帝的“奥托大帝”一样，保加利亚的第一代沙皇——西蒙大帝所建立的“帝国”，在他身后就由盛转衰，陷入了分裂状态。以至于在 11 世纪初，为拜占庭帝国所灭。尽管一甲子之后（公元 1185 年），保加利亚人又重新摆脱了拜占庭帝国的控制，建立了“第二保加利亚王国”，但身处四战之地的保加利亚，在势力范围上，始终没有突破。既无法取代拜占庭，又无法统一南斯拉夫。巴尔干山脉南北的这两条低地带，成为了保加利亚人最终的归宿地。至于“帮助”斯拉夫人坐上罗马皇帝宝座的宏伟愿望，就只能看看在欧洲拥有边缘优势的东斯拉夫人，将来有没有机会了。

第五章 基辅罗斯的建立

第一节 瑞典人登陆东欧大陆

东欧板块的崛起及瑞典人浓厚的商人气息

就“大历史”这个维度来说，并不可能去细致的解读每一个民族的兴衰史，必须有所取舍。存在既是合理的，除了几个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外，那些经受过时间考验，能够成功留存在人类记忆中，甚至能够以一定形式影响当代地缘政治格局的地缘标签，也有研究的价值。匈牙利、保加利亚，包括被这两国夹在中间的罗马尼亚都是如此。

在欧洲人的视角里，世界大略等同于“欧洲”，所有欧洲以外的区域，无非是这个世界的外延。很多时候这个视角中的“世界”范围还会再收窄一些，会把东斯拉夫人和他们所占据东欧平原排除在外。这其中的潜台词就是，希腊——罗马——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直至今天以“欧洲新大陆”（或者说“新欧洲”）定位的美利坚才是一脉相承的世界文明主线。至于其它文明的存在，只是为西方文明提供一些技术上的补充，而绝无可能影响到它的核心价值观。

任何文明、民族、板块都有权利以自己为中心审视这个世界。凭借大航海时代所打下的基础，西方文明当下也有资本这样认为。只不过，现在离欧洲人开启大航海时代，已经过去了 500 年。当时间长河逐渐抹平了诸文明之间的技术代差后，再过 50 年（也许不用这么长），西方人也许会去反思一下，自己所崇尚的那些价值观，难道真的可以普世吗？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解读的东欧板块。对于进入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除了一直为希腊、罗马文明困扰的，透过小亚细亚半岛、马格里布地区（西北非）所传递过来的东方压力以外，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都也需要更多关注来自东欧平原的压力了。匈人的入侵，让整个欧洲感受到了欧亚草原的力量。而东斯拉夫人在东欧的崛起，则更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换句话说，纯粹就欧洲内部的地缘政治格局来说，除了东、西罗马的双中心模式以外，东欧平原这个体量庞大、并且有亚洲游牧势力强势介入的板块，很有可能会为分裂的欧洲，再诞生一个地缘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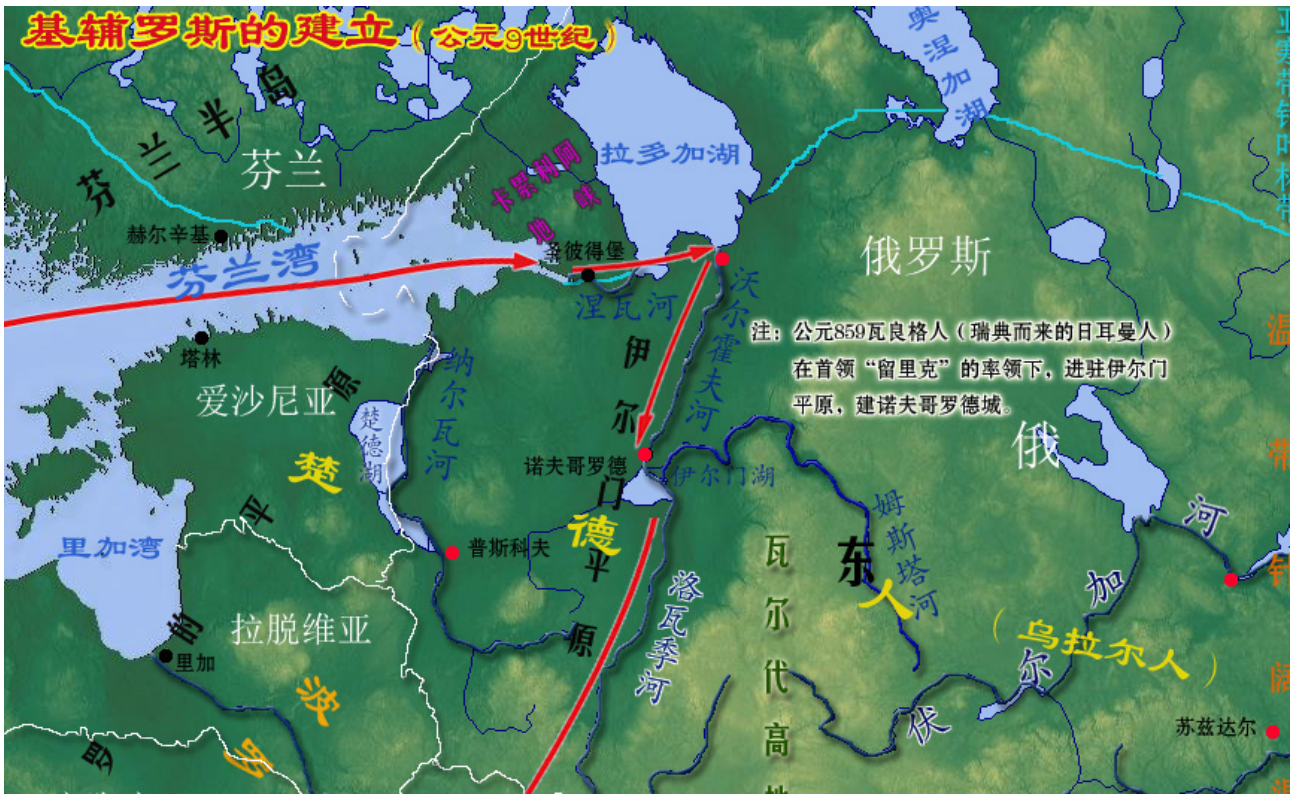
前面已经说过了，最早“帮助”斯拉夫人在东欧平原崛起的，其实是来自瑞典的“维京人”。之所以说“帮助”，是因为在这些瑞典人所留下的历史记录中，他们是被内乱不止的斯拉夫人“请”来的。至于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就只有天知道了。反正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从地缘角度分析瑞典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又是怎么做到的，会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尽管一提到维京，大家就会想到丹麦、挪威、瑞典三国，并且将之与海盗联系起

来，不过与前两者在大西洋留下的恶名不同，面向波罗的海及内陆的瑞典人，看起来更像是去做生意的。当然，很多时候海商与海盗只是一线之隔。瑞典人如果有机会不花本钱就得到货物的话，也肯定是不会浪费机会的。挪威人、丹麦人，也同样不排斥用贸易的手段获取利益。瑞典人之所以商人气息更浓厚一些，是因为他们所面对区域，开发水平较低，有机会通过建立政治体实现利益最大化；相比之下，面向西欧的丹麦、挪威人，所面临的抵抗就要强烈得多。巨大的财富积累，也让他们面临更多的诱惑。

瑞典人从芬兰湾的圣彼得堡一带登陆

瑞典人登陆东欧大陆的地点，是在芬兰湾东端的弯底。今天在这个湾底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圣彼得堡（苏联时期改名“列宁格勒”）。但凡对俄国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圣彼得堡对俄国有多么的重要。然而这座城市为什么重要，知道的人去未必很多了。“山形水势”是考察一座城市地缘价值的重要标志，放在这片低平之地，“水势”基本是唯一的考量标准。不过与其它“傍大河”的名城有所不同的是，造就圣彼得堡的那条河流，并不是一条体量巨大的大河。相反，这条叫做“涅瓦河”的河流，几乎算是我们解读过的重要河流中，最短的一条了（全长仅 74 公里）。



基辅罗斯的建立示意图

要是从年径流量来看，涅瓦河却是比全长 5000 多公里的“黄河”还要大。反差如此之大，是因为涅瓦河实际上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差点成为芬兰湾一部分的，欧洲第一大湖——“拉多加湖”的出海管道。然而成就圣彼得堡的，却并不是拉多加湖所收集的大量淡水。如此巨大的水量，只会让涅瓦河一带成为一片沼泽之地。不要说开发耕地，仅仅是修筑定居点，都要面临很高的技术难度。事实上，一直到 18 世纪初，

俄国人才在付出了数千人的生命代价后，真正在涅瓦河口建筑城堡成功（俄罗人修筑“圣彼得堡”的初衷，正是为了防御瑞典人）。

不管是瑞典人从芬兰湾底切入东欧大陆，还是俄国人在800多年后修筑圣彼得堡，所看中的都是涅瓦河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观察涅瓦河的位置，最吸引大家目光的，应该是涅瓦河以北这片，被拉多加湖——波罗的海之间包夹的这块，被称之为“卡累利阿地峡”的陆地。如果想从东欧平原北入芬兰半岛，地势平坦、纬度相对较低的“卡累利阿地峡”将是最好的战略通道。这一点，后来的芬兰人和俄国人也都十分清楚。在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前，为了防备俄国人的进攻，芬兰人花了十年时间，倾尽全力在此修筑了一条“曼纳海姆防线”（曼纳海姆为当时的芬军总司令）。俄国人则在惨胜之后，逼迫芬兰交出整个地峡的控制权。



圣彼得堡

然而俄国人之所以要拿下“卡累利阿地峡”，更多是从军事地理角度，为圣彼得堡在北方获得一片缓冲之地（尤其在芬兰明显倒向西方的情况下）。基本上我们可以将涅瓦河定为“亚寒带针叶林带”，与“温带针阔混交林带”的地理分割线。这也意味着，就土地本来的人口潜力来说，涅瓦河以北地区在古典时期的价值十分有限。对于乘船进入涅瓦河的瑞典人来说，透过地峡向北扩张并没有意义。要是想开发针叶林带的动植物资源，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可以做了。真正吸引瑞典人前来探险的，是涅瓦河的通道作用。

很显然，拉多加湖巨大的水量，并不是从天下直接落入湖盆中的，它势必在周边

拥有超过湖体面积的流域面积。除了涅瓦河这个出口以外，还应该有数量更多的，以拉多加湖为终点的河流散布周边。那么到底是哪条河流，帮助瑞典人深入东欧平原呢？

第二节 波罗的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贸易商路

维京人与地中海地区的毛皮贸易

与华夏文明扩张的“耕地”主线不同的是，在地缘结构复杂的欧洲，贸易一直是串连各板块的主线，也往往是地缘扩张的源动力来源。基于气候整体偏冷的关系，毛皮贸易一直在欧洲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况在东亚就没有了）。作为生活在欧洲北部的维京人，毛皮也是他们长期以来，与南方民族交易的重要商品。温度越低的地方，动物的毛皮质量也就越好。维京人用来交易的毛皮，很多其实也是从北方针叶林带的乌拉尔人那里收购过来的。这一进一出的转口生意，也为维京人注入了商业文明的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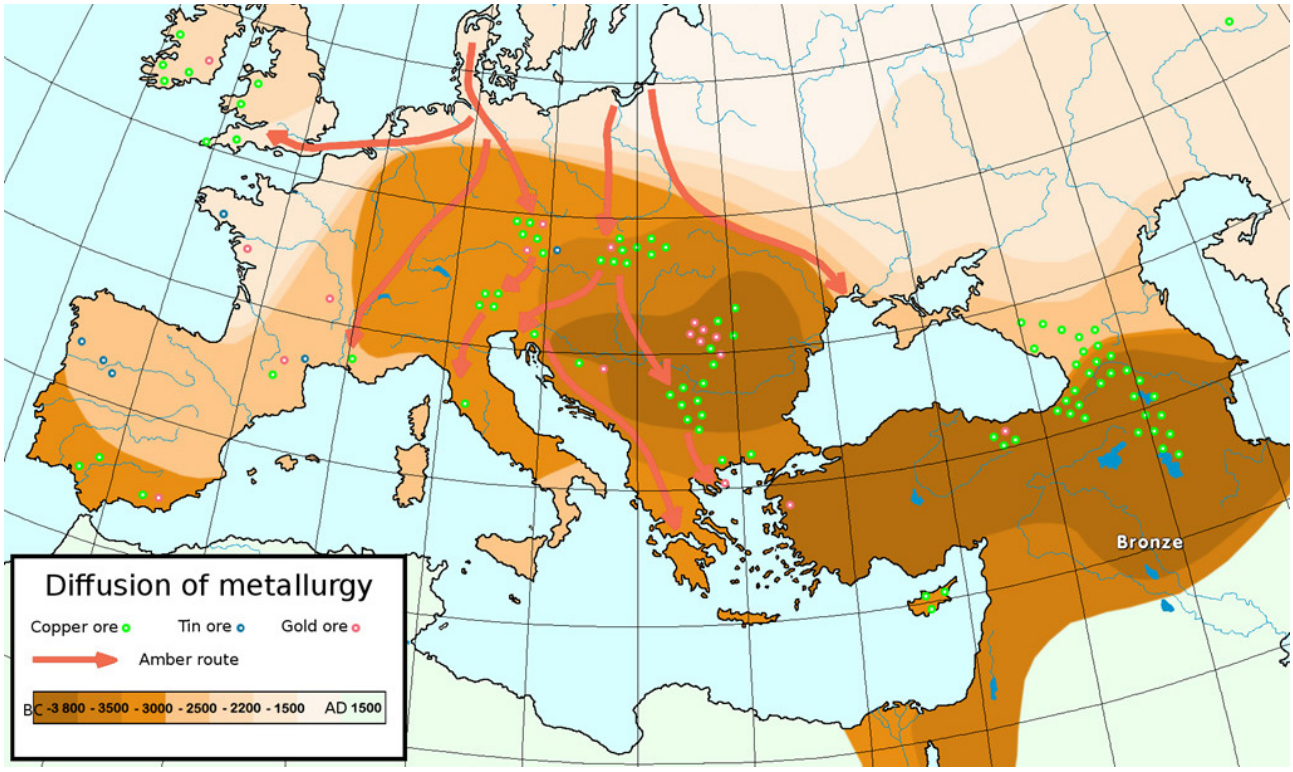
对于维京人来说，并不需要去征服乌拉尔人，才能利益最大化。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控制波罗的海的制海权。深入芬兰湾，并渗入拉多加湖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是其构筑海洋贸易网的一次探索。事实上，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包括北部的波的尼亚湾、波罗的地区，维京人（以瑞典人为主）都在尝试布设沿海贸易据点。为了打通贸易线，同一时期，丹麦人和挪威人也沿着大西洋岸线做着同样的工作，甚至最终绕过直布罗陀海峡，搅动了地中海的地缘政治格局。当然，一下子面对物资如此丰富的花花世界，这部分维京人难免更喜欢用零对价的方式贸易，以至于留下了海盗的恶名。

虽然维京人在波罗的海拥有主导地位，并且貌似能够通过中转乌拉尔人的渔猎收获，获得一定额外的利润（而不仅仅是商品提供者），但在整个欧洲的贸易线上，维京人还是处在食物链的底层。他们离最大的消费市场——地中海文明区，中间还隔着欧洲大陆。由于中西欧地区，已经被他们的日耳曼远亲们占据，并且经营的很成熟了（人口已经有了几何级数的增加），维京人再想像当年的辛布里人那样，横扫欧洲大陆，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孤立的波罗的人也许是个突破方向，不过赶走了这些土著，本身也无益于贸易线的扩张。

琥珀之路的开通

在大陆地区打通贸易线，最好的办法是在各条河流之间挖掘运河，编织一张触角遍及各个角落的水路运输网。在地势低平的东欧平原，这样做的技术难度看似并不大。然而欧洲人真正打通“任督二脉”，疏通大西洋、北冰洋，与黑海、地中海之间的水路通道，却要等到 20 世纪。比如俄国人用来沟通波罗的海、里海水系的“莫斯科运河”是在上世纪 30 年代修通的；德国的“莱茵河——多瑙河运河”是在 1985 年贯通的。相比之下，即使不论大禹治水真伪，中国人也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完成了鸿沟、灵渠等沟通各大水系的运河工程了。

当然，即使不能顺畅的从波罗的海，一路航行到黑海——地中海，河流本身也还是会为商贸提供极大便利的。事实上，最早尝试水、陆结合打通商路的，并不是公元9世纪的维京人。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波罗的海——中欧——南欧的商路，就已经被开拓出来了。莱茵河、易北河、奥得河、维斯瓦河等大西洋河流，都曾经为商路的北半段提供便利；摩拉瓦河、多瑙河、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等通向黑海的河流，则经常负责商路的南半段。日耳曼人的历次南迁，其实也正是在这些既有商路的指引下完成的。



琥珀之路示意图



琥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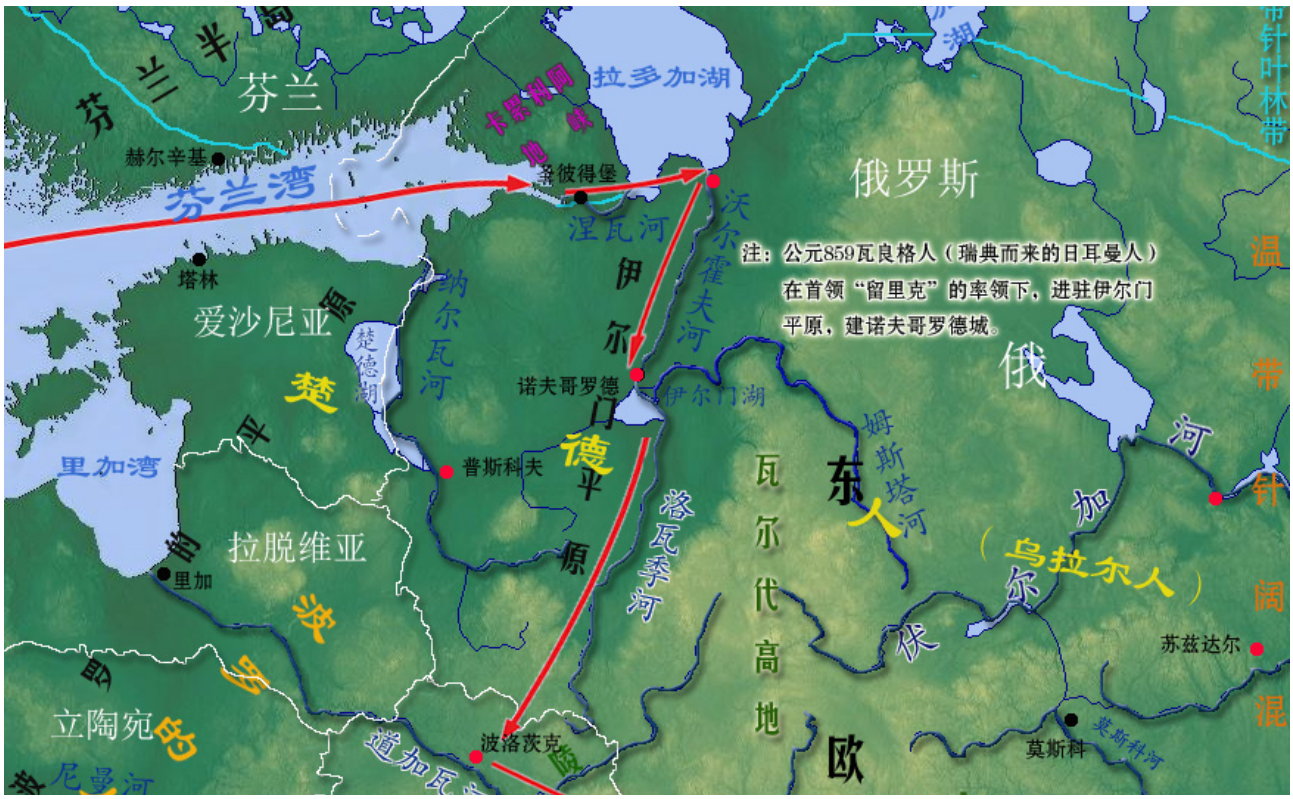
从波罗的海，通过中欧地区中转，接入地中海地区的商路，被历史学家称之为“琥珀之路”。贡献这个名称的是2000万年以前，生长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针叶林。这些树木所分泌的树脂，被埋藏于地下后，经过时间的磨砺，石化成为了透明、半透明状的“琥珀”。尽管琥珀这类商品，本身并不能满足人类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但在人类进入文明期

后，总是会有部分人可以不再为温饱担忧，而追求更高的心理满足感。由此，琥珀这类物以稀为贵的矿产，也就成为了高价值的贸易对象，甚至硬通货。从本质上说，也算是人类群体之间的一次财富再分配。只有当那些文明地区，通过技术进步积累出多余的物资后，才有余力从欠发达地区交换这些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波罗的海北半部，看似是针叶林的主产区，但由于冰川和海水的作用，波罗的地区反倒成为了琥珀矿的主产区。波罗的人能够在如此恶劣的地缘环境下求生，这些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说也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不过，琥珀和“琥珀之路”，看起来并不是瑞典人的目标所在，拉多加湖所给予他们的，是开拓一条新商路的希望。

第三节 瑞典人在伊尔门平原建立诺夫哥罗德城

虽然拉多加湖在每个方向上都有支流，但很显然只有从南端接入湖盆地的河流，才有机会让瑞典人接近地中海文明，气候上也更适合建立长期据点。在这个方向，瑞典人很快会发现一条河流——沃尔霍夫河。沃尔霍夫河所在的区域，是一片南北长约 500 公里，东西宽约 200 公里的低地。伊尔门湖是整片低地的地理中心。沃尔霍夫河正是从伊尔湖引水，向北注入拉多加湖的。而伊尔湖之南，与沃尔霍夫河流向一致的上游河流，叫作“诺瓦季河”。 “姆斯塔河——伊尔门湖——沃尔霍夫河”水系所覆盖的这片低地，我们可以称之为 “伊尔门平原”。



基辅罗斯的建立示意图

伊尔门平原虽然体量不算很大，但却横跨了北纬 60 度，到北纬 55 度线的区间，高纬度、大跨度的结构，使得平原的地表结构很不稳定。与我们在东亚中纬度地区常见的东、南流河流不同的是，高纬度地区的北流水系，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冰期长。以伊尔门湖为例，其每年的结冰期长达 5 个月之久（11 月至次年 4 月）；二是由于气温有差异，上游会比下游更先解冻。遇下游冰塞受阻的上游洪水，势必周期性向周边低地漫流。加上高纬度地区的蒸发量本来就小，导致伊尔门平原，常年处于湿地（沼泽）状态。从技术上看，如果没有人类的干预，这片低地和伊尔湖，就是一个调解水量的泄洪区。

类似的情况在西西伯利亚，体现的更为明显。80% 的西西伯利亚平原因此处于难以开发的湿地状态。另一个与我们关系更近的案例，则是黑龙江。单看中国地图，黑龙江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条东流河流。不过当我们把俄国人占据的外东北地区也纳入视线后，就会发现它在俄国境内的下游河道（俄称“阿穆尔河”），完全就是一条北流河流。每年 4 月，当充当中俄界河的这部分河道开始解冻，并很快迎来汛期时，下游的河面还处于冰封状态（5 月解冻）。很显然，黑龙河流域中应该也有一片，与伊尔门平原类似的低地，帮助整个水系调解水量。

这片位于黑龙江中、下游相接之地，被中俄所共有的低地，地理名称叫做“三江平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交汇之地）。它的中国部分有一个知名度更高的名称——北大荒。今天的“北大荒”已经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红色中国开始依靠机械力，大规模开发这片湿地之前，这一区域仍然都还是人类生存的禁区。东亚民族在三江流域所遇到的困境，瑞典人也同样会遇到。不过一方面瑞典人所生活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端，与伊尔门平原纬度相当，最起码在气候上不会有什么不适；另一方面，瑞典人至此并不是来寻找耕地的。如刚才所分析的那样，真正吸引他们前来的，是这片土地的贸易潜力。

公元 859 年，一支来自瑞典的武装商队，在他们的首领“留里克”的带领下，在伊尔门湖北岸、沃尔霍夫德河畔，建立了一座城市——诺夫哥罗德（意为新城市）。这也是俄罗斯境内最古老的城市，被视为东斯拉夫国家的发源地。然而这座城市的建立，其实与斯拉夫人并无关系。鉴于伊尔门平原并不适合农业生产，东迁的斯拉夫人更倾向于向东南方向扩张。在瑞典人到来之前，此地只有人数不多的，隶属乌拉尔语系的渔猎部落在活动。正是因为与这些乌拉尔人的贸易，瑞典人才渗透至此的。也可以说，诺夫哥罗德最初的定位，只是一个长期贸易据点。

在伊尔门地区进行贸易的瑞典人，很快便会发现，他们从乌拉尔人手中收购过来的商品，并不一定要再运回波罗的海，再通过中欧转手地中海地区。如果在尚未充分开发的东欧平原打通一条新“航线”，瑞典人就有机会直接和最富庶的拜占庭帝国直接交易了。不过，再想往南的话，瑞典人所面对的就不是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乌拉尔人，而是已经开始有国家意识的斯拉夫人了。那么接下来这些武装“商人”会怎么呢？

第四节 瑞典人南下第聂伯河流域建立基辅罗斯

北欧日耳曼人的不同称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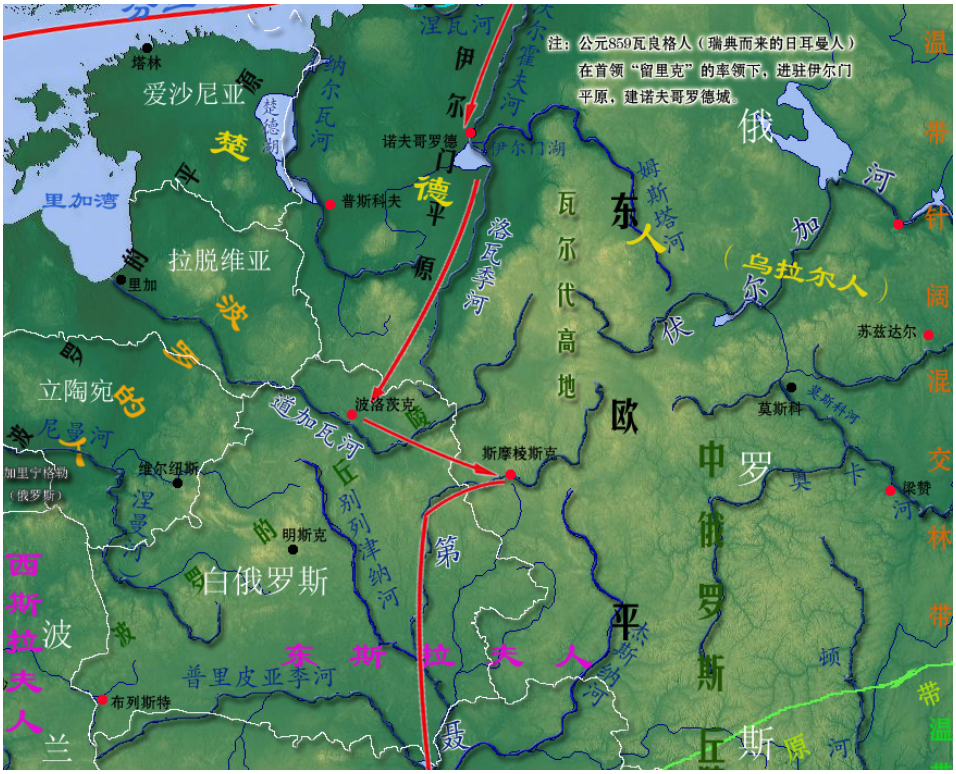
最近这几年，从乌克兰买进的半成品“瓦良格号航母”，完成了华丽转身，变身成为了中国海军的“辽宁号”。这使得“瓦良格”这个俄语标签，在中国颇具知名度。其实“瓦良格”在斯拉夫语的原意为“商人”，正是1000多年前，东斯拉夫人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称呼。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斯拉夫人对瑞典人的初始印象，要好于西欧国家眼中的“维京人”（丹麦人、挪威人）。

在乌拉尔人口中，这些西欧人眼中的“维京”人、斯拉夫人口中的“瓦良格人”，又变成了“罗斯”人，其原意为“北方人”。如果纯粹比较这些北欧日耳曼人，与芬兰乌拉尔人的位置关系，这一称呼看起来似乎很难理解（芬兰人的位置更是偏北）。不过，当我们知道伊尔门平原上的乌拉尔人，是最早接触到这批瑞典人的乌拉尔语系民族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殖民东欧的瑞典人，看起来更喜欢“罗斯”这个表明方位的标签，以至于他们后来将统一斯拉夫诸部后，所建立的国家称之为“罗斯”。今天中国人口中的“俄罗斯”（ 英文是Russia），是经过蒙古语转译而来的（蒙古语发音为OROS）。与之相比，倒是古人依原音所译之“罗刹”国，不仅更为音近，也颇合严复所提之“信、达、雅”之翻译标准。

说起来，后来那些定居于西欧的“维京人”，也一样被拉丁人称之为“北方人”。只不过他们的拉丁语发音，变成了“诺曼人”。现在我们知道了，所谓维京人、诺曼人、瓦良格人、罗斯人，原来所指向的都是“北欧日耳曼人”，这些标签使用当中的细微区别，相信通过之前的解读，大家也都能够了解了。比如提到维京人，那指向的就应该是，最初在大西洋海岸劫掠的丹麦、挪威人（而不是向东欧平原扩张的“瑞典人”）；等他们合法定居下来后，就应该转称为“诺曼人”了。如果参照“北方人”的方位命名原则，用丹麦、挪威、瑞典这些大家更熟悉的地缘政治标签代指，会更容易让大家在脑海中描绘出他们最初的地缘位置。

在伊尔门平原建立长期贸易据点的瑞典人，最初并不会有太宏大的目标。不过当这些武装商人熟悉了周边板块的地缘结构后，就会发现自己的利益空间，并不止于做点转口贸易。很显然你不可能沿着一条河流，一帆风顺的一路南下。当瑞典人顺着洛瓦季河一路南下时，终究必须在河流的源头弃舟登岸，寻找下一条可供他们发挥航海特长的河流。

绝大多数情况下，水系的最上游部分都会是一片高地。尽管东欧平原上的“高地”，只能算是一片无法显示脉象的丘陵地带，但结合河流的走向，我们还是可以为之划分区块的。为洛瓦季河提供水源的这片丘陵，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部分。河流西南方向对接的，正是孕育了“波罗的人”的“波罗的丘陵”。今天这片丘陵的主体为“白俄



基辅罗斯的建立示意图

罗斯”所占据。有的人由此可能也预感到了，后来白俄罗斯人之所以成为独立民族，也许跟波罗的人的影响有关；河流西北方向，则是一片完全处于俄罗斯境内，被称之为“瓦尔代高地”的丘陵。如果想在东欧平原看似没有重心的丘陵中，找一个地理枢纽点，那么瓦尔代高地应该是最有竞争力的候选地了。

瓦尔代高地的海拔并不高，最高点也不过海拔 343 米。然而当我们在地形图上，为之叠加上水系图后，就会明白它的重要性了。但凡一个地理单元能够被称为“枢纽”，肯定是处在几个板块相接之地，而河流就是显示这一地缘关系的主脉。伊尔门湖流域，所承接的，只是高地北坡所收集的淡水，在西、南、东三个方向，瓦尔代高地还为三条重要河流提供了补给。从西侧对接瓦尔代高地的，是波罗的地区流程最长、下游处于拉脱维亚境内的“道加瓦河”（俄语称“西德维纳河”）。道加瓦河也是波罗的地区诸河中，唯一一条穿透波罗的丘陵，指向东欧平原腹地的河流。与之隔分水岭相对的东侧，就是今天俄罗斯境内最重要的那条河流——伏尔加河。

瑞典人沿河流南下建立罗斯国

伊尔门平原的瑞典人，如果想以伏尔加河流域为扩张方向的话，倒不一定要选择洛瓦季河。在伊尔门湖东侧，有另一条被称之为姆斯塔河的河流，从瓦尔代丘陵东北麓流过，帮助他们接近伏尔加河的上源。不管选择哪条河流，瓦尔代高地都不会成为瑞典人向东扩张的障碍。问题是，瑞典人是不是要把重心放在这个方向。如果瑞典人此刻的打交道的对象，仍然是那些从事原始渔猎活动的“乌拉尔人”，那么向伏尔加河流域扩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作为伏加尔河流域的土著，乌拉尔人还是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的主体民族。那些从中欧渗透而来的斯拉夫人，渗透的重心则是源出瓦尔代高地之南的“第聂伯河”。

与斯拉夫人一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来的日耳曼人，也优先选择了向第聂伯河方向渗透。这一方面是由于第聂伯河流域身处“南方”，气候相对更为宜人（农业和

人口潜力也最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第聂伯河能够对接黑海。这意味着，谁能够入主第聂伯河流域，谁就能够获得与地中海文明直接交流的机会。

源出瓦尔代高地的上游支流，被视为是第聂伯河的正源。进占伊尔门平原的瑞典人，与之中间仅仅相隔了东西向的“道加瓦河”。同时扇形的第聂伯河流域，还拥有很多支流。其中右岸最大支流，是源自白、乌、波三国相接处的“普里皮亚季河”。由中欧而来的斯拉夫人，沿着第聂伯河上游支流，进入第聂伯河流域。过了普里皮亚季河——第聂伯河河口后不久，斯拉夫人将在第聂伯河左岸，看到一条叫做“杰斯纳河”河流（也是左岸最大支流）。公元 9 世纪初，在瑞典人还没有踏足伊尔门平原时，东斯拉夫人已经在第聂伯河——杰斯纳河河口，筑起了他们的第一座城——基辅（今天的乌克兰首都）。一定要为东斯拉夫人的民族源头找一个座标，基辅应该比瑞典人建立的诺夫哥罗德更为合适。



基辅罗斯的建立示意图

东斯拉夫人之所以选择了这个位置建立政治中心，是因为过了基辅再往南的话，森林就不再能为他们提供完全的保护了。因为介于温带森林与南俄草原的“森林草原”地带，将呈现在东斯拉夫人的面前。森林、草原相间的植被覆盖状态，使得游牧民族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机会优势。对于东斯拉夫人来说，最大的利好是，南俄草原在匈人之后一直未能完全统一在一起。这也让东斯拉夫人，有机会将他们的势力范围渗透到森林草原地带。不过，在第聂伯河下游的南俄草原，斯拉夫人并没有什么机会实控。

现在，日耳曼属性“罗斯人”的扩张脉络已经很清晰了。在伊尔门平原盘亘 20 年后，这些北方来的“商人”，横穿道加瓦河借助第涅伯河进入了东斯拉夫人的地盘，准备

建立更为庞大，能够直抵终端市场的贸易帝国。公元 882 年，诺夫哥罗德城的第二代统治者“奥列格”率军入主基辅，在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罗斯国”。由于首都位于基辅，遂史称“基辅罗斯”。有一种说法是，在奥列格入主基辅城之前，已经有其他“瓦良格人”，先一步成为了基辅的统治者。不管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基辅罗斯的建立，都为东斯拉夫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瑞典人（罗斯人）南下至斯拉夫人土地

虽然古罗斯人最初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日耳曼人，但就像保加尔人一样，“日耳曼罗斯人”在文化及人口上相比斯拉夫人，并不占据优势。因此入主基辅的罗斯人也很快和被征服的斯拉夫人融为一体，以至于今天“罗斯”这个名词，完全成为了东斯拉夫人所独占的标签。那么基辅罗斯接下来的扩张方向在哪里，又有没有机会克服南俄草原的障碍，打通通过地中海之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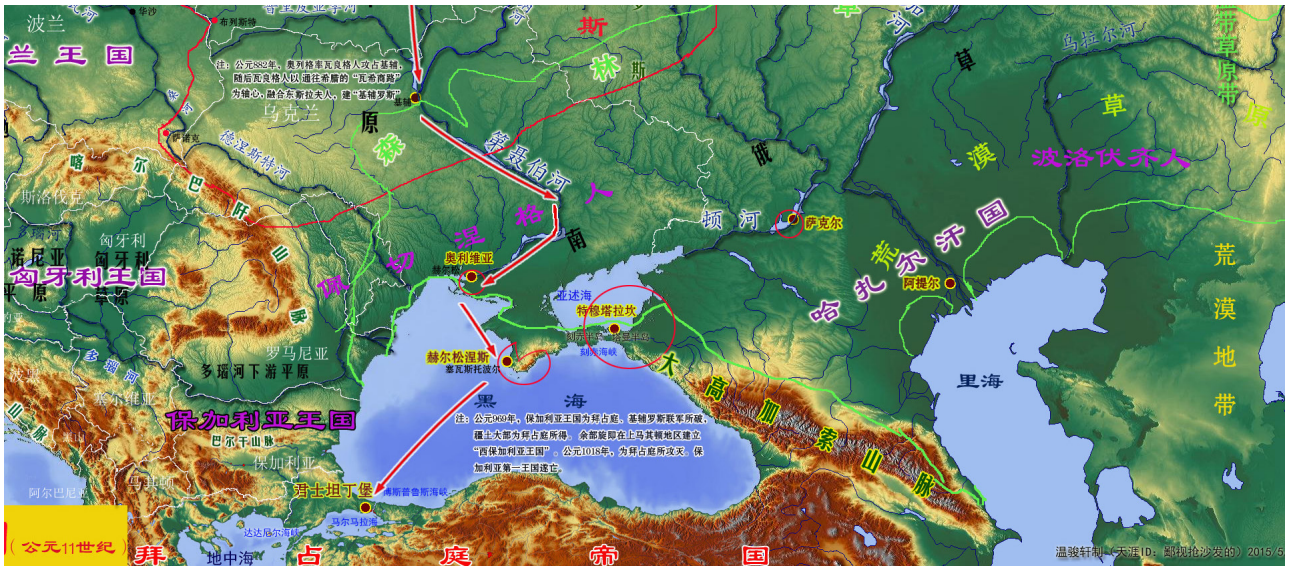
第六章 哈扎尔汗国在南俄草原的崛起

第一节 南俄草原上的突厥人

罗斯人打通瓦希商路的障碍

来自北欧的瓦良格人征服“第聂伯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中欧的“琥珀之路”之外，打通一条能够自己控制的，通往拜占庭帝国的商路。由于拜占庭帝国此时已经被视为了一个希腊国家，所以这条身处东欧平原的商路，也被称之为“瓦希商路”。应该说，在征服了伊尔门平原的乌拉尔人、第聂伯河中上游的东斯拉夫人后，瑞典人离这个目标已经非常接近了。然而他们要是再想进一步的话，有一个坎是必须跨过去的，那就是“南俄草原”。

在瑞典人入主基辅城，并开始以“罗斯”的标签示人时，他们在第聂伯河下游所面对的游牧民族有两支，分别是第聂伯河西岸的，乌拉尔语族的马扎尔人；以及东岸的，突厥语族“佩切涅格人”。不过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突厥人的步步紧逼之下，马扎尔人被迫退至了多瑙河三角洲。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在前面的内容都已经描述过了。拜占庭人与马扎尔人联合，把渗透入多瑙河南岸的保加利亚人赶走；保加利亚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向佩切涅格人抛出了橄榄枝，联手把马扎尔人逼入了特兰西瓦尼亚高原。此后，马扎尔人决心在多瑙河中游打拼，而瓦拉几亚平原则成为了保加利亚人的势力范围。



基辅罗斯地缘结构图

相比从罗马那里洗白游牧身份，成就天主教“匈牙利王国”的马扎尔人；以及从君士坦丁堡那里借势成为东正教“保加利亚王国”的保加尔人，完全身处草原之地的佩切涅格人却始终保持了游牧本色。对周边地区的劫掠、充当雇佣军，成为了其补充

游牧经济的主要手段。基于这一特点，先天就有商业基因的“基辅罗斯”，并不一定要通过战争手段，来征服这片草原。让佩切涅格人明白，与之合作能够让彼此从拜占庭帝国那里获益，应该会更容易达到目的。

不过即使罗斯人真的能够让佩切涅格人合作，南俄草原与拜占庭之间，也还隔着个保加利亚。此时的保加利亚王国，正处在鼎盛时期，保加利亚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西蒙一世，甚至为自己加冕了一个“罗马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皇帝”的头衔。要想同时控制一支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加上一个正处在上升期的国家，困难可想而知。这也意味着基辅罗斯想打通一条陆地线的“瓦希商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事实上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既然罗斯人的关注点只在商路是否畅通，他们又是沿着河流，一路从波罗的海渗透而来的，那么基辅罗斯所需要关注的，其实就只是第涅伯河的控制权罢了。虽然游牧民族在草原上拥有明显的优势，但这一优势却无法在河流之上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基辅罗斯如果能够建立一支强大舰队，那么他们就有机会无视佩涅格人的威胁、保加利亚的阻隔，从水路渗透黑海，进而与拜占庭帝国对接。

哈扎尔人的源流

对于基辅罗斯来说，草原处于分裂状态是一件好事；不幸的是，占据草原东半部的，却并非一支内部松散的部落联合体，而是一个已经立国超过两百年，比之文明层级更高的国家——哈扎尔汗国。与基辅罗斯一样，这个草原国家的身体里，也流淌着商人的血液，并且将拜占庭视为最重要的商业合作伙伴。如果基辅罗斯想在黑海有所作为的话，并无可能无视他它的存在。

在纵横欧洲的亚洲游牧民族政权中，中国人最熟悉的应该是欧洲古典时代末期的匈人所建立的“阿提拉帝国”（公元 5 世纪），以及 13 世纪中叶——15 世纪末，隶属蒙古帝国体系的“金帐汗国”了。而填补这两个时段之间真空期的，最为强大的草原国家，就是兴起于公元 7 世纪中叶——11 世纪初的“哈扎尔汗国”。很多中国人相信“哈扎尔人”就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隶属西突厥的“突厥可萨部”，因此哈扎尔汗国，也被译为“可萨帝国”。这样命名，看起来能够再一次激发种族或者民族自豪感。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唐帝国灭了西突厥，可萨帝国又是西突厥的属国，于是华夏文明再一次透过多米诺骨牌效应，搅动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

在阿提拉帝国崩溃之后的混乱时期，哈扎尔人争取而来的领地，是在里海之西、高加索山脉北麓（今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境内）。基于中国人可以理解的心理（因为我们的人文史也经常这样考据），俄国人更愿意相信，哈扎尔人是高加索地区土生土长的游牧民族。事实上，最初的哈扎尔人还有可能是在匈人西进时期，就随之从中亚迁入南俄草原了，就像保加尔人一样。不过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其实也不重要。自匈奴崛起之后，欧亚草原的迁徙方向，就一直呈现“东风压倒西风”的趋势。可以说，从中亚乃至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一直就没有停下过向南俄草原渗透的步伐。在突厥帝国统一亚洲草原后，那些源自亚洲的新老移民，都与突厥帝国发生联系。并在欧洲

人面前自称“突厥人”，可以让欧洲人勾起对匈人所带来“黄祸”的恐怖回忆。

然而打着“突厥”标签的“黄祸”，最终并没有到来。或者说除了一些诸如佩涅切格人的突厥部落，会经常骚扰一下欧洲诸国的边境外，欧洲在战略层面上，并没有受到威胁。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就是哈扎尔汗国的存在。以领土范围和影响力来看，将哈扎尔人所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帝国”是很勉强的。这些从大高加索山脉北麓，扩张至伏加尔河——顿河流域的突厥人，甚至没能对南俄草原形成完全的统治，但与那两个让欧洲人为之战栗的民族不同的是，哈扎尔人让欧洲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片草原并非只能带来死亡和恐惧。

哈扎尔人在南俄草原发展商业贸易的条件

与气候干旱、寒冷的的亚洲草原不同，纬度较低、降水相对较多的南俄草原的先天条件要好的多，或者说并非只能选择游牧经济。相对较低的纬度，使得南俄草原的积温条件能够满足够农耕需求；千百万年来腐蚀而成的“黑土”也是这个星球上，最为肥沃的土壤。

虽然自然降水较少，但那些从东欧平原中部收集雨水的河流，如伏尔加河、顿河、第聂伯河等，如果借助更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南俄草原完全可以转变为优质的耕地。即使没有进行深度开发，黑海北岸的某些点的降水，也已经可以支撑原始农耕经济的开展。早在希腊文明时期，色雷斯人就在克里米亚半岛南部、刻赤半岛殖民，并建立“博斯普鲁斯王国”，将大量农产口输往希腊。

问题在于，南俄草原与亚洲草原之间，并无天险分割彼此。任何一个想在南俄草原进行深度农业开发的民族，都会受到来自东方的强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游牧经济所造就的机动力、战斗力，反而会让自己更为安全。最起码实在不敌对手的进攻，还可以迁徙至另一片草原，迅速重头开始。那么，有没有能够与游牧经济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另一种经济形态，来帮助游牧民族完成文明进程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商业。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商”和“贾”看似是同一意思，但却有着本质区别。所谓“行商坐贾”， 行走运输、贩卖货物者为“商”；定居开铺出售货物者为“贾”。以游牧民族的机动力和活动范围来说，本身就具备了成为“商”的天然条件；一旦这种“行商”所带来利润足够大，部分游牧者（尤其是统治阶层），也会在贸易通道中择点定居变成“坐贾”，以完善、控制自己的商贸管理体系。当游牧生活，因为商贸行为而加入定居成分后，源自游牧文化的文明基因，也就有了生长的土壤。

上述演变过程，在中亚、阿拉伯半岛都曾经发生过。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突厥人、阿拉伯人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其最初的载体都是那些因承载商贸功能，而兴起的贸易城市（比如在伊斯兰教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的麦加、麦地那）。不过，并不是每一个游牧板块，都有机会开启这一“游牧商业文明”进程的，身处什么样的地缘位置，十分重要。比如要论自然环境，阿拉伯半岛算是诸游牧板块中条件最差的，

但凭借长期垄断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地缘优势，阿拉伯人有机会成就自己的文明，并且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力。

对于准备在南俄草原一显身手的哈扎尔人来说，黑海的存在是一个颇为有利的因素。黑海能够为南俄草原提供一条海上快速通道，这使得他们不必费力统一整个草原，就能够通过海路与地中海文明对接。不过一直以来，这段海岸线的存在，更多是让地中海那些海洋国家，有机会建立一些登陆东欧的贸易据点，并将南俄草原作为销售市场。早在希腊文明时代，希腊人就已经开始通过这样的做法，向草原游牧民族销售种类繁多的商品了。后来的罗马人、拜占庭人，也同样继承了这一地缘优势，向南俄草原倾销商品。

由于对地中海地区商品的依赖，无论是早期的斯基泰人，还是后来的匈人，通常都不会吞并黑海北岸的那些贸易据点。除非有一天，南俄草原也能够拥有地中海地区所渴求得到的商品，扭转贸易逆差。在黑海北岸布局，甚至打造舰队才会变得有价值。然而仅仅依靠游牧经济的产出，哈扎尔人显然是无法做到这点的，除非有别的途径弄到商品充实他们的马队。那么中世纪的哈扎尔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二节 草原丝绸之路开通的地缘背景

在草原上开通丝绸之路面临的复杂局势

虽然哈扎尔人迁入欧洲，与中央之国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们能够以别样形式，在黑海之滨立足，却的确与中央之国有着很大关联。将两者串连起来的，就是那条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并不是在公元 7 世纪才开拓成功的，这条文明、商业交流之路能够被打通，是公元前 2 世纪，中央帝国的汉王朝，为击败匈奴人所做的一项战略决定（结盟大月氏人）的副产品。伟大的“汉武帝”以及他忠实的使者“张骞”，是这一计划的批准者和执行者。而公元 7 世纪的中央之国，则属于另一个强大王朝——唐王朝，其在草原上的对手也变成了覆盖整个亚洲草原的“突厥人”。

西方人认为，中央之国内部的诸王朝，只是在不断的重复自我，只需研究一个样本，就能够这其中的规律了。从地缘角度看，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就好像我们会发现，罗马帝国所遵循的一些地缘政治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欧洲。然而尽管汉朝和唐朝貌似都击败了强大的游牧帝国，并且成为了丝绸之路东半部的主导者，但两个对手和两条丝绸之路之间，在结构上却存在着一定差异。

匈奴纵横亚洲草原的时代，这个游牧帝国的根基是在蒙古高原。而阿尔泰山以西的中亚草原，匈奴人基本上只控制了包括以阿尔泰山南麓在内的半个准噶尔盆地。至于以“伊犁河谷”为核心的天山草原，以及哈萨克丘陵地区，则分别为乌孙、康居两个游牧王国所控制。也就是说，匈奴人并没有真正统一亚洲草原。这一格局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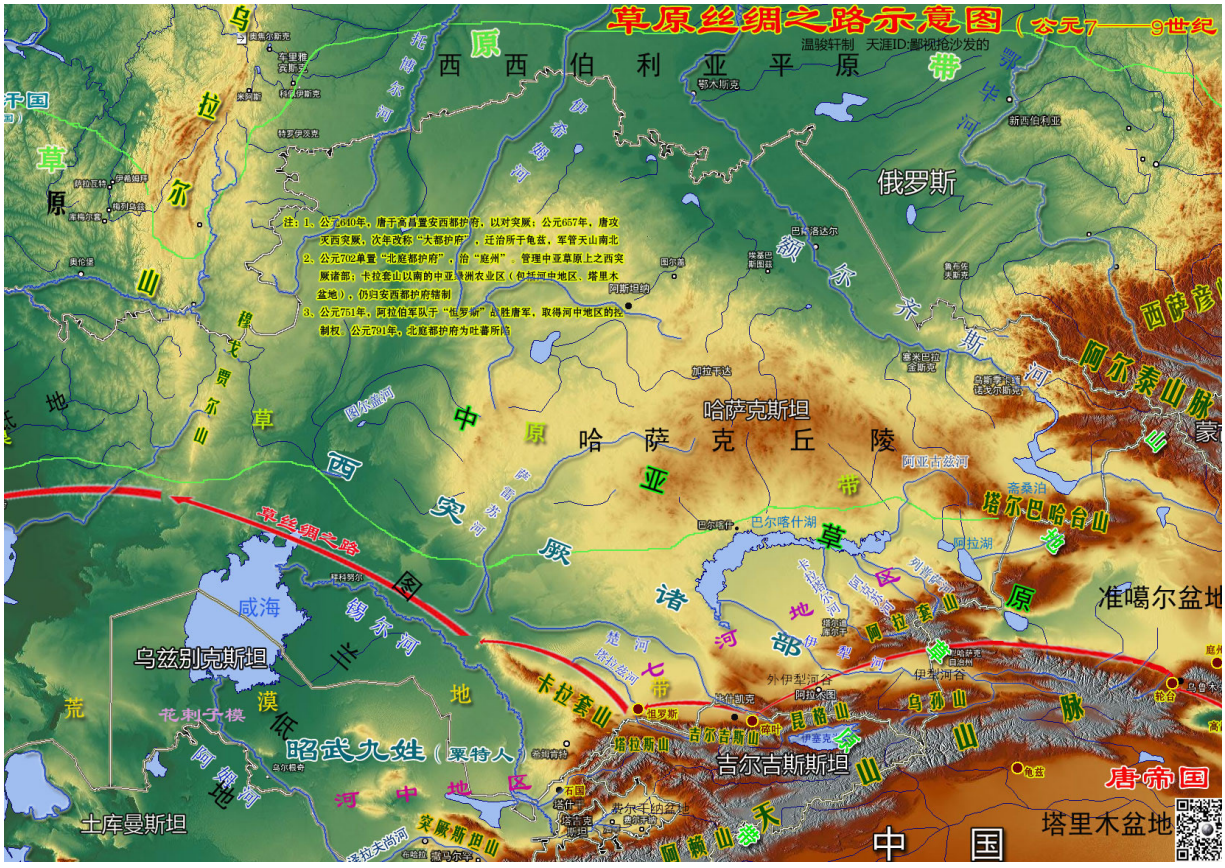
显然也为汉帝国所关注到。为此，帝国一直视乌孙为战略盟友，以减轻匈奴人对塔里木盆地的压力。依照同样的外交逻辑，身处乌孙人西、南侧的康居人，也曾经与匈奴人结盟，以避免乌孙人在中亚草原一家独大。

对于上述历史，以及诸亚洲草原王国的地缘结构，我们在“西域部分”已经非常详尽的解读过了。对这一块感兴趣的人，可以回过头去看。现在牵扯出这一节，是让大家明白一点，在汉王朝开辟丝绸之路时，中亚草原上的局势有多么的复杂。这也意味着，尽管游牧民族在机动性上优势明显，草原看起来也比沙漠地区更有利于通行，但真正能够被视为丝绸之路主线的，只能是沿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绿洲，再跨越天山，进入中亚南部绿洲地带的路线。

唐帝国击溃突厥打通草原丝绸之路

情况在公元 6 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突厥人在击败众多竞争对手之后，建立了覆盖蒙古、中亚草原的游牧帝国。尽管这个帝国很快便以阿尔泰山脉为分割线，分裂成为东、西两部分，但突厥人在欧亚草原的优势地位已然确定。同一时期，中央帝国也经历了隋、唐两代的朝代变迁，并且始终将解决突厥人的压力，作为事关王朝生存的首要战略任务。

经过一个世纪的反复博弈，唐王朝在公元 7 世纪中叶，先后击溃了东、西突厥，史无前例的取得了对蒙古高原、中亚地区的宗主权。中央帝国为控制中亚而建立的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也因此能够帮助帝国打通一条，从准噶尔盆地切入，沿天山北路西行的新丝绸之路（史称“新北道”以区别于沿塔里木盆地北沿通行的“北道”）。



草原丝绸之路示意图

如果沿着天山一路西行，“新北道”将在中亚“河中地区”（锡尔河、阿姆河地区）与西出塔里木盆地的“北道”会合，然后翻越伊朗高原、两河流域，进入拜占庭帝国所控制下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然而几乎与唐王朝羁縻中、北亚草原的同时，西亚的地缘政治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凭借伊斯兰教的强大思想控制力，一盘散沙的阿拉伯民族不仅得以统一，更攻灭了统治伊朗高原、两河平原、河中地区的“萨珊波斯”。拜占庭帝国在新月沃地及北非的领土，也相继为阿拉伯帝国所吞并。

在罗马（包括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包括之前的安息）双方关系紧张之时，欧洲人要想获得来自亚洲的商品，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作为阿拉伯半岛的控制者，阿拉伯人敏锐的看到了这一商机，绕过伊朗高原和新月沃地，通过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以及印度洋——红海航线，打通了印度次大陆通往埃及的商路。即使波斯人因为战争，阻断了商路，拜占庭也还是有机会，中转得到来自东方的奢侈品。然而在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后，一切都开始发生的变化。从中亚“河中地区”一直到尼罗河畔都为同一帝国所控制的后果，就是极大的削弱了欧洲人的议价能力。欧洲人当然还是能够得到来自东方的商品，但到底用什么价格得到，就得由阿拉伯人说了算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洲人希望有一条能够不受阿拉伯人控制的商路，为之带来中国的丝绸、印度的香料。从地理结构上看，欧亚草原之上的游牧民族，所掌控的横穿乌拉尔山——里海 / 咸海之间的草原通道，是最适合承担这一任务的，而唐帝国对西突厥的征服，正好让中亚草原有了强有力的主导者。也就是说，如果拜占庭帝国能够在黑海之滨的南俄草原，找到一个务实的合作者，那么欧洲就有可能通过中亚、南俄草原的中转，获得来自东亚甚至南亚的商品。



草原丝绸之路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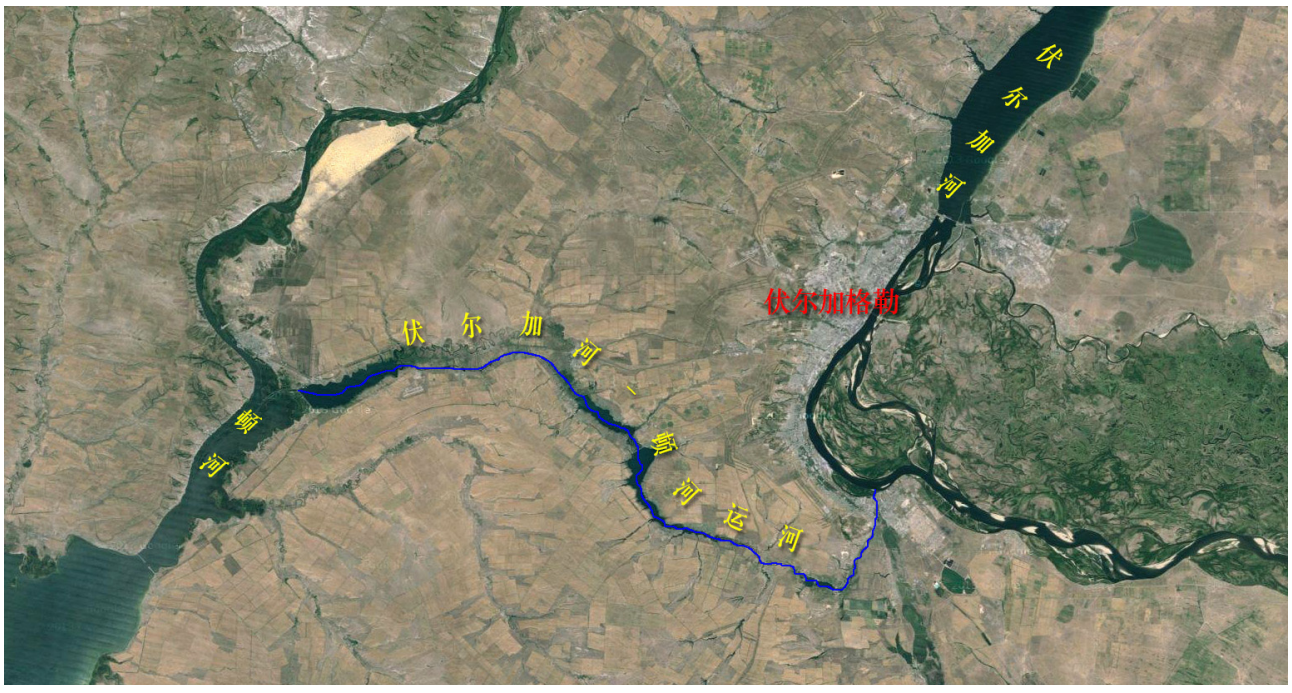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条商路称之为“草原丝绸之路”。这条商路的在中亚对接“新北道”的点，位于天山北麓“塔拉兹河”河畔。今天这个属于哈萨克斯坦的枢纽城市，

与河流同名（塔拉兹）。不过在公元 7、8 世纪，它名字“怛罗斯”会更有知名度。公元 751 年，大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在这里进行过一场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后者在战败之后，对天山以北地区的控制权逐渐减弱。

当中亚地区在唐王朝的主导下，迎来新秩序时，从中央帝国经天山北麓送至塔拉兹河畔的商品，接下来就有机会在突厥语游牧部落的护送下，沿锡尔河下游上溯至咸海北部，穿越乌拉尔河（源自乌拉尔山脉南麓，注入里海）进入南俄草原。问题在于，唐王朝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会去帮助协调中亚游牧民族之间的利益，谁又能够在南俄草原和拜占庭帝国形成利益共同体呢？

第三节 哈扎尔人建立商业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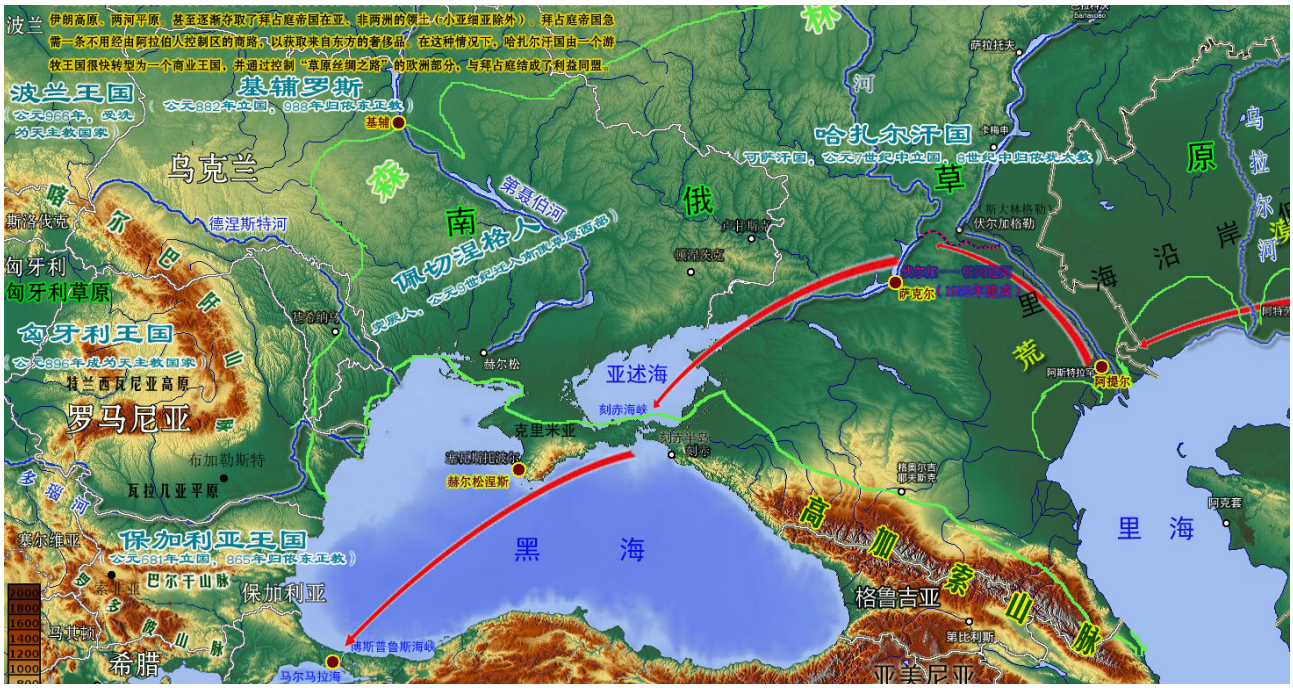
很显然，抓住这个巨大商机的就是哈扎尔人了。也可以说，正是借力“草原丝绸之路”的开启，以及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矛盾，游牧的哈扎尔人得以奇迹般的，在南俄草原成为一个让欧洲人欣赏的“文明国家”。这一转变让强大的“哈扎尔汗国”不再把目标放在统一整个南俄草原之上（纯粹的游牧国家一定会这样做）。只要保证伏尔加河、顿河下游的控制权，汗国的利益就能得到保证。至于从多瑙河下游，到第聂伯河流域的西半个“南俄草原”，则先后成为了马扎尔人、保加尔人、佩涅切格人的竞争的舞台。后者甚至是公元 9 世纪，从中亚草原穿越哈扎尔汗国的控制区而来的新突厥移民。



伏尔加河——顿河运河

地理位置相近的伏尔加河、顿河的命运，总是会联系在一起。在哈扎尔汗国时代，前者能够帮助汗国，第一时间迎接到来自中亚草原的商队；后者则能够打通一条，由

顿河——亚述海——黑海——地中海所组成的水上贸易通道。值得关注的是，这两条河流在南俄草原的最近处，相距不过 4、50 公里。从技术上看，如果打通一条运河的话，里海也就不再只是一个封闭的咸水湖了。从中亚而来的商品，也有机会通过水路，经由里海——伏尔加河——顿河进入黑海。事实上，后来俄国人也的确这样做了。上世纪中叶，“伏尔加河——顿河运河”的打通，让里海一定程度拥有了出海口（虽然走不了大型海轮）。今天为了强化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俄国人似乎也有意向拓宽运河，“帮助”里海沿岸的中亚国家，获得真正的出海口。



草原丝绸之路示意图



伏尔加河——顿河运河

当然，即使两大水系没有连通，也不会影响顿河、伏尔加河相接之地的地缘价值。今天矗立于这片土地之上的，是始建于 16 世纪末的“伏尔加格勒”。这座城市在绝大部分苏联时期（1925 年后），以及 2004 年之后的俄罗斯，还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斯大林格勒。看到这，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明白了，为什么二战中，俄国人一定要在斯大林格勒，死磕德国人了。

在哈扎尔人建立商业王国之时，从锡尔河、咸海 / 里海北岸运送而来的商品，通常会在伏尔加河三角洲中转，然后溯河而上，在斯大林格勒一带转入顿河，然后再顺河而下接入亚述河、黑海。汗国也因此在伏尔加河三角洲、顿河下游建立了两个都城。

当哈扎尔人藉此成为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后，他们也顺势成为了乌拉尔人，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中间商。一方面乌拉尔人在伏尔加河中上游，乃至更北部地区所收集的初级商品，经由顿河中转输往拜占庭帝国；另一方面，乌拉尔人要想得到拜占庭帝国的商品，也一样会让哈扎尔汗国获利。事实上，正是凭借对边缘民族的商品出口，拜占庭帝国在东方贸易中的逆差缺口，才得以填平。

对于做转口贸易的哈扎尔人来说，既然能够坐享如此巨大的利益，又为什么要像匈人那样去做什么草原霸主，并且用“劫掠”这种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手段，从欧洲人那里收获利益呢？然而这种凭借地缘位置，以及特殊地缘政治背景而形成的优势，是否能够长久保持下去呢（比如现实中的香港）？

第四节 哈扎尔汗国皈依犹太教

哈扎尔人对宗教信仰的选择

当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并且开始步入文明国家行列后，哈扎尔人开始意识到，必须在宗教信仰上有所选择了。亚洲游牧民族所信奉的，是与其生产力相适应的，源自渔猎时代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从技术上看，相信“万物有灵”的萨满教，既无成熟的宗教体系，又无成文的教意，是宗教发展初级阶段的产物。在经历过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多神教，三个发展阶段之后，世界宗教的主流，已经推进到了“万神归一”的一神教阶段。

沙漠游牧民族——阿拉伯人，凭借一神教 3.0 版本的“伊斯兰教”，奇迹般的建立庞大帝国，是一神教体系影响力最成功的表现。在欧洲，一神教 2.0 版也同样对人类的政治、生活影响巨大，并呈现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宗教高于语言、文字等要素，成为了最重要的身份识别标志。鉴于欧洲地缘结构的复杂性，“万神归一”的一神教，在技术上成为了最容易普及（也更容易为统治者所控制）的宗教形式；二是否归依基督教，成为了一个民族是否步入文明行列的衡量标准。三是宗教信仰选择与中世纪民族国家的建立，共同筑就了现代欧洲民族的识别基础。你会发现，今天大部分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都能上溯到公元 8、9 世纪这个时间段；

对于哈扎尔人来说，最现实的问题是，无论他们的盟友（拜占庭人），还是对手（阿拉伯人），都已经用强大的宗教武器加强了组织性。即使纯粹出于内部统治的需要，准备在南俄草原扎根的哈扎尔人，也需要为自己寻找一尊唯一的“真神”。然而问题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尽管一神教能够从意识形态层面，更加简单的让不同的族群站在同一阵线，但地理、地缘政治层面的考虑，终究还是起着主导作用的。最直接的案例，就是整个欧洲看起来都已经成为了基督教传播福音的乐土，但却还是在地缘政治的作用下，分割为了天主教、东正教两大阵营。至于一个准备跻身“文明”行业的族群到底怎么选，也一样要从自身的定位来考虑。

从地缘关系的远近来看，哈扎尔人受拜占庭帝国影响选择东正教的机率，要比选择天主教更大。当然，有时候地理、地缘关系越近，一方反而会因为防御需要，根据“远交近攻”的原则，选择不同于周边地区的意识形态。不过哈扎尔人看起来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一则拜占庭人并无力征服这片草原；二则在草原上维持一个能为自己带来利益的商业伙伴，对曾经饱受游牧民族侵扰的拜占庭人来说有益无害。

君士坦丁堡无疑是非常想说服哈扎尔人归依东正教的。然而在商业交往中，平等是第一原则。东正教君权在上、神权在下的模式，会让哈扎尔人感觉到自己成为了拜占庭人的附庸。面临同样的问题，同为游牧出身的保加尔人倒是选择了东正教。不过在多瑙河下游经营日久的保加尔人，已经完全放弃了草原。与斯拉夫人融为一体的他们，同时看到自己有像日耳曼人那样，继承罗马帝国遗产的可能性（虽然从结果上看，只是让俄国人脑洞大开）。至于哈扎尔人，他们其实只是想安静的做一个商人。

天主教当然也是一个选择。问题在于，哈扎尔人并不是想与拜占庭人对抗，舍近求远选择罗马，只会增加彼此的不信任感。同样的道理，哈扎尔人也不可能选择伊斯兰教。真要那样做的话，对哈扎尔人产生不信任感的，就是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了。更何况哈扎尔人实际上是从阿拉伯人口中夺食。在阿拉伯帝国已经吞并伊朗高原，将控制线推进到大高加索山脉时，哈扎尔汗国与之已经有了直接的地缘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哈扎尔人与基督教世界所结成的，就不仅仅是商业伙伴关系，而更是一个互相依靠的安全同盟了。

既然选择加入一神教 2.0 版、3.0 版看起来都不能完全保护哈扎尔人的利益，那么希望借力宗教，摆脱“蛮族”定位（同时增强内部凝聚力）的哈扎尔汗国，就没有其它选择了吗？当然也不是这样了。条件合适的话，哈扎尔人也可以在认可一神教理论的前提下，创建一个包容前面三个版本的“4.0 版本”（就像伊斯兰教那样）；或者在某一个版本基础上，再分化出一个独立的 2.1、3.1 版本（比如后来与天主教、东正教并立的新教那样）。不过，在选择创新之前，哈扎尔人其实还有一个更省力的办法，那就是直接归依一神教最原始的 1.0 版本——犹太教。

纯粹从技术上看，哈扎尔人选择以犹太教立国，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三大宗教的特点和渊源，我们曾经在“中东部分”有过详细解读。在犹太教的教

义下，原始的血缘关系认定同样重要。简单点说，犹太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上帝所选中的选民，完全遵从教义的话，一个与之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和民族，是不可能半路出家成为犹太教徒的。正是因为犹太教的这种封闭性，才迫使一些想将其“福音”，博爱式的传播向所有民族的人，另起炉灶创立了“基督教”；以及汲取前两者经验教训，将一神教控制力发挥到极致的“伊斯兰教”。

哈扎尔人立犹太教为国教

然而意识形态终究是服务于现实世界的。现实世界就是，犹太人早已失去了他们那片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迦南之地，被迫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尽管“犹太人”在宗教和血缘上的双重认定标准，能够保护他们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千年一系的维持自己的存在，但没有同盟的客观现实，还是让犹太人始终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也许犹太人内心深处，已经为当初固执的坚持封闭思维（包括借罗马人之手，除掉向异族传播福音的耶稣基督）有了一丝悔意。不过在基督教已经主导欧洲大地，伊斯兰教强势传播西亚、北非的大背景下，犹太人即使真有改革的想法，在他们所认知的世界里，也没有拓展空间了。

在公元 6 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崛起之时，西亚的犹太人又一次被迫大规模外迁。如果说之前犹太人最热衷的迁徙地，是与迦南相隔不远的两河平原，那么在伊斯兰教的强大压力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穆斯林要向异教徒收取高额税收），这次犹太人则把对宗教信仰管制还不太严格的欧洲，作为了主要迁徙方向。

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犹太人有着极强的商业头脑，以至于他们给欧洲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奸诈吝啬的商人、放货者形象。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犹太人的异类身份（以及对耶稣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欧洲几乎没有可能通过分封或者购买获得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从“大散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中找到商机，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自我封闭的内部结构，演变为了管理优势；被迫散居的状态，转化为商业网络优势。犹太人开始在欧洲商业舞台上，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大约在公元 9 世纪，犹太人的形象就完全演变成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样了。

不管是游牧的哈扎尔人，率先嗅到打通草原丝绸之路的商机，还是这一战略转变，本身就是出于犹太人的建议。犹太人在哈扎尔汗国所打造的商业王国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公元 7 世纪中叶，哈扎尔人决定立犹太教为国教，并且继续保持与拜占庭帝国良好的盟友关系（同时也不会排斥和阿拉伯人做生意）。基于商人的务实性，以及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哈扎尔人并不会强迫汗国内的所有居民，都信仰犹太教。也就是说，在可萨汗国的统治下，草原游牧民族依旧可以从萨满巫师那里获取力量；而黑海沿岸那些希腊人后裔，也仍旧能够信仰他们的基督教。

现在看起来，哈扎尔人成为犹太教徒，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缺乏血缘上的联系纽带了。不过一定要从血缘上和犹太人连上谱，也并非什么难事（孤独的犹太人其实并不排斥这种做法）。因为从本质上说，民族认知是一种你情我愿的主观认知。“血统”

认同，更多是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至于这种认同的背后，到底有多少真实成份反倒是不重要的。就像同样重视血缘纽带的华夏民族，在壮大过程中，也通过“塑造”共同祖先的方式，吸收了不少边缘民族加入。以色列在立国之后，为了壮大自身力量，甚至在上世纪 8、90 年代，依据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美丽传说，前后共二次（分别为摩西行动、所罗门行动）从埃塞俄比亚接入了 20000 多“黑犹太人”（贝塔以色列人）。

然而哈扎尔人却并没有打算放弃他们的游牧基因。从本质上说，这些已经适应了定居生活，甚至在伏尔加河畔尝试种植业的前游牧者，只能算是信仰了犹太教的突厥人。哈扎尔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所身处的这片草原，始终是游牧者的世界。如果哈扎尔人希望从来自亚洲的突厥部落手中，接过“草原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商品，那么最好不要让对方认为，自己跟他们已经没有共同的祖先和记忆了。对此，欧洲的犹太人肯定会感到一丝遗憾了。

不过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的，商人总是务实的。何况对于一个没有家园的民族来说，出现有一片认同他们意识形态，并为之提供广阔商业舞台的土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只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国家，就不会有竞争者出现，挑战他们的核心利益吗？当然不是了。因为从波罗的海南下的罗斯人，已经在路上了。

第五节 哈扎尔汗国的立国基础和面临的地缘压力

哈扎尔人在黑海的贸易利益及开展种植业

需要注意的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为哈扎尔人建立商业王国奠定了基础，但不能说没有了来自东方的奢侈品，哈扎尔人就无法立国了。更不能就此认为，中央之国的政局一旦发生变化，就一定会影响到商口出口到西方。事实上，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央之国来说，从来就没有过主动开辟贸易之路的想法。所谓“丝绸之路”的开通，只是地缘政治的副产品。西方能否从陆地商路获取东方商品，其实更多取决于从河西走廊到黑海之滨间的政局是否稳定。一旦这片降水稀少的草原、荒漠地带，出现了政治和谐的景象，并且能够与中央之国维持和平（使之不至于出于防御需要，封关以自守），那么商队就能够从丝绸之路获益。

即使没有来自东方的商品，黑海也早已成为了重要的贸易平台。希腊人很早就在整个黑海沿岸地区都布设了贸易据点。以面对南俄草原，乃至整个东欧平原进行贸易的希腊殖民地，散布于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的河口，以及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半岛南岸。在罗马及拜占庭帝国时代，这些贸易据点一如既往的在发挥着作用。只不过谁能控制它们，就要看当时的形势了。这其中战略位置最为重要的，就是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的“赫尔松涅斯”。在基辅罗斯坐大黑海之前，拜占庭一直都牢牢的掌控着这个战略要点。不过今天你在的黑海沿岸上找这个名字，就只能在第聂伯河河口，找到

一座叫“赫尔松”的城市（时名奥利维亚 Oleshye，也是古希腊殖民点）。因为现在这座黑海北部地区的地缘中心，已经更名为“塞瓦斯托波尔”了（克里米亚的首都，俄“黑海舰队”的驻地，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的争夺焦点）。这也意味着，在伏尔加河——顿河下游站稳脚跟的哈扎尔人，如果能够向西垄断整个黑海北部的海岸线，那么仅凭垄断传统的东欧——地中海贸易，也足以立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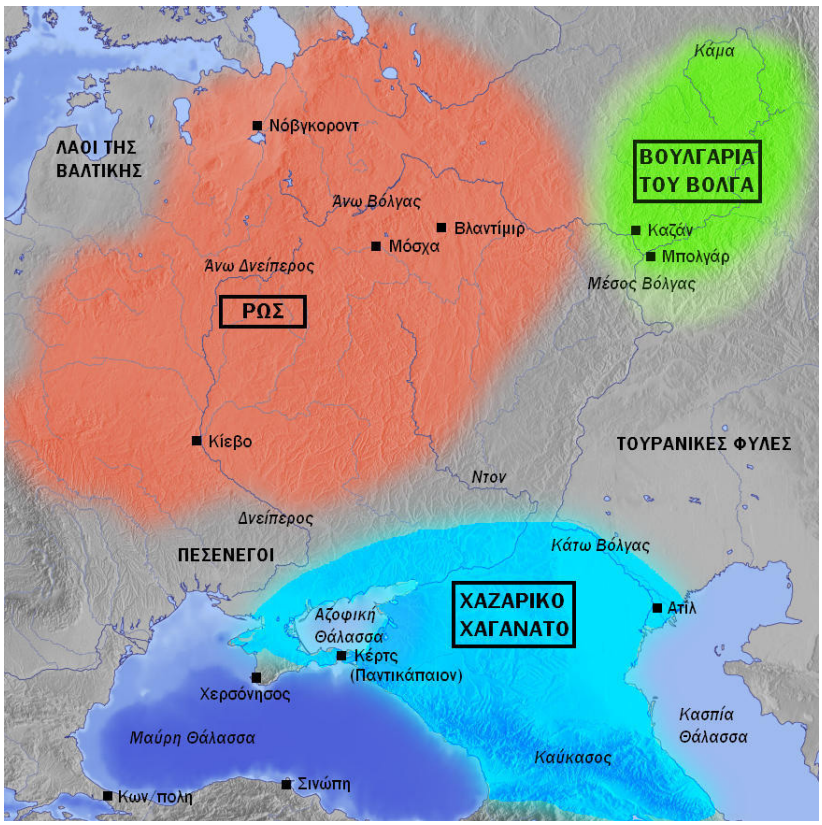


草原丝绸之路示意图



俄罗斯奥伦堡州（南俄地区）的草原

另一个能够成为哈扎尔汗国重要经济支柱的产业，就是种植业了。一直以来，这



罗斯国和哈扎尔汗国示意图

片土地未能开垦的原因，并不在于土壤、气候，而在于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游牧民族的威胁。当哈扎尔人因控制商路需要，而选择在某些枢纽点上（必定临河）定居下来时，并有胡萝卜和大棒，约束周边游牧部落时。种植业也很自然的会成为哈扎尔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在哈扎尔汗国的统治下，南俄草原的经济呈现出了明显的，商、牧、农（种植业）混合经济形态。

南俄草原[1]的问题，因为环境和位置的原因，太过容易受到游牧集团的冲击，而使其更多呈现出游牧属性。相比之下，整体环境更加恶劣的中亚、西域绿洲农业区（天山——卡拉套山以南），土著居民在这三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业态之间转换，会更加从容。比如在唐朝时期，大量从中亚“河中地区”迁入内地的“粟特人”（安禄山、史思明就是粟特人），身上就能同时显现出上述属性。

哈扎尔面临的地缘压力

不管怎么说，哈扎尔人都算是抓了了历史机遇，帮助自己在这片多事的草原上定居下来了。经过两个世纪的经营，哈扎尔人成功的将控制线，向西覆盖至德涅斯特河口。并且将生活于此的游牧部落（如马扎尔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我们经常会讨论，哪块地方会是四战之地，哪一板块又有边缘优势。事实上在这个圆形的星球上，没有一地能够拥有绝对安全的大后方。在罗斯人到来之前，草原民族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欧亚草原内部。特别是在匈人西进之后，乌拉尔山口已经明显成为了南俄草原的压力源。像哈扎尔人这样的“老移民”，必须时刻警惕来自亚洲的“新移民”前来取代他们的地位。

公元 9 世纪迁入欧洲的新突厥移民——佩切涅格人，就是哈扎尔人所直接面对的

1　南俄草原为欧亚草原的一部分，草原从多瑙河口附近开始，东北部几乎延伸到喀山，然后东南方向延伸到乌拉尔山脉的南端。它的北部边缘是一片宽阔的森林草原，现在整个地区已经转为农地而被抹去。在东南部，黑海 - 里海草原在黑海和里海延伸到高加索山脉。在西方，匈牙利大平原是与特兰西瓦尼亚山脉的主干草原分离的草原岛。在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在南海岸有一些内部草原和港口，将草原与地中海盆地的文明联系起来。

亚洲压力。尽管这些突厥人像大多数游牧民族那样，不屑于把自己束缚在土地上（定居），但他们对第聂伯河流域及其以西草原地带的控制，还是为哈扎尔人在南俄草原的霸主地位带来的挑战。然而，这并非哈扎尔人所面临的最大压力。毕竟遵循游牧传统的佩切涅格人，本身并无意于染指哈扎尔人的商业版图，而崛起的基辅罗斯就不会这样想了。

第七章 基辅罗斯对周边地区的征战

第一节 基辅罗斯为贸易权攻击君士坦丁堡

从波罗的海而来的瑞典人，本身就是因为贸易才对渗透东欧平原发生兴趣的。当发现征服第聂伯河的东斯拉夫人，能够帮助他们打通一条从波罗的海到希腊半岛的新商路时，他们与哈扎尔人之间的地缘冲突就无可避免的。从拜占庭帝国的角度来说，其实更愿意与已经算进入文明国家行列（信教了），并且磨合日久的哈扎尔人交易。更何况身处南俄草原东端的哈扎尔汗国，战略上还在帮助整个欧洲，抵御来自阿拉伯帝国的威胁。至于那些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来的北方人，他们在公元 9 世纪的名声可不太好（整个西欧都处在维京海盗的阴影下）。

为了获得与拜占庭帝国的贸易权，在整合东斯拉夫诸部的同时，基辅罗斯在公元 10 世纪曾经先后四次，透过黑海发动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这种情形有点像 19 世纪的英国，为了贸易权而对中国开战）。从航行和造船技术来看，罗斯人并没有问题。只是为了同时适应内河与波罗的海的通航，北欧日耳曼人所造的船只通常都不大，吃水也较浅。当黑海成为可能的战场时，这些斯拉夫化的日耳曼人，开始建造更大的船只。有记录表明，罗斯人所拥有的船只，曾经达到过两千艘之巨（只不过其中大部分是没有海战能力的小船了）。

尽管拜占庭帝国在黑海的统治权，第一次遇到来自海上的挑战，但总的来说优势还是在拜占庭一面。在军事层面，拜占庭帝国的海上优势经常被一种神秘武器——“希腊火”所神化。这一武器的结构到底如何，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其使用方法大致为，将混合了助燃剂的轻质石油，通过青铜管喷射向对方的船只，并在喷射过程中点燃。由于油比水轻，这些漂浮于海面的燃烧物，能够对敌军舰队造成巨大伤害（使用的时候肯定是要观察风和水流方向的）。在与拜占庭的海战中，阿拉伯人和罗斯人都曾经吃过这一武器的苦头。



希腊火

当然拜占庭帝国的海上优势，并不是单纯靠一种神

秘武器来维持的。所谓“百年海军”，要想打造一支优势海军，没有长时期的经营，以及巨大的财力支撑，是做不到的。最起码要在黑海和拜占庭帝国打持久战，罗斯人并没有拜占庭海军那么多的港口提供支援。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的海上威胁，在战略上和游牧民族通过陆地，周期性的侵扰并没有分别。

虽然拜占庭帝国并不惧怕罗斯人的海上威胁，但有这样一个带有海盗色彩的敌人，游弋于黑海贸易线上，终究不是件好事情。这和游牧威胁一样，攻击方总是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让防御方付出成倍的代价的（看看长城防线的花费就知道的）。更何况帝国海军，还要应对更大的对手——阿拉伯人。因此罗斯人在每一次战争或者说海上骚扰之后，都还是能够在贸易权上获取一定收益的。对于拜占庭和其它黑海国家来说，不得不正视的一点就是，在黑海本身就已经足够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被“瓦良格人”注入了海洋基因的斯拉夫人，已经拥有一席之地了。至于以“基辅罗斯”为政治标签的东斯拉夫人，最终能够在黑海、东欧平原取得多大的成就，就不仅要看自己内部的整合情况，更要看邻居们的表现了。

第二节 基辅罗斯进攻保加利亚和伏尔加保加利亚

基辅罗斯取得哈扎尔贸易城市后攻击保加利亚

在斯堪的纳维亚人进入东欧平原时，曾经繁荣的哈扎尔“犹太国”就已经出现衰弱的迹象了。这很大程度与安史之乱后（公元 755——763 年），唐王朝逐渐放弃对西域的经营有关。当丛林法则重新在中亚地区盛行后，哈扎尔人的处境最起码发生了两个明显变化：一方面中亚的动荡，再次欣起了新一轮的西迁浪潮。佩切涅格人就是因此，才出现南俄草原之上的；另一方面，东方商品数量的减少，使得哈扎尔人的经济重心，更加向欧洲本土倾斜。这也意味着，基辅罗斯的做大，将影响到哈扎尔汗国的核心利益。

在渗透东欧平原一个世纪后（公元 10 世纪下半叶），羽翼丰满的基辅罗斯，终于在伏尔加下游，对哈扎尔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将哈扎尔人建立在顿河下游（萨克尔）、刻赤海峡两岸、以及第聂伯河河口（今赫尔松市）的贸易城市，变成了“瓦希商路”的一环。这也意味着，基辅罗斯真正控制了一条，从波罗的海到君士坦丁堡的商路。至于悲剧的哈扎尔人，则只能退守于伏尔加河下游、高加索一带，并逐渐淡出地缘政治舞台。

相比之前出现在东欧平原南部的民族，罗斯人的优势在于他们所拥有的“海洋基因”。这使得基辅罗斯能够透过黑海，与拜占庭帝国直接对话。并且在与哈扎尔人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优势。从哈扎尔人不再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时。多瑙河下游的保加利亚人，成为了罗斯人的新目标。如果能够进一步征服保加利亚王国，即使那些瓦良格贵族暂时没有想做“沙皇”的想法，也能够把想象空间，延伸到整个南斯拉夫地区。

为此，基辅罗斯在战胜哈扎尔人后，马上就挥师西进，向保加利亚人发起攻势。事实上罗斯人并非孤军作战，为了消除保加利亚王国所带来的压力，拜占庭帝国与基辅罗斯结成了同盟。至于到最后谁被对方当枪使了，就要谁能够得到保加利亚的领土了。

从地缘关系上看，拜占庭人占据明显的优势。保加利亚王国所控之地，本来就是拜占庭的北部边区，无论从海路还是陆地，二者都可以无缝对接。至于基辅罗斯要想在多瑙河下游立足，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就是南俄草原。尽管控制了第聂伯河——黑海、顿河——亚述海——黑海的水上运输线，但出身于森林气候区的罗斯人，并没有力量真正控制这片草原。也就是说，基辅罗斯控制的只是贯穿南俄草原的几条水上运输线，以及支撑这条运输线的几个重要据点。这一切，只有等到东斯拉夫人诞生出一个独特民系——哥萨克人到来，才算有所转机。在此之前，这片草原一直都是来自亚洲的，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的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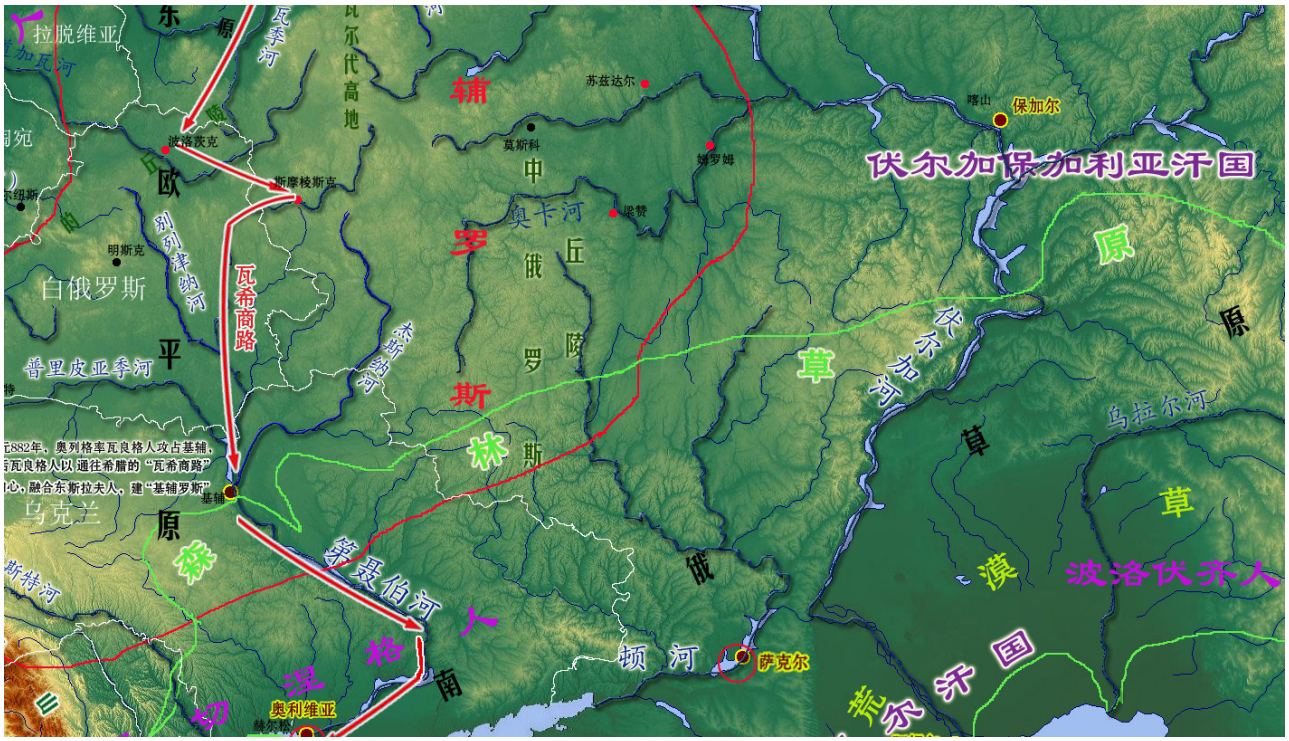
基辅罗斯地缘结构图

战略上的先天不足，使得罗斯人的军队在击败保加利亚人之后，旋即被拜占庭人赶出了多瑙河下游（保加利亚人在上马其顿重新建国，史称“西保加利亚王国”。公元 1018 年为拜占庭帝国所灭）。罗斯人最大的收获，也许就是俘获了保加利亚人的“沙皇”。悲剧的是，南俄草原上的突厥人（佩涅切格人），可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基辅罗斯历史上武力最强大的君主，哈扎尔汗国、保加利亚王国的征服者（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在退回基辅的途中，自己也成为了别人的战利品。甚至连头骨也被依照游牧民族对的风俗制成了酒杯，成为胜利者显示力量的象征（就像 1000 多年前，匈奴单于对大月氏王所做的那样）。

基辅罗斯远征伏尔加河流域

残酷事实让基辅罗斯意识到，在没有办法征服草原之前，南下多瑙河下游，甚至图谋拜占庭帝国的皇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基辅罗斯新的君主（弗拉基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把扩张版图的方向，放在了南俄草原之北。除了对内继续完成东斯拉夫人的整合工作，并与西线的波罗的人、西斯拉夫人（波兰人）、北线的乌拉尔人发生摩擦之外，更试图在伏尔加河流域有所突破。

早在渗透伊尔门平原时，这些为东斯拉夫人注入商业基因，然后以“罗斯”形象示人的北方人，就已经开始对伏尔加河流域的探索工作了。最初的目的，当然只是从乌拉尔人那里收集皮毛了。不过在入主基辅，与哈扎尔人发生利益摩擦后，对伏尔加河中、上流的渗透工作，战略意义就更为重大了。要知道，东方而来的奢侈品尽管利润巨大，但在量上毕竟有限，供给也不稳定。产生于东欧森林中的毛皮、蜂蜜，乃至奴隶等初级产品，才是占据物流通道的主要商品。对于已经控制了第聂伯河中上游的基辅罗斯来说，如果他们能够向东扩张，控制伏尔加河流域中、上游的资源，就有机会把哈扎尔人逼上绝路。同时从战术上看，如果能从伏尔加河顺流而下的话，罗斯人将有机会直取哈扎尔人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都城。



基辅罗斯地缘结构图

在对伏尔加河流域的征服中，基辅罗斯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并非是土著的乌拉尔人，而是公元 7 世纪就已经被哈扎尔人，迫入伏尔加河中游的那部分保加尔人。为了区别多瑙河下游那些斯拉夫化保加尔人，这部分同样由草原气候区，转入森林气候区的保加尔人，被称之为“伏尔加保加尔人”，所建立的国家史称“伏尔加保加利亚”。汗国的首都，就是今天的“喀山”（时名“保加尔城”）。公元 9 世纪中叶，哈扎尔

人曾经将 “伏尔加保加利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些身处欧洲边缘的保加尔人，也开始为欧洲人所知晓。

尽管基辅罗斯对保加尔城发动了远征（公元 985 年）并且取得胜利，但基辅罗斯实际上并没有能吞并“伏尔加保加利亚”。 最终成为了基辅罗斯和斯拉夫之地的，是包括今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所在的“奥卡河”流域在内的，伏尔加河上游地区。不过莫斯科及著名的“莫斯科公国”12——13 世纪才开始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而莫斯科取代基辅，升级为东斯拉夫人地缘政治中心的战略窗口，则要等到蒙古人入侵东欧平原之后才会打开。

第三节 基辅罗斯皈依东正教

罗斯人加入东正教世界及选择的背景

基辅罗斯没能彻底征服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人、下游的哈扎尔人，主要是因为这个由日耳曼人和东斯拉夫人结合起来的国家，本身立国也不过 100 多年。不管瑞典人还是土著的斯拉夫人，本质上都算是尚未进入文明阶段的边缘民族。无论从民族凝聚力、还是政治结构来看，这个依靠武力捏合在一起的国家都还存在很多先天不足。新生的基辅罗斯要想完善内部统治结构，并且不再被人视为野蛮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像周边“文明国家”一样，接受“一神教”的洗礼。

与哈扎尔人一样，罗斯人面前也有四个选择：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哈扎尔人选择的犹太教。首先罗斯人并没有必要，主动把自己排除出基督教世界。很显然，选择伊斯兰教的话，他们不仅会和生意伙伴拜占庭人产生芥蒂，更马上会被中欧的天主教世界视为第二个西班牙（此时的西班牙，已经是天主教抗击阿拉伯帝国的前线）。其次犹太教也不会成为选项。哈扎尔人选择犹太教，是因为他们只能安安静静的做一个商人，而能够将整个斯拉夫之地作为想象空间的“基辅罗斯”，可不会那么容易满足。

在波兰人已经接受了天主教（公元 966 年）的情况下，罗马教庭也希望，他们能把从罗马散播出去的福音，传递给东斯拉夫人。然而作为东斯拉夫人的政治代言人，基辅罗斯的统治者有自己的想法。在波兰以及整个西斯拉夫群体在天主教世界占得先机的情况下，基辅罗斯已经很难在罗马教庭拔高自己的地位了。就地缘政治格局来看，现在的波兰王国与当年的法兰克王国很像；基辅罗斯所代表的东斯拉夫人，则与日耳曼尼亚的德意志人相当。也就是说，波兰人很希望在教庭授权下，“联合”东斯拉夫人，打造出属于斯拉夫人的“帝国”。

如果波兰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状态的东斯拉夫世界，那么他们的想法倒有机会实现。就像当年查理曼，各个击破的征服日耳曼尼亚诸国，打造出“东法兰克王国”一样。如果成功的话，即使出于地缘结构的原因，东斯拉夫人最终还是独立建国，但

在宗教上也已经接受天主教了。然而悲剧的是，在波兰人准备借助“天主”的帮助做大时，北方而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帮助东斯拉夫人完成政治统一，甚至通过击败哈扎尔汗国、保加利亚王国，挑战拜占庭帝国，建立了比波兰人更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再想以西斯拉夫人为主导，统一东、西斯拉夫世界就很困难了。

最终在完成对“伏尔加保加利亚”的远征后，我们刚才提到的“弗拉基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还是将东斯拉夫人带入了东正教世界（公元 988 年），这也是他的名字能够出现在这里的唯一原因。出于生意（与拜占庭）和战略防御（与波兰）的原因，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由于与拜占庭之间相隔了南俄草原，接受了东正教的基辅罗斯，并不用担心会因此受控于君士坦丁堡。唯一需要付出的，就是接受一个“大公国”的政治地位。至于拜占庭人当然也是满心欢喜了，南俄草原之北、天主教世界之东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东正教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件好事。

基辅罗斯陷入分裂状态

除了东欧平原的东斯拉夫人归依东正教以外，北欧的日耳曼人也在公元 10 世纪接受了天主教。这似乎意味着，基督教已经统一了欧洲。不过当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一时期的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就会发现“神”在欧洲的统一事业还未完成。其中以芬兰人为代表的，活跃于亚寒带针叶林带的“乌拉尔人”，各方面都还处在原始氏族阶段。在“神”的光茫在更温暖地区还有努力空间前，他们暂时还是很安全的；相比之下，波罗的人的文明程度肯定要比乌拉尔人高，也与已经进入宗教文明期的其他民族，保持着密切的地缘关系。问题是，深感自己处境危险的波罗的人，并不认为传教士们能够让自己更强大。相反接受某一教派的洗礼，只会让周边国家找到渗透、同化自己的机会。

至于南俄草原，哈扎尔人特立独行的选择犹太教，已经是这片草原离上帝最近的一次了。如果形势比人强，将来一定要接受一项宗教的话，与欧洲人所处地缘环境大大相径庭的他们，选择源出沙漠游牧民族的一神教——伊斯兰教的可能性要更大。事实上，在东斯拉夫人、哈扎尔人的双重压力下，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人，在这个世纪（10 世纪）就已经选择了向阿拉伯人示好，成为了欧洲最早的穆斯林。一直到今天，这片以“鞑靼”为标签、喀山为政治中心的土地（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仍然带有强烈的伊斯兰教色彩。

接受东正教的洗礼，虽然有助于强化东斯拉夫人共同的民族意识，但基于欧洲地缘结构的分裂性和不稳定性，曾经强大的基辅罗斯，很快也像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那样，进入了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事实上在整个欧洲中世纪，只有直接面对亚洲文明影响的拜占庭，在组织结构、意识上呈现出君主专制的“帝国”形态。在公元 11 世纪中叶，基辅已经无力维系统一的局面。这个由北欧人建立的东斯拉夫人国家，被分裂为了十几个公国。混乱的局面一直延续了将近一百多年，直到另一股来自东欧平原之外的势力——蒙古人出现。

蒙古人要等到公元 13 世纪，才开始搅动欧洲大陆的政局。在此之前，包括“瓦良格人”在内的北欧日耳曼人，才是整个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搅局者。在了解完这些北方人对东欧地区的“贡献”之后，我们也要把目光转向西欧，看看那些被称之为“维京”的北欧人，又究竟留下了什么地缘遗产。



第二部分

维京人侵扰西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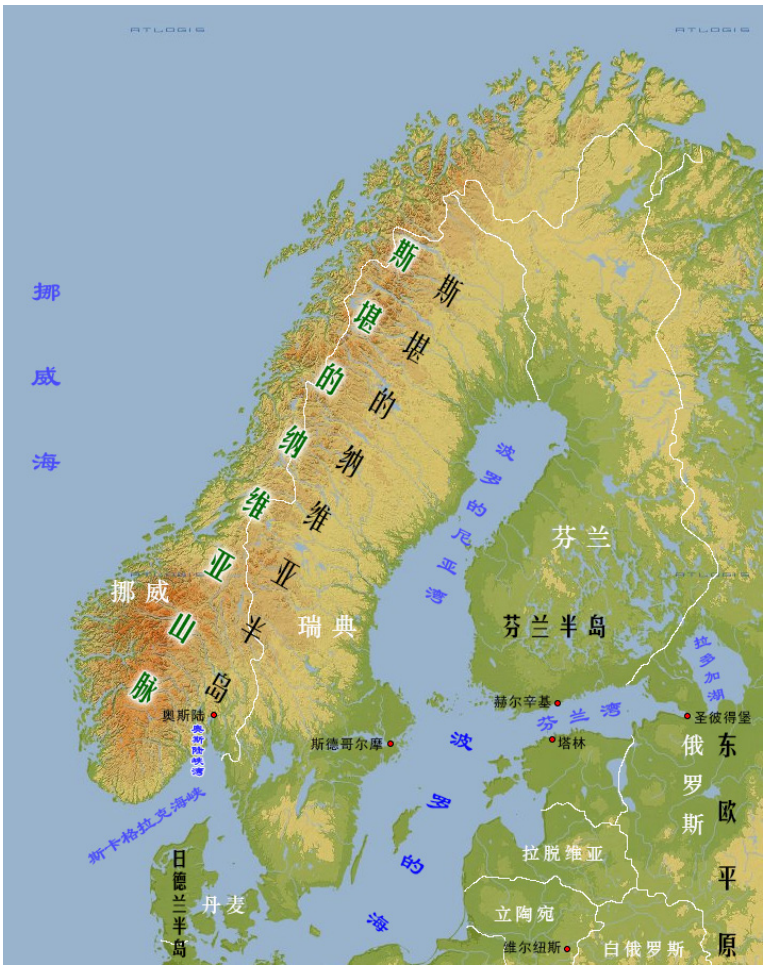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挪威人的海上扩张之路

第一节 挪威向海外探险的地缘背景

挪威的地理环境特点

很多时候“斯堪的纳维亚人”会与“维京人”这个标签混用。不过“斯堪的纳维亚”这个标签，只是把生活在瑞典、挪威的日耳曼人包含进去，而无视了日德兰半岛（及其附属岛屿）上的丹麦人。另一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是“维京人”是否包含所有的北欧日耳曼人。在英语的语境中，“维京”人的形象被固化为：一群从北方海湾跨海而来的海盗。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活在丹麦和挪威的日耳曼人，才能算是“维京”人。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部的瑞典人，他们的拓展方向则是波罗的海和东欧平原。瓦良格人（商人）、罗斯人（北方）这两个标签，是斯拉夫人和乌拉尔人对他们的最初印象。

当然广义来说，把来自这三个板块的北欧日耳曼人，都统称为“维京人”也无不可。毕竟在他们本身的确是处在一个地缘圈，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只是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导致了渗透路线、方式上的差异。不过此文既以地缘分析见长，自然是要解读的更深入一些了。分析欧洲人开始认识这些北欧日耳曼人时，这三大民族的地缘特征，还是很有意义的。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形图

从地理结构上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轮廓颇有点像一只面向南方的“蟹钳”，并明显呈现“西高东低”的走势。“蟹钳”面向大西洋方向的延伸，基本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山脉，突兀的矗立于大洋之中。其沿海地带，几乎没有像样的沿海平原存在。相比之下，面向中欧平原另一瓣“蟹钳”， 在冰川和水流的作用下，地势就要平缓的多。今天身为瑞典核心区的这片土地，整体呈现

丘陵平原相间地貌。二者的分割点，则是一个深入内陆 130 公里的峡湾——奥斯陆峡湾。身处奥斯陆峡湾最深处的城市，是挪威首都“奥斯陆”。今天奥斯陆之名为国际政治爱好者所知，大概是因为它在 1993 年成为巴勒斯坦、以色列和谈地。由此所签署的巴以和平协议，也被称之为“奥斯陆协议”。

奥斯陆峡湾及其以西地斯堪的纳维亚沿海地区，是挪威人的传统领地。这一点，也在今天的政治版图划分中得到了体现。从地缘属性来说，挪威人可以被定性为“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大西洋沿岸民族”。其分布地依山伴“洋”（而不是“海”）的特点，是这挪威得以独立于两个亲缘民族的根本原因。不过虽然纬度较高，但由于大西洋暖流的影响，使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山脉沿海山麓的挪威人，所感受到的气温倒并不会比北京人更低（而且更加湿润、多雨）。

除了大西洋暖流以外，深入山脉的一道道峡湾，能够帮助挪威人免受恶劣海洋气候的影响，同时也造就了星罗棋布的天然良港。在这些挪威人赖以生存的峡湾中，无论从地势、地理位置还是纬度上看，南部的奥斯陆峡湾无疑是整个挪威最好的区域。公元 11 世纪中叶，首次在挪威境内建立统一国家的君主（金发王），正是从这里出发，向西、北方向扩张，统一挪威境内各部的（奥斯陆城也是在此时兴建的）。

挪威耕地缺乏促其向海外探险

然而有一个问题，却始终制约着挪威的发展，那就是耕地问题。即使在今天，挪威的耕地面积也仅占国土面积的 3%。可以想见，在 1000 多年前，挪威人是根本没有办法依靠农耕来维持部族生存的。这使得挪威人 “渔猎”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日，要比欧洲大多数民族更长（除了乌拉尔人）。那些自然生长于海洋、森林中的动植物，是挪威人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即使在公元 11 世纪，挪威人开始摆脱原始氏族结构，建立统一国家时，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改观。在统治者向臣民征收的税赋中，动物毛皮仍然是最主要的硬通货。

虽然古挪威人这样的民族，被我们定性为“渔猎民族”，但他们选择这种属性，更多是出于无奈。从“人”的本性来看，如果能够有更好、更稳定的经济收入，没有谁会愿意一直这样靠天吃饭。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文明往往是随着大片低地森林，被开发为耕地而诞生的。然而对于高山密布的挪威来说，这条发展之路显然是行不通的。当挪威人意识到，自己所生存的土地没有潜力可挖，相邻条件较好的区域，又已为亲缘的丹麦、瑞典人所覆盖时，他们的寻找新生存空间的方向就只能是海外了。

最早开始离开原住地，进行海外探险的北欧日耳曼人就是“挪威人”，挪威因此也可以被称之为维京海盗的发源地。出于砍伐森林的需要，以及境内丰富且易于开采的铁矿资源（由于冰川的作用，很多铁矿暴露于地表），斯堪的纳维亚人很早就掌握了用铁制工具——斧头，砍伐森林的技巧；同时出于渔业需要，制造和驾驭船只，也成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如果说游牧民族叱咤欧亚大陆的利器，是马和弓箭的话，那么当挪威人决定离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海岸线，去寻找新大陆

时，船和斧头这两样先进的生产工具，就是他们驰骋海洋的马和弓箭。



维京人

第二节 挪威人发现并殖民设得兰群岛

凯尔特人在设得兰群岛上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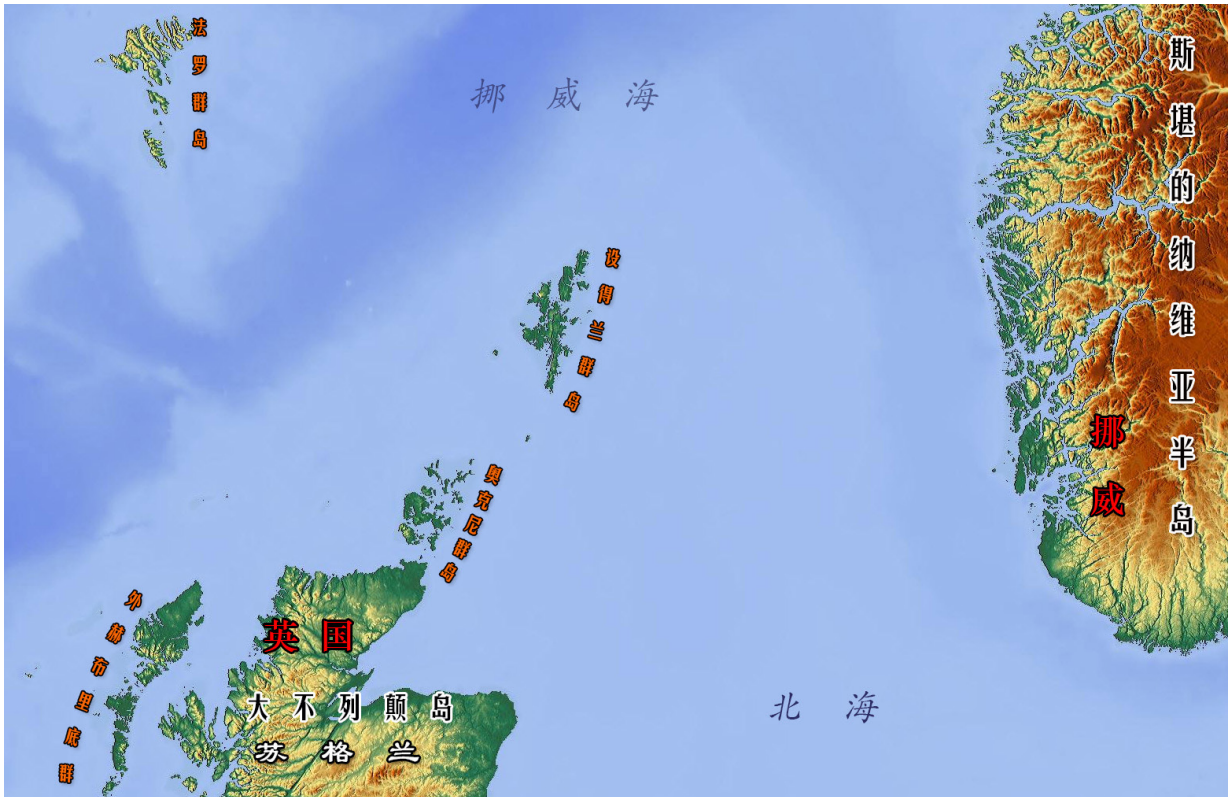
由于南部更靠近欧洲大陆的海洋，是日德兰半岛的辐射范围，挪威人的探索方向被锁定为了西方。在这个方向上最接近斯堪的纳维亚的陆地，是一个由 100 多个小岛组成的群岛——设得兰群岛（又译“谢德兰群岛”，主岛为梅恩兰岛）。公元 8 世纪初，挪威人发现了这个与其纬度相当的群岛，并开始向岛上殖民。然而他们所发现的并不是一组无人居住的岛屿。在北欧日耳曼人到来之前，这些岛屿中最适宜居住的成员，就已经从南方迎来接入了凯尔特人移民。

日耳曼人并非第一次在大西洋上入侵凯尔特人的保留地。早在公元 5 世纪，日耳曼人大举进入西欧时，日德兰半岛南端及易北河下游的盎格鲁、萨克森等族，就已经开始跨越英吉利海峡，陆续登陆大不列颠岛的英格兰地区了。那些本来寄希望于在罗马军队撤走后，能够重新回到东南低地区的凯尔特人，在日耳曼人的挤压之下，不得不继续留在高地区。然而为什么远离大陆的大西洋北部，凯尔特人的命运会再次受到日耳曼人的冲击呢？其实看看地图，这一切就都明白了。

在罗马阶段，大家已经对“不列颠群岛”的地缘结构有所了解了。不过当时我们的目光，更多是放在“大不列颠岛”这个主岛上，对其附属岛屿，尤其是北部岛屿却没有做过解读。从迁徙的角度来看，跨越英吉利海峡而来的凯尔特人，沿陆地向北扩散至苏格兰高地后，他们当中很自然也会有人，在开展渔业生产的同时探索新的陆地。

在大不列颠岛西北角的“赫布里底群岛”，以及东北角的“奥克尼群岛”，肯定是最先被发现并移民的外岛。

以奥克尼群岛为跳板，再向东北方向航行 100 公里左右的话，凯尔特人就可以看到设得兰群岛了，而设得兰群岛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直线距离，大致为 350 公里。单纯从距离上来看，不列颠人发现设得兰群岛的可能性也要更大些。考古学家认为，早在 5000 年前，设得兰群岛上就已经出现人类了。至于挪威人在群岛上看见的居民，是不是这些先民的后代，就很难判断了。能够确定的是，公元 8 世纪，维京在设得兰群岛上看到的土著岛民，“文明”程度要比他们更高。这些凯尔特人甚至在挪维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归依了基督教（这一时间比大部分的斯拉夫人还要早）。



设得兰群岛位置图

从人文历史的角度探讨，这一差异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凯撒。在公元前 55 年凯撒入侵不列颠之前，即使是高卢凯尔特人，对他们的这些亲戚也不甚了解。90 年后，当罗马军团再次登陆不列颠，并建立行省之后，也标志着这片外岛被正式纳入了欧洲文明圈。尽管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后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没有能够占领过苏格兰高地，但通过与这些入侵者的博弈、交流，高地及北部外岛上的凯尔特人，一直都能够感受到欧洲文明的影响。

不列颠群岛的基督教化及岛上的意识形态之争

就欧洲中世纪迈入“文明”门槛的重要标志——归依基督教这件事来说，位置边缘的凯尔特人，甚至比英格兰人走的更快一点。早在公元 5 世纪初，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还没有确立各自基督教中心地位的时候，那些仅凭个人宗教热情传播教义的传教士，

就已经开始踏足爱尔兰岛了。公元 6 世纪，在爱尔兰人普遍接受基督教之后，传教士们又以爱尔兰为基地，向苏格兰地区渗透，然后再南下英格兰地区传教。这些来自爱尔兰的传教士，甚至还尝试过向欧洲大陆的日耳曼人传教。公元 6 世纪末，当以法兰克人为主的高卢地区，已经全面接受罗马天主教后，从罗马教庭出发的传教士，也开始带着政治任务，向不列颠群岛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传教。在这一南一北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及至公元 7 世纪后期，整个不列颠群岛都已经接受上帝的福音了。

从地理关系上来看，基督教在不列颠群岛上的这种传播路径，似乎很难理解。毕竟英格兰地区比爱尔兰岛，与欧洲大陆要近的多。问题在于，地缘关系并不仅仅是由地理距离来决定了。基于“远交近攻”的外交原则，两个相隔甚远的板块，往往会有动机建立一定程度的共识。在公元 4 世纪，君士坦丁大帝代表罗马人，认可基督教国教地位的大背景下。向边缘民族传播基督教，成为了传承罗马文明的重要方式。凯尔特人在不列颠群岛上的边缘地位，使得他们比日耳曼人更有动机，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的共性，来获得外部支援（缅北的克钦人归依基督教，也是这种心理）。在这种心理下，传教士们可以让凯尔特人相信，如果接受洗礼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得到“罗马人”的帮助。

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并不能抹去凯尔特人与英格兰日耳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间的地缘矛盾。这一次，到底是受独立发展的爱尔兰教会所控，还是接受罗马教庭的再次洗礼，一时成为了凯尔特人与英格兰人之间的矛盾点。英格兰人也将是否接受罗马公会，视为一个凯尔特人部族，是否接受自己统治的标志（地缘独立性较差的威尔士就接受了）。当英格兰人在 16 世纪同样出于政治目的，自立门户创建隶属新教体系的“英国国教”后，双方的地缘矛盾在宗教层面上，又转化为天主教与英国国教之争了。

在这里解读不列颠群岛的宗教史，除了再次证明意识形态之争，只是地缘矛盾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势（而不是本质）以外，更是为了让大家清楚，在维京人到来之前，整个不列颠地区已经成为了欧洲中世纪文明的一部分了。相比之下，虽然挪威人所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欧洲大陆的地理距离，看似要更近一些，但罗马人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发生过兴趣。能够与拉丁化的高卢地区直接发生关系的，也是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尼亚地区。在这一地缘背景下，北欧日耳曼人中更属边缘的挪威人，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机会吸收到欧洲文明了。

第三节 挪威人发现格陵兰岛和冰岛

挪威经营设得兰群岛及发现格陵兰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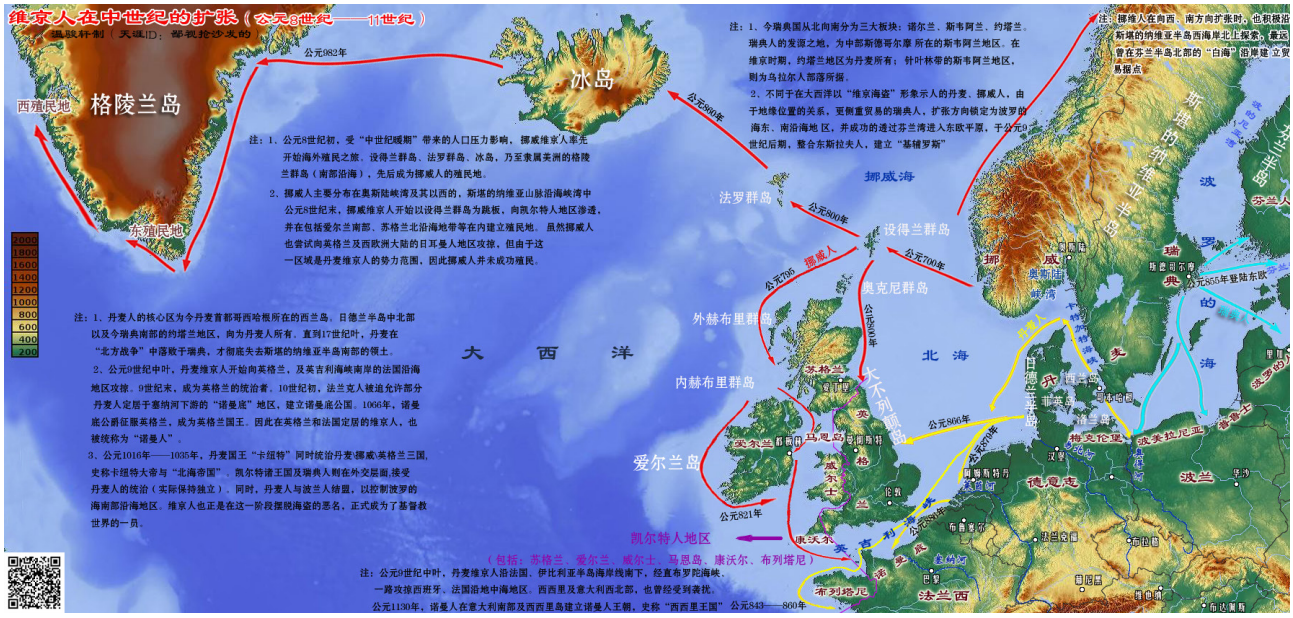
同样由于大西洋暖流的作用，设得兰群岛的气候也可以用“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来形容（夏天最高温度摄氏 20 度出头，冬天最低温度不超过负 10 度）。在这样的



设得兰群岛

环境下，挪威人应该很快能找到家乡的感觉。事实上在公无 8 世纪初，到达此地的挪威人，也的确是把这个群岛当成殖民地来经营（而不是纯粹的打劫对象）。当然，这也与岛上的凯尔特原住民，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挪威人入侵有关。即使在今天，设得兰群岛的总人口也不过 2 万人。

在公元 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挪威人还没有以海盗的形象出现在欧洲人的视线中。不过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设得兰群岛的资源有限，在 8、9 世纪相交的这段时间里，挪威人开始以此为基地，再次向周边探索。基于当时的知识水平，人类在进行类似探索时，往往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不过，那些文明程度更高、人口更多的地区，容易把这类事件记录下来罢了。



维京人在中世纪的扩张

在挪威人的海上探险中，最令人称奇的当属对美洲的发现了。当然，这里说是“美洲”，并不是哥伦布所登陆的“西印度群岛”（加勒比海地区），也不是后来欧洲移民充斥的美洲大陆，而是“格陵兰岛”。当我们在观察北美洲地图里，一定会注意到，在这片大陆的东北角，有一个体量巨大、一般被涂抹成白色的巨大岛屿存在，它就是

以 216.6 万平方公里面积，位列世界第一大岛的“格陵兰岛”。

公元 982 年，一名挪威裔罪犯在流放过程中发现了它。格陵兰岛距离挪威本土的距离约为 1500 公里，与设得兰群岛的直线距离也有 1400 公里。考虑到这个距离，这名探险者似乎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壮举。不过事实上，他真正看不到陆地的航程，只有 300 公里左右（当然，也是很了不起的了），因为格陵兰岛与设得兰群岛之间，还有两片为之中继的陆地：法罗群岛和冰岛。

挪威人殖民法罗群岛并发现冰岛

离设得兰群岛最近的是法罗群岛，挪威人大约是在公元 800 年开始向此地殖民。不过这次他们依然不能把发现权归属自己。在其登陆之前，来自爱尔兰的修道者就已经来到了这片由 20 个岛屿组成的群岛。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挪威人继承向西北方向探索，才算是真正的发现了一个无人岛——冰岛（虽然也有人认为，爱尔兰修道士还是抢先发现了）。不过冰岛给挪威人的最初印象并不好，否则他们也不至于给这个面积三倍于台湾岛的海外殖民地，取这样一个冷冰冰的名字。由于过高的纬度，岛上几乎很难看到，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家乡常见的针叶林带，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苔原。然而这个已经贴到北极圈了的岛屿，内部却不像它表面那般冰冷，丰富的地热资源，是这个国家的一大特色。



冰岛

由于环境原因，挪威人相信冰岛已经是这次探索的最后一站了。对于渴望寻找新领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说，他们并不相信，再往西北方向探索还能有什么收获。事实上，对于挪威本土来说，这样一个高纬度岛屿的用处也实在不大。这也使得在此后 1000 多年时间中，最初殖民于此的挪威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能够一直管理着这片土地。

即便在某一个时期出于经济原因（要与北欧进行贸易），在政治上归属于挪威或者丹麦，也不会为岛上带入新移民。

世外桃源般的地缘位置，最起码对冰岛造成了两个地缘后果：一是这个人口仅30多万的岛屿，在二战行将结束之前（1944年），就在即将建立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中，获得了一个独立法人的地位；二是几乎所有的岛民，都是1200年前那批挪威人的后代。以至于如果需要的话，冰岛人可以查清自己与周边每一个人的亲缘关系。当然，这其中也尴尬之处也是存在的。因为如果忽视了这一工作，你的结婚对象可能就跟你差了辈。

发现格陵兰岛的，其实就是冰岛人。不过在相当长的历史当中，这一发现除了让斯堪的纳维亚人，有机会去争一下美洲发现者的荣誉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为了让更多的冰岛人跟他去开拓新的殖民地，那位被放逐者给这个巨大的岛屿取了个极具诱惑的名字：绿色的土地（格陵兰的原意）。然而随后跟随他移民岛上的几百名冰岛人，发现前景并不如想像中光明。这个一大半土地都在北极圈内的岛屿，可以利用的土地非常有限。只有南部海岸的部分土地，才会在夏季出现些许绿意。

事实上，欧洲人在格陵兰岛上并非没有竞争者，在他们到来之前，这个世界上最耐寒的民族——因纽特人（爱基斯摩人）也会因为追逐猎物，不时光顾一下这个冰雪世界。不过这个岛实在太大了，双方之间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多交集（既没有战争，也没有贸易）。最重要的是，在欧洲人殖民此地时，岛上有足够的食物来源（主要是海豹），提供给双方。

第四节 小冰河期对欧洲的影响

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河期交替带来的影响

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海外殖民的8——10世纪，格陵兰岛、冰岛、法罗群岛、设得兰群岛的气候，相较今天要更为温暖。实际上在这一时期，整个地球的气温都有所上升。说到这里，可能已经有朋友想起来了，我们在神圣罗马帝国阶段，曾经提到了一个气候概念——中世纪暖期。对于欧洲的中高纬度地区来说，气候能够变温暖一点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不过相对充足的食物来源，也带来了另一项后果，那就是人口绝对数量的迅速增长（从而导致竞争的加剧）。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得以重塑。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各板块的人类族群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重组。一大批我们熟悉的民族国家，如法国、德国、波兰、俄罗斯、匈牙利、保加利亚……，都是在这一阶段奠定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基础。

从本质上来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这一阶段的海外扩张，也是缘自于这一气候的变化。挪威人之所以成为北欧日耳曼人中最早的海外开拓者，是因为他们所生存的那些沿海峡湾，可供挖掘的潜力最为有限。而气候变暖带来的另一个有利后果就是：高

纬度地区，适宜航海的季节变得更长，从而增加了挪威人在北极圈附近，发现冰岛、格陵兰岛的概率。问题是，气候的变化是周期性的。在进入 13 世纪后，欧洲的气温开始有下降的趋势。进入 14 世纪中叶后，气候开始明显转冷。等待欧洲人的，是残酷的“小冰河期”。

小冰河期对很多地区都造成了影响，不过身处“生存还是死亡”临界点的格陵兰岛，应该是观察这一变化最好的样本。虽然格陵兰岛的居民很难通过农牧业生产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拜“中世纪暖期”所赐，格陵兰岛上的动物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他们不仅直接为殖民者提供了食物来源，其毛皮、油脂也成为了输往欧洲的商品。在 14 世纪，格陵兰岛的欧洲移民，人口甚至已经比最初移民时，增加了 10 倍（5000 人）。然而在天气转冷之后，格陵兰人悲哀的发现，不仅眼中绿色和动物资源越来越少。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峡湾，也变得越来越危险。即便在本来就很短暂的夏天，巨大的浮冰也会不期而至，封堵港口。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以及航行风险的增加，格陵兰岛上的岛民，已经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食物了。及至 15 世纪初，因纽特人再一次成为了唯一到访岛上的人类（欧洲人不是乘船离开，就是饿死了）。

欧洲的小冰河期在 16、7 世纪达到了高峰，结束于 19 世纪。一方面因为气候环境的向好；另一方面则受欧洲人瓜分世界的浪潮驱动，维京的后代之一“丹麦人”，再次登陆格陵兰，并在岛的东南部建立殖民地（1894 年）。不过让丹麦人 2000 公里之外，直接控制岛上的居民，显然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因纽特人始终更为适应这片土地。今天生活在岛的的 6 万居民当中，丹麦移民的后代仅有 1 万左右（其余基本都是因纽特人后裔）。有鉴于此，格陵兰岛一直是以半独立的“丹麦属地”的性质留在丹麦的版图中。

挪威发现的岛屿在周边国家的流转

以当代欧洲人所遵循的“民主自决原则”，以及格陵兰岛与丹麦的地理距离来看，格陵兰岛如果独立的话，政治上并不会太困难。事实上，双方已经在 2009 年签署了协议，允许格陵兰岛随时独立出去。唯一让格陵兰人心生犹豫的因素，只是经济。要知道，格陵兰岛的一半开支，需要依靠丹麦政府补贴。一旦独立的话，就只能靠自己了。真正能够让格陵兰人下定决心的，依然是天气的变化。考虑到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地球的气候又一次开始升高。格陵兰岛有望在北冰洋可能开通的航线，以及海底资源中分一杯羹。当这一切可以变现时，丹麦也就失去格陵兰了。

法罗群岛、冰岛、格陵兰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位于北极圈内，在 12 世纪方为挪威人所发现的“斯瓦尔巴群岛”（今为挪威属地）之间的这片海域，又被称之为“挪威海”。如果北冰洋航线开通，这片横跨大西洋、北冰洋陆缘海，应该有机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了。然而中世纪时，维京人（或者说挪威人）在挪威海边缘开拓这些殖民地的行为，却并没帮助他们成就一个“挪威帝国”，也没有引起欧洲人的关注。在历史中，这些潜力有限、位置边缘的岛屿，通常只是如商品一般，在周边大国中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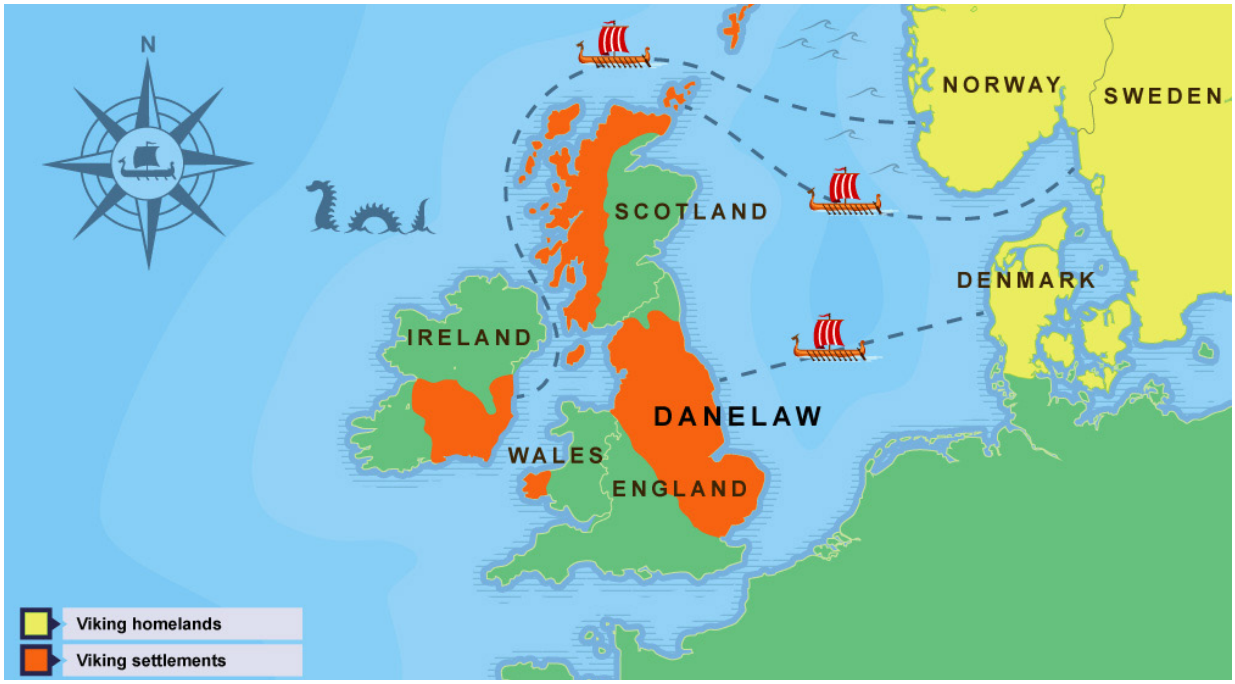
手。其中设得兰群岛在 15 世纪，被挪威人卖给了苏格兰；法罗群岛则在挪威人和丹麦人之间流转（今为丹麦自治领）。如果维京人想让欧洲文明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就必须把视线投向更温暖的南方。接下来，我们就将去看看，真正以海盗面目示人的维京人，是如何搅动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

第九章 维京人对西欧的侵扰

第一节 挪威人入侵不列颠

公元 8 世纪末，挪威维京人首先在苏格兰高地沿海地带及外岛（包括西部的内、外赫布里群岛），建立了一系列据点，然后再沿海岸线继续南下，针对不列颠群岛沿海地区，开启的征服之旅。不列颠群岛的地缘结构，我们在罗马部分就已经解读过了（参见《不列颠地缘结构图》）。

在公元 9 世纪时，大不列颠岛东南以低地为主的区域，被称之为“英格兰”，为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据有；西南及北部以高为主的地区，则分布有三个凯尔特人板块，由北向南分别是：苏格兰、威尔士、康沃尔。除此之外，英伦三岛中的另两个岛屿：爱尔兰、马恩岛，也都是凯尔特人的保留地。另一个仍旧为凯尔特人所据的板块，是英吉利海峡西南岸，法国西北角的“布列塔尼”。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大规模入侵不列颠后，部分凯尔特人渡过英吉利海峡回到了欧洲大陆，聚居于布列塔尼半岛。



维京人入侵不列颠

挪威维京人的主要侵扰对象，就是上述凯尔特人聚落区。总的来说，这部分维京人在爱尔兰、马恩岛、苏格兰高地（西北沿海地区）做的最为成功。在公元 8 世纪中叶，上述地区成为了挪威维京人的重点殖民区。土著的凯尔特人部族，也都臣服于这些维京人的霸权。以这些殖民地为跳板，从布列塔尼到葡萄牙的西欧海岸线，以及东部的英格兰地区都成为了挪威海盗的袭扰对象。

挪威人最早被英格兰人记录下来的海盗行为，是他们在公元 793 年，对英格兰东北角的“霍利岛”（ Holy Island。又称 Lindisfarne Island）的一次袭击。在那次袭击中，最让英格兰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野蛮人居然把修道院作为了袭击对象。事实上，挪威人早在设得兰群岛时，就已经和来自爱尔兰的基督教传教士打过交道了。从那时起，他们就应该发现了，那些神圣的宗教场所，也是财富和物资的聚集地。



维京人入侵不列颠

将修道院、教堂这类宗教场所，甚至僧侣本身作为渔猎的对象，无疑也进一步恶化了这些北欧人的形象。然而尽管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挪威人，很希望在凯尔特人所处边缘地区立足之后，向更为富庶的英格兰、西欧大陆进一步发展。不过他们的计划却受到了另一支北欧日耳曼人——丹麦人的阻止。事实上，大部分针对这两个地区的海盗行为，都是丹麦人所组织的。以至于在当时，欧洲人经常把维京海盗统称为“丹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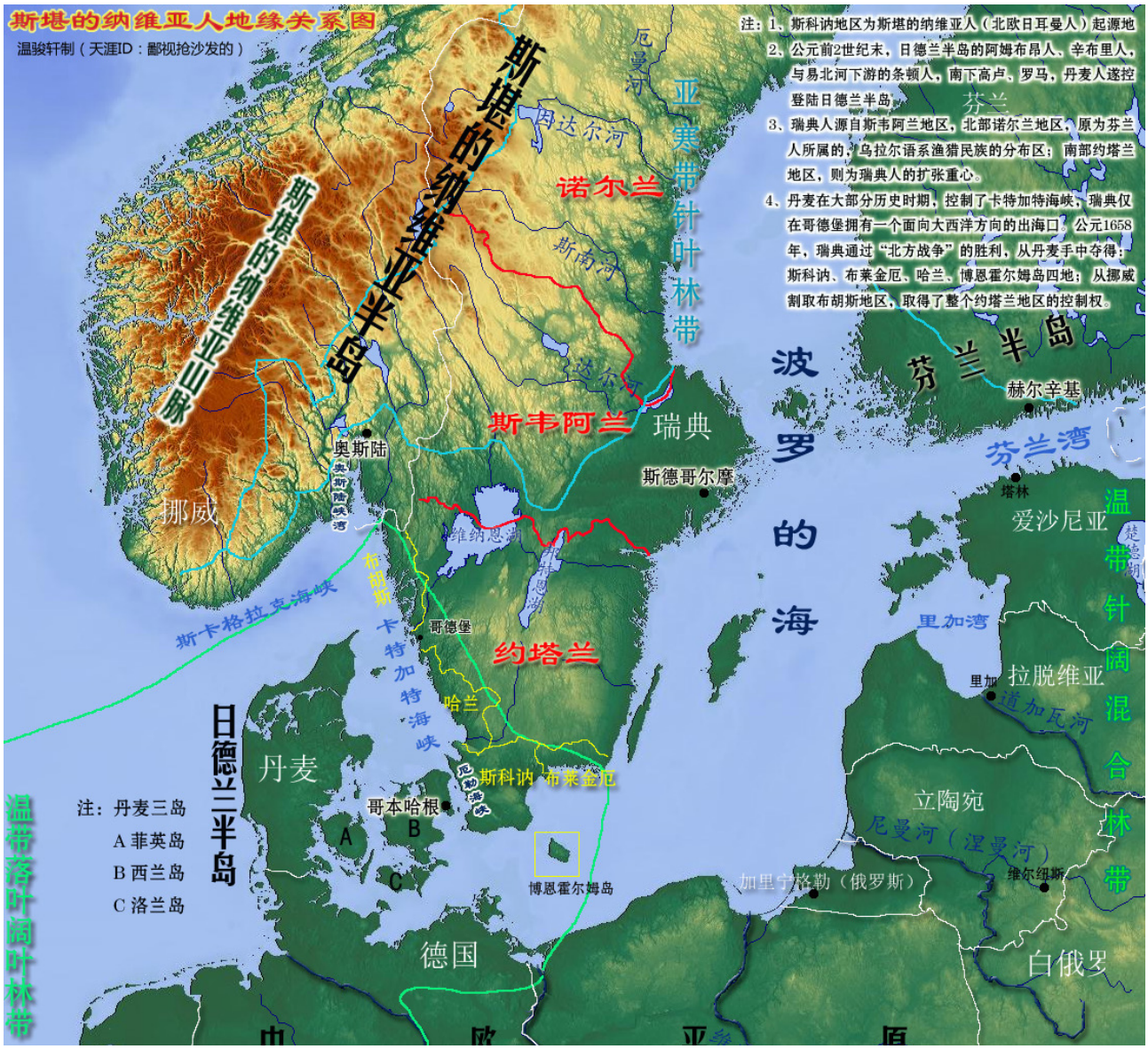
第二节 丹麦的历史地理结构

丹麦和瑞典的地理结构

在北欧日耳曼人三大板块中，丹麦人的位置得天独厚。今天看丹麦的版图，其地缘位置也是是好的。即能西出大西洋，又可东顾波罗的海；北部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隔海峡相望，南部又与欧洲大陆无缝对接。事实上在 1000 年前的维京时代，丹麦的结构要比现在更加丰满。现在的丹麦，版图主要分为二个部分：日德兰半岛（大部）以及东部呈倒“品”字型排列的“菲英岛”、“洛兰岛”、“西兰岛”三个岛屿（可称为“丹麦三岛”）。这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丹麦 = 日德兰，或者说丹麦是一个核

心区在日德兰半岛的大陆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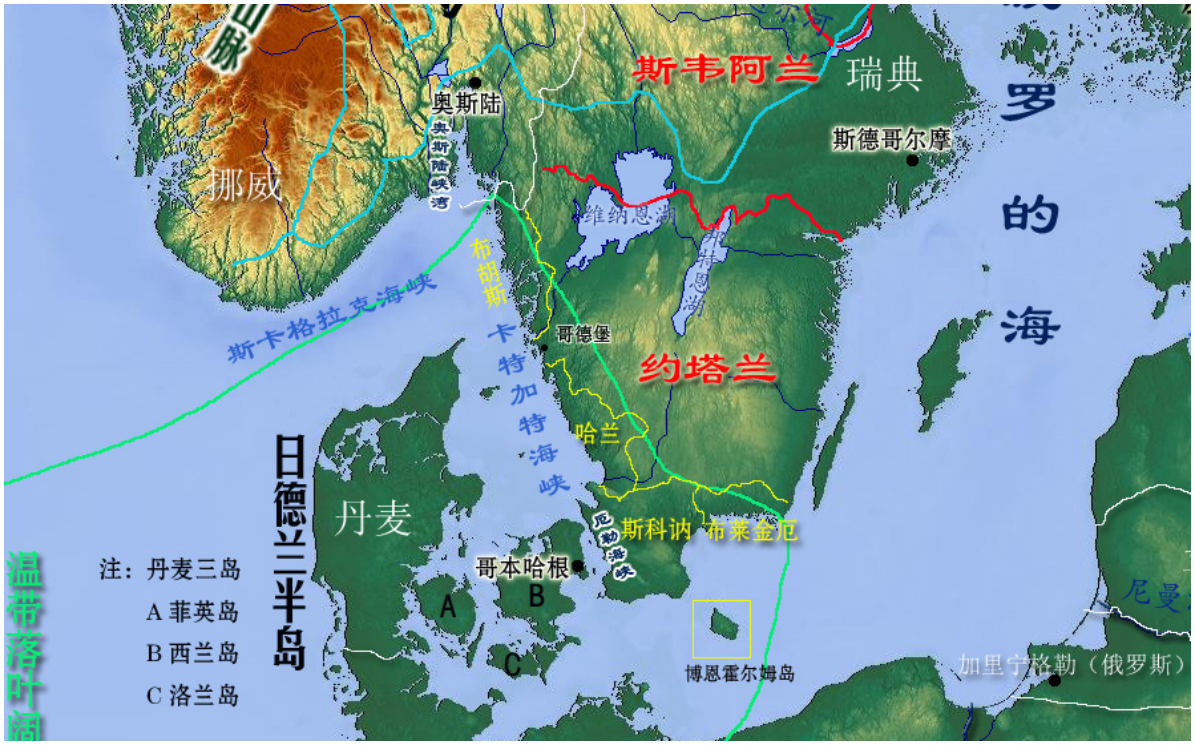
然而日德兰半岛却并非是丹麦人的地缘中心，丹麦人最为核心的部分其实是西兰岛。因为在大部分历史时间中，与西兰岛隔厄勒海峡相望的瑞典南部，也是丹麦人的传统势力范围。这其实也能解读，丹麦首都为什么会在国土的最东部的“哥本哈根”（西兰岛东），而不是在日德兰半岛，或者位置更为中心的菲英岛上。



斯堪的纳维亚人地缘关系图

今天的瑞典，领土虽然贯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侧的低地区（相对挪威的地势），但瑞典人并非一开始就拥有这些土地的。总的来说，瑞典内部可以由北至南划分为三个历史地区：中北部的“诺尔兰” 地区、中南部的“斯韦阿兰” 地区，以及南部的“约塔兰” 地区。在 1000 多年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还处在部族分裂状态时，瑞典人所控制的，只是今天首都“斯德哥尔摩”所在的“斯韦阿兰” 地区。今天瑞典国名的原意，就是“斯韦阿兰人的王国”（Svea Rike）之意。在地图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面对芬兰湾的那个突出部，也就是最早的“瑞典”了。

斯韦阿兰地区的气候特点，与东斯拉夫人所在的东欧地区类似，都属于“亚寒带针叶林气候”，向“温带阔叶落叶林气候”区过渡的“针阔混合林气候”区。其与北部“诺尔兰地区”的地缘分割线，其实就是“亚塞带针叶林带”在半岛上的南部边界。那些从亚洲迁徙而来的，隶属乌拉尔语系的“乌拉尔人”，会更为适应针叶林带的环境。当然，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上，日耳曼人在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后，把先一步到来的乌拉尔人，挤出了相对舒适的温带森林地区。而在随后的历史中，欧亚大陆这些形同鸡肋的亚寒带针叶林带，也在殖民浪潮中被欧洲人尽数瓜分。



斯堪的纳维亚人地缘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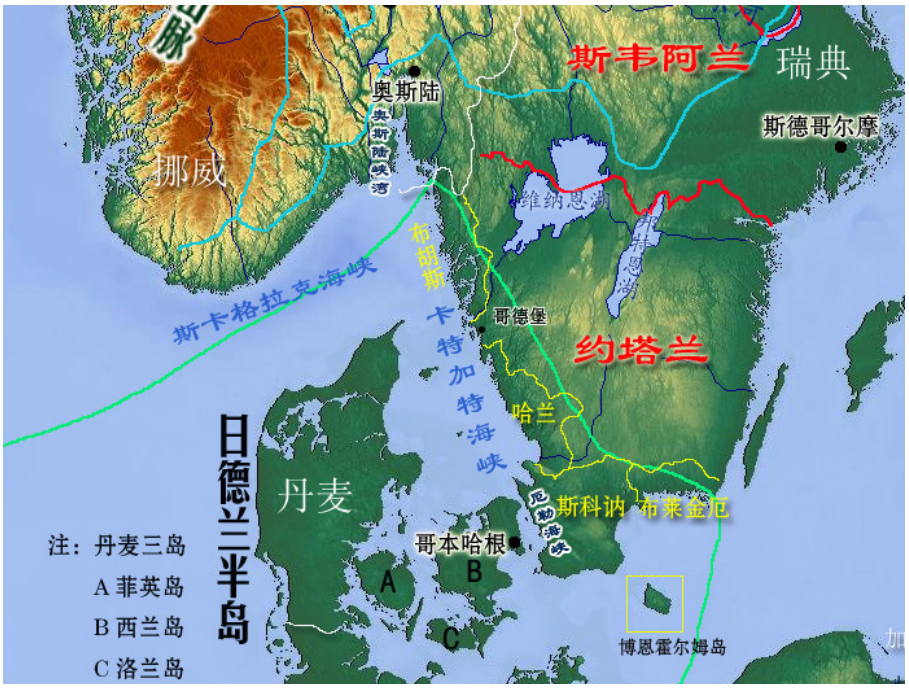
对于瑞典人来说，人口潜力有限的诺尔兰地区并非扩张重心，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是南部气候最好，位置最接近欧洲大陆的“约塔兰地区”。这其中地缘位置最为重要的，又是整个半岛最南端，与西兰岛相对的那部分“斯科讷”地区。亲缘民族在历史的某一个时期，总是会有一个共同起源地的，斯科讷地区就是北欧三大民族的共同发源地。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丹麦、瑞典、挪威三族，是从斯科讷地区分别向三个方向扩张的。从渊源上看，丹麦人倒的确也是可以被归入“斯堪的纳维亚人”范围的。

丹麦人失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领土

丹麦人应该是在公元前 2 世纪末，日德兰半岛的阿姆布昂人、辛布里人，与易北河下游的条顿人一起南下，发动那场导致罗马变革的“辛布里战争”后，才得以填补他们在日德兰半岛留下的真空的。对于丹麦人来说，这也是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契机。如果丹麦人能够同时控制日德兰半岛、丹麦三岛，以及约塔兰地区（最起码要有斯科讷地区），这些板块之间的航道，就可以被统称为“丹麦海峡”，而丹麦人也就牢牢

学制了，波罗的海与大西洋之间的战略通道，并由此成为地区霸主。

上述板块中任何一个板块的缺失，都将影响丹麦的地缘价值。这与奥斯帝国虽然最后几乎把欧洲领土丢完了，却也要竭力保住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所在的“东色雷斯地区”是一个道理。试想一下，如果土耳其人只能控制海峡的东侧，今天的欧洲人还会高看他们一眼吗？（以至于将土耳其拉入北约）。



斯堪的纳维亚人地缘关系图

日德兰半岛与约塔兰地区之间相隔的海峡，被称之为“卡特加特海峡”，西兰岛与斯科讷地区之间，则是“厄勒海峡”。对于瑞典人来说，不管在约塔兰地区获得再多领土，只要不能控制“卡特加特——厄勒海峡”东海岸线，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海洋国家。然而在17 世纪中叶，瑞典人通过“第一次北方战争”把丹麦人彻底赶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前，从斯科讷到奥斯陆峡湾的这条海岸线，基本都为丹麦人和挪威人所控制（哥德堡以南的海岸线，以及斯科讷地区为丹麦区）。

失去大西洋通道控制权的丹麦也不再有称雄北欧的本钱了。如果说土耳其人，还能把小亚细亚半岛与巴尔干半岛之间的水道（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称为“土耳其海峡”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地图上能看到的“丹麦海峡”，也就只能出现在格陵兰岛与冰岛之间了。悲剧的是，冰岛在 20 世纪中叶，已经从丹麦人手中独立；而格陵兰岛可能不用等到 21 世纪中叶也会独立。到那时，再把这条离丹麦本土 1000 多公里的水域，称之为“丹麦海峡”，就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了。

当然，在维京时代，丹麦人还是不折不扣的主角。如果把丹麦在斯堪的纳半岛的历史领土圈出，并叠加上气候线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丹麦所控制的，包括斯科讷地区在内的“卡特加特——厄勒海峡”东部沿海地区，“恰好”与日德兰半岛、丹麦三岛一样，属于气候条件最优的“温带落叶阔叶林”气候区。这自然不是巧合了。丹麦人要的是通过大西洋通道的控制权，获得超然于竞争对手的地缘优势，而位于面对大西洋的这条战略通道，本身又能接受更多的大西洋暖流的影响。

了解丹麦的历史地理结构，有助于帮助大家明白，为什么瑞典人没有参与发生在

大西洋上的那场“维京盛宴”，而是另辟蹊径的在东欧平原，开启了一个“罗斯时代”。至于综合优势明显的丹麦人，在维京时代又获得了哪些成就，我们接下来再接着解读。

第三节 丹麦人侵扰欧洲大陆

丹麦人与查理曼帝国的冲突

在公元 8、9 世纪相交的时节，变化为“维京海盗”的北欧日耳曼人，还远不是欧洲地缘政治舞台的主角。此时全欧洲的目光，都被一个叫做“查理”的西欧日耳曼人吸引住了。公元 800 年，法兰克国王“查理”，从罗马从教皇手机中接过了“罗马皇帝”的桂冠，变身成为“伟大的查理”（查理曼）。与此同时，法兰克人也已经基本搞掂了易北河——莱茵河下游之间的萨克森人，站在了丹麦人的门口。尽管向易北河以东地区扩张的价值，要远大于纬度偏高、地域狭窄的北欧，但如果能拿下日德兰半岛的话，查理曼帝国的版图将更为完整。更何况在如日中天的大帝级征服者看来，没有哪块土地是不能征服的。

在公元 9 世纪初，丹麦人与查理曼先后进行了几场战争。就战场上的结果来看，双方互有胜负。总的来说，丹麦人成功的让法兰克人放弃了吞并日德兰半岛的想法，为今天丹麦领土的范围奠定的基础。尽管以法兰克人的国力来说，一定要拿下日德兰半岛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问题在于，这样做是否划算。在查理曼帝国的版图中，最难被搞掂的，就是日德兰半岛之南的“萨克森人”。160 多年后，也正是萨克森人带领德意志人，建立了脱离法兰克体系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萨克森地区不稳的情况下，以之为基地去尝试吞并日德兰半岛并不明智。

在欧洲这片土地上，强大而又统一的帝国，往往在一世之后便面临分裂。而触发分裂的导火索，往往又是伟大君主本身。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统治一个地缘结构复杂，国民语言、文化、民族存在巨大差异的帝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分而治之”看起来是唯一能够可行的方案。具体的方法，通常是将土地平等的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同时期的中央之国，是赢家统吃的“中央集权”制）。于是“大帝”们的最高成就，其实也只是让自己的血脉，成为了帝国内部各独立板块的最高统治者。在这种“封建”结构下，“罗马皇帝”称号形同虚设，即使谁天时、地利、人各皆备，能够以强力手段让其它贵族表示臣服，也无非再换来“一世帝国”罢了。

查理曼死后，帝国很快便陷入了权力争夺的混乱状态，以至于在 9 世纪中明确用协议的方式，将帝国分割为东、西、中三个法兰克王国。当查理曼的子孙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方身上时，丹麦人自然也开始了海外扩张之旅。就丹麦人的位置来看，他们会比挪威人，更有机会把海盗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做大的。

丹麦人沿海洋和河流参透欧洲大陆

以日德兰半岛为跳板的丹麦人，最初是以欧洲大陆为攻掠重心的。通常情况下，

丹麦海盗会沿海岸线前行，然后攻击河口繁荣的港口地区。仅仅 20 年时间（公元 840——860 年），整个欧洲大陆的大西洋海岸线，就都遭到了丹麦人袭扰。这些把维京精神发扬光大的丹麦人，甚至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地中海西北海岸线，一路攻掠至意大利西北部。也可以说“查理曼帝国”的海岸线，几乎全部遭遇到了维京人的袭扰。更为恐怖的事，受害的并不仅仅是沿海城镇。由于这一时期是欧洲海军的黑暗时代（日耳曼人在陆地争夺西罗马帝国的遗产），维京人不仅凭借战斧以及强悍的作风，在陆地遭遇战中取得优势，更在水上如入无人之地。



维京人侵扰欧洲示意图

这些北欧人的造船技术非常高，他们所制造使用的船只，通常被称之为“龙头战舰”。其最大的外部特征，就是狭长的舰身以及两头翘起舰首。这种设计使得维京人的船只不仅行动迅速（还不用调头），而且还吃水浅，使得他们能够很方便的从河口地区，沿河向内陆地区渗透。正因为上述特点，整体地势平坦的法国成为了重灾区，其境内五大河流：莱茵河、塞纳河、卢瓦尔河、加龙河，乃至面朝地中海的罗讷河，都成为了丹麦维京人深入其境的“帮凶”。

尽管内部因为分裂，而造成了一些内耗，但法兰克人毕竟刚刚统一了西欧大陆，不仅军事上处在高效期，更能调配更多的资源来应对外部威胁。在维京海盗的威胁下，

法兰克人的军事战术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一是重甲骑兵成为了唯一能够与维京战士正面对抗的兵种，并获得了高度重视（同时轻骑兵也利用他们的机动性，不断的反袭得手后的维京人）；二是为了应对海盗的突然袭击，欧洲（特别是法国）的封建主们开始兴建城堡。当最具攻击性的重甲骑兵，与最具防御力的城堡战术结合在一起后，欧洲人在面对维京人时，也终于不再那么恐慌了（后来城堡和重甲骑士，也成为了欧洲中世纪的两大标志）。



维京海盗船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以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来分裂这些“北方人”，但这些海盗行为却并不能算是国家行为。大多数情况下，一些小领主甚至平民，只要能够征集到 1、200 人（包括相应的船只和补给），就可以开始他们的海盗之旅了。然而由于法兰克人开始越来越有效的，应对海盗的进攻，维京人获得胜利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了。一方面，小股维京人开始由更高级别的领主（乃至国王）统一在一起，发起更大规模的行动；另一方面维京人也开始学习使用马匹，以增加自己在陆地上的机动性。

在法兰克人的阻击下，丹麦人在整个公元 9 世纪，都没能在欧洲大陆建立稳定的殖民点（这是海盗活动最为猖獗的世纪）。相比之下，他们在不列颠的征服要显得成功的多。如果说从边缘地区入手的挪威维京人，主要威胁的以爱尔兰为跳板的凯尔特人地区的话，那么丹麦人的目光则放锁定在了英格兰。

第十章 丹麦人入侵并殖民不列颠

第一节 英格兰的七国时代

英格兰人一般把自己建立统一“英格兰王国”的历史，上溯到公元 927 年。然而如果不是因为丹麦人的话，这个日期本来可以再提前 100 年的。公元 5——8 世纪，入侵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整合为了七个国家，史称“七国时代”。公元 9 世纪初，英格兰西南角的“韦塞克斯”（今英国多塞特郡一带）开始崛起，并用武力和外交方式，迫使其它王国承认它的宗主权。韦塞克斯的国王，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自称“不列颠统治者”的英格兰君主（公元 829 年）。

拥有边缘优势的“韦塞克斯”，统一的英格兰的过程，让我们不禁想起了 1000 年前的“秦国”。不出意外的话，英格兰将在韦塞克斯人的整合下，进一步融合成为真正的统一的“英格兰王国”，就像查理曼 30 年前在西欧大陆做的那样。然而这个时机实在是太不巧了，因为在英格兰人需要一点时间来完成内部整合时，大批维京人开始登陆了。



维京时代的不列颠

所谓英格兰七国包括：萨塞克斯（南撒克逊）、韦塞克斯（西撒克逊）、肯特、埃塞克斯（东撒克逊）、东盎格利亚、麦西亚、诺森布里亚七国。在大历史的视角中，统一的英格兰才是地缘政治舞台的主角（就像日本一样），所以当下并不会花时间去细细解读盎格鲁——撒克逊人内部的这些恩怨。对英国历史（或者《冰与火之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附图中慢慢品味七国的地缘关系。

韦塞克斯是撒克逊人建立的国家，因此也被称之为“西撒克逊”。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韦塞克斯并非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它能够迅速崛起，直接受益于对康沃尔的征服。在之前的内容中，

不列颠群岛及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被我们划出了至今还保留有部分凯尔特文化的 6 个保留地。分别是：苏格兰、爱尔兰、马恩岛、威尔士、康沃尔，以及布列塔尼。除了孤立于欧洲大陆西北角的“布列塔尼”以外，康沃尔应该是最让很多人感到陌生的凯尔特人地区了。在凯尔特人的保留地中，康沃尔的面积仅比马恩岛大。问题是，马恩岛的四面环海的形态，能够帮助他们抵御外来文化的侵扰。相比之下，与英格兰陆地相连的康沃尔，看起来并不像有太多机会保持政治、文化的独立。

从地缘位置上看，位于大不列颠半岛南部的“西撒克逊人”，有充分的理由吞并康沃尔。解决了西面这个凯尔特人邻居，韦塞克斯王国在向东、北方向开始统一之战时，就无后顾之忧了。这与春秋时，秦国在前往中原争霸前，先在西、北方向针对边缘“西戎”进行战争、扩地千里的做法相一致（史称“秦霸西戎”）。不过不管是秦人还是西撒克逊人，他们在西线开辟战场的目的，都不仅仅是解决后顾之忧那么简单，更多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争霸战争，储备战略资源。

第二节 康沃尔地区的沉浮史

康沃尔丰富的铜矿和锡矿资源

从地缘战略层面来看，秦人最终之所以能够夺取天下，很大程度是因为抢得了“粮仓”——成都平原。然而丘陵密布、地域狭小的康沃尔，农业上并没有什么潜力，它最为让人垂涎的资源是铜矿和锡矿。在冶铁术成熟之前，铜和锡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金属了。将这两种金属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起所制成的合金，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发明——青铜。相比金、银这类单纯充当货币和奢侈品的贵金属，青铜要更加有价值得多，不仅能够极大提高生产力，也能让战士更加有战斗力。事实上，即使在铁器已经得到广泛运用的中世纪，铜、锡，包括青铜仍然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商品。

康沃尔几乎是英国唯一出产铜矿和锡矿的地区，仅此一点，就已经足够为康沃尔的土著，拥有巨大财富了。事实上，康沃尔的矿藏并非只满足于本地使用。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康沃尔的矿产，尤其世界整体储量较少的锡矿，就已经出口欧洲大陆了。至于康沃尔的铜、锡矿到底有多少，有一个数字倒是可以提供参考。据称在上世纪中叶，康沃尔生产的铜、锡，一度曾经满足了世界一半的需求。

尽管坐拥巨大财富，能够让康沃尔人有资源对抗外来入侵，但康沃尔半岛地力、人口潜力有限短板，还是让居于其上的凯尔特人，时刻面临着被外来族群吞并的风险。从战略层面上看，康沃尔人之所以能够在罗马和七国时代幸存下来，是因为一旦面临入侵风险，周边其它凯尔特人地区可以派人前来支援。当然，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为康沃尔人得到这种战略支援背书的，是他们手上的矿产资源。然而当历史运行到 9 世纪初时，不列颠群岛的形势，却开始朝着不利于康沃尔人的方向发展。打破这



康沃尔废锡矿遗址

一平衡的，就是那些令人闻风丧胆的维京人。

韦塞克斯征服康沃尔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以设得兰群岛为跳板的挪威维京人，在 8 世纪末、9 世纪初，开始沿海路向南扩张。其中苏格兰（西北沿海地区）、爱尔兰、马恩岛等凯尔特人地区首当其冲。尽管康沃尔因为位置的原因，在西、北线暂时承受的压力要小些，但当“西撒克逊人”从东线攻击而至时，康沃尔人再想从其他凯尔特人地区获得外援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在海盗袭击愈发频繁的时节，那些原本可以跨海前来增援的凯尔特人部落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当他们当中的青壮年为康沃尔人保卫家园时，谁又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维京时代的不列颠

正是借着康沃尔人缺乏外援的契机，韦塞克斯完成了对康沃尔的征服，并让这个王国一跃成为了七国当中的最强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康沃尔的臣服只能算是政治上的妥协，并不意味着西撒克逊人，或者英格兰人就替代凯尔特人，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尽管面临英格兰文化的强大压力，康沃尔人还是竭力把康沃尔语（凯尔特语族）的母语地位，维持到了 18 世纪。今天康沃尔的居民，仍然还是凯尔特人后裔。进入

20 世纪后，为了增强民族意识，康沃尔人也一直在致力于康沃尔语的复兴工作，并且卓有成效。

康沃尔人之所以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很大程度与采矿业（包括寻找矿脉）是一门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有关。如果英格兰人一定要进行种族清洗的话，势必会影响这些战略资源的产量。而无论西撒克逊人，还是后来其他的征服者，都不会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事实上在康沃尔，矿工（尤其是锡矿工人）的地位一直都比较高，并且形成了天然垄断的行会。在中世纪，锡矿工人甚至可以免税和免服兵役。拥有这样一份有钱有面子的工作，如果不想把技术和职业传承给自己的后代，倒是不可思议的了。

今天的康沃尔，经济支柱已经不再是采矿业，而是旅游业了。进入 18 世纪后，由于殖民地采矿业兴盛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以及挖掘难度的增加（矿坑越来越深），康沃尔的矿山在成本上不再具备优势了。大量康沃尔技术工人，开始前往澳洲、北美等地“淘金”。康沃尔语的势微，其实也与这个大背景有关。当康沃尔人需要离开故土，在大英帝国的其它地区讨生活时，英语也就比康沃尔语更加重要了。同样的，康沃尔语从濒临灭绝到看到复兴可能，也与 20 世纪当地的采矿业一度复兴有关。

解读康沃尔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探究“韦塞克斯”崛起的原因，更在于康沃尔地区的沉浮史，最起码能够在地缘方向给我们两个启示：一是当一个地区过于依赖一项资源时，战略上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技术上，只有一个拥有“全产业链”以及巨大内部市场的政治体，才有机会最大限度规避这一风险。事实上，近代欧洲那些老大帝国的建立，也都是基于这一需求；二是一个“少数民族”能否与“主体民族”相融合，又与当地的经济结构有关。如果当地的经济与周边地区依存度不大，甚至有自身的垄断优势，那么“少数民族”就会有倾向于维持自己独立群体的特征；反之，则会更原意模仿甚至成为主体民族的一员。至于说康沃尔的经济教训，到底可以为国内外哪些地区所引以为戒，就留待大家自己去思考了。

第三节 维京人登陆英格兰地区

挪威人沿埃文河攻掠英格兰

最先搅乱英格兰统一大业的并非丹麦人，而是在爱尔兰、苏格兰建立沿海据点的挪威人。虽然在大多数人印象中，维京人就是一群魔鬼般的海盗。不过其实在那个年代，海商跟海盗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维京人也并不总是用斧头来解决问题的。比如你也可以缴纳一笔保护费，让自己的村落甚至国家免受海盗的“洗礼”（相当于中原王朝曾经向游牧民族缴纳过的“岁币”）。

把挪威人引入英格兰的，是威尔士人。实际上，威尔士与韦塞克斯王国并不接壤，双方之间隔着一个叫做“布里斯托尔湾”的海湾。注入这个海湾的，是英国境内流



维京时代的不列颠

程最长的河流——塞文河（其实也只有 350 公里）。塞文河源出坎布里亚山脉东北麓，原本也是威尔士人的领地。不过早在罗马时代，威尔士人就被迫退入坎布里亚山脉，依托边缘那些沿海低地生存了。从地缘关系上看，七国时代占据塞文河流域的是“麦西亚王国”。纯粹跟一个王国 PK，有坎布里山脉庇佑的威尔士人，还是能够与之抗衡的。问题是，在西撒克逊人征服康沃尔、开始结束七国时代时，威尔士人的处境就十分的不妙了（事实上，针对威尔士人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为了避免步康沃尔人的后尘，威尔士人让挪威人相信，大家合作能从英格兰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次威尔士人主动充当带路党，战略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希望维京人能给英格兰人的统一大业添乱。进入布里斯托尔湾的维京人与从海湾北岸出击的威尔士人汇合，沿着塞文河的上游支流“埃文河”，一路攻掠到了英格兰中部。尽管韦塞克斯并不是直接攻击目标，但作为“不列颠统治者”的西撒克逊人，自然是不能坐视威尔士人和挪威人，在英格兰如入无人之境的。最终势头正盛的西撒克逊人，还是在埃文河上游击退了威尔士——挪威联军的攻击（公元 838 年），解决了这场西线危机，但这还不是英格兰人遇到的最大挑战。因为很快，丹麦人就将从东线登陆英格兰的土地了。

丹麦人占领大片英格兰领土

英格兰西高东低的地势，决定了它的大部分河流，都是至西向东注入北海的。这其中最重要，也是位置最好的，就是泰晤士河。在七国分立的时代，伦敦以西的泰晤士河是韦塞克斯王国与麦西亚、埃塞克斯王国的分界线（伦敦则归属于埃塞克斯）。公元 9 世纪 50 年代，丹麦人开始出现在泰晤士河口。这些划着龙头船的海盗，以河口的谢佩岛为跳板，不断侵扰泰晤士河下游地区，包括伦敦也多次遭到洗劫。这意味着，任由事态发展的话，韦塞克斯王国的安全，也将直接受到这些丹麦人的威胁。

相比挪威人，丹麦人的来势更为凶猛。不过处在上升期的西撒克逊人，还是成功阻止了丹麦人，向泰晤士河以南扩张的想法。问题是英格兰有足够的海岸线，让这些丹麦海盗寻找薄弱环节。身为霸主的西撒克逊人，虽然要肩负帮整个英格兰抵御外敌



维京时代的不列颠

的大任，但在面对海上威胁时，西撒克逊人自己也有漫长的海岸线需要防守。在这种情况下，丹麦人选择的突破口如果远离韦塞克斯的话，要是想帮中北部的王国抵御外敌，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对于维京人来说，有较长、较多河流相连的海湾，是最理想的登陆地点。维京人不仅可以在海湾建立据点，更能通过这些河流深入内陆，扩大自己的劫掠范围。喇叭状的泰晤士河口，并非是唯一适合登陆的地点。在英格兰中部，最起码还有两个类似的湾口：瓦士湾（沃什湾）、亨伯湾都符合维京人的要求。事实上，当年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正是透过此类路径，登陆英格兰的。其中泰晤士河口，及英格兰南部海岸线，是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登陆区域（建立了东、西、南三个撒克逊王国，以及朱特人的肯特王国）；而沃什湾和亨伯湾，则是盎格鲁人的切入端口。七国当中面积最大的诺森布里亚、麦西亚，以及东部的东盎格利亚，就是盎格鲁人建立的国家。

公元 9 世纪 60、70 年代，丹麦人在英格兰东北部，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埃塞克斯、东盎格利亚、麦西亚、诺森布里亚的大片领土，都沦为了丹麦人的占领区。最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丹麦人已经有想法摆脱“海盗”这份不太稳定的职业，而把比丹麦气候、农业条件更好的英格兰，作为殖民地经营了。这变化宛如当年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初只是被罗马人当成雇佣军引入岛上，却最终变成一场民族大迁徙一般。

第四节 阿尔弗烈德大帝抵御丹麦人

在抵御丹麦人渗透的过程中，英格兰也诞生了一位唯一的“大帝”级君主——阿尔弗烈德大帝。其实以“大英帝国”后来在殖民时代的成就，应该是能够成就很多“大帝”的。身处外岛的英格兰，终归是没有办法进军罗马（或者从君士坦丁堡接过衣钵），

也就很难在逻辑上，继承罗马帝国的遗产了。后来在 19 世纪末，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终于想到了个办法，来圆王室的皇帝梦。公元 1877 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印度女皇”，这一帝号一直延续到 1948 年，印、巴独立之后方告终结（女皇之后改称“印度皇帝”了）。

当然，君主们到底给自己加什么头衔，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鉴别一个政治体是否是“帝国”的标准，也不在于某位君主是否正式称帝。那么“阿尔弗列德大帝”究竟有什么成就，让英国人如此推崇他呢？

从领土面积来看，被英格兰人冠以“大帝”（伟大的）前缀的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 从 871 年至 899 年在位），可能是成就最小的大帝级人物的。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仅仅是让泰晤士河流域大部（不包括埃塞克斯王国部分）、塞文河流域免受丹麦人的侵入。至于英格兰的东北部，则为大批丹麦移民所充斥。英格兰的东北地区，也由此诞生了一个分裂的地缘标签——丹麦区。

大体上，你在英格兰西海岸的利物浦与伦敦之间连条直线，就可以视作丹麦人与西撒克逊人最初所认可的势力分割线了（双方曾在公元 886 年有协议分割）。不过西撒克逊人，在 30 年后又夺回了埃塞克斯的控制权，因此真正稳定的丹麦区实际上建立在盎格鲁三国的废墟上的（诺森布里亚、麦西亚、东盎格利亚）。单纯看这样的结果，会给人一种感觉，撒克逊人借丹麦人之手，把统一进程上最大的对手给消灭了。



维京时代的不列颠

从客观情况来看，丹麦人的入侵对试图统一英格兰的韦塞克斯王国来说，也的确起到了这个的效果。在丹麦人大举入侵之前，西撒克逊人还只能算初步取得了英格兰的霸权。要想完全消灭其它六国的王室，统一王权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即使不考虑民族渊源，大家很容易从附图上感觉到，被“丹麦区”所摧毁的诺森布里亚、麦

西亚两个盎格鲁王国，将是西撒克逊人统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丹麦人的入侵，不仅帮西撒克逊人消灭了两个最大的对手，更让全体英格兰人心中，消除了原有的狭隘民族藩篱，有了民族、权力统一的强烈欲望。



丹麦人和韦塞克斯人的战斗

阿尔弗雷德之所以被英格兰人视为最伟大的君主，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丹麦人势力最盛的时期，没有让英格兰完全陷于丹麦人之手；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他对在制度、文化、法律上的建树，为英格兰形成自己的文明，奠定了基础。不过如果没有上述“天时”，这一荣誉也很难落在这位君主身上的。所谓“时势造英雄”之说的意义便在于此。然而如果英格兰日后没有被西撒克逊人统一的话，这些努力也就没有意义了。

以大不列颠岛的地理结构来看，并不支持在英格兰低地长期存在分裂状态。丹麦人介入后所形成的南北对峙状态，与之前的七国分裂之态，最终都会结束的。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以谁为主罢了。如果最终是丹麦人把盎格鲁——撒克逊人融合掉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再看英格兰历史，就会在公元 8 世纪与维京历史相对接；而如果是后者把前者融合掉的话，那么英格兰人登陆不列颠的历史，就仍然可以对接到罗马帝国放弃不列颠时期。

第五节 不列颠岛上的民族融合问题

不列颠日耳曼人和丹麦人的融合

可以说，民族融合问题几乎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反复发生过，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也吸收了罗马人、凯尔特人的成分进来一样。总的来说，在谁把谁融合掉的问题上，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会发挥影响：一是文明程度高低。所谓人往高

处走，文明程度低的民族，会更原意接受层级高民族的生存方式；三是人口多少。通常情况下，文明程度高、人口有压倒性一方的族群，即使在政治上属于被征服方，也能够在数代之后同化掉对方。比如被视为奇迹般延续了数千年传承的华夏民族，就是这种情况；三是政治优势。如果各方向差异都不大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总会有更多机会的。

最后一点是种族差异。种族相近的族群，融合起来要容易的多。反之，则会遇到较大困难。在这一问题上，印度就是个典型案例。印度的种姓制度之所以将影响力延续至今，根本原因就在于最初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无论在文明层级还是在人口数量上，相比那些黑皮肤的印度土著，都明显处于劣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凸显自己的种族优势，并设立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成为了雅利安人自我保护的方式。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内部分裂明显的印度。

就盎格鲁——撒克逊人登陆不列颠时的情况来看，文明程度显然是不高的。不过在大批罗马人退回大陆的情况下，源源不断输入的日耳曼人，在人口数量上很快树立了优势地位。当然，罗马人留下的空间，本来完全可以由之前退入高地区的凯尔特人来填补的。问题是留在岛上准备自治的罗马人，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而最初出现在岛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是这些罗马人主动引入，对抗凯尔特人（包括其它觊觎不列颠的欧洲日耳曼人）的雇佣军。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尽管留守罗马人最初引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动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被帝国抛弃的情况下），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让后者在岛上继承了罗马帝国的遗产，为自己通过移民树立人口优势（并提升自己的文明层级）赢得了时间。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丹麦人有没有机会抓住类似的战略机遇。

首先，登陆不列颠的丹麦人，完全是以入侵者的形象出现的。这意味着，这些维京人在试图反客为主的过程中，不仅得不到土著势力的帮助，反而会遭遇到英格兰人的强烈反抗；其次，以中世纪的标准来看，已经基督化了的英格兰人，显然比被视为文明秩序破坏者的丹麦人，要更有优越感；第三人口问题，丹麦人固然可以源源不断的，把他们因中世纪暖期影响，而多余出来的人口送入英格兰，但问题是，英格兰地区也是这一气候的受益者（本身条件越好，基数越大的地区，人口膨胀的越厉害）。更何况盎格鲁——撒克逊人此时并不像当年的罗马人一样，大量迁回欧洲大陆，而是正处在内部统一的进程中。在这种情况下，丹麦人并无法在人口上占据优势。

凯尔特人的种族特征

唯一对丹麦人比较有利的，似乎只有种族问题了。双方共同的日耳曼人出身，使得彼此在外貌、语言等方面，有更多的共同点。相比之下凯尔特人就显得异类了，语言上，他们归属于独立的“凯尔特语族”（另两者属于“日耳曼语族”），不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由丹麦人融合起来，技术难度都更大；另外，尽管大家都属于高加索人种，但凯尔特人却有着与日耳曼人明显不同的种族差异，那就是“红发”。



凯尔特人后裔 1（儿童 - 姜黄发色）



凯尔特人后裔 2（红铜发色 - 红发女郎）

一提到红发，估计很多人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火红头发、热情奔发的“红发女郎”形象。不过现实的情况是，如果你真看到这么红的头发，基本都是染发的结果。真正的天然红发，实际上是呈“姜黄”色或者“红铜”色。尽管天然红发，很多时候也被不知就里的亚洲人，归类为广义金发，但欧洲人却很容易识别出彼此的异同。由于凯尔特人的弱势地位，在中世纪的欧洲，红发人一直饱受歧视。同时这一独特的种族特征，客观上也成为凯尔特人自我识别、自我保护创造的条件。

另一个不太有利于凯尔特人的种族特质，倒是当时的欧洲人不易察觉的。也就是他们的皮肤实在是太白了（并且容易产生雀斑），相比其它族群更容易被晒伤。以至于这个族群成为了世界上，最容易患皮肤癌的群体。纵观历史，凯尔特人一直没有在有强烈阳光照射的地中海气候区有所作为，与此不无关联。事实上金发人对阳光的抵抗力也同样不强，以至于日耳曼人虽然在地中海周边地区取得过政治上的胜利（包括其它向低纬度迁徙的雅利安人），但最终能够留存下来的后裔，基本都不可避免的杂合成深色头发了。

需要说明的是，红发和金发基因都是隐性基因。虽然隐性基因在杂合后，无法表达出自己的外部特征，但除非携带这种基因的人，都同时丧失了生育能力，否则它们是不会消失的。简单点说，两个带有同样的浅发色基因的人，即使自己本身都是黑发，后代中也有可能出现金发或者红发等发色。（另外，浅发本身不是稳定的，红发和金发随着年纪的增长都会有变化。比如金发，成年后会变深，甚至变黑。红发变深后，有时看着就像金发了。）好了，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丹麦人与盎格鲁 - 撒克逊人相融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与爱尔兰人或者苏格兰人了。只不过，

到底谁能够把谁融合，就要放在一个更长的时空中来看了。

所谓地缘影响，是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空才能反映出来的。从上述分析大家也能感受到，已经有了统一民族意识的英格兰人，比丹麦人更有地缘优势。整个 10 世纪上半叶，阿尔弗雷德的后代们（韦塞克斯王朝），都在为收复丹麦区而努力着。半个世纪后（公元 954 年），英格兰人终于取得了初步胜利，迫使“丹麦区”承认韦塞克斯王室的最高统治权。不过，英格兰人与丹麦人在不列颠的融合之路才刚刚开始，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

第六节 维京人入侵对苏格兰地区的影响

皮克特人和布立吞人的分布区域

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么一个弹丸小岛上的故事，到底有没有必要花时间去研究。不过影响力这种事情，从来不是单纯以体量来衡量的。鉴于后来的大英帝国对世界近代历史，造成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从地缘角度研究英格兰民族的形成，其意义本身并不会比探究希腊、罗马文明的形成要小。

说到英格兰，就不得不提它那如影随形的冤家“苏格兰”了。丹麦维京人对不列颠的入侵，无疑对英格兰的历史进程造成了重大影响。难倒苏格兰就可以不受影响吗？当然不是。维京人的入侵不仅直接导致了苏格兰王国的出现，更影响到了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的政治分割线。



皮克特和布立吞分布示意图

要了解这件事，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一下，当时凯尔特人内部是如何划分的。在罗马和七国时代，生活在今天这片叫“苏格兰”的土地上的，是一支叫做“皮克特人”的凯尔特人部族，而原本生活在英格兰地区的凯尔特人，则被称之为“布立吞人”。在没有外族入侵时，二族之间的地缘关系，就如后来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一样。只不过在面临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威胁时，凯尔特人内部的这些差异，很多时候就被无视了。

就如维京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虽然同属日耳曼人，却是在不同时期迁入不列颠一样。皮克特人和布立吞人两大族群的形成，也与时间有关（先进入的是皮克特人）。不过二者之间的分割线，

并非今天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边界，而是克莱德河、福斯河口之间（克莱德湾——福斯湾）。这个陆地蜂腰部也是整个大不列颠岛的最窄处。认真阅读过前面内容的朋友，应该会意识到，这其实就是罗马皇帝安东尼时期修建的“安东尼边墙”（公元142年——196年）所在位置。

根据传说，皮克特人也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内部曾经也有过七国之分。不过对于我们来说，研究这个消失民族的内部结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苏格兰”这个标签，并非源自于皮克特人，而是一支爱尔兰人。与北欧日耳曼三族一样，凯尔特人内部的交流互动也很频繁。早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移民英格兰之际（公元5世纪），爱尔兰凯尔特人就在苏格兰高地的西南角（包括外岛）登陆，建立了最早的苏格兰王国（史称“达里阿达王国”。今苏格兰“阿盖尔－比特”地区）。

尽管来自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基于生存需要，一直在向苏格兰低地扩张，并与皮克特人之间产生地缘矛盾，但在挪威维京人开始南下之际，双方都感觉到了联合的重要性。公元843年，一位苏格兰王同时继承了两国的王位，这一年也被认为是苏格兰王国的建国元年。这种通过王室联姻而导致的王国合并，在西方历史中是很常见的。只是如果没有地缘基础，即使某位君主机缘巧合的成为两个（甚至更多）领地的最高统治者，也不意味着能够整合成统一的政治体（后面我们马上可以看到失败的案例了）。

不列颠岛上的地缘政治格局

在最初的100年中，“苏格兰王国”的领地，南线都是止步于安东尼边墙的。细心的朋友估计已经发现了，今天苏格兰最大的两座城市：爱丁堡、格拉斯格的位置，都在苏格兰低地的南部、安东尼边墙之南。罗马人曾经短暂占有过这片土地，不过很快就退回了哈德良长城。南半部苏格兰低地，又重为布列吞人所控制。

布立吞人在“安东尼长墙”与“哈德良长城”之间的土地，大致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福斯湾以南（爱丁堡所在区域）部分名为“高多汀”；克莱德湾一带（格拉斯所在地），以克莱德河为核心则为“斯特拉斯克莱德”（克莱德河畔的“斯特拉斯）。前者在公元7世纪即为扩张的盎格鲁人（诺森布里亚）所吞并，后者建立的“斯特拉斯克莱德王



维京时代的不列颠



维京时代的不列颠

国”则一直顽强的生存到了公元 10 世纪中叶。

作为帮助整个英格兰向北扩张的“诺森布里亚”来说，原来是由两个盎格鲁王国合并而成的（双方之间的分割线为源出奔宁山脉东麓的“蒂斯河”）。这一合并行为，使得从福斯湾到亨伯湾之间的整个英格兰北部地区，都成为了诺森布里亚王国的领地，并使之成为英格兰霸权的有力争夺者。然而丹麦人的到来，却使得整个亨伯河流域，都成为了丹麦人的殖民地。诺森布里亚王国的残存势力，则力保蒂斯河以北地区不失。这也使得“索尔韦湾（哈德良长城西部起点）——蒂斯河”一线，成为了“丹麦区”的北部边界。

好了，现在我们大致清楚，公元 10 世纪上半叶大不列颠岛的地缘政治格局了。掐指算一下，岛上当下为六分天下的格局：安东尼长墙以北的北部地区，为完成了内部整合工作的“苏格兰王国”；长墙以南的中北部地区，则为布立吞人的“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与盎格鲁人残余的“诺森布里亚王国”；横贯英格兰“中土”的，是围绕着“奔宁山脉”扩张的丹麦区；坎布里亚山脉所处的西部地区为“威尔士”；至于整个塞文河、泰晤士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则是俨然成为英格兰人最后希望的——韦塞克斯王国的领地了。

在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舞台上，地域狭小且无边缘优势的斯特拉斯人、诺森布里亚人的日子最不好过（威尔士人还有边缘优势自保）。前者曾经一度控制奔宁山脉以西地区，与威尔士的同族连成一片（同属布立吞人），现在则被孤立于苏格兰人与丹麦人之间；后者同样随时可能被崛起的苏格兰王国，以及强势的丹麦人所吞并。另外，虽然苏格兰人后来成为了英格兰人永恒的征服对象，但就目前的情况局面而言，丹麦人显然是西撒克逊人统一英格兰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基于远交近攻的原则，在一切尚

未稳定之时，苏格兰人的中立态度至关重要。



维京时代的不列颠

在英格兰人（韦塞克斯王朝）通过战争，迫使丹麦区承认其宗主权的过程中，苏格兰王国也得以将控制线越过“南部高地”挺进到今天的英格兰、苏格兰分界线一带（索尔韦湾——切维厄特丘陵——特威德河下游）。其中“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甚至是英格兰人拿下后，再移交给苏格兰的（公元 945 年）。当然，抛开外交层面的考虑，单纯从民族融合角度看，让苏格兰人去消化他们的凯尔特同族，难度也比英格兰人要低（英格兰人的精力放在融合丹麦人身上了）。

如果说苏格兰王国的统一、建立，“得益”于挪威维京人的压力，那么王国能够向南扩张、占据整个苏格兰低地，也可以算是拜丹麦维京人所赐了。当这一切尘埃落定时，英格兰人剩下的工作，似乎就只剩下慢慢融合掉，已经准备英格兰化的丹麦区了。而在这一工作完成之后，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之间的博弈、磨合，也将成为这个岛屿上的博弈主线。问题是，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维京时代还未终结。

第十一章 丹麦人建立诺曼底公国和入主英格兰

第一节 诺曼底公国的建立

丹麦人劫掠西法兰克王国

大多数时候，维京时代的结束期，被定位在公元 11 世纪中叶，诺曼人登陆不列颠这一事件发生时（公元 1066 年）。然而从客观角度看，大规模、散发性的海盗行为，其实在 10 世纪就已经终止了。在英格兰人征服丹麦区后所发生的一切，更应该被归类于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博弈。

在政治上征服丹麦区，并不意味着英格兰人可以高枕无忧了。鉴于丹麦人在英格兰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如何让这些带着海盗基因的北欧人，真正变身为英格兰人，成为英格兰王国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统一宗教、语言、法律等，都能够直到积极的作用。然而不管你是否积极去做这类融合工作，纯粹从心理归属感来看，这一过程至少也需要三代以上的时间。在丹麦人仍然在英格兰处于群居状态时，这段时间也充满着不确定因素。英格兰人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管制住那些定居英格兰的维京后裔，而是来自于其它“丹麦区”。

英格兰并非是丹麦人唯一的殖民方向，在法国沿海也同样存在一个 “丹麦区”。只是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这个丹麦区，是以另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地缘标签——“诺曼底”示人罢了。说起“诺曼底”，大多数人肯定马上想到二战末期那场著名的“诺曼底登陆”。不过诺曼底的时间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可是要比这场登陆战早上 1000 年。

前面我们也说了，“西法兰克”（后来的法兰西）一直是丹麦维京人的重点攻掠对象。由于法兰克人拥有更多的资源，并且在军事技术上更加领先（使用城堡 + 骑兵的战术遏制维京人侵），在公元 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丹麦人都很难大规模在法国沿海建立殖民地。也正是这一背景下，防御力更低的英格兰成为了丹麦人的拓荒对象，并取得了丰富的战果。不过伴随着英格兰丹麦区的坐实，法国这边的情况也开始发生变化了。

一方面，英格兰丹麦区的成功开拓，刺激了更多丹麦人（也包括挪威人）向海外移民。维京甚至能够为一次入侵，集结数万战斗经验丰富的战士。这样的规模让法兰克人的防御变得越来越吃力；另一方面，英格兰丹麦区成为了丹麦人入侵法国的跳板。那些从英格兰启程的维京战士，到达法国沿海地区的时间，比之从丹麦出发，要缩短一半以上的航程。很显然，这将大幅提升丹麦人攻击法国的效率。

作为掌握制海权的劫掠者，维京人可以任意在沿海选择攻击地点，那些汇集了大量财富的城市，是他们眼中的头号攻击目标。由于维京人的船只吃水浅，可以很方便的进入内河航道，所以身处内陆的城市也未必能逃出例外。西法兰克王国的都城，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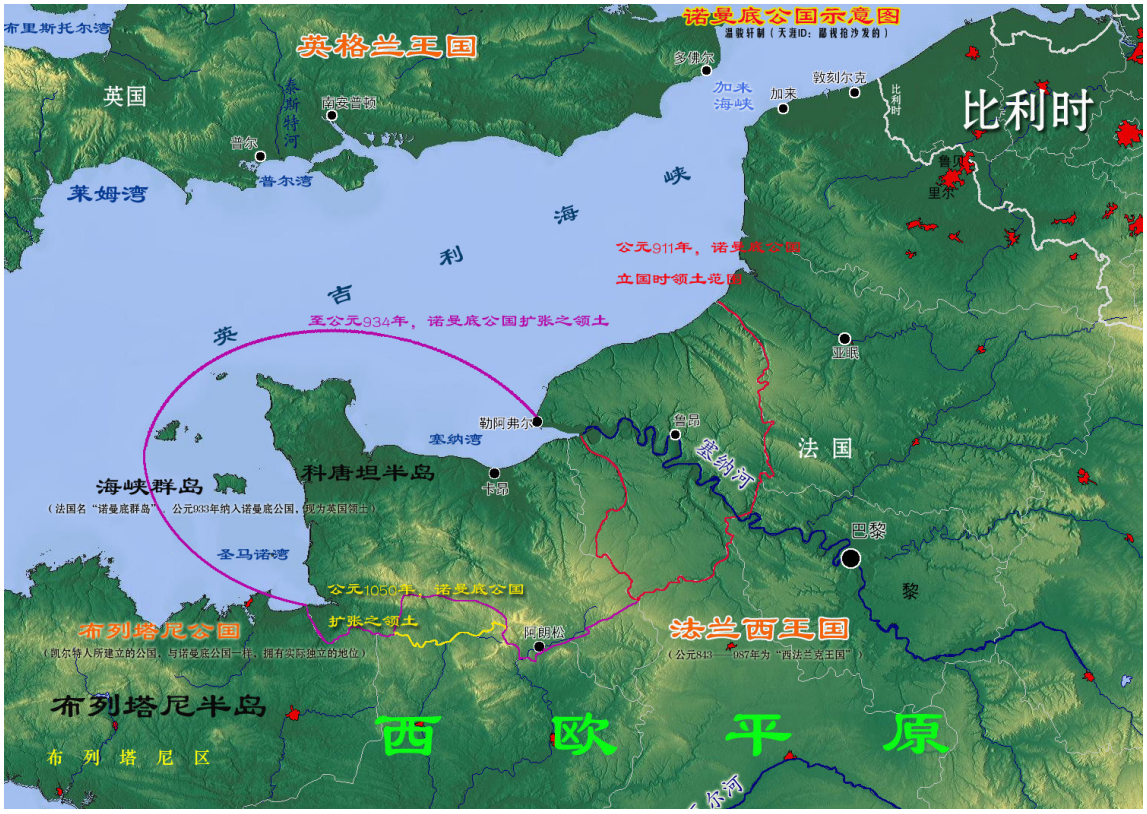
纳河畔“巴黎”，就经常因此成为攻掠的目标。在 9 世纪末的一次维京入侵中，这些狂暴战士甚至围攻了巴黎将近一年时间，直到收取大笔赎金后才解围而去。

法兰克允许维京人在塞纳河下游建立诺曼底公国

西法兰克王国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它是一个“边缘国家”。这意味着它不仅要应对来自大西洋的威胁，也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大陆事务上。比如与东法兰克王国，争夺勃艮第的控制权。这其实也是法国人一直以来所面临的困扰，在大航海时代，这一地缘结构上的矛盾，甚至直接影响了法国对待海外殖民地的态度（比如为了欧洲战争，拿破仑把在北美的殖民地卖给了美国）。

为了彻底解决来自大西洋的威胁，西法兰克人终于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招安”最强悍的维京人（公元 911 年）。所谓“招安”之策，熟读中国历史的朋友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维京人中对巴黎威胁最大的那部分，被法兰克人允许定居于塞纳河下游，以下游城市“鲁昂”为中心，建立法国的丹麦区——诺曼底公国。与英格兰的丹麦区有所不同是，在这场政治交易中，西法兰克人一开始就在政治上，让诺曼人明确了自己的从属地位。也就是说，诺曼底公国在法律上仍然是西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

然而在中世纪的封建体制下，此类封地本来就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诺曼人以征服者姿态，强势让法国人接受他们存在的现实，更让诺曼底公国实际处于完全独立的状态。事实上，直到 15 世纪中叶，法国人才算真正统治了诺曼底公国。不过巴黎的君主消除维京威胁的目的倒是达到了。出于维护既得得益的考虑，完成“维京人”向“诺曼人”身份转变的这部分丹麦人，肯定是不会允许其他同族再来法国分一杯羹的了。



诺曼底公国示意图

事实上在公元 9、10 世纪相交这一阶段，伴随着入侵行为，丹麦人已经以塞纳河口为中心，在其东西海岸线那些短小的沿海河流地区，初步设立了大量据点。诺曼人最初所获得的领地，只是包括了塞纳河口以东，已经被他们所占据的岸线，以及塞纳河下游地区。为了双方共同的得益，这些诺曼人很快把扩张的方向指向了西线，试图将其他的维京势力统一进这个独立公国。

塞纳河河口以西的海岸线，主要为两个半岛：科唐坦半岛、布列塔尼半岛。其中为维京人所控制的是科唐坦半岛。20 多年之后（公元 934 年），诺曼底公国不仅包括原来为维京人所控制的科唐坦半岛（及其附属的“海峡群岛”），更把领土向南一直扩张到卢瓦河流域的边缘（法国城市“阿朗松”一带）。至此，诺曼底公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土范围，也基本定型了。

之所以没有继续向西扩张，是因为布列塔尼半岛早已为 “小不列颠人”（布列塔尼人）所控制。虽然在查理曼之后，布列塔尼大多数时候以公国的名义成为法国的一部分，但与诺曼底公国一样，这个凯尔特人地区也一直强势维持着实际独立的地位，并与海峡对岸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地缘政治关系。诺曼人当然也可以把布列塔尼地区，当成扩张的重心。不过在控制了塞纳河口周边地区，以及科唐坦半岛之后，法国在英吉利海峡的一半海岸线，都已经为诺曼人所控制了。基于自身的海洋属性，诺曼人并无意于在大陆地区争霸（或者说不是他们的强项）。相比法兰西，英格兰会更合诺曼人的胃口。

如果诺曼人把英格兰视为下一个扩张方向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赶在丹麦区彻底融于英格兰之前来做这件事了。否则等英格兰王国真正完成内部统一工作之后，单靠诺曼底公国的实力，想拼出一个横跨英吉利海峡的“海峡王国”，就很困难了。然而有类似想法的，并不仅仅是身处法国的诺曼人，在他们的母国丹麦，同样有人希望能够继承丹麦区的地缘遗产。

第二节 丹麦王国征服英格兰建立北海帝国

丹麦王国入侵英格兰并取得丹麦区主权

当生活在英格兰的丹麦人，逐渐被英格兰人征服时，他们在北欧的老家，却开始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之前我们也说了，虽然挪威、丹麦、瑞典的地缘概念已经天然形成了，但还没有人能够统一上述地区。比如丹麦，就被分割为了四个独立地区。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维京入侵，是“挪威人”、“丹麦人”的入侵，但却不能说是挪威、丹麦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国家战争。

公元 10 世纪中叶，挪威和丹麦两个盛产海盗的国家，先后完成了内部统一工作。作为进入文明国家行业的标志——基督教，也开始自上而下的在两地推进。由于维京人在不列颠的征服事业，前者的基督化主要受爱尔兰影响，后者则与英格兰关系密切。

相比之下，领土与欧洲大陆相连的丹麦，文明化的速度要更快些。不过，与西欧诸国一样都信仰了“上帝”，并不代表他们就不再会进行海外扩张了。尤其对于实力最强大的丹麦王国来说，就此放弃维京时代的遗产，着实是有些不甘的。

公元 10 世纪 80 年代，统一之后的丹麦王国开始大规模入侵英格兰，试图夺取丹麦区的控制权。在这个过程中，英格兰的丹麦移民后裔，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那就是做英格兰人还是丹麦人。可以想见的是，英格兰人在如何处置这些“丹麦人”的问题上，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到底把他们看成英格兰人，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丹麦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丹麦人的选择将直接决定战争的天平向哪边倾斜。

最终沉不住气的是英格兰人，公元 1003 年，英格兰国王下达了“杀胡令”，屠杀境内的丹麦移民。也许下达屠杀令时，英格兰的统治者也考虑过，是否要甄别一下，丹麦移民的政治态度。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这种带有种族仇恨性质的屠杀令下达，血统就必将成为划分敌我阵营的唯一标准。鉴于丹麦人在英格兰覆盖面积之广，英格兰人很显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能消灭所有的丹麦移民。而这种做法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把英格兰人境内的丹麦移民，集体推向了丹麦王国的一边。

有了英格兰人“帮忙”，再次以拯救同胞为名，跨海而来的丹麦军队，只用了 10 年时间就完成了对丹麦区的征服，并且逼迫英格兰人承认丹麦人对丹麦区的主权。英格兰人所控制的土地，重新回到了公元 10 世纪初，韦塞克斯王国与丹麦区并立时的范围。这也是历史上，英格兰人第一次承认丹麦人，在英格兰的土地上拥有王权（之前丹麦区成立的那些小国家，是不被承认的）。这样的格局，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南北朝”并立的局面。

卡纽特征服英格兰和挪威建立北海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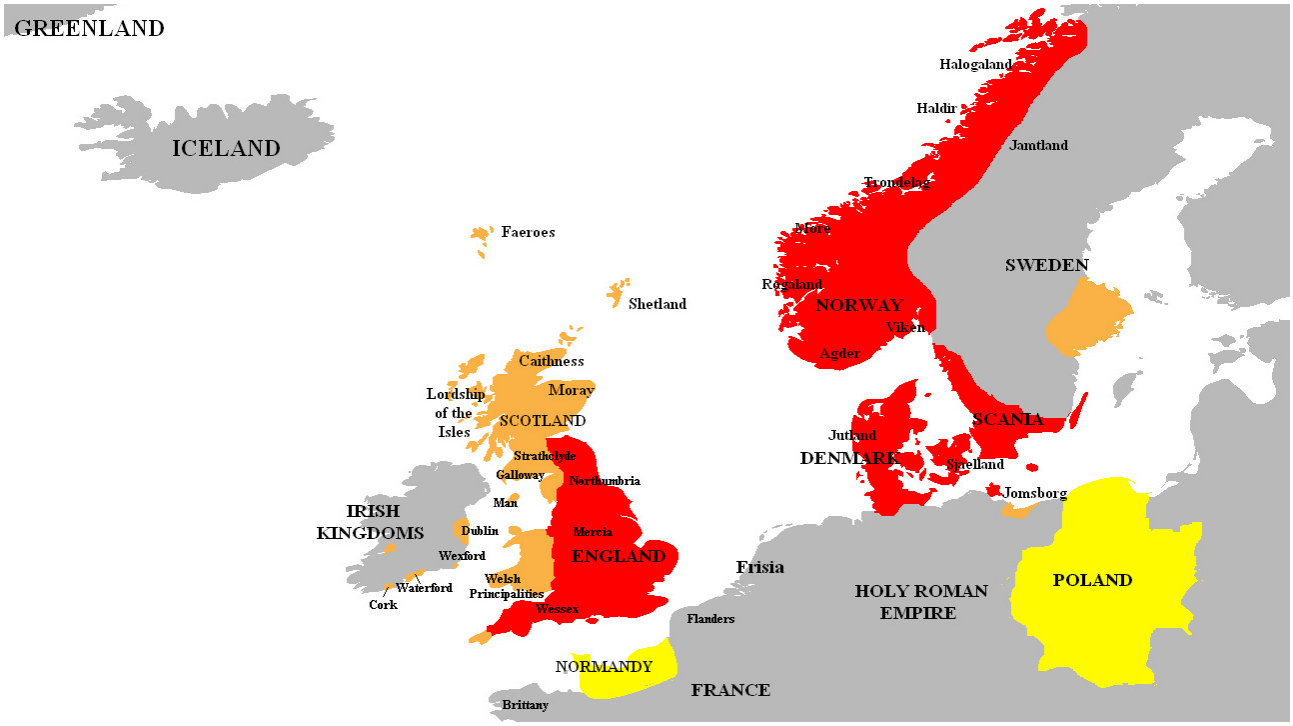
然而在丹麦人强大的压力之下，这种南北共存的格局，并没有延续几年。丹麦历史上唯一的“大帝”级人物——卡纽特大帝（克努特大帝），很快就成为了整个英格兰和丹麦王国的统治者（公元 1017——1019 年）。征服英格兰之后的丹麦王国，很快又把视线投向了与自己竞争大西洋霸权的挪威，并很快完成了对挪威的征服（1030 年）。自此，一个以北海为中心，包含丹麦、挪威、英格兰在内的“北海帝国”开始形成。

与英格兰人的清洗政策不同的是，统治英格兰的丹麦人倒是很想融入这个岛国。卡纽特大帝本人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英格兰，并力促英格兰人与丹麦人的融合。基督徒们会更原意认为，这是宗教的力量。不过从当时的地缘政治背景来看，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丹麦本土的安全性渐成问题。长期的海外征服事业，使得丹麦本土的人口数量（特别是青壮年）失血严重。与此同时，南方与之相邻的日耳曼同族，却已经被整合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旗帜下，势必对丹麦造成严重的威胁。然而时下的丹麦人，早已习惯了将海外作为事业的重心，想让人口大规模回流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

倒不如顺水推舟的，将英格兰与丹麦融为一体。

说到这里，顺便说个小知识。最初统一丹麦并发动远征英格兰的，是卡纽特大帝的祖父“哈拉尔”。由于在北欧叫哈拉尔的国王实在太多了，所以跟很多欧洲君主一样，后世会根据这位君主在生理或者性格上的某个特征给他取个容易识别的外号。这位丹麦开国君主的外号叫作做“蓝牙”（稍早统一挪威的也叫哈拉尔，史称是“金发哈拉尔”）。是不是很耳熟？没错，现在运用在手机上的无线通讯技术“蓝牙”，名称就是源自于这位丹麦王。

发明蓝牙技术的爱立信公司（瑞典公司），之所以用“蓝牙”之名来命名一项无线通讯技术，是因为认可这君主在北欧日耳曼人统一进程中的贡献。然而对于“北海帝国”的建立者来说，将丹麦和英格兰合并为一个国家的难度，要远高于它与挪威、瑞典的融合。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英格兰人已经是一个文明层级更高的独立民族，更在于丹麦与英格兰之间，相隔着一片海洋——北海。



北海帝国示意图

纵观历史，真正能够围绕一片海域，形成一个“地中海帝国”的，只有罗马帝国。这其中，除了各方面因素以外，地中海良好的海况，以及诸多半岛拉近了亚、非、欧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帝国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这使得帝国的各部分能够拥有良好的海上沟通通道。至于身处外洋、气候恶劣， 东西长达 500 公里的“北海”则很难具备这个条件。

最终丹麦人建立的这个“北海帝国”，也如欧洲历史上的很多所谓帝国一样，因为没有地缘基础在卡纽特离世之后陷入分裂状态。事实上，这个所谓帝国只是后世的认定，在当时并没有真正在获得过法律上的认可。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在西欧如

果你想建立一个真正的帝国，从教皇那里获得授权，以继承罗马帝国的政治遗产（罗马皇帝），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很多中文翻译的“大帝”，原意只是一个“伟大”的前缀，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皇帝。

很显然，没有进军过罗马的“卡纽特大帝”，并没有像查理曼和奥托一世那样，留下一顶“皇帝”的桂冠，所以后世也就没有谁再为恢复所谓“北海帝国”而努力过了。然而这并不代表，就没有维京人的后代思考过“进军罗马”问题。那么是谁这样尝试？

第三节 诺曼人入侵并征服英格兰

诺曼人登陆英格兰及不列颠军事技术的落后

在经历过西撒克逊（韦塞克斯）、丹麦两个王朝之后，英格兰的统治权并没有顺利的交接到英格兰人手上，因为海峡对岸的诺曼人，认为自己更有资格继承英格兰的王位（欧洲王室有着复杂的姻亲关系）。公元 1066 年，诺曼人登陆英格兰，并且很快凭借强大的武力取得了英格兰的控制权。自此，英格兰进入了“诺曼王朝”时代。

很多时候，诺曼人会被人看做维京海盗的另一个标签，但通过之前的解读，大家应该明白了，二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最起码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这些定居法兰西已经一个半世纪的维京人，在语言、政治制度等方面已经法国化了。由于法兰克人在查理曼时代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治遗产，并且获得了教庭的认可，所以在文明层级上会自视高出英格兰人一等。这一心理无疑也影响了法国化的诺曼人。比如落户英格兰的丹麦人，会愿意学习英语并与之整合，而跨海而来的诺曼人，却一直高傲的说着法语，以显示他们和英格兰人的区别。

从客观角度看，当时不列颠的发展水平，也的确和西欧不在一个层级上。这一点也体现在双方的军事水平上。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法兰克人使用城堡和骑兵相配合的战术，克制了维京人的扩张。虽然诺曼人最终还是在法国殖民成功，但最起码没有出现英格兰那样，反客为主的情况。定居之后的诺曼人，对这两项军事技术极为重视。基于诺曼人本身的军事基础，诺曼骑兵很快成为欧洲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兵种。至于城堡的作用，当然是不能体现在登陆不列颠的战役中了。不过为了不让土著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有机会与之对抗，统治英格兰的诺曼人，在修筑城堡和配备装备重甲骑兵的方面，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作出了严格的限制。

相比之下，在封闭的不列颠，英格兰人包括凯尔特人的军事水平发展严重滞后，你甚至能够在英格兰的军队里，发现石斧这样的原始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军事水平同样说不上高，但却更加勇猛的维京人能够横行不列颠的原因。整个不列颠唯一能够有机会在中世纪体现价值的军事发明，可能就是威尔士人最先使用的“长弓”了。后来采用了这项技术的英格兰军队，在英法百年中取得了辉煌战绩。事实上，在整个欧

洲，弓箭技术一直都不太受重视，英格兰人之所以独辟蹊径的发展长弓技术，就是因为诺曼人在常规军事技术层面，对他们限制太多了。大家所熟悉的，以箭术闻名于世的“侠盗罗宾汉”故事，最初就是以这一段历史为背景书写的。

说到这里，也顺便说一下，为什么在欧亚草原发挥过如此重大作用的骑射技术，没有能在欧洲普及。理论上看，既然游牧民族所使用的这项军事技术，让欧洲人如此印象深刻，他们应该会很快学习并普及才对。这一点，在战国时代就开始推行“胡服骑射”技术的中央之国，就是典型案例。至于欧洲，影响这一技术普及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气候。



英格兰长弓



游牧民族复合弓

尽管人类历史上，弓箭的发展源远流长，但亚洲游牧民族所使用的弓，技术含量要高出许多。其弓体是由木（竹）、角、筋等材料，以动物胶胶合在一起制成的“复合弓”（不同于现在的复合弓）。其最大的好处在于，弓臂可以在做的较短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积蓄较大的动能。相比之下，如果只用一种材料做的单体弓，为了射的更远，就必须做得更长了。像英格兰的长弓，一般都在 1.5 米左右。对于有骑射需求来说，复合弓显然更为适用。

然而复合弓虽然有诸多优点，制造起来成本却较高，保养起来也有很高的要求。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长时期处于过度潮湿环境就会脱胶，从而导致整张弓报废（在古代中国，军官要有专门的烘箱来对弓进行保养）。在干旱的欧洲大陆腹地，复合弓的维护相对较容易。而在受海洋气候影响，整体多雨潮湿的欧洲（特别是西欧），复合弓的性价比就太低了。

当然，我们还是回到地缘的角度上，并非只是单纯的普及武器知识。如果把视角局限于此，就会有“唯武器致胜论”之嫌了。在这里谈到弓箭的使用，也只是让大家意识到，武器本身也是有地缘属性的。事实上，从战略层面上看，任何一件武器如果能在战场上发挥重大作用的话，都很快会被对手模仿或者找到克制方法的。决定战争走向的，最终还是彼此的战争潜力。

诺曼人控制跨海峡两岸的英格兰和诺曼底公国

回到地缘视角，如果法兰克人当初有机会在陆地战场与英格兰人决战的话，相信结束七国时代的就不是丹麦人了。从这个角度看，海洋是英格兰人最大的保护神。只不过，维京人恰恰是一个海洋民族。既带有维京海洋基因，又融入欧洲大陆先进文明的诺曼人，最终得以跨越海峡，成为英格兰人的统治者。

以欧洲松散的地缘政治结构来说，要想让英吉利海峡两岸诺曼底、英格兰共同处在一个国王治下，本来是非常困难的。真正让两地在政治上紧密结合起来的，是那些诺曼贵族。在完全征服后，为了控制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地，大多被封建给了那些说法语的诺曼贵族，而这些贵族在诺曼底也同样拥有封地。一旦分裂的话，这些诺曼贵族就必须做选择题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诺曼贵族成为了维护海峡两岸政治统一的中坚力量，并且力保海峡两岸在同一位君主的统治下。然而从地缘角度来看，英格兰人和“法国人”之间的界线，却始终泾渭分明。最起码，诺曼人是不会放弃他们引以为傲的法语，去主动学习下里巴人的英语的（今天法国人还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欧洲都出现了一个横跨英吉利海峡的强大政治体。身兼英格兰国王和诺曼底公爵的君主，既可以调动诺曼底的资源，去降服威尔士、苏格兰；又可以利用英格兰作后盾，去欧洲大陆和原来的宗主“法兰西王国”争霸。尽管没有帝国之名，但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用一个“诺曼帝国”或者“海峡帝国”的概念，来形容这个横跨英吉利海峡的政治体了。只不过，由于英格兰所给予“帝国”统治者的是一顶王冠，而诺曼底在法律上，是从属法兰西的一个公国。因此尽管“海峡帝国”的统治者，很多其实都不会说英语，并且把扩张重心放在大陆，但还是更原意突显英格兰国王的身份。由此，这个“帝国”与法兰西的矛盾，在历史上也就被定位为英、法两国的矛盾了。

相比“诺曼帝国”的概念，其实用“海峡帝国”的概念来概括这个二元政治体会更准确一点。因为英格兰的“诺曼王朝”，前后维持了不到百年（公元1154年宣告终结）。随后通过姻亲关系，取得英格兰和诺曼底继承权的，是来自卢瓦尔下游的“安茹公爵”。



金雀花王朝（安茹帝国）示意图



金雀花王朝（安茹帝国）示意图

由此也开启了英格兰历史上的另一个时代——金雀花王朝[1]，而“海峡帝国”的概念，也包括这个淡化了诺曼概念的，延续到 15 世纪中叶的王朝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能永远会为欧洲王室这些复杂的亲戚关系感到困惑，并且为一个国家的君主，可以去继承另一个国家的王位感到不可思议。好在从地缘和大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一切的话，倒不必去弄清这些世系问题。从诺曼王朝到金雀花王朝，对于“海峡帝国”本身来说，并非坏事。最起码“帝国”在法兰西的领地又扩大了（相当于带了嫁妆进来）。此消彼涨，法兰西国王所能直接、间接控制的土地也就减少了。这一时期也是法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包括巴黎在内的整个塞纳河流域、布列塔尼、卢瓦尔河以及加龙河下游（阿基坦地区）都成为了打着“英格兰国王”招牌的，“海峡帝国”的属地。

最终结束这一切的，是一场欧洲历史上最长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公元 1327 年——1453 年）。这段历史中，大家最熟悉的人物，应该就是率领法国军队反抗“英国侵略者”的圣女贞德。公元 1458 年，“海峡帝国”在失去了在

1　金雀花王朝，在法国又名安茹王朝。王室家族是一个源于法国安茹的贵族，从 12 世纪起统治英格兰，首任英格兰国王是亨利二世。除家族原有世袭领地安茹伯国（1060 年 – 1203 年），该朝曾统治过诺曼底公国（1144 年 – 1204 年及 1415 年 – 1450 年）、英格兰王国（1154 年 – 1485 年）、阿基坦公国（1153 年 – 1453 年），一度拥有从比利牛斯山到苏格兰边境的广大统治版图，后世称此时期的英格兰王国为“安茹帝国”（Angevin Empire）。

欧洲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加来）。经历过这一过程之后，真正由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英格兰王国”，也认清了海峡的力量，此后在战略上把自己定位为欧洲地缘政治的平衡者，即：自身不再谋求登陆，但却不让任何一国在欧洲做大。

第四节 英格兰大宪章产生的历史背景

英格兰独特体系的形成

英法之间的恩怨，以及它们内部的诸多战争，并不会去详细解读。在了解两地的原始地缘结构后，对这部分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应该可以在脑海中建立版块框架了。当然，这并不代表英格兰和法兰西不会再出现在今后的内容中。事实上，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来说，英法两个政治体的地缘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这种影响力体现在政治、法律、宗教等诸多方面。比如在法律体系中，会有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之分；法国延续了天主教传统，而英国成为了新教的重要基地。

在英法这两个样本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英格兰这个样本。以东亚的经验来看，连不列颠群岛都没有做到完全统一的英格兰，本来是没有机会发展出可以与大陆体系相抗衡的独特体系的。归结到地缘层面，英格兰没有像东亚的日本那样，长时期处在大陆文明阴影下（日本近现代又受西方影响，但还是没有产生原创性的体系），都是在那条“隔而不断”的英吉利海峡影响，以及欧洲本身地缘结构松散的背景下产生的。试想一下，如果欧洲大陆一直处于罗马帝国时代，抑或不列颠与法兰西的距离，像格陵兰那般远，英格兰还有没有机会成就大英帝国呢？

英格兰开始形成自己独特地缘影响力，并非是在 15 世纪中，英格兰完全放弃大陆领土后才形成的。事实上，在“海峡帝国”时代，英格兰的地缘独立性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这其中对现代文明影响最为深远的，也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大宪章”。一般认为，正式出现在 13 世纪初（金雀花王朝）的大宪章，是现代宪政制度的原点，并确立了“法律至上”的原则。

关于《大宪章》的内容，以及引发其出台的具体事件，即使之前不熟悉的朋友，也是可以轻易百度到的（包括各种赞美之词），在这里也就不注水了。简单点说，这是一份英格兰贵族（包括教会）用来限制“王权”的，内容上还不那么正规的法律文件。虽然内容看起来有 60 多条，归结起来不外乎有两点：一是国王在英格兰的权力不是无限的（主要是关于“钱”，也就是税赋的限制）；二是限制国王权力的是“议会”。

其实等到欧洲人再次发现古希腊、罗马文明后，他们会明白以法律、制度来限制王权的做法，并非是英格兰人首创的。甚至如果西方人仔细研究过华夏文明后，也会发现，华夏政权的君权也不是没有边界的，同样要受到一些成文或者不成文“法”的约束的（包括西方人不能理解的“祖宗家法”）。当然，这些殊途同归的做法，并不能抹杀英格兰人通过几个世纪，所磨合出来的宪政原则的影响力。毕竟近现代盎格鲁－

撒克逊国家，成为了这个世界的最强者。他们倡导的价值观，也几乎成为了普世价值。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花在英格兰身上的时间，要比其它国家更多。

大宪章出现与共主联邦制的关系

就地缘层面上来看，《大宪章》的出现，与“海峡帝国”的背景密不可分。首先，基于大陆的吸引力，这个二元帝国的重心始终在欧洲部分，即使某一个时段几乎被法兰西王国赶下海峡，也无时不刻想着重返大陆；其次，英格兰本土贵族在帝国的东扩过程中，实际获益有限。国王在法兰西拥有再多领地，受益者也只是那些帝国境内的“法国人”。相反，为了“帮助”完成国王的欧洲霸主梦，英格兰人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在这种付出与收益不成正比的情况下，英格兰人的内心并不认为自己和海峡对岸的“法国人”同属一个帝国，而应该是一种“共主邦联”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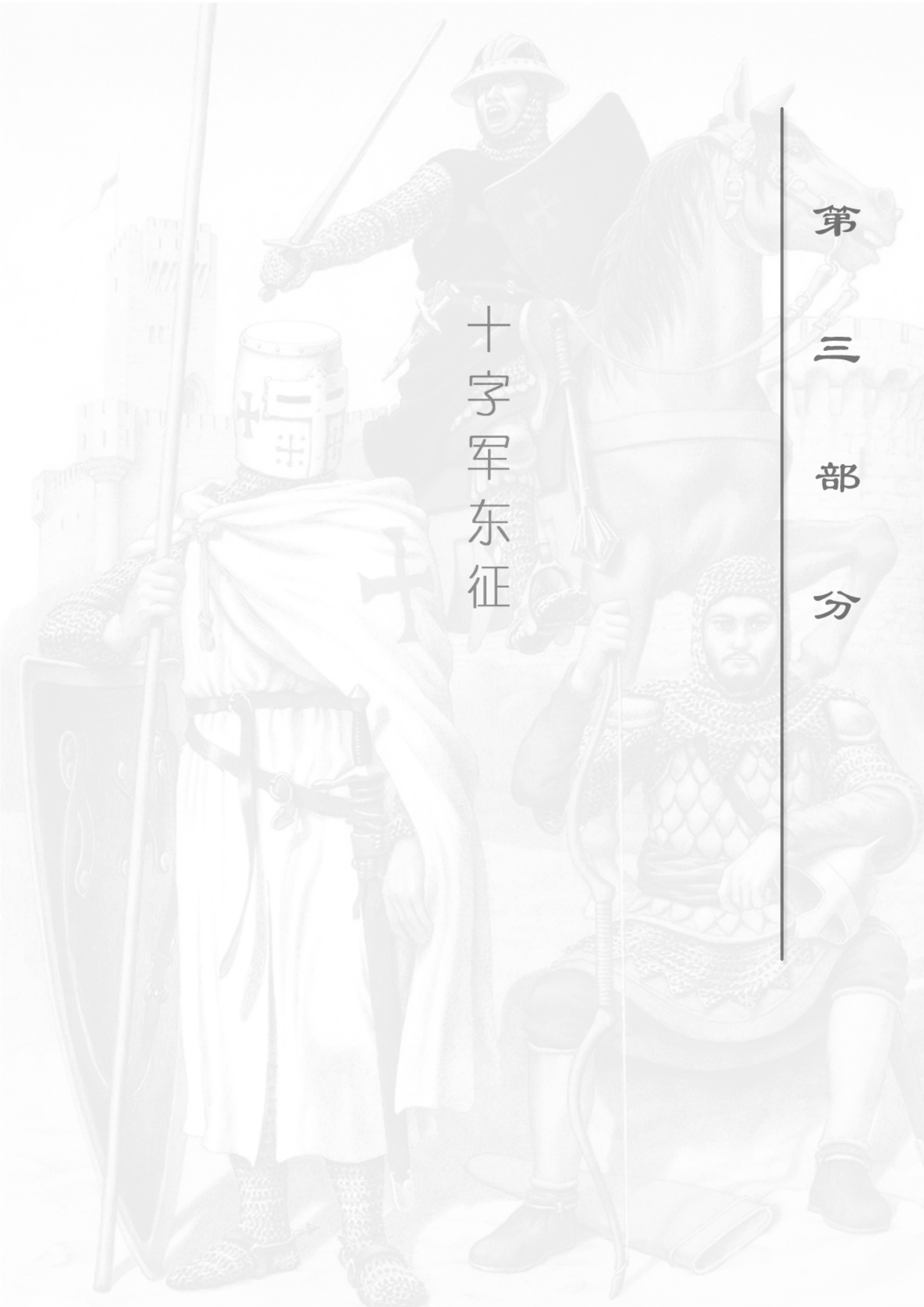
所谓“共主邦联”的形式，其实质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政治体，拥有一个共同的元首。今天世界范围内最大、最重要的“共主邦联”，就是以前大英帝国殖民地为成员国所组成的“英联邦”。在这样一个“邦联”体中，成员之间、成员与元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于交换原则下维系的契约关系。如果“合则两利”，那么大家就可以组合在一起；如果一方的利益会受损，那么也就没有组合在一起的必要了。在近代，英国率先基于上述原则确立的上下契约式政治结构，是英国“君主立宪”制；而横向契约制政治结构的案例，则是以“联邦制”的形式，率先在独立后的美国实现的。

对模块式、契约式关系的认可，是欧洲文化与东亚文化之间一个重要区别。很多时候，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国式”思维，所无法理解的某些国际关系（比如联邦制、民族自决），其实就是因为对这种文化背景缺乏了解。当然，西方文化与东亚文化更本质区别，在于“多样性”。既有英格兰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以及身处“海峡帝国”的那段历史，所成就的“君主立宪”制；也有身处大陆的法兰西、德意志，为了争夺大陆霸权，走向“君主专制”道路的案例。各种体制、文化之间的博弈、相互学习，才是西方能够抓住机遇，在近现代成为这个世界主导者的源动力。

应该说，每一种体制、价值观的形成，都有它特定的地缘、历史背景，不能简单的比较谁好谁不好。尽管在工业化时代，西方的确一下子将人类文明发展，拉升了一个台阶。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当西方人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并因此认为这个星球上只有一种“普世价值”时，却无意间否认了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多样性文化共存的重要性。也与之前固步自封，陷入死循环状态的华夏文明一样，迎来了最大的危机。

“海峡帝国”时代的英格兰人，其实还没有条件形成一套完整的治国理念，一切处在被动维护自身利益的萌芽阶段。所谓“大宪章”也没有真正起到保护英格兰人利益的作用。总的来说，当帝国的统治者在法国失血太多时，英格兰人就有机会拿出大宪章，要挟国王承认（1215 年，被迫签订《大宪章》的国王约翰，就几乎完全失去了法国的领地）；反之，国王则仍然能够抛开束缚，在英格兰以君主专制的形式行使王权。据不完全统计，在两百多年时间里，类似谈判多达 30 余次。

关于英格兰人的故事，我们在“大航海时代”还将延续。在此之前，中世纪还有一件对西方文明造成重大影响的地缘事件没有交待过，那就是——十字军东征。接下来，我们也将把视线投向这场以主名义发动的战争。



第三部分

十字军东征

第十二章 十字军东征前的地中海政治格局

第一节 十字东征的地缘背景

十字军东征背后的宗教因素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起始时间，是公元11世纪末（1096年），然而西欧天主教世界，与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地缘矛盾，却已经延续了将近3个世纪。可以说，自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踏上伊比利亚半岛的那一刻起，宗教战争的西线战场就已经开辟了。在伊比利亚，这场旷日持久的博弈被称之为“收复失地运动”。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欧洲的天主教徒，才算把穆斯林在半岛上的最后一个据点拔除掉（此时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已经被拉开了）。总的来说，伊比利亚的“收复失地运动”和“十字军东征”，都可以算是一场以主为名的“圣战”。相比之下，前者的理由要更加的充分一些，毕竟阿拉伯人的确是从欧洲人（西哥特人）夺取的伊比利亚。

当然，宗教与其它类型的意识形态一样，从来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我们将这场“圣战”定性为“以主为名”也是这个道理。从地缘角度看，欧洲的天主教世界之所以在11世纪末，主动向东方扩张，源动力并非是宗教的狂热（虽然具体到人身上，很多人是受此驱动卷入的），而是因为天主教世界在西欧的扩张遇到的瓶颈，简单点说整个欧洲几乎已经被基督教国家所覆盖了。

公元9——11世纪，是欧洲民族国家崛起的重要时期。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国家是否进入“文明”序列，是否归依基督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其背后所隐藏的，是对法兰克王国时期开始形成的，以“军事采邑制”为特色的封建体系的接受。对比各民族之前那种带有原始民主气息的“国家”结构，这种有宗教、武力相辅的金字塔型结构，显然要更加的有竞争力。

回忆之前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在扩张天主教的大旗下，法兰西、不列颠、意大利、伊比利亚、德意志、波兰、捷克、匈牙利、丹麦、挪威、瑞典等版块，相继进入了天主教国家的行列；巴尔干半岛的拜占庭、保加利亚，以及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则成为了东正教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矛头战略性的转向异教徒，那么这些上帝的子民就只能继续内耗了。虽然信仰同一个神，并不能掩盖彼此之间的矛盾，但在外部还存在更大的空间时，矛盾的焦点是可以被转移的。

中世纪暖期使人口增长促欧洲人向外扩张

隐藏在圣战之名背后的另一个地缘推手，是曾经在之前内容多次提及的“中世纪暖期”。在温暖气候的助力下，欧洲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及至暖期结束的14世纪中，欧洲人口已经超过了7000万，而在公元7世纪初，这个数字仅仅为2000万。在强大的人口压力面前，除了对内挖掘潜力（如将更多的森林变成耕地），向外扩张也会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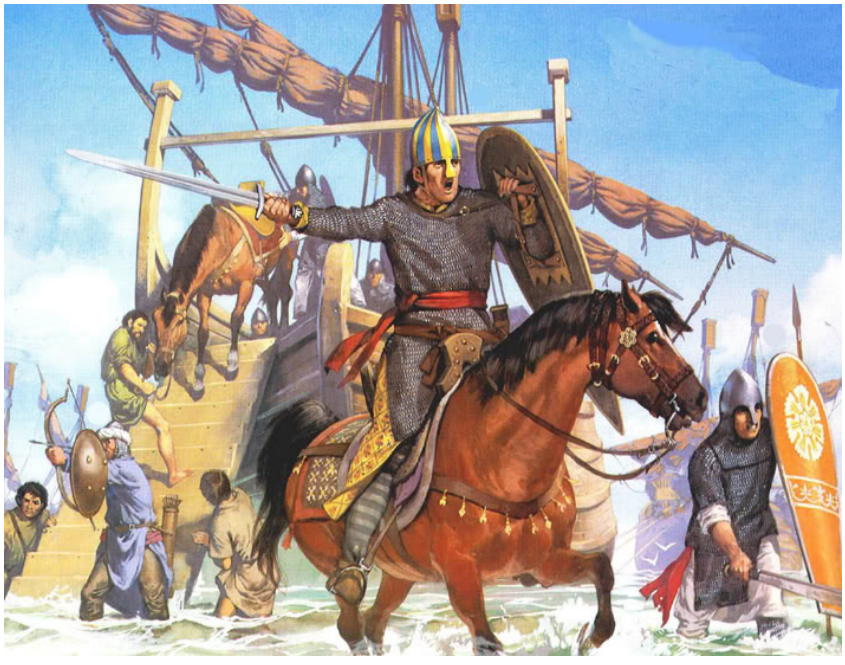
为选项。在欧洲，北欧的维京人应该是最能敏锐感受到温度变化的族群了。这一点也很好理解，相比低纬度地区，斯堪的纳维亚人会更容易从冰雪的变化中，直接受益（可以活动的时间增长了，原本不能通航的水域，可以通航了等等）。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欧洲大西洋沿岸地区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恐怖的维京时代。

第二节 诺曼人进军南意大利地区

诺曼人登陆南意大利开始其征程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曾经的“海盗”身上。并且通过他们了解了欧洲外洋（大西洋）地区的地缘结构。随着十字军骑士们的噪动，是时候把视线拉回到地中海了。要想了解十字军在东地中海都干了些什么，首先必须对西地中海同时段的地缘政治格局有所了解。吊诡的是，在了解这片内海的现状时，我们依然无法摆脱维京人的阴影。因为在 11 世纪中叶，诺曼底公国开始垂涎英格兰的土地时，一批诺曼贵族已经在意大利半岛开拓另一片天地了。

无论是出于宗教热情（朝圣），还是让诺曼人成为欧洲政治主导者的政治预期，意大利对维京后裔中文明程度最高的“诺曼人”，都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在正式登陆意大利半岛之前，诺曼人已经通过去耶路撒冷朝圣，熟悉了地中海复杂的地缘政治结构。然而纯粹遵循大陆扩张原则的话，诺曼人最先要跨越的障碍，就是他们名义上的宗主——法兰西王国了。问题是，可能有很多势力希望看到法兰西被削弱，但却并不代表大家希望看到法兰西消失。诺曼人要是想着反客为主征服法兰西的话（先且不说诺曼人有没有实力做到这点），势必会打破查理曼帝国分裂以来，欧洲大陆业已形成的地缘政治平衡。包括罗马教庭、神圣罗马帝国在内的相关重要势力，就会考虑这种变化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了。



诺曼人

既然跨越法兰西进军罗马的想法很难实现，那么富于冒险精神的诺曼人就没有其它路径靠近罗马了吗？当然不是。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正在描述的这个群体，血液里流淌着维京海盗的基因。早在公元 9 世纪，维京人还在从事海盗这份有前途的事业时，他们就已经穿越直

布罗陀海峡，沿着西班牙、法国海岸线，一路劫掠至意大利北部过了。不过这次已经成为上帝子民的诺曼人，却把目标指向了意大利南部，在南意大利与中北部的分割点——那不勒斯地区成功登陆（公元 1027 年）。并以此为原点，开始了他们在意大利南部的征程。

诺曼人选择意大利南部作为他们在地中海的立足点，在战略层面是经过充分考虑的。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意大利半岛，实际上一直处于混乱的分裂状态。其北部由中法兰克王国，及其分裂后成立的诸多小国、城邦所控制；中部则是拥有最高宗教权的教皇国。至于南部，拜占庭帝国凭借优势的海军，一直占据的主导地位（并非占领全境）。

尽管拜占庭帝国与西欧诸国看似同属上帝的子民，但这其中微妙的关系，相信已经不用多解释了。简单点说，如果诺曼人选择在意大利北方扩张的话，那么势必会在西欧天主教国家引发连锁反应，包括教皇会很难权衡到底支持谁。不过，要是把矛头指向东正教徒控制的南意大利的话，最起码教皇会很愿意看到，受命于罗马教廷的天主教教士，终于能够遍布意大利。至于诺曼人到底能够做到哪一步，那要看他们的实力了。

诺曼人在意大利半岛立足后剑指西西里岛

在诺曼人登陆英格兰之际，前往地中海冒险的那部分诺曼人，也大致完成了他们在意大利南部的征服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拜占庭人并非是诺曼人所遇到的唯一对手。最初教廷和意大利诸邦国，包括拜占庭人都没有意识到诺曼人的野心，各方对诺曼人的定性，就是可以用钱驱动，打击对手的雇佣军。然而随着诺曼人的逐渐做大，周边势力对这股新兴势力都产生了强烈不安感。如果说拜占庭在意大利半岛的存在，更多是在保护自己的贸易利益，以及一点罗马帝国继承者的宗主情结。那么诺曼人的想法就没那么简单了。

这些维京后代，显然已经准备在地中海复制诺曼底的成功经验了。如果成功的话，必将极大改变地中海的地缘政治平衡。要知道，在这种“春秋”格局中，平衡才是最重要的。一旦有人准备打破原有的平衡，受威胁的各方都很有可能摒弃前嫌，重新考虑自己的外交政策了。事实上在整合工作后期，教皇国和意大利本土邦国，甚至和拜占庭人组成联军，以阻止诺曼人的做大。只不过最终诺曼人还是击败了所有对手，成功的征服了教皇国以南的意大利半岛。这也是中世纪以来，群雄逐鹿的南意大利第一次被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

诺曼人能够异军突起，在意大利半岛立足成功，得益于他们出色的军事能力，以及与生俱来的海洋基因。尤其是后者，为这些维京后代战胜拜占庭帝国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拜占庭帝国得以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有在意大利半岛的领地，得益于他们相对强大的海军力量。当然这并不代表拜占庭的海军，在规模和技术上就比罗马帝国时代的海军更为强大，只是因为在日耳曼人所控制下的西欧，大陆才是各方争夺



诺曼人征服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

的重心，并没有海上争霸的想法。

另一个导致拜占庭人能够长期占据优势的原因，是因为东地中海及亚洲的经济，要远比被日耳曼人破坏后的西欧发达。西欧诸国需要拜占庭人为他们带来东方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想挑战拜占庭帝国海上霸权，贸易权将很有可能被拜占庭人用来分化对手的阵营。然而诺曼人的到来，从技术上打破了拜占庭人的海上优势。在日耳曼人当中，没有谁比维京人更加具有海洋基因了，并且熟悉制造、驾驭船只了。更加让人恐惧的是，经过在诺曼底的沉淀，这些维京后裔又站在法兰克人的肩膀上，精进了自己的陆战军事技能（包括吸收“军事采邑制”这样有效的军政合一组织架构）。

虽然整体实力，肯定还是拜占庭更为强大，但这个帝国最大的问题，是一直在把重心放在东线上。意大利的利益，并不是帝国的核心利益。相比之下，诺曼人则把南意大利当成了自己事业的起点，并准备以此为基地扩张政治版图。从战略层面来看，诺曼人有三个方向可以发展。一是进军罗马、统一意大利，最终在西欧复制查理曼和奥托大帝的事业；二是跨越亚得里亚海，像当年战胜迦太基后的罗马一样，把巴尔干半岛作为下一个目标。最后一个选择，则是向地中海西北非方向进军，针对阿拉伯穆斯林开辟“南线”圣战战场。

在权衡利弊之后，诺曼人最先把兵锋指向了阿拉伯人控制下的西西里岛。优先选取这个目标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让诺曼人的形象，从一个讨厌的搅局者，一跃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守卫者。其实在登陆意大利之初，诺曼人就曾经以拜占庭雇佣军的身份，参与过争夺西西里的战争（因双方内部矛盾，以失败告终）。如果说那时诺曼人是在为钱卖命的话，现在就是在为自己打天下了。更重要的是，开启在西西里的“圣战”，让诺曼人和教廷之间形成可以共赢的同盟关系。诺曼人尊重教廷的权威，并让罗马天主教又多了一个教区；而教廷则让诺曼人在南意大利的统治合法化。一切都有如查理曼和奥托当年的翻版。

第三节 诺曼人在南意大利建立西西里王国

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岛及建立西西里王国

诺曼人完全征服西西里岛，前后用时差不多30年时间，（公元1060——1091年）。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征服西西里，很大程度是因为诺曼人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西西里岛上。在控制西西里大部后，这些冒险家又针对拜占庭帝国发动了几场战争，试图在巴尔干半岛上有所突破。只不过，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诺曼人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撑他们征服拜占廷（后来借着十字军东征的契机，诺曼人还是在东方有所收获的。至于收获到什么，我们后面会分析到）。

需要说明的是，地缘距离决定了，诺曼人在地中海的事业，与在英吉利海峡两岸扩张的诺曼底公国，并无直接关联。这就好像丹麦王国不能算是诺曼底公国的母国一样。事实上这部分诺曼人，在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比法国的诺曼人低。公元1130年，诺曼人成功的从教皇那里谋得了一项王冠，建立了诺曼人名下的第二个王国：西西里王国。诺曼人的“西西里王国”，在内部结构上与由英格兰——诺曼底所组成的“海峡帝国”非常相似，都是由岛屿和大陆部分所组成的。统治西西里王国的诺曼人，也将都城放在了岛屿上。

说到这里，很多人应该已经回忆起，当年希腊与迦太基争霸地中海时，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殖民，所形成的“大希腊”板块概念。历史并非惊人相似，一切都是地缘结构使然。诺曼人的这项工作完成之后，也意味着今后描述这片土地时，我们可以用“大西西里”的概念，替换早已成为历史的“大希腊”概念了。

虽然在西西里的征服还算成绩斐然，但总的来说，诺曼人在意大利半岛不太可能取得新的进展了。一方面，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进军罗马这件事，总是有着很高的热情；另一方面，波河平原在同期，也有不容小觑的新力量崛起（后面我们会分析到是谁）。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查理曼帝国遗产的继承者，都不希望南意大利，有一个如此强大的王国存在。在王国成立之后，来自法兰西、德意志的政治势力都试图通过军事、外交手段控制它。

诺曼人远征北非及其王国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西西里王国开启了它的“迦太基计划”。 我们知道，与西西里岛相对应的非洲岸线，就是今天的突尼斯、当年的迦太基了。诺曼人觊觎迦太基故地，当然不是因为宗教热情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诺曼人也知道以南意大利为起点，在欧洲大陆打拼出一个帝国来的机会，并不会比身处法国的诺曼底公国更大（虽然他们更能影响到教廷）。比较现实的目标，是先谋得一块安身立命之地，然后凭借强大的海军，在地中海沿岸攻占港口城市，最终建立一个贸易帝国。拿到西西里，只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如果能把“迦太基”也拿到手，诺曼人就可以完全控制东——西地

中海的海上贸易通道。



诺曼——西西里王国示意图

凭借强大的海军，诺曼人很快在 12 世纪中叶，控制了从突尼斯——的黎波里一带的沿海城市。以今天的行政划分来看，相当于占领了突尼斯和半个利比亚的海岸线。不过，北非的地缘环境，终究是更适合阿拉伯人。诺曼人虽然能够凭借强大的海军占领沿海城市，却并无法深入内地。很快他们便在穆斯林的反攻下，退回了西西里。

尽管在今后的内容中，诺曼人已经不会再是主角了，他们在西西里的统治，也在历史推进到 13 世纪时宣告结束。从地缘角度来看，诺曼人的贡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西西里岛重新纳入了欧洲范畴；二是把西西里岛与南意大利在政治上紧密结合了

起来，使得这种组合成为一份地缘政治遗产传递了下去。就像英格兰诺曼王朝被更换为金雀花王朝，没有改变“海峡帝国”的属性一样。不管以后“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者是谁，都会致力于将墨西拿海峡两岸的土地，置于同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

应该说，诺曼人在地中海的成就，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他们能够做到这点，得益于维京基因所带来的强大海洋实力。诺曼人的海上事业之所以没能做得更大，是因为除了一直被诺曼人当成主要竞争对手的拜占庭帝国以外，这片内海还崛起了另外几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这些海上力量相互制衡，无形中压缩了诺曼人的地缘空间。至于它们是谁，又在十字军东征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再接着解读。

第四节 威尼斯城的形成背景

日耳曼人先后入主意大利北部地区

说到十字军东征，大多数人脑海中所浮现的应该是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场景：一群手持长剑、外罩十字长袍的欧洲重甲骑士，在与手持弯刀、身披黑袍的穆斯林战士对砍。这种让人热血沸腾的战场景象，让很多人忽视了十字军东征背后的海洋力量。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海上力量支持的话，你很难想象那些身处西欧的十字军战士，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远征西亚。

说到地中海的海上力量，拜占庭和我们刚刚解读过的诺曼人，肯定是重要的两支了。然而在整个十字军东征中，起到最大作用的却不是他们，而是位于波河平原东部的一群商人——威尼斯人。莎士比亚有一部名剧就叫《威尼斯商人》，这部剧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那个唯利是图的犹太商人了。当然，现在并不是要分析犹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威尼斯的问题。事实上，在欧洲任何有商机的地区，都有可能见到犹太人的身影。我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威尼斯这个标签会与“商人”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跟我们正在解读的十字军历史又有何联系。

威尼斯的商业属性从中世纪早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一般认为，公元 5 世纪末东哥特人入侵西罗马是中世纪的开端（也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时间）。在东罗马之后，日耳曼人中的伦巴第人、法兰克人相继统治了意大利北部地区。这其中伦巴第人政治控制治意大利的时间最长，前后超过了 200 年（568 ～ 774 年），真正代表日耳曼人，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完成了拉丁化进程（法兰克人是在高卢完成的）。这也使得波河平原被深深的刻上了“伦巴第”的烙印。

基于伦巴第人在意大利的存在，已经渗透到了方方面面。查理曼入侵意大利后，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地缘融合，而是由查理曼本人通过领有了“伦巴第国王”王位（后来更名为“意大利王国”），直接继承了伦巴第人的政治遗产。这种“偷懒”的做法，在分裂的欧洲是很常见的，也由此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在查理曼帝国之后，伦巴第人留下的地缘政治遗产，被符号化为了一顶王冠——

伦巴第铁王冠（这也是欧洲流传下来最古老的王冠了）。这顶曾经被查理曼加冕过的王冠，被认为是意大利统治权的象征。与后来演变为“法兰西”、“德意志”两大势力的西、东法兰克王国不同，中法兰克王国在 9 世纪下半叶就实际陷入了分裂状态，并为各方势力所觊觎。在神圣罗马帝国从教廷手机中谋得罗马帝国政治遗产之后，“伦巴第铁王冠”也成为了进军罗马的皇帝们势在必得之物（包括后来进军罗马的拿破仑，也同样遵循了这个传统）。

威尼斯的特殊地缘地位

意大利的统治权之所以被符号化为了一顶王冠，是因为在中世纪，这片土地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统一过。欧洲那些源自日耳曼人的政治势力，需要一件能够将日耳曼人和意大利、罗马紧密联系起来的信物，来证明自己在法律上拥有对意大利的统治权（否则怎么进军罗马呢？）。正是基于这一政治需要，比法兰克人进入意大利早、比哥特人统治时间长的“伦巴第”，才有机会让自己变成一个政治符号。



意大利北部行政区划图

至少在 15 世纪之前，几乎整个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还都被称之为“伦巴第”。直至今天，波河平原中部行政标签也仍然是“伦巴第大区”。了解这些，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阅读中世纪历史时，意大利北部的政治势力经常会以“伦巴第”的面目出现。比如 12 世纪中叶，又一位强势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巴巴罗萨，试图进军罗马之时。为了避免自己的独立受到分割，波河平原的一个个城邦就联合起来组成了“伦巴第联盟”，以武力对抗德意志人的入侵。

如果说“伦巴第”这一地缘标签，是日耳曼人统治意大利象征，那么“威尼斯”

就是一个另类了。无论是在伦巴第王国，还是法兰克人时代，威尼斯都没有包含进“伦巴第”的地缘范围内。最初在日耳曼蛮族入侵意大利后，大量不愿意受蛮族统治的罗马遗民不得不向沿海地区，尤其是亚得里亚海沿岸迁移，这其中位置最好的威尼斯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避难点。正常情况下，在日耳曼人覆盖的波河平原，威尼斯这样一个点是没有可能幸免于难的。然而对于一直不愿意完全放弃意大利的拜占庭帝国来说，威尼斯这个港口城市，成为了帝国在波河平原存在的象征。

从技术上看，拜占庭如果想通过海路，保有一个波河平原上的据点，威尼斯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如果结果不能让拜占庭和日耳曼人都觉得有益的话，威尼斯是肯定无法长期受到拜占庭庇护的。真正让拜占庭愿意这么做，又让伦巴底、法兰克等日耳曼王国，容忍拜占庭帝国在自己眼皮底下拥有一个据点的原因，在于威尼斯的商业价值。一个谁都不能忽视的事实是，身为罗马、希腊文明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的经济远比被日耳曼人破坏后的西欧要发达的多。更何况在拜占庭的东侧，还有同样富庶的亚洲（拜占庭还可以向西欧转口亚洲，包括中国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威尼斯这样一个没有政治威胁，但有巨大商业价值的港口城市，游离于日耳曼人的直接统治下，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理解威尼斯与日耳曼人之间的地缘关系，其实并不困难。想想香港为什么能够在1949年之后，仍然能够游离于红色中国之外，这一切就很好理解了。不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一样的。尽管威尼斯之于北意大利的地缘位置、价值，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与香港当年的经历如出一辙，但二者所面临的选项和后来的走向却有很大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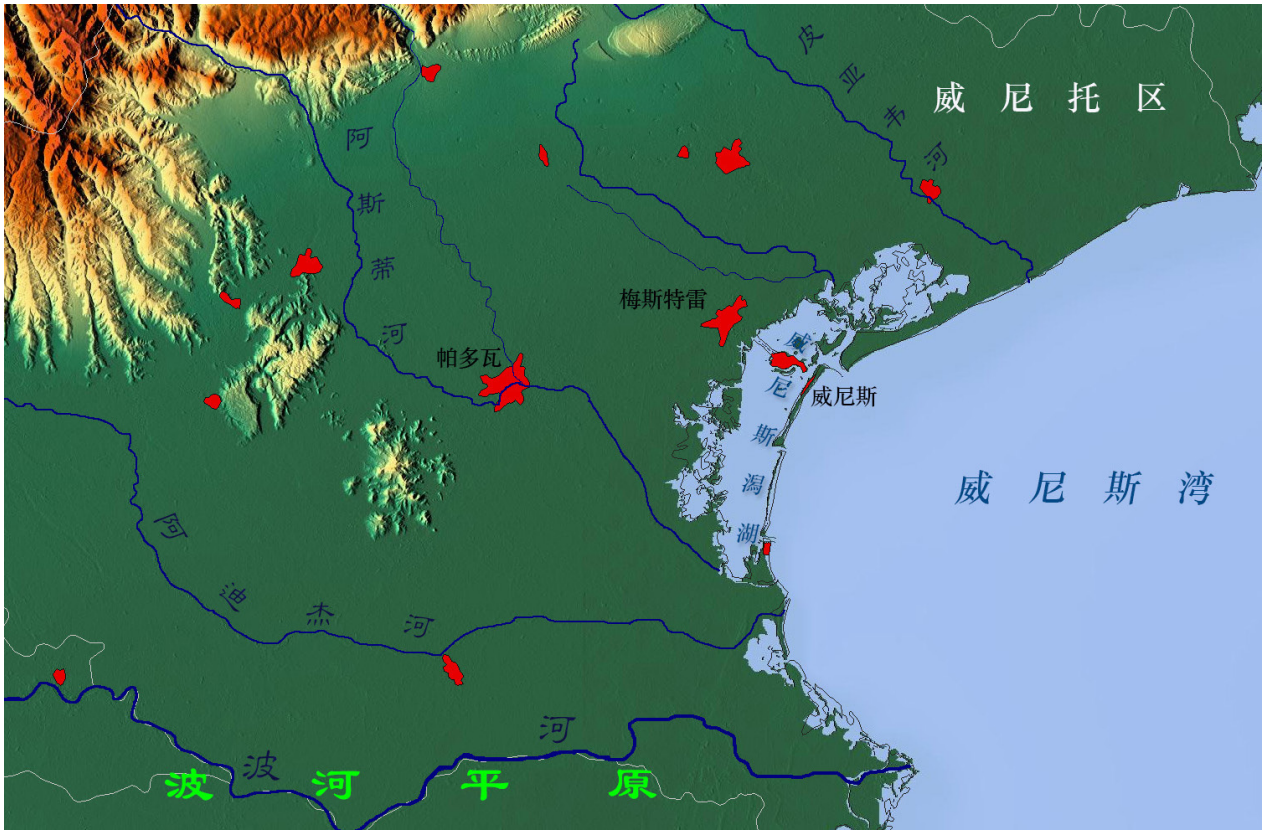
第五节 威尼斯命运改变的契机

威尼斯以独立面目参与地中海博弈

提到威尼斯，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一个建筑在水上的城市。以至于今天中国境内的江南水乡，经常会以“东方威尼斯”之名做旅游推广。其实威尼斯最终成为一座水上城市，也与公元5世纪日耳曼蛮族入侵的背景有关。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像波河平原这个地形平整，又处在蛮族眼皮底下的城市几乎没有幸免于难的可能。为求自保，那些逃亡于此的罗马遗民，开始选择在河口的沙洲上居住，并且以舟楫代步。

不过虽然身处波河平原，但罗马遗民的建城地址，却并非当然的选择在了波河河口，而是在波河河口以北，由阿迪杰河、布伦塔河、皮亚韦河等几条较小河流，所共同造就的“威尼斯潟湖”中。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在这个海湾状的潟湖，遍布着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沙洲，并且在外围已经天然积沙形成了防波堤（所以才被称之为“潟湖”）。这样的条件，不仅有利于威尼斯人打造一座安全的水上避难所，更兼具了成为海港城市的地理条件。同时，造就威尼斯潟湖的几条河流，不仅能够让威

尼斯的商船渗入波河平原腹地，更能直抵阿尔卑斯山麓，与连通中欧平原的商路相连。对于以“陆——海”转口贸易谋生，并试图拥有更广阔市场的威尼斯商人来说，这样的条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正因为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威尼斯才能够成为拜占庭帝国，在北意大利最后的据点。



威尼斯地区示意图



18 世纪的威尼斯

将威尼斯比作香港的话，那么拜占庭和富庶的东方，就是后来的大英帝国以及其背后的整个“西方”世界了。二大帝国的共同点在于，最终都失去了这个重要的贸易平台。公元 7 世纪末，远离拜占庭本土威尼斯人开始实现自治，成为以拜占庭帝国为名义宗主的 “自治共和国”。及至 10 世纪末， “威尼斯共和国”完全脱离了拜占庭的控制，开始以独立城邦国家的身份，参与意大利半岛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地缘政治博弈。如果说威尼斯在独立之前的情况，与香港有诸多相似之处，那么它在脱离拜占庭控制之后的命运，就有着天渊之别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前后维持了将近千年，直到 18 世纪末，拿破仑进军罗马后才宣告结束。至于香港，则已经无可避免的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了。

威尼斯命运改变的地缘政治环境

威尼斯与香港命运走向的不同 ，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块大陆，在大历史的时空范围来看，地缘价值也有着本质区别。总的来说，香港之于东亚大陆，只是战术性的存在。是中央之国在特定自我保护时期，所保留的一个与西方世界沟通的窗口。随着中央之国逐渐找到在维持自己地缘独立性的前提下，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西方世界，进行有效交流的途径，香港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实际上，类似的趋势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了。香港所谓“本土派”这两年的一些过激举动，正是源于这种存在感消失，所带来的焦虑情绪。

相比之下，威尼斯人的空间就要大出许多了。首先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意大利。再把视角抬高点的话，意大利背后又是一个分裂的，建立在西罗马废墟上的西欧日耳曼世界，而这些区域都是威尼斯商人的天然市场。从政治角度来看，面对一个分裂的外部世界，无疑会增加自己合纵连横空间。比如在中国的战国时代，像“韩国”这样位置居中的小国，也有机会凭借外交手段，长期生存于大国夹缝中。从商业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如果威尼斯在中世纪所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即使在政治上仍能暂时保持独立，它的商业议价空间也可能会被大大压缩。

需要说明的是， “一国两制”的做法，并非中国人的创造发明。在同一政权之下，根据各地区的情况，顺势采取符合该地地缘属性的制度，是西方世界普遍的做法，也是其多样性特征的具体体现。威尼斯之于拜占庭，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就政治层面来看，此类贸易城市最大的共性就是：掌握政治话语权的，是一群商人。其最能接受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商业联盟”基础上，以议会、选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共和制”。这也是为什么，威尼斯人所建立的国家被称之为“共和国”，而不是王国或者公国一类的君主国的原因。

然而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在威尼斯也并非一点没有体现出来。尽管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财产需达到一定数额，才有选举权），但其任期却是终身制的（这一点又与君主制国家一样了）。考虑到威尼斯所处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这样的带有一定君主制色彩的共和体制，倒是有助于威尼斯内政、外交的稳定性。当

然，如果权力一直世袭下去的话，威尼斯就算有议会、选举制度，也是不能被称之为“共和国”的（就像有元老院、选举程序的罗马帝国一样）。为了避免权力世袭，威尼斯的平衡方法是，连续两任元首不能再出自同一家族。

其实再进一步观察 “威尼斯共国”（独立之后）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内部这种带有一定集权色彩的“共和”体制，大家是不是觉得和今天存在于亚洲一个城邦国家——新加坡很相似？至于二者之间有哪些相似点，这里就不展开分析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思考比较一下。

第六节 威尼斯参与地中海的海上争霸

威尼斯开启海上争霸

作为一个因水而生、以贸易立国的城邦共和国，去和那些日耳曼王国争夺陆地霸权，显然不是威尼斯的强项，海上才是威尼斯人的空间所在。随着拜占庭实力的消退，威尼斯商人也开始图谋走出潟湖，打造一个海上商业帝国。公元 10 世纪末，在那个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基本成型的年代，威尼斯人海上霸业也开始扬帆启航。

为了争夺海上霸权，你首先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熟悉水性又有钱的威尼斯人来说，这本身倒不是问题。商人的严谨性，使得威尼斯海军在组织性和效率上，要优于同时期的竞争对手。不过对于很多生活在大陆地区的人来说，往往容易把海上霸权理解为海军实力的比较。事实上，真正决定你在海上能走多远的，是你所控制海上基地的位置和数量。比如在美苏争霸时，苏联之所以没有在如日中天时，选择与美国争夺海洋霸权，就是因为美国可以从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继承大航海时代的遗产，先天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拥有大量地缘条件成熟的基地。反之俄国在殖民时代的扩张，虽然为之获得了三大洋的出海口，但本质还是个大陆帝国，在大洋上没有美国那样的回旋空间。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正驶向远洋的中国。尽管中国的海上实力，在这一阶段出现爆发性增长，以至于经常会听说所谓中、美平分太平洋的说法，但在第一岛链以东的岛屿，皆为美日所有的情况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无法做到这点的。即使是在中国视为后院的南中国海，如果没有支点可倚，想从这个方向走向蓝海，也面临战略性的挑战。好在地理、地缘条件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当下强大的经济实力，已经为之打开了一个弥补自身短板的战略窗口。

相信南海吸沙造岛的进程，已经让不少时政迷、军迷感到热血沸腾了。就西沙、永暑、美济、渚碧几岛的技术细节以及战术价值，网上已经有很多详细的解读了，这里就不再多言了。在这里只是从地缘角度做一点提示，即地理布局并不等地缘布局。所谓地理和地缘两个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加入了“人”的因素。中国要想真正把南海变成自己的后花院，最重要的并不是军事层面的威慑，而是“人”的布局。

简单点说，中国耗费巨资所打造这些人工岛，核心目标是要建成布局合理，能承载足够数量常住人口的海上行政区，而不仅仅是一个迪戈加西亚式的纯军事基地（标准是在人口数量，对周边竞争对手的岛礁形成压倒性优势）。

如果经过几代人的经营，能将覆盖西、中、南沙群岛的“三沙市”，打造成一个拥有十万数量级人口的海上城镇群，那么南海与东亚大陆的地缘联系，就算真正建立起来了。先于南海造陆行动而设立的“三沙市”，证明北京方面已经充分意识到在南海经营中，地缘融合的重要性。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设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能实现。



威尼斯

回到威尼斯的问题上来。以争夺地中海海上霸权的先天条件来看，直接继承罗马帝国遗产的拜占庭，无疑是最有优势的。拜占庭帝国之所以能够在蛮族入侵后的意大利，保留几个世纪的影响力，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它代表着“罗马文明”，并且有实力维护罗马时代留下的海上贸易网。这使得包括威尼斯在内的很多沿海贸易城市，愿意主动接受拜占庭为宗主。

威尼斯控制达尔马提亚地区

以威尼斯的地理位置来看，它由一个贸易枢纽城市，走向海洋帝国的第一步，是取得亚得里亚海海岸线的控制权。这片位于意大利半岛与巴尔干半岛之间的海域，传统上一直是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威尼斯、南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半岛的亚得里亚海海岸线，都曾经长期为拜占庭所控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公元 10 世纪，君士坦丁堡不仅失去了在威尼斯的影响力，同时也失去了巴尔干半岛北部海岸线的控



达尔马提亚地区示意图

制权。

观察地图，大家会发现巴尔干半岛北部海岸线（亚得里亚海），散布着一系列与海岸线平行的岛屿，其总数甚至超过了一千个。这一系列岛屿及其相应的大陆岸线，有一个特定的地缘标签——达尔马提亚（其岛屿部分为“达尔马提亚群岛”）。如果按照国土范围与海岸线相对应的原则来看，今天达尔马提亚地区应该为克罗地亚、波黑所共有。然而颇为奇特的是，整个达尔马提亚地区目前几乎都为克罗地亚所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共和国（波黑），只是勉强挤出了一个出海口，以避免成为一个完全的内陆国。

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空，是很难一下子解释清楚达尔马提亚的归属问题的（要等到奥斯曼人登陆巴尔干后）。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因其优越的港口条件、漫长的海岸线，是任何一个试图称霸亚得里亚海的势力，势在必得的板块。不过最初迫使拜占庭退出达尔马提亚的，并不是来自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而是斯拉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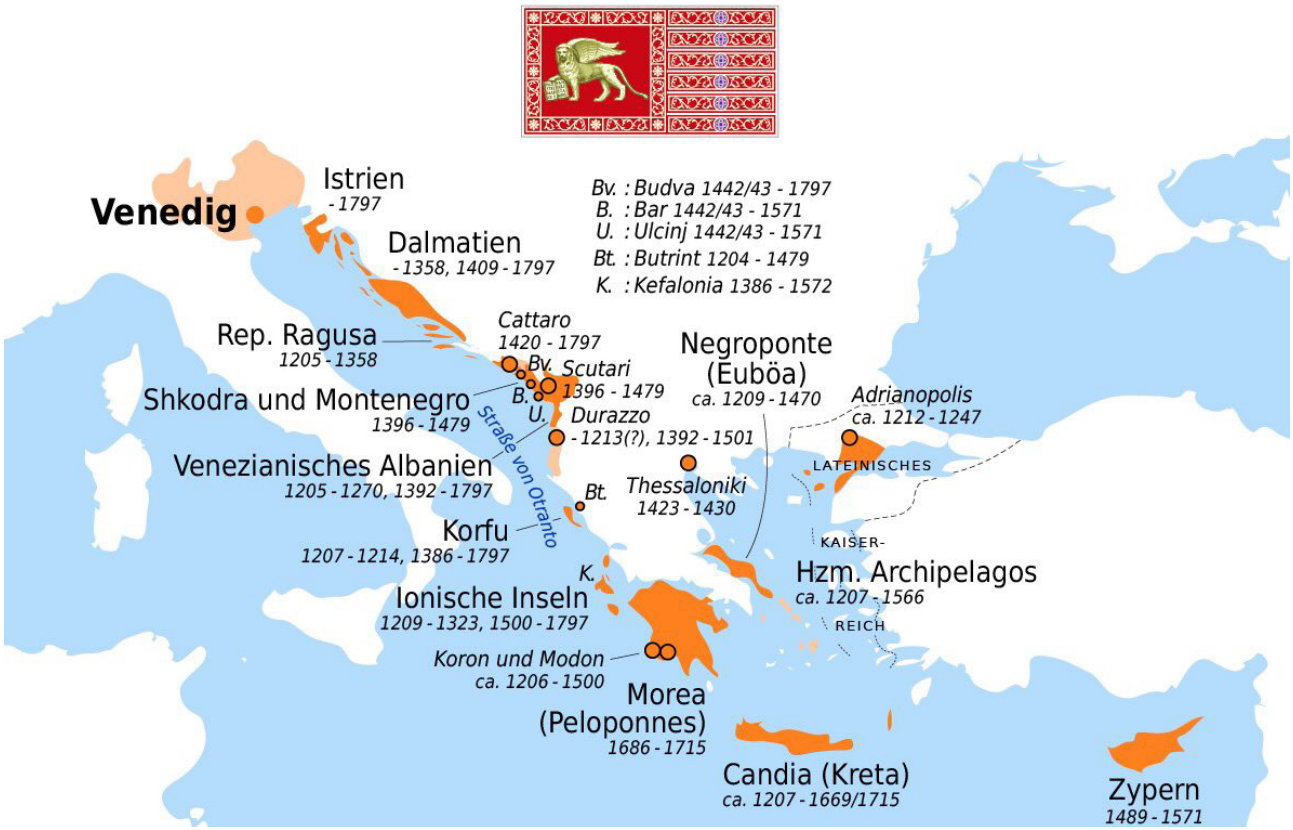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公元 6——7 世纪，在日耳曼人反客为主，肢解西罗马、威胁东罗马后，重生的拜占庭帝国就已允许斯拉夫人越过多瑙河，穿越潘诺尼亚平原，进入巴尔干半岛北部的这片山地。这些从中欧迁移过来的斯拉夫人，演变成为今天的“南斯拉夫人”。在最近这一百年间，包括塞尔维亚、克罗的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等南斯拉夫民族，经历了一场场分分合合的悲喜剧，并最终分别建立了民族国家。

拜占庭人当年的初衷是希望这些斯拉夫人，能够战略性的替代日耳曼人曾经发挥的作用，替帝国拱卫边疆。只是在时间的作用下，当斯拉夫人与巴尔干半岛在地缘上融为一体之后，君士坦丁堡再想控制这片土地，就不那么轻松了。好在拜占庭还暂时还能维持海洋优势，因此直至公元 9 世纪，达尔马提亚群岛及其北部的伊斯特拉半岛（今大部亦属克罗地亚），仍属拜占庭的势力范围。

随着“南斯拉夫人”的势力逐渐走强，那些原本在巴尔干内陆发展的斯拉夫人，也开始觊觎拜占庭在达尔马提亚的殖民地了。这部分向西发展的“南斯拉夫人”，就

是现在的克罗地亚人。公元 10 世纪，克罗地亚人进入达尔马提亚地区，并且开始建立基督教国家。为了对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克罗地亚人选择了跟随罗马教廷的脚步，成为了天主教徒。在后来的历史中，来自天主教地区的征服者，进一步强化了克罗地亚人的天主教信仰。

为了控制达尔马提亚群岛，克罗地亚人也相应的发展了自己的海上力量。然而在严谨的威尼斯商人，以及旧宗主拜占庭帝国眼中，达尔马提亚的这些斯拉夫航海者，更像是一群海上秩序的破坏者，或者说“海盗”。其实说起来，在欧洲文化中海盗与海商之间的界限，本来也算不上泾渭分明。“海商”也会看准时机，做些无本钱的生意；“海盗”也同样会进行公平贸易，这些都只是相对而言罢了。



威尼斯共和国控制区示意图

不管怎么说，逐渐失去亚得里亚海控制权的拜占庭，以及寻找机会进行海外扩张的威尼斯商人们，都有恢复亚得里亚海原有贸易秩序的想法。在多线作战的拜占庭无力主导这一切时，“威尼斯共和国”抓住机会与前宗主达成协议，以达尔马提亚为起点，开始了它的海外扩张事业。值得玩味的是，当年罗马也是以打击海盗、重建亚得里亚海贸易秩序为名，征服达尔马提亚群岛南部的“伊利里亚”地区的。

征服达尔马提亚的战争进行的很顺利，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散布于达尔马提亚地区的那些贸易城市，原来就属于罗马——拜占庭体系，克罗地亚人对贸易秩序的破坏，无疑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即使不考虑归属感的因素，达尔马提亚群岛的前拜占庭殖民地，也是希望能够摆脱这些“蛮族”的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历史跨入公元纪

元后的第二个千年时，威尼斯人终于获得了达尔马提亚群岛（包括伊斯特拉半岛西海岸）的控制权，向建立地中海贸易帝国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在地缘结构复杂的地中海，威尼斯人的海上之路，注定是不会平坦的。因为进入新千年之后，这片看似平静的海洋上，拜占庭海军并不是唯一需要关注的对象。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地中海再一次迎来了海上博弈的高潮。

第七节 意大利半岛西海岸开展海洋贸易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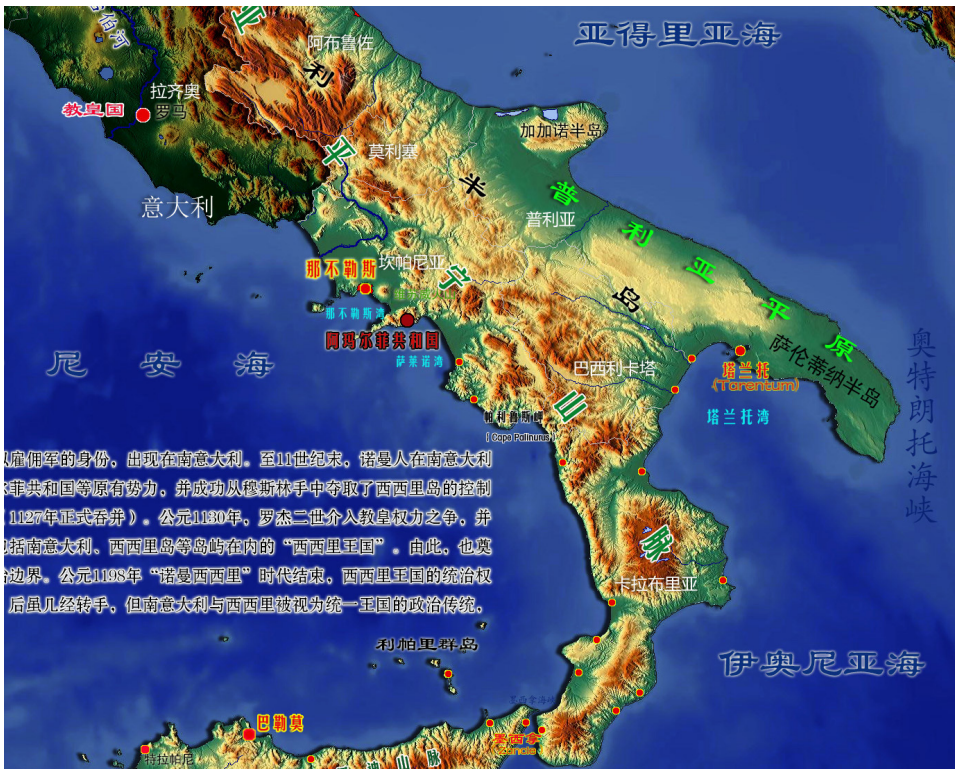
意大利半岛西海岸的海洋基础

拜占庭在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全数被威尼斯接收，因为很快富于冒险精神的诺曼人，就开始了他们在南意大利的征程。不过对于威尼斯人来说，诺曼人的介入并不全是坏事。作为一名优秀的商人，一定要有从任何事情中看到机会的本领。诺曼人插入地中海的中心，最直接影响到的是拜占庭的利益。带有海盗基因，并且拥有强大武力的诺曼人，甚至多次登陆巴尔干半岛，试图在拜占庭的根基之地扩张。在这种两虎相争的背景下，威尼斯人的选择将直接决定双方的博弈平衡。

最终威尼斯人战略性选择了站在拜占庭帝国一边。除了双方之间产生贸易摩擦的时段，在整个 11 世纪后期至 12 世纪后期，也就是诺曼人坐镇南意大利（包括西西里）的这段时间，威尼斯海军都以拜占庭海军盟友的身份，参与了对抗诺曼人的战争。从商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选择是很理性的。因为如果威尼斯人如果选择和诺曼人联手的话，即使能够肢解拜占庭帝国，也很难说能够在和这帮维京后裔的谈判中，分到多少战利品；反过来和拜占庭帝国合作的话，获得的利益就很明确了。简而言之，威尼斯藉此成为了拜占庭在西地中海的代理人，几乎垄断了从拜占庭转口亚得里亚海的贸易权。

尽管威尼斯的东方贸易做得风声水起，并且已经在亚得里亚海占据了优势，但请不要忘意大利是个半岛结构，除了威尼斯所主导的东海岸、诺曼人控制了南意大利以外，半岛还有西海岸。在这个方向，还有两个体量与西西里岛在一个量级的岛屿：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一直到公元 11 世纪初，阿拉伯人还是意大利以西海域的主导者。阿拉伯人不仅控制了科西嘉、撒丁、西西里三岛，还不时的袭扰意大利半岛的西海岸。相比之下，拜占庭势力范围内的亚得里亚海，就要太平的多。

不过意大利半岛在罗马时代毕竟还有有深厚海洋基础的，日耳曼蛮族的侵入，也不可能把所有海洋基因抹去。既然威尼斯人能够在东海岸脱颖而出，那么半岛的西海岸也同样有条件出现类似的贸易城邦共和国。问题在于，这个点究竟会落在哪里。并不是海岸线上的每一个点，都有机会成为另一个威尼斯的。要想成就一个以海洋贸易为经济主线的城邦共和国，首先你得有能够停靠大量船泊的避风港。最有可能形成天然海港的，是靠山面海的地形。从这个角度看，冲积平原狭小、山地密布的南意大利（包



诺曼——西西里王国示意图

括西西里岛），是最有机会创造天然港口的。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希腊人，集中在这一区域打造贸易殖民地，并且为之打上“大希腊”标签的根本原因。

以意大利半岛西海岸的地形情况来看，那不勒斯所在的“那不勒斯湾”及其以南的海岸线，是半岛上天然海港的集中之地。事实上，最早在半岛上正式建立的“海洋共和国”并不是威尼斯，而是那不勒斯湾南部的“阿玛尔菲共和国”（ Amalfi，公元 850 年）。不过在 11 世纪中叶，诺曼人的扩张进程中，这个先发的共和国被迫从地缘政治舞台上消失，成为了“西西里王国”的一部分罢了。

台伯河口没有建立贸易港口的原因

那不勒斯湾以北，亚平宁山脉以西，是橄榄核状的平原、丘陵地带。我们曾依其轮廓形象的将之称为“弓腹”部分（亚平宁山脉北为“弓臂”）。在罗马初创时期，这块“弓腹”地带以台伯河为界，被分为北部的“伊特鲁里亚”、南部的“拉丁姆”两部分。其中伊特鲁里亚人最先进入文明阶段，并且长期统治包括罗马人在内的拉丁姆地区。在罗马崛起之后，伊特鲁里亚、拉丁姆地区相融，共同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核心区。

作为罗马文明的核心区，丘陵、平原相间的“弓腹”部分，也是意大利半岛农业最发达、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并因此有着强劲的贸易需求。当年伊特鲁里亚人能够比拉丁人先发，正是得利于他们最先开展了海上贸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地区做大海上贸易时最大的短板也显露出来了：就是沿海多为冲积平原，缺乏优质的天然海港。不过这一问题，并非无法解决。

所谓“海港”指的并不仅仅是背山面海，通常位于海湾处的天然海港（可称之为“海湾港”），还包括另一种位于江河入海口处的“河口港”。这种兼具海、河优势的港口，既能躲避恶劣海洋气候又能将水上运输线向内陆延伸，贸易潜力往往比海湾港还要更大。威尼斯港就是“河口港”的一种类型。只不过威尼斯潟湖的存在，以及

威尼斯人为躲避战乱，密集开发河口沙洲上的无心插柳，更加强化了威尼斯陆——海连接点的地位。

然而比之天然的海湾港，河口港最大的问题在于稳定性。河流的天然造陆功能，使得河口港需要经常性的清淤维护，才能保证港口的通畅。通常情况下，大河的河口因为能够拥有更大的经济腹地（内河沿线人口多）并且河道较宽、较深，会更容易兴起以“河口港”立身的贸易城市。比如欧洲货物吞吐量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鹿特丹港，以及中国最大的上海港，就是依托莱茵河、长江，成就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在亚平宁山脉以西的半岛中西部地区，流程最长的河流是罗马城所在的“台伯河”，以及北部流经佛罗伦萨、比萨等著名城市的“阿尔诺河”（亚诺河 Arno River）。结合自然条件以及地缘政治背景，台伯河河口应该是最有机会成为整个地区贸易中心的。在罗马时期情况也的确是这样。由于沧海桑田的变迁，罗马城本身离海岸线还有一段距离，并非建港的最佳选择。为此罗马人于公元前四世纪，在距离罗马城 25 公里的台伯河口修筑了一座叫做“奥斯提亚”的海港城市，以为罗马和台伯河流域承担“海——河”转运功能。



罗马共和国地缘结构图

然而罗马城或者奥斯提亚城，却并没有在中世纪成为西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中心。这是因为，当罗马帝国因日耳曼蛮族的压力，被迫在色雷斯兴建“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后，罗马城的地缘作用就开始由政治、经济中心，转型为宗教中心了。尽管罗马教廷存在的历史中，也不可避免的会跟“钱”打交道（比如收收“什一税”、买卖“赎罪券”），但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显然不会再适合承担贸易中心的功能。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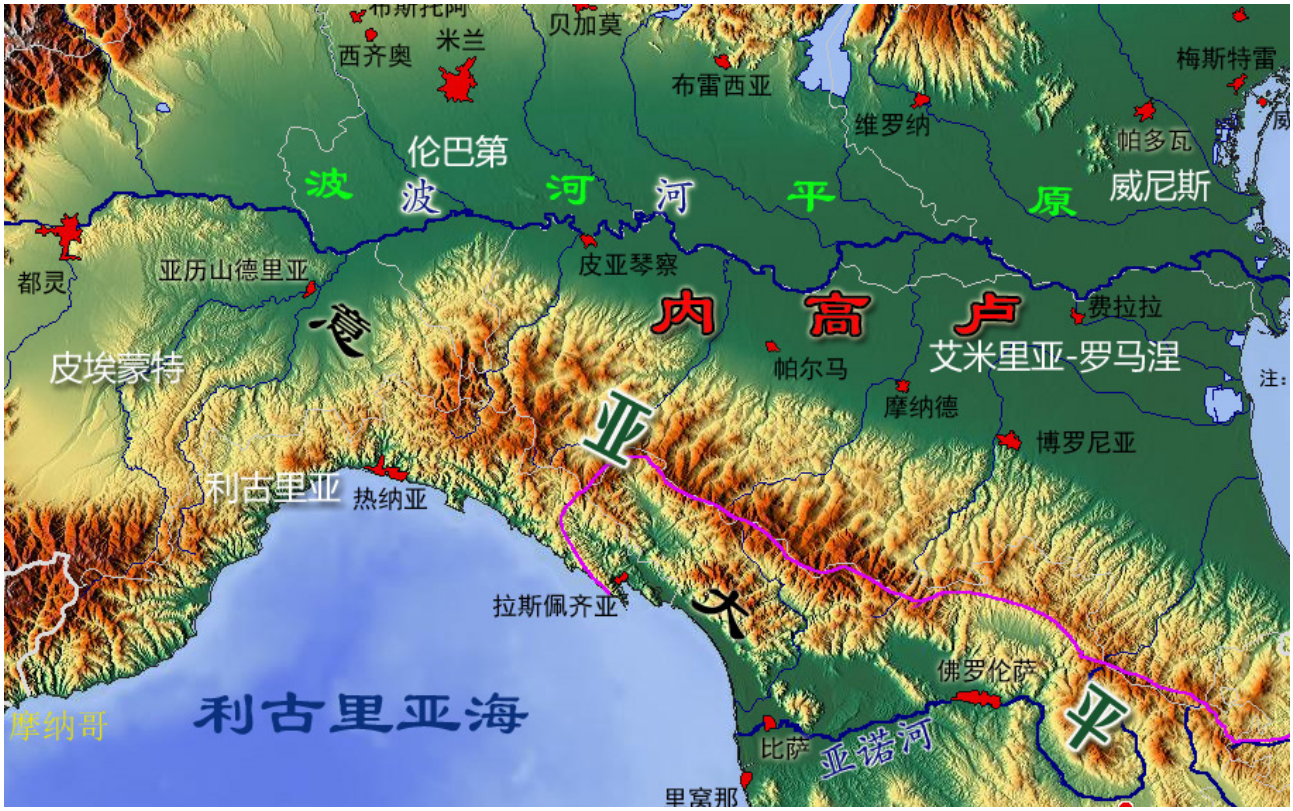
一背景下，流域面积仅次于台伯河的阿尔诺河（亚诺河 Arno River）河口，开始接过半岛中部的贸易大旗，诞生出一个强大的海上贸易共和国——比萨共和国。

科西嘉、撒丁、西西里三岛与意大利半岛之间的海域，被称之为“第勒尼安海”，而位置最北的科西嘉岛与波河平原之间的海域，则被称之为“利古里亚海”。比萨的位置处于利古里亚海的东侧。在三岛被阿拉伯人控制的情况下，比萨想取得这两片海域的霸权，势必与阿拉伯人正面交锋。不过比萨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它并不是意大利半岛西侧，唯一试图崛起的海上贸易城市。在利古里亚海北侧，还有一个天然条件更好的港口城市——热那亚，也同样虎视眈眈的盯着西地海中海的贸易利益。那么最终谁笑到了最后？

第八节 比萨和热那亚在海洋贸易上的竞争关系

比萨控制撒丁和科西嘉并与诺曼人争夺西西里岛

亚平宁山脉在利古里亚海的北部走势开始趋缓，并且与海洋开始无缝对接（缺少沿海冲积平原）。这种地势也造就了北意大利最好的天然海港——热那亚港。如果大家对布匿战争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能记得在罗马入侵之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土著部族叫做“利古里亚人”（利古里亚海也因此得名，今天以热那亚为首府的大区也叫利古里亚）。当年利古里亚人和高卢人（凯尔特人）一样，成为了作为汉尼拔的盟友。汉尼拔的一个弟弟，还曾经带领援军从利古里亚登陆。



罗马共和国地缘结构图

如果说比萨的经济腹地，是意大利半岛中部的话，那么热那亚在地缘位置上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充当波河平原与西地中海的贸易窗口。然而二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太近了，同处一片海域的二个海洋共和国，不可避免的会在利古里亚海乃至整个西地中海产生贸易冲突。不过矛盾这种事向来是分主次的，最起码在穆斯林仍然占据科西嘉、撒丁两岛时，双方之间的合作大于竞争。

抛开宗教方面的原因，比萨、热那亚两国也有抢占两岛需求。因为在宗教对立的大背景下，占据两岛的阿拉伯人并不能在政治层面，与意大利的基督教世界建立贸易关系（走私不算）。基于双方的地理距离，相信你能想象出这些阿拉伯人，会经常采取什么的形式去半岛“作客”。既然威尼斯人能以打海盗为名，在亚得里亚海重建贸易秩序，为什么比萨和热那亚不能这样做呢？

事实上，比萨、热那亚采取行动的时间要比威尼斯人更早。公元 1015 年，双方所组成的联合舰队就拉开了海上反击战的序幕。直至至 11 世纪中叶，穆斯林势力终于被彻底赶出了撒丁、科西嘉两岛。在这个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与教廷地缘关系更为密切的比萨。比萨人不仅可以从教廷丰盈的财政收入中分一杯羹（建立政商合作关系），更能占得先机，让教廷授权自己成为撒丁、科西嘉两岛的实际控制人。

取得了撒丁、科西嘉岛控制权比萨人，并不意味同时获得了第安尼策海的霸权。要想做到这点，西西里岛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尤其西西里岛的归属，还关系到打通东、西地中海的贸易线的问题。为此比萨人在北部两岛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对西西里岛发起了远征（1162 年）。然而同一时期，西西里岛也成为了诺曼人的征服目标。虽然比萨人很希望和诺曼人一起瓜分西西里岛，但很显然后者并不愿意这么做。最终比萨人识趣的退出了西西里争夺战，诺曼人独立完成了在西西里的圣战。不过控制西西里的诺曼人，最终并没有影响到比萨人在西地中海的势力扩张。对于这个自认掌握了地中海中枢的王国来说，拜占庭才和巴尔干半岛，才是最有价值的地缘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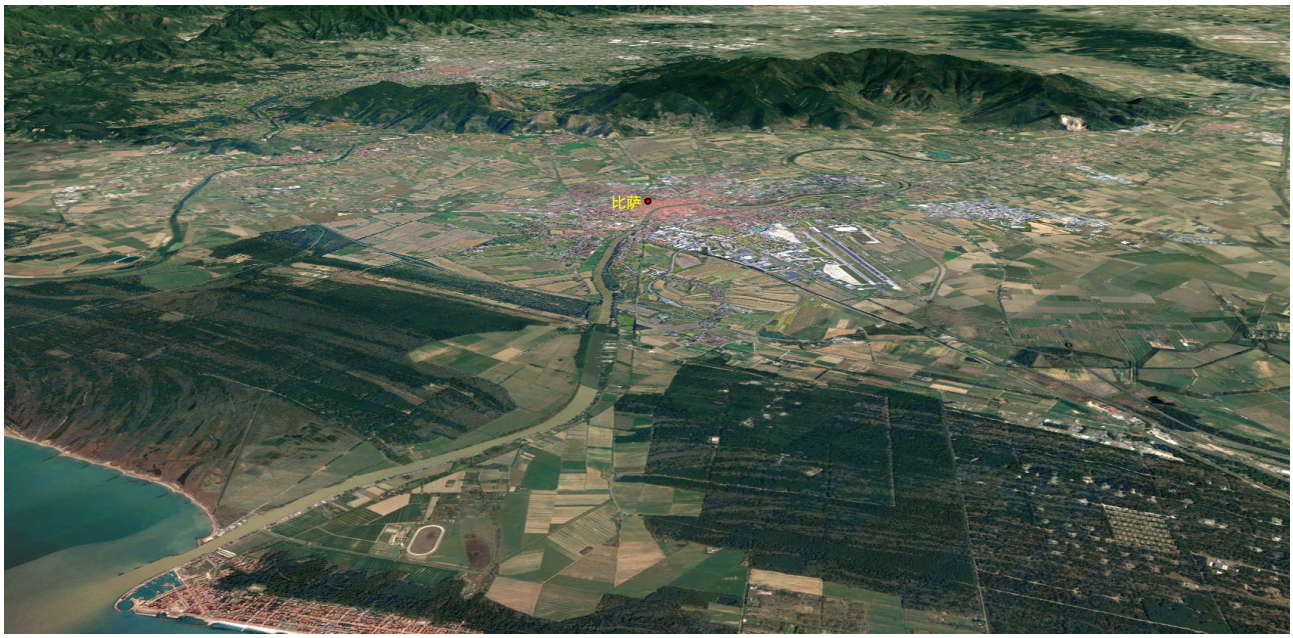
热纳亚在与比萨的竞争中胜出

相比之下，被困在西地中海的比萨人，则将扩张方向锁定为了阿拉伯人控制下的北非、西班牙沿海地区。不过商人出身的比萨人，并不是为了所谓“圣战”目标才去做这些的。同时在整体环境干旱的北非，登陆并夺取殖民地也不是个好想法，毕竟在这片土地上，骑骆驼的阿拉伯人占据了地缘优势。这点自认为武力强大的诺曼人认识就不太清楚，以至于他们拿下从突尼斯到的黎波里的海岸线后，仅仅维持了几年就被迫退出。比萨商人的目标，则是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把西地中海的穆斯林城市纳入自己的贸易网。

在比萨人的武力威胁下，一些穆斯林城市与比萨人建立了贸易关系，甚至向其缴纳税金。不过最终能够维持双方关系的，还是贸易所产生的利益。其实事情就是这样，一旦有人迈出了第一步，对立的双方会发现，彼此间并非只能玩零和游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比萨人就没有领土要求了。对于海上霸业的建立者来说，那些能够控制航

线的岛屿，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2 世纪初，比萨人征服了靠近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进一步完成了西地中海的海上布局。

凭借西地中海“穆斯林——基督教世界”贸易中间商的地位，比萨成为了西地中海的霸主。对于这一切，与比萨在地缘位置上存在天然竞争关系的热纳亚，当然是十分的不满了。事实上，双方的矛盾早在争夺撒丁、科西嘉岛时就已经暴露了，不过在教廷的调停，以及更大利益的诱惑下，矛盾暂时还不至于白热化。双方的海上竞争，前后延绵了二个半世纪。直到 13 世纪末，热那亚在利古里亚海中的梅洛里亚海战[1]（Bataille de la Meloria）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方告结束。此后比萨逐渐失去了独立地位，并且把阿尔诺河流域的地缘中心，让位给了位于中游的佛罗伦萨。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热那亚最终战胜比萨，我们在后面的内容中会给出答案。不过倒是可以提前解答一下，热那亚是怎么让比萨失去地缘优势的。



比萨位置图

基于热那亚与比萨的海上竞争关系，热那亚人在获胜后压制比萨的发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拥有海洋优势的河口城市总是比中上游城市更加有地缘潜力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比萨的地位最终甚至被佛罗伦萨所取代（甚至曾被佛罗伦萨所统治），就多少有些意外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结局与比萨的海洋基础不够稳定有关。我们曾经说过，像比萨这样的河口港，需要经常的清淤维护才能够保证港口的通畅与规模。被热那亚击败、经济遭受重创的比萨，在港口维护的投入上势必会锐减，并造成恶性循环。简单点说就是：收入少了，港口条件变差；港口条件差变了，反过来又影响收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恢复的代价也会越来越高。

1　在第勒尼安海的梅洛里亚小岛发生。战后，比萨共和国被永远从海权强国的名单中除名。热那亚共和国则取得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主权。马可·波罗正是在这场海战中被俘，后在热那亚监狱中写成了著名的《马可·波罗传》。

事实上，热那亚人也注意到了比萨的这块短板。在战胜比萨后，热那亚人甚至在比萨上游的阿尔诺河河道中筑了一段拦水坝，以让水流变缓。其结果就是导致那些本可被水流冲入大海的沙石，更多的沉淀到了河口。这般动作倒是与罗马在征服迦太基后，毁城洒盐的恶毒做法颇有相似之处。相比之下，要是比萨人征服了热那亚，想毁掉这个天然的海港，就要困难得多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热那亚港仍然是意大利第一大港，而比萨却只能靠斜塔闻名于世的原因所在了。

在争霸西地中海的博弈中，比萨已经占得了先机，如果热那亚在战略层面上没有突破的话，应该是很难压倒比萨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让热那亚得以最终反转成功呢？

最后说一点小知识：斜塔是比萨的，但“比萨饼”却不是比萨，而是那不勒斯的。一个是 PISA，一个是 Pizza，只是中文译名相同罢了。为了避免误会，那张饼实是应该译成“披萨”的。

第十三章 阿拉伯帝国的兴衰

第一节 伊斯兰教早期继承人的推选

拜占庭与西欧天主教世界的联合

人们常用“黑暗”二字来形容中世纪的西欧，也有观点认为，其实在这“黑暗”的一千年，那些日耳曼后裔也是有进步的。比如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大宪章”就是中世纪时代的产物。不管怎么认定，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世纪的欧洲在物质上的确是比较匮乏的。相对于富庶的罗马时代，经济上倒退了不少。在见识过商人们从东方带来的奢华商品后，很自然的会产生对东方的向往。至于“宗教”，只是一个最容易引发共鸣的借口罢了。

然而西欧的天主教世界想要发动“圣战”，地缘政治上有一个很大的障碍需要跨越，那就是拜占庭的态度。基于二者在意识形态及政治上，已经明显分化成了两个阵营，拜占庭人并非是天主教徒们的天然盟友。问题是如果没有拜占庭的加入，并沿途提供基地、补给，天主教徒们即使有足够的船，也是无法发动远征的。然而政治是务实的，富裕的拜占庭人，提防这些毁灭西罗马的日耳曼王国之心，胜过那些从自己手中夺走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人，并不会因为一句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的口号，就把这些“穷亲戚”引进来的（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也证明了这样做的确是在引狼入室）。

真正能让拜占庭人在战略上和西欧天主教世界联合的理由，是自身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尽管在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拜占庭很快失去了埃及和西亚的领土，但在仍然保有小亚细亚，并且有亚美尼亚王国从中缓冲的情况下，帝国的整体安全还是有保障的。然而当历史跨越到新的千年之后，拜占庭帝国所面临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倒不是说，阿拉伯帝国变得愈发的强大。恰恰相反，此里的阿拉伯帝国早已处于分裂状态，而拜占庭所需要直面的这部分，甚至已经开始崩溃了。

将基督徒们在十字军东征中，所面临的对手描绘为“阿拉伯人”其实是非常不准确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穆斯林”。这是因为，扩张之后的阿拉伯帝国，内部民族结构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那些以异族身份加入穆斯林阵营的民族，甚至在对抗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地位。比如知名度最高的穆斯林将领“萨拉丁”，就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库尔德人。

穆罕默德离世后继承人的产生

要想详细了解穆斯林世界的这些恩怨，需要很长的篇幅。好在之前已经花过时间，写了30余万字的中东部分。如果详读过那部分内容，再理解以后的内容就会轻松多了。不过即使没有读过也不要紧，所谓“历史”就是一出罗生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同一事物。我们可以从探究十字军东征事件背景的角度，再来简单梳理一下穆斯林

世界的前世今生。

儿时课本上看到阿拉伯历史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三种颜色：白色、黑色，以及绿色。这三种颜色对应的，就是所谓的白衣大食、黑衣大食、绿衣大食了。大食，是古代中国人对中东穆斯林的统称，最早所指向的其实是波斯人。不过后来这样的划分，多是对应的是阿拉伯帝国分裂后的三个部分了。记得当时实在是很难分清这三部分对应的区域，于是老师就用联想记忆的方法帮助大家辨别：西班牙人是“白种人”，所以西班牙对应的就是“白衣大食”；尼罗河是农业发达的绿洲，所以埃及对应的就是“绿衣大食”。至于 “黑衣大食”，既然你都知道穿绿衣和穿白衣的在哪了，剩下的亚洲部分自然就是穿黑衣的了。当然，后来知道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不过对于小学生来说，能够对此类知识做到一点了解，回想起来也算是难得了。只是不知现在各地的小学，是否还有历史课。

言归正传，回到事件的源头。穆罕默德在公元 7 世纪初创立伊斯兰教，并迅速统一阿拉伯各部已经是常识了。不过很多人并不清楚，所谓的阿拉伯帝国，却并不是在这位圣人在世之时，而是在他死后创立的（公元 632 年）。不管什么类型的组织，继承问题都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情。在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由氏族成员共同推选首领，算是最常用的方式了，教科书中也把这归类为“原始民主”。需要注意的是，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并不是沾上“民主”二字就代表着社会进步的。后来权力趋向集中的那些制度，因为效率和稳定的因素，在竞争中也逐步取代了“原始民主”制。

当然，民主和集权的优劣辩，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也极易产生口水战）。在这里所说的优劣，只是放在当时的地缘背景下来说。比如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之所以能够进入文明视线，很大程度就是他们开始脱离原始氏族阶段，开始进入等级分化的“封建社会”；又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在现在看来，简单是一无是处。不过这一制度的设计，却让印度文明能够以一个完整的文明体传承下来。从这个角度看，华夏文明倒并非是唯一传承下来的古代文明。

在穆罕默德离世之后，阿拉伯诸部根据原始民主的惯例，先后推选出了四任最高领袖——“哈里发”[1]，意为“安拉使者的继承人”。从哈里发之名的原意来看，此时的阿拉伯世界还处在一个教权高于政权，或者说宗教领袖主导政务的政教合一时代。这一时期也因此被称之为阿拉伯的“神权共和时期”（公元 632——661 年）。然而在经历过短暂的“共和”时代后，用意识形态武装起来，并且扩张出了极大版图的阿拉伯民族，已经不可能用原始的“民主”形式来做行政管理了。无可避免的，阿拉伯世界将摆脱原来的部落联盟结构，进一步向建立真正的“帝国”迈进，而为乱整个穆

1　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于公元 632 年去世后，阿拉伯穆斯林在其后的 30 年里产生过四任哈里发。他们分别是：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哈塔卜、奥斯曼·本·阿凡和阿里·本·塔里卜。阿里·本·塔里卜被哈瓦利及派暗杀后，倭马亚家族夺去了哈里发权力，建立了倭马亚王朝，开始实行哈里发世袭制。

斯林世界的分歧，也正是在这一刻开始出现。

第二节 伍麦叶王朝的建立

伊斯兰教世界权力传承与血统的问题

当历史的车轮，即将把“阿拉伯帝国”推向地缘政治舞台时，剩下的问题就只是政权的归属问题了。这看起来似乎应该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作为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的子孙应该是最有资格得到这一切的。鉴于这位圣人的儿子都不幸早夭，他的女婿（也是堂弟）“阿里”成为了第一顺位继承人。然而在历史和电视剧中，看惯了各种中国宫廷戏的朋友们，应该明白一点，在权力争夺之中，血统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即使建立了万世一系的继承原则，这些君主中的绝大部分也摆脱不了“虚位君主”的命运。这一问题上，日本的“天皇”就是典型案例。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傀儡的定位也不一定是坏事，最起码可以避免成为权力争夺的焦点，把自己的血统延续下来。

以伊斯兰教的宗教控制力来看，本来是完全有机会做到，维系一个千年一系的名义政教领袖的。即使不能一直维系如日本天皇式的地位，最低限度也可像孔府的“衍圣公”一样，世袭一个宗教守护者的超然地位。然而最初设计的一个技术偏差，却让这种可能性成为了泡影，并且事实造成了穆斯林世界的最大分歧。这个技术偏差，就是穆罕默德在离世之时，并没有为自己的血亲继承者规定一个超然的政教地位。我们无法肯定，这是圣人有意为之，还是一个技术失误（抑或背后有阴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不确定性为阿拉伯世界最高统治者的选择，留下了无限的解读空间。

公元 610 年，穆罕默德结束了在 “希拉山洞” （麦加城外）的冥想，创立了伊斯兰教。仅仅用了 20 年时间，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们就挑战旧秩序成功，入主阿拉伯半岛最重要的宗教中心（也是商业中心）——麦加。基于这并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重大改变（由“多神”信仰向“一神”信仰转进），这个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要知道，仅仅是为了在罗马帝国取得合法地位，基督教就花将近 300 年时间（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宣传基督教合法化）。

伊斯兰教的教派分歧与伍麦叶家族的夺取权力

在统一阿拉伯民族的过程中，武力和经书并不是唯一推动力，更多的是台面下的妥协。简单点说，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破旧立新的过程。比如麦加的圣城地位得以保留，之前作为多神崇拜体系中的圣物——黑石，也转型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圣物。当然，这种宗教层面的调和背后所隐藏的，是以麦加贵族为代表的阿拉伯旧势力的权力，在伊斯兰时代被延续了下来。

阿拉伯世界的新旧势力，能够那么快统一在伊斯兰教的大旗之下，更大的因素还是合作所展示的巨大想象空间。作为地中海地缘圈的边缘民族，在沙漠中苦苦求生



阿拉伯的穆斯林士兵

的阿拉伯人，没有理由不觊觎新月沃地，乃至周边更广阔的富庶之地。现在有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能够让原本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成强大的合力，并且还不损害原有统治阶层的利益，麦加那些兼具商人和部落首领双重身份的贵族，自然是算得清帐的。后来的结果来证明，“左手持剑，右手捧经”的穆斯林们，也的确做出了其它地区游牧民族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成就。今天，强大的蒙古帝国早已烟消云散，而谁又能认为，在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上，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角色，是可以被忽视的呢？

尽管阿拉伯民族，为自己找到了一件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但内部政治斗争，该有的还是一样不会少。只不过这一次，宗教而不是部落间的差异，成为了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这一点和欧洲同时期开始出现天主教、东正教分化（虽然当时还没正式分裂）的情况如出一撤。放在伊斯兰世界，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差异了。

什叶派和逊尼派最初的差异，简单点说就是：什叶派认为“阿里”才应该继承哈里发一位；逊尼派则不承认“阿里”的继承权，旧麦加贵族是这一派的核心。很显然，这种情况要是放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观里，完全可以被描绘为“混入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试图窃取革命果实”。至于结果，其实也和历史教科书中描述的大多数情况一样，试图打破旧秩序的革命者，悲哀的发现胜利果实还是被“窃取”了。

最终成为“阿拉伯帝国”统治者的，是来自麦加的贵族首领——伍麦叶家族。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伍麦叶家族击败了阿里和他的追随者，其于公元 661 年所建立的王朝被称之为“伍麦叶王朝”（或译“倭马亚王朝”）。套用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名称，就是所谓“白衣大食”了。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初代帝国以及逊尼派源头，尽管伍麦叶家族曾经是“先知最凶恶的敌人”（和解前联合整个阿拉伯世界与穆罕默德作战），但“白衣大食”的正统地位还是就此被奠定了。今天阿拉伯人，以一袭白色长袍示人，本质上就是对这一历史定位的认可。

不过最终站在十字军面前的阿拉伯帝国，却并不是“白衣大食”，而是“黑衣大食”。至于穿着尚黑的穆斯林，与尚白的穆斯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背后又隐藏了什么样的地缘密码，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三节 阿拔斯王朝的建立

什叶派与波斯人在呼罗珊起义推翻伍麦叶王朝

“黑家大食”，顾名思义就是穿黑衣的穆斯林了。既然伍麦叶王朝所崇尚的“白色”，成为了今天阿拉伯人的正色，那么“黑色”又被什么民族继承了呢？说到这里，估计很多人已经在脑补时事新闻里的各种穆斯林形象了，但凡对此类细节有过关注的人，多半已经想到了一个和逊尼派阿拉伯人格格不入的族群——波斯人。的确，伊朗给人的感觉就是满街都是黑色的旗帜、黑色的长袍，包括缠头的式样，也与阿拉伯人的头巾有着明显的区别。鉴于两大民族的历史恩怨，“黑色”俨然成为了，波斯人用来彰显地缘独立性的标志。问题是，这一切跟“黑衣大食”有关系吗？



伊朗穆斯林

说起来，这一切倒的确是有关系的。由于政权所有者在血统上的先天不足，伍麦叶王朝的正统地位，在当时一直是受到质疑的。最起码“安拉使者的继承人”（哈里发）这一神权意味颇浓的职位，什叶派争夺起来更为理直气壮。这股反对的力量，终于在公元 8 世纪中叶覆灭了伍麦叶王朝。此后阿拉伯帝国的大统，为系出“哈希姆家族”的阿拔斯家族所获。其所建立的王朝被称之为“阿拔斯王朝”，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黑衣大食”。

所谓“哈希姆家族”又称“圣裔”，其血统上溯的源头，并非先知穆罕默德本人，而是他的曾祖“哈希姆”。鉴于阿里本人并非穆罕默德后裔，这种设定倒也十分合理。不过这样的话，有机会借先知影响力，图谋大统的人选范围就扩大了。这次建立黑衣大食[1]的“阿拔斯”，就是穆罕默德的叔父。在黑衣大食的崛起过程中，除了视阿里及哈希姆家族为正朔的什叶派以外，另一支重要的力量，是来自“呼罗珊”地区的波斯人。

所谓呼罗珊地区，所指向的就是伊朗东北部的“帕提亚”地区。从地缘角度看，整个伊朗高原其实是具备中亚、西亚双重属性的。其中呼罗珊（帕提亚）地区，与中亚的地缘关系最为紧密。比如建立安息帝国的帕提亚人，就是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

1 阿拔斯王朝为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古代中国史籍中称之为黑衣大食。于 750 年取代倭马亚王朝，定都巴格达，后于 1258 年被蒙古旭烈兀西征所灭。阿拔斯王室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伊本·阿卜杜勒·穆塔里卜的后裔。故建立的王朝以其祖先的名字命名为阿拔斯王朝。

而西部的米底、西南部的波斯两大版块，则与美索不达米亚联系紧密，更应该被划入“西亚”板块。

在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人就已经完成了对“萨珊波斯”的征服（公元651年）。无论从阿拉伯人，还是萨珊波斯的角度来看，西亚无疑都是地缘政治的重心所在。有鉴于此，在伍麦叶王朝时遭受迫害的大批什叶派阿拉伯人，把视线投向了位处帝国边缘的“呼罗珊”，开始希望在“中亚”寻找到崛起的机会。与此同时，不愿意受阿拉伯人统治的波斯人，也把呼罗珊和中亚，作为复兴波斯的基地。当这两股强大的力量混合在一起时，就变成了推翻伍麦叶王朝统治的合力。

公元8世纪中叶，波斯人在呼罗珊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起义，而身为哈希姆家族族长的“阿拔斯”，则被波斯人和什叶派共同选定为了最合适的“哈里发”人选。当然，波斯人也可以自立门户，或者说从宗教和政治层面，独立复兴波斯帝国。不过伊斯兰教和一神教的威力，在这个时代已经显现出明显的优势，并且通过百年的经营，在西亚站稳了脚跟。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波斯人只是甘于在呼罗珊及中亚地区建立政权，并接受与阿拉伯帝国长期抗衡的局面。否则接受阿拉伯人的意识形态，并在政治独立的问题上缓图之，将是最合理的选择。

阿拔斯王朝迁都巴格达并唐朝发生冲突

公元750年，伍麦叶王朝的末代哈里发在埃及被杀，标志着阿拉伯帝国正式进入了“阿拔斯王朝”时代。两大王朝的交替，也使得阿拉伯人的地缘重心发生了些许位移。在伍麦叶王朝时代，王朝的政治中心是设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伍麦叶原为叙利亚总督）。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样的设定让阿拉伯人的视线，更多的投向西方。事实上，西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西班牙地区，都是这一时期从欧洲人手中夺取的。相比之下，借助波斯人力量夺取政权的阿拔斯王朝，则把与伊朗高原联系更为紧密，且之前一直为波斯帝国地缘重心的两河平原视为了根基之地。今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城，就是在阿拔斯王朝初期，由其第二代哈里发所兴建并作为都城的。

阿拉伯帝国地缘重心的这种偏移，甚至对远在万里之外的唐帝国引发了蝴蝶效应。提到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之间的关系，大家肯定会想到“怛罗斯之战”，而怛罗斯之战的时间，正是阿拔斯王朝崛起的公元751年。由于在阿拔斯王朝崛起过程中，原本边缘的呼罗珊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拔斯时代的“阿拉伯帝国”，顺势加大了在中亚绿洲农业区（河中、吐火罗地区）的扩张力度。

同时期，唐帝国恰巧也处在鼎盛时期（唐玄宗执政时期），也希望把势力范围稳定至中亚农业区。在这种背景下，两大帝国之间发生了唯一的一次碰撞，并以唐军的落败而告结束。不过唐帝国之所以在这场中亚争夺战中落了下风，并非缘于一场战役的失败，而是因为强大的唐帝国很快就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内乱——安史之乱中（公元755——763年）。很显然，你无法奢望一个转入衰弱期的帝国，在对自己核心利益影响甚微的边缘之地，PK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帝国。



后伍麦叶王朝地图

伍麦叶王朝残部退往伊比利亚建立政权

尽管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成就看起来超越了白衣大食，但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当这些穿黑衣的穆斯林，准备接收阿拉伯帝国西部遗产时，情况就不那么顺利了。我们很难看到，不带血腥的王朝更迭过程。阿拉伯帝国的这次权力转换也不例外。阿拔斯在获胜之后，甚至屠灭了整个伍麦叶家族（这也为他带来了“屠夫”的外号），然而百密一疏，结果还是遗漏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率领追随者逃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并让白衣大食的国祚得以在欧洲延续。令人唏嘘的是，40 年前伍麦叶王朝攻入伊比利亚半岛，灭亡西哥特王国的时候，应该没有想到过，这个穆斯林登陆欧洲的桥头堡，最终却成为了白衣大食最后的避难所。



阿拔斯王朝地图

由于在政治上继承了伍麦叶王朝，最终在伊比利亚（或者说西班牙）建立新政权的王朝，也被称之为“后伍麦叶”王朝。半岛南部城市“科尔多瓦”（瓜达尔基维尔河中游）是这个王朝的政治中心，因此也被称之为“科尔多瓦哈里发国”。从政治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与欧洲人在西班牙博弈了千年的“摩尔人”，就是所谓的“白衣大

食”。当然，要是从民族角度来看，“摩尔人”的成分要复杂的多，主体是源自西北非的“柏柏尔人”。

“白衣大食”能够一直不被“黑衣大食”所攻灭，除了地理距离与直布罗陀海峡的阻隔以外，更重要的是阿拔斯王朝并没有完成对西北非的征服工作，也就是说没有真正把疆界推进到直布罗陀海峡。

第四节 波斯人与突厥人在阿拔斯王朝的地位

阿拉伯人借重在文化优势的波斯人治国

让人意外的是，在借助波斯人和什叶派上位之后，阿拔斯王朝并没有顺势成为一个什叶派王朝，而是变身成为了一个“逊尼派王朝”。这个选择看起来很让人不能理解，不过从避免阿拉伯民族分裂的角度看，却是必然的选择。前面我们也说了，伍麦叶家族并非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代表的是阿拉伯民族原有的部族势力。对于这个本质是部落联盟的政治体来说（今天还是），强行把最高权力固定给某一家族，带来的分裂风险是很大的。换句话说，逊尼派对统治者身份相对开放的态度，比之什叶派来说更吸引人。在这种背景下，拥有“哈希姆家族”身份，又同时承认逊尼派教义，能够让阿拔斯家族在阿拉伯世界获得更全面的认同感。问题是，重新回归“异端”身份的什叶派会有什么反应，一直就是“异族”身份的波斯人，又能在新王朝里获得什么样的地位？

先来看看波斯人的收获。总得来说，白衣大食时代的统治是不成功的。虽然表面上已经过渡到帝国时代，但其体系内核还是原始的部落体。这也导致伍麦叶家族，甚至没有挺过“百年王朝”的大关。相比之下，借助波斯人上位的阿拔斯家族，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更有机会从波斯人那里汲取治国经验。在王朝建立之初，波斯人成为了帝国官僚体系的主体，甚至可以说政权实质是掌握在波斯人手中。

站在“波斯文明”肩膀上的黑衣大食，也是阿拉伯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这种强大并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军事层面上，更大的意义在于文化层面上。包括古希腊文明在内的大量东西方文献，在这一时期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文艺复兴时期又回到欧洲）。由此也让“阿拉伯”这个部落文化体，成功的完成了向“阿拉伯文明”的转型。

类似阿拉伯与波斯文明交融的情况，在经常遭受异族入侵的中央帝国也很常见。然而与任何一个异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都必须在汉化和退出中原中做出选择不同的是，阿拉伯人没有被融合掉，而波斯人也保持了自己的地缘独立。这种情况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阿拉伯人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优势。波斯人原来信仰的“祆教”（拜火教）属于多神信仰。就宗教的控制力来说，远低于伊斯兰教所属的“一神教”。简单点说，波斯人可以让阿拉伯人和其它伊斯兰化的民族接受他们的制度、汲取他们的文化，却无法让他们（包括自己）接受自己所创立的拜火教信仰。

由于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阿拉伯烙印（这和基督教不同），使得波斯人即使想在宗教层面“反客为主”，变成穆斯林世界的中心（就像欧洲变成基督教中心那样）也是不可能的。比如就身份认同这一点来说，域外的穆斯林更会愿意和阿拉伯人扯上关系，而很少会把自己的血统、信仰源头，溯源到波斯人（比如中国内地的穆斯林）。

阿拉伯人重用古拉姆军人以制衡波斯人

在黑衣大食时代，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蜜月期前后持续了约 80 多年，几乎与伍麦叶王朝的国祚相同。在这个“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中，依靠波斯人推进自己文明进程的阿拉伯人，也在时刻防备着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当历史推进到公元 9 世纪 30 年代时，阿拉伯人开始有计划的将波斯人排除出核心权力层。另一支看起来文明层级较低，并且对阿拉伯人统治威胁不大的族群，开始出现在帝国政治舞台上。这一族群就是“突厥人”。

突厥人最初是以职业军人的形象，出现在帝国中枢的。在阿拉伯人试图摆脱波斯人的影响时，突厥裔近卫军成为了哈里发们所依靠的对象。这点倒与当年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的经历有些类似。不过在做法上，阿拉伯人要更为特别。这些充当近卫军的所谓“职业军人”，大多是以奴隶买卖、战俘的方式，从高加索中亚草原上购入的突厥裔儿童。从小经受的严格军事训练，以及伊斯兰教义的洗礼，使得这些奴隶军人变得非常的“职业”。 这种培养“突厥裔奴隶军人”的制度，当时被称之为“古拉姆”。

“古拉姆军人”之所以会以突厥裔作为基础，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则这些突厥儿童在出生之后，就已经在草原上经历过一轮自然淘汰，身体和心理素质上都具备了成为优秀军人的基础；二是更容易被“洗脑”。尽管突厥人最初建立草原帝国的时间，比阿拉伯人还要早上一个世纪，但在经受过地中海文明滋养，并且用伊斯兰教武装起来的的阿拉伯人（包括波斯人）眼里，还是属于未开化的边缘民族。相比那些已经有成熟宗教思想的民族（比如基督教信仰的亚美尼亚人），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塑造。

尽管哈里发们让“奴隶军人”介入权力游戏的初衷，是为了制衡波斯人的影响，但“尾大不掉”这句成语的重点，从来不在于“尾”的性质，而在于是否“大”上。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群体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权力，都有可能反客为主成为控制者。至于在十字军东征前夕，穆斯林世界错综复杂的地缘关系究竟演化成了什么格局，我们再接着解读。

第五节 什叶派穆斯林建立伊德里斯王朝

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与什叶派寻找新的根据地

阿拉伯人、突厥人与波斯人，逊尼派与什叶派。一千年来，这“三族两派”之间

的磨合，一直是中东地缘政治舞台的主线。现在的话，随着犹太人重返“迦南之地”并建国成功（以色列），局面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鉴于中东局势在当下的国际政治关系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借由十字军东征的引子，从源头梳理一下上述关系的演变过程，还是很有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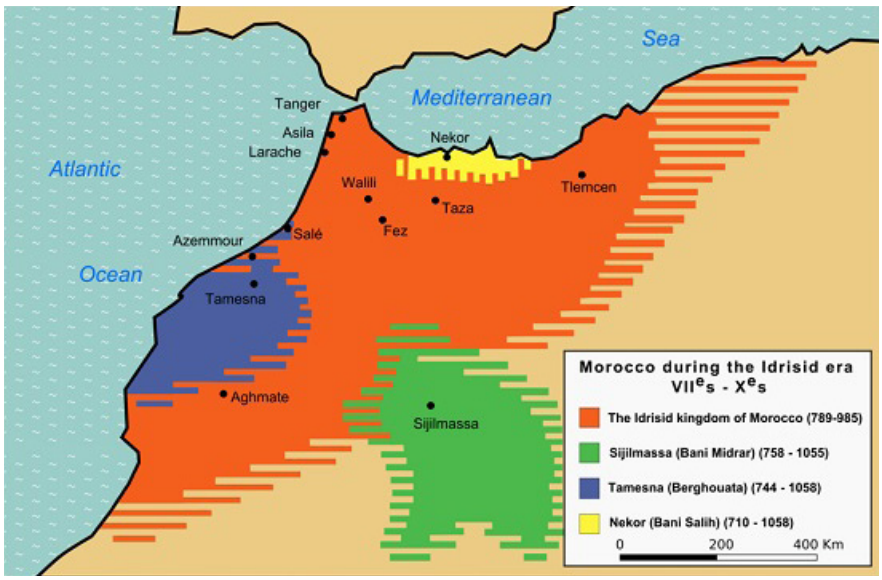
对于一千年前的阿拉伯人来说，最为重视的并非族群关系的处理。宗教方面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导致的最高权力之争才是问题的主线。简单点说，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阿拉伯人已经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不管波斯人还是突厥人，看似都无法觊觎“哈里发”这个政教合一的最高位置。然而对倾向于让更多阿拉伯人，有机会继承最高权力的逊尼派来说，什叶派的存在始终是一个阴影。基于人类血亲认同的本能，总还是会有很多信众会认为，阿里及其后裔才是最正统的继承人。不过从更本质的层面来看，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只是这个分裂世界的一个缩影。有人的地方有就江湖，无论再和谐、统一的世界，都会有反对派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没有阿里、没有什叶派，伊斯兰世界也会找到其它分歧点，做大一股能容纳反对者的教派的。

在阿拔斯家族黑衣大食已经明白无误的认同逊尼派教义之后，那些带着什叶派标签的阿拉伯人，开始寻找新的机会崛起。从地缘角度看，波斯人仍然是可能借助的力量。不过前面我们也说了，波斯人在阿拔斯王朝得到了很多，暂时还没有动力成为新的反对派。中亚的突厥人也许是一个选项，然而在新王朝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呼罗珊地区，在帝国中的地位已经不再是不被重视边缘板块了。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中亚正是呼罗珊板块扩张势力的主要方向。以至于从广义角度来看，“大呼罗珊”的范围还可以包括阿姆河流域。

呼罗珊板块的地缘地位提高，意味着什叶派暂时不大可能越过伊朗高原，在中亚突厥人群体中寻找新盟友。好在阿拉伯帝国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纵横万里，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联合体。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既然东方的机会不大了，倒不妨去西方看看。纯粹从躲避黑衣大食影响的角度看，伊比利亚半岛肯定是最合适的选项了。不过在什叶派与阿拔斯王朝反目之前，白衣大食的残余势力已经着手在西班牙建立“后伍麦叶王朝”了。也就是说，什叶派想要再找个基地的话，最好是退而求其次的在西北非想想办法。

什叶派在马格里布边缘地区建立伊德里斯王朝

提到西北非，看过之前内容的人应该很快会想到三个标签：阿特拉斯山脉、马格里布地区，以及迦太基。被撒哈拉大沙漠覆盖的北非地区，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就是“一河一山”了。这其中的河，指的是尼罗河；山则指的是阿特拉斯山脉。所谓“马格里布”地区，指向的就是阿特拉斯山脉及其与地中海之间的区域。在近现代，马格里布也成为了一个地缘政治名称。围绕着阿特拉斯山脉分布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三国，被称之为“马格里布国家”。在卡扎菲时代，为了做大利比亚的影响力，马格里布东西两侧的纯荒漠国家：利比亚、西撒哈拉也被列入了马格里布国家的



伊德里斯王朝示意图



突尼斯角示意图

概念（1989 年由卡扎菲主导成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不过纯粹从地缘角度看，我们行文中所称的马格里布地区，并不会包括这两个国家。

在罗马与迦太基相争的时代，迦太基的核心之地是在马格里布地区的东部，今天的突尼斯境内的“突尼斯角”（突尼斯城所在的位置）。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什叶派想以西北非为基地反攻阿拉伯半岛的话，也必须占据突尼斯角，然后再向东图谋埃及；同理，黑衣大食要想坐实在北非的统治，同样要保住这两座天王山。在阿拔斯王朝立国之初，巴格达的哈里发还是能做到这点的。至于什叶派要想在马格里布地区有所作为，就需要躲到更边缘点的地区去了。纯粹就马格里布地区的情况来看，阿特拉斯西北部，与西班牙隔海峡相望的摩洛哥地区，肯定是最边缘的了。在什叶派和黑衣大食决裂之后，摩洛哥地区也成为了什叶派避难者最早的归宿。公元 785 年，部分什叶派阿拉伯人退入摩洛哥，并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什叶派王国——伊德里斯王朝（Idrisids_dynasty）。

第六节 法蒂玛王朝的建立

柏柏人在西北非支持什叶派欲提升自身影响力

什叶派之所以能够在摩洛哥建国，得益于当地土著势力——柏柏尔人的支持。在解读迦太基时，“努米底亚人”曾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站队，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战局的走向，这些努米底亚人就是柏柏尔人。事实上，古埃及文明的创建者，很有可能也是柏柏尔人。不过在进入文明期后，游牧的柏柏尔人，已经与埃及人

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了。这种情况和阿拉伯半岛的情况类似。比如巴比伦的建立者也是闪米特人，但他们与在荒漠地带游牧的闪米特人（后来的阿拉伯人），已经完全分化了。

总的来说，阿拉伯人也好、柏柏尔人也罢，包括巴比伦人、埃及人，都是“原始闪含人”（说闪含语的族群）的后裔，热带沙漠气候是这个族群形成的环境基础。在阿拉伯人凭借伊斯兰教崛起之后，原本在地缘结构上处于分裂状态的闪含诸板块被奇迹般的融合在了一起。很多阿拉伯人相信，如果不是以色列横插一脚的话，他们本来是有机会重现帝国辉煌的。其实说起来犹太人也是原始闪含人的后裔，只不过自视为“上帝子民”的他们，在宗教层面的优越感、执着感，比阿拉伯人更甚罢了。

建立一个帝国是一回事，在地缘上完成融合又是另一回事。把从直布罗陀到波斯湾的广阔热带荒漠气候区，进行阿拉伯化、伊斯兰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柏柏尔人没有波斯人那样的文明高度，且在血缘和地缘环境上，与阿拉伯人更为接近，但并不代表柏柏尔人就甘于被阿拉伯人融合掉。既然波斯人可以借助黑衣大食的崛起，实现一定程度的复兴，那么柏柏尔人同样也可以寄希望于帮助什叶派崛起，从而提升自己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

在什叶派——柏柏尔人结合而成的“伊德里斯王朝”站稳脚跟后，当年迦太基人所控制的西南地中海地区，也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白衣大食的西班牙、什叶派的摩洛哥，以及突尼斯的黑衣大食。前两者之所以能和整体占据优势的黑衣大食共存，一方面得益于这种互相牵制的地缘政治格局；另一方面也在于，巴格达的哈里发，在技术上无法把中央集权之力，渗透到遥远的西北非。

阿拉伯半岛而来的什叶派建立法蒂玛王朝

事实上自公元 9 世纪起，为了应对什叶派和后伍麦叶王朝的威胁，巴格达的哈里发就已经允许突尼斯、的黎波里斯（利比亚西部）地区的地方总督，独立行使军政大权了。这个独立王国（艾格莱卜王朝）对巴达格的义务，仅仅是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贡金。同时这也意味着，这个帝国的西部“藩镇”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负责（也因此得不到帝国其它地区的支援）。

之所以要在这一阶段解读西北非的地缘政治结构，是因为 “绿衣大食”正是崛起于这一地区。 “绿衣大食”又称“法蒂玛王朝”。“法蒂玛”之名得自于先知的女儿、阿里的妻子。从这个名称大家也能看出，这是一个什叶派王朝了（哈里发自称是法蒂玛后裔）。由于摩洛哥“伊德里斯王朝”的示范作用，马格里布地区俨然也成为了其他什叶派眼中可以依托的“福地”。

相应的，受制于“艾格莱卜王朝”的柏柏尔人，也希望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提升一下自己的地位。公元 909 年，依靠当地柏柏尔人的支持，另一批从阿拉伯半岛而来的什叶派穆斯林颠覆了隶属黑衣大食的“艾格莱卜王朝”，建立了与阿拔斯王朝平级的法蒂玛王朝（双方都立有哈里发）。60 年后（公元 969 年），绿衣大食东征埃及成功，

并营建新都“开罗”。至此，白、绿、黑三色“大食”，分割欧亚非大陆的阿拉伯帝国格局形成。

需要说明的是，在绿衣大食崛起之后，同属什叶派政权的“伊德里斯王朝”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变成法蒂玛王朝的一部分。在绿衣大食东征埃及后不久，西班牙的白衣大食渡过海峡（公元 974 年），攻灭了这个偏安的什叶派政权。不过曾经独立的经历，让这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看到了民族独立的希望。自公元 11 世纪中叶起的整个中世纪时代，以摩洛哥为源头的柏柏尔人先后建立了三个柏柏尔人王朝。其高峰时期不仅据有整个马格里布地区，还渗透到了西班牙南部（甚至自立为哈里发）。

然而柏柏尔人毕竟没有波斯人那样的文明积累，或者说他们在各方面能够独立且优势于阿拉伯人的东西几乎没有。以至于在 16 世纪中叶后，借助欧洲人入侵北非所带来的混乱，定居于马格里布地区的阿拉伯人成为了这一地区的主导者。今天马格里布三国中唯一保留有君主制的摩洛哥，其统治家族也是自称圣裔的阿拉伯人。至于没有被融合、仍然在坚持游牧生活的柏柏尔人，他们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可能就是有别于阿拉伯人的，以绿色为主的鲜艳长袍了。

其实在这场针对闪含民族的阿拉伯化浪潮中，即使文明积淀深厚的古埃及人也一样未能幸免。今天在埃及境内，唯一还能算是古埃及人后裔的，就只有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就已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科普特人”了。相比之下，阿拉伯人在闪含民族之外的同化工作，就要失败的多了。后面我们会看到，波斯人和突厥人，是如何先后架空黑衣大食的。

第十四章 伊朗和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演变

第一节 白益和萨曼王朝在伊朗高原的分治

波斯王朝在伊朗高原的复兴

集权还是分权，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并不能简单用对或者错来评判。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一个庞大帝国建立中央集权体系，是非常困难的。对于试图依照波斯模式，建立中央集权体系的阿拉伯帝国，情况也是如此。进入公元 9 世纪后，巴格达的哈里发所能直接控制的区域，逐渐向美索不达米亚萎缩。那些派驻马格里布、埃及、波斯等地的总督，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世袭体系，并实质上形成一个个名义上尊哈里发为最高领袖的独立王国（中央集权的一大标志，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应由中央政府定期更换）。

就阿拉伯文明扩张的问题，需要划分为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宗教传播；二是民族融合。就这两点来看，阿拉伯文明在伊朗高原以西，干热、低平的热带沙漠地区的扩张，显然是十分成功的。不管是曾经拥有高度文明的埃及，还是似阿拉伯人那样出身游牧的柏柏尔人，最终都没能阻挡阿拉伯化的大势。然而在文明记忆、地理结构方面有着综合优势的伊朗高原，阿拉伯人的同化工作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在阿拔斯王国陷入内部分裂之后，波斯裔的政治家，首先在包含呼罗萨、阿姆河流域的“大呼罗珊”地区获得了独立管理权，并先后建立了塔希尔（820——873 年）、萨曼（874——999 年）两代波斯属性的王朝。能否同时控制米底（以哈马丹为中心）、波斯（以色拉子为中心，大致为今伊朗法尔斯省）、帕提亚（呼罗珊）三个核心板块，是决定伊朗高原是否诞出强大政权的重要标志。在过往的历史中，从米底王国、波斯帝国、安息帝国，到被阿拉伯人所灭的萨珊波斯，莫不如此。

不过在上述王朝虽然帮助波斯人一定程度实现了国族复兴，但却并没有完成伊朗高原的统一。由于呼罗珊地区面向中亚的地缘特点，它们更多是把注意力放在东、北两个方向。而在伊朗高原内部，如果想重新觊觎美索不达米亚的话，必须要控制的是米底、波斯两个板块。在呼罗珊地区建立波斯人政权后一个多世纪，一支生活于伊朗高原西北边缘（里海之南）的波斯系部落——德木莱人得以崛起，很快了夺取米底、波斯板块的控制权，并顺势入主巴格达，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彻底架空。这些来自山地，在萨珊波斯时期就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山民，所建立的王朝被称之为“白益王朝”（932——1055 年）。

白益王朝未能统一波斯及波斯的伊斯兰烙印

抛开黑衣大食这层外皮我们会看到，在公元 10 世纪中叶之后，波斯人在政治上已经得到了复兴。只不过，这种复兴是以萨曼、白益两大王朝分立的局面而做到的。

从政治和板块控制的角度看，**白益王朝**应该是最有机会重建波斯帝国的。事实上，这也正是白益王朝的统治者想做的，他们甚至沿用了萨珊波斯帝国“万王之王”的称号来为自己加冕。不过这个出身略显边缘的王朝，接下来并没有体现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特征，大多数时候领地内的三大板块（米底、波斯、美索不达米亚）被分别由三个君主所统治。



白益王朝地图（公元 970 年）

当然，即使最终波斯帝国得以复兴，重建后的波斯文明也已深深的打上了阿拉伯人的烙印。这一点，在白益、萨曼两大王朝分治伊朗高原时期，就已经得到了显现。前者将什叶派立为国教；后者则把自己打造为一个逊尼派王朝。今天经历过重重磨难，准备实现民族复兴的波斯人，之所以致力于将什叶派与波斯两个标签联系在一起，也是在无法摆脱阿拉伯文明影响下，为维持民族独立意识，所做出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历史选择了什叶派作为阿拉伯人的主流信仰，那么伊朗高原就将是逊尼派的大本营。

从地缘融合的角度来看，做到意识形态的统一，比完成民族融合要容易的多。与一般的“地缘政治”研究不同的是，这里所做的“地缘”研究维度要更为丰富。会更为关注行政变迁背后的地缘融合问题上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搞清楚，为什么以中华文明能够一直屹立东方而不倒，而有的民族虽然建立过庞大的帝国，但却只能在历史中充当一次暴发户（比如很多北亚游牧民族）。

虽然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在这些绕不开的政治、宗教问题上，但最终还是要把重心放在民族博弈的问题上来。假定伊朗高原就是世界的边缘，波斯人还是很有机会压

倒阿拉伯人，重新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主人的。问题是，伊朗高原并不是一块边缘之地。当波斯人在为自己从内部架空阿拉伯帝国而得意时，源自中亚草原，并且伊斯兰化的部分突厥人，也开始了向西亚方向扩张之旅。

第二节 伽色尼王朝和喀喇汗国的崛起

突厥人在中亚的存在及其伊斯兰化

就现在的情况看，突厥人可以说是彻底的伊斯兰化了。虽然还有一些说突厥语的民族没有信仰伊斯兰教，但他们大多已经不再被视为突厥人（比如在中国被归为蒙古族的“图瓦人”）。不过最初推动这一进程的主力，却并非是阿拉伯人而是波斯人。其实这点也很好理解，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阿拉伯帝国的影响力，要透过伊朗高原的波斯人，才能有效传递到中亚。只是借助阿拔斯王朝复兴的波斯人，自己在“帮助”突厥人成为穆斯林之后，却反受其害。想要弄清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 1000 多年前，中亚是什么样的地缘格局。

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前，突厥已经在北亚、中亚草原先后崛起，并建立了东、西突厥汗国。西突厥在中亚的领地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巴尔喀什湖——阿尔泰山脉以南，天山——卡拉套山（中亚农牧分割线）以北，包括七河地区、准噶尔盆地、锡尔河中下游在内的中亚草原区；另一部分则是包括锡尔河中上游、阿姆河流域，以及塔里木盆地在内的，中亚绿洲农业区。

由于突厥人的游牧属性，他们在中亚绿洲农业区的统治，主要是以羁縻的方式完成的。几乎与此同时，阿拉伯帝国在西亚崛起同时，来自东亚的唐帝国向中亚强力扩张，攻灭了盘据于此的西突厥汗国。抛开政治归属不谈，聚焦中亚的民族结构变化，我们会发现突厥人对中亚的改变，要更大于唐帝国。在唐帝国控制西域、中亚之后，中亚草原依然散布着突厥语部落，而农耕属性的“唐人”，却没有同化中亚农业区的原住民。

1000 多年前，在中亚两河（锡尔河、阿姆河）分布于那些绿洲农业区的，是一支我们熟悉的部族——粟特人，因其王族姓氏为“昭武”，又分为诸多小国，亦称“昭武九姓”。 基于同中央之国建立商业联系的需要，这些粟特人更愿意把自己的源头，追溯为当年的“大月氏人”。虽然有关月氏人最初是什么种族的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但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变身为粟特人之后，他们在种族、语言已经被中亚原有的高加索民族所同化了。其种族上，呈现为高加索人种；语言上则与波斯人一样，同属伊朗语族。

由于地缘属性接近，中亚两河地区与伊朗高原的联系，一直较为密切。包括波斯、安息、亚历山大、萨珊等历代统治伊朗高原的王朝，都视这一地区为天然势力范围。从地缘上看，黑衣大食与唐帝国的那场“怛罗斯之战”，也是伊朗高原恢复在中亚农

业区影响力的标志。问题在于，突厥人在中亚扩张的这段历史，使得突厥人有机会成为影响波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第三股势力。

古拉姆军人颠覆萨曼王朝建立迦色尼王朝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进入公元 9 世纪后，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为了削弱波斯人的影响，有意识的启用突厥裔近卫军（古拉姆军人）来掌管朝政。与此同时，波斯人先后在大呼罗珊地区，建立塔希尔、萨曼两代王朝，一定程度实现了国族复兴。然而古拉姆军人制度，并非只为阿拉伯人所采用。事实上就征召、买卖突厥游牧民充实军队这件事来说，始作俑者更有可能是波斯人。由于萨曼家族原本就是替塔希尔王朝经营河中地区的（直接与突厥人打交道），所以古拉姆奴隶贸易，在萨曼王朝时代也达到了顶峰。

公元 10 世纪中叶，逐渐掌控军政大权的古拉姆军人，开始在萨曼王朝东境，今阿富汗境内容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迦色尼王朝（公元 962 年，名义仍为萨曼王朝属国）。三十多年后，在这个千年的最后时刻（公元 999 年），迦色尼王朝完全颠覆萨曼王朝，在大呼罗珊地区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突厥王朝。

突厥人在阿拉伯帝国体系内崛起过程，很像当年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后期的上位。只不过欧洲人一开始是以雇佣军的方式，引入日耳曼人；而阿拉伯人、波斯人是以奴隶买卖的方式，“养大”这支突厥裔军事集团。相比那些在巴格达架空哈里发的突厥人，波斯人在大呼罗珊地区培养的突厥军人，威胁要大得多。因为这些古拉姆军人，与他们的突厥同族相距太近了，更有机会借助草原的势力建立自己的王朝。

喀喇汗国攻入塔里木盆地并使之伊斯兰化

当时控制七河地区，并与萨曼王朝经常发生战争的游牧政权为 “喀喇汗国”。关于喀喇汗国最初源自哪支游牧部落，一直以来都有所不同的说法，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首先这是一个突厥系游牧汗国；其次受萨曼王朝的直接影响，喀喇汗国在公元 10 世纪中叶，接受了伊斯兰教。当然从本质上看，与其说中亚突厥部落的伊斯兰化，是受到波斯人影响，倒不如说是他们感受到了一神教强大的力量。

既然生活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能够凭借伊斯兰教很快入主那些富庶的农业区，甚至建立强大的帝国，那么中亚游牧的突厥人，也同样有理由相信，奇迹可以在自己身上复制。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果然没有让突厥人失望，他们接下的的扩张，甚至直接改变了今天中国的地缘结构。在中亚草原伊斯兰化之前，与之隔天山相望的塔里木盆地，大部为信仰佛教的于阗国控制（东部的回鹘人也信仰佛教）。喀喇汗国的突厥人信仰伊斯兰教之后，天山南北也因此成为了宗教战争的战场。

从战略上看，同为突厥——伊斯兰教国家的迦色尼、喀喇汗两国（崛起时间也一样），应该是很有机会联起手来，干一番事业的；同时基于共同的信仰，这些突厥人势必也能从伊斯兰世界获取额外的资源 。事实的确如此，在喀喇汗国攻灭于阗的过程中，迦色尼王朝以及来自大呼罗珊地区的穆斯林志愿军，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在狂

热的穆斯林军队冲击之下，这个在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已经立国的西域佛国，终于在千年相交之时成为了过去式。

所有的合作都是互惠互利的，伽色尼王朝对萨曼王朝的颠覆过程，一如当年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一样，是由体系内外的两股“异族”势力合力完成的。这股外力就是喀喇汗国。在瓜分波斯人遗产之时，两国以阿姆河中下游为界划分疆域。其中迦色尼王朝得到了吐火罗盆地，及整个呼罗珊地区；粟特、花剌子模、费尔干纳等河中地区，则成为了喀喇汗国的领地。

喀喇汗国接下来是如何在中亚、西域发动圣战的，已经不是我们接下来所要关注的了，因为他们并不会站到十字军的对面。地中海圣战的真正主角，将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第三节 伽色尼王朝吞并锡斯坦并向印度扩张

萨珊波斯向唐朝求援试图以锡斯坦复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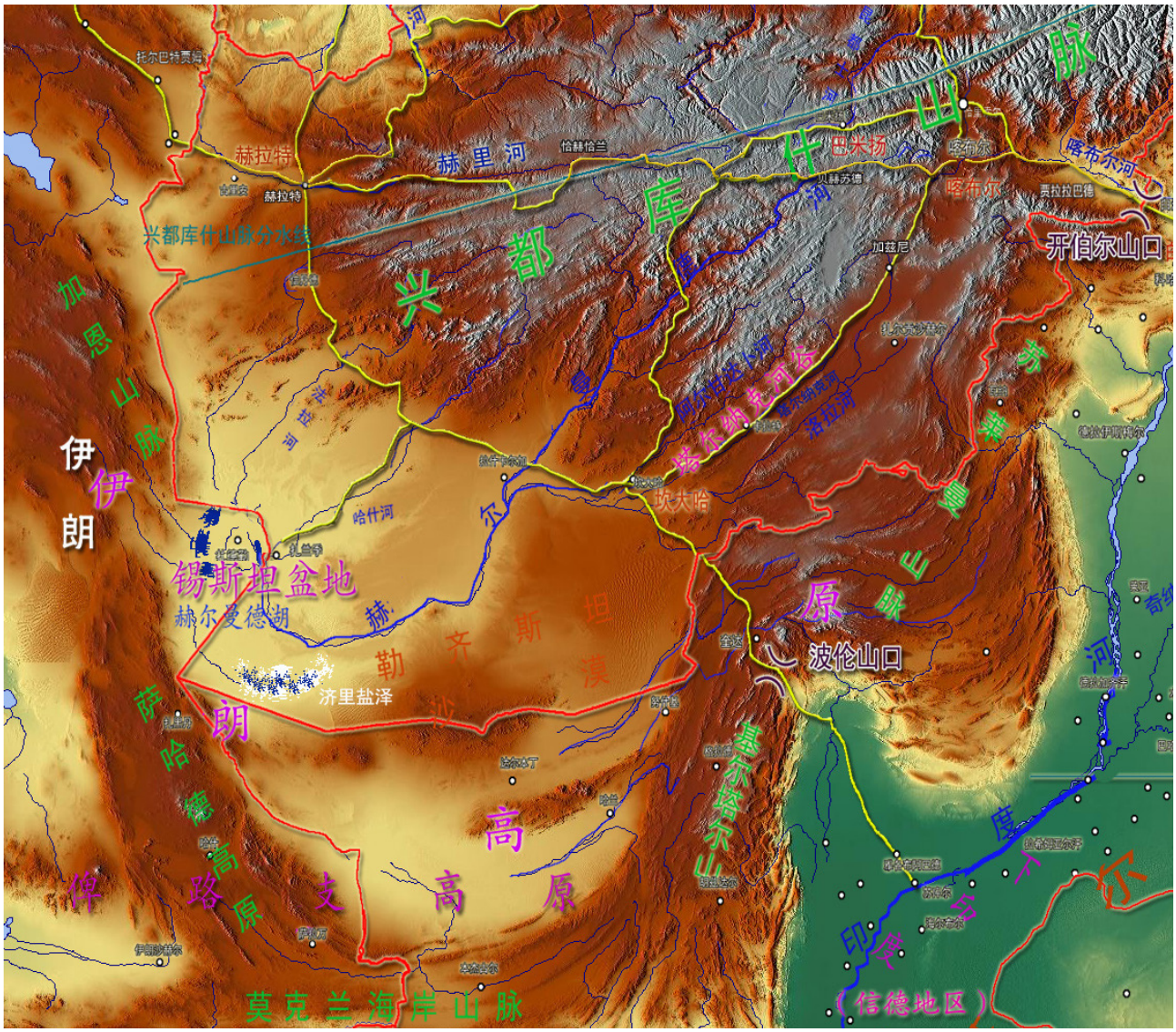
与萨曼王朝的波斯背景不同，就地缘政治属性而言，迦色尼王朝更应该被归入阿富汗的历史。我们知道，阿富汗所对应的核心地理单元，是兴都库什山脉。以兴都库什山脉分水岭为界，阿富汗能够被分为三个部分：北部为吐火罗盆地的南部，归属于中亚属性的阿姆河流域（虽然因为沙漠化的原因，很多河流流不到到阿姆河）；东南部以喀布尔河为中心的区域，是南亚属性的印度河流域；西南山地汇集的雨水，则以赫尔曼德河为核心，向伊朗高原方向的“锡斯坦”方向汇集。

迦色尼王朝之名，取自于它的都城“加兹尼”。 而加兹尼的位置则在赫尔曼德河上游，与喀布尔河流域相接之处。最初萨曼王朝是希望这些奴隶战士，能够帮助自己向兴都库什山脉之南扩张。只是当这些手握军权的突厥裔军人，发现兴都库什山脉的阻隔，能够帮助自己成就一个独立王国时，迦色尼王朝便出现了。因此仅从其立国的位置来看，即使河中地区没有被喇喀汗国所瓜分，强大之后的伽色尼王朝也会向锡斯坦和印度河方向扩张。

从地理属性上看，锡斯坦相当于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位置上属于伊朗高原与兴都库什山脉相接之地。这也造成它的政治归属，经常在二地政权之间转换（现为伊朗、阿富汗所瓜分）。比如今天我们看锡斯坦的核心区——赫尔曼德湖，基本为伊朗所有，而绝大部分赫尔曼德河流域，则归属于阿富汗。在萨珊波斯为阿拉伯帝国所灭之后，锡斯坦这块伊朗高原的边缘之地，也成为波斯王族最后的归宿。这个后萨珊波斯政权，甚至被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央帝国的史官记录了下来。

公元 662 年，萨珊波斯末代君主之子“卑路斯”，试图以锡斯坦为基地复国。为了寻求外援，波斯人将目光投向了刚刚在中亚攻灭西突厥的唐王朝。然而即使是处在鼎盛时期的中央之国，想染指伊朗高原也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唐王朝在天山南北的

统治，还要受到青藏高原的压力（吐蕃）。有鉴于此，唐王朝除了盛情款待来访的波斯人以外，所能做的只是顺势在安西都护府之下，加设一个“波斯都督府”的建制，以向阿拉伯人表示自己是波斯地区的保护者。很显然，这种名义上的保护完全起不到任何效果，锡斯坦地区很快还是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领地。



中亚——南亚地缘关系图

伽色尼吞并锡斯坦并渗透上印度

在阿拉伯帝国大分裂的时代，锡斯坦地区的波斯裔总督也顺势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萨法尔王朝（867——1002）。虽然萨法尔王朝也曾向周边扩张，然而相比伊朗高原那几大核心区，锡斯坦的潜力并不大。得益于古拉姆军人相助，萨曼王朝很快便压制住了萨法尔王朝。而在迦色尼王朝做大并取代萨曼王朝后，这个由突厥裔军人支撑起来的王朝，更是马上顺势吃掉了锡斯坦地区。与此同时，突厥人在开泊尔山口之东也取得了突破。整个上印度河平原（旁遮普地区）成为了迦色尼王朝的领地。不过，迦色尼王朝并不是第一个建立横跨兴都库什山脉，兼容中、南亚的王朝。最起码这样的地缘格局，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大月氏人所建立的“贵霜帝国”。

虽然迦色尼王朝、喀喇汗国从属性上看，都算是突厥——伊斯兰王朝，但二者本身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的统治阶层来源于那些自幼进入波斯体系的奴隶军人，后者则是典型的由草原游牧部落进阶而成的“国家”。换句话说，前者在统治制度上会更加成熟，但就族群融合层面上来说，却会因没有自己的基础部族载体，而缺乏方向；后者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会积极在扩张过程中自然壮大自己的族群，但源自草原民族的部落基因，却始终会让国家呈现松散状态。

第四节 迦色尼引入塞尔柱人

塞尔柱人从蒙古迁入中亚后继续南迁

鉴于喀喇汗国的威胁，以及自己反客为主的经历，迦色尼王朝并不希望突厥人在内部一家独大。为此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让突厥人垄断武力，而是有意识的在军队中加入波斯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等族的成分。特别是易于管理的印度人，更是成为了倚重的对象。然而每一个族群都有其适应的环境，就好像阿拉伯－北非沙漠中的单峰驼，不能像双峰驼那样，适应即有高温酷热，又有严寒低温的中北亚沙漠一样。至于让印度人和他们的大象，去中亚防御游牧骑兵，更缺乏战略层面的操作性（在战术层面上偶尔用可以）。

类似的战略困境在中央帝国防御北方威胁时也一直存在。无论那些强大的中原王朝如何努力，最后都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真正能牵制住这些马上民族的，还是源自森林、草原的力量。回归到迦色尼王朝的问题上来，无论王朝的统治者有多么的担心突厥人的势力坐大，他们权衡过后的选择，依旧是引入一支看起来威胁不那么大的突厥部落，来为自己拱卫北疆。这支被引入迦色尼王朝北境的突厥部落，就是日后叱咤西亚，逼迫拜占庭帝国不得不引狼入室的“塞尔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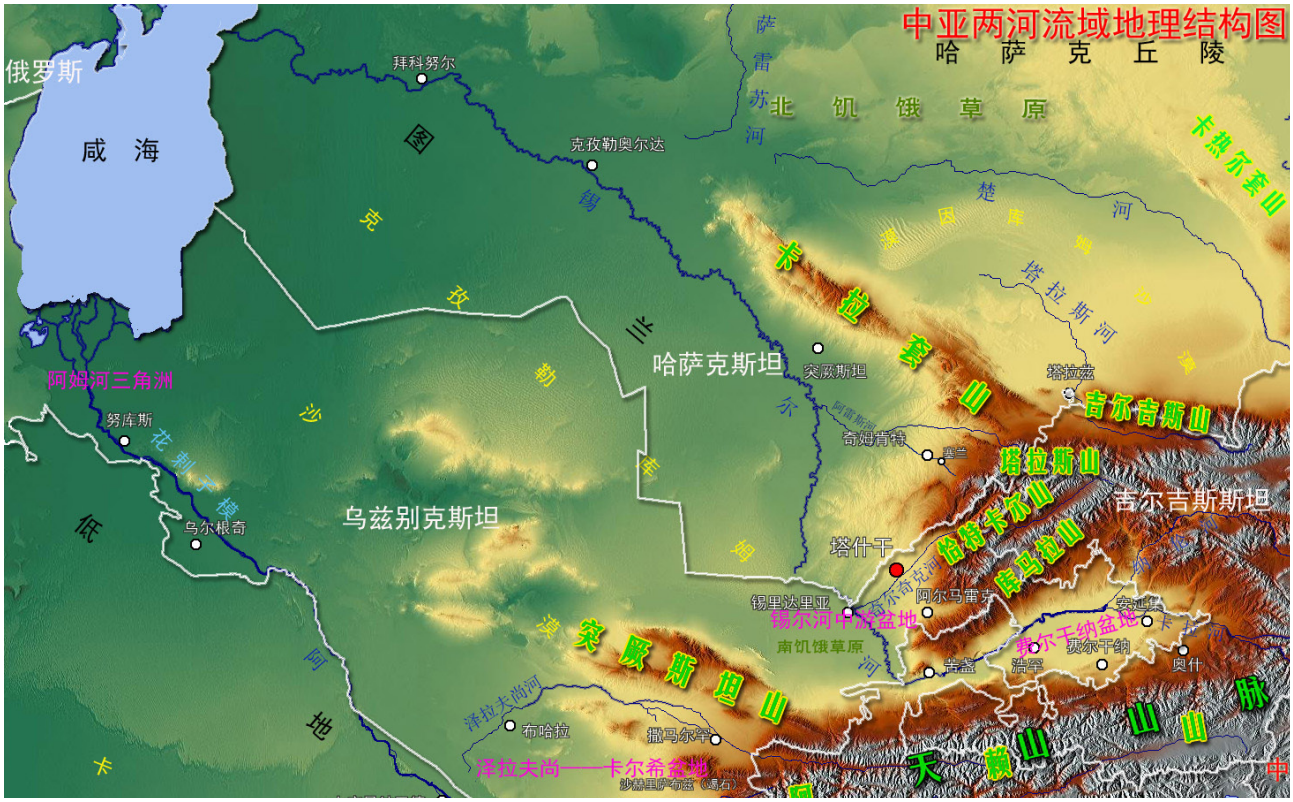
塞尔柱人

塞尔柱人与其它操突厥语的部落一样，最初是由蒙古高原迁入中亚的。不过其所属的乌古斯部落联盟，并不属于突厥汗国的核心部族，也因此在进入中亚后，没有被分配到最肥美的七河地区（山地草原），而是驻牧于条件相对较差的哈萨克草原（丘陵地带）。然而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妙，西突厥汗国在唐王朝的攻击下覆灭之后，身处边缘

之地的乌古斯部落联盟反而能够独善其身，并开始自己的事业。从天然条件来看，最让乌古斯部垂涎的，肯定是以伊犁河谷这核心的七河之地了。然而由于与其它乌古斯部落之间产生了矛盾，塞尔柱人没有向东发展，而是被迫选择了南迁之路，他们落脚的第一站，是看起来应该很美的锡尔河下游。

锡尔河下游地区较差的地缘潜力

通常情况下，大家提到河中地区，就会想到锡尔河、阿姆河两个中亚大河。然而定义富庶，且带有绿洲农业特色的“河中地区”时，锡尔河下游却并不包含在内。这是因为锡尔河并非一条严格意义上的东西向河流，而是东南——西北走向的注入咸海。这一走向导致锡尔河下游的纬度过高，不能像阿姆河下游那样，蓄积足够农耕生产的积温（后者诞出了“花剌子模”绿洲）。锡尔河之北、天山山脉向西延伸出的“卡拉套山”，既是中亚草原地带与绿洲农业区的分割线，也是锡尔河流域的农、牧分割线。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干旱地带谈农、牧分割的问题时，所谓“农业区”都只是相对的。基于整体环境的干旱，这些绿洲农业区的边缘，总是会有一定规模的荒漠草原带，以及更为广袤的沙漠地带。



中亚两河流域地缘结构图

如果说哈萨克丘陵地带的草原条件，不如七河草原的话，那么咸海之滨、锡尔河下游的情况就更不如意了。今天这一地区能让世人记住的地标，只有前苏联在此建筑的航天城“拜科努尔”。基于航天工程的特殊性，相信大家能够想象的出，俄国人当初选择在锡尔河下游建筑航天基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里的“荒凉”（又不至于荒到没有水源供给）。既然锡尔河下游不是久居之地，那么塞尔柱人要是想有前途的

话，就必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向西迁徙，进入最为肥美的南俄草原，应该是最具诱惑力的一种选择，不过经过前一阶段的解读，大家也应该清楚早有突厥系部落这样做，并且在各方势力的介入下，整个南俄草原早已乱成一窝粥了。换句话说，在这条直通欧洲的快车道上，塞尔柱人并没有太好的机遇。

在迦色尼王朝与喀喇汗国联手颠覆萨曼王朝的过程中，塞尔柱人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至于塞尔柱人是如何一步步的建立一个大帝国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五节 塞尔柱人入主阿拉伯帝国

塞尔柱人向呼罗珊地区渗透

塞尔柱人并不会一直呆在锡尔河下游，在萨曼王朝即将崩溃之际，塞尔柱人开始向阿姆河渗透。尽管他们的此时的势力，并不足以取萨曼王朝而代之。不过这支突厥部落的机会在于，可以在喀喇汗人（又译“哈拉汗”）与迦色尼人之间选边。纯粹从地缘背景来看，塞尔柱人似乎更应该和同属突厥部落体系的喀喇汗国站在一起。

问题是，塞尔柱人对于喀喇汗国来说，并没有特殊的意义。在喀喇汗国拥有自己的核心部族的情况下，即使加入的话也只能获得边缘地位。相比之下，在迦色尼王朝那里，塞尔柱人的比较优势就很明显了。最起码他们比受雇于王朝的其它民族，要更适应中亚这片土地。当然，获得这个机会的前提是必须成为穆斯林。不过这本身完全不是问题，伊斯兰教让游牧民族所焕发的生机，已经是有目共睹了。更何况一旦拥有了这个身份，塞尔柱突厥人的想象空间就不再只是中亚地区了。



汉西域全图

基于伽色尼王朝与喀喇汗国在中亚的分割协议，塞尔柱人被允许留置于阿姆河以南、伊朗高原以北的“卡拉库姆沙漠”中，依托阿姆河、穆尔加布河（源出兴都库什山脉）等河流驻牧。在地图上对照今天统治这一区域的国家，大家会发现这基本就是“土库曼斯坦”的领

土。事实上所谓的“塞尔柱人”其实就是“土库曼人”，“塞尔柱”一名，源于将这土库曼人带入河中地区的部族首领（Seljuk ben Dukak），就好像后来成就奥斯曼帝国的那支突厥人，也以其开国君主“奥斯曼”作为前缀一样。

以伽色尼王朝的本意来说，自然是希望塞尔柱人满足于这片荒漠地带。然而问题是，尾大不掉的情况永远存在。很快塞尔柱人就不满足于在卡拉库姆沙漠中，希望能够进驻条件更高的呼罗珊地区。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统治呼罗珊地区的政权，总是会向阿姆河方向扩张，反过来情况也是一样。当年在种族、文化上属于欧洲游牧民族的帕提亚人，正是按照这样的路径入主呼罗珊地区（所以最早我们称伊朗东北部为“帕提亚”）的。现在隶属亚洲游牧体系的塞尔柱突厥人，只不过是在历史重现罢了。

伽色尼王朝将政治中心放在兴都库什山脉之南的做法，注定了他们会把重心放在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选择，毕竟比起中亚乃至波斯来说，印度在各方面都要更具诱惑力。从吐火罗盆地到印度河一带，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区域。换句话说，伽色尼王朝本身所带有的游牧基因，可以让他们在这一区域拥有军事上的比较优势。正是因为如此，在颠覆萨曼王朝得到“大呼罗珊”地区之后，伽色尼王朝并没有把自己的政治中心迁往呼罗珊。至于塞尔柱人的优势在于，总能从北方的中亚草原的突厥部落那里，获得新生力量的加入。

基于上述原因，已经有机会在印度河流域建立统治的伽色尼王朝，放弃与突厥人争夺呼罗珊地区，也不能算是一个错误。这其中的地缘政治背景是，你无法稳定保有一个，包括中亚、伊朗高原、印度部分在内的帝国。当塞尔柱人在整个大呼罗珊地区做大，并且在战场上击败伽色尼人后（公元 1040 年）。伽色尼王朝并没有调集印度的资源，把战争拖入拉锯状态，而是放弃了在呼罗珊的统治，重新成为一个“阿富汗”王朝的原因。

塞尔柱人应哈里发召唤进入阿拉伯帝国

现在从地缘政治格局上看，拥有纯正突厥血统的“塞尔柱王朝”，俨然成为了萨曼王朝的继承者。如果说当年萨曼王朝的战略，是立足呼罗珊地区，向中亚、南亚方向扩张的话，那么站上伊朗高原的塞尔柱人，现在也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是取伽色尼王朝而代之，还是来场波斯高原的统一战争。促使塞尔柱人做出决定的，是来自巴格达的召唤。我们知道，此时统治米底、波斯，并在美索不达米亚架空哈里发（阿拔斯王朝）的，是以萨珊波斯继承者定位的什叶派王朝——布韦希王朝。无论从宗教还是民族层面来看，巴格达的哈里发（以及王朝内部的突厥裔军人）都希望有人来打破这一局面。

塞尔柱人在呼罗珊的崛起，让阿拉伯人看到了打破这一局面的希望。对于正在风头上的突厥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方面，有了哈里发的召唤，塞尔柱人有机会一下子从一个新进入伊斯兰世界的边缘民族，一跃成为核心势力；另一方面，布韦希王朝一直并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进入了衰

弱期。

在夺取呼罗珊地区后仅仅 15 年（公元 1055 年），突厥——逊尼结构的“塞尔柱王朝”，就攻灭了波斯——什叶体系的布韦希王朝。然而应召而来的塞尔柱人，并没有如阿拉伯人所愿的，恢复他们的统治权，而是顺势“继承”布韦希王朝在阿拉伯帝国的权力。换句话说，对于巴格达的哈里发来说，他们的地位就好像是三国时期的汉朝皇室一样，虽然也一直想借助外部力量中兴，但其实只能做别人的棋子罢了。当然，由于哈里发还呆在巴格达，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一阶段视为“黑衣大食”或者阿拉伯帝国的历史。对于任何一个未完全控制（又希望控制）阿拉伯帝国领土的非阿裔穆斯林来说，自称哈里发的风险都还是很大的。如果突厥人一定要抢夺“哈里发”之位的话，那些原本归属于逊尼派的阿拉伯人，要是不能另组政权的话，就只有投奔埃及的绿衣大食了。

虽然看起来，塞尔柱人只是取代波斯人在阿拉伯帝国的地位，但相比之下，塞尔柱突厥人的崛起，地缘意义要重大得多。首先这个突厥王朝，第一次统一了波斯高原三大板块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使之具备了建立一个真正帝国的基础；其次，与阿拉伯帝国内部那些自幼被训练为“古拉姆军人”突厥裔不同的是，塞尔柱人代表的是真正的突厥游牧势力。为了确保自己在西亚的统治，中亚草原的突厥游牧部落，被塞尔柱人有意识的、大规模的引入西亚。其所导致的最终后果，就是直接改变了中东的地缘结构。以至于我们今天在“中东”的地缘政治舞台上，能够看到“土耳其”这股突厥系力量。

现在的话，还远不到奥斯曼突厥人出场的时候，为之打前站的塞尔柱突厥人，尚在思考他们下一步的扩张方向。很显然，这个方向将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帝国，以及向叙利亚方向渗透的绿衣大食中选取。

第六节 塞尔柱从绿衣大食夺回西亚裂谷带

当塞尔柱突厥开始他们的征服事业时，阿拉伯帝国三大哈里发并立的局面，也在悄然改变。公元 1031 年，孤悬伊比利亚的“白衣大食”的大统被彻底终结。从外部压力来看，这与基督徒契而不舍的“收复失地运动”有关；以内部矛盾来看，则主要是“后伍麦叶王朝”无法平衡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利益。当然，这并不代表穆斯林就此退出了欧洲（只是被分割为很多各自为政穆斯林小国）。事实上，西班牙境内最后一个穆斯林王国被基督徒攻陷的时间，要晚至 1492 年（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不过白衣大食及其衍生的穆斯林王国，早已与阿拔斯王朝已经没有地缘冲突了，是否还有人自称“哈里发”，也不会影响到黑衣大食和塞尔柱人的利益。控制埃及的绿衣大食才是阿拔斯王朝最大的对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埃及（尼罗河）与美

索不达米亚（两河）之间的博弈，一直是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主线。巴勒斯坦、叙利亚（西亚裂谷带）是二者争夺的焦点板块。当年在希腊化时期，塞琉古王朝与托勒密王朝的博弈，也是如此。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崛起后的地缘政治变化 ，在于把麦加、麦地纳所属的“汉志山地”加入，变成了一个各方势在必得的焦点板块（主要是对伊斯兰世界有意义）。

在塞尔柱突厥人崛起之前，后发的法蒂玛王朝本已在与阿拔斯王朝的博弈中，占据优势，控制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在这一过程中值得玩味的是，架空阿拔斯王朝的布韦希王朝，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就奉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为正朔。只是在什叶派的布韦希王朝被塞尔柱人颠覆之后，其残余力量才随即转投同为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由此也再次证明了那些永恒不变的真理：所谓意识形态之争，只是地缘矛盾的工具罢了。

虽然突厥人的到来，并没有让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重拾实际统治权，但这些精于骑射的突厥人，对“黑衣大食”体系和逊尼派的贡献还是挺大的。最起码他们重新从什叶派手中夺回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对于欧洲的基督徒尤其是西欧的天主教徒来说，这些穆斯林世界内部的权力之争，本来并不会引起特别的关注。问题是，在穆斯林世界内部的这些乱斗中，敏感的巴勒斯坦总是处在漩涡中心。

今天巴勒斯坦甚至“斯坦”这个后缀，俨然已经成为了穆斯林世界的专属。不过当年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这一地区就已经被称之为“巴勒斯坦”了。因此在这里，巴勒斯坦只是一个地缘标签，并非特指阿拉伯巴勒斯坦（叙利亚也是如此）。同时大家都知道，让一神教三大派系魂牵梦萦的焦点，只在巴勒斯坦板块内的那座圣城——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有他们失去的圣殿（现在剩余的遗址是“哭墙”），是民族和宗教的源头；对于基督徒来说，耶路撒冷即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地，也是圣墓的所在地（圣墓教堂）；而对于穆斯林来说，这里则是先知“夜行登霄”、觐见真主的地方（圆石清真寺）。



耶路撒冷

这种错综复杂的宗教关系，使得任何一个统治耶路撒冷的政权，

都必须表现出一定的宽容态度，以避免矛盾升级。比如当下以色列就规定，犹太人和基督徒不得进入圆石清真寺。在国际社会协调巴以矛盾的方案中，也建议将耶路撒冷托管为“国际城市”，以这种各方妥协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只是好不容易重回圣城的犹太人，是断不肯这样做的。

第七节 塞尔柱人征服高加索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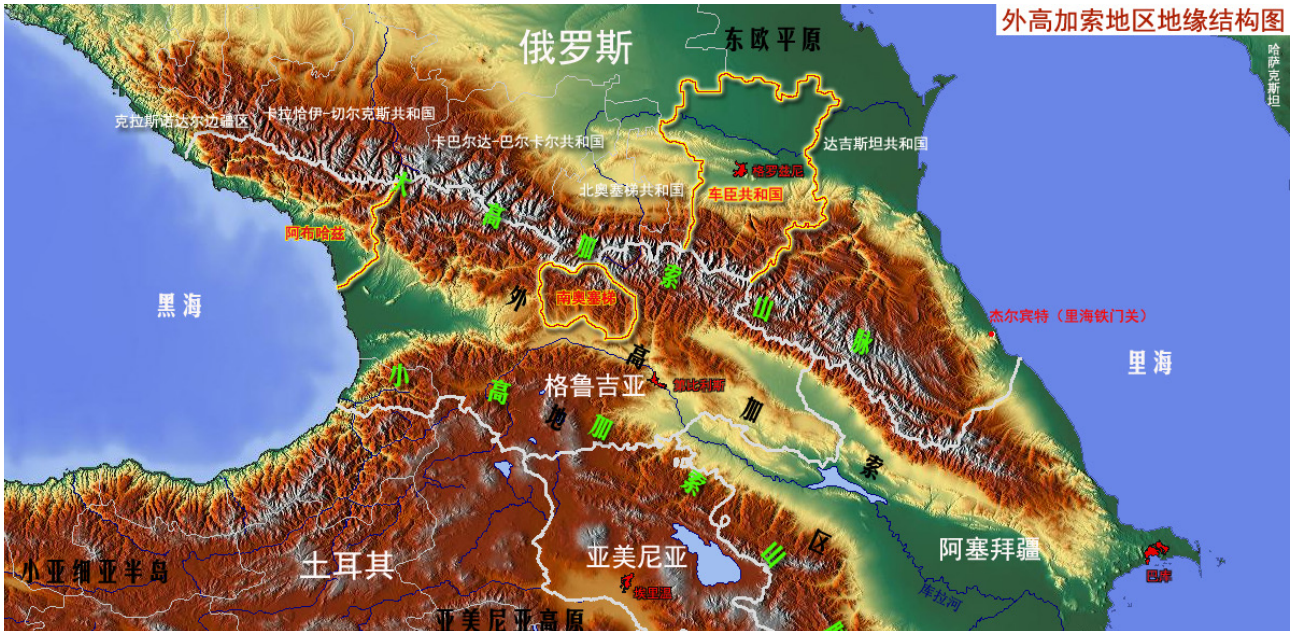
今天大家提到伊斯兰教、阿拉伯，总会不由自主的联想到“极端”一词。不过在一千多年前，各方面处于黄金时代的伊斯兰世界留给人的印象，却并没有那么极端。最起码在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来自欧洲的基督徒都可以自由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并进行商贸活动。11 世纪初，当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夺得耶路撒冷之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在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过程中，法蒂玛王朝不仅在其国内压制逊尼派的宗教活动，亦曾经试图将耶路撒冷，彻底变成一座伊斯兰教圣城（破坏城内的基督、犹太教堂）。拜占庭帝国花了很长时间和金钱，才算一定程度恢复了朝圣权（以及重建圣墓教堂）。

鉴于两代逊尼派王朝，在处理耶路撒冷的宗教问题上，都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会让人很容易认为，如果逊尼派政权重新控制耶路撒冷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然而当塞尔柱人成为逊尼派阿拔王朝的中兴力量，并夺回耶路撒冷后，欧洲人却发现情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这些刚刚完成转型的中亚游牧民族，还算不上虔诚的穆斯林。初入西亚的塞尔柱人，甚至会劫掠、破坏清真寺。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他们再去尊重其它宗教，更是难上加难。其实也不仅仅是宗教层面上的问题，进入文明体系的游牧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总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指望其快速摆脱一些原有习惯（比如劫掠）是不大现实的。

尽管在伊斯兰和地中海世界，突厥人目前都给人以相对“原始”的感觉，但这并不妨碍这些来去如风的骑射高手，发挥强大的军事效率。在向法蒂玛王朝发起挑战的同时，塞尔柱人也以伊朗高原为基地向西扩张。气候环境的差异过大，是很多温带民族向热带地区扩张时，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比之阿拉伯半岛终年酷热的“热带沙漠气候区”，突厥人其实会更喜欢生活在由伊朗——亚美尼亚——安纳托利亚高原所组成的这条高原带上。因为这一地区与欧亚草原同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同样拥有四季分明的气候。

最先在塞尔柱西征中被征服的是高加索地区（公元 1054 年）。所谓高加索地区意指大、小高加索山脉及其之间的地区。由于两大山脉中部有支脉相连，使其整体地理结构呈“Z 字型，并造就了分别朝向里海和黑海的两块喇叭型低地。今天大致按照这样的地理分割，两块核心低地分属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就气候类型来说，面朝里海的阿塞拜疆，整体要比面朝黑海的格鲁吉亚低地区气候更为干燥（前者为大陆

性气候，后者为海洋性气候）。不过对于来自中亚的突厥人来说，他们更为喜欢的就是干燥一些气候。其影响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阿塞拜疆人”变成了突厥人（格鲁吉亚人则为高加索土著）。



外高加索地区地缘结构图

征服高加索地区后，塞尔柱人面临一个更为重大的选择：要不要征服亚美尼亚。要知道，自罗马——萨珊波斯时代起，亚美尼亚高原就是欧、亚缓冲之地的地缘定位。即使在阿拉伯帝国势头正盛之时，也没能打破这种战略平衡。同样，自视为萨珊波斯继承者的布韦希王朝，也没有以此为目标。不过，作为穆斯林世界的生力军，塞尔柱人显然希望打破这种平衡。为此塞尔柱统治者甚至从哈里发那里要来了个“东方和西方之王”的称号。当然，扩张伊斯兰教的版图，也符合宗教领袖（虽然哈里发本身应是“政教领袖”）的利益。这种情况就好像，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出身，只要能够帮天主教扩张版图，罗马教庭都会乐见其成一样。

第八节 塞尔柱人进取亚美尼亚

塞尔柱人从拜占庭夺取亚美尼亚

一直以来，亚美尼亚王国都是欧洲（将小亚细亚视为欧洲的话）与亚洲的缓冲之地，这个古老的王国一直在面临一个选择：东方还是西方。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无论从文明还是宗教的角度来说，亚美尼亚人都不会选择穆斯林和塞尔柱人。为此当塞尔柱人大军压境时，同为基督教世界一员的拜占庭人，成为了亚美尼亚王国的救命稻草。然而拜占庭人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却是将亚美尼亚人变成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 1045 年）。

尽管一直处于拜占庭的保护之下，但并不代表亚美尼亚人想变成拜占庭人。要知

道，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立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公元 301 年），亚美尼亚人可不认为他们和那些欧洲日耳曼、斯拉夫国家一样，是从旧罗马体系中接受的文明曙光。今天耶路撒冷旧城，除了犹太区、伊斯兰教区、基督教区以外，还有亚美尼亚区。所谓“欲亡其国，先亡其史”，民族记忆能否不被异族文化所融合，很大程度取决于你有没有值得炫耀的历史。事实上，亚美尼亚人之于基督教世界、犹太人之于整个“一神教”体系的优越感，是这两支中东古老民族，能够历经千年风雨而存的根本原因。



格拉提德王朝时的亚美尼亚王国地图（公元 880——1045 年）

在亚美尼亚的历史中，这并不是第一次变成“罗马”的一部分了。亚美尼亚人相信，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他们还是可以在这片高原上复国的。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却着实有些不妙，因为塞尔柱人很快便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亚美尼亚（公元 1071 年）。当然，与 20 世纪初另一支突厥人的手段相比（亚美尼亚大屠杀），亚美尼亚人还不至于遭遇灭族或者强制转变宗教信仰的风险。只要愿意承受有别于穆斯林的高额税收，亚美尼亚人就可以保持他们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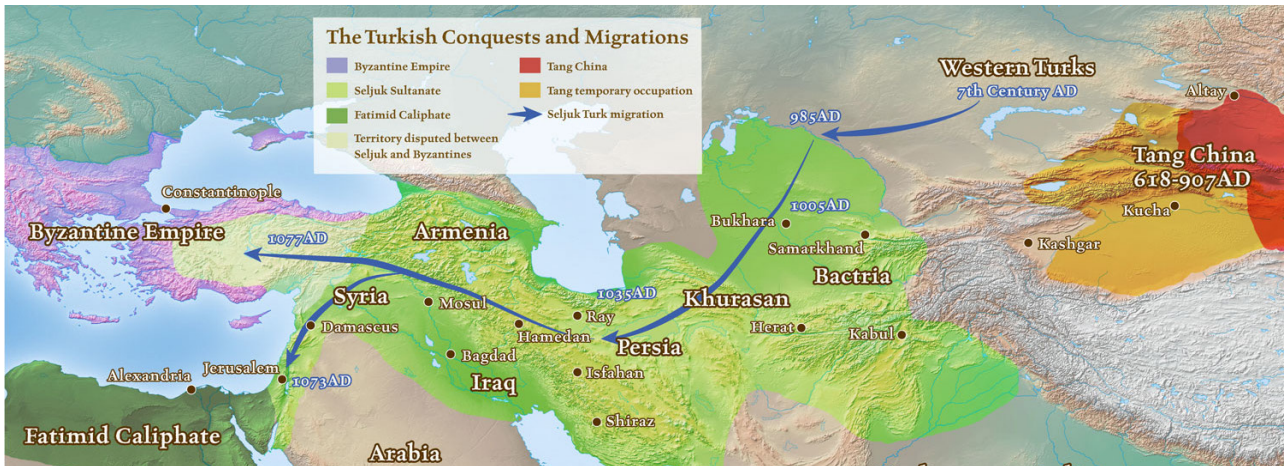
很多时候穆斯林的君主们，其实是愿意看到自己境内，一定程度的存有这样倔强的异类（贡献更多财政收入），前提是他们不会强大到威胁自身安全。这种基于经济考虑而作出的决定，也被理解为早期伊斯兰教的“宽容”。反观今天的穆斯林之所以容易被贴上“极端”的标签，则与整个伊斯兰世界在工业时代的边缘化有关。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不再拥有安全感时，心理就会容易变得敏感和脆弱。

夺取亚美尼亚，意味着塞尔柱人打开了通往小亚细亚的门户。对于希腊化的拜占庭来说，最大的地缘风险在于：突厥人比他们更适应安纳托利亚高原。在希腊部分我们就已经对小亚细亚的地缘结构做过分析了。从地缘角度来看，“希腊”之于小亚细亚的优势在于沿海低地，而气候干旱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优势区。

问题在于，当游牧民族能够控制安纳托利亚高原时，那些被俯视的沿海低地也将不再有安全感。也正因为如此，亚美尼亚的缓冲作用才变得尤为重要。

塞尔柱帝国分裂与乞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的建立

如潮水般涌入的中亚游牧者，很快便基本控制了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尽管头上还顶着个黑衣大食的招牌，但从政治和领土范围来看，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把 11 世纪末的塞尔柱王朝，称之为“塞尔柱帝国”了。不过如所谓的“阿拉伯帝国”、法兰克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所遇到的问题一样，突厥人在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上也遇到了困难。当军事扩张到一定极限后，各自为政的分封制，几乎成为了帝国扩张到瓶颈时的必然选择。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便是此意。



塞尔柱帝国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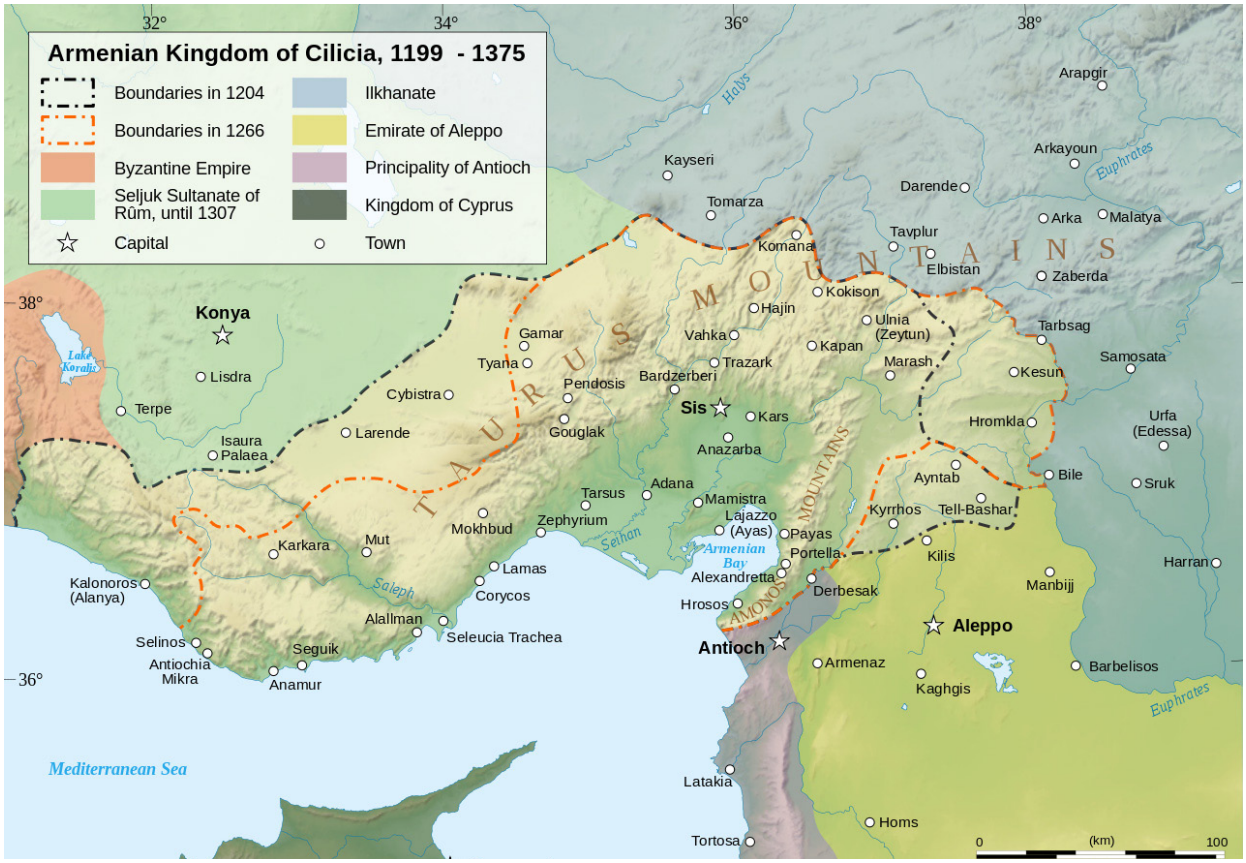
在塞尔柱帝国内部裂土封王过程中，分得小亚细亚部分的是“罗姆苏丹国”。很显然，如果不能从罗姆苏丹国或者说塞尔柱人手中夺回小亚细亚，拜占庭帝国的君主就算还自称为罗马皇帝，其实质上也只是一个“希腊”国王了。在突厥人已经站到爱琴海东岸的情况下，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得危急。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急需一股强大的外援，帮助他们重回小亚细亚。很显然，这个战略任务将属于西欧的天主教徒。

相比东正教徒在东方的囧境，西地中海的局面，却在朝着有利于天主教世界的方向发展。白衣大食在西班牙的崩溃；诺曼人在西西里，比萨、热那亚对撒丁、科西嘉岛的征服，以及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的做大，不仅让天主教世界扭转了几个世纪以来，与穆斯林博弈的被动局面，更培养出了强大的海军。这使得罗马教廷和狂热的天主教徒们，开始有信心把视线投向富庶的东方。当然，正如我们解读穆斯林世界之前所说的那样，天主教徒们能不能去东方，还要看东正教世界的态度。当 11 世纪行将成为历史时，机会终于来了。

翘首等待十字军东征的，并不仅有拜占庭人，还有被拜占庭人和塞尔柱人挤压成炮灰的亚美尼亚人。因为在灭国后不久，不甘被穆斯林所统治的部分亚美尼亚人，找到了一片新的土地重建亚美尼亚王国。这片土地就是位于小亚细亚东南角、地中海西北角的“奇里乞亚”（西里西亚）。重建后的亚美尼亚王国，也因此被称之为“奇里

乞亚亚美尼亚王国”（公元 1080 年）。

亚美尼亚人实际上是被拜占庭人主动“请”进奇里乞亚的。作为几大板块相接之地的枢纽之地，奇里乞亚也曾经被穆斯林所征服过。拜占庭在夺回这块战略要地之后（公元 965 年），开始有意识的从邻近的亚美尼亚、叙利亚地区吸引基督徒（同时驱逐穆斯林），以消除这一地区的伊斯兰痕迹。拜占庭及塞尔柱人对亚美尼亚的吞并、征服之后，大量亚美尼亚难民开始迁入奇里乞亚（尤其是利益损失最大的贵族阶层），并很快在人口上占据了优势。



乞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地图

君士坦丁堡当然是很乐见亚美尼亚人，帮助帝国镇守住奇里乞亚这块战略要地了，至于复国这个问题，却不是拜占庭人所希望看到的。问题不在于亚美尼亚人有没有资格要求独立，而在于奇里乞亚的位置太过敏感。亚美尼亚人之所以一直欧亚之间充当缓冲者的角色，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片不那么有占领价值的高原上。然而没有人会愿意一直做这样悲剧性的角色，亚美尼亚人也一直有想法充当第三股势力。从地缘位置上看，他们扩张的首选之地就是乞里乞亚和叙利亚地区。公元前 1 世纪，亚美尼亚人就曾经借着塞琉古王朝崩溃之际，一度完成这个愿景。只不过正在向帝国阶段的转型的罗马，很快便终结了这一切。

虽然拜占庭帝国并不愿意看到奇里乞亚成为“新亚美尼亚”，但事情的主动权很快便不不掌握在君士旦丁堡手中了。塞尔柱人对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征服，让奇里乞亚成为了一块孤悬东地中海的“飞地”。尽管凭借海上优势，拜占庭人还能在奇里乞亚

控制几个沿海据点，但这片土地的主导权，已经不可避免的被亚美尼亚人所获得了。

一方面，亚美尼亚人与拜占庭帝国有着灭国之恨；另一方面，又与穆斯林国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就是在这样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建成。很显然，如果没有强力外援的话，没有人会看好这个新国家的命运。至于十字军的到来之后，亚美尼亚人的命运发生了哪些改变，后面的内容将逐渐揭晓答案。

第十五章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第一节 十字军东征的组成人员和进军路线

罗马教廷在十字军东征上的作用及东征组成人员

毫无疑问，罗马教廷是“十字军东征”事件的重要推手。长久以来，教廷虽然貌似拥有至高无上的神权，但却一直被法兰克、神圣罗马帝国两大世俗君主体系所操控。显而易见的是，没有谁会真心愿意接受这种定位。就像世俗君主们，总试图让祭司们成为自己的工具一样。负责意识形态层面的祭司们，也希望看到神权在上、君权在下的“神权政治”体系的建成。

罗马教廷在十字军东征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权力之争，是我们必须在开始解读这段历史时，就必须关注到的。基于彼此间的竞争关系，“神的使者”并无法直接从世俗君主那里获取主控权。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控制力，自下而上的倒逼世俗君主屈服于教权，是最为常见的路径。上世界70年代末，什叶派宗教领袖们幕后推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终结了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专政体系，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具体到这段历史，教廷在权力上的企图心，直接导致了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以宗教思想为武装，高度集权的军事集团出现，并对欧洲地缘政治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教廷非常想借圣战之机成为西欧的权力中心，但神并不会赐予它足够的组织力。这也使得整个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充满着混乱和无序。第一支启程的十字军，甚至是由修道士所组织的二万“民军”（战斗力不言自明）。可想而知，这些被狂热宗教情绪驱使，自愿打头炮的民军，在碰到塞尔柱人后会是什么样的下场。有鉴于此，西欧军事采邑体系下的那些封建领主，才是这些圣战的核心力量。



十字军东征

总得来说，十字军东征并不是一场“国家战争”，不过“人”都是有地缘属性的，那些地缘政治关系更为紧密的区域，更容易采取一致行动。最终成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主力

的，是来自法国（包括诺曼底）的军事贵族，人数大约在 30000——40000 人左右（包含数千骑兵）。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法兰西”主导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试图染指东方贸易的热那亚、威尼斯商人，则负责提供船队（运送补给）。

对比当年亚历山大、汉尼拔的兵力规模、配置，应该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兵力，并非没有可能取得远征胜利。不过因为军队本身是由互不归属的封建领地所率领，在指挥和协同作战方面，很难有当年亚历山大和汉尼拔那般高效。事实上军事研究者一般认为，相比古典时期，中世纪欧洲在军事技能层面是处在倒退状态。

比较利好的一点是，欧洲人所面对的穆斯林世界，正处在一片混乱状态，并不能发挥合力阻击这些远渡而来的圣战者。就这件事来说，塞尔柱人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这些曾经被哈里发寄予厚望的游牧者，既没有让阿拉伯人重新掌握权力，也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强大帝国。公元 1092 年，塞尔柱人最强大的君主（马立克·沙一世）死去之后，帝国就陷入了各自为政的分裂状态（一如当年的阿提拉、查理曼）。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示意图

十字军进军进军路线

之所以要把这个时间点提出来，是因为第一支十字军启程的时间是在公元 1096 年。从这个时间关系大家也可以看出，基督徒所选择的这个“天时”还是不错的。这些来自法兰西各地的十字军，大体分为了两路：北路沿多瑙河而下，横穿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保加利亚，抵达君士坦丁堡；南路则从瑞士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波河平原，然后再兵分两路。一路沿亚得里亚海东岸而下，经由达尔马提亚进入希腊北部。一路则在意大利南部渡海与前者在希腊会合，并最终抵达君士坦丁堡。

上述路线向我们表明，分裂且充满矛盾的基督教世界，终于在“圣战”的大旗下，第一次采取了一致行动。即使还处在观望状态的地区，也提供通行的便利。当然每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诉求，这其中拜占庭人的打算，就是让天主教徒们帮助自己夺回小亚细亚。当然，为此君士坦丁堡要负责为远道而来的十字军提供补给。

在亚历山大时代，达达尼尔海峡是通往小亚细亚的主要海上通道，与之相邻的小亚细亚低地区被称之为“密细亚”（特洛伊古城所在板块）；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相邻的区域则被称之为“比提尼亚”。黑海周边地区及东欧的开发，促使东迁的罗马选定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之侧的拜占庭城作为新都（东罗马因此被后人称之为拜占庭帝国），也由此提升了比提尼亚的战略地位。不过在中世纪，比提尼亚被称之为“尼西亚”（核心城市为尼西亚城，今土耳其伊兹尼克）。拜占庭帝国之所以急于希望西欧的天主教徒前来支援，是因为塞尔柱人的罗姆苏丹国将都城选定在了尼西亚。很显然，这表明塞尔柱人野心绝不仅仅在小亚细亚。



小亚细亚半岛地缘结构图

“法国人”所率领的十字军在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很快便帮助拜占庭人夺回了尼西亚，并沿萨卡里亚河向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挺进。塞尔柱人败退的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他们低估了十字军的军事实力，尤其在刚刚屠杀过那支由农民所组成的所谓“十字军”后；二是整个“塞尔柱帝国”正处在分裂后的动荡期，与十字军直接对抗的“罗姆苏丹国”，还要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与其它塞尔柱王国争斗。

即使没有十字军的增援，占据海上优势的拜占庭帝国也还是很有机会，在持久战中逐步夺回尼西亚、爱奥尼亚等沿海低地的。然而彻底夺回小亚细亚的关键，在于能否将突厥人赶出安纳托利亚高原。想要做到这点，难度就比较高了。毕竟游牧出身的突厥人，比欧洲人要更加适应高原干旱的大陆性气候，此时的他们也并非孤独的存在于安纳托利亚高原。就气候环境所产生的困扰来说，进入高原腹地的十字军应该是深有体会。这些从法国而来的职业军人，因为酷热缺水而出现了大量非战斗减员。

帮助他们夺回整个小亚细亚。从战略上看，拜占庭军队和十字军只有一路向东拿到亚美尼亚的控制权，方有可能拿回小亚细亚。不过这些远道而来天主教徒，却

不是来给东正教徒做雇佣军的，夺回圣城耶路撒冷，才是他们此行的最终目的。因此在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后，“新亚美尼亚”而不是“亚美尼亚”成为了十字军的下一个目的地。

第二节 十字军建立埃德萨伯国

十字军在安托利亚高原的进军路线

由于十字军东征事件，有相当部分是发生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所以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土耳其境内的区划，以利于后面的解读工作。今天土耳其内部共分为八个行政大区，分别为：以马尔马拉海为核心，包括东色雷斯（欧洲部分）、密细亚、比提尼亚在内的“马尔马拉海地区”；包含爱奥尼亚、卡里亚、吕底亚在内的“爱琴海地区”；由吕基亚、潘菲利亚、奇里乞亚、安条克组成的“地中海地区”；包括尼西亚以东黑海沿海地区的“黑海地区”（当年的本都王国）；覆盖安纳托利亚高原核心部分的“中部安纳托利亚地区”；位于亚美尼亚高原的“东部安纳托利亚地区”。 以及东南托罗斯山脉以南，至叙利亚边界的“东南安纳托利亚地区”。



土耳其行政区划图

在中世纪，今天所谓土耳其“东南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核心城市，是一座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城市——乌尔法城（今名尚勒乌尔法）。这座古城还有一个东正教徒命名的希腊语名字——埃德萨。为此，我们也可以把东南托罗斯山脉以南，至土叙边境的这片丘陵平原称之为“埃德萨地区”（不包括安条克）。曾经的奥斯曼帝国在缩水成“土耳其”后，安条克和埃德萨成为了突厥人在新月沃地的两个保留地。其中以安条克可以帮助土耳其发挥对西亚裂谷带的影响；埃德萨则是渗透美索不达米亚的前哨。

并不准备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纠缠太久的十字军，接下来兵分二路：一路穿越托罗斯山脉中的奇里乞亚山口，进入奇里乞亚平原。在从亚美尼亚人那里得到补给之

后，翻过叙利亚山口进入安条克；另一路则绕过奇里乞亚平原，沿当年的“波斯御道”从今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马拉什），穿出托罗斯山脉。前一条行军路线，实际就是当年亚历山大东征所用的线路。在东出奇里乞亚时，亚历山大与当时的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曾经围绕着分割奇里乞亚、安条克的“阿曼山脉”进行决战（公元前 333 年，伊苏斯战役）。此战之后，波斯人退入美索不达米亚，完全放弃了地中海周边地区。



十字军骑士国

获胜之后的亚历山大当时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经安条克南下，征服西亚裂谷带；二是经埃德萨地区直取美索不达米亚。亚历山大的选择是先南下征服包括安条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在内的整条“西亚裂谷带”以及埃及。等整个东地中海在手之后，再北上攻入美索不达米亚。当十字军代表欧洲人站在阿曼山脉之东时，也同样面临两个方向性的选择：安条克还是埃德萨。很显然，无论是从向欧洲方向获得后援，还是夺回圣城耶路撒冷的目标来看，天主教徒们都应该沿着亚历山大的足迹继续前行。事实上，十字军主力也的确这样做了。不过这支由法兰西－诺曼军事贵族所组成的远征军，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真正的统帅。在大多数十字军开始从安条克启程向耶路撒冷挺进时，也有部分十字军往埃德萨方向推进。

促使部分十字军东进的直接原因，是来自亚美尼亚人的请求。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亚美尼亚人在奇里乞亚试图重建“新亚美尼亚王国”，但奇里乞亚并非是亚美尼亚人在高原以外，唯一人口占优的区域。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托罗斯山脉南麓的埃德萨地区也自然渗透了很多亚美尼亚人。由于位置的关系，埃德萨城曾经是拜占庭帝国在东部的最前沿城市，也是其与穆斯林国家博弈的焦点。在十字军到来之前，埃德萨地区已经为塞尔柱人所控制（公元 1087 年）。此后，塞尔柱人将埃德萨的管理权交给了臣服的亚美尼亚人。

十字军在埃德萨地区建立埃德萨伯国

然而基于宗教原因，亚美尼亚人并不希望成为穆斯林的子民（尤其异教徒的身份意味着更多的税赋），十字军的到来，帮助他们燃起了独立的希望。从结果来看，亚美尼亚人的这个愿望实现了一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十字军的确帮助他们夺回了埃德萨城，并在后来的征战中，逐步向底格里斯河方向扩张。然而埃德萨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却没有能够借势实现独立，或者说与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人共建“新亚美尼亚”。因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从西欧而来的天主教徒们，决定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十字军在埃德萨地区建立的国家被称之为“埃德萨伯国”。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狂热的天主教徒们一共建立了四个国家，分别是：埃德萨伯国、安提柯公国、的黎波里伯国，以及耶路撒冷王国。其中埃德萨伯国（公元 1098 年）是最早建立的国家，也是最先被塞尔柱人所攻陷的（公元 1146 年），其存续时间仅仅只有不到 50 年。导致这一悲剧性结果的原因有二：一是埃德萨地区处在抵抗塞尔柱人的最前沿。突厥人可以从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高原、安纳托利亚高原，乃至叙利亚四个方向对埃德萨伯国形成包围之势；二是埃德萨伯国是十字军四国中，唯一不临海的国家。这意味着它很难从欧洲方向直接获得后援。

从地缘位置、人口结构来看，这个十字军国家能否生存下来，很大程度取决于亚美尼亚人的态度。为此，埃德萨伯国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结盟。尽管亚美尼亚人内心深处，肯定对天主教徒们反客为主式的占据埃德萨地区不满，但在东正教（拜占庭）和穆斯林（塞尔柱）的双重压力下，这些欧洲而来的十字军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因此在埃德萨伯国的存续其间，无论是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人，还是埃德萨的亚美尼亚人，都尽了很大努力。

“奇里乞亚亚美尼亚”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的地缘作用，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今天的以色列。如果说犹太人凭借他们坚定的复国信念，使之客观上成为了西方打入穆斯林世界的一个楔子，并为自己赢得了外交空间，那么亚美尼亚人当日的做为，也为自己在基督教世界内获得了生存空间。由于并非出自旧罗马的基督教体系，亚美尼亚人及其历史悠久的“亚美尼亚教会”，本来一直是被视为异类般的存在。在成为十字军东征必不可少的支撑点后，亚美尼亚人在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宗教地位都得以提升。以至于在 1 个世纪之后（公元 1198 年），天主教世界（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代表）以及东正教会，正式将奇里乞亚的“新亚美尼亚”，由公国升级为“王国”。

顺便说下当下在亚美尼亚高原及包含埃德萨、伊拉克西北部（摩苏尔）在内的托罗斯山脉南麓，占据人口优势的已经不是亚美尼亚人，而是地缘政治角色同样尴尬的穆斯林民族——库尔德人。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不是后来穆斯林消化了小亚细亚半岛，那么现在的所谓“库尔德斯坦”，地缘标签应该还是“亚



土耳其尚勒乌尔法城

美尼亚”。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埃德萨城的特殊宗教地位。但凡对一神教有些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尊的人文始祖（先知）是“亚伯拉罕”（穆斯林称之为“易卜拉辛”。埃德萨城（乌尔法）被认为是亚伯拉罕的出生地，也因此被称之为“先知之城”。从这点来说，当年建立埃德萨伯国的十字军，其在“圣战”层面的贡献，并不亚于对耶路撒冷的征服。

第三节 十字军建立安条克公国

在部分十字军向埃德萨推进时，十字军主力还是选择了与亚历山大相同的线路。他们首先要攻克的就是著名的“安条克城”（ 安提俄克、安提柯）。纯粹从战略位置来看，处在地中海——新月沃地窗口位置的安条克，甚至比耶路撒冷还要重要。从地质角度来说，地中海东岸的“西亚裂谷带”，本质是 “东非大裂谷”向阿拉伯半岛西侧的延伸。由于面朝地中海，又有山地为之截留来自大西洋的水气，西亚裂谷带的降水条件比阿拉伯半岛要好上许多。这也是为什么西亚裂谷带，能够与两河地区共同组成“新月沃地”的根本原因。

成就西亚裂谷带的，是一系列由红海延伸至“东南托罗斯山脉”的山地（红海本身也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位于裂谷带最北部的山地带叫做“阿拉维山脉”，其与延伸自“东南托罗斯山脉”的阿曼山脉之间的低地区，就是“安条克” 板块。在水资源尤为珍贵的西亚地区，能够从两个方向的山地收集降水的“安条克平原”，环境上自是有它的优势。另一个加分项是，阿曼山脉与阿拉维山脉之间并非无缝对接，这一缺口不仅让安条克平原能够拥有宜人的“地中海气候”，更使之成为了阿拉伯半岛与地中海的天然交流窗口（这也是当年心向欧洲的塞琉古王朝，把都城定位在安条克的原因）。

在基督教历史上，安条克也有着很高的地位，甚至拥有“圣城”的地位。我们知道，基督教源于犹太教。其与犹太教之间最本质的差异在于：犹太人认为只有自己的族人才是“上帝选民”，而不愿意和外邦人分享他们的权力；而基督教徒则认为，



十字军骑士国

应该把这“优秀”的教义传播出去，成为一个不分民族的普世宗教。在耶稣基督受难之后，他的信徒开始向南北两个方向迁徙、传教，其中与耶路撒冷相距不远，居民又因枢纽位置而民族成份复杂的安条克地区，是最早接受这一理念的区域。因此将安条克称之为基督教的形成之地，也并不为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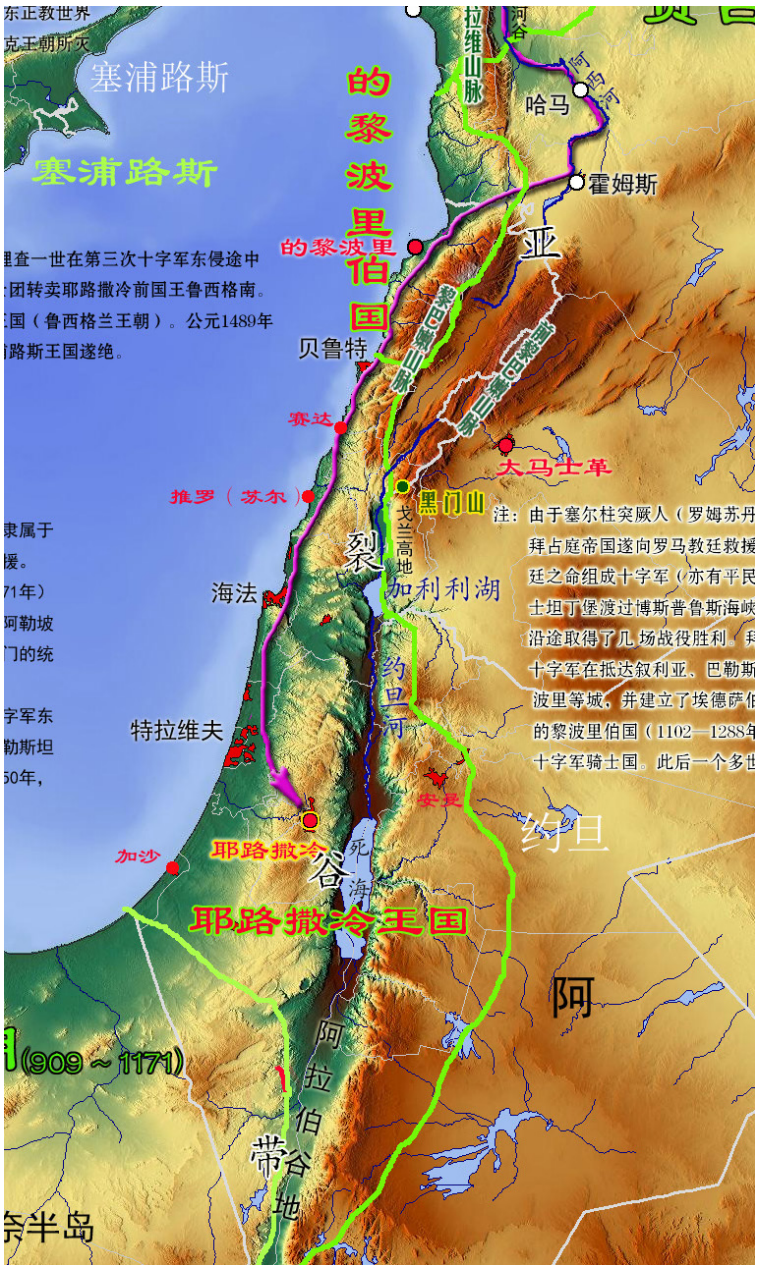
从地缘位置上看，安条克比现在的大马士革，更有资格成为“叙利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中心。不过今天的叙利亚却并不包括安条克。在奥斯曼土耳其崩溃之后，更名为“安塔基亚”的安条克成为了突厥人留在新月沃地的楔子。很显然，这种情况并不能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满意，尤其叙利亚独立后的合法政府，一直由视安条克——阿拉维山脉一带为世居之地的“阿拉维派”穆斯林所掌握。为此，叙利亚方面曾长期不承认土耳其对安条克的占领（目前承认了）。

今天安条克也是欧洲雇佣军、圣战者加入叙利亚、伊拉克内战的主要登陆点。不过对比900年前的十字军，这些欧洲人几乎没有可能在地缘政治层面发挥什么作用。基于安条克的临海位置以及“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的存在，势头正盛的十字军拿下安条克并不让人意外（围城战共持续了 40 多天）。紧接着，安条克也像埃德萨一样建立了十字军骑士国——安条克公国（公元 1098 年）。基于安条克的各方面优势，取得一个比伯国高、王国低的政治地位还是很合适的。

第四节 耶路撒冷王国和的黎波里伯国的建立

十字军沿海岸地区南下建立骑士国

如果十字军所倚仗的仅仅是那些骑士的战斗力，那么接下来他们可以沿从安条克入海的“阿西河”，经阿拉维山脉东麓一路向南，攻入西亚裂谷带的下一个地理单元——贝卡谷地。今天这条谷地为世人所知，大概是因为 1982 年 6 月 9 日，以色列对黎巴嫩藏身于此的导弹阵地，发动的那场毁灭性空袭。不过空中打击是一回事，



十字军骑士国

陆地推进又是一回事。从地形上看，贝卡谷地是由黎巴嫩山脉——前黎巴嫩山脉包夹而成的谷地。这两段山脉也是整个“西亚裂谷带”的地势最明显的山地。由此也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谷地内水资源相对丰富、土地肥沃；二是仰仗两侧山地所形成的防御优势，贝卡谷地也形成了复杂的民族、宗教结构。今天黎巴嫩成为一个基督教、逊尼派、什叶派混杂之地，也正是拜这两条山脉所赐。

即使拥有最强陆战实力的马其顿军团，当年也没有选择经由贝卡谷地南下的线路，而是从黎巴嫩山脉西麓的沿海地区南下，攻取的黎波里、塞达、提尔等沿海城市。基于这片沿海之地原来是腓尼基人所占据，我们也可称之为“腓尼基平原”。当十字军沿阿西河而下，即将进入贝卡谷地时，最终也还是没有贸然进入，而是穿越阿拉维山脉与黎巴嫩山脉之间的山口，向西切入腓尼基平原。只不过由于腓尼基地区并不是十字军的最渴望的目标，这些远道而来的天主教徒并没有在腓尼基纠缠太久，而是快速向耶路撒冷推进。

由于塞尔柱帝国的分裂，使得耶路撒冷这个什叶派、逊尼派相争的焦点，重新又成为了埃及法蒂玛王朝的领地。这种频繁的易手，显然并不利于稳定耶路撒冷的民心。公元 1099 年 7 月，依靠狂热信仰支撑的十字军，终于从什叶派穆斯林手中夺下了这座圣城。只是在这些基督徒眼中，可没有什叶派、逊尼派之分。由于在持续 8 天的攻城战中损失惨重（据信损失了将近 3 万人），城破之后这座圣城内的穆斯林几乎被屠杀殆尽。此后占据耶路撒冷的骑士们，急不可待的建立了第三个十字军骑士国——耶路撒冷王国（公元 1099 年）。

十字军得以建立骑士国的地缘背景

需要注意的是，在十字军建立上述骑士国时，他们也仅仅是攻占了几个城市作为支点，还有大量据点为穆斯林所控制。包括黎巴嫩地区，整体都还是在穆斯林手中。为此，十字军又花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才算基本控制了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沿海地区。这其中，阿拉维山脉——今天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不包括贝鲁特）之间，以的黎波里为核心的沿海地区，被建制成了最后一个十字军骑士国——的黎波里伯国（公元 1102 年）；贝鲁特——耶路撒冷一线，归属耶路撒冷王国。双方之所以没有按照今天以色列、黎巴嫩的边界划分领地，很大程度是因为巴勒斯坦地区缺乏天然良港（需要腓尼基地区的港口从欧洲获取后援）

然而还是那句话：“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宗教的狂热可能帮助你取得暂时的胜利，能不能长期占领一地，终究还是要看战略层面的支撑了。客观上看，十字军骑士国能够立国，在于他们能够从欧洲得到多少支援。这一点在耶路撒冷围城战中就得到了体现，热那亚人从海上运送过来的木材，在攻城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光拥有海岸线，并不代表你一定就能从欧洲获得资源。特别是攻陷耶路撒冷后，大多数天主教徒，或带着夺回圣城的荣耀，或带着战利品（抑或两者都有）回到了欧洲。然而东方的富庶、圣地的宗教光环，同时又刺激着一批又一批希望改变命运的西欧人前来冒险，使得大多数十字军骑士国能够支撑到 13 世纪中后期（除了基本只能依靠亚美尼亚人的“埃德萨伯国”以外）。

另一个对十字军有利的地缘政治背景，是十字军建国之地是什叶派的法蒂亚王朝与塞尔柱人控制的阿拔斯王朝的相接之地。即使不考虑塞尔柱人内部的分裂状态，十字军骑士国也很难会碰到被整个穆斯林世界所围猎的情况。事实上在十字军骑士国存续期间，与某个穆斯林君主结盟，以应对另一个穆斯林国家并不鲜见。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各方势力犬牙交错的伊比利亚半岛。只能说，政治永远是务实的。

然而政治上的合纵连横，终究不能改变地缘上的短板。从地缘政治层面上来看，十字军骑士国包括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人，毕竟是处在穆斯林世界的包围当中。即使仅仅是新月沃地和埃及的穆斯林能够形成合力，也足以把这些十字军赶到海里去。那么穆斯林世界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力量，来打破这一局面呢？

第五节 古拉姆军人建立赞吉王朝

两河平原的逊尼派穆斯林成为十字军对手

从地缘位置上看，拜占庭帝国的直接对手，是安纳托利亚高原的统治者。具体到政治层面，就是塞尔柱突厥人的“罗姆苏丹国”；占据西亚裂谷带的十字军骑士国，则面临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两个方向的压力。理论上什叶派的法蒂王朝、被塞尔柱人控制的逊尼派“阿拔斯王朝”，都有可能承担终结者使命的。最终成为十字军

恶梦的，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逊尼派穆斯林。

用教派来划分穆斯林阵营，并不是因为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战争性质”，而是当时穆斯林世界内部的矛盾主线，就是这两大教派之争。在宗教层面之下，才是借题发挥的各方力量。在错综复杂的地缘关系中，除了宗教以外，民族成分也是阵营划分的重要依据。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民族”与“血统”的区别。一个人是否归属一个“民族集团”，要看他与这个集团有没有可见的亲缘关系、心理归属；如果只是个体有某一民族的血统，但其本身因为主、客观原因，与之并没有发生互动联系，那么他的身份标签后面，就一定要加上“裔”，以示这仅仅是个单纯表达血统的标签。

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马克思的身份归属了。很多文章把马克思归类为“犹太人”，按照上述标准这个归类很显然是错误的。精准的说法应该是“犹太裔”。在全球化的今天，高流动性也带来了更多身份认同方面的困惑。比如区分一个拥有中国血统的人，是应被标注为带有民族认同的“华人”，还是仅仅表达种族意味的“华裔”，可以避免表错情。最起码像“骆家辉”这样的华裔美国人，无论在美国政坛取得多大的成功，其实都与大洋彼岸没什么关系。

古拉姆军人攻灭埃德萨伯国后建立赞吉王朝

穆斯林世界战略反击十字军的标志，是埃德萨城的陷落（公元 1144 年）。从军事角度来说，在这次反击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不是塞尔柱人的部落骑兵，而是早已在阿拉伯帝国成型的突厥裔“古拉姆”军人。塞尔柱人的入侵，并没有打破阿拔斯王朝原有的“古拉姆”军事体系。事实上，这些自幼接受军事训练和宗教洗礼的奴隶军人，已经成为了整个穆斯林世界不容忽视的力量。鉴于被统治地区复杂的民族结构，穆斯林君主们相信这些奴隶军人的忠诚度会更高。然而“人”毕竟不是机器，尾大不掉的风险并不会因为身份而降低风险。当初替萨曼王朝远征阿富汗的古拉姆军人，不就很快建立了独立的“伽色尼王朝”？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往往在一次成功的远征后，出现尾大不掉风险的机率最高。在顺利征服一个独立板块之后，手握重兵的将领很有可能会经不住诱惑，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王朝。比如三国时期替晋国灭蜀的钟会，就曾经在四川盆地做过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替塞尔柱人和阿拔斯王朝西征的古拉姆军人也是如此。攻灭地缘位置尴尬的埃德萨伯国之后，古拉姆军人出身的远征军统帅“赞吉”，也顺势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赞吉王朝”，并向西继续扩张。由于其本身就领有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地区，这个新王朝的版图，很像公元 9 世纪开始强势扩张时的“亚述帝国”。

从地缘政治属性来看，12 世纪中叶立国的赞吉王朝，也可以被定性为一个“叙利亚王朝”。大马士革——摩苏尔——埃德萨，是这个三角形轮廓国家在南、北、东三个方向的地标城市。位于两河流域与西亚裂谷带之间的叙利亚城市“阿勒坡”，则是这个王朝的地缘政治中心。当然，赞吉王朝在名义上还是算在阿拔斯、塞尔柱之下的三级王朝。

就位置来说，赞吉王朝已经全面控制了西亚裂谷带的东部。也可以说耶路撒冷、的黎波里、安条克三个骑士国在东线所面临的穆斯林，被统一为了一个整体。这也使得整个逊尼派世界，都在期待着这些古拉姆军人，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消灭其它几个十字军骑士国。反之，对于背靠海岸线十字军骑士来说，赞吉王朝的崛起则一个危险的信号。不过好消息是，在赞吉王朝攻灭埃德萨伯国的消息传到西欧后，一支新的“十字军”就被组织了起来，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第十六章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第一节 第二批十字军的组成结构特点

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比较，第二批十字军的组成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加入了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成员；二是政治规格高（由法兰西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统领）。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德国人并不认为跑到亚洲去圣战是明智之举。事实上，如果神圣罗马帝国想要向异教徒“传教”的话，家门口就有“波罗的人”可以帮助他们完成心愿（相邻的西斯拉夫人已经归信了天主教）。要知道，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起源之地的“普鲁士”，此时还被不信仰基督的“古普鲁士人”（波罗的民族）控制着呢。让一个大陆属性的国家，舍近求远跑到亚洲去“圣战”，怎么看也不是一件可以持久的事。

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德国人最初的担忧，在整个以收复圣地为目标的十字军东征中，德国人所取得的成果乏善可陈。直至日耳曼人针对波罗的人，在北线开辟十字军第二战场，才算找准了方向。相比之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都拥有漫长海岸线的“法兰西”，在地中海东岸的想象空间就要大得多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曾经提出的“地中海联盟”的概念，在利比亚、叙利亚的动乱中，法国比其它欧洲国家都更为“热心”，都是基于这层地缘关系。

尽管德国人并不认为，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亚洲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所在政治、经济、宗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已经对西欧天主教世界的平衡产生了影响。从长远来看，要是一直让法兰西专美此事的话，势必会影响到德意志人对“罗马皇帝”（神圣罗马帝国）这笔政治遗产的继承。有鉴于此，在埃德萨伯国被穆斯林所攻破之后，德国人也开始思考要不要受教廷之召，前往亚洲圣战了。

同样受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成果刺激的，还有法兰西、德意志两国的君主。如果继续让中下层骑士和平民垄断这一神圣事业，无疑将会对君主们在国内的统治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法兰西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成为两支大军的带队者。这也使得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在政治层面上升级成为了国家行为。表面看，这种升级对十字军的战斗力应该是一个利好消息，最起码指挥层面应该变得更加有序。

除了德意志、法兰西两股力量之外，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还有一支来自“尼德兰”地区的十字军独自出发，并没有直接加入法、德两国君主的队伍。我们知道，在西欧平原与中欧平原之间，围绕着莱茵河三角洲，有一片与不列颠隔岸相望的低地，一直在充当着高卢（法）、日耳曼尼亚（德）两大板块的缓冲之地。这片低地就是“尼德兰”（尼德兰的本意就是“低地”）。由于尼德兰地区目前为比利时、荷兰所有，它

的地理标签也可标注为“比荷低地”。在中世纪，尼德兰地区的地缘政治标签则主要为弗兰德斯（比利时境内）和弗里斯兰（荷兰境内）。

从大陆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看，尼德兰地区其实并没有什么机会成为地缘政治舞台的主角。然而背河面海的位置，却使之有机会在海洋时代发挥重要作用。说到这里，可能已经有朋友想到了，荷兰后来在大航海时代成为一时的霸主，应该正是缘于这一地缘优势。不过大航海时代却并非尼德兰地区崛起的起点。早在 11 世纪，借助维京人（包括丹麦、诺曼人）对不列颠的征服浪潮，尼德兰地区就发展了与斯堪的纳维亚及不列颠的海上贸易，并藉此成为了欧洲的工商业重地（比如从英格兰进口羊毛，然后加工成纺织品销往欧洲大陆）

沿海地区在发展工商业上天然具有地缘优势，但并非所有的沿海地区都能成为工商业重地。尼德兰人的工商业基因，源自于这一地区相对不稳定的农业环境。海侵是尼德兰人最头疼的事情（今天荷兰的国土有将近 1/4 来自于围堰填海）。在人口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尼德兰人只有改变经济结构、着力发展海洋经济和工商业，才有可能立足。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有着维京血统的诺曼底公国，因为有能力通过武力获得政治上的收益，反过来就没有动力做这些锱铢必较的事了。

第二节 第二批十字军的进军路线

尼德兰和法德十字军的进军路线

在法、德两地骑士集结在自己君主的旗下，准备从陆路向君士坦丁堡进发时，尼德兰十字军却先行一步从海路出发，准备南下经由直布罗陀，横穿整个地中海抵达东方。结合尼德兰地区的地缘背景，显然这并不简单是一个军事层面的考虑。与其说尼德兰人是想去耶路撒冷圣战，倒不如说他们想借机把海上贸易线向地中海方向延伸。

最终的结果也验证了这点。尼德兰十字军在经过伊比利亚半岛时就停下了脚步。在此之前，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后伍麦叶王朝”已然崩溃。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被分裂为许多南北对峙的基督教、穆斯林国家。由于地缘位置的关系，从法兰西方向而来的贵族，一直试图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有所收获。这其中就有葡萄牙王国的开国君主“阿方索一世”（公元 1139 年自立为葡萄牙国王）。公元 1147 年，阿方索一世和过境于此的尼德兰十字军达成的协议，在后者的帮助下攻下了被穆斯林占据的“里斯本”，这座城市后来也成为了葡萄牙的首都。

无论此行出于圣战、经济，还是荣誉的目的，尼德兰十字军的愿望都已经在葡萄牙得到了满足，所以这部分十字军并没有再继续前行加入东方战场。当然，尼德兰人帮助葡萄牙立国之事，只是整个十字军东征事件的一个小插曲。不过鉴于尼德兰（荷兰）和葡萄牙在大航海时代的表现，在这一阶段让大家对两个国家形成的地缘背景有所了解，也是很有必要的。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德、法两国君主，所率领的十字军主力身上。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十字军率先沿多瑙河而下，抵达了君士坦丁堡。需要说明的是，拜占庭帝国对于这些十字军的到来，并不如第一次那般热心，双方甚至发生了强烈冲突。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拜占庭帝国本来想借十字军之力，一举拿回叙利亚的利益。只不过十字军骑士国的建立让拜占庭认识到，十字军不是来做奉献的，最终还是只能靠自己，一步步的先把小亚细亚拿回来。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示意图

从十字军的角度来说，他们此行的直接目的，是夺回被穆斯林“赞吉王朝”所吞并的埃德萨伯国。为了抵达目的地，十字军可以有三条线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经尼西亚横穿整个安纳托利亚高原，然后在安条克向东发起攻击。这一路线，也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所采取的线路；第二条则是由君士坦丁堡出发，经海路前往安条克；第三条线路则是沿小亚细亚半岛西、南海岸线前行，经尼西亚、爱奥尼亚、卡里亚、吕基亚、潘菲利亚等拜占庭帝国控制下的沿海平原，接入奇里乞亚、安条克。

德国和法国十字军进军途中的遭遇

德国人的选择是第一条，即从塞尔柱“罗姆苏丹国”领地过境的陆地线路。显而易见的是，这并不简单是德国人的决定。如果让拜占庭人提供船只、补给，让十字军从海路直抵安条克的话，东正教徒无疑是做了一件赔本买卖。而如果让十字军横穿整

个小亚细亚的话，那么不管这些天主教骑士的命运如何，对拜占庭正面的塞尔柱人都会造成消耗（这样拜占庭也就没有白管饭了）。

踏入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德国人，遇到了半个世纪前第一批十字军一样的麻烦，那就是游牧者比他们更适应这片干旱的高原。熟悉地形的塞尔柱人像非洲草原上的肉食动物那样，预先埋伏在水源地附近，很快就完成了对德国十字军的狩猎行动（萨卡里亚河上游的埃斯基谢尔城附近）。全部的步兵和大部分骑兵，都成为了突厥人的猎物（神圣罗马皇帝康拉德三世逃回了尼西亚）。德国人的第一次圣战之旅，也就此画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

在德国人十字军几近全军覆没后不久，法兰西国王也率领着法国十字军，踏上了尼西亚的土地（1147 年冬）。吸取德国人的教训，法国人决定不贸然穿行塞尔柱人控制下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而是计划沿刚才所说的第三条线路，沿海岸线抵达安条克。这样做虽然有点绕远，但好处是可以一路处于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内，安全和补给都有保证。然而沿海线虽然能够避开突厥人，却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恶劣气候也不只有干旱。仅仅走完一半爱琴海岸线，法国人就遭遇到风暴和洪水的袭击，损失了部分人员和大量辎重。这使得法国人决定还是冒险从安纳托利亚高原切入（从以弗所东入高原），以尽可能直的线路向奇里乞亚方向进发。

事实证明，塞尔柱人并不比变化莫测的风暴好对付。进入山地的法国十字军，很快便尝到了突厥游牧骑兵的苦头。这些弓骑兵甚至不用正面决战，只是利用机动优势不断袭扰法国人的行军队伍，就已经让这支十字军面临崩溃的边缘了。在遭遇惨重损失之后，法国人决定就近南下拜占庭控制下的沿海城市“安塔利亚”（潘菲利亚板块），然后从海路进入安条克。

第三节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无果而终

法国十字军进入西亚后以大马士革为目标

由于计划仓促改变，安塔利亚的拜占庭人并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运输船。最终地位更高的骑兵得到了从海路安全抵达安条克的权力，至于继续沿海岸线东行的步兵（以及随行的朝圣者）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从潘菲利亚到奇里乞亚之间并没有足够纵深的沿海低地，托罗斯山脉中部成为了两个低地板块的分割线。这意味那些被迫沿山地前行的步行者，很有可能再次成为塞尔柱骑兵的狩猎对象。事实上，当年亚历山大在沿海岸线行至安塔利亚后也没有继续东行，而是北上征服安纳托利亚高原后，再南下奇里乞亚。当然与强大的马其顿兵团相比，被迫继续沿陆路前往东方的法国步兵，完全就是送上门的猎物了（大约只有一小半人抵达安条克）。

虽然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事件的触发点，是埃德萨为穆斯林的“赞吉王朝”所没，但抵达安条克的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却并不想把自己残存的力量，消耗在为埃德

萨复国这件事上。不能言明的理由是，埃德萨在基督教世界已经是有主之地，法国骑士们甚至都不能通过劫掠居民，来获得战利品（因为城内多是基督徒，也是埃德萨伯国的子民）。为此，法国人在他们的君主带领下，先行南下耶路撒冷朝圣。然后在权衡得失后，将耶路撒冷王国东侧、塞尔柱人统治下的大马士革作为了攻击目标。一旦得手的话，即使不能再建立一个新十字军骑士国，这座城市中的财富也能够让法国人有不虚此行的感觉。

十字军骑士国和赞吉王朝的对抗

从外交角度来看，攻击大马士革并不符合耶路撒冷王国的利益。因为此时的大马士革，还不是日益强大的“赞吉王朝”的领地。为求自保，统领大马士革的塞尔柱将领，甚至和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结成了同盟。问题在于，基于宗教“大义”，耶路撒冷王国也不好明确反对新十字军的攻击计划。只是缺少了“地主”的支持，法国人也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几天。在大马士革城下踌躇了几日后，还是决定踏上返回欧洲的行程。几年之后（公元 1154 年），赞吉王朝完成了对大马士革的征服，正式完成了对十字军骑士国的包围。



十字军和穆斯林的战斗

第二次十字军之旅（1147——1149 年）就这样徒劳无功的结束了。至于埃德萨的事，就只能靠十字军骑士国自己了。只是通过大马士革的事情，大家也应该明白，谁都有自己的利益。比如对于耶路撒冷来说，不让大马士革这个通往圣地的门户落入赞吉王朝的手中，就比帮助埃德萨伯国复国一事就要更重要。相比之下，安条克公国倒是与埃德萨唇齿相依。在埃德萨失国之后，安条克也成为了赞吉王朝的重点攻击对象。当从新十字军那里获得支援的希望破灭后，两地骑士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起反攻。只不过，这次反攻非但以失败而告终，还直接导致埃德萨地区的基督徒（特别是亚美尼亚人）遭到报复性清洗。

现在围绕着耶路撒冷所在的“西亚裂谷带”，对峙形势已经很明显了。一边是背靠地中海及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三大十字军骑士国；一边是站在伊斯兰抗击十字军入侵前线的“赞吉王朝”。二者最大的优势，都在于能够以圣战的名义，从身后的基督教、伊斯兰世界吸引圣战者加入（有点像 ISIS 现在正在做的）。不过那些各自为战的圣战者的加入，很难帮助双方的一线国家，在战略层面打破僵持的局面。比如这次法、德两国失败的远征，就只典型案例。无论是十字军骑士国还是赞吉王朝，都只有依靠自身力量，在领地有质的扩张后，才能够集中更多的资源彻底击败对方。

第四节 十字军骑士国和拜占庭结盟并进攻埃及

耶路撒冷王国进攻埃及遭到赞吉王朝掣肘

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硝烟散去后，我们才发现在这场由天主教徒和穆斯林所主导的欧、亚博弈中，近在咫尺的埃及，在把耶路撒冷拱手“让”给十后军后，似乎一直置身于事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盖因埃及的法蒂玛王朝正处在衰弱期。在内部柏柏尔人和西欧天主教势力（西西里诺曼、热那亚、比萨）的双重压力下，王朝在 11 世纪后期就已经失去了马格里布地区的控制权。由于过于倚重那些看起来忠诚度很高的奴隶军人，这一阶段的穆斯林王朝在衰弱之后大都会碰到被奴隶军人，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古拉姆”军人把持朝政的情况。埃及也不例外，不过在埃及，这些奴隶军人被称之为“马穆鲁克”。

古拉姆也好，马穆鲁克也罢，他们的出现并不会改变一个国家的族群结构。就好像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的末期会出现宦官专权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只是牵扯到内部权力制衡。相比之下，由于以塞尔柱人为首的突厥游牧部落的介入，阿拔斯王朝领地的地缘结构变化，却颇为引人关注。抛开政治外衣来看，突厥势力的扩张其实相当于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孤悬撒哈拉沙漠的埃及暂时没有导入这样的新鲜血液，这也注定了这个什叶派政权，将成为邻国眼中的鱼肉。公元 12 世纪 60 年代，耶路撒冷王国和赞吉王朝先后派军进入埃及，介入法蒂玛王朝的内部斗争。

相比控制线南端在大马士革的赞吉王朝，耶路撒冷王国在渗透埃及的事情上要更有优势。然而赞吉王朝的优势则在于，它可以在背后以“围魏救赵”之策，进攻十字军骑士国的后方，迫使耶路撒冷放弃在埃及的行动。当然赞吉王朝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帮助法蒂玛王朝的目的，只是为了不让十字军得到这块风水宝地罢了。为了在稳固后方的前提下，有足够的力量来吃掉埃及，耶路撒冷必须找到新的外援。不过这一次，前来提供支援的却并非西欧天主教国家，而是处在中兴阶段的拜占庭帝国。

由于在西线受到诺曼人、威尼斯人的挑战；东线遭遇塞尔柱人的挤压。拜占庭人自 11 世纪后半叶以来，日子一直都不太好过。在十字军骑士国对冲塞尔柱人的压力后，拜占庭帝国开始致力于恢复西线的影响力。好在西欧天主教世界，内部有足够的

矛盾让拜占庭人施展纵横之术。12 世纪中叶，帝国总算是压制住了诺曼人和威尼斯人。包括达尔马提亚、克罗的亚、波斯尼亚在内的巴尔干地区，也重归拜占庭版图。

东线的话，拜占庭帝国虽然不能将塞尔柱人赶出安纳托利亚高原，但最起码也已经能够控制小亚细亚的整个沿海低地了（包括逼迫奇里乞亚亚美尼亚人重新承认它的宗主权）。同时鉴于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法、德两国糟糕的表现（两国暂时也没有意愿，再组织一字东征），十字军骑士国们意识到，在应对“赞吉王朝”问题上，开始呈现中兴之势的拜占庭帝国，要比远在西地中海的天主教兄弟们更为靠谱。为此这一时期，拜占庭甚至取得了十字军骑士国的宗主权。当然，这种承认并不代表双方真的在政治上进行了融合，只是战略层面的结盟罢了。

拜占庭和耶路撒冷王国进攻埃及失败

公元 1167 年，与拜占庭人达成协议的耶路撒冷王国，开始对埃及发起了总攻。军事层面上，耶路撒冷王国负责陆战，拜占庭帝国则提供海上支援。一旦完成的对埃及的征服，拜占庭人将得到半个埃及作为回报。在海、陆两线的压力下，衰弱的法蒂玛王朝把赞吉王朝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若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这种“天主教 + 东正教 PK 什叶派 + 逊尼派”局面的出现，倒真是很有圣战的意思。然而再神圣的宗教外衣，也掩盖不了利益结合的实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拜占庭和耶路撒冷的联合行动，为的是瓜分埃及，同样赞吉王朝的帮助也不会是没有代价的。

尽管基督徒们在收割法蒂玛王朝的问题上占了先机，甚至攻入了开罗，但埃及现时的地缘基础却对十字军和拜占庭人的统治颇为不利。一方面，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埃及此时已是一个穆斯林人口占据绝对优势的地区了。鉴于尼罗河下游的农业潜力，其穆斯林人口的绝对数量要远高于十字军骑士国当下所统治的地区；另一方面，埃及是一条延伸入沙漠深处的绿色长廊，以十字军和拜占庭人严重依赖海上支援的地缘特点来看，他们甚至很难在开罗稳定自己的统治。

由于没有统治基础，在赞吉王朝大军再次进入埃及之时，耶路撒冷王国终于识时务的放弃了开罗，退回了耶路撒冷（公元 1169 年）。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已经可以想象了。赞吉王朝当然不是真心来帮法蒂玛王朝复国的。对于赞吉王朝来说，法蒂玛王朝的求援，只是他们入主埃及的绝佳时机。代其成为埃及什叶派政权终结者的，就是著名的“萨拉丁”。

说起萨拉丁来，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他的身份问题。由于萨拉丁的库尔德裔身份，他的成功很容易在地缘角度被误解为“库尔德人”或者“库尔德斯坦”的突破，但事实上萨拉丁更注重的是自己“逊尼派”穆斯林的身份，以及谋求在阿拉伯政教合一框架下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将萨拉丁称之为伊斯兰英雄和阿拉伯英雄都是符合事实的。

实际上，为赞吉王朝领军在埃及作战的统帅是萨拉丁的叔叔。不过在逼退十字军，并把持法蒂玛朝政后，这位过渡性人物很快便暴卒。随其出征并展现出军事才能的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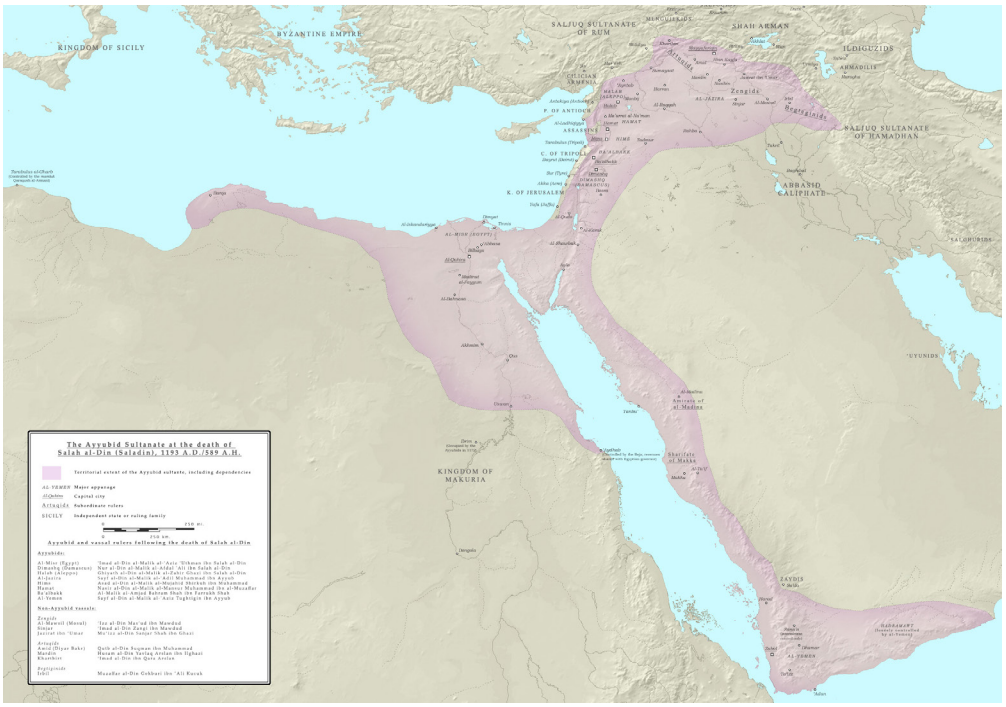
拉丁，很快成赞吉王朝在埃及的代理人，并于公元 1171 年正式终结法蒂玛王朝，让埃及重回逊尼派世界。这一继承关系不由得让我们想起秦末揭竿而起的项梁、项羽叔侄。不过比起项羽这位悲剧性的“将才”来说，萨拉丁显然要更具政治才能。

第五节 萨拉丁建立阿尤布王朝并攻取耶路撒冷

萨拉丁建立阿尤布王朝及与哈里发的关系

从地缘角度看，萨拉丁脱离“赞吉王朝”几乎是必然的选择。面对那样一块地缘独立的风水宝地，任何一个得到它的人都很难不为之动心。更何况埃及和赞吉王朝之间，还隔了一条被十字军占据的“西亚裂谷带”。萨拉丁所建立的王朝，被称之为“阿尤布王朝”，如果事情至此为止的话，那么整个中东的地缘政治结构倒并没有什么特别变化，无非是埃及换了个穆斯林王朝罢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接下来的十几年间，萨拉丁开始向大马士革、阿勒坡乃至摩苏尔进军（公元 1174 年）。换句话说，萨拉丁准备反过来吞并赞吉王朝，承担起包围十字军骑士国的战略任务了。

作为中世纪最知名的穆斯林，萨拉丁为世人所关注的多是他的军事才能和骑士风度。不过这位伟大人物更值得称道的，其实应该是政治才能。与 1000 年前项羽主动砍倒“义帝”（谋杀楚怀王）这杆凝聚人心的大旗、制造割据局面不同的是，萨拉丁主动捡起了“阿拔斯王朝”这块神主牌位，以逊尼派和阿拔斯王朝的复兴者的面目，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这种情况很容易想中国人想起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过萨拉丁与阿拔斯王朝的关系，更应被定义为双赢的合作关系。阿拔斯王朝的收益是摆脱塞尔柱人，重新实控了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两河平原。而宣誓效忠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阿尤布王朝”，不仅在伊斯兰世界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也在军事、政治、宗教的多重作用下，很快便征服了赞吉王朝，成为摩苏尔——埃及这条绿色地带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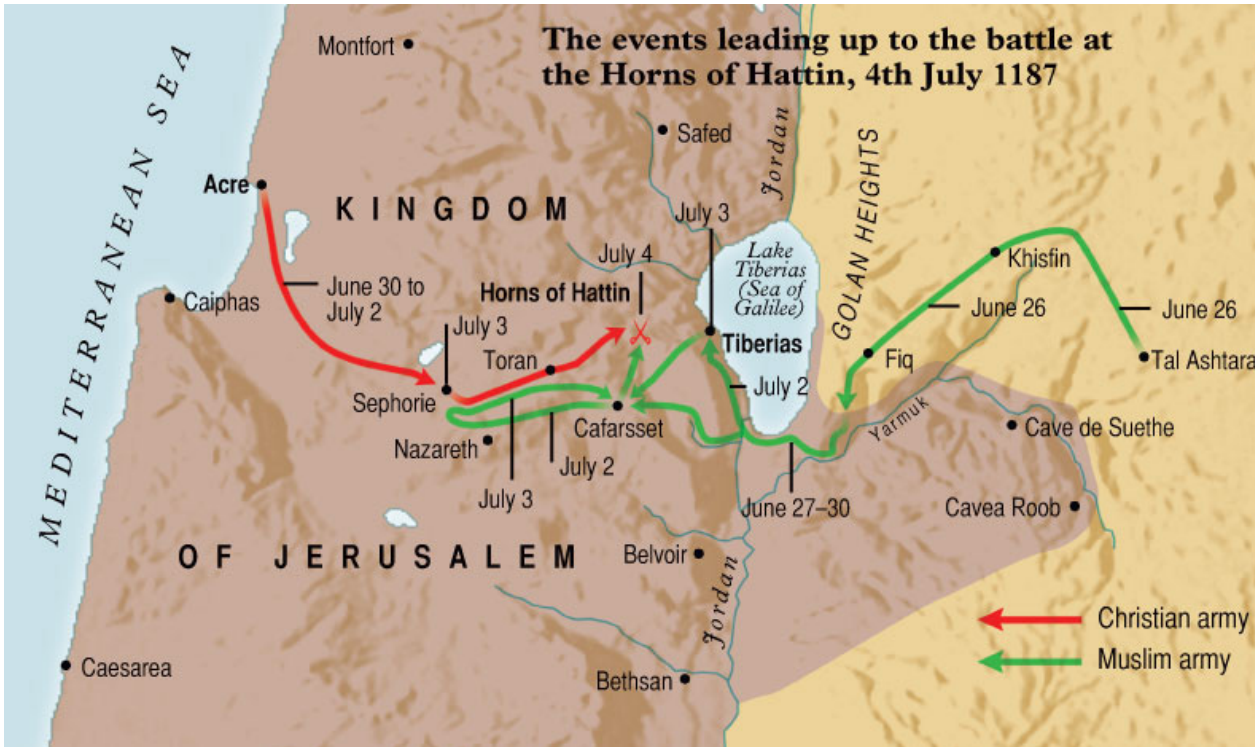


阿尤布王朝（公元 1193 年）

统治这样一条弧形地带，将王朝的政治中心定位于开罗或者阿勒坡都不是合适的。事实上，早在萨拉丁开始远征赞吉王朝之时，他就把都城迁往了叙利亚与埃及两大版块之间的节点之一“大马士革”（公元 1175 年）。也正是在这一年，萨拉丁在政教层面与阿拔斯王朝结为了同盟。整个北非、叙利亚，及包含麦加、麦地那、也门在内的赛拉特山脉地区，被巴格达的哈里发“封赏”给了萨拉丁。上述计划最终完成的时间，是在公元 1185 年（拿下摩苏尔）。由此，萨拉丁也代表伊斯兰世界完成了对十字军骑士国的战略包围。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相信无论是当时的十字军还是现在的我们，都应该能想到了。耶路撒冷将再一次成为两大世界碰撞的焦点。

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夺取耶路撒冷

纯粹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十字军们当下所面临的局面，已经与 88 年前他们站在耶路撒冷面前的情况大为不同了。这些天主教徒能够长时间在地中海的另一端，建立飞地性质国家的背景，是穆斯林世界陷于分裂状态。现在他们的面前则只剩下处在上升期的“阿尤布王朝”。最起码从战略层面上看，十字军们的形势是非常不容乐观的。公元 1187 年，萨拉丁的军队（约 2 万多人）从大马士革启程，沿戈兰高地南沿，过加利利湖之南向耶路撒冷王国发起攻击。



哈丁战役示意图

上述路线也是连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传统商道的一部分。为了阻止穆斯林军队的进攻，十字军骑士们并没有选择固守城堡的战术，而是调集的大部分兵力在加利利湖西岸的加利利山地中与萨拉丁进行决战（哈丁战役 Battle of Hattin）。对于萨拉丁来说，十字军放弃坚固的城堡来与之野战，实在是再好不过的结果。历史上有太多战略上处于劣势的防御方，试图以这样孤注一掷做法来速战速决，其结果却是加速



哈丁战役

了自己的失败。

哈丁战役的结果也是如此，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十字军（约 1 万多人），最终赌输了这场关键之战。这场战役中的军事技术细节，并不太能引起我们的关注。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战役中被穆斯林包围的十字军，很大程度是因为干渴而丧失了战斗力。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十字军第一次遇到这样



哈丁战役遗址

的困境了。由此也证明了，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那些游牧出身的穆斯林总是能比他们更好的利用环境。

由于在哈丁战役中损失了大部分军力，萨拉丁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拿下了十字军骑士国的大部分领土。这其中就包括双方争夺的焦点——耶路撒冷。由于十字军仍然艰难的保有了安条克、的黎波里等少数几个能得到海上支援的据点，耶路撒冷王国也成为了这阶段，唯一被萨拉丁灭国的国家。不过尽管萨拉丁的征服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他本人却因此在欧洲人那里声名鹊起。这是因为在战场获胜，包括攻破耶路撒冷之后，基督徒们所担心的屠杀情况并没有发生。当然，这并不代表没有战俘会被处死，但最起码绝大多数骑士和那些身份地位较高的战俘受到了礼遇，并很快得以释放。

其实以赎金交换高等级战俘是天主教骑士战争中通行的做法，在和穆斯林的战争

中也很常见（本质是一种商业思维）。萨拉丁这次为对手所敬佩，不仅在于没有展开报复性屠杀，也在于并没有收取赎金。在一场表面由意识形态所引发的战争中能做到这点（尤其是当年十字军屠城耶路撒冷的前提下），再一次证明了他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家那么简单。从萨拉丁的角度来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想与基督徒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中。要知道在复杂的伊斯兰世界，背后有太多势力在觊觎这片肥沃的土地。最起码北方高地上的突厥人、波斯人不会那么容易放手。

夺取耶路撒冷的成就以及哈里发的授命，让新生的“阿尤布王朝”得以在伊斯兰世界确立威信，并思考穆斯林世界统一问题。然而对于欧洲的基督徒来说，耶路撒冷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特别是在十字军还没有在西亚失去所有据点的情况下，战争很难以这种“突然死亡”的方式结束。相较触发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埃德萨城之失，失去耶路撒冷对欧洲人的心理冲击，显然要大出许多。以至于当时的教皇在听闻此消息后，很快便不治身亡。当然，从政治角度来说，这也是一次机会。尤其对于那些在当年夺取圣城之战中，身为旁观都的各国君主，更是希望藉此来抢占欧洲霸主的地位。很快，以夺回耶路撒冷为目标的，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拉开了序幕。

第十七章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第一节 德皇腓特烈一世领军参与十字军东征

红胡子巴巴罗萨的进军罗马与领军东征

从参与者的角度看，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可谓是最有看点的一次。不仅穆斯林方面由最具人气和才能的萨拉丁领队，天主教世界的三大代表：法、德、英三国，也推出了各自在骑士时代最著名的三位君主：法兰西王国的“腓力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一世”；以及英格兰王国的“理查一世”。以至于我们在行文中一向习惯性淡化个人色彩的，也开始转变作风，用上述三位君主之名，作为他们所属的地缘政治势力的标签。

最先响应教廷号召的，是将神圣罗马帝国带入新高峰期的“腓特烈一世”。在重名率高得惊人的欧洲，他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标签，那就是“红胡子巴巴罗萨”。这位神圣罗马皇帝在任上，不仅对内压制住了德意志内部的各方诸侯（尤其是势力最大的萨克森公国），还在意大利击败了伦巴底同盟的阻击，完成了每位神圣罗马君主都想做到的“进军罗马”的夙愿（只有在教廷加冕后，才算是真正的皇帝）。不过辉煌的成就，也让这位神圣罗马皇帝产生了将神权置于君权之下的想法。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甚至在罗马的加冕仪式上屠杀了近千名不给面子的教士（公元 1154 年）。

当然，如果巴巴罗萨真的能够在政治上完成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那么教廷的作用倒的确不是那么大了。问题是在，当下还没有欧洲人，知道怎样去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属性的帝国。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外衣下，其实都是各自独立的分裂模块。政治、军事手段，固然是将各模块整合在一起的手段，但由此就认为教廷这块神主牌位没用的话，很快就会尝到失去民意的恶果。

为了摆脱这位暴君的控制，教廷很自然的开始利用它在宗教上的影响力，策动那些本就不愿看到德意志强大的势力，挑战巴巴罗萨的霸业。在这一过程中，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诸城邦，成为了教廷政治上最可依靠的对象。在首次进军罗马之后，巴巴罗萨又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先后 5 次入侵意大利，以图真正控制这片富庶之地。当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在没有教廷支持情况下，统治意大利后，巴巴罗萨终于选择和教廷达成了政治和解。

无论从修复和教廷的关系，还是稳固自己帝业的角度出发，代表基督教世界拿回圣城耶路撒冷这件事，对于巴巴罗萨来说都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此在其他君主还未准备好时，德国人就迫不及待的整军出发（公元 1189 年）。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红胡子皇帝第一次参加十字军了。在半个世纪前那场失败的远征中， 25 岁的巴巴罗萨就已经随军出征了（与当时的君主康拉德三世为叔侄关系）。这一次，德国人依



欧洲中世纪十字弓

然选择了沿多瑙河而下的陆地线，也又一次在和拜占庭人发生不愉快后，开始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

日耳曼人的十字弓

相比上次经历，德国人这次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表现要好上许多。几十年来，一直处在战争状态的日耳曼人，在军队组织性和军事技能上有了显著提高，也做了更充分的后勤准备。远征过程中，有一件特别的武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就是“十字弓”。我们知道，亚洲游牧骑兵最令对手头疼的，就是他们的骑射能力。在机动状态下使用远程武器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帮助你在一场决战中获得胜利，而在于总能以最小的代价不断的进行袭扰，最终把对手拖垮。由于弓箭特别是骑射技术的熟练，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欧洲人即使想模仿也很难在这项技术上压倒对手。不过，十字弓的出现一定程度弥补了这块短板。

所谓“十字弓”，就是我们所说的“弩”了（单兵手持型）。关于一般认为，十字弓是欧洲人在 11 世纪末从阿拉伯人那里引进的技术，最早出现在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战争中。当然，鉴于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弩，自然也会有人推断出，这项技术应该是经过阿拉伯人中转入欧洲的。不过一件武器的起源地到底在哪是完全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发挥作用。与中国弩不同的是，欧洲人所使用的是“钢弩”，即用钢片来做弓臂。这倒是很好的规避了复合材料弓臂，难以适应欧洲潮湿气候的弊端。亦可以用较短的长度，提供较大的动能。另外早期的欧洲十字弓是用脚蹬法上弦的。即在弓臂上设置有“脚蹬”，以单足踏之，双手持弦上拉，后来则开始运用标杆等机械原理提升效率。

由于十字弓巨大的杀伤力，教廷曾经在 1139 年颁布谕令，禁止在基督徒内部战争中使用。不过对付穆斯林这种异教徒，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当然，武器使用的关键还是在于人，也不可能凭借某一种武器就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一点，这些年有些穷兵黩武的德国人，倒是占据了优势。此次用来远征的 3 万军队，算得上是训练有素。需要说明的是，十字弓大多数时候，都是作为步兵装备。而德国人这次，很有可能开始尝试让骑兵用“骑射”的方式来使用这项武器。尽管射击的效率不会比游牧骑兵高，但也足以让一直以骑射优势为傲的游牧骑兵大吃一惊了。事实上，即使是游牧者在一

轮进攻中，通常也只是放出一支箭后，就迅速脱离战场。

德国人在军事上的进步，大大削弱了塞尔柱人游击战术的威力，并帮助他们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抵达奇里乞亚。不出意外的话，红胡子巴巴罗萨将与萨拉丁展开一场世纪之战。然而在微观历史层面，偶然性事件总是会存在的。在传统的兵棋推演中，偶然性事件会用掷骰子的方式来进行预测。如果说人类战争只是上帝在玩掷骰子游戏的话，我们的神圣罗马皇帝的运气实在是不好，他居然在渡河时不幸落水淹死了。

鉴于巴巴罗萨已经领导神圣罗马帝国将近 40 年，并且一直以来的独断专行，可以想见他的离世将对德国十字军的信心造成多大打击。大多数德国人开始立即启程，返回自己的邦国。因为他们都知道，接下来上帝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治秩序中抢个好身位，才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继续向耶路撒冷挺进，准备在东方建功立业的小部分德国人，也几乎被沿途穆斯林的袭扰，以及严酷的气候环境消耗殆尽。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示意图

在管理学中有个“坠机理论”，将假定领导人突然坠机后，企业会不会陷入混乱，作为判断企业风险的重要指标。很不幸，巴巴罗萨乃至之前、之后的神圣罗马君主，其实都没有能够为德意志人建立一套健全的中央集权体系（直到普鲁士人出现）。因此，即使年近古稀的巴巴罗萨能够躲过这一劫，甚至从萨拉丁手上夺回耶路撒冷，神圣罗马帝国在他身后也同样会陷入混乱。当然果真如此的话，这位“罗马皇帝”倒是能够洗刷掉之前在处理教廷关系问题上的污点，甚至为自己谋得一个“大帝”的历史称号。只不过现在，夺回圣城的荣耀，就只能留给另两位来自英、法的君主去争取了。

第二节 狮心王理查从海路出发东征

狮心王理查东征时英格兰的国内局势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这次十字军东征中“正方”（从基督徒的角度）真正的主角——狮心王理查。这位国王的名气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他与萨拉丁惺惺相惜的情节；二是罗宾汉的故事，就是以他东征事件为背景创作的。先来看看这一阶段，所谓的“英国”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在诺曼人登陆不列颠后，我们曾经给这个领土横跨英、法，以君主为联系纽带的国家，定性为“海峡帝国”。海峡帝国时代并不仅仅包含诺曼王朝，也包括后面的金雀花王朝（又称安茹王朝 1154 年——1485 年）。同样来自法兰西的后者，除了继承诺曼底和英格兰的领地外，还带入了卢瓦尔河下游的“安茹”（大至为现在法国的曼恩－卢瓦尔省）、阿基坦（加龙河下游——比利牛斯山脉间的沿海低地）。如果说诺曼底与英格兰在政治上的一体化，已经让法兰西王国感到不舒服的话，那么现在金雀花王朝，则已经具备挑战法兰西王国的潜力了。

事实上，贯穿整个金雀花王朝历史的（包括系出同门的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就是英法两国在对法兰西领土的争夺。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和民意，两边的君主也成为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热情参与者。尤其是并不愿意呆在英格兰，一心只想做一个大陆君主的狮心王理查。顺便说一下，“矮子丕平”、“红胡子巴巴罗萨”这类抓住外部特征的外号比较好理解，狮心王理查肯定不是因为长了颗狮子的心而得名的了。传说中他是因为杀死一头狮子，并当众吃掉了狮子的心脏而得名的。当然，这些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君主必须有个外号，才不至于被人搞混。

对于英格兰人来说，其实是非常不愿意国王将不列颠的资源，收刮来投入大陆战争的。尤其这些跨海而来的君主，心理上并不愿意做英格兰人。英格兰对他们的吸引力，主要是在那顶“王冠”（这样就可以取得与法兰西国王平级的政治地位），以及可供榨取应对大陆扩张的资源。不过这一次，基于目标是拯救全体基督徒心目中的圣城，金雀花王朝的统治者在从不列颠收集资源时（加收所谓“萨拉丁税”），还算比较顺利。当然，付出终究是要回报的，如果不列颠在这整件事情中毫无收益的话，圣战的外衣也遮掩不了矛盾的爆发。

地跨海峡的王朝结构，使得英国远征军将马赛定为了军队的集结地。从英吉利海峡启程的舰队，经直布罗陀海峡，在马赛与王国法兰西属地的军队汇合。这也使得英国人成为了最后完成战备的国家。在他们之前，法兰西的腓力二世已经先期派遣先头部队，从热那亚启程前往圣地了。法国人之所以由热那亚启程，是因为要向热那亚商人租用船只。事实上，热那亚、比萨、威尼斯三个共和国，都在密切关注十字军东征的进程，以试图借机扩张自己的商业版图。不过就海上支持一事来说，在第三次十字

军东征中，本该提供最有力支持的，是西西里的诺曼王国。

英法经停西西里时卷入诺曼王国的王位继承权之争中

与其它三个更关注生意的海上共和国不同，一直以来，诺曼王国都不甘于蜗居于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侧重军事能力的诺曼人，更希望凭借武力在领土扩张上有所作为。在萨拉丁控制埃及之后，诺曼人甚至组织了一支舰队在亚历山大港登陆，试图攻占这块富庶之地（公元 1174 年），未能如愿之后又与拜占庭帝国交战（同样未能如愿）。圣城耶路撒冷的失守，让诺曼人找到了新的方向，正是在西西里舰队的支援下，十字军在的黎波里等沿海城市才得以抵御住萨拉丁的进攻（公元 1189 年）。这也使得西西王国有信心在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承担更重要的作用。

然而西西里王国的强势扩张背后，却隐藏了非常大的隐忧。要知道这一时期也正是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半岛强势扩张的阶段。连教廷都不放在眼里的红胡子巴巴罗萨，自然也会希望“意大利”尽皆成为他的领地。不过在北方伦巴第诸城邦战事未停，教廷又站在自己对立面的情况下，将诺曼人推入自己的敌对阵营也并不明智。于是，神圣罗马帝国和诺曼人的西西里王国通过联姻结盟，并达成了一个协议：一旦西西里王国绝嗣，那么继承人将由双方联姻而产生的后代继承。由于在这次政治联姻中，德意志人的代表是巴巴罗萨的儿子（亨利六世），所以一旦成为现实的话，也意味着西西里王国的诺曼时代结束。

中国人可能会比较惊讶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过类似的继承与约定，在欧洲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 1919 年，离马赛不远的袖珍小国摩纳河，就与法国签订过条约，一旦王室没有了男性继承人，就将并入法国。好在现在世界的规则已经不一样的，小国也有它的生存权。2002 年双方再次签约，确认即使没有继承人，摩纳哥仍将维持独立。

回到我们正在解读的历史，诺曼人的西西里时代结束的比想象中要快得多。因为那位希望在圣战中有所作为的西西里国王（古列尔莫二世），在帮助的黎波里等城击退穆斯林后旋即离世（公元 1189 年）。虽然有条约规定接下来的继承权，将转移到神圣罗马帝国手中，但很显然西西里的诺曼贵族们不会甘心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们很快便推出了自己的继承人。按计划经停西西里的英、法两国君主（西西里承诺提供支援），也一定程度卷入了这场的继承权之争，尤其是跟西西里王国有姻亲关系的英国人。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换取计划中的补给；另一方面也是不希望看到西西里王国落入德国人手中。

第三节 狮心王理查与萨拉丁的对决

狮心王理查攻占塞浦路斯与在东征的表现

与离开西西里之后，法国人直奔巴勒斯坦有所不同的是，我们的狮心王显然还有更多的想法。这位渴望在东方建功立业的君主，深知自己是欧洲天主教国家中，与圣

城地理距离最远的一个。为此，他迫切希望能够在东地中海拿到一个基地作为战略跳板。鉴于西西里敏感的地缘政治地位，这个岛屿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相比较之下，与圣城近在咫尺的另一个大岛——塞浦路斯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拜占庭在东方失去很多领土，但基于它的海上优势，塞浦路斯岛暂时还属于拜占庭的版图。问题在于，如果从拜占庭帝国那里割走这样一个岛屿，政治和民意（这就不是圣战了）方面的风险还是很大的。不过英国人比较有利的一点是，拜占庭人派驻塞浦路斯的总督，在圣城失守之后乘乱宣布了独立。这样的话，英国人拿下塞浦路斯（公元 1191 年），也就不算得罪拜占庭帝国了。



狮心王理查在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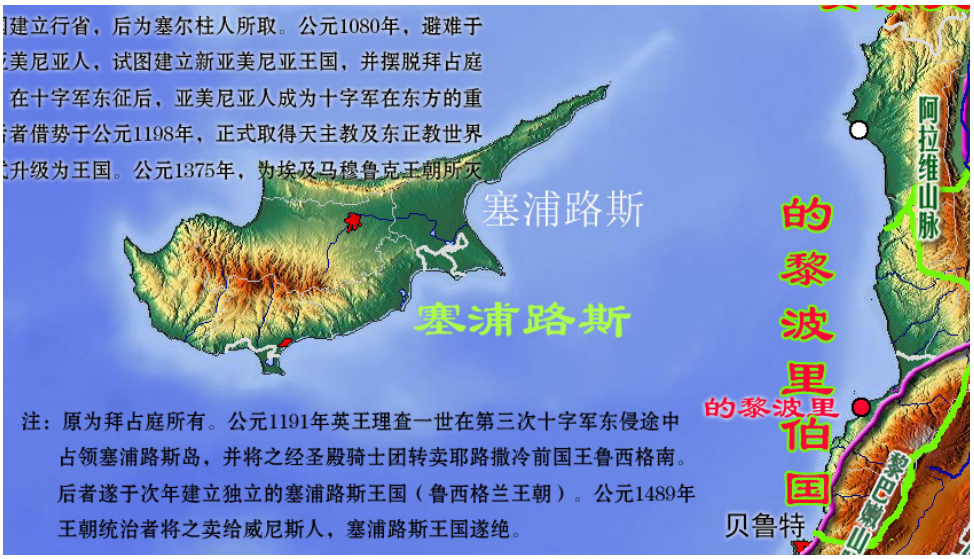
应该说，狮心王理查还是一个不错的军事家的，最起码有了塞浦路斯这个前线补给基地后，本来在这场战事中地缘位置最边缘的英国人，便一下子占据了优势。他的这种野心和军事才能，也使得之成为了第三次十字军的主角。

狮心王理查的强势让法王腓力二世意识到，即使能够夺回圣城，最大受益者也会是英国人。由于不愿接受配角的定位，在初战告捷后，法国人就返回了欧洲。接下来的战争，可以算是狮心王理查与萨拉丁之间终极对决。不过战争的过程并不是这里所关注的，我们更应该把焦点放这场战事的结果，以及它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上。

就结果而言，萨拉丁没有丢失耶路撒冷，而基督徒们则保住了绝大部分沿海据点，并且得到了自由出入耶路撒冷朝圣的权力（公元 1192 年）。抛开两位军事家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所谓“骑士风度”（包括最终签署 5 年停战和约）不谈，这样的结果倒是很符合双方的地缘特点的。当然，谁都知道这样一个结果是不可能持久的。

塞浦路斯岛在后世的归属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导致了一系列变化。首先心系大陆的英国人，并无力统治塞浦路斯。从拜占庭帝国分割出来的塞浦路斯，最终被转交给了耶路撒冷撒冷王国的统治者（作为没有拿回耶路撒冷的补偿），由此建立了独立的塞浦路斯王国（1192 ～ 1489）。风水轮流，19 世纪末当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后，又再次从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手中，拿到了塞浦路斯的统治权，以至于塞浦路斯今天位列英联邦成员（英国在上面仍有驻军）。



十字军骑士国



塞浦路斯岛

塞浦路斯岛上的居民仍然是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崛起后（包括土耳其独立后），为了控制这个战略要点，突厥人也被有意识的迁入塞浦路斯岛。以至于在今天，塞浦路斯被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边是获得国际承认的，希腊裔控制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北边则是只有土耳其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其次西西里王国昙花一现的独立，也在这一时段宣告结束，变身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属地。在后来的历史中，西西里岛这个地中海的地理中心，更成为了德国、西班牙、法国等大陆国家争夺的目标。这也说明在地中海这样一个内海中，岛屿本身并没

有可能独立发挥地缘影响力。只有当面对更为广阔的大洋和“新大陆”时，岛屿型国家才真正凭借自己的“海洋属性”，摆脱大陆国家的影响力。

狮心王理查在东征中的收获与损失

很显然，在这场劳民伤财的远征中，获得荣誉最多的是直接与萨拉丁对战的狮心王理查。然而损失最大的，却是他的国家。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狮心王理查的这次远征，更像一位军事家和骑士的冒险行为，对王朝在欧洲的事业不仅无益，而且是有害的。事实上，早在英国人还在东方作战时，把注意力转回欧洲的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就已经达成了默契，将英国定位为共同的对手了。启程返回领地途中，这位伟大的骑士被神圣罗马帝国扣押，在付出了天文数字的赎金（相当于英国十年税收），及承认英国为神圣罗马帝国附庸后，壮志未酬的英格兰国王才被放回（公元 1196 年）。

实力受到严重削弱的英国，让法国人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占据了优势，一步步蚕食金雀花王朝在法兰西的属地。对于爱惜荣誉的狮心王理查来说，很快因伤离世应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公元 1199 年）。在其死后，金雀花王朝不久便失去了全部的法兰西属地。只不过由于领土不是在理查手上丢失的，加之理查的东方之旅，貌似为英国人赢得了“国际声誉”，因此后人将所有的责任都记到了他的继任者头上（无地王约翰）。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在法国做大之后，感受到威胁的神圣罗马帝国又开始与英格兰结盟，以压制法国的生长。公元 1214 年，英德联军在决战中败于强势崛起的法国（布汶战役）。神圣罗马帝国由此陷入了长期分裂状态，一直到后来的普鲁士出现后，才算真正完成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至于英国的变化，则是催生了削弱王权的《自由大宪章》。从这点来说，藉由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而完成法兰西统一的法国，成为了这次圣战的最大赢家。英、法、德三国在西欧的三国演义，则一直上演到今天。

总的来说，十字军东征对欧洲地政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影响还是有限的，它的基本格局在圣战之前就已经奠定了。其深远的意义更多体现在，为黑暗的西欧中世纪，打开了一扇文明之窗。当然，身处狂热宗教战争状态的天主教徒们，暂时并不会在意这点。这种影响要到军事色彩渐渐淡化，商业交往成为主线后才会开始发酵。最为有趣的一点是，这场圣战一方面让“商业共和”体制获得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却又为欧洲播下了“军事集权”种子。至于这个硬币的正反两面究竟是谁，后面会有解读。

第四节 威尼斯与热纳亚争夺海上贸易权

威尼斯在东地中海贸易之争中后来居上

在东征的军人和普通百姓中，的确有不少纯粹是因为宗教狂热而驱动的，但威尼斯、比萨、热那亚这几个有实力提供海上支援的“商业共和国”，肯定不是因为信仰

搅和进来的。所谓无利不起早，帮助十字军从海路运输人员、补给，是一项非常有利可图的事情（十字军们则用战利品来偿还债务）。更大的利益则在于，十字军在西亚建立的骑士国，能够成为海上共和国们的贸易据点，使之从东西方贸易交往中获取巨大的利润。

就从十字军来源地来说，位于意大利西海岸的热那亚和比萨会更占优势些，毕竟十字军的主力是来自于西地中海的法国。尤其位置更靠近波河平原与法国的热那亚，受益会更多（比如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法国人就是租用热那亚船只的）。相比之下，比萨的商业腹地就要受限很多。这一地缘位置上的差异，最终也导致在西地中海的竞争中，热那亚能够压倒比萨成为霸主。



罗马共和国地缘结构图

然而同样基于地缘位置的原因，热那亚也很难称霸整个地中海，因为威尼斯的位置会更容易在东地中海发挥影响力。比如在诺曼人侵扰拜占庭时，威尼斯海军就可以审时度势的成为关键先生。由于这层关系，醉心在达尔马提亚开拓，以图称霸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一开始并没有对十字军东征之事有足够的重视。坦白说，从商人的眼光来看，威尼斯人的最初判断并没有问题。毕竟一群乌合之众叫嚷着去东方圣战这件事，怎么看都有点异想天开。要知道威尼斯人可是在所有的海上共和国中，最纯粹的一群商人。他们甚至明确将天主教势力排除在政治体系外（如果你成为了教士，就不能从政）。

在十字军奇迹般的夺回耶路撒冷，并建立四个十字军骑士国时，把利益看的远比上帝更重要的威尼斯商人，发现自己差点错失了重大商机。不过不要紧，在穆斯林的包围之下，“圣战”是件需要长期坚持的事业，并不是夺下耶路撒冷圣战就能大功告成的，守江山的难度，远比坐江山要更难。而以实力和地缘距离来说，威尼斯会更占

据优势。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之前在诺曼人与拜占庭人的争斗中，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拥有贸易特权和更多的贸易点。这意味着，十字军骑士们如果想保住圣城和骑士国的话，战略上可能给他们最大支撑的还是威尼斯，尤其陆地补给线离拜占庭最远，却又离埃及最近的耶路撒冷（埃及的海军实力，是穆斯林政权中最强的）。

正是基于上述地缘优势，依靠给耶路撒冷提供海军保护，威尼斯人很快便取得了巴勒斯坦地区沿海港口的停泊权和贸易权。加上他们在拜占庭的贸易特权，没有第一时间反应的威尼斯人，反倒成为了十字军东征的最大受益者。压倒两个竞争对手，成为了东地海的贸易主导者。事实上，能够一直得到海上支援，也是线性排列的几个十字军骑士国，能够存活一个多世纪的根本原因。只是这完全跟基督教友们的友情无关，各方只是在相互借力罢了。当然有得意的就有失意的，对威尼斯扩大贸易版图这件事，最为不满的肯定是它的竞争对手——热那亚和比萨了。

拜占庭剥夺威尼斯人的贸易特权

威尼斯的强大不仅让它的直接竞争对手眼红，也让拜占庭人感到不安。虽然拜占庭人知道，在穆斯林和十字军胶着于西亚之时，自己想再次成为东地中海贸易的主导者，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这并不代表拜占庭就必须忍受威尼斯一家独大的局面。最起码，就拜占廷领土势力范围内的爱琴海、黑海贸易权来说，面前有三个拉丁海上共和国可供选择。

在萨拉丁控制埃及，建立阿尤布王朝的同一年（公元 1171 年），拜占庭人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剥夺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特权。由于热那亚人之前做了大量工作，这些特权被移交给热那亚人（这也使得热那亚的实力得以压倒比萨）。从君士坦丁堡的角度来说，转换合作对象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通过没收境内威尼斯人的财产，充实自己的国库。至于理由，既然威尼斯人承认拜占庭的皇帝是最高宗主，那么宗主征用臣民的财产还需要理由吗？

很显然，威尼斯人肯定不会接受那么没有契约精神的做法。很快威尼斯人便派出了强大舰队远征君士坦丁堡。只是你很难仅仅凭借海军就征服一个帝国的，尤其是面对君士坦丁堡这样举世闻名的坚固城市。因此在僵持一段时间后，威尼斯人还是不得不接受了这一切。对于这一结果，最满意的肯定是热那亚人了，不过拜占庭人意识中的，皇权高于一切的想法，对于商业合作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在后来的历史中，热那亚人也同样“享受”过这种待遇。

从地缘结构上看，在东中海贸易主导权的争夺中，有两个关键点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君士坦丁堡；另一个就是骑士国们的核心——耶路撒冷了。失去拜占庭这个贸易伙伴后，与十字军骑士国的合作关系，成为了威尼斯手上唯一的筹码。如果能保住与耶路撒冷贸易特权，那么威尼斯在东地中海还不会被边缘化。然而萨拉丁对耶路撒冷的征服，很快便让威尼斯人失去了巴勒斯坦的贸易线。可以说，两个贸易支撑点的相继沦陷，让威尼斯陷入了建国以来的最低谷。

精明的商人能够从任何事件中看到商机。耶路撒冷的沦陷，也让地中海上的其它几个海上强国看到了机会。如果谁能帮助十字军夺回圣战，那么很自然的也就拿到了巴勒斯坦的贸易权。这也是为什么，西西里王国、热那亚共和国们，争相为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出力的原因所在。不过这次阵容强大的远征，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了，并没有如愿拿回耶路撒冷。可以想像的是，一定会有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来完成这一未竟的事业。只是那些希望在东方建功立业的十字军们，出发前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场远征的主导权，被为他们提供海上支援的威尼斯拿到。

第十八章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第一节 威尼斯将十字军引向君士坦丁堡

十字军计划进攻埃及并由威尼斯提供海运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未果之后，天主教徒们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埃及。正是因为得到了埃及，萨拉丁才有足够的打造对十字军骑士国的包围圈，并攻下耶路撒冷。为此，第四次（公元 1202 年）、第五次（公元 1217 年）、第七次（公元 1248 年）十字军东征的目标，都被锁定为了埃及。纵观历史，拿下埃及的意义的确比单纯的维持那几个十字军骑士国的意义要大。当年罗马也是在臣服了（名为结盟）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之后，再解决西亚的塞琉西王朝。控制了肥沃的尼罗河平原，一个基督化的东地中海方才真正可期。

从技术上看，进军埃及最大的障碍在于十字军并没有自己的海军。相比之下，前几次以圣地为目标的东征，只要得到拜占庭帝国的协助，完全可以从陆地线进军（包括让拜占庭在部分路段提供海运）。由于拜占庭帝国希望拉丁人能够帮他们消耗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塞尔柱人，即使双方内部亦有摩擦，但通常情况下总是会予以协助的。现在，将目标锁定为埃及的话，拜占庭的帮助就很难获得了。不过此时天主教世界，已经有了自己的海上势力，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三个共和国，都能提供这种支持。从海上实力和位置来看，威尼斯是最合适的人选。失去拜占庭、耶路撒冷这两个贸易同盟的威尼斯，也更有动机开发新的贸易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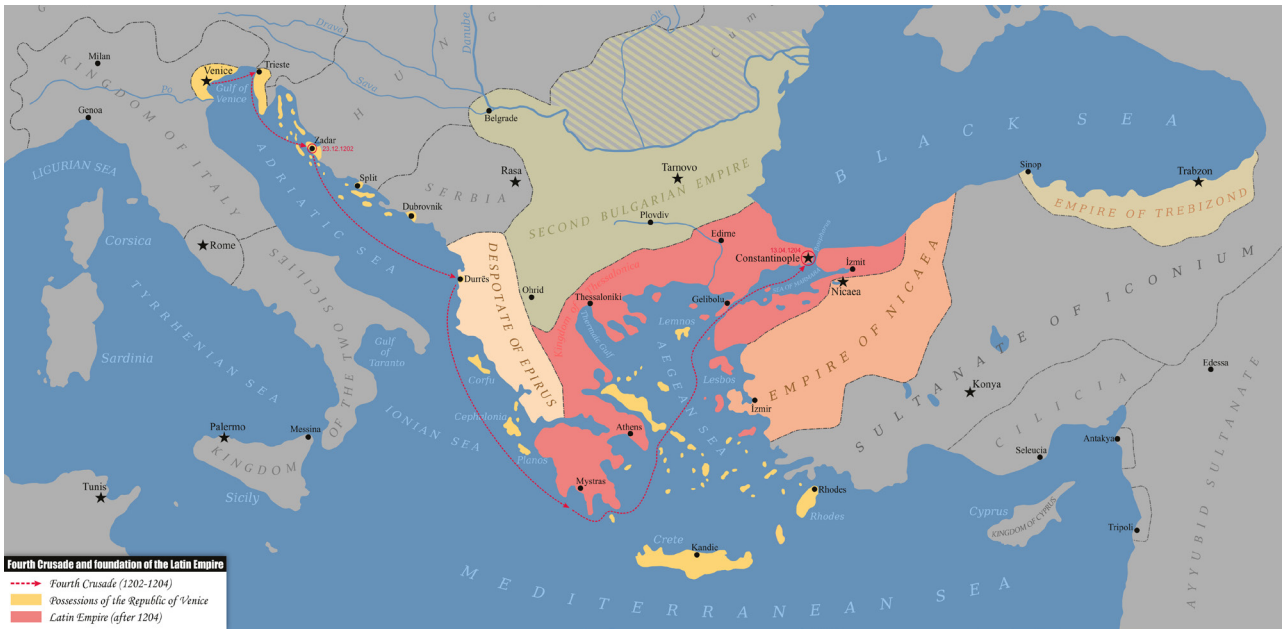
由于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正陷入失去君主后的混乱中，法王（腓力二世）也正在乘机推进蚕食英格兰国王在法兰西的领地。对参与远征埃及计划感兴趣的，主要是来自法国的贵族（也包括部分意大利人）。欧洲大陆政权格局的动荡，也使得最终能够成行的十字军数量大约只有一万人。然而让所有骑士都没有想到的是，本来受雇于十字军的威尼斯人，最终却成为了这次计划的主导者，而计划的目标，也完全偏离了这次东征，乃至整个圣战的初衷。

威尼斯将十字军引向攻打拜占庭

由于人员、物资要完全依赖于海上运输，将数万十字军护送至埃及，并提供战争期间海上保障的费用是非常庞大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威尼斯商人们在募集资本和金融运作上的创新。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威尼斯人为了这次远征，几乎压上了全部身家。通常情况下，商人们会提供分期付款的方案，以在战争进程中让骑士们，用收获的战利品来支持费用。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你对战争的结果要有信心。现在的问题在于，威尼斯人会不会把赌注，押在这样一次实力看起来不太强，又无法得到陆地支援的远征上？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威尼斯人一开始所做的准备，就不

是为了远征埃及，也不是简单的做一笔运输生意。

相比去埃及征服穆斯林，威尼斯人对恢复他们在拜占庭势力范围内的贸易版图，兴趣要大得多。威尼斯人的打算，其实是将这支十字军变身为一支攻打拜占庭的雇佣军。这样做的最大风险，倒不在于为了圣战目标而组织起来的骑士们会不会答应，因为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如果威尼斯人拒绝为远征提供支持，将意味着骑士们先期投入的费用将付诸东流（征召军队、准备装备是很花钱的）。风险在于不管怎么说，拜占庭的东正教徒也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员。尽管即使是天主教国家内，也一样会有互相互伐的情况（虽然教廷一直希望要和平共处在罗马的领导下），但把一场以圣战为名组织的军事行动，演变为基督教内部的战争，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示意图

对于把利益置于上帝之上的威尼斯商人来说，这其实并不会成为心理障碍。他们要做的是一步步帮助骑士们克服心理障碍罢了。有鉴于此，这支十字军最初被引导参与的战役，是达马尔提亚的札达尔城（这座城市依附了向巴尔干扩张的匈牙利王国，影响到了威尼斯在达尔马尔提亚的利益）。虽然对攻击基督徒心存顾忌，但为了让威尼斯人最终把他们运向目的地，骑士们还是同意了前者的要求，并顺利的拿下了这座城市。接下来，威尼斯人开始明确提出——进军君士坦丁堡。

第二节 十字军攻下君士坦丁堡

十字军攻下君士坦丁堡的重要原因

对于一场战争来说，师出有名还是很重要的。十字军们的心理障碍，很大程度是缘于教廷的态度。不过这也不是问题，威尼斯人和十字军说服罗马的理由是：这样可以让希腊人回归“正统”的罗马天主教。对于教廷来说，让原本分裂的东、西基督教



十字军攻打君士坦丁堡

会统一到罗马的治下，这个愿景甚至要比拿回耶路撒冷更具诱惑力。于是，在获取了陆战能力及教廷默许后，一场由威尼斯人主导，完全不能称之为“圣战”的战争，终于在爱琴海拉开了序幕。

自公元 330 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新罗马”（君士坦丁堡）以来，这座堪称世界上最坚固的城池抵御了保加尔人、瓦良格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威尼斯人等外敌的进攻，却从来没有陷落过。甚至可以说，拜占庭帝国每每能在危机之时涉险过关，很大程度有赖于这座建筑在枢纽位置上的城。然而这一次，君士坦丁堡却没有守住不破金身，甚至两度被攻陷（公元 1203 年 7 月，公元 1204 年 4 月）。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新罗马的陷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威尼斯人在海、陆两线所做的准备以外，拜占庭内部出现了权力之争，并导致内部分化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简单点说，威尼斯人之所以敢于把注下在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埃及），是因为拜占廷有流亡的皇族（后来的阿列克谢四世）希望借势争夺帝位。所谓堡垒最易从内部攻克，这句话的含义并不只在战术层面上。如果攻城的阵营中，有可能合法继承大统的拜占庭皇族，那么部分抵抗者的决心就不会那么坚定了。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古往今来的入侵者，大都会寻找在对手内部，先寻找代理人的原因所在。

威尼斯人策动这场战争的原因在于希望重夺爱琴海与黑海的贸易版图。计划中的结局，应该是他们的所扶植的代理人，顺利回到君士坦丁堡，然后把贸易特权从热那亚人手中移交给威尼斯人。当然除此之外，这次战争所花费的军费也自然要由拜占庭来承担。对于这一流程，熟知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列强与清帝国战争史的朋友，应该不会感到陌生。然而在顺利完成军事目标，将自己的代理人扶上皇位后，威尼斯人却发现，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十字军再次攻破君士坦丁堡

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是由于有拜占庭方面合伙人的原因，威尼斯人和十字军无法通过大肆劫掠来获取战利品。然而在城破之前，拜占庭的国库已经被出逃的前政权席卷一空，并不能马上筹出巨额军费缴付给前者；二是威尼斯人的行为，以及君士坦丁堡城破之后所造成的破坏，让拜占庭民众对之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换句话说，无论谁

做拜占庭皇帝，都很难再保证威尼斯人能在拜占庭境内安全的做生意了。

如果仅仅是前者的原因，倒还是很好办的。精明的威尼斯人可以制定一个加上高额利息的还款计划，让君士坦丁堡方面慢慢还（当年清政府就是如此被要挟）。但后一个因素，却让威尼斯人感觉到，一旦让拜占庭帝国恢复了元气，那么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可能性几乎就是百分之百了。要知道，皇权至上的拜占庭，上一次把威尼斯人强行赶出君士坦丁堡时（并没收财富），就完全没有什么契约精神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已经撤出城外，等待和“新”拜占庭帝国谈判的十字军，在威尼斯人的带领下再次发动攻城战并破之。可以想见，无所顾忌的十字军这次将通过劫掠这座千年古城，获取远超军费的回报。

从十字军的角度来看，事情到此已经完全可以划上句号。圣战意志不那么强烈的骑士，可以带着东方的财富回到欧洲；还想去耶路撒冷完成神圣事业的人，也有钱雇船继承东行了。然而长于计算的威尼斯人，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策动这场战争，目标决不仅仅是做一锤子买卖，恢复甚至垄断爱琴海、黑海的贸易版图，才是它的终极目标。为此，一个构筑在拜占庭废墟上的“拉丁帝国”开始呈现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上。

第三节 拉丁帝国的建立

拉丁帝国的建立及拜占庭继承者在各地的出现

1204 年立国的“拉丁帝国”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标签，是因于这次入侵的天主教徒，都是来自于拉丁地区（法国、意大利）。帝国的正式名称其实是“罗马尼亚”（罗马人的土地）。在欧洲“罗马帝国”这笔丰厚的地缘政治遗产，一直被各种势力主动“继承”。要是从语言来看，“拉丁罗马”倒比希腊化的拜占庭好像更“正宗”。当然就文明继承的角度来说，拜占庭的希腊人要比这些日耳曼人后裔，更有资格自称“罗马”。

“拉丁帝国”的范围大体包括现在的希腊和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土耳其海峡两岸的土耳其领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拜占庭帝国就此消亡。失去君士坦丁堡和大部分领土的拜占庭人，分别在小亚细亚半岛爱琴海、黑海地区，以及品都斯山脉西侧（阿尔巴尼亚南部、希腊西北部）的伊庇鲁斯地区，建立了三个国家，分别是：尼西亚帝国、特拉比松帝国，以及伊庇鲁斯国。当然这些标签其实都像“拉丁帝国”一样是个方便区分的“外号”。三个继承者自己可都是以正统拜占庭继承者自居的。

所谓的“拉丁帝国”一如之前日耳曼人所建的那些所谓帝国一样，内部从一开始就处于各自独立的“封建”状态。其中“皇帝”的领地自然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横跨土耳其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土地。其它参与东征的法兰西贵族，则在希腊分别建立了：塞萨洛尼基（包括下马其顿和塞

萨利地区）、雅典（维奥蒂亚和阿提卡地区）、亚速该（伯罗奔尼撒）等名义从属帝国国家。可以想见的是，即使不考虑希腊——东正教属性的拜占庭人，是否愿意接受这些“野蛮”西欧骑士的统治，单从结构来说，这样的“封建”结构能够保持稳定，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拉丁帝国示意图

威尼斯得到爱琴海重要岛屿和贸易权

作为这次东征的主导者，威尼斯人得到了包括埃维亚岛、克里特岛、希俄斯岛等重要岛屿在内的爱琴海岛屿。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与那些骑士国不同的是，威尼斯人其实并没有加入拉丁帝国的政治体系，或者说没有宣誓效忠所谓的帝国皇帝。因为这些商人认为，贸易才是权力的基础，他们之所以要那些爱琴海岛屿，也只是为了贸易。一旦在政治上有所束缚的话，谁又能保证当年拜占庭人驱逐、没收威尼斯人财产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的呢。至于和那些拉丁国家的关系，威尼斯人更愿意用商业原则来做纽带。

对于一些抱有农耕文明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威尼斯人这种不在意领土扩张，而在于贸易控制权的做法是很难理解的。比如将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所遭受的那些西方入侵，统统归结于“殖民”行为，就是基于这种思维。事实上对于那些看中海洋贸易的帝国来说，海洋的控制权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正在向海洋迈进的中国来说，厘清这点同样具有现实意义。这样你就不会纠结于，还有多少岛礁在某个南海国家手中，而会将注意力放在，谁才真正有实力、有支点控制这片海洋。

威尼斯人也并没有控制全部的爱琴海岛屿，不过那些重要岛屿在手，加上经济上控制“拉丁帝国”的优势，已经足以让他们主导爱琴海的贸易了。当然，无论对于那些拉丁骑士还是威尼斯商人来说，不能将拜占庭领土尽数收入囊中总归是个遗憾。然而拜占庭帝国毕竟已经统治这片土地将近千年了，这些人口、文明都不占优的天主教

徒，想让已占领土地上的东正教徒臣服，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另一个外部原因是，拜占庭残余势力所建立的三个国家，并非是唯一的东正教国家，君士坦丁堡北边还有个早归信东正教的保加利亚王国呢。尽管保加尔人历史上一直和拜占庭人争斗，但这些游牧后裔也知道，一旦东正教世界失去君士坦丁堡的话，自己一定会成为天主教世界扩张的下一个目标（特别是北边的匈牙利也是天主教国家）。保加利亚王国很快和新生的尼西亚帝国结成了同盟，以避免唇亡齿寒的局面出现。

第四节 拜占庭帝国的复国

一个新王朝是否能生存下来，前 50、60 年（三代）的融合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想像，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下，所谓的拉丁帝国将很难熬过王朝的危险期。事实也的确如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博弈，三个后拜占庭国家中位置最好，潜力最大的尼西亚帝国终于重返君士坦丁堡（公元 1261 年），将一开始就风雨飘摇的“拉丁帝国”变成了历史。值得玩味的是，尼西亚帝国在复兴拜占庭的过程中，得到了热那亚人的大力协助。至于这是为什么，相信完全不用解释了。

虽然尼西亚帝国脱颖而出，入主君士坦丁堡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正统继承人，但并不代表另外两个竞争者就此消失了。事实上战略上试图向塞萨利扩张的伊庇鲁斯国和以黑海为经营方向的“特拉比松帝国”（大体就是当年 “本都王国”的翻版），实际并没有回归新拜占庭帝国（前者曾经表面臣服过）。这两个地缘政治板块，后来都和君士坦丁堡一样，在 15 世纪中叶为奥斯曼帝国所征服。



拜占庭帝国地图（公元 1265 年）

同时奥林匹斯山以南的雅典、亚速该等十字军国家，也没有为复兴后的拜占庭帝国所征服。说起来这也是封建体系的一个好处，每个板块都有自己的利益和体系，并不会因为中央政权的易手而瞬间崩溃。相比之下，像中央之国这种中央集权到极致的

国家，征服金字塔的顶端，往往就能很快拿到整个帝国。另外威尼斯人也依然控制着他们在拉丁帝国时期的遗产。当然，热那亚人通过帮助拜占庭复国这件事（尤其能因此进入黑海贸易），再次成为了威尼斯人在东地中海的有力竞争者。这两个共和国在地中海的贸易博弈，也贯穿了后来的整个中世纪史。

从地缘角度来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让拉丁势力得以在爱琴海南部的原拜占庭领土中生根。客观上使得西欧，尤其是威尼斯等商业共和国所在的意大利北部，可以从拜占庭全面吸收文明因子。同时东西方贸易所聚集的财富，也为意大利北部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所引发的最大成就，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了；另一个后果，则是让拜占庭帝国彻底走向了衰弱，为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扫清了最大的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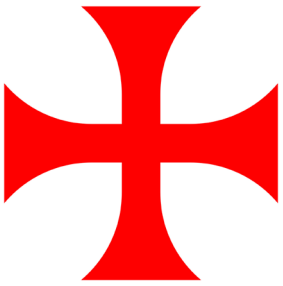
写到这里，喜欢这段历史的朋友可能还会有个疑问，在十字军东征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三大骑士团，怎么还没有出场。别急，他们的前世今生，将伴随着另一条十字军东征的支线展开。

第十九章 北方十字军战场的开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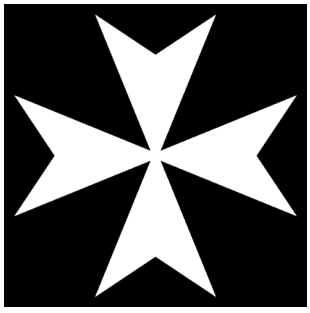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十字军三大骑士团的建立

十字军骑士团十字标志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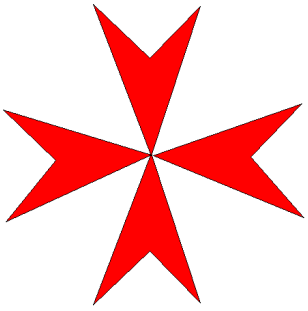
提到十字军东征，很多人脑海中浮现出的，一定是一群身披长袍、胸印十字，重甲在身的骑士。这一标志性形象其实主要属于骑士团。当然，每一个骑士团所披的十字长袍，在十字标志上也略有区别。比如让人印象深刻的白袍红十字，就是属于声势最大、实力最强的“圣殿骑士团”；由四个 V 所组成的八角十字，又称“马耳他十字”的则属于最早成立的“医院骑士团”（初为黑底白十字，后为白底红十字）；最晚成立的“条顿骑士团”所采用的，则是不对称的白底黑十字。今天我们仍然能在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这些北欧国家的国旗上看到这种偏十字，因此也被称之为“斯堪的纳维亚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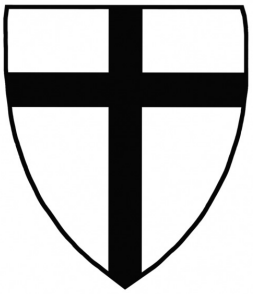
圣殿骑士团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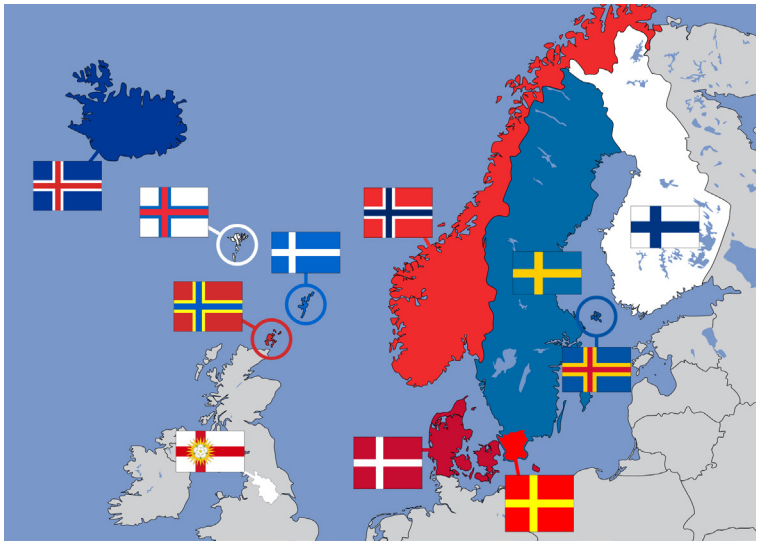
医院骑士团十字



医院骑士团十字



条顿骑士团十字



斯堪的纳维亚十字

上述小知识有助于我们在影视资料里，区别不同的骑士团战士，然而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骑士团”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对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简单点说，骑士团是一个以宗教思想武装起来的军事组织。其在组织关系上并不隶属于世俗世界的某位君主。名义上，教廷才是骑士团的最高领导者，并且授予后者合法地位。正因为如此，骑士团也被描述为“僧侣骑士团”或“军事修士会”。他们外披僧侣式的长袍，内穿甲胄，也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特点。

十字军骑士团的形成过程和其地缘属性

由于罗马教廷是十字军东征的直接推动者（而不是某个“国家”），理论上所有的十字军都应该受教皇节制。只是我们也知道，十字军的构成极其复杂，教廷想对具体事务发号施令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教廷是意识形态的控制者，在十字军队伍中选取一些思想和军事过硬的成员，组建僧侣性质的军事组织并非难事。事实上，那些抱着神圣目的前往圣地的十字军，本身也有建立组织的需求。比如最早成立的医院骑士团（公元 1099 年），其成立初衷就是为了救助前往圣地的天主教徒。在壮大并成为不可忽视的势力后，很快便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授权。



医院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

由于骑士团在宗教、军事上的双重属性，使得他们在十字军东征中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就战斗力来说，僧侣骑士们算得上是十字军中战力最强的一批人。在狂热宗教思想的武装下，将之称之为“以一敌十”并不为过。这其中将总部建在所罗门圣殿遗址（也是穆斯林的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上的“圣殿骑士团”，以及总部也设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医院骑士团，就是保卫耶路撒冷的中坚力量。

古今中外的战史中，类似的案例也比比皆是。在战场上，胜利会更青睐于不惧死亡的人。当个人生死让位于一个更崇高目标之后（比如爱国主义），获得胜利的机会也就比对手多了。不可否认的是，骑士团的很多成员，是抱着为上帝献出一切的目标加入这一事业的。然而事情总是这样的，无论最初的目标有多么神圣，在凭借这个目标汇集起强大力量之后，都会很自然的结合成一个利益集团，并且开始带有地缘属性。

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建立的组织，由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成员皆为来自法兰西的骑士，所以一开始成员基本都是来源于法国。只不过，后发的圣殿骑士团，圣地保护者形象的定位更为精准（也更专注于军事层面），在法国吸引到了更多的人加入。相比之下，早一步成立的医院骑士团，则带有更多慈善和医疗救助的性质。在法国竞争不过圣殿骑士团后，成员则渐渐转变为以意大利人为主；至于条顿骑士团则是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神圣罗马帝国战略性退出东征事业后，仍坚持前往东方的德志意骑士所组建的。

从地缘属性上看，也可将上述三大骑士团对应为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三个地缘政治板块，在十字军中志愿力量的集中显现。由于有教廷的支持以及强大的武力，最早建立的这两个“拉丁骑士团”声势一度如日中天。

第二节 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最终命运

圣殿骑士团在法国的覆灭

对于骑士团成员来说，教皇的保护意味着不仅意味着他们在东方拥有军事、政治、贸易方面的特殊权力，也意味着在原属国家内，不再需要向世俗统治者（也包括地方教会）承担税赋和义务。鉴于服从教廷所付出的成本，要低于呆在世俗封建体系内，使得越来越多的贵族，愿意把自己和土地依附于骑士团。这其中尤以深耕法国的圣殿骑士团，所获得的土地和财富最多。发展到后来，这些僧侣骑士甚至把业务延伸至金融市场，像那些商业共和国一样，通过放贷等手段积累财富。

如果骑士团的影响力，仅限于以圣城为中心的东方，那么欧洲那些世俗君主其实倒并不会介意他们的存在。问题在于骑士团成员并不可能就此放弃他们在母国的土地，其原属国也就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了。比如国王们就再也不能从那些归属“上帝”的土地上收税了。尽管如此，基于骑士团在东方的军事存在，以及宗教、经济影响力，君主们纵然无法忍受这种情况的存在，一时也无可奈何。除非有一天，十字军的事业彻

底终结。

骑士团所遇到的第一次危机，是萨拉丁对耶路撒冷的征服。在那次征服中，作为圣城守卫中坚的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遭遇到了致命打击。此后圣殿骑士团从狮心王理查手中得到塞浦路斯以为基地，只不过这个岛屿很快又被转售给耶路撒冷王国的统治家族，以重新建国。好在这次两大骑士团虽然损失惨重，但由于穆斯林并没有拿下全部的十字军骑士国，且后来耶路撒冷王国又复国成功，所以骑士团们依然有机会继续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13 世纪后期，四大十字军骑士国相继覆灭。公元 1291 年，天主教徒在西亚的最后一个据点被穆斯林拔除，标志着十字军东征的事业彻底终结。虽然经过将近两百年的经营，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尤其是前者），甚至成为了许多欧洲君主、贵族的大债主，但失去“圣战”这项神圣事业，以及在东方的据点之后，骑士团与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了。

骑士们的命运与其主力经营区域的地缘政治环境有关。其中以法国为经营重心的圣殿骑士团，命运最为悲惨。力图打造中央集权，以在和英、德两国对抗中获胜的法兰西王国，无法容忍骑士团对自己国家的割裂。公元 1307 年，全法国的圣殿骑士几乎在同一天被捕，所有的土地、财产也被没收。

医院骑士团的重新定位得以延续存活

相比之下，在与圣殿骑士竞争中相对处于劣势的医院骑士团，结局反而要好得多。一方面，意大利的割据状态，以及教皇国的存在，使得没有哪股世俗力量能够对其进行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在法国的圣殿骑士覆灭之后，分散在其它地区的圣殿骑士很快在教廷的授意下转入了医院骑士团旗下，使之反而成为这场灾难的受益者。不过医院骑士团能够幸存，更多与它的地缘选择有关，那就是不介入欧洲大陆的政治博弈，始终把自己的影响力限定在地中海中。



医院骑士团的迁移位置图

在十字军事业彻底终结之后，医院骑士团先是将它的基地退入塞浦路斯（公元 1291 年），后又迁入罗得岛（公元 1309 年）。对于欧洲的天主教国家来说，定位于东地中海的医院骑士团， 不仅不会影响到它们内部的博

弈，反而可以成为抵抗穆斯林（尤其是后来的土耳其人）西侵的前线力量。这也为医院骑士团的存在赢得了政治空间，以至于当骑士们不得不在奥斯曼帝国的重压下，放弃罗得岛后（公元 1522 年），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协商决定，将附属于西西里的“马尔他岛”，作为医院骑士团的新基地（骑士团也因此更名为“马耳他骑士团”）。

在随后的历史中，马耳他骑士团一直在欧洲事务中恪守着中立态度，并继续为天主教世界抵御穆斯林的进攻奉献力量。尽管在拿破仑帝国时期，马耳他岛被迫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骑士团因此失去了他们的立身之地（1834 年在罗马重建总部），但“马耳他骑士团”的特殊国际法人地位，却一直保留到今天。以至于在联合国的组织结构中，马耳他骑士团拥有着永久观察员的地位。当然，此时的马耳他骑士团，已经完全不具备军事和地缘政治价值，而是回归到它救助、慈善的原始社团使命上了。




今日的医院骑士团

要么因为尾大不掉，被世俗君主颠覆；要么识时务的找到自己正确的定位。这是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命运所给我们的启示。那么，除了这两条路之外，组织能力、运转效率极高的“军事修士会”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三大骑士团中还有一个成员——条顿骑士团的命运，还没有呈现在我们眼前。

第三节 条顿骑士团帮助匈牙利抵御钦察人

条顿骑士团面临的困境和机会

自萨拉丁攻陷耶路撒冷以来，十字军的事业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可以说，比另两大骑士团晚成立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条顿骑士团（公元 1198 年成立），一开始就注定很难在圣战中取得太大成就。另一个制约其发展的战略原因，是德意志并非一个地中海板块，很难对在东地中海打拼的条顿骑士们进行战略支援。不过后一个原因，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算是得到了解决。同时期原本由诺曼人统治的西西里王国，归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体系（公元 1197——1266）。试图扩大德意志影响力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将南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境内的若干据点提供给了这些条顿骑士，帮助他们在圣地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从地缘政治逻辑来看，如果英国人没有放弃



条顿骑士团

塞浦路斯岛的话，很有可能也会在这一时期孵化出一个“英系”的骑士团来。

尽管德意志人凭借西西里王国及条顿骑士团，将势力拓展至了地中海，但鉴于其身处阿尔卑斯山北的地缘位置，战略前景实在很难让人看好。尤其对于条顿骑士团来说，有两个强大竞争者在前，无论土地还是财富上的空间都不大了。在十字军的圣战事业整体走下坡路的背景下，底子最薄的条顿骑士团看起来，是最有可能被先淘汰的一批人。不过谁也没有规定“圣战”对象一定得是穆斯林。从技术上看，条顿骑士团只要把战争的目标指向那些不信仰基督的“异端”，就符合天主教“军事修道会”的社团定位，也就能够得到教廷的支持。事实上，医院骑士团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一直生存下来，也正在于他们始终处在圣战前线的位置。

穆斯林并非是基督教或者说天主教世界，唯一直面的“异端”。条顿骑士团最先在地中海之外找到的圣战机会，是匈牙利人统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高原（罗马尼亚还未立国）。此时已经天主教化的匈牙利王国，正处在扩张后的鼎盛时期，不仅控制了整个多瑙河中游地区（喀尔巴阡盆地），还向西渗透至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所以才会影响到威尼斯人的利益）。不过天主教世界之所以容忍游牧出身的马扎尔人做大，可不是让他在西方争利，而是因为其能够在东线起到“基督教之盾”的作用。

匈牙利并非唯一的“基督教之盾”，多瑙河下游南岸的东正教世界，是由同样游牧出身的保加利亚人来庇护。两个归化民族所面对的，都是来自南俄草原的游牧民族。由于多瑙河口的草原气候，以及瓦拉几亚平原的低平地势。游牧民族一般总是能够把势力范围延伸到东瓦拉几亚平原。在匈奴之后、蒙古人尚未西征之前，具体构成威胁的基本都是那些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这些从中亚进入南俄草原，种族呈黄白混血状的突厥民族会被他们的敌人打上各种标签，其中这一阶段最著名的标签就是“钦察人”，南俄草原也因此又被称之为“钦察草原”（阿拉伯人称之为“库曼人”，将南俄草原称之为库曼尼亚）。

条顿骑士团进驻特兰西瓦尼亚及后又被赶出

条顿骑士团的机会在于，做大之后的匈牙利王国需要有一支生力军，帮助王国在

特兰西瓦高原东南角（今罗马尼亚布拉索夫县）防御钦察人的侵扰。对深感地中海非自己长留之地的条顿骑士来说，他们愿意帮助匈牙利人的对价，则是希望能够得到布拉索夫地区[1]作为封地。应该说，封建以御外敌也是很常见，甚至几乎是必然的做法了（在欧洲）。只不过在匈牙利与神圣罗马帝国接壤的情况下，条顿骑士团的德意志背景，势必会让匈牙利人感到有些不安罢了。毕竟钦察人进入高原，一般也只是劫掠一番，并没有定居的打算，但有神圣罗马帝国做后盾的条顿骑士，想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在条顿骑士入驻布拉索夫地区十几年后（公元 1211——1225 年），权衡利弊之后的匈牙利人开始驱逐条顿骑士，以避免后者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后来的历史证明，匈牙利人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关于钦察人的结局，在蒙古西征阶段会有所解读，现在大家关心的，应该是条顿骑士团下一步将何去何从。需要说明的是，条顿骑士在匈牙利找后路的时候，还没有结束在地中海的圣战。他们最后参加的重要战役，是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中对埃及的进攻（1217——1221 年）。也正是在这次失败的战争后，条顿骑士团开始把重心战略性的转回欧洲，并让匈牙利人感受到威胁。

虽说条顿骑士团是被匈牙利人赶出特兰西瓦尼亚高原的，但客观从地缘位置来看，德国人想在此做成一番事业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毕竟这里离德意志本土相距太远，中间还隔着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诺曼人在西西里的过客生涯，就是前车之鉴）。不过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依靠圣战所凝聚起来的这股军事力量，终究还是找到了用武之地。而接下来等待条顿骑士团去征服的异教徒，就是波罗的人中最靠近西侧的“普鲁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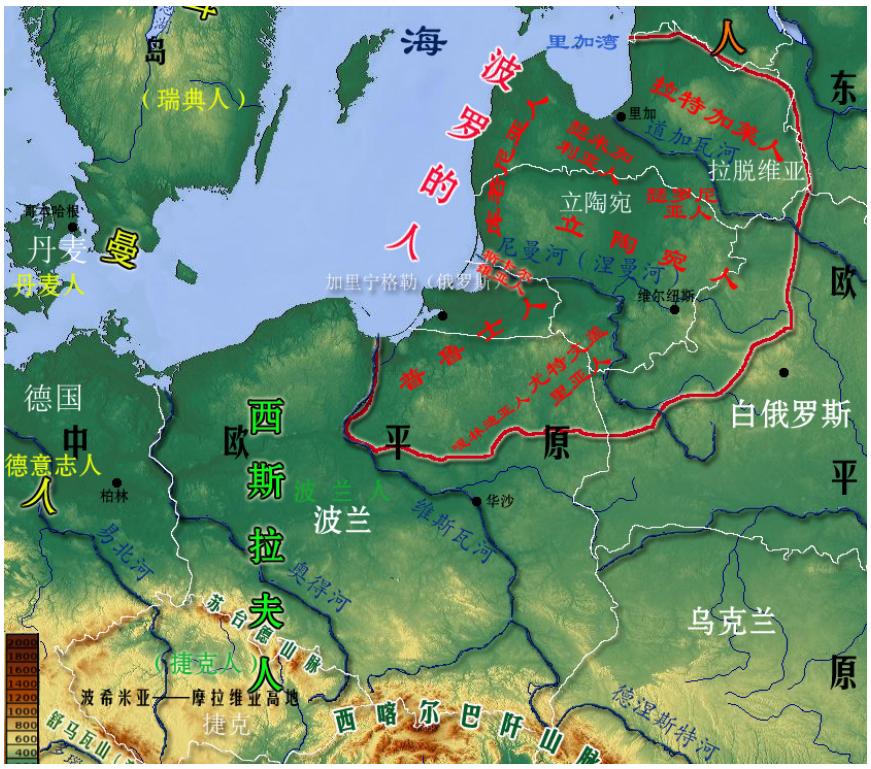
第四节 条顿骑士团应波兰人之邀征战普鲁士

波兰王国的分裂

为了与后来德意志化的“普鲁士人”相区别，接下来的行文中我们将以“古普鲁士人”作为这支波罗的民族的标签。在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先后加入基督教大家庭后，古普鲁士人所属的波罗的民族，以及芬兰、爱沙尼亚人所属的乌拉尔人，算是欧洲北部仅存的“异教徒”了。由于上述民族都处于波罗的地区，而神圣罗马帝国也是波罗的海“国家”，所以条顿骑士们在北线开拓新的十字军战场，远比在东地中海对付穆斯林、特兰西瓦尼亚高原防御钦察人要现实的多。然而最先建议条顿人征战普鲁士的，却并非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而是波兰人（公元 1226 年）。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王国的领土关系。作为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在中欧地区上的政治代表，两大政治体在中世纪的分界线大体稳定于奥得河一

1　布拉索夫 (Brasov)，今罗马尼亚中部的县。位于南喀尔巴阡山脉北坡、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东南部。1211 年建立，是撒克逊人居住区。



波罗的海人地缘位置图

线（也就是今天的波德边界）。作为波罗的海民族最西侧的一支，古普鲁士人的领地则在维斯瓦河河口（波兰中部）与涅曼河口（立陶宛与加里宁格勒边界）一带。这意味着从陆地征服的角度来看，对普鲁士最有想法的应该是波兰人。

以古普鲁士人的有限纵深来看，似乎很难理解波兰人需要求助于条顿骑士。究其原因是因为曾经强大，并阻止德意志人向奥得河以东扩张的的波兰王国，在 12 世纪中叶重新陷入了分裂状态，并依地缘结构分成了西北部奥得河下游——维斯瓦河下游的“大波兰”、东南部维斯瓦河上游的“小波兰”、西南部奥得河中上游的“西里西亚”，东北部维斯瓦河中游，以今天波兰首都华沙为中心的“马佐夫舍”四个公国。其中正面与古普鲁士人博弈，及请条顿人前来的是马佐夫舍公园。

马佐夫舍公国求援条顿人与圣剑骑士团的先行

陷入分裂状态的王国，自然无法集合全国之力对抗一个看似体量不大的对手。包括匈牙利王国之所以请条顿骑士来防御钦察人，也是因为王国内部正处在分裂的边缘。事实上借由驱赶条顿骑士一事，匈牙利内部做大的贵族阶层逼迫王室通过了类似英格兰《自由大宪章》的协议，阻止了中央集权体系的成熟。回到波兰的问题上来，马佐夫舍公国固然一直想拿下古普鲁士人，以做大自身实力及获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问题在于，整个波兰相对普鲁士板块是有比较优势的，但具体到 1/4 个波兰就未必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其它几大公国并不希望看到马佐夫舍公国，通过征服普鲁士而做大的情况出现。由于得不到其它三大公国的帮助，在请条顿人介入之前，马佐夫舍公国不仅丢失了王国强盛时期渗透的部分普鲁士领地，甚至还被古普鲁士人逆转形势，反过来向华沙方向逼近。这种时候是否有外援，就是关乎国之生死的大事了。

波兰人的请求让正处在困境的条顿骑士看到了获得一块根基之地的希望。尽管普鲁士与德意志之间还间隔着西斯拉夫人，但透过波罗的海，条顿骑士完全有机会直接从神圣罗马帝国获得支撑。事实上，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德意志本土已经有先行者仿效三大骑士团的模式，在波罗的人海地区开辟“北方十字军”战场了。这支成立于



条顿战争示意图

1202 年，同样得到教廷授权的“军事修道会”，也有个很酷的名称——圣剑骑士团（又译宝剑骑士团）。由于骑士团仗剑传教的地点叫作“利沃尼亚”，因此也被称之为“利沃尼亚骑士团”）。

所谓“利沃尼亚”从地理上看就是以里加湾——道加瓦河为核心，包括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南部（里加湾——楚德湖之间）在内的区域。其与普鲁士之间，则是同属波罗的民族序列的立陶宛人的地盘。从这个位置关系也可以看出，圣剑骑士们的野心有多大。当然比起三大骑士团在西亚的远征，圣剑骑士们在利沃尼亚的征服，风险倒也不会更大。最起码利沃尼亚地区的波罗的人、乌拉尔人看起来，不会比穆斯林更难对付。

第五节 条顿骑士团完成对古普鲁士的征服

教庭和神圣罗马帝国对骑士团征战的支持

动身前往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与先期在利沃尼亚征战的圣剑骑士团，共同组成了“北方十字军”的核心力量。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战场的开辟直接推动者也是罗马教廷（公元 1193 年正式发布召令）。教廷之所以把视线转向这里，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德意志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通过武装贸易行为，已经在利沃尼亚地区一定程度传播了天主教；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背景是，这一地区也是归依了东正教的“基辅罗斯”的扩张方向。可以说，自基辅罗斯立国以来，他们就没有停止对波罗的人的征服工作。这意味着如果天主教世界不发力的话，那么从维纳斯瓦河口——芬兰湾这片尚未基督化的“处女地”，就很可能会成为东正教世界打进来的契子。纵观后来的波罗的海三国的命运，也正是这一悲剧性地缘位置所决定的。

为了真正获得一块立身之地，并且防止匈牙利被逐事件再次发生，条顿骑士团希望在波兰之外寻找到第三方力量的支撑，而这个第三方就是骑士们的母国——神圣罗马帝国。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来说，条顿骑士团在波兰人的势力范围内开拓，实在是一

件有益无害的事情。如果成功的话，相当于替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民族获取了一块飞地。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损害德意志本土的利益。因此在进入普鲁士后不久，条顿骑士团便从神圣罗马帝国得到了庇护，认可他们对普鲁士的占领。一旦波兰人准备卸磨杀驴，那么条顿骑士团将能够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支援。

条顿骑士的做法相当于转换门庭，对于这一后果，波兰人显然很难接受。然而这次，拥有强大后援的条顿骑士团，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形成。为了避免将条顿骑士团推向神圣罗马帝国，将之请进来的马佐夫舍公国也只能开出神圣罗马同样的条件，即承认条顿骑士团对征服土地的占有。然而谁都知道，这种妥协只是暂时的。谁又会允许自己的眼皮底下，出现这样一股势力呢？为了让自己对普鲁士的占领更加顺理成章，条顿骑士随即针对教廷的说服工作。简单点说，条顿骑士团希望自己对普鲁士的征服，是一场得到教廷授权的圣战，以从法理上来消除自己与波兰人的事实雇佣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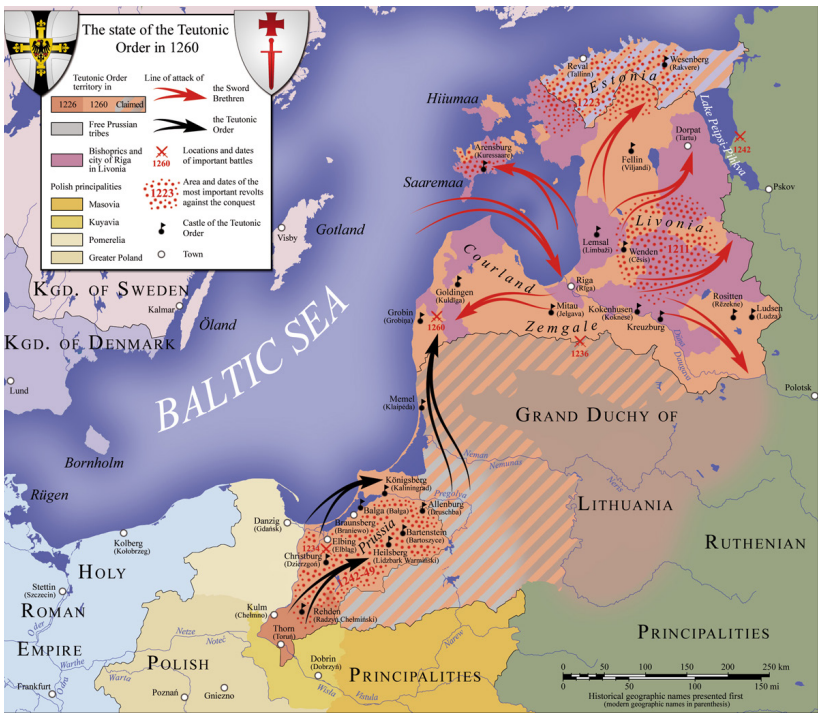
对于教廷来说，它所希望看到的是天主教区的扩大，至于由谁来完成这一事业并不重要，所以当条顿骑士团承诺在占领土地，向那些异教徒推进基督教事业后，他们对普鲁士的占领，很快便得到了“神”的授权。至此，在地中海和匈牙利遭遇困境的条顿骑士团终于合法的拥有了一块立身之地。不过，条顿骑士团与同它肩负同样使命的“圣剑骑士团”能否在波罗的海地区打出一片天地，还要看自己的本事。要知道，在德意志人到来之前，这些波罗的人一直在承受东、西斯拉夫的的压力。这些无论从民族还是宗教角度都属异类的波罗的人仍然能够留存于世，就证明了征服他们绝非一件易事。

条顿条士团在古普鲁士征战的成功

如果没有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介入的话，波罗的地区应该是乌拉尔人和波罗的人相争的格局。以“利沃尼亚”这个标签来说，其所指向的利沃尼亚人就是乌拉尔人的一支。基于人种和语言上的明显差异，源自亚洲的乌拉尔人与基督教世界交流的难度，显然要比波罗的人更困难些（波罗的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同属印欧人）。在北方十字军到来之时，里加湾那些多从事渔猎生产的乌拉尔人，其实已经被波罗的人边缘化了。这也使得在骑士团的征服中，波罗的人成为了主要的障碍。

在北方十字军展开行动之前，波罗的人的信仰还处在“多神信仰”阶段。由于事实已经处在基督教世界的包围中，波罗的人成为基督教徒，可以说是必然的事，无非是成为天主教徒还是东正教徒的问题。从地缘位置上来看，天主教世界的赢面会更大。今天立陶宛、拉脱维亚属于天主教国家，也是地缘博弈的结果。单从这点来说，它们一直谋求并最终与俄国人脱钩这事，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然而今天作为波罗的人中硕果仅存的两大民族：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总人口也不过 400 万人。在如此复杂的地缘环境中，以这样一个人口数量保持民族特性，并且成就两个独立的国际政治法人地位，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体量不大的民族能够顽强留存下来，并在政治版图上拥有一



十字军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征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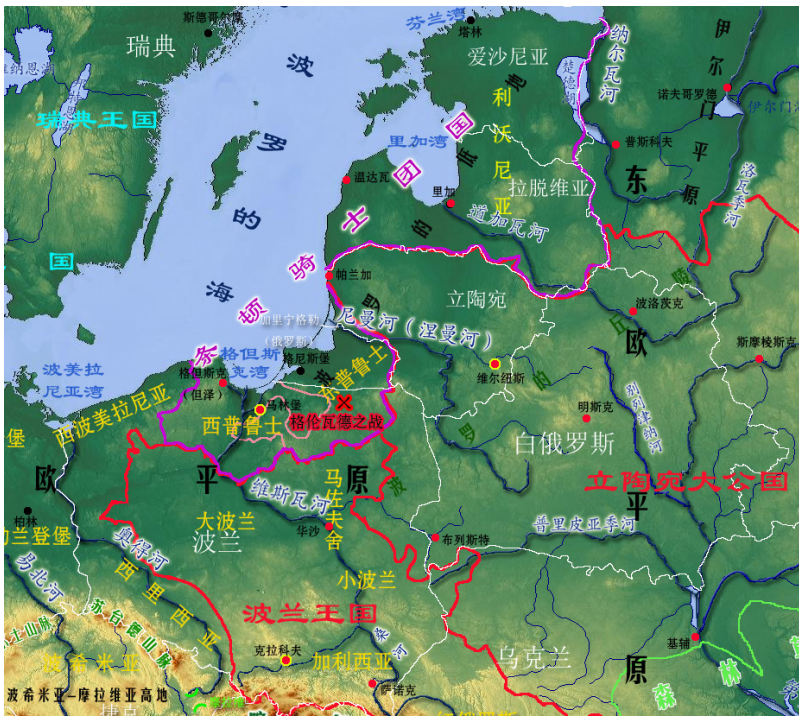
席之地，与它曾经拥有过的辉煌历史有关。比如今天包夹于中、俄两国之间的蒙古，之所以没有被其中一方所消化，就与成吉思汗为这片高原带来的荣耀有关。当然，保持民族特性与政治上的完全独立并不能划等号。在大国相争之地能够做到这点，通常是大国博弈的结果，漠北蒙古和波罗的人的情况莫不如此。接下来的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波罗的人是如何做到这点的。

就对波罗的人的征服来说，后发的条顿骑士团要成功的多。从公元 1226 年，条顿骑士踏上这片土地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战，这些曾经在耶路撒冷沐浴过圣城之光的德意志人，基本完成了对古普鲁士的征服。14 世纪初，条顿骑士团将其总部从威尼斯迁至普鲁士，意味着完全放弃地中海的事业，转而全身心的向建立一个独立的“骑士团国”努力。相比之下，在利沃尼亚的圣剑骑士团，命运就要坎坷的多了。在条顿骑士加入北方十字军阵营 10 年后，圣剑骑士的征服工作遭遇到了重大打击。

第六节 圣剑骑士团的衰弱

当我们在地图上把普鲁士和利沃尼亚的范围画出来，会发现二者并没有完全对接起来，这片看起来被两大骑士团忽视的土地，就是今天的“立陶宛”。当然，实际情况自然不是德意志人没能看上这片土地，而是他们没有能够征服立陶宛。在圣剑骑士团扩张利沃尼亚、条顿骑士团入主普鲁士之后，立陶宛境内的波罗的海诸部开始组成联盟，以抵御德意志人的入侵。公元 1236 年，圣剑骑士团在入侵西立陶宛时（苏勒战役），损失了包括大团长在内的大批骑士，从此一蹶不振，并随即为条顿骑士团所合并。

一场战役导致一个骑士团衰弱，在战略层面上并没有说服力。要知道，在地中海的圣战中，三大骑士团都曾经多次遭遇到类似损失。事实上，只要欧洲方面还在一直为圣战努力，这些“军事修道会”就不愁没有志愿者和资源加入。影响圣剑骑士团满血复活的原因，其实正是在条顿骑士团身上。在圣剑骑士团作为北方十字军唯一的“僧侣骑士团”时，他们无疑是企图参加圣战的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方向的唯一选择。



条顿战争示意图

而在条顿骑士团加入之后，基于它参与过“正宗”十字军的经历以及更大的影响力，无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些君主，还是志愿献身圣战事业的志愿者，会更倾向于把资源注入条顿骑士团。

类似的竞争，在同样创建于法兰西的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中也存在。从竞争的结果上来说，圣殿骑士团在法兰西的收获显然要更大。不过中国有句古话叫“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当十字军东征的事业难以为继，圣殿骑士团有法兰西的势力存在，反倒为他们惹来了杀身之祸。反倒是被排挤到意大利一带的医院骑士团，成为了最终的受益者。

如果条顿骑士团不能够在波罗的地区打出一片天地，他们回到德意志的下场也不会比圣殿骑士团好到哪里去。抛开刚才说的影响力原因，普鲁士要比利沃尼亚离奥得河更近，才是他们在竞争中胜出圣剑骑士团的根本原因。从地缘政治层面上来看，条顿骑士团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普鲁士与德意志本土连成一片的机会要比利沃尼亚更大（后来也的确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条顿骑士更受青睐也就不奇怪的。

不过圣剑骑士团并没有消失，他们在名义上归入条顿骑士团后，仍然独立在利沃尼亚打拼，而条顿骑士团的领导者，也很少干预利沃尼亚地区的运作。这种合并很容易让人想起国内互联网 O2O 领域中，最近发生的几起合并事件（如滴滴—快的、美团—大众），本质上都是为了减少竞争中的消耗，共同开拓市场。当然，合并的模式有很多种，像条顿、宝剑骑士团这种业务实质独立的做法，就很有点“双 CEO 制”的意思。虽然在企业并购案中，这种“双 CEO 制”往往只是过渡阶段的做法，但原本很有可能被条顿骑士团完全消化的圣剑骑士团，却一直留存了下来。甚至在条顿骑士团世俗化变身成为“普鲁士王国”后，依旧没有消失。

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与一个国家的出现有关。那么是哪个国家？又对这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第二十章 条顿骑士团与立陶宛及波兰的博弈

第一节 立陶宛人维持独立地位的方式

立陶宛人归信天主教并建立立陶宛王国

阻碍了德意志人东征大业的 “名不见经传”的立陶宛，在重创圣剑骑士团之后，包括立陶宛人在内的波罗的民族，危机并没有被解除。处在这样一个险恶环境之下，被德意志人或者斯拉夫人消化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好在这些觊觎波罗的人的民族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而立陶宛人也很快找到应对十字军东征的方式。

我们知道，不管背后隐藏着多少利益诉求，十字军东征事件都是以传播基督教为名，由教廷名义授权的一场圣战。这意味着身披十字战袍、手持十字长剑的骑士，理论上只能将剑锋指向未能归信基督的异教徒。当然，这一神圣的标准从来没有真正被执行过，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世界内部，一直也是攻伐不断。不过，如果一个族群能够识时务的加入天主教大家庭，并且得到教廷的认定，那么它就能够在天主教世界获得合法的政治生存权。也就是说，你可能还会因各种原因受到其它教内势力的攻击、被蚕食领土，但却很难从政治版图上将之抹去。

类似的先例在波兰、匈牙利等民族身上已经成功实践过了。波兰王国、匈牙利王国从罗马教廷获得的“准生证”，保证了它们今天仍然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民族国家的源头，往往都是溯源到它们的祖先归信基督教时。而这一次，立陶宛人则成为了“识时务者”。在击溃圣剑骑士团后，部落联盟性质的立陶宛地区，归信成为了教廷认定的“立陶宛王国”（公元 1250 年）。对于教廷来说，它并不在乎一片土地的统治者是谁、这片土地之上的居民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属性，它在乎的只是天主教徒的数量是否壮大。要知道不谈意识形态层面的神圣意义，单从经济上来看，每名天主教主必须将 1/10 收入交给教会（什一税），就足以刺激祭司们扩张天主教版图的欲望。

以中国人希望信仰、种族、文字、语言等诸多方面统一的高标准来看，教廷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十分短视的。不过教廷成为西欧最高权力阶层，并且以整合意识形态的方式，让西欧形成一定程度的统一，也是这一地区地缘结构松散、开放的特点所决定的。当然，天主教立陶宛王国的降生，并不意味着它和那些德意志骑士们之间的矛盾就化解了。在与教廷达成和解的同时，立陶宛王国也将西立陶宛的部分土地划给了圣剑骑士团，以此来终结与德意志骑士们的恩怨。同时也成为了插入骑士团国中间的一棵契子。

立陶宛寻求外援与基辅罗斯的政治格局

立陶宛固然可以用外交技巧谋得一个独立法人的地位，但政治终究是讲求实力的。

在条顿骑士消化普鲁士，圣剑骑士控制利沃尼亚的情况下，立陶宛人建立的国家能否长期生存下去是很值得怀疑的。对此立陶宛人也十分清楚，要想避免被步步紧逼的德意志人蚕食，必须在德意志乃至整个日耳曼系民族之外寻找外援。这个外援是谁呢？答案显而易见，只能是斯拉夫人。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能够与立陶宛人结盟共同应对德志意人的，应该有代表东斯拉夫人的“基辅罗斯”，与代表西斯拉夫人的“波兰”。不过前者恐怕是帮不了什么忙了。一是因为基辅罗斯也逃不过历史规律，在 11 世纪中叶版图扩张到顶峰后，很快就“受累”于“封建”体系建立，内部分裂为十几个国家。此时再提“基辅罗斯”，已经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而是一个地缘政治版块的概念了。当然，这种分裂对于波罗的人来说其实也是好事，否则这些已经扩张到白俄罗斯的罗斯人，一样会像德意志人一样，强势向波罗的地区扩张。

另一个削弱罗斯人实力的因素，是一场“黄祸”。几乎与北方十字军扩张同时，在亚洲草原崛起的蒙古人越过阿尔泰山，针对中西亚、欧洲开启了西征之旅（公元 1216 年）。公元 1241 年，通过第二次西征，蒙古人在欧洲战场取得了辉煌战果。不仅征服了南俄（钦察）草原、匈牙利草原，还向北攻占基辅、击败罗斯各国，迫使东斯拉夫人向蒙古人称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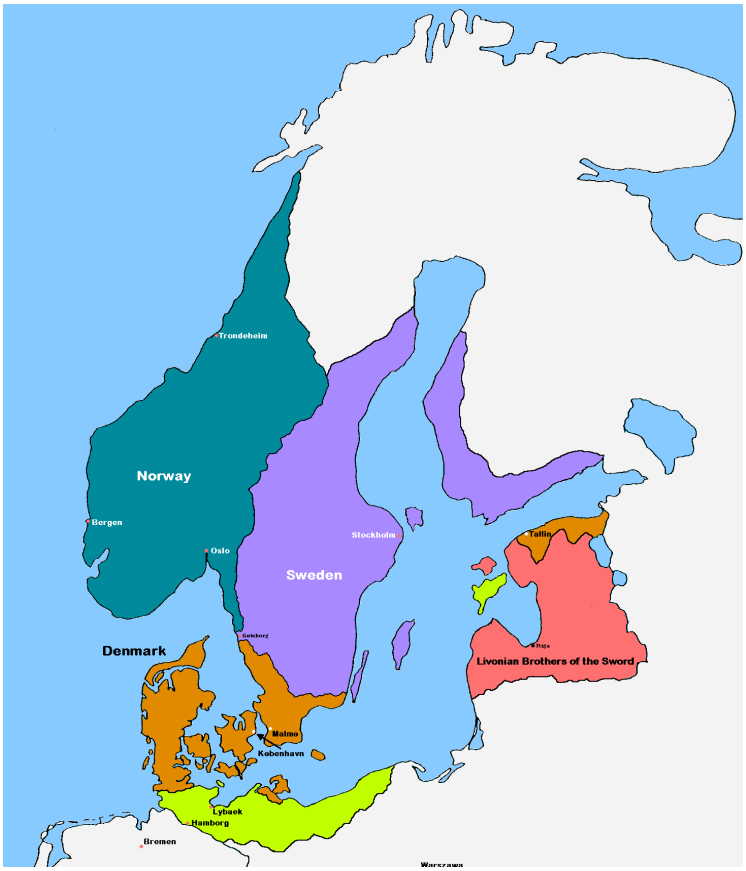
蒙古西征是结束“北方十字军”部分后的解读方向。现在我们关注的是这场游牧者的盛宴，对东斯拉夫人乃至波罗的海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什么样深远的影响。由于地缘属性的关系，蒙古人在欧洲（包括部分中亚草原）建立的“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直接控制区域只能在钦察草原以及边缘的“森林草原地区”。这意味着森林草原地带的：罗斯人的基辅城、保加尔人在伏尔加河中游的“伏尔加保加利亚”，都成为了蒙古铁蹄的直接驻地。而受北方森林保护斯拉夫人，则得以用称臣纳贡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半独立状态。

来自草原的强大压力，扭转了基辅罗斯时代，东斯拉夫人向钦察草原渗透势力范围的大势，让主动权重新回到了游牧者手中。为此东斯拉夫人的地缘政治中心，开始从第聂伯河中游的基辅，向森林深处、伏尔加河上游一带移动，并最终定位于莫斯科。这一旧一新两个中心，也造就了今天东斯拉夫三族中的两大民族：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了。那么三族中的另一个成员“白俄罗斯人”，又是如何独立成族的，与波罗的海的恩怨又有什么关联呢？

第二节 立陶宛向白俄罗斯地区扩张

斯堪的纳维亚人征服乌拉尔人

立陶宛之所以能够和德意志骑士们达成暂时和解，在于其放弃了西立陶宛的海岸线。虽然这损害了当地部族的利益，导致多年的内战，但德意志人在得到波罗的地区



13 世纪至 14 世纪早期的北欧国家

全部海岸线后，暂时也没有动力去向内陆地区渗透了。另外，当条顿－圣剑骑士团在波罗的海南岸扩张时，斯堪的纳维亚民族集团中的瑞典人、丹麦人，也在针对芬兰湾南北的乌拉尔人发动圣战。前者成功的将芬兰半岛纳为瑞典王国领土，后者则让爱沙尼亚北部变成了丹麦王国属地。

现在我们清楚了，所谓的“北方十字军”是由德意志十字军与瑞典十字军共同组成的，前者的征服对象主要为波罗的人，后者则针对的乌拉尔人。而芬兰、爱沙尼亚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也正是源于这一时期。现在的问题在于，丹麦人如果一定要在“爱沙尼亚”弄块飞地的话，与圣剑骑士团控制下的利沃尼亚，将会因地理分割不明显而潜伏长期冲突的隐患。纯粹从地理分割的角度来看，芬兰湾会更适合作为斯堪的纳维亚人与德意志人向东殖民的分割线。另外，以丹麦的地理位置而言，穿越波罗的海经营爱沙尼亚，也的确有些困难。

事实上，在完成征服之后，丹麦人并没有真正向爱沙尼亚进行过殖民（瑞典则向芬兰大量殖民）。基于丹麦与欧洲大陆相连的原因，丹麦人对向分裂的德意志地区渗透影响力会更感兴趣。因此在征服爱沙尼亚北部一个多世纪后，这块丹麦属地被卖给了圣剑骑士团（公元 1346 年）。就此德意志人算是完成了对整个波罗的地区海岸线的征服工作。上述进程也告诉我们，借助北方十字军东征，波罗的海成为了日耳曼人的内海。至于一南一北两支日耳曼人：德意志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们后面会有所解读。

立陶宛完成对白俄罗斯的征服

回到立陶宛的问题上来。尽管还顶着“波罗的人”的标签，但在立陶宛交出波罗的海海岸线的那一刻起，波罗的人就已经不在是波罗的海地缘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者了。如果不想慢慢在夹缝中消亡的话，立陶宛人也必须在领土扩张上有所作为。对于立陶宛人来说，非常有利的一点是，此时正是蒙古帝国西征的高峰期。曾经强大的“罗斯人”（东斯拉夫人），已经被蒙古人严重削弱。并且在东斯拉夫人已经臣服于蒙古人的背景下，德意志人也希望有立陶宛人居中缓冲，隔绝那些可恶的“鞑靼人”（使之可以



条顿战争示意图

放心经营波罗的海）。就这点来说，立陶宛人避免踏古普鲁士人的后尘，蒙古人还真是“帮”了点忙。

从地理角度看，“白俄罗斯”正处于东欧、波罗的地区的板块交汇处。向西经现在的拉脱维亚、立陶宛注入波罗的海的尼曼河、道加瓦河，与向南经乌克兰注入黑海的第聂伯河，均发源于此。实际上，波罗的人比斯拉夫人更早居住于白俄罗斯地区，在东斯拉夫人借助“基辅罗斯”崛起后，白俄罗斯成为了东斯拉夫人的领地。现在，东斯拉夫人的明显处在衰弱期，而已经对波罗的海没什么想法的立陶宛人，则开始了在白俄罗斯地区的强势征服。14 世纪初，白俄罗斯地区成为了立陶宛的一部分。

后来的历史中，白俄罗斯地区在立陶宛和俄罗斯（包括其前身莫斯科公国）之间几经易手。至于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强大的俄罗斯帝国笑到了最后。从地缘的角度来看，这种博弈的焦点地区，一定会存在民族融合的情况。也就是说，从种族上来说，所谓“白俄罗斯人”混合了东斯拉夫人和波罗的人的成分。不过这两支民族在种族上，都属于原始印欧人的后裔。融合的结果，无非是一些原本说波罗的语的印欧人，变成了说东斯拉夫语的印欧人。



白俄罗斯人

有人认为，白俄罗斯之所以有个“白”的前缀，是因为他们要比另两个东斯拉夫民族更“白”，种族上更像纯斯拉夫人。虽然就“白俄罗斯”之名来说，这种说法无从考证。但相比领地与钦察草原相接，混入更多亚洲游牧者基因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来说，主要与波罗的人做地缘融合的“白俄罗斯人”，在种族上的确更接近原始的东斯拉夫人。至于东斯拉夫源头，还应该是乌克兰人的骄傲。当然，在把东

斯拉夫人推向世界之巅的俄罗斯人看来，这些都不重要。

第三节 波兰与立陶宛的结盟

德意志人吞并作为波兰出海口的波美拉尼亚

蒙古崛起所引发的蝴蝶效应，波及了整个旧大陆。不过立陶宛能够长期保持族群独立，直接能够借力的还是同样直面德意志威胁的波兰人。从板块位置上来看，立陶宛的强大，将使条顿骑士团（包括其所属的圣剑骑士团）在波罗的海的领地，随时可能被一分为二；同样的，除非波兰放弃成为一个沿海国家，否则普鲁士——利沃利亚之于德意志本土，也同样是一块飞地。

将普鲁士与德意志本土隔离开的这块沿海低地，是位于奥得河口和维斯瓦河口之间的“波美拉尼亚”。波美拉尼亚一词的原意为“海岸”，地理上看是一片遍布冰碛湖的低地（波美拉尼亚湖区）。从农业角度来说，这片因冰川作用而缺乏土壤肥力的土地，价值并不大。不过德意志人需要它漫长的海岸线，完成波罗的海南岸的德意志化进程，而波兰人则同样需要出海口。在“普鲁士”因条顿骑士的入驻，变身成德意志化的地缘标签后，波兰能不能保住“波美拉尼亚”，在战略上看就很难说了。



条顿战争示意图

12 世纪末波兰王国陷入分裂，正处在高峰期的神圣罗马帝国（巴巴罗萨统治时期）抓住时机吞并了西波美拉尼亚。此后波兰人能够控制的，只是维斯瓦河入海的“格但斯克湾”地区（核心城市为“但泽”），即所谓的“东波美拉尼亚”地区。然而时间推移至 13 世纪初，羽翼丰满的条顿骑士团征服了东波美拉尼亚。这片土地后来也被打上了一个新的地缘标签——西普鲁士（维斯瓦河河口以东，则为“东普鲁士”）。

从两个方向蚕食波美拉尼亚的德意志人，终于完成了对波罗的海南部沿海地带的

全控制，接下来他们的重心，将是如何做大波罗的海经济的问题。至于悲催的波兰，则像立陶宛那样，变身成为了一个内陆属性的国家。由于欧洲内部分割严重，很难有一个地缘政治板块，能够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也就是说，不管你自身的经济侧重于哪方面，对外贸的依存度都很高。问题是，内部各种层级的封建割据，让陆地商路的畅通变得异常困难。相比之下，海洋贸易的自由度要大的多。由此可见，丧失出海口的将对一个民族和国家将造成多么大的伤害。

波兰与立陶宛结盟共同对抗德意志人

波兰与立陶宛人的同病相连，让二者之间有了形成联盟的基础。公元 1378 年，立陶宛与通过与波兰联姻结为了同盟，并开始共同为重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而努力。这一联盟的形成，也往往被认定为是立陶宛成为天主教国家的真正开始。因为在 13 世纪中，立陶宛人在罗马教廷“注册”为天主教徒之后，并没有完全的天主教化。在以宗教守护者自居的德意志骑士团看来，这些波罗的人仍然保持了很多之前的“多神”信仰恶习。从教廷的角度来看，波兰人能让立陶宛人变成“真正”的天主教徒，也算得上是大功一件了。

当然，波兰人与立陶宛人结盟，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打破德意志人对波罗的海岸线的垄断。就战略方向而言，波兰人可以在西波美拉尼亚和条顿骑士团控制下的东、西普鲁士中作出选择。不过只有把骑士团作为博弈对象，这种联合对立陶宛人才有意义。因此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波兰人实际放弃了拿回“西波美拉尼亚”，将臣服条顿骑士团（包括后来的普鲁士公国）作为自己的战略重心。而立陶宛人的野心，往小了说是拿回割让给圣剑骑士团的西立陶宛地区，往大了说则是希望利沃尼亚的波罗的人（拉脱维亚人），也能归入自己的阵营。

第四节 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

“波兰——立陶宛”联盟，对阵“条顿——利沃尼亚”骑士团，这就是 14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中欧平原东部的地缘博弈格局。单纯从板块实力来说，拥有大陆纵深的波兰－立陶宛联盟显然要更强。至于骑士团则更多要指望，来自德意志方面的战略支援。然而对于这些“僧侣骑士”而言，与波兰－立陶宛人之间的战争，却是很难上升为德意志国家、民族之战的高度。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神圣罗马帝国，自红胡子巴巴罗萨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强势集权的迹象。当神圣罗马帝国强大之时，名义上统治意大利的皇帝们，总是希望能够进军罗马，让教廷为自己的世俗政权服务；而当德意志内部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时，教廷也一定会抓住时机，进一部分裂“神圣罗马帝国”，以避免自己被边缘化。

在波兰与立陶宛结盟前夕的 14 世纪中叶，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这种权力之争，终于以一种看似民主的方式固定了下来。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七个地缘政治代表，被

认定为具有选举“罗马皇帝”资格的“选帝侯”。包括三个主教区：摩泽尔河谷－洛林高地的“特里尔大主教”；莱茵河下游平原的“科隆大主教”；中德山地－美因河流域的“美茵兹大主教”。四个世俗体系的诸侯国：波希米亚高地的“波希米亚王国”；代表易北河以西低地区的“萨克森选侯国”；代表易北河东低地区的“勃兰登堡选侯国”；统治莱茵河中游的“莱茵－普法尔茨选侯国”。

看起来神圣罗马境内每个版块似乎都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不过且慢，以德意志的三级地形来看，尤为重要的巴伐利亚高原为什么不在其列？要知道，巴伐利亚不仅是高地势力的代表，也是多瑙河流域的重要板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德意志人都不可能忽视它的存在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莱茵河中游的“莱茵—普法尔茨”，与巴伐利亚当时同为一个家族统治（巴伐利亚－普法尔茨）。让一个家族获得两个选帝侯资格，无疑为当时的政治竞争者所不容。

如果说巴伐利亚的落选让人有些意外，那么从地缘属性上看，“波希米亚王国”的入选，也同样让人费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片以捷克盆地为核心的二级高地，本身的地缘属性还是斯拉夫，准确的说是西斯拉夫人中的捷克人之地。基于它位于易北河上游的枢纽位置，德意志民族如果想在与西斯拉夫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的话，这片高地的归属将至关重要。而在波兰人成为西斯拉夫板块的核心之后，捷克人也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是与波兰人联合共同对抗德意志人，还是在保持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加入神圣罗马帝国。最终捷克人选择了加入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人所给出的条件是，给予波希米亚以最高的政治待遇（王国），并且保证本地捷克贵族对国王的选举权。相比较之下，与同属西斯拉夫民族的波兰人联合，却未必对保持捷克的民族独立更为有利。

由于波希米亚王国的新统治家族，同一时期也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308——1437 年），使得波希米亚王国的政治地位，在神圣罗马帝国中达到了最高。尽管需要推出“选帝侯”制度，以“民主”的方式解决皇位之争，但没有谁会在自己主导制定的规则中把自己排除在外，因此波希米亚获得选帝侯资格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过即使纯粹出于地缘政治角度，给予成为波希米亚一个选帝侯地位也是合适的。毕竟这一板块是如此的重要和异类，高规格的政治待遇有利于让这个顶层德意志、中下层捷克的王国，稳定留存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体系内。

回到条顿骑士的战略后援问题上来。七大选帝侯中有三个是由教廷任命的“主教”，由此可见教廷对德意志民族分裂所造成的影响。基于条顿骑士团受命于教廷的宗教属性，它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关系的微妙性，也就可想而知了。换句话说，即使神圣罗马帝国在政治上得以统一，也很难倾力去支援与“波兰－立陶宛”联盟对抗的“条顿－利沃尼亚”骑士团。那么这些骑士们最终选择了什么方式艰难生存下来，又反过来对德意志本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第五节 格伦瓦德战役

条顿骑士团对决波兰立陶宛联盟

公元 1410 年，一场改变中欧地缘政治格局的战争拉开了序幕。这场由波兰－立陶宛联盟发起的，针对条顿骑士团的战争，也被称之为“条顿战争”。不过要说战争的始作甬者就是波兰、立陶宛人，也的确有失公允。因为德意志骑士们也非常清楚，两国形成联盟之后将对自己造成多么大的威胁。所以双方都在战争之前，做足了准备。由此所对决出的结果，也可以说真实反映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从战略层面看，这场对决也很有点日耳曼——斯拉夫大 PK 的意味。条顿骑士所能招募到的志愿者、雇佣军，主要源自德意志、法兰西，甚至英格兰、瑞士等日耳曼系天主教国家；而波兰、立陶宛人则主要从分裂后的东斯拉夫人（罗斯等国）、波希米亚的捷克人（西斯拉夫人），甚至游牧民族（鞑靼人）那里雇佣外援。当然最终谁能获胜，还是要看双方自身的实力，因为打仗就是打钱，不管是自己的军队还是雇佣军都是要花钱的。



条顿战争示意图

波兰人的战争目标，锁定为维斯瓦三角洲为中心的“西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100 年前，在条顿骑士夺得了这片土地之后，将自己的政治中心迁移至维斯瓦三角洲，并依河修筑了一座著名城堡——马林堡（Marienburg，今波兰马尔堡）。攻下马林堡的话，不仅意味着拿回“西普鲁士”，更能给条顿骑士以致命打击。不过最终的决战并不是发生在马林堡，而是在今天波兰北部，东西普鲁士相接的格伦瓦德（Grunwald）。这是因为条顿骑士也想通过一场野战解决问题，所以在波兰、立陶宛大军西进时主动

前往迎击。

格伦瓦德战役之所以著名，很大程度是因为双方投入的兵力总计有 6 万（条顿方面稍少 5000）。虽然在动辄以数十万计的中国战争看来，这点兵力似乎算不了什么，但在以重装职业军人为主的欧洲中世纪战场，这样的规模还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双方都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东西来，以期望一战而解决问题。就以往类似决战来看，总有一方会彻底的悲剧。



格伦瓦德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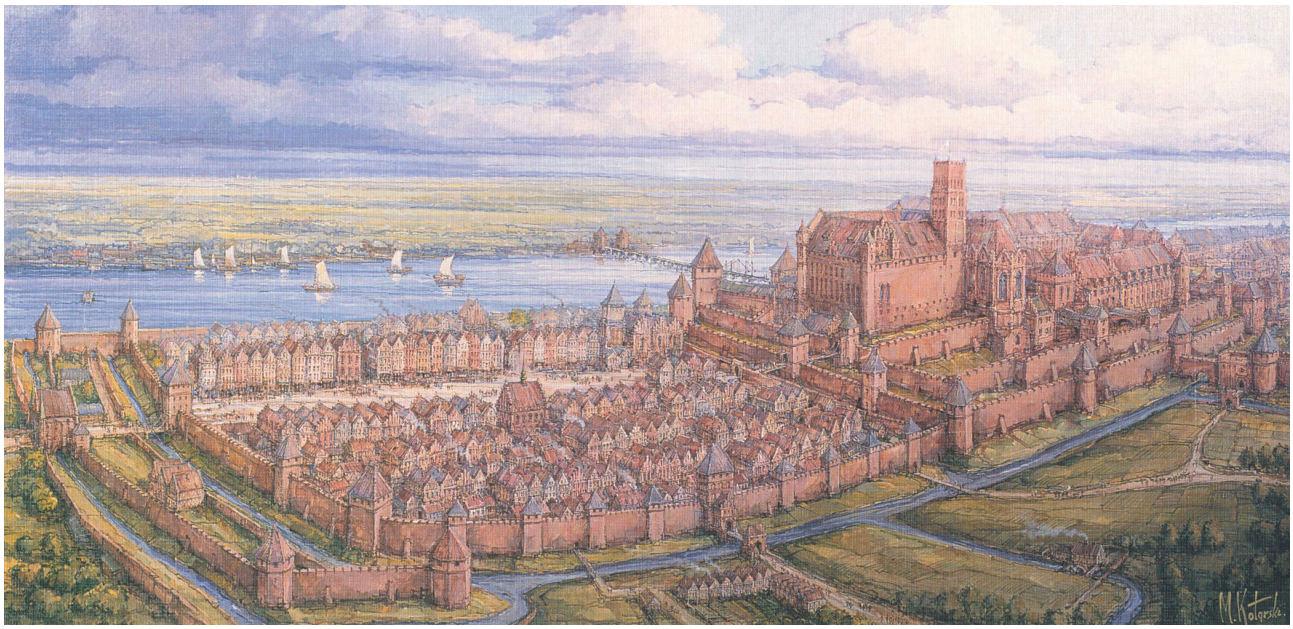


马林堡（今波兰马尔堡）

条顿骑士团的战败

格伦瓦德战役的最终结局，被很多人形容为“条顿悲歌”。从这个名字大家应该

也猜到了，条顿骑士们赌输了国运。2.7 万兵力条顿骑士中，有 85% 阵亡或者被俘（并损失了几乎所有的指挥官），可以算得上是全军覆没了。然而乘胜追击的波兰、立陶宛人，也没能一战而攻陷马林堡，彻底征服普鲁士。经过一个世纪的经营，马林堡已经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城堡了。在这片低平的土地上，一座依河而建、防御力强的城堡，军事和地缘政治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马林堡

就像君士坦丁堡依海峡而建的位置，以及它那坚固的城防体系，曾经多少次的挽救拜占庭帝国命运一样。马林堡和其它几座坚固的城堡，使条顿骑士避免了一战而灭国的命运。鉴于波兰、立陶宛联军中大量外国雇佣军的背景，对手也不希望此时把战争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军费压力大）。最终在答应交付巨额战争赔款后，条顿骑士团与波兰、立陶宛人签订了停战协议。只是谁都知道，对于还没有达成心愿的波兰人来说，“条顿悲歌”还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第六节 十六年战争

普鲁士联盟与波兰结盟对抗条顿骑士团

时间看起来对获胜方的波兰、立陶宛人来说更为有利。要知道，条顿骑士虽然将原属波兰控制的东波美拉尼亚变成了“西普鲁士”，但就控制力来说却比不上从普鲁士人手中夺来的“东普鲁士”。 这是因为“西普鲁士”的主要居民为西斯拉夫人，同时也存在很成熟的本地贵族阶层。条顿骑士在维斯瓦河三角洲的扩张，以及随之涌入的德志意移民严重影响了原住民的利益，使得他们与德国人的矛盾愈发尖锐。事实上，在德国人介入之前，整个波美拉尼亚地区的波兰化进程本来也尚未完成。换句话说，那些拥有海洋贸易之利的波美拉尼亚诸部（也属西斯拉夫人），还没有想好是否

要成为内陆属性的波兰王国的一部分。

然而被条顿骑士和波兰人夹在当中的“西普鲁士人”，终究还是明白现实已经没有可能谋求完全的独立。在波兰、立陶宛联盟发动战争时，维斯瓦三角洲的“西普鲁士人”也因应组织了自己的联盟，宣布效忠波兰，以图借势摆脱德国人的控制。尽管战争以条顿骑士团的妥协，并保有西普鲁士而结束，但“西普鲁士”在地缘政治上摆脱条顿骑士团控制的种子已经播下了。在双方的和约中，甚至明文约定了如果条顿骑士团不履行赔款等义务，西普鲁士人就有权力进行军事反抗。

简单点说，格伦瓦德战役虽然没有为波兰人夺回维斯瓦河三角洲的控制权，却已经为条顿骑士团的衰弱埋下了种子。要知道，条顿骑士为赎回被俘骑士和结束战争，所需交付的战争赔款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英格兰十年的财政收入）。而波兰人的做法，不由得让人想起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后，“放”迦太基人一马的罗马。当迦太基人辛苦的通过 50 年，履行完战争赔款义务后，罗马人很快便通过第三次布匿战争，把这次下完了蛋的母鸡给宰杀了。

由于要支付战争赔款（必须加重税收），条顿骑士们与本地居民尤其是西普鲁士境内斯拉夫人的矛盾愈来愈激烈。公元 1454 年，后者所组成的“普鲁士联盟”与波兰王国结盟，再一次针对条顿骑士团发起了战争。比起 40 多年前所依靠的那些雇佣军，这股来自普鲁士内部、为自身利益而战的力量，显然要更靠谱的多（当然，这次依然会有雇佣军）。这也使得战争陷入了长达 13 年的拉锯状态，并因此而被称之为“十三年战争”（公元 1454-1466 年）。

与上次对决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战争并非是发生在两个联盟中，而是波兰和条顿骑士之间的 PK。一方面立陶宛人在格伦瓦德战役结束后，通过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施压，从条顿骑士团手中已经拿到了一个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今立陶宛帕兰加）。加上在白俄罗斯方向，要应对崛起的莫斯科公国，因此对参与这场战争基本没有兴趣。至于本该给条顿骑士团以支援的宝剑骑士团，也以利沃尼亚也自身难保为由，拒绝给予条顿骑士以支援。加上西普鲁士人的“起义”以及财政危机，内忧外患的条顿骑士们已经完全没有胜算了（尽管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可圈可点）。

抛开影响战争本身的那些直接因素不谈，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条顿骑士的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在整个波罗的海沿海都已经基督化的情况下，以扩大基督徒版图为己任的“骑士团”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显然已经没有了法理上的依据。这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条顿骑士团也好、圣剑骑士团也罢，越来越难以从西欧招募拥有崇高理想的志愿者了。当然，你也可以依靠雇佣军一类的外援，来获取一场战争的胜利，前提是你要有钱。只是对于财政捉襟见肘的条顿骑士来说，能用来买忠诚的钱是越来越少了。事实上，马林堡最后被波兰人所攻破，就是因为波兰人有钱给对手欠薪已久的雇佣军“发工资“（使其主动撤走）。

条顿骑士对波兰妥协得以保留东普鲁士

唯一有可能帮助条顿骑士避免灭国命运的，可能只有教廷了。然而成功让立陶宛进入天主教世界的功绩，足以让波兰人在教廷方面得到更多的加分。更何况教廷也实在想不出理由，为什么要在一场天主教廷的内部争斗中，去偏向条顿骑士。在这种情况下，条顿骑士和他们的信仰被历史所淘汰，几乎是必然的。

虽然波兰人占据了优势，但要想完全消灭军事能力上佳，又在普鲁士经营了两百多年的条顿骑士团，也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波兰人的设想，是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逼迫条顿骑士团离开普鲁士，南下德涅斯特河中游（乌克兰靠近摩尔多瓦西北边境的波多利亚地区），去针对南俄草原的鞑靼人开展“圣战”。基于骑士团的定位，以及大势已去的局面，条顿骑士团很难有理由拒绝这个要求。只是骑士们也很清楚，波兰人当然不在乎的是条顿骑士们有没有地方圣战，他们指出方向的原因，只在于将这尊自己“请”进来的神送走。为此，条顿骑士团并没有简单的拒绝波兰人的提议，而是希望在保留普鲁士的前提下，派军南下圣战。很明显，这并不能让波兰人满意。

这场前后纠结了半个世纪的“条顿战争”，最终还是以一种政治上的妥协而宣告结束。就地缘政治层面来说，双方的方案包含两个方向：一是条顿骑士的团的“西普鲁士”，重新变成波兰王国领土的一部分（定位为自治省）；而继承保有“东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则成为波兰王国的臣属附庸。以结果来说，波兰人最起码在法律层面上，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即定目标。

尽管失去了西普鲁士，并且被迫成为波兰王国的藩属，但条顿骑士们还是艰难的在波兰－立陶宛联盟的包围下，保住了自己的根基之地。这也为日后普鲁士的崛起，以及德意志的统一、东扩埋下的伏笔。而从地理层面来看，条顿骑士们选择的是一块拥有漫长海岸线，并且能够通过海路与母国连通的“活地”，是他们能够在此顽强生存下来的根本原因。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德国人当初留在特兰希瓦尼亚高原，或是接受波兰人的建立跑到乌克兰去圣战，还有没有可能东山再起？

第七节 汉萨国盟的形成

波罗的海经济圈形成背景

既然波罗的海对条顿骑士团起了那么大的支撑作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很有必要以这片海为中心，解读一下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了。在地中海的十字军东征过程中，以威尼斯、热那亚为代表的海上共和国，一直在东方骑士团国的生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波罗的海，又有没有类似的商业之手在幕后捉弄一切呢？答案是肯定的，它就是——汉萨同盟。

由于地缘位置远离地中海，以及土壤较为贫瘠的原因，德意志北部低地区的经济，在中世纪时远不如多瑙河、莱茵河所处的高地区发达。同时，经济的欠发达也导致了

北德地区的民风更具侵略性。从查理曼东扩时最大的阻碍——萨克森人，到后来再次统一德国的“普鲁士王国”，在军事上的强势都与这一地缘背景都有莫大的关联。当然，这并不代表北德地区经济上就没有发力点了。要知道，欧洲南部地区之所以能够在文明和经济上先发，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地中海成为了沟通周边地区的商业平台，促进了地区的发展。

单纯从“海”的层面来看，地中海并不是欧洲所面对的唯一海区。事实上整个欧洲都可以被形容为一个半岛结构。如果说欧洲南部所面对的是地中海－黑海两个内海区，那么欧洲北部对应的则是波罗的海、北海两个海区（前者为内海，后者为边缘海）。问题在于，文明总是在物产较丰富、气候较温暖的地区先发。就这点来说，地中海周边的条件就要好得多了。这一地区的欧洲人，可以很方便的通过贸易，从西亚、北非的先发文明中汲取养分。希腊、罗马文明也是受益于此而产生的。

然而在经过法兰克、神圣罗马帝国、维京人等日耳曼族群的扩张洗礼，以及波兰人、罗斯人等斯拉夫人通过归化基督教融入欧洲，整个欧洲内部在文明层级上的代差，在中世纪中期已经被拉平了。这意味着之前被边缘化的波罗的海、北海沿岸地区，不再只是地中海地区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给地，有了打造出一个“北地中海地缘圈”的，并反过来把影响力向内陆延伸的基础。

说到这里，要说一下分裂和统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一直以来关于分裂还是统一，谁更有利于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不同的意见。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只是一个度的问题。过度的统一会对多样性、创新产生消积影响。比如在东亚一家独大的中央之国，之所以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内，只是在周而复始的王朝重复，缺乏质的突破，正是因为缺乏竞争。同时，过度的分裂也一样会造成巨大的消耗。欧洲在中世纪时相比罗马时代的文明倒退，不稳定的政治结构要负非常大的责任。

那么分裂与统一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平衡点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其实也是我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将地球划分为一个个“地缘板块”的原因所在。一个能够形成一定自给能力，并且有安全感的政治体，最起码要能覆盖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以这个标准来看，高峰期能分裂为 1000 多块相互独立，犬牙交错领地的德意志，显然是不合格的。比如在经济上所造成的最大问题是，由于对外贸易要通过 N 多独立领地、面对太多不确定因素，德意志内部在经济上无法形成合力。



汉萨同盟示意图

汉萨同盟形成的内外条件

在欧洲这种碎片式结构地区，真正起作用于串连起各个群体的并非是信仰，而是商人和商业利益。基于利益的驱动，以德意志北部为贸易腹地的商人，在 12 世纪就开始寻求打造各类商业联盟。以期通过莱茵河、易北河等北流入海的河流，打通德意志的海外贸易线。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聚集于大河下游的商人。如莱茵河下游的科隆、易北河下游的汉堡。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商业联盟还只是商人自发性质的（汉萨的原意即为“商会”），并没有升级成为政治行为。

对于政治上破碎得不能再破碎的德意志地区来说，以商业规则来减少彼此的消耗，形成一定程度的统一，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德国破碎的地缘政治结构，让商人们有了巨大的获益空间。就像同样破碎的意大利，让威尼斯、热那亚这样的商业共和国，有机会收获比传统君主国更大利益一样。很显然，当商人们的经济实力累积到一定程度，他们势必将在政治层面发挥影响力，甚至成为政治的主导者。这也为将“商人同盟”上升为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政治同盟”奠定了基础。14 世纪中叶，一个以政治体为单位，覆盖莱茵河口至芬兰湾区间内所有海岸线，以及大部北德低地区的地缘政治同盟——汉萨同盟开始形成。

所谓“汉萨同盟”，直白些说就是“德意志政商同盟”，再具体点则是“北德意志政商同盟”。德意志属性的这个政商同盟能够形成并壮大，“条顿骑士团”在波罗的海南部的做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垄断才能产生最大的利益，为德意志民族执行东扩任务的德意志骑士们，成功的将控制线延伸到了芬兰湾南岸，使得失去出海口的波罗的人、西斯拉夫的波兰人，甚至东斯斯拉夫的罗斯诸国，都不得不成为了德意志商人的商业腹地。

当然，作为商业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条顿骑士团国也从中收获了大量利益，并得以立国。这一模式也与威尼斯、热那亚商人，与十字军骑士国的合作，本质上是一样的。然而当我们在谈德意志势力在波罗的海、北海的存在时，却不能忘了同样在这两片海洋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的另一股势力——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些以“北欧海盗”标签扬名天下的北欧人，在北海及波罗的海的早斯开拓，我们之前已经详细解读过了。而德意志骑士们在波罗的海参与的“北方十字军东征”，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同样没有缺席。

就波罗的海控制权争夺的参与者来说，主要分为两大族群：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前者内部又可分为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南部的德意志人；后者则包括波兰人（西斯拉夫人）和罗斯人。至于抵达波罗的海沿岸，比上述族群都早的乌拉尔人（如芬人）、波罗的海（如立陶宛人），在中世纪时已经没有能力成为主角了。从地缘战略上看，13 世纪的所谓“北方十字军东征”，实质是斯堪的纳人、德意志人以传播天主教为名，分别从北、南两个位置分别向东进行的殖民扩张。

斯堪的纳维亚人与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所形成的势力分割线，大体就是日德兰

半岛与芬兰湾之间的连线。纯粹从几何分割的角度看，这不失为一条合理的南北分割线。然而还是那句话，垄断才能利益最大化。一个海区出现两个实力相当的主角，竞争是再所难免的。那么，在德意志人组成“汉萨同盟”这样的政商联盟之后，斯堪的纳维亚人又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应对这个拥有更大腹地的竞争者呢？

第六节 卡尔马同盟的建立

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共主联邦形成政治联合

在商业力量主导下统一的汉萨同盟，无疑对北德意志，乃至整个德意志经济的推动，起到了巨大作用，并为德意志植入了属于自己的工商业基因。要知道，尽管曾经有过进军罗马、加冕“罗马皇帝”这样的政治成就，但自罗马时代以来，“日耳曼尼亚”在经济、文化上无疑都是西欧的边缘地区。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根源又在于自身没有开放的“海洋商业平台”（因此而缺乏文化上的创新）。也为了与汉萨同盟相抗衡，同样不甘于被欧洲边缘化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急需找到属于自己的联合方式。

与汉萨同盟的商业方式不同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统一”办法是政治性的。不过政治性的统一，并不只意味着东方式的大一统或者说中央集权。在多样性的欧洲，选择的弹性要大的多。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方法是“共主联邦”，即丹麦、瑞典、挪威三个北欧国家，在保持各自内政独立的前提下，共尊一位君主。由于条约签订地在今瑞典南部的卡尔马城，这个政治同盟也因此被称之为“卡尔马同盟”（公元 1397 年）。

从技术上说，在欧洲各国王室中，找出一个血统上有资格为各方认可的君主，形成“共主联邦”的形式并非难事。难的是这种法律层面上的统一，如果没有地缘基础的话，很难为地方势力所认可，并且形成事实的合力。比如在卡尔马同盟形成之前，德意志梅克伦堡公国的君主，就因为姻亲继承的关系得到了瑞典的王位，并在表面上形成了所谓“瑞典——梅克伦堡共主联邦”（公元 1364 年），但事实上，这个德意志人即无法得到瑞典人的认可，也无法让他名下的两块土地形成合力。最



卡尔马同盟

终，斯堪的纳维亚属性的瑞典，还是选择加入了由丹麦人主导的“卡尔马同盟”。

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卡尔马同盟所共尊的这位君主是位源出丹麦王室的女性——玛格丽特女王一世，这也使得她成为欧洲中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就共尊一位君主的特征来看，这一时期的北欧似乎可以用“北欧大帝国”来形容了。不过一个政治体能用“帝国”来形容，政治上的集权度要很高。而对于一开始就只是为了避免彼此消耗、维持各自独立的卡尔马同盟来说，帝国体制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建立。这也意味着，这个政治体最多只能用“联邦”来形容。

丹麦与瑞典在同盟内的龃龉

丹麦人之所以能够主导卡尔马联盟，是因为它的地缘潜力更大。虽然从面积上来看，丹麦好像是三国当中最小的，但人口数量从来不是由单纯的面积来决定的。纬度更低的丹麦，当时的人口数量是其它两国的总和。另一个有利因素，是因为丹麦所主控的日德兰半岛，不仅与欧洲大陆相连，并且还能兼顾北海与波罗的海。相比之下，瑞典之于北海、挪威之于波罗的海就很难辐射力量了。上述地缘特点，其实在维京时代就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实力上的略胜一筹并不意味着，丹麦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的“北欧大帝国”。

丹麦人在政治统一北欧问题上，最大的障碍是瑞典。原因在于瑞典是三国之中，最有扩张空间的国家。要知道丹麦人试图向南扩张的话，必将会遇到德意志人的强烈反抗。至于挪威人，除了在北海北部征服几个岛屿以外，并没有办法更进一步。在维京征服中，二者在地缘政治上能有多大空间，都已经用时间验证过了。相比之下，致力于在波罗的海东部打拼的瑞典，反而会有更大的空间。这并不是说，瑞典人在维京时代突破至东欧平原，建立基辅罗斯的业绩，要比那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兄弟更值得炫耀。事实上，这就像诺曼人虽然貌似建立了横跨英吉利海峡的帝国，但最终却是为他人做嫁衣的情况一样（不过是“帮助”东斯拉夫人了罢了）。

瑞典人的真正空间在于芬兰半岛，及乌拉尔人所覆盖的亚寒带针叶林地带。尽管这一地区人口潜力非常小，但丰富的自然资源却还是能够提升瑞典的贸易价值。这一点，有如后来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一样。在那场征服当中，用来供应欧洲市场的毛皮，成为了哥萨克有兴趣前往东方开拓的主要动因。当然，俄罗斯人所代表的东斯拉夫人，同样对东欧平原北部的亚寒带的自然资源感兴趣，后面我们会解读到，俄国人和瑞典人因此而暴发了多少场战争。

借助北方十字军东征以及之前的渗透活动，瑞典人已经控制了气候相对较温暖，也是最具人口潜力的芬兰半岛南部，及从芬兰湾北部到波罗的尼亚湾的海岸线。这使得瑞典有实力在卡尔马联盟内部与丹麦意见相左，并成为这个共主联邦内部所潜藏的主要危机。相比之下，实力最弱的挪威，被丹麦人控制的力度要大的多。在卡尔马同盟正式成立之前（公元 1380 年），两国就已经先行通过共主的方式合并了。维京时代为挪威人所征服的格陵兰、冰岛、法罗群岛，也随之成为了丹麦领地。而到了 16



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示意图

世纪初，在瑞典退出同盟之后，丹麦仍然能够控制挪威，甚至将之变成自己的一个省。

除了上述领地之外，卡尔马联盟中还有一块由丹麦人控制的领地，非常具有地缘政治意义。仔细观察今天的地图我们会发现，日德兰半岛并非丹麦全控，它的南部有一部分是归属德国的，其地缘标签为“石勒苏益格”。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归属权，一直在丹麦与德国之间摇摆。卡尔马同盟建立之前，这个敏感点在政治上倒向的是德意志。不过以地理分割的角度来看，从石勒苏益格地区南部，连线至基尔湾中部，应该是一条比较理想的分割线。丹麦人看起来也是这样认为了，以至于它可以把爱沙尼亚北部卖给利沃尼亚骑士团，但却一直希望能够控制“石勒苏益格”地区。

卡尔马同盟建立之后，地缘政治上最大的进展，应该就是帮丹麦在 15 世纪中控制了石勒苏益格地区。以至于 19 世纪中后期，普鲁士王国崛起之后，这一地区才归为德意志第二帝国所得。需要说明的是，丹麦人也并非一无所得。因为历史上的“石勒苏益格”地区，并不全在现在的德国境内，也包括丹麦南部的部分土地，其北界大致与丹麦三岛中最靠近日德兰半岛的“菲英岛”北缘持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石勒苏益格地区以公投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归属。最终北部成为丹麦领土，而南部则留在了德国。



第四部分

蒙古西征

第二十一章 西辽和花剌子模在中亚的兴起

第一节 辽王朝的崛起

蒙古人的西征事业

波罗的海恩仇录我们可以暂放一段落了。从这部分内部中，大家看到的更多是关于海权的争夺，以及海商对欧洲文化、政治的深远影响。相比于欧洲地缘属性中这种明显的海洋性，欧洲大陆另一端的情况要“大陆”的多。尽管东亚大陆同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央之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使得海洋在亚洲东部的作用空间非常之弱。至于身处北亚的草原游牧民族来说，海洋性更是无从谈起。为什么要在解读欧洲时，再次提到这些可怕的“黄祸”（对欧洲人来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十字军的事业即将烟消云散时，“异教徒”们再次对欧洲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而这次入侵的发起者，正是来自北亚的“蒙古人”。

蒙古人自成吉思汗而起的征服事业，尤其是他们在东亚扩张，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现在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大多数人不太熟悉的“蒙古西征”的故事。大多数时候，成吉思汗在公元 1219——1224 年亲自领导的，针对中亚“突厥斯坦”（中亚两河流域）的征服，会被定性为第一次蒙古西征。不过此前针对“西辽”的征服（公元 1217——1218 年），其实才是西征的真正开始。两次西征在地缘政治上的共性，在于将天山南北的绿洲农业带，纳入了蒙古帝国的范畴。

天山及其西向支脉“卡拉套山”，是我们从环境、气候角度认定的中亚农、牧经济地理分割线。其中的绿洲农业区以天山为界，可划分为西部包括锡尔河上游、阿姆河沿线农业区的“两河地区”，以及东部的塔里木盆地。在发起西征之前，蒙古人已经越过阿尔泰山进入了准噶尔盆地，驻马于巴尔喀什湖和天山之北。从技术上看，蒙古人可以选择进入中亚草原的核心——“七河地区”，沿天山北麓一路西行入侵锡尔河、阿姆河流域；也可以在征服七河草原之后，先行进入塔里木盆地。最终蒙古人的选择是先行征服塔里木盆地，而此时统治这个封闭盆地的，是一支我们熟悉的马上民族——契丹人。

辽与北宋的对峙

契丹所建的“辽”王朝与北宋王朝在东亚的恩怨，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契丹人本身以及他们与宋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都有些特别之处。通常情况下，中原王朝的北方威胁会被认定为来自两个方向，即：蒙古高原的草原游牧民族，以及东北地区的森林渔猎民族。然而各种典型环境相接之处，又总会有些兼具两者特征的缓冲地带。位于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之间的，那条连接东北平原与蒙古高原的战略通道，就是一条兼具森林、草原地貌特征的缓冲地带。辽河西源的西拉木伦河，是

这条通道的核心河流。

崛起于西拉木伦河的契丹，最初的属性亦为渔猎、游牧混和的形态。不过相比游牧、农耕来说，渔猎毕竟属于较低层级，因此在后来的发展壮大中，西征蒙古高原，南入华北平原－山西高原北部的“辽”王朝，成为了一个兼容农牧的大帝国。以长城为界的“南农北牧”两大体系并立的格局，是这个帝国最大的地缘特征。为维持这个二元帝国的存在，契丹人创新性的实行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一国两制之策。从这一国策设定的用语也可以获知，契丹人还是更原意保持它的游牧本性，而避免步很多马上民族的后尘融于汉地。

辽王朝和北宋在华北平原的分割线，本来并不是一条稳定的地缘平衡线。通常情况下，燕山才是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地缘平衡线。一旦失去了燕山山脉的屏障，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是很难不被征服的，此后的中原王朝也只能南渡江淮，以舟楫上的优势维持战略防御姿态。辽、宋两王朝之间，之所以能够在华北平原维持一个多世纪的平衡，很大程度是因为双方找到了一个商业性解决方案。即富庶的宋王朝以“岁币”的形式向契丹人换取和平，辽王朝则战略性的放弃入主中原的想法（同时宋王朝也实际放弃了重回长城防线的想法）。

不管怎么说，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件消耗极大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辽、宋之间这笔交易，对于“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百姓来说，都算是一个利好。宋王朝也因此在文化、经济层面上，达到了一个高峰。然而不要忘了，东亚“世界”并不只有契丹和汉人存在。时势在怎么变化，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这两大地缘板块的威胁都会存在，后来的历史大家也都清楚了。东北渔猎属性的女真人，成为了辽王朝和北宋王朝的终结者，蒙古人则又成为了女真人（金王朝）和南宋王朝的终结者。

第二节 契丹余部征服东喀喇汗王朝建立西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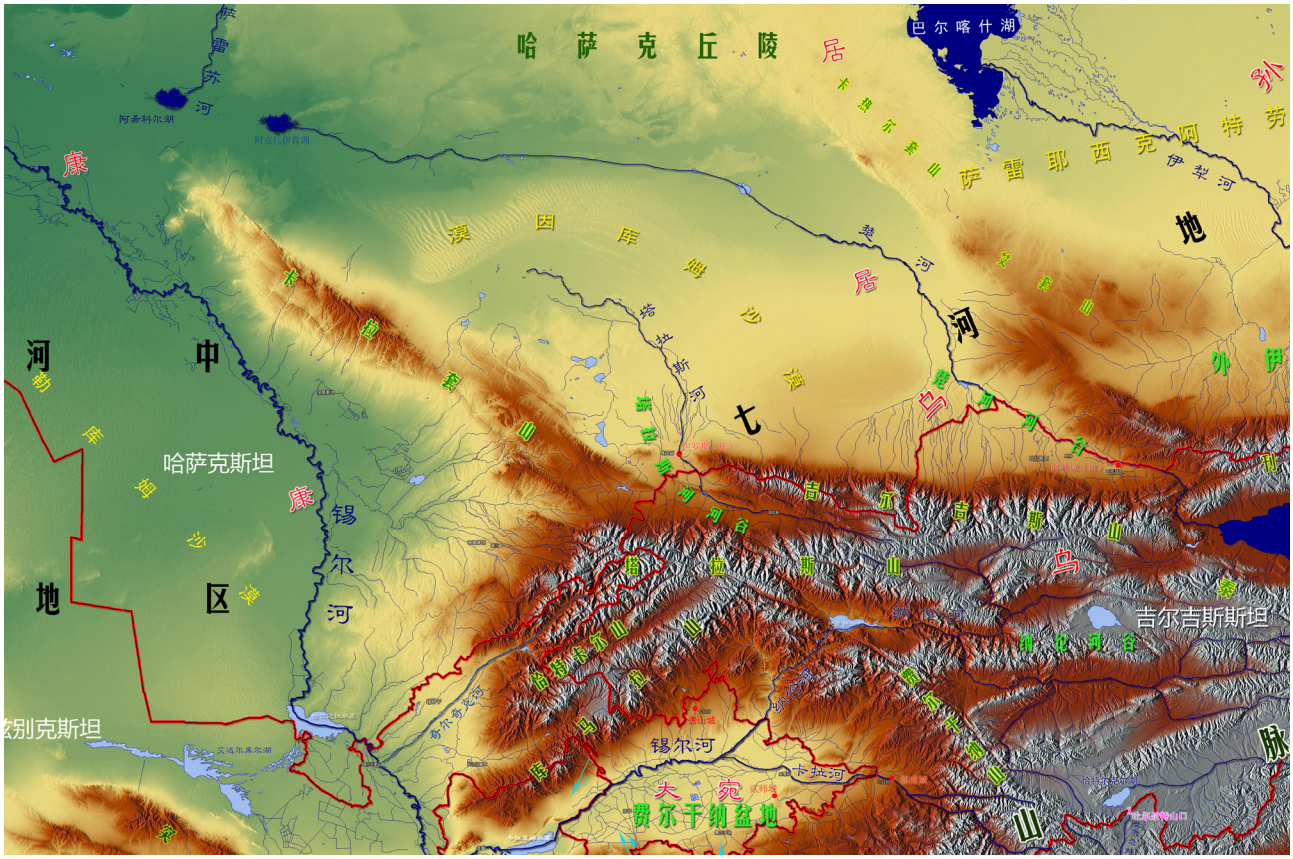
契丹人取得七河地区和塔里木盆地

尽管随着女真人的崛起，契丹人在东亚有历史使命已经宣告结束，但这支刻意保持游牧属性，并且积累了丰富统治经验（统治不同属性民族）的民族，却并没有在地缘政治舞台上马上消失。在淡出中原之后，契丹在草原刻意保留的游牧体系，开始发挥了作用。残余的草原契丹部落退入蒙古高原西部，试图东山再起。为了获取重返中原的资本，同样兼具农、牧两大体系中亚地区，成为了契丹人的战略目标，“西辽”则是这个中亚契丹帝国在历史中的政治标签。

在契丹人到达亚洲腹地之前，统治这片土地的是我们在阿拉伯部分解读过的突厥系游牧政权——“喀喇汗王朝”。这支九世纪中叶，由七河流域入主河中地区的突厥人，在地缘上最大的“贡献”是接受伊斯兰教，开启了天山南北的伊斯兰化进程。借助宗教的凝聚力，喀喇汗王朝的版图在其鼎盛时期包括中亚河中地区、塔里木盆地，

以及七河草原。不过每一个王朝都会经历兴衰周期，更何况喀喇汗王朝的统治区域内，天山是一条明显的地理分割线。在契丹人西进之前的 11 世纪中，这个突厥王朝就已分裂为东、西两个王朝了。其中东喀喇汗王朝领有七河流域及塔里木盆地，而西喀喇汗王朝的领地则为卡拉套山至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核心区则在泽拉夫尚河畔的撒马尔罕、布哈拉）。

由于同时领有草原属性的七河地区，以及绿洲农业属性的塔里木盆地。东喀喇汗王朝在地缘政治结构上，呈现为双中心结构。建立在七草原南部、楚河河谷的“八剌沙衮”，以及塔里木盆地的“喀什噶尔”（喀什）。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是位于楚河河谷“八剌沙衮”（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城东南），这座城市也是喀喇汗王朝最初的政治中心。看过西域部分的朋友，可能会对楚河河谷有些印象，因为唐帝国在中亚所建的“碎叶城”也正位于此（在托克马克西南部）。一般认为，那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李白，正是出生于碎叶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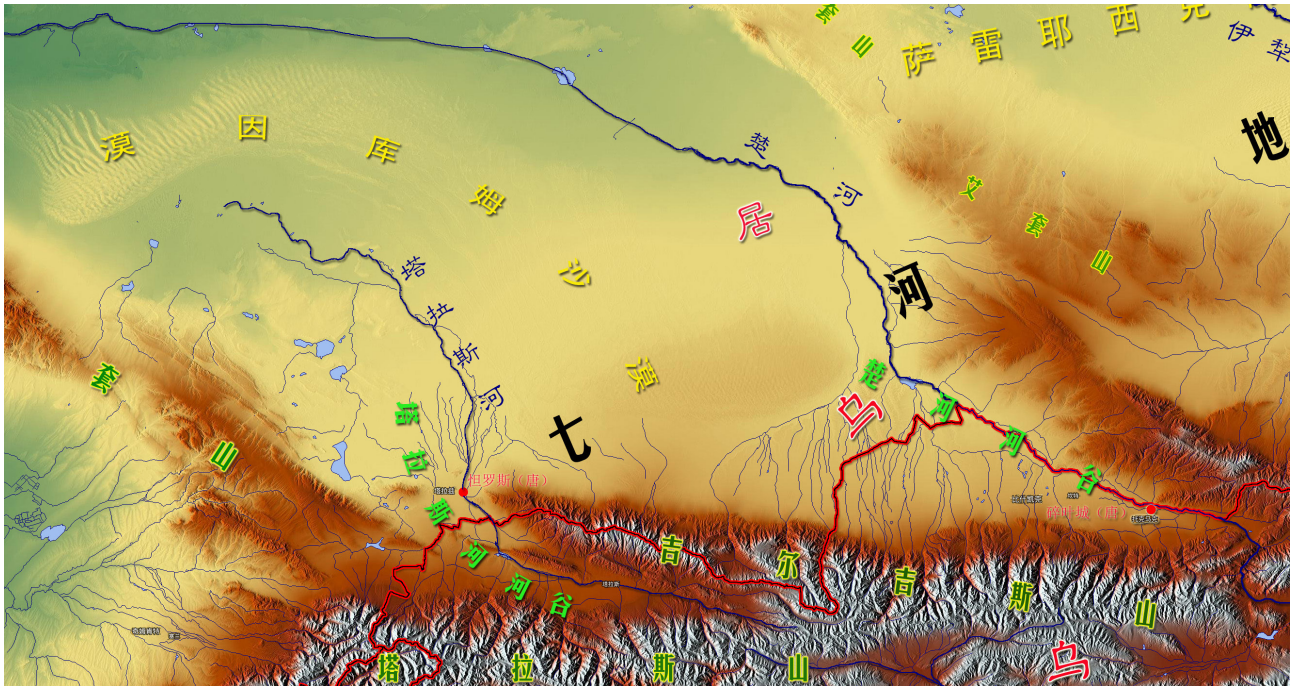
西天山北路地缘结构图（西汉）

公元 1132 年，契丹人由蒙古高原起兵越过阿尔泰山，开始了对喀喇突厥人的征服。地缘上缺乏外援的东喀喇汗王朝，最先被纳入“西辽帝国”的版图。上承草原之地，下近绿洲之境的“八剌沙衮”变身成为了西辽的都城“虎思翰耳朵”，塔里木盆地也随之成为了西辽的属地。相比之下，河中地区的“西喀喇汗王朝”，在地缘政治上的选择空间则要更大些。在 11 世纪下半叶，包括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高原、新月沃地大部，都被来自中亚草原的塞尔柱人所征服。同样出身中亚的塞尔柱突厥人，成为

了西喀喇汗人的强邻。

西喀喇汗人抵抗契丹人的南下扩张

无论占据伊朗高原的是哪个政权，都天然会希望能够将影响力辐射至河中地区。西喀喇汗王朝在 11 世纪后期的那场塞尔柱征服中，也成为了后者的附庸。现在，面临契丹人的压力，无论出于地缘政治还是共同信仰的因素，塞尔柱人势必都会为西喀喇汗王朝出头。只不过前面我们已经解读过了，游牧部落出身的塞尔柱人，显然还没有做好取代阿拉伯人建立帝国的准备。在契丹人崛起之时，所谓的“塞尔柱帝国”内部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尤其在西欧的天主教徒们打开 “圣战”魔盒的大背景下（公元 1192 年开启十字军东征），从安纳托利亚高原到两河平原的穆斯林，视线都聚集在西线的战事上。真正能为西喀喇汗人提供支援，主要是来伊朗、阿富汗北部，与中亚地缘关系紧密的穆斯林地区。



西天山北路地缘结构图（西汉）

仔细观察东、西喀喇汗王朝的势力范围划分，以及西辽征服东喀喇汗王朝后的局面，喜欢唐朝历史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此时的政治对抗格局很像公元 751 年“怛罗斯之战”时的情况。只不过被迫西迁的契丹人成了中原王朝的代言人，而塞尔柱人则成为了伊斯兰在中亚扩张的执行者。

怛罗斯之战发生的地点，是在楚河之南的塔拉斯河谷（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市一带）。塔拉斯河（亦译塔拉兹河）是七河草原最南部的一条河流，怛罗斯所在的河流冲积扇是由卡拉套山、天山主脉包夹形成的。跨越卡拉套山，就是富庶的河中地区了。在东、西喀喇汗王朝分立时期，塔拉斯河谷被划分给了西喀喇汗王朝，以充当河中地区屏障。说起来如果清王朝不是在俄国的重压下，失去了半个伊犁河谷。跨入现代国家行业的中央之国，西部疆域线也很有可能触及卡拉套山或者塔拉斯河。

当然，没有能够保有从巴尔喀什湖北至卡拉套山之前的七河草原，包括天山之上以伊塞克湖为中心的山地区（吉尔吉斯斯坦所有），并非清王朝的过错。事实上，在当时欧洲与世界其它地区拉开了技术代差的情况下，重心一直在长城以内的中央之国，能够在西北这片干旱之地保有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包括半个伊犁河谷），已是不幸中的万幸。在这个过程中，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地缘潜力、汉唐经营西域的历史，以及清王朝马上民族的出身，都是重要的地缘因素。

第三节 西辽与塞尔柱人展开卡特万之战

契丹人吸收其治下民族加入军队

西辽与塞尔柱人的决战，并非发生在卡拉套山之北。在塞尔柱人还在征召前往河中圣战的穆斯林军队时，作为战略扩张方的契丹人，已经将战场推进到了河中地区。需要说明的是，在征服东喀喇汗王朝之后，契丹人本来是准备东征，从女真人手中重新夺回中原的。然而此时的金王朝正处在上升期，契丹人在中亚整合的资源，尚不足以完成这个战略任务（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胜利），转而将近在咫尺的河中地区作为目标，踏踏实实的做一个“西”辽帝国会更加现实。毕竟无论是西喀喇汗王朝还是塞尔柱人，当下都在走下坡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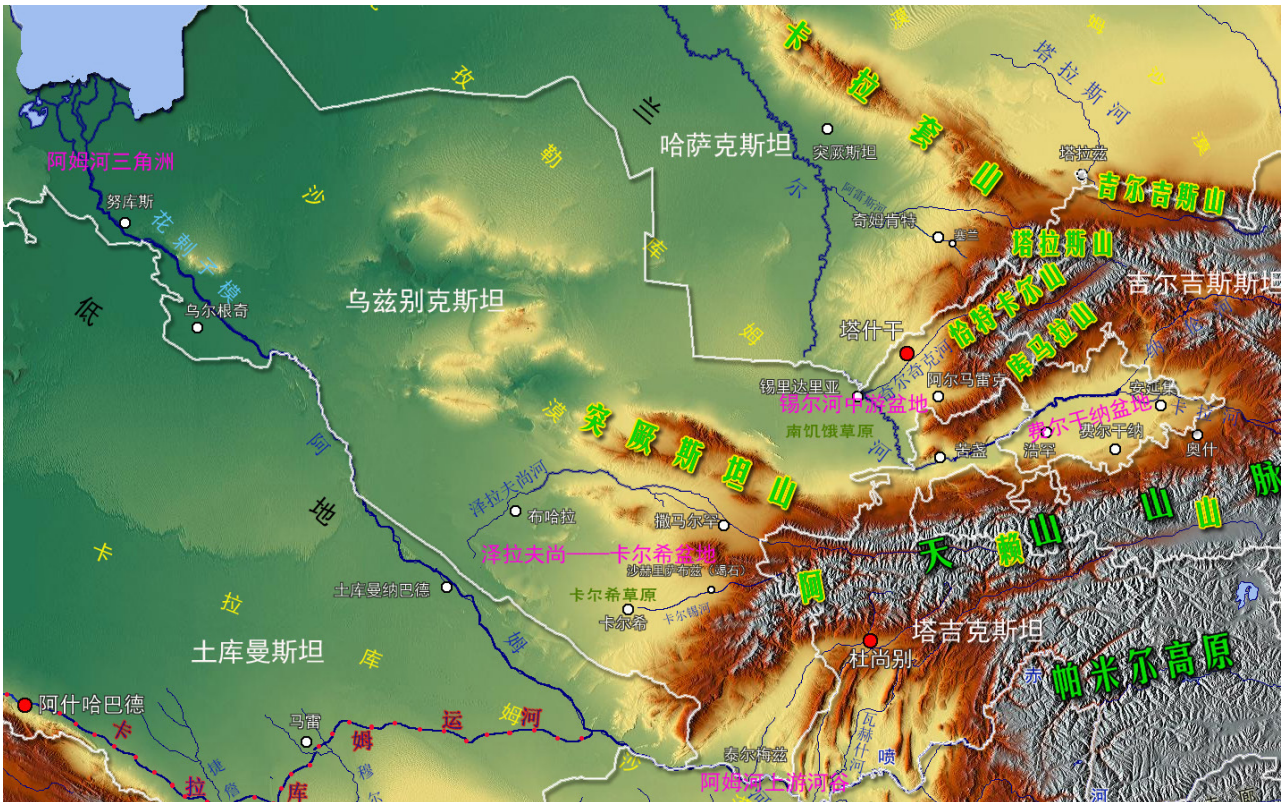
尽管中亚的这些突厥人，看起来比东亚的女真人更好对付，但能否取得胜利还是要看自身的实力。对于从蒙古高原失势而来的契丹人来说，如果他们的对手是整个中亚突厥语系民族，那么实力显然是有不足的。问题是“突厥”各民族并非天然的联合体，西辽军队在西征过程中，也吸收了大量突厥系游牧部落。事实上，善于将不同属性的民族集合于自己的大旗之下，正是契丹人这些年在东亚积累的重要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干涉、改变统治民族（特别是农业民族）原有的政治、经济、宗教结构。简单点说，你只要在政治上接受西辽的任命，并且按户数缴纳一定税赋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不肯接受如此宽松的统治条件的话，那么军事上打击就会随之而来。

就塔里木盆地、河中地区这样的绿洲农业区来说，缴纳一些“保护费”完全是可以被接受的，毕竟西辽帝国可以让他们免受草原游牧部落的侵扰。更何况天山南北处于同一政权控制下，更能够保证商道的安全。这与当年汉唐两朝能够控制西域的道理是一样的。相比之下，契丹人对于加入自己阵营的那些草原突厥人要更加的警惕，甚至在他们成为绿洲地区不稳定因素时，强行将之转化为定居者。至于契丹人，则更注重维持自己的游牧属性和军事属性，以确保自己有能力威胁诸被统治民族。这也是为什么西辽的都城并没有从楚河河谷，迁往富庶的撒马尔罕的原因。

西辽军队在卡特万之战中战胜塞尔柱人

当然，如果契丹人不能在战场上证明自己，是不可能靠嘴说服西喀喇汗王朝归顺自己的。从板块划分的角度看，锡尔河中上游的费尔干纳、奇尔奇特河谷（塔什干所

在地）是锡尔河流域的两大绿洲之地。河中绿洲的这个半壁江山，也是契丹人的下一个征服目标。在击败西喀喇汗军队的抵抗后，契丹人顺利得到了上述绿洲（公元1137 年）。接下来他们要跨越的，是锡尔河流域与阿姆河流域的地理分割线——突厥斯坦山脉。跨过这条分割线后，河中地区的地缘政治中心：泽拉夫尚河谷的“撒马尔罕”，将呈现在契丹人的面前。



中亚两河流域地缘结构图

公元 1141 年，西辽军队跨越突厥斯坦山脉向撒马尔罕进军，而此时塞尔柱人所集结的，总兵力达到十万之巨的穆斯林军队，也已经进驻于此。双方在撒马尔罕城北、突厥斯坦山脉南麓的草原上展开了决战，史称“卡特万之战”。 最终契丹人成为了胜利者，西辽帝国的版图由此扩张到了包括泽拉夫尚河谷、奇拉奇特河谷、费尔干纳几块核心绿地在内的河中地区。

在这场战役中，塞尔柱人的损失超过三万人。对比十字军前线那种重骑士对决的战争形式，这样大规模的草原会战（以及损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以至于这场战役此战之后，当时的阿拉伯史学家将之称之为伊斯兰史上空前的失败。如果说当年的怛罗斯之战，在地缘层面意味着伊斯兰势力开始强势渗入中亚，那么信仰佛教的契丹人征服河中地区，客观上遏制了伊斯兰教的进一步扩张。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卡特万之战，倒是应该享有与怛罗斯之战同等的历史地位。当然，西辽的统治特点我们前面也说了，并不会强行去改变当地居民的信仰，更多是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允许各种宗教在自己境内传播。不过阿拉伯人在当年传播教义时，也同样没有采取强迫手段。这种影响，更多是透过政治、经济手段而缓慢呈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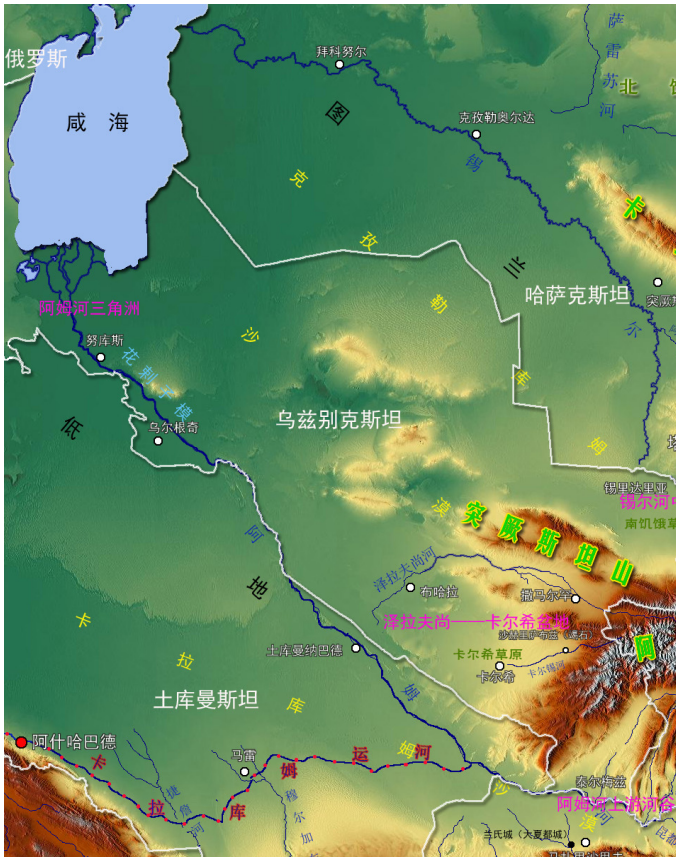
然而卡特万战役的对穆斯林世界的伤害，以及契丹人可能在地缘上取得的历史地位，很快便成为了过去式。因为还在为契丹人西进感到忧虑的穆斯林世界，在看到随后而来的蒙古人便会明白，这些在东亚经受过文明洗礼的契丹人，实在是太仁慈了。

第四节 花剌子模的崛起

花剌子模的根基之地

在先后征服了东、西喀喇汗王朝，迫使塞尔柱人完全退出中亚之后，契丹人同样面临着一个结构性难题，那就是如何统治个既包括草原、又包含绿洲，并且绿洲农业区还被天山山脉分割为东、西两片的区域。契丹人所使用的方法，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一是维持自身的游牧属性（同时严格管理突厥游牧部落），以确定在军事上的优势；二是允许绿洲农业区进行完全的自治。问题在于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挑战总是无处不在的。在 12 世纪后半叶至 13 世纪初，塞尔柱人把重心转向西亚、蒙古人暂时还未崛起西征的这个空档期，西辽在中亚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

契丹人遇到的挑战，来自一个中亚边缘的绿洲板块——花剌子模。说起“花剌子模”，它的名气可比西辽在世界史上的知名度更高。不过这个名气的建立，却并非基于它曾经昙花一现的辉煌，而是因为蒙古人。在蒙古西征过程中，最先让穆斯林世界乃至欧洲感到震惊的，应该就是成吉思汗灭“花剌子模国”的战争了。在那场战争中，最夸张的说法是，仅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乌兹别克斯坦乌尔根奇）城破之后，就有 120 万人被屠杀。当然，以当地人口潜力来看，这个数字可能过于夸张了，不过数以十万计的居民被屠还是可信的。现在，我们的重点自然不在讨论蒙古人到底有多么的血腥，而是解读花剌子模的地缘位置，以及它对蒙古西征的意义。



中亚两河流域地缘结构图

我们知道，在以天山山脉为主轴的中亚－西域地区，地缘潜力最大的总是那些靠近山麓的冲积扇地区。如果纬度有些高、积温有些低的话，那么这些冲积扇就是水草丰美的草场；如果纬度低些、积温够高的话，则能孕育出农业绿洲来。不过依山傍水这事也并不是绝对的，若是山地集水区

面积够大、海拔够高的话，也会有足够多的水量冲破沙漠的包围，在远离山地的下游洼地聚集成湖，并且发育出植被茂盛的三角洲来。

以天山北路的情况来看，阿姆河、锡尔河，以及伊犁河这三条水量排名前三的大河，都有机会做到这点。前两者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汇集而成了“咸海”；后者则成为了巴尔喀什湖的主要供水者。不过依照以卡拉套山为界，划定的这条农牧分割线来看，真正有成为农业绿洲潜力的，只有位置最靠南的阿姆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这片“伞”状绿洲带，所对应的就是“花剌子模”。在塞人的语言中，花剌子模的原意是“太阳之地”。有了水和阳光，绿洲也就有了。考古表明，这块风水宝地在 4000 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

花剌子模得以崛起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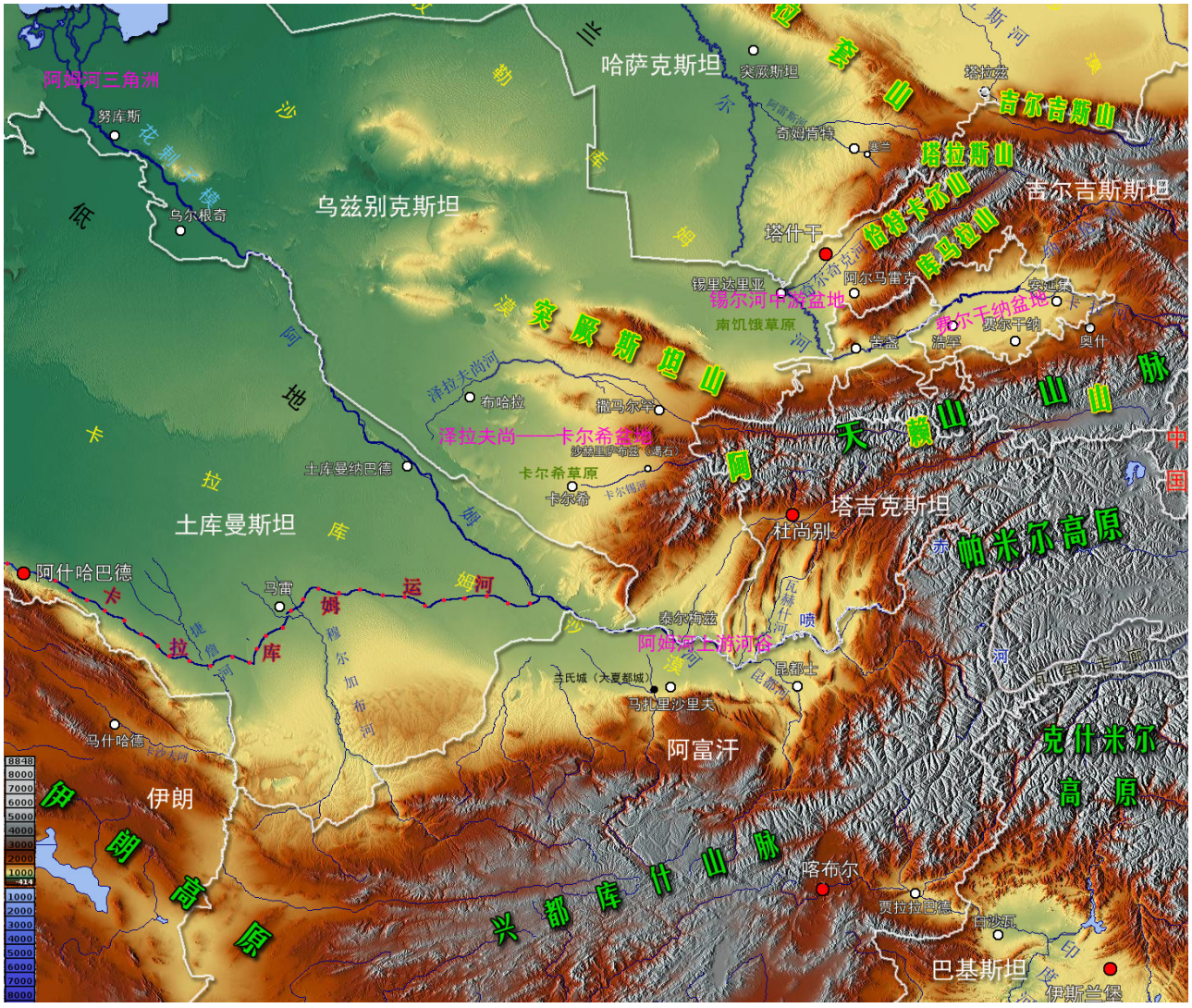
就花剌子模的位置来说，很有点被大漠包围的飞地的味道。这样的位置，本身其实并没有很好的机会，成为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大多数时候，花剌子模和中亚两河之地区其它农业绿洲一样，是伊朗高原的势力范围。一旦伊朗高原的政治势力进入衰弱期，又往往会为商业潜力更大的河中地区所控。控制河中的喀喇汗王朝、横扫西亚的塞尔柱王朝，先后都曾经迫使花剌子模依附。问题在于，不管是哪个王朝想控制花剌子模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是一片独立的大绿洲，天然有地缘独立性。天时、地利、人和具备的话，也不是没有机会做大一把。就像青藏高原很难有挑战东亚中原王朝的潜力，但在唐王朝时期，吐蕃却也着实风光过一把一样。

在 11 世纪末的塞尔柱征服中，花剌子模也成为了塞尔柱王朝的属地。这片绿洲崛起的契机，来源于西辽的崛起。塞尔柱人在争夺河中的战争中落败后，阿姆河看似成为了西辽与塞尔柱王朝之间的分割线。然而游牧于阿姆河的突厥部落以及默默积蓄力量的花剌子模人，都看到了摆脱塞尔柱人的机会。在“卡特万之战”落败后不过十年，塞尔柱人继续统治阿姆河——伊朗高原之间土地的努力就宣告失败。替代塞尔柱人在中亚地区扛起穆斯林世界捍卫者大旗的，就是“花剌子模”。

花剌子模的崛起，虽然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十字军和契丹人的进攻，相当于同时在西亚、中亚发起了两场宗教战争。也可以说，阿拉伯人做大的伊斯兰版图，在 12 世纪中叶受到了严重挑战。事实上，当时的欧洲人听闻塞尔柱人在中亚的失败，也认为这是一个战略利好消息。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契丹人不是基督徒而是佛教徒罢了。

需要说明的是，从地缘结构上看，阿姆河的上游的绿洲农业区：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所包夹而成的“吐火罗盆地”，也有机会代表全体穆斯林，在中亚与契丹人展开圣战的。在喀喇汗和塞尔柱时期，统治吐火罗盆地的是一个我们前面解读过的，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王朝——伽色尼王朝。这个被归入阿富汗历史的王朝，地缘结构上也同样有个大问题，那就是内部分裂性明显，其中兴都库什山脉分水岭以北属于中亚的阿姆河流域；分水岭之南则与南亚的印度河流域相接。

今天阿富汗内部依然受困于这样的地缘分裂，南方的普什图人与北方塔吉克人之间的地缘矛盾，贯穿于整个阿富汗的近现代动乱史。借助加入塞尔柱人所发起的圣战（卡特万之战），吐火罗盆地也实际从伽色尼王朝中分离出来，诞出了一个独立的王朝——古尔王朝。也就是说，单就中亚的情况来说，在 12 世纪下半叶呈现出：古尔王朝（吐火罗盆地）、花剌子模王朝（阿姆河中下游绿洲）、西辽（河中、七河草原）三足鼎立的态势。



中亚两河流域地缘结构图

不过古尔王朝的志向并不在中亚，他们对偏安于兴都库什山脉之南的原宗主——伽色尼王朝要感兴趣得多。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这也很好理解。要知道如果能够跨越兴都库什山脉的话，富庶的印度河平原就将呈现在眼前。当年的伽色尼王朝，包括更早由大月氏后裔创建的贵霜王朝，都是遵循这样的路线入主印度河平原的。换句话说，有了印度河这张大饼，谁还会在乎河中这点绿洲呢？

已经运转了两个世纪的伽色尼王朝，此时也已经进入了衰弱期。这也是为什么古尔王朝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前后用了不到 40 年时间（公元 1148——1186 年），古尔王朝便成功了取代了伽色尼王朝，成为了吐火罗盆地、兴都库什山脉及上印度河平

原（旁遮普地区）的统治者。接下来，谁又会成为这场中亚三国演义的胜利者，并且代表穆斯林世界抵御蒙古人的进攻呢？

第五节 花剌子模的对外扩张

花剌子模征服呼罗珊地区并得到西辽帮助

对于西辽来说，统治从阿尔泰山到阿姆河之间如此广润的土地，已经到达了它的力量极限。现在结构脆弱的西辽帝国，仿佛就是当年喀喇汗王朝的翻版。契丹人当然可以尝试一下，向兴都库什山脉或者伊朗高原扩张。只是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那样做势必会消弱对七河草原和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力。也许入主河中的契丹人，将来也会像当年大月氏人那样，放弃回到北方的想法，并寻找时机向南扩张（一如贵霜帝国），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西辽的重心还是维护现有的胜利果实。

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一直是西辽帝国希望并入的板块，这在地缘政治上也是合理的。今天据有河中绝大部分土地的乌兹别克斯坦，同样领有了大部分花剌子模之地。当年在大月氏经营河中之时，他们的势力也曾经延伸到了这片土地（火寻国）。在击败塞尔柱人之后，契丹人对花喇子模发动了战争，后者也很快识时务的以称臣纳贡的形式，与前者达成了和解。

从西辽的统治方式来看，契丹人并不会对花剌子模的内部统治做过多干涉，花剌子模人也无非是又换了个宗主。不过这并不代表花剌子模人没有自己的想法，既然契丹人暂时还没有打算南扩，而塞尔柱人又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内耗阶段，这样花剌子模就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事实上，每每伊朗高原陷入分裂之时，都会面临中亚而来的压力。当年的帕提亚人、塞尔柱人，都是由北方入主伊朗高原的。在这次塞尔柱大分裂时期，也依然有原来依附于塞尔柱人的突厥游牧部落，乘乱渗透伊朗高原。只不过偏安一隅的花剌子模，过往并没有那些四海为家的游牧者那样有野心罢了。

花剌子模这次的机会机会在于，能够得到正处于强盛期的西辽的帮助。具体来说，在表示臣服于西辽之后，契丹人的军队直接参与了花剌子模对伊朗北部呼罗珊地区的征服工作。之所以没有自己主导这场战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伊朗高原现在已经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了。如果由信仰佛教的契丹人来主导征服任务，那么很有可能给高原上原本分裂状态的穆斯林国家重新团结在一起的借口。正如塞尔柱人之前在河中与西辽的那些战争，就是以圣战之名在穆斯林各国征召军队的。反之，由已经伊斯兰化的花剌子模来做这件事，政治上的障碍就要小得多了；二是迅速做大、幅员辽阔的西辽帝国，内部结构也并不稳定，并且还要随时防备来自蒙古高原的后来者。

花剌子模征服伊朗高原

在萨拉丁攻陷耶路撒冷（公元 1187 年）的前一年，花剌子模完成了对伊朗高原北部，也就是呼罗珊地区的征服。在一些人看来，花剌子模已然是自己的属国，那么

他们在呼罗珊地区扩张的领土，自然也可以算是西辽帝国的一部分了。然而“尾大不掉”总是永恒的政治真理，如今花剌子模已经有实力摆脱对西辽的臣属关系了。问题在于，抓住这千年一遇机会的花剌子模人，并没有必要急着与契丹人翻脸，因为此时的花剌子模还需要一个稳定的后方，让他们有时间推进统一伊朗高原进程。

从地缘结构上来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伊朗高原本身是具备中、西亚双重属性的板块。其三大核心板块中，属于中亚属性的即是东北部与中亚相接的“呼罗珊”地区。前面我们也说了，以历史经验来看，中亚游牧民族入主伊朗高原，总是以呼罗珊为跳板（比如帕提亚人）。现在花剌子模控制了呼罗珊地区，自然也会有这种想法了。这其间更大的诱惑在于，成为伊朗高原之主后，再顺势拿下富庶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一旦能够入主巴格达，花剌子模便能仿效先前的塞尔柱人，架空阿拉伯的哈里发，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主导者。今天的伊朗，之所以费尽心机的希望树立什叶派宗主的身份，本质上也是希望能够从这笔伊斯兰遗产中受益。

将伊朗高原和新月沃地控制在手是很多穆斯林君主的梦想。抛开政、教层面的意义，经济上的价值也是无比巨大（也意味着垄了地中海地区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在 13 世纪即将到来之即，花剌子模大致完成了对伊朗高原的征服，但却没能进一步入主巴格达。之所以暂时止步于伊朗高原，是因为中亚草原游牧者以及吐火罗盆地的古尔王朝，一直在威胁花剌子模的本土，迫使其不得不回头巩固后方。当然，以过往中亚游牧民族南征的经验来看，中亚的利益并非是不能被弃的，花剌子模人也完全可以力图做个“西亚王朝”。

然而与那些四海为家的游牧者不同的是，花剌子模人本质是一个对故土更加眷念的定居农耕者。让这这样的王朝转移自己的核心区，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时间和外部压力来推动）。想想中国历史上那些中原王朝，即使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压倒北方之后，也还是会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建立王朝，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

在与巴格达的哈里发达成和平协议，并且取得了正式授权成为伊斯兰世界最高级别的政治领袖（苏丹）后，花剌子模人将目光转向了自己东侧——在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发展的古尔王朝。与花剌子模在伊朗高原的成功相比，古尔人在 12 世纪末所取得的成就一点也不逊色。这些年古尔人除了拿下了印度河平原以外，甚至征服了整个恒河平原，将兵锋指向了南亚次大陆东侧的孟加拉湾。印度人所倚重的战象虽然看起来可怕，但在中亚而来的骑兵面前，却并没有优势可言。这意味着整个巴基斯坦和北印度，都成为了这个阿富汗王朝的领地。

现在从局面上看，西辽、花剌子模、古尔王朝已经把这场中亚三国演义的舞台做大了。在西亚、南亚扩张成功的后两者，也具备了和契丹人抗衡的实力。不过三足鼎立的局面与两强相争对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出了合纵连横的空间。简单点说，总会有两方试图联合起来，先消灭另一个对手。那么，接下来的博弈，到底谁会最先成为被孤立者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六节 西辽的衰弱与蒙古的兴起

花剌子模击败古尔王朝后又击败西辽

公元 1204 年，花剌子模又一次说服了契丹人和自己站在一起，击败了阿富汗的古尔王朝。落败于两国联军的古尔人，现在面临一个选择，到底是归顺同属伊斯兰教的花剌子模，还是异教徒的契丹人。最终古尔人的选择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花剌子模成为古尔王朝遗产的接收者，并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逐步将领土推进到了印度河流域。至于契丹人，则再一次为他人做了嫁衣。

契丹人所面临的困境，在于他们宽容的宗教政策，固然能够使之统治一些穆斯林地区，但想要再进一步的话，就会受累于这层身份。对于契丹人来说，解决这一困境也并非没有办法，那就是改信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就像之前喀喇汗人、塞尔柱人那样。如果契丹人是一个纯粹的，信仰长生天（原始宗教）的游牧民族，那么事情将会简单的多。然而问题在于，契丹人在意识形态层面并不原始。他们曾经在东亚接受过的文明洗礼，使之作为这一选择时要艰难的多。

现在，借助契丹人的西征，花剌子模不仅解除了北方游牧部落的威胁，还得以接收塞尔柱、古尔王朝的遗产，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北境之王”。中亚这场三国演义也变成了两强并存的局面。这也意味着，仍然控制着河中之地的西辽，无可避免的成为了花剌子模的下一个目标。公元 1210 年，在距离蒙古西征还有 6 年的时候，花剌子模成功的从西辽手中夺取了河中之地，统一了天山以南的全部绿洲带。值得一提的是，双方决战的地方也在怛罗斯。

花剌子模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契丹人本身的内部矛盾。对于西辽来说，上下层的宗教差异以及天山对中亚、西域绿洲地带的分割，是两个无解的结构性矛盾。宽容的统治，固然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减少内部矛盾，但基础却始终是脆弱的。花剌子模既然能用伊斯兰世界守护者的名义，收服伊朗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地区穆斯林的人心，也同样能用这杆宗教大旗来影响西辽治下的穆斯林地区。尤其对于直接受花剌之模威胁的西喀喇汗王朝之地来说，这种影响会更为直接。

战败的契丹人意识到如果治下的居民，特别是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居民仍然是穆斯林的话，那么天山也不能成为天然的屏障。为此，失去河中的西辽开始在东喀喇汗王朝旧地推行强硬的宗教政策，试图让以喀什为代表的绿洲地区居民，变成佛教徒（包括在服饰上契丹化）。这种做法，与当年秦始皇在国内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本质一样，都是为了增强中央集权力。

既然当年本身信仰佛教的西域诸国，能够被喀喇汗王朝强行变成穆斯林，那么从技术上看，契丹人要在封闭的塔里木盆地做同样的事，也并非没有可能做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教当时并没有覆盖整个新疆的绿洲地带，以东疆（吐鲁番盆地、

哈密盆地）绿洲为核心的西辽属国——高昌回鹘，当时还是以佛教信仰为主。只不过从地缘角度看，无论采取强制还是和平的手段，如此重要属性的改变，至少需要五六十年（三代）的时间才能够稳定，问题是留给契丹人的时间却只有 5、6 年了。

蒙古在东亚扩张的转变

终结塔里木盆地佛教化进程的不是别人，正是蒙古人。当然，蒙古人之所以西征，并不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事实上崛起于草原的蒙古人，对于宗教本身是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等都曾经对蒙古上层造成过影响。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都没有意识到，需要一个带有明显蒙古属性的宗教，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公元 13 世纪初，在西辽、花剌子模、古尔三王朝在中亚纠缠之时，成吉思汗也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并且在蒙古民族的发源地——鄂伦河（斡难河）畔正式建立了“蒙古汗国”。

正常情况下，当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统一在一杆大旗之下后，与之隔长城相望的东亚农业区，将会是第一目标。此时统治中央之国北方的，正是将辽朝变成“西辽”、宋朝变成“南宋”的女真人（金国）。由于女真人在东北平原的故地，与蒙古人崛起的高原东部仅隔大兴安岭相望，使得女真人更加注意对蒙古人的控制。后者也一直识时务的，奉金国为宗主。基于金国的强大，成吉思汗在统一草原之时，一直避免过早跟女真人撕破脸，而是首先将控制西套、河西之地的党项王国——西夏作为了征服目标。

在花剌子模与西辽决战于怛罗斯的同一年（1210 年），蒙古人取得了第一次“蒙夏战争”的胜利，成功逼迫西夏与蒙古结盟（并附蒙伐金）。在此之前，西夏本来是金国的盟友。西夏外交政策的改变，相当于断了金国的左臂，使得蒙古人在战略上形成了对金国的半包围之势。这也意味着，蒙古与金国对决时机的成熟。接下来，高效的蒙古人也的确马上转入了“蒙金战争”的模式。公元 1214 年，无法阻挡蒙古南下的女真人，将都城从长城脚下的中都（北京），迁往黄河之畔的南京（开封）。次年，蒙古人攻破金中都，并席卷整个华北平原、山西高原。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幕并不陌生。女真、契丹，以及之前很多北方民族，都是沿着相同的路径入主中原。不出意外的话，“蒙古汗国”也很快会像前两者一样成为一个中原王朝，并且逐渐接受华夏文明的影响。然而接下来的历史，却并没有照我们熟悉的模式往下走。中亚地区发生的一件意外，使得蒙古人暂时将视线转向了西方，并随之改变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历史。

第二十二章 蒙古西征花剌子模及对欧亚的探路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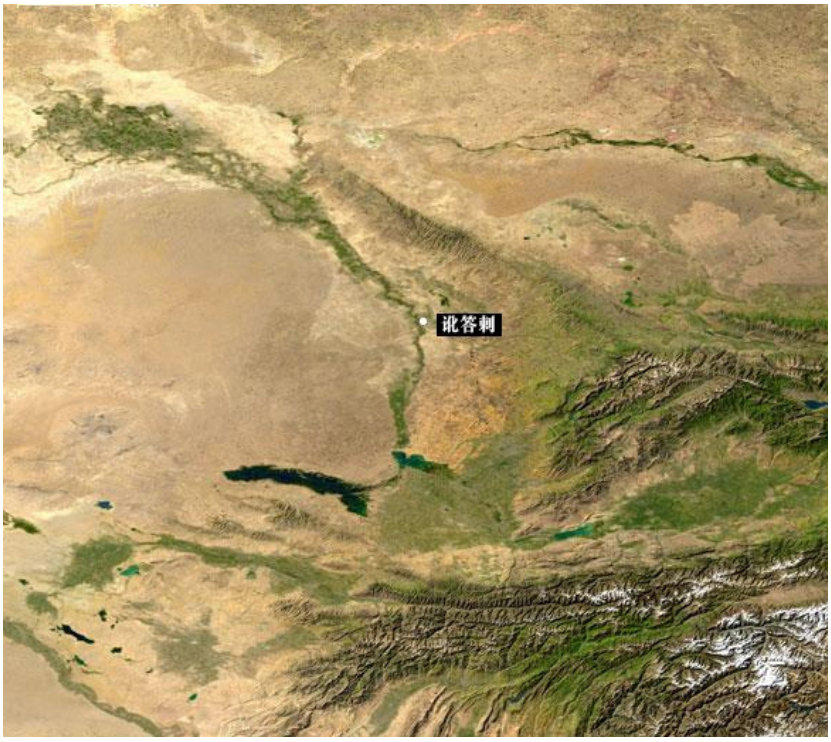
第一节 蒙古人西征并灭亡西辽

花剌子模杀害蒙古商队引发蒙古报复

翻越阿尔泰山向中亚方向渗透，一直也是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一条自然扩张之路。早期的匈奴帝国、突厥帝国都曾经这样做过。后者甚至一路扩张至了伊朗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的边缘，开启了整个中亚地区的突厥化进程。不过相比东亚富庶的农业区，中亚的吸引力其实要小的多。如果能够在东亚有所突破的话，游牧者更原意把注意力放在这片高收益地区的。制服西夏并且在华北势如破竹的蒙古人，之所以将视线向向西方，直接原因在于花剌子模的一个错误外交决定。

此时的花模子模，不仅击败了古尔王朝、西辽，控制了整个中亚两河流域、兴都库什山脉，以及伊朗高原各国。这意味着，花剌子模能够做到，垄断传统的东西方贸易通道——丝绸之路。对于正处在灭金关口上的蒙古人来说，并不担心花剌子模会对自身的安全有所威胁。蒙古人期望的，是通过和花剌子模建立贸易伙伴关系，这样他们从东方掠夺的那些奢侈品，将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

在先期派使节沟通后（公元 1215 年），成吉思汗派出了一支将近 500 人的商队，尝试打通贸易通道。然而在蒙古人的商队跨越中亚草原地带与绿洲农业区的分水岭，也是花剌子模的北方边界——卡拉套山后，意外发生了。这些商人被花剌子模派驻当地的总督以间谍的名义尽数诛杀（地点在“讹答剌”，又称奥特拉尔，位于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阿雷思河和锡尔河交汇处。）。这一意外的发生，被认为是那位总督贪图蒙古商人所带来的财物。不过问题并不在于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因个人贪念所引发的意外，而在于花剌子模国王随后拒绝了蒙古交出肇事者，重新缔结和平协议的要求（甚至杀死了蒙古使者）。换句话说，花剌子模和蒙古交恶的确是一个



讹答剌位置图

战略层面的外交决定。

如果花剌子模人能够预知蒙古人力量，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现在，几乎与蒙古同时崛起的花剌子模，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长期处于中亚和伊斯兰世界边缘的花剌子模，不仅成为了中亚的最强者，还成功的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南亚和西亚。这使得花剌子模人，并没有把这些由北亚而来的游牧者当成一回事。事实上，在与蒙古交恶的这段时间，花剌子模也的确把心思放在了西亚方向，在蒙古人已经开始执行西征的计划时（公元 2017 年），花剌子模还在执行着进军巴格达的计划（由于出现内乱而中途放弃了）。

另一个让花剌子模人做出错误决定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有所提升。作为伊斯兰世界的北境守护者，花剌子模人天然有向北方那些“野蛮”游牧民传播教义的义务。击败佛教徒统治的西辽、夺取河中这件事，也足以让花剌子模人的信心爆棚。更何况花剌子模现在的期望值，已经提升到了做伊斯兰世界政治领袖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花剌子模人并不认为，有什么必要和蒙古人缔结什么和平条约。至于贸易，自然还是可以做的，只是蒙古人就没有必要自己把货运过卡拉套山了。

很显然，无论出于面子还是利益方面的考虑，同样正处在势头上升期的蒙古人，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按照之前北方游牧帝国在东亚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蒙古人能够把重心一直聚集于东方，那么他们下一步很可能会像之前入主中原的那些北方民族一样，建立一个中原王朝，并逐渐丧失自己的游牧属性（又或者像契丹人那样建立一个二元帝国）。当然，也存在蒙古人打破历史规律，在征服中央之国后，还有欲望向西扩张的可能性。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花剌子模人的主动交恶，至少将蒙古西征的日期提前了。以至于后人一提到蒙古西征，以及他们对西方世界伤害，大家都会想到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源自于花剌子模失信诛杀蒙古商队之事。

蒙古远征西辽

由于控制楚河河谷和塔里木盆地的西辽，横亘于蒙古与花剌子模之间，蒙古人首先针对西辽发动了远征。做出这样选择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现在西辽的君主并不是一个契丹人，而是蒙古人在草原上的主要对手之一：“乃蛮人”的王子。记得在西域部分时，为了解读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我们曾经略写过一下成吉思汗时代，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其中说成吉思汗所属的蒙古语的部落分布于肯特山以东的东部地区；中部的色楞格河流域则以克烈部为主（可能说突厥语，也可能说蒙古语）；至于西部杭爱山——阿尔泰山之间的“大湖盆地区”，及至阿尔泰山南麓，则为为突厥语族的乃蛮人所有。

除了语言上的差异以外，克烈部与乃蛮部在宗教信仰上与蒙古人也有所不同。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诧异，二者当时的信仰竟然是属于天主教的教派——景教（聂斯脱利派）。当然，这些游牧者的信仰，并非欧洲人直接传教的结果。基督教得以在蒙古高原上传播，很大程度是因为自唐朝传入中原之后，因其独尊一神的理论，无法与佛教、

道教等其它宗教，以及华夏文明的祖先崇拜传统兼容共存，而退而求其次的避入游牧之地传播。实际上，由于自身在文明上的积淀有限，游牧民族对宗教信仰本身，并没有定居民族那么坚定，任何成体系的外来宗教，都有可能在游牧民族中获得传播。

作为阿尔泰山的守望者，乃蛮人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蒙古人统一高原成功，也意味着蒙古骑兵的身影将很快出现在天山之麓。最先让西辽人感受到直接压力的，是“高昌回鹘”的叛离（公元 1209 年）。在契丹人进入中亚之后，身处东疆的高昌回鹘也是最早归附西辽的国家，并且成为西辽帝国在东北方向的门户。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契丹人决定借力逃亡而来的乃蛮人，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同时乃蛮人也作出了融入契丹的姿态，甚至因此而放弃了原有的基督教信仰，变身成为了佛教徒。不过这支落跑而来的外援，并没有为西辽的安全做出太大贡献。相反，在花剌子模人击败西辽占得河中之地后，反客为主的乃蛮人却乘机谋得了王位，并通过与西辽王室联姻（同时仍以西辽为国号）与契丹贵族达成了和解。

由于西辽推行强制改宗佛教的政策，是在乃蛮人发动政变之后进行的，所以西辽后来灭国的责任，很大程度被归罪于乃蛮人身上。然而事实上，正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西辽之所以开始改变宗教政策，是因为遭受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强大压力。从这一点来说，决心融入西辽的乃蛮人只是在顺应大势罢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地缘政治上都应该由“西辽”这个政治体来负责。不过这个责任到底由谁来负，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蒙古人几乎没有留给他们看到改革后果的时间。公元 1217 年，成吉思汗派出两万铁骑，（哲别领军）开始向西辽进军。

契丹人推动宗教改革被蒙古人利用

蒙古人军事上的特点，已经被各路研究者研究的很透了。在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在政治、外交层面的做法。鉴于西辽正处于宗教改革的阵痛期，蒙古人在军事进攻之前就向西辽臣民传达了自己允许宗教自由的政策。这一政策迅速在以喀什为首的各个绿洲引起了共鸣，占据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居民，很快成为了蒙古人的内应，并使得乃蛮人和契丹人的统治瞬间崩塌。值得玩味的是，当年契丹人之所以能够在中亚迅速满血复活，也正是受益于宽松的宗教政策。

很难说契丹人的做法是对是错，因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有其特定的背景。鉴于蒙古汗国的强大，即使契丹人继续执行宽松的民族、宗教政策，也一样逃脱不了灭亡的结果。这其中最大教训在于，即使从各个层面（包括民族、宗教等）来看，在一个政治体内进行地缘融合是必要的，你也不可能在自己衰弱之时做到这点。换句话说，这样做的前提是执行者本身必须足够强大，否则只会加速自身的分裂。相信这一教训，在今天依然有借鉴作用。

“胡萝卜加大棒”一词，是美国人在 20 世纪初引用于外交政策中的。不过在历史上，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方式，早已让各个时代政治家们操弄的很熟练了。就中文的语境来说，中国史书《三国志》中总结的“恩威并施”一词，倒是显得更加的优雅。当然，

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一政策并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做了。在征服西辽的过程中，宗教自由的胡萝卜，显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让生活在西辽土地上的居民，在改朝换代时承受了较低的损失。

然而仅仅凭借这一政策，蒙古人是无法建立庞大帝国的。就一硬一软的两种手段来说，大棒显然比胡萝卜要更重要。因为只有在大棒威胁下的胡萝卜，才会显得更加的香甜。就好像蒙古铁骑没能在战场上显示出战胜西辽军队的实力，再多胡萝卜也是于事无补的。现在为了让更多人接受“胡萝卜”，蒙古人还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显示一下大棒的毁灭性威力。很不幸，花剌子模人成为了这个倒霉的样本。

第二节 蒙古攻灭花剌子模

成吉思汗率军西征花剌子模

公元 1209 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西征，开启了建立横跨欧亚帝国的征程。成吉思汗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次战争，一方面是因为，如日中天的蒙古人决不能接受花剌子模那样的羞辱；另一方面同样自认为如日中天的花剌子模刚刚为成为一个庞大帝国完成了奠基。只要征服了它，就可以顺势接收这笔遗产。不过在蒙古西征之前，还没有哪个游牧帝国能够同时在东、西线同时取得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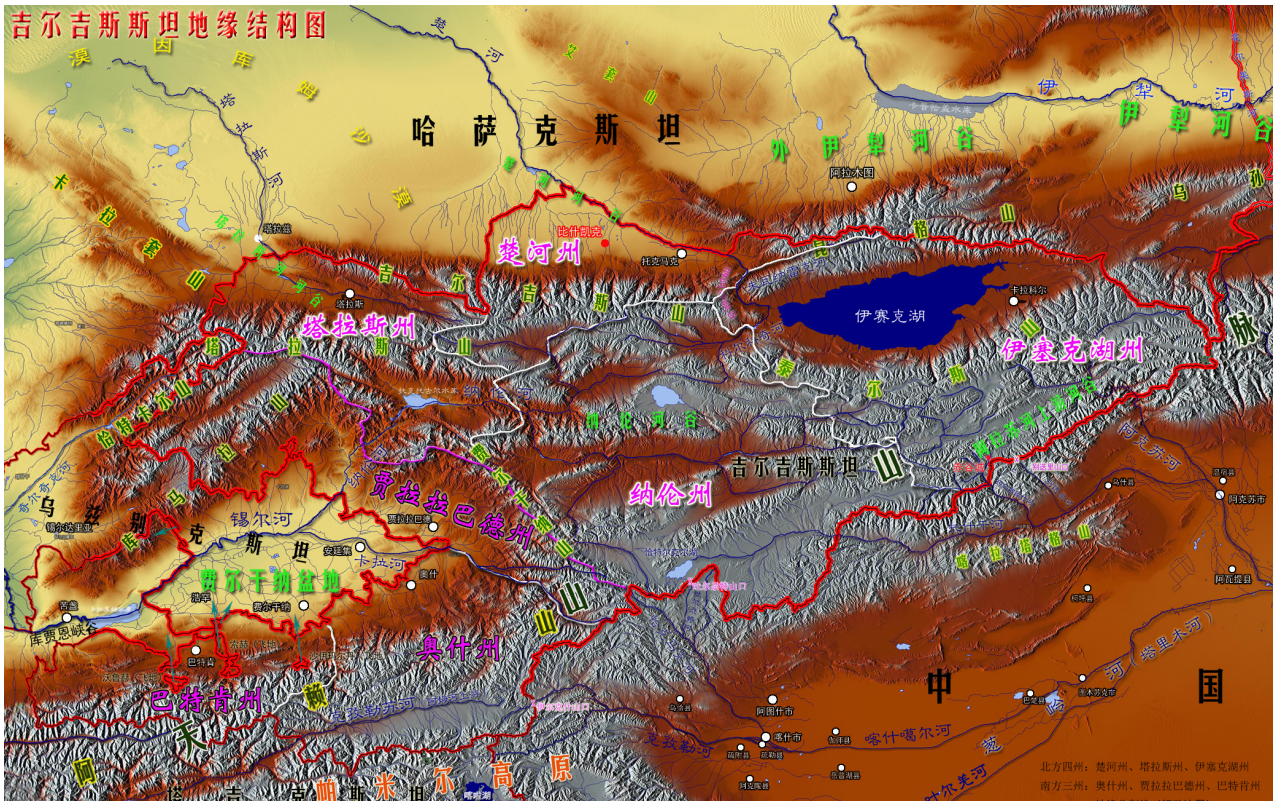
尽管花剌子模在战略上轻视对手，但并不代表他们在战术上也会无视对手的存在。就游牧民族的特点来说，长期与之打交道的花模之模人，了解程度并不比身处东亚的中原王朝要低。显而易见的是，与这些游牧者进行野战是很难占到便宜的。建立坚固的城防工事，以充沛的物资储备打消耗战，是最为稳妥的方案。为此，中央之国的历代王朝，兴建起了规模庞大的长城体系。不过在绿洲散状分布于沙漠之地的中亚（乃至西亚地区），沙漠本身就能起到天然防御作用，长城这种形式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维护。在能够提供淡水和补给的绿洲中修筑坚固的城堡，就更符合当地的防御需求。

大多数情况下，游牧者的进攻并无法持久，无论他们是否掠得自己想要的物资，都会很快退回草原。防御者所要做的，就是在储备足够物资同时坚壁清野，静待这些游牧轻骑兵的撤退。由于花剌子模原有位于阿姆河下游的都城“玉龙杰赤”（土库曼斯库尼亚－乌尔根奇）位置过于边缘，突厥斯坦山下、泽拉夫尚河畔的撒马尔罕成为了花剌子模的新都。如果花剌子模的统治重心在于中亚的话，这个选择在地缘政治上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然而鉴于花剌子模已经取得了兴都库什山脉南北，以及伊朗高原的控制权，花剌子模要想真正成就一个帝国的话，下一步应该需要在伊朗或者阿富汗再建一个新都（取决于它的重心是在西亚还是南亚）。

在蒙古大军即将压境之时，是否把政治中心进一步南移，并不是花剌子模优先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这些土地的实际统治者们也只是刚刚臣服于花剌子模，花剌子

模还没有时间来消化这一切。能否坚守河中各绿洲，才是这个新生帝国存亡的关键。为此，玉龙杰赤、撒马尔罕这新旧两都成为了花剌子模的防御重点（集结了一半的兵力），同时从卡拉套山到费尔干纳的诸绿洲城堡中，也都储备了足够多的物资，以图消耗掉蒙古人的耐心。

从战略方向来说，西征的蒙古大军可以选择两条路线发动进攻：一是从阿尔泰山起兵，穿越伊犁河谷、楚河河谷、塔拉兹河谷，沿天山北麓翻越卡拉套山，在锡尔河中游上次蒙古使者被劫杀的“讹答剌”城一带与花剌子模人接战；二是沿天山南麓，由原西辽最后的都城——塔里木盆地西北角的喀什出发，翻越天山进入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盆地。这两条线路，实际也是两条丝绸之路的主线（新北道与北道），前者是汉王朝所开拓，后者则为唐王朝所打通（官方层面）。



吉尔吉斯斯坦地缘结构图

最终这两条线路都为蒙古人所采用，其中成吉思汗所率领的主力（20 余万），走的是天山北路，而之前由哲别带领征服西辽的部分蒙古骑兵（5000 人），则先期进入费尔干纳方向策应。就蒙古人的意图来说，是希望对手误以为费尔干纳方向才是主力进攻方向。事实上花剌子模人也的确作出了错误判断，将机动部队的主力派往了费尔干纳。不过，这一错误判断本身并不会改变战局的结果，因为花剌子模人要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的唯一希望，只在于那些看似坚固的城堡能否耗尽蒙古人的补给和耐心。

蒙古军队横扫河中地区

花剌子模人调集在河中地区的总兵力约在 40 万，从数字上来看好像略占优势，然而有两个战略层面的因素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首先这是一个内部结构松散、民



蒙古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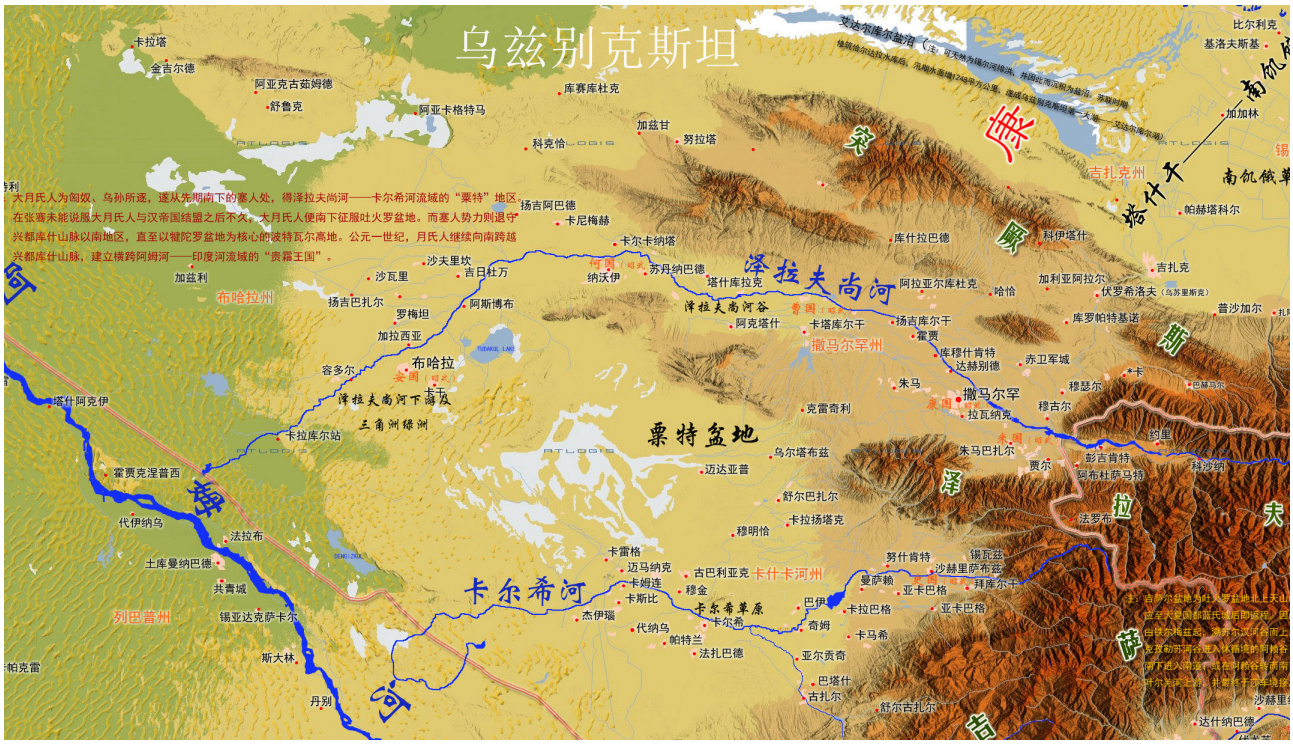
族众多又各有其地的新生帝国。你很难让那些在异地作战的军队，在保卫他人领地时有足够的决心。反观对手，尽管蒙古帝国崛起的时间几乎与之相似，但成吉思汗的优势在于，基于自身的地缘属性，帝国对游牧者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将所有住在毡房里的游牧者统一起来，也是蒙古帝国的国策。而原本一盘散沙的游牧部落同样明白，他们之所以长期在与农耕王朝的角力中，长期只能以袭扰者的身份存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办法集中力量。一旦有一杆汗旗能够将其统一，那么这些原本游牧于荒凉之地（相比农耕区）的牧民，将能共同从富庶的农业区获取超额的回报。

其次虽然总兵力高于蒙古人，但花剌子模所需要设防的据点众多，兵力势必分散。而拥有机动优势的蒙古人，可以选择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至于花剌子模人寄希望以坚壁清野的方式“饿”跑蒙古人的愿景，也在一个个绿洲失守之后，变得希望渺茫。因为每失守一个绿洲，那个绿洲所储备的物资都将成为蒙古人延续战事的资本（所谓“以战养战”）。更何况蒙古人已经先期从西辽那里，收获了从吐鲁番盆地到塔里木盆地的绿洲，能够为他们在天山北麓的战争提供有利的支撑。

很多时候蒙古人的胜利被归结于他们在军事上的强势。一昼夜奔袭 200 公里的效率，以及人马合一的骑射能力，是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然而蒙古帝国之所以如此之快的扩张，更多还在于在外交上简单而又有效的方式。在蒙古大军压境之时，如果原意开城投降的话，那么至少城内居民的生命权可以得到保证（虽然财产还是有可能被掠夺）；如果强烈抵抗的话，则将面临屠城的命运。基于蒙古人在宗教、文化政策上的开放，投降的选项变得更加的有吸引力。

另外，蒙古人在恐吓对手方面的确有着非凡的手段。每当他们攻取一地，都会从当地居民中选取精壮以为副军（中国史书称“签军”），这些非主力部队除了承担军队中的苦役之外，更重要的职能是在后来的战事中排在阵前，增加声势和充当炮灰。于是那些认为自己非常安全的守军，总能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被声势浩大的蒙古军队所包围，并因此而丧失对抗的信心。同时，蒙古人也很善于吸收利用被征服地区的技术。即使在下令屠城之后，那些身怀技能的工匠也总能保留性命，并让以轻骑兵为主的蒙古军队，变成一支能够适应各种战场（特别是攻城器械的制造）的复合型军队。

由于河中之地新附，加之除撒马尔罕之外的其它据点兵力有限，成吉思汗的军队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扫清了包括费尔干纳在内的，锡尔河中上游的绿洲，陈兵于撒马尔罕城下。在围攻这个河中地区最重要的据点之前，蒙古人甚至先迂回到泽拉夫尚河下游，攻占了河中的地区的另一大城市“布哈拉”为首的几个城市，以彻底将撒马尔罕变成一座孤城。



汉西域全图

不过花剌子模的国王，仍然认为撒马尔罕城能够坚守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只是他自己却并不愿意以身犯险，而是退至了吐火罗盆地。驻守这座战略要地的任务，则交付给了非嫡系的，从伊朗高原征召而来的的波斯人，以及从中亚草原招募而来的突厥人（总数约十万人）。问题在于，鉴于蒙古人对游牧者的吸引力，后者的忠诚度完全不能保证。这座被花剌子模寄予厚望的新都，在攻击发起后仅仅几日，就因守军的主动投降而沦陷。

撒马尔罕的失守，意味着蒙古人对河中之地的完全征服。接下来花剌子模的旧都、横跨阿姆河两岸的玉龙杰赤，自然成为了蒙古人的下一个目标。不得不说的是，作为花模子模的发家之地，玉龙杰赤的抵抗要坚决的多。在 7 个多月的防御战中，蒙古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以至于城破之后，这座中亚名城遭遇了毁灭性打击。不仅城内数十万居民被屠，城市更是被憎恶城墙的游牧者所毁。

一年的时间里（公元 1219 年 6 月——1220 年春），花剌子模就失去了他们苦心经营的河中防线。在战前就已经出逃的国王和他的继任者，分别向王朝的新领地：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呼罗珊，以及兴都库什山脉南部的印度河流域逃亡。为了彻底解决掉花剌子模的威胁，蒙古军队亦分别向两个方向进行追击。事实证明，花剌子模之前的

开拓工作并没有白做。逃往阿富汗南部的新国王（扎兰丁），在喀布尔河谷之北的“八鲁湾”（今阿富汗恰里卡尔）又聚集到了十万军队，并对翻越山口而来的三万蒙古军队进行了阻击，史称“八鲁湾之战”。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蒙古军队遭遇了开国以来的第一次大败，峡谷地形以及坑石相杂的地貌，让蒙古骑兵吃尽了苦头。在对手优势兵力的合围之下，三万蒙古骑兵大部被歼。花剌子模的这场胜利，不由的又让人想起了兴都库什山脉那“帝国坟场”的称号。那么这场突出其来的失败，会阻止蒙古西征的步伐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第三节 蒙古侵入印度追击扎兰丁

蒙古军队进入兴都库什山脉

虽然很多战役会被定性为是战略转折点（比如怛罗斯之战），但实际上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并不是一次战场上的成败。是否失败后有力量再战，才是问题的关键点。这就好像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败，中途岛海战的失败并不是真正致命的，让日本走向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与美国对抗的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日本决定突袭珍珠港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点战役统帅山本五十六自己反倒是最清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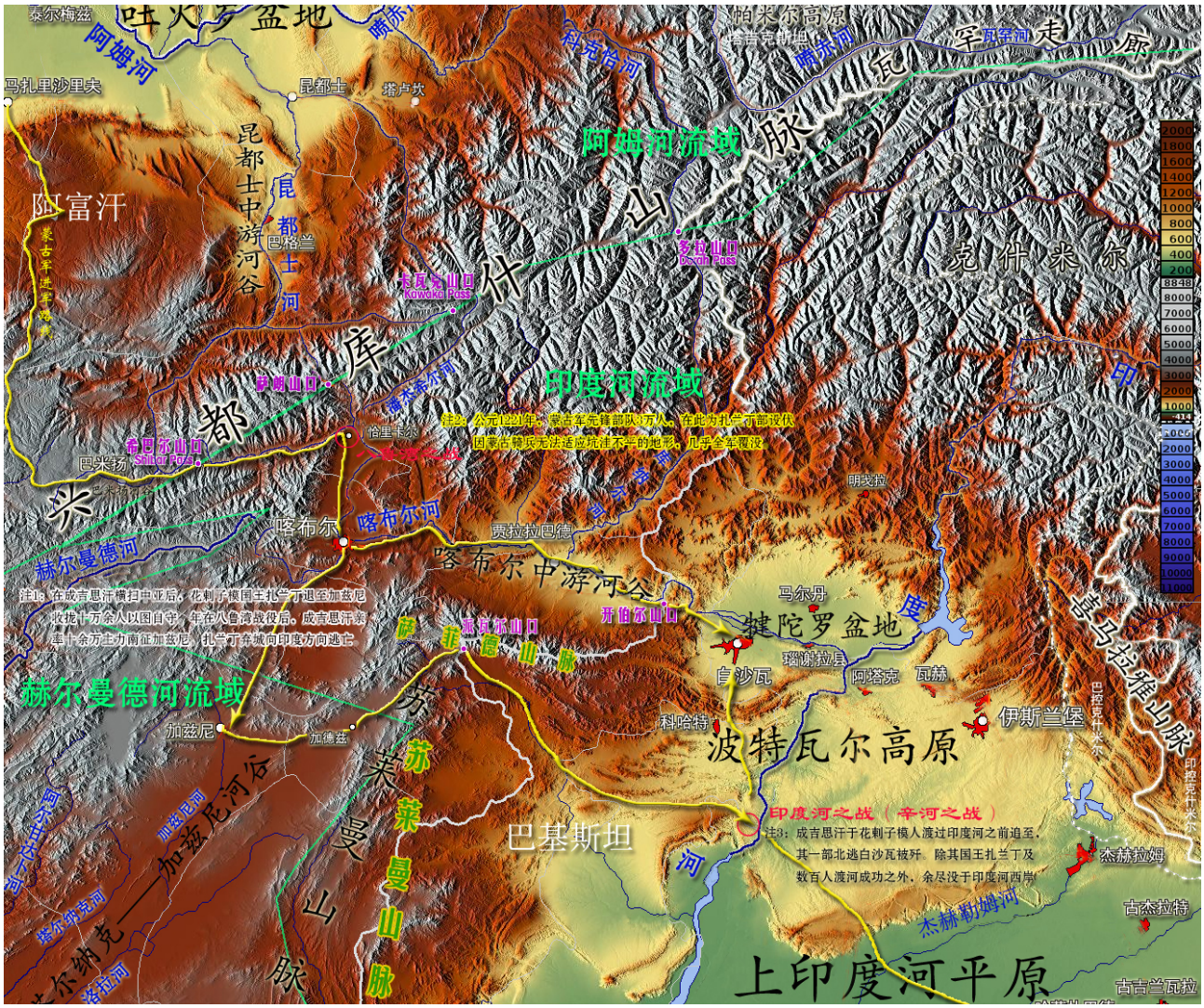
回到蒙西西征的话题上来。在喀布尔河谷遭遇史无前例的失败后，蒙古人意识到花剌子模在阿富汗境内的战争潜力，以及自己在战术上的问题。为此成吉思汗本人亲率十余万主力，迅速由巴米扬（就是那个有大佛的地方）再次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分水岭，准备给予对手致命一击。在压力面前，花剌子模人刚刚积累的一点信心，很快便荡然无存。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他们主动放弃了包括伽色尼在内的阿富汗城市，越过今天的阿、巴边界向印度河方向撤退。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连接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山口中，海拔仅千米的开伯尔山口几乎成了唯一代言人，然而在如此漫长的山地中，能够通行的山口显然不止一个。这就好像一提到华北平原与东北的分割点，大家就会想到山海关所处的那条沿海通道，但燕山山脉之上，还是会有不少对接分水岭两侧河谷的山口（通行难度更高罢了），它们被使用的历史，甚至比山海关要早得多。也正因为此，拥有强大人力、物力的中央之国，才会通过建立一条连续防线（长城），以谋求绝对的安全。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印度河平原与兴都库什山脉之间，倒也具备修筑长城的条件。不过邦国林立的次大陆，并没有做过类似的尝试。在蒙古人到来之前，花剌子模人在阿富汗南部集结的地点，是在当年伽色尼王朝的都城“伽色尼城”。以地理结构的划分来看，伽色尼城处于兴都库什山脉南麓谷地带（具体赫尔曼德河上源——洛拉河的上游）的东部，其北部则是喀布尔所处的“喀布尔河谷”。由喀布尔河谷起，穿开伯尔山口后，进入的是印度河平原与克什米尔山地之间的缓冲高地——波特瓦尔高

原。

开伯尔山口东侧的“犍陀罗盆地”（核心城市为南部的白沙瓦）是波特瓦尔高原的核心区，也是历代外来民族入侵南亚次大陆的跳板。如果花剌子模人想逐次抵抗蒙古人的话，他们可能的选择是波特瓦尔高原。不过这显然不是花剌子模人的预案，要知道如果你在兴都库什山脉那种复杂山地中，都没有信心抵抗的话，到了波特瓦尔高原、印度河平原这种平缓之地，就更没可能抵御蒙古骑兵的冲击了。事实上花剌子模人上一次在喀布尔河谷（八鲁湾）的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审时度势的弃马，以步兵设伏的形式迎战，而蒙古人当时却还固执的坚持他们的人马合一（这次成吉思汗是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了）。



蒙古入侵印度示意图

在地形图上我们会看到，在兴都库什山脉与波特瓦尔高原之间，在是一条体量不大、但海拔颇高的“厂”字形山脉，近乎天然长城般的存在于今天的阿、巴边境。这条山脉的名称叫做“萨菲德山脉”，其与南部的苏莱曼山脉一起，共同成为了兴都库什山脉——南亚次大陆的地理分割线。开伯尔山口，就在这条天然长城的东端。另外，萨菲德山脉的西部延伸部分，也是伽色尼所处的洛拉河谷（赫尔曼德河流域），与喀

布尔河谷（印度河流域）的分水岭。

蒙古取胜后不适应印度气候而撤军

从伽色尼出发进入印度河平原，并不一定要绕经喀布尔河谷和开伯尔山口。伽色尼城位置正是在萨菲德山脉的西南麓。沿萨菲德山脉南麓向东，有一条从“厂”形山脉拐角处穿行，直接进入平原区的山口——“派瓦尔山口”（阿富汗城市加德兹东部），今天，阿、巴两国在此也有公路连接。只不过与开伯尔山口相比，这个海拔 2600 米的山口，通行难度要大一些罢了。在没有信心坚守印度河平原的情况下，急于逃亡的花剌子模国王（扎兰丁），率领还愿意追随他的 5 万余人，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就穿越了派瓦尔山口，向印度河方向转移。然而凭借强大的机动能力，比花剌子模人晚半个月从迦色尼出发的蒙古人，还是在对手准备横渡印度河之时追上了这些逃亡者。

眼看渡河无望的部分花剌子模军队，开始北上向白沙瓦方向逃亡。如果最终能够进入克什米尔山地，那么还是有保存性命的可能性。不过成吉思汗派出的另一支蒙古军队，已经东出开伯尔山口，入驻了犍陀罗盆地，等待这些逃亡者的，只能是一边倒的屠杀。最张为花剌子模留下火种的，是少人跟随着他们的国王，骑马强渡印度河成功的花剌子模人。他们的下一站，恒河平原的门户，今天印度的中心——德里[1]。

在花剌子模人攻灭古尔王朝之前，古尔人曾经横扫恒河平原，一直攻入孟加拉国境内。当然这种占领，并非是真正意义的帝国，而是迫使当地的印度邦国归附。攻灭古尔王王朝的花剌子模人，也在恒河平原一定程度上拥有影响力。问题在于，纯粹从地形条件灭看，在这样的大平原地区是绝对阻挡不了蒙古铁骑的。不过蒙古人在追击了一段路程之后，还是退了回去。后来的几次西征中，也没有再把南亚次大陆作为扩张的方向。说起来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地理影响力并不只体现在地形上，还包括气候。从北亚苦塞之地而来的蒙古人，根本无法忍受恒河平原那湿热的热带季风气候。

蒙古人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中高纬度民族入侵南亚次大陆时，所遇到的最大挑战。相比之下，印度河流域那种干热的热带沙漠气候，反而要更加容易适应些。当然，也会有一些民族，经过时间的洗礼后，最终适应热带季风气候。比如最早的雅利安人、后来建立莫卧尔王朝的突厥人。只是这样做的代价，势必是将自己土著化，并切断自己和故地的地缘联系。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适应还体现在，原本以马上优势征服印度的民族，逐渐因适应环境的原因，习惯使用印度式的军种（如象兵），然后再被新的马上民族所征服。

1　德里为古印度历代首都和自北印度到恒河平原 (Gangetic Plains) 古老贸易路线的主要城市。印度首都德里分为旧德里和新德里两部分，身为印度第二大城市的德里，是印度的首都所在地，城区又可分历史悠久的旧城区及新规划的新城区。旧城区目前仍保有许多重要古迹，新城区部分则是印度现代化的象征。新德里位于德里南部，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始建于 1911 年 2 月。

对于在欧亚大陆还有巨大扩张空间的蒙古人来说，印度的吸引力还不足以让他们决心变成一个热带民族。一定要从欧亚大陆富庶的边缘之地选一个板块来征服的话，长城以南那片与蒙古高原对接的土地，要适合得多。事实上在结束这次攻灭花剌子模的西征之后，蒙古人便很快就在东亚发动了灭金战争（公元 1234 年灭金）。灭金战争结束后，高效的蒙古人旋即进行了第二次西征（公元 1236 年）。

之所以要花些笔墨在蒙古人身上，是因为这个纵横欧亚的游牧民族，前往未有的将欧亚大陆几大边缘地区串连了起来。对于身处东亚，又想了解欧洲的我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把两个平行世界（如果将中央之国视为孤立板块的话）联系在一起的好媒介。在攻取中亚，将触角伸及西亚、南亚之后，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却没有定位于这两个方向，而是开始了在欧洲的征战。

第四节 蒙古西征军进入阿塞拜疆

蒙古军队追击摩诃末并深入伊朗高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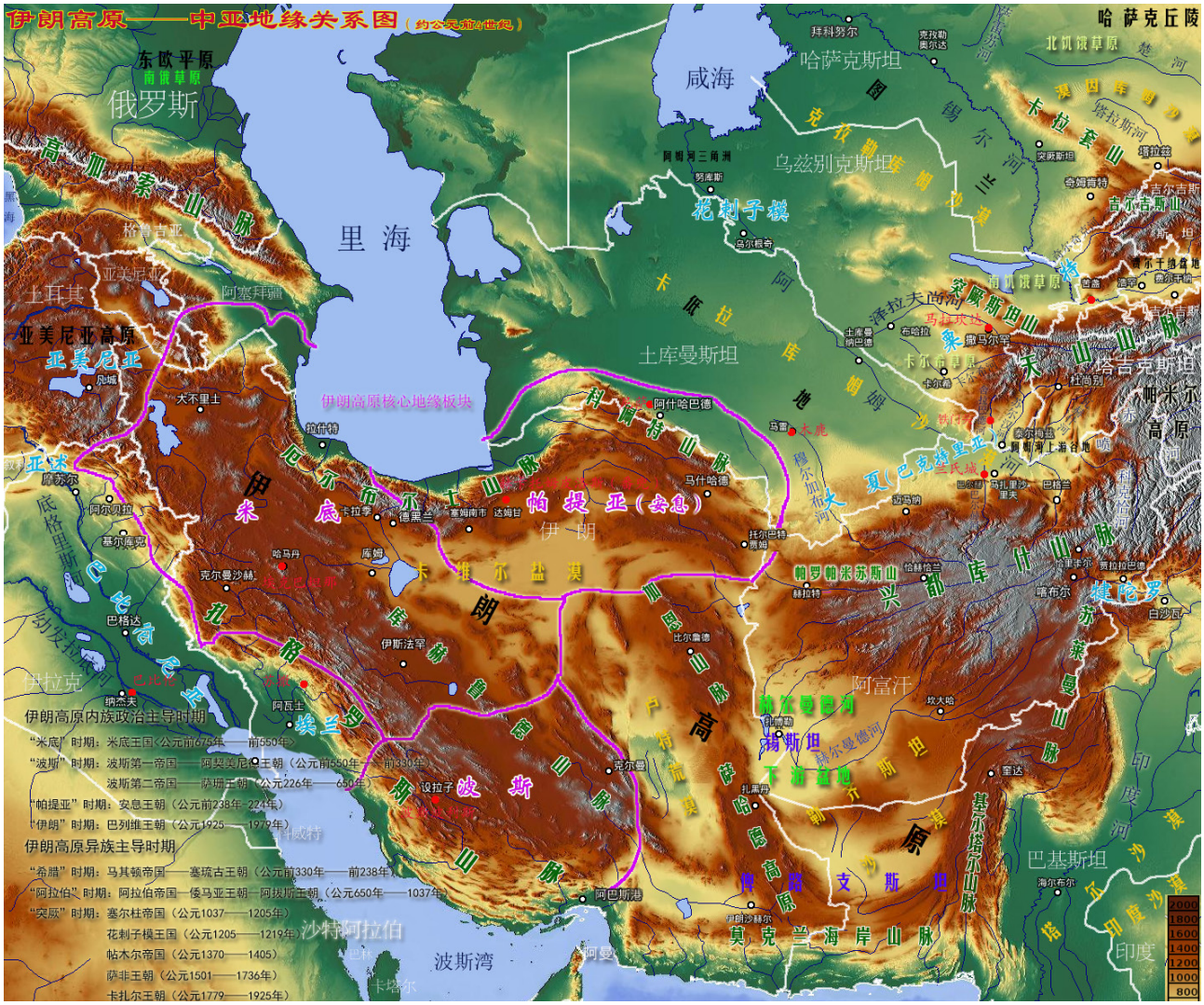
蒙古人在南亚的征战，与我们正在解读的欧洲并无直接关联，这部分内容更多是让我们清楚，蒙古帝国在这个方向的扩张极限在哪里。真正对后来历史有影响的是西线的战事，蒙古铁骑在这个方向的渗透，不仅为后来的第二次西征埋下了伏笔，更是让他们与欧洲和基督教世界接上了火。事件的导火索，依然是那个昙花一现般的帝国——花模子模。

在蒙古人快速攻破撒马尔罕后，身处吐火罗盆地的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对坚守阿姆河防线一事彻底丧失了信心，转而率领王室向伊朗高原西逃（此时玉龙杰赤城尚未受到攻击）。从战略上看，内部结构不稳的花剌子模，的确无法在阿姆河一线阻挡蒙古铁骑。问题在于其战前的计划，却又是把赌注压在阿姆河一线，尤其是新旧两都之上的。这意味着，花剌子模在呼罗珊一线并没有事先筹划第二条防线，逃亡者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仅仅取决于蒙古人的决心。

不幸的是，之前决定与蒙古交恶的花剌子模国王本人（摩诃末），就是成吉思汗此次西征的直接目标。更为不幸的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蒙古人在陆地的机动能力应该算得上是最强的，逃亡的花剌子模人每到一地，蒙古人追兵便很快追击而至。由于花剌子模已经取得了整个伊朗高原的宗主权，蒙古人认为无法在包括呼罗珊在内的中亚地区立足之后，花剌子模国王将很有可能退入伊朗高原西、南部，并集结力量与之对抗。

在此我们先回顾一下伊朗高原的地理、地缘结构。由于印度洋季风并没有光顾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以及南亚的印度河流域，这些地区的水资源都主要是靠高山雪水补给。就这一点来说，在山脉围边的伊朗高原倒是优势十足。不过也正因为这一特点，伊朗高原腹地的那些低地，都为荒漠地带，真正有价值的是紧邻山地的区域。其

中东北边缘的厄尔布尔士山脉（东段）、科佩特山脉，成就了呼罗珊板块（帕提亚板块）；西南的平行分布的库赫鲁德山脉、扎格罗斯山脉，则是南、北对应着波斯、米底板块。



伊朗高原——中亚地缘关系图

以方位来说，地缘属性归入中亚的呼罗珊地区（帕提亚），又可以称之为“东伊朗”；而隶属西亚范畴米底、波斯板块，则可统称为“西伊朗”。 东、西伊朗，或者说中－西亚的地缘分割线，大致对应着里海南岸与厄尔布尔士山脉的中点。另一个方便大家在行政图上分割二者的方法，是找到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位置（当时称Ray，中文译为“拉伊”或“刺夷”）。由东向西进入德黑兰，即意味着进入了西伊朗的范围。

与美索不达米亚直接对接的，是曾经崛起米底王朝的“米底板块”，中心城市为扎格罗斯山脉西北麓的哈马丹。中亚民族在控制呼罗珊之后，一般会先征服哈马丹，再翻越扎格罗斯山脉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蒙古人到来之前，花剌子模也正是沿着这样一条线路，对巴格达进行了一次失败的远征。由于担心花剌子模在西伊朗恢复元气，向西搜索前进的蒙古人连续进占了德黑兰、哈马丹。不过事实证明，已如惊弓之鸟的花剌子模国王，已经完全没有再战的信心了，在蒙古人的步步紧逼之下，只是

想找个地方避祸。

在这个星球上，似乎只有海洋能够阻碍这些游牧者的步伐。半个多世纪后，已经在陆地上扩张到极致的蒙古帝国，本来并不认为日本能够独善其身，然而前后两次渡海远征的失败，让蒙古人意识到海洋暂时还不是他们所能挑战的。花剌子模当下的领土范围，还没有扩张到地中海和黑海之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境内就没有“海”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咸海之西、伊朗高原之北的“里海”，除了没有通道与外海相连以外，各方面条件都可以算得上是“海”了。事实上，里海与相邻的黑海分离，也仅仅是一万年前的事情。为了躲避蒙古人的追杀，摩诃末带着他的儿子们由里海东南角的戈尔甘河口，秘密潜入里海中的岛屿隐身。只是为了快速脱身，王室的其它成员及辎重财物，就只能丢给蒙古人了。

在避入里海之后，触发蒙古西征的摩诃末当年便撒手人寰（公元 1220 年，死后传位于扎兰丁）。继承王位的扎兰丁后来试图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南东山再起的事，前面也已经解读过了。对于我们来说，成为过去式的花剌子模已经不是关注的重点了。而对于取得呼罗珊地区控制权的蒙古人来说，还要不要继续西征才是重点需要考虑的。大多数情况下，中亚入侵者在入主呼罗珊之后，会对伊朗高原西、南部的米底、波斯两大板块更感兴趣，以便最终能够接入富庶的新月沃地。

阿塞拜疆人配合蒙古人过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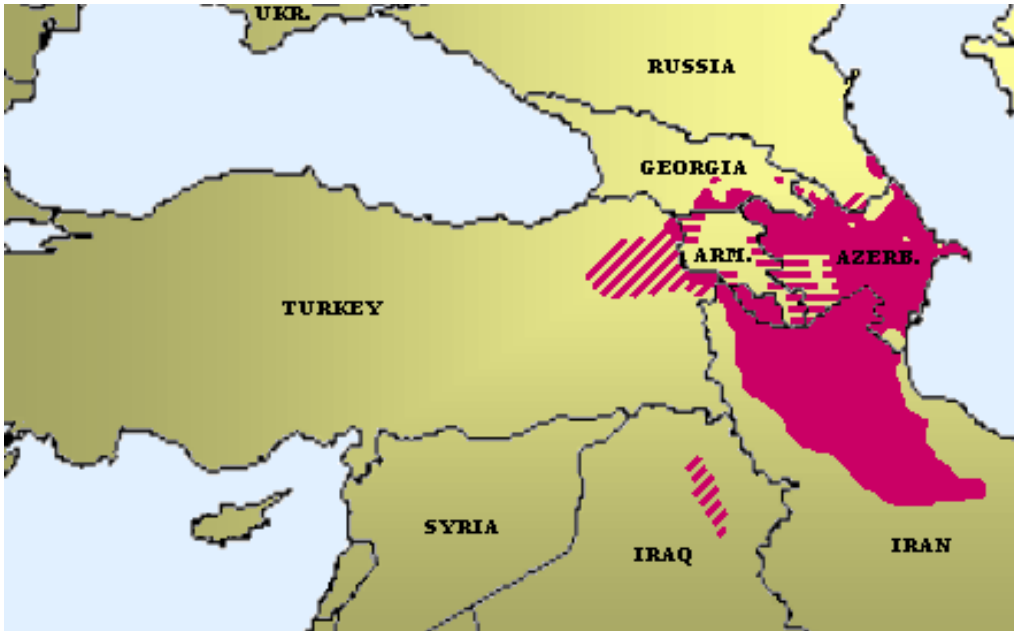
蒙古人已经站上了伊朗高原的土地，并且在西伊朗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对西亚的征服自然也会在考量当中。问题在于以此时他们离“家”已经太远了，在东亚征服金朝战事尚未结束时，无论是陷在西亚还是南亚，战略上的风险都很大。当然，击败花剌子模的计划执行的如此顺利，蒙古人还有时间为将欧亚草原所有游牧部落统一起来的目标做准备。

从大兴安岭到多瑙河口的欧亚草原带，是最适合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存的土地（由于降水稀少，乔木很难成片生长），因此也被称之为“干草原”或者“典型草原”。以阿尔泰山为界，欧亚草原又被划分为东、西两大区域。其中西干草原，尤其是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草原，条件要比蒙古本部所处的东干草原优越许多。正常情况下，亚洲游牧民族，都是从里海——乌拉尔山之间的缺口向钦察草原推进，就像在欧洲草原变身为“钦察人”的突厥系游牧部落一样。不过这次对花剌子模的征服，却让蒙古人产生了打通另一条进入欧洲通道的想法，那就是跨越高加索地区，从里海之西进入当下主要由钦察人覆盖的“钦察草原”。

所谓“高加索地区”，指向的是大、小高加索山脉夹合而成的一片“Z”字形板块。尽管一提到高加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一片山地，但即使在山地为主的区域，其最有潜力的板块还是山间的低地。具体到高加索地区，就是 Z 字形山地间的两片喇叭状低地了。其中面向黑海，以里奥尼河平原为核心的平原区，当下为格鲁吉亚所有；面向里海的库拉河平原，目前为则阿塞拜疆领土。

作为高加索地区的土著，格鲁吉亚人的存在，早在古希腊文明时期，就已经被记录下来了（古希腊人还在此建立了贸易据点）。在希腊神话中，格鲁吉亚甚至还是英雄们寻找到金羊毛的地方。在蒙古人到来之前，格鲁吉亚人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在欧亚地缘政治舞台上发挥着特殊作用。不过鉴于蒙古人此行的目标是前往钦察草原，阿塞拜疆人才是他们前行道路上的直接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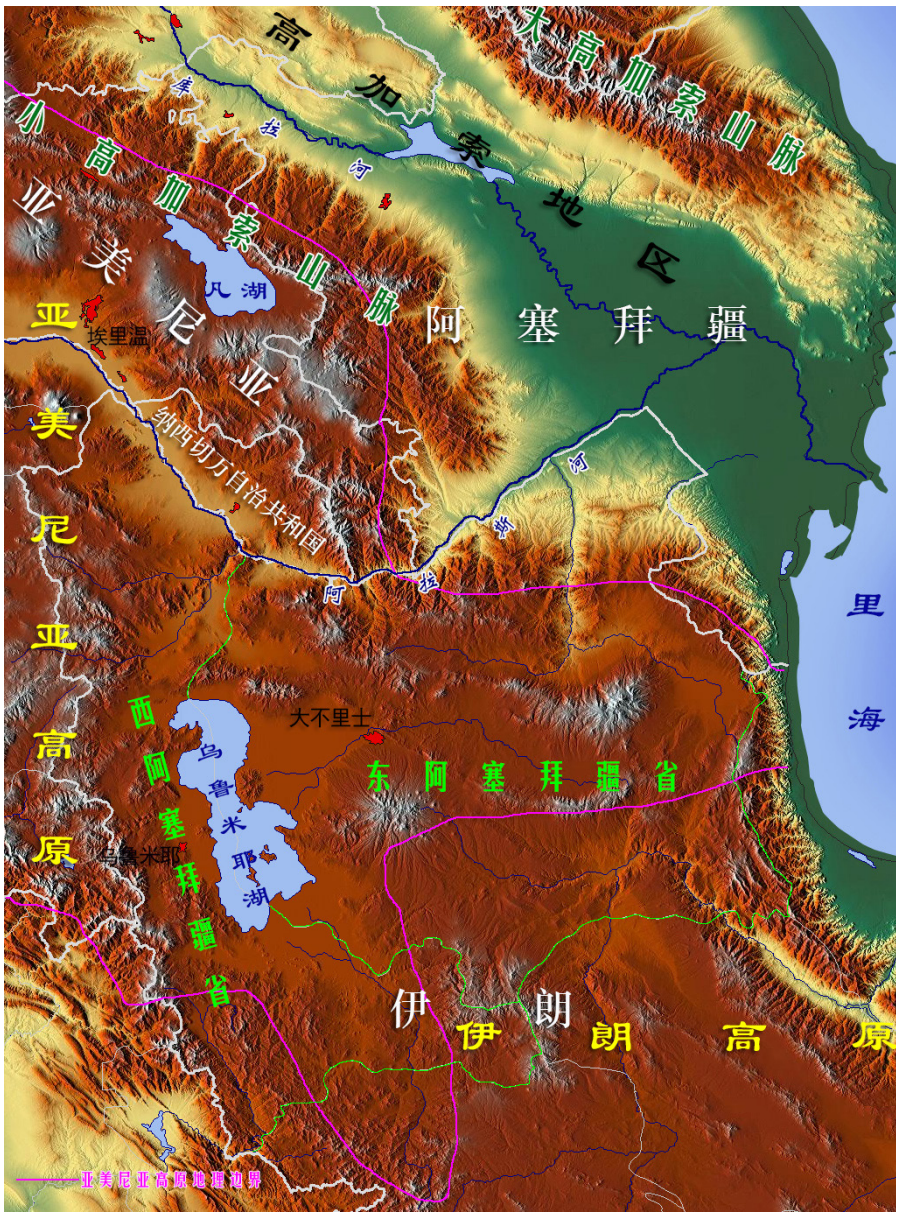
蒙古人当年所遇到的阿塞拜疆人，就是现在阿塞拜疆人的祖先。他们到达这片土地的时间，要远晚于格鲁吉亚人。11 世纪后期，在塞尔柱突厥人征服西亚、小亚细亚及高加索地区后，大量中亚突厥系部落被引入帝国境内。在塞尔柱帝国分裂之后，定居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高原－高加索地区东部的部分突厥人，开始建立政权并形成了突厥属性的阿塞拜疆族。



阿塞拜疆语分布区

如果说面朝黑海的格鲁吉亚人，地缘方面更多受欧洲方向影响的话，那么与伊朗高原无缝对接的阿塞拜疆地区，则一直处在波斯文明的影响下。以至于今天阿塞拜疆人，与伊朗一样归属于什叶派，甚至可以将之称为“波斯化的突厥人”。需要说明的是，阿塞拜疆的概念并不仅限于今天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现在我们看到的阿塞拜疆，实际只是 19 世纪 30 年代，沙皇俄国从波斯人手中割取的“北阿塞拜疆”。南阿塞拜疆则一直留在波斯（现在的伊朗）境内，并建制有东、西两个阿塞拜疆省。在行政地图上，我们会看到伊朗在西北部、里海之西有一个突出部，这就是“南阿塞拜疆”的所在。在南阿塞拜疆北部，甚至还有一块叫做“纳西切万自治共和国”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飞地，横亘在它与亚美尼亚之间。

从地理角度来看，南阿塞拜疆的位置处于亚美尼亚高原（包括纳西切万），而北阿塞拜疆则完全属于高加索板块。一直以来，处于板块相接位置的阿塞拜疆地区，都是各方争夺的焦点。今天南阿塞拜疆境内的“乌鲁米耶湖”，也是古亚美尼亚“三海”（三湖）之一。不过亚美尼亚人失去乌鲁米耶湖地区帐，并不能算到突厥人头上。早在米底时期，操伊朗语的人口就开始向亚美尼亚高原、高加索地区东部渗透成功，并



阿塞拜疆地区示意图

使之与伊朗高原连成一体。

中世纪阿塞拜疆板块的政治中心在今天南阿塞拜疆境内，乌鲁米耶湖东侧的“大不里士”城，这座历史名城今天也是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的省会（湖西为“西阿塞拜疆省”）。 在蒙古人到达阿塞拜疆之前，阿塞拜疆的突厥统治者也和伊朗高原上其它国家一样，表示了对花剌子模的臣服。当蒙古人从哈马丹出发，准备从阿塞拜疆境内过境前往钦察草原时，识时务的阿塞拜疆人并没有抵抗，而是打开了城门将蒙古人迎入了大不里士城。有了阿塞拜疆人的配合，蒙古人在穿越高加索时，看起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一直在与穆斯林交战的蒙古人，很快就会与基督教世界展开第一次交锋。

说到这里，很多人一定想到了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罗斯人。关注过蒙古西征历史的人，大都看到过蒙古大军击败十万罗斯联军的记录。不过这些东斯拉夫人并不是最早抵抗蒙古进攻的基督徒。蒙古人所遇到的挑战，是在翻越高加索山脉之前。那么，是谁代表基督教世界吹响了战争的号角呢？

第五节 格鲁吉亚人抵抗蒙古西征军队

格鲁吉亚国名的渊源

高加索山脉之南的基督徒，这会是谁呢？估计有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那个古老的基督教王国——亚美尼亚，不过答案却是否定的。还记得我们在公元 11 世纪末，

开始解读十字军东征时，曾经提到的“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的地缘政治概念没有？受塞尔柱突厥人入侵亚美尼亚、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影响，大批亚美尼亚人特别是精英阶层，迁居至了拜占庭统治下的奇里乞亚（西里西亚）。当然，仍然还是有大量亚美尼亚人，留在亚美尼亚高原上。不过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的存在，让谋求独立的亚美尼亚人找到了一个政治平台。反之还愿意留在故土的，更多是能够忍受异教徒统治的了。

从地缘结构上看，亚美尼亚人没有办法在他们传统的“三海”地区复国，是因为这是一片封闭的高原之地，在西面的小亚细亚半岛、东面伊朗高原都已经伊斯兰化的情况下（更别说南面的新月沃地了），再在政治上维持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存在，是非常困难的。相比之下，能够通过地中海与欧洲沟通的奇里乞亚，从外部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就大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借助在十字军东征中发挥独特的地缘政治作用，亚美尼亚人能够在奇里乞亚异地复国的根本原因。

既然亚美尼亚作为一个政治板块，已经在亚美尼亚高原上不复存在了，那么谁又可能代表基督教世界，率先站出来阻挡蒙古大军的步伐呢？答案是格鲁吉亚。首先我们来谈一下格鲁吉亚的宗教属性。说起“格鲁吉亚”这个标签，它在中文语境里中唯一能够让人联想到的，就是这个高加索小国了。不过要是变个译法，把英文中的Georgia 变成“乔治亚”、“佐治亚”，或者是人名“乔治”，是不是一下子觉得更加的熟悉了呢？

作为地名，美国的“乔治亚州”（也译佐治亚州）知名度可能还要高于格鲁吉亚。其实格鲁吉亚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译名，都还是“乔治亚”，只是为了与后者区别开，才变成现在这个中文名称。这种情况跟斯拉夫人的“哥萨克”跟突厥人的“哈萨克”，在俄语中原来是一个词的道理一样。所谓“乔治亚”一名，来源于一位公元 4 世纪的基督教圣徒——圣乔治。根据传说，在罗马帝国还视基督教为非法宗教时，这位信奉基督教的帝国军官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出了生命（公元 303 年）。由于在传说中，这位骑士还屠杀了一条恶龙、保护了民众，所以“圣乔治”在普通民众中的声望甚高。

今天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丝“圣乔治”文化，主要是来自于英格兰人。也许是因为他曾经与“龙”战斗过的传说，英格兰人非常喜欢这位屠龙骑士。不过说到以“乔治亚”作为政治标签 ，东正教信仰的格鲁吉亚人可是更有优先权了。格鲁吉亚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二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在罗马帝国通过米兰赦令（公元 313 年）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之后，一直身处罗马势力范围（其沿海地区数次成为罗马领土）的格鲁吉亚人也开始顺应这个潮流。这一历史自豪感，也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两族，在后来的伊斯兰扩张狂潮中，一直能够孤岛般的生存于这片是非之地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同样分布于这片高原之上的库尔德人，就因为没有预先接受过一神教的洗礼，而很快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一份子。

格鲁吉亚的宗教信仰

在分裂的基督教世界，格鲁吉亚人的信仰被归入了东正教体系。这并不让人感到

奇怪，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整个黑海地缘圈长期都是希腊文化和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范围。今天除了伊斯兰化的土耳其之外，黑海周边的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利亚、乌克兰、俄罗斯、格鲁吉亚，都是东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实际上在上世纪初，希腊从解体后的奥斯曼帝国中独立之时，包括黑海地区在内的土耳其沿海地区，仍然生活着大量希腊裔东正教徒。只是在希、土两国正式切割后，双方通过人口交换，都“净化”了自己和种族结构。

从地缘政治层面上看，格鲁吉亚人这么早接受基督教（与罗马保持一致）的原因，是为了对抗萨珊波斯的渗透。虽然罗马人也一直试图控制这片土地（主要是沿海地区），但相比之下，与之陆地相连的波斯人，对格鲁吉亚的威胁要大的多。公元 6 世纪，高加索地区的地理中心，原属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城，就被萨珊波斯攻占。7 世纪在阿拉伯帝国取代波斯，成为西亚之主后，第比利斯也成为了一座被穆斯林统治的城市。等到格鲁吉亚人再次夺回这座城市，时间已经过去 500 多年了。



格鲁吉亚王国（12 世纪）

一方面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饱受伊斯兰世界的压力，这就是格鲁吉亚尴尬的地缘位置。尽管这两个强邻本身也是死敌，但有一点倒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希望看到统一、强大的格鲁吉亚王国，独立于黑海之滨。公元 9 世纪末，在阿拉伯帝国因内部纷争而走向分裂后，格鲁吉亚人借机完成自己的内部统一并独立。王国的黄

金年代，出现在 11 世纪末、12 世纪初。首先打破地缘政治平衡的，是来自中亚的塞尔柱突厥人。

在塞尔柱人入侵之前，罗马帝国不管有没有分裂，都还能够控制小亚细亚半岛，与波斯、阿拉伯帝国等亚洲国家对抗。在这种平衡之下，亚美尼亚王国也好，高加索国家也罢，尽管无法摆脱两大势力的影响，却也能因缓冲国的定位，而夹缝中求生。然而在塞尔柱人入主小亚细亚之后，首先使得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干涉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能力。此时在高加索地区有一个独立的基督教王国，帮助牵制塞尔柱人，反而能够帮助拜占庭人解压。其次，在昙花一现的塞尔柱帝国陷入分裂之后，十字军又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一线登陆，整个西亚穆斯林世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这使得格鲁吉亚在亚洲方向的压力，也趋向缓解。

迎来了千载难逢战略窗口的格鲁吉亚王国，随之开始进入扩张斯，不仅夺回了第比利斯这个地缘枢纽（并立为国都），还向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高原方向强势扩张。以至于十字军们通过第四次东征，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立“拉丁帝国”（公元 1204 年）后，格鲁吉亚人可以帮助小亚细亚东北沿海地区的拜占庭人，建立“特拉比松帝国”（与尼西亚帝国、伊庇鲁斯国一同自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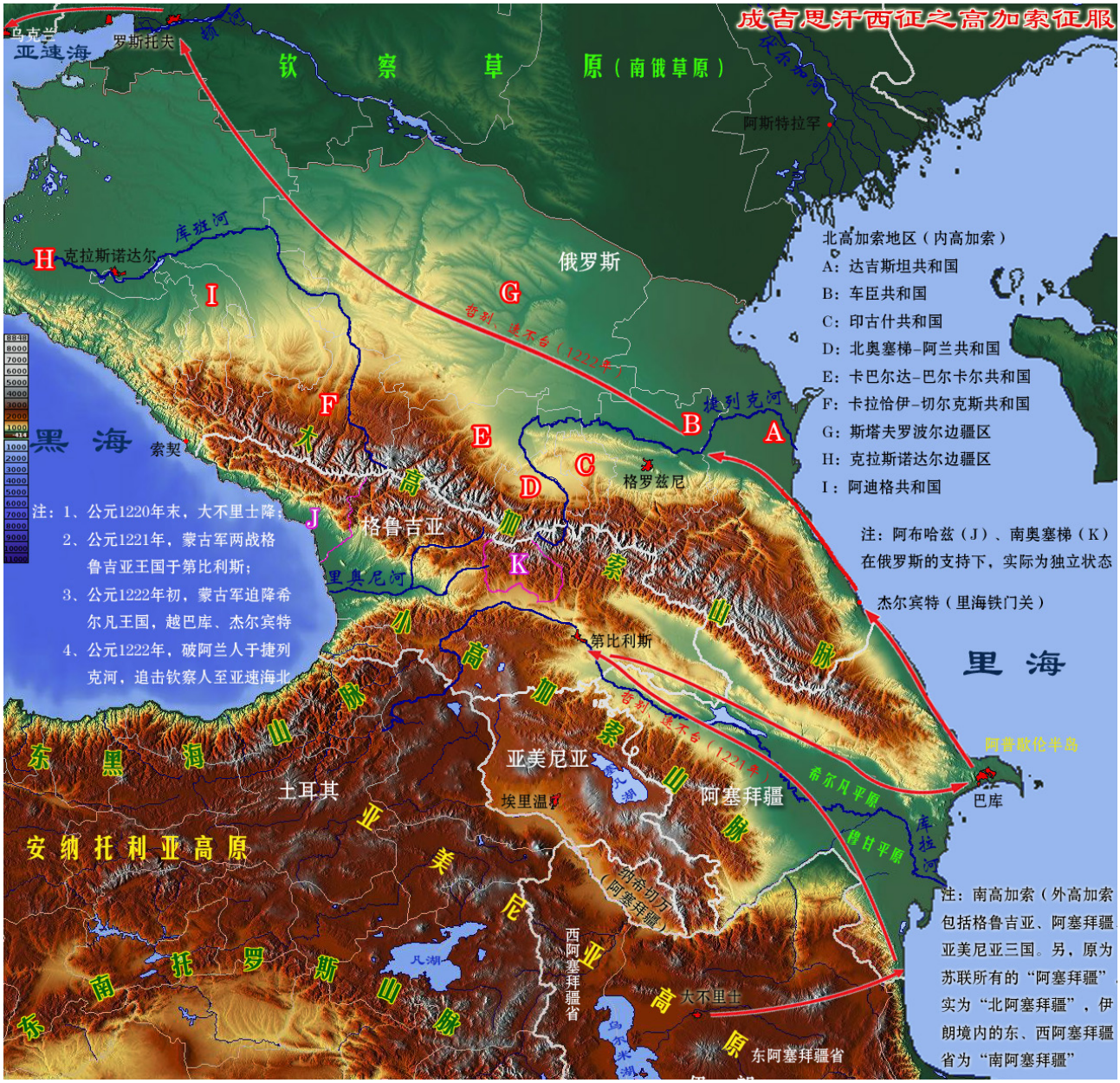
在蒙古人到来之前，格鲁吉亚的领土已扩张至包括现代亚美尼亚在内的北亚美尼亚高原（基督教地区），而北阿塞拜疆及亚美尼亚高原的其它穆斯林地区（除南阿塞拜疆之外），亦成为了格鲁吉亚王国的势力范围。此时的格鲁吉亚王国，可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高加索第一强国。同时这也意味着，在大不里士驻扎的蒙古人，想要进入钦察草原的话，势必要触及格鲁吉亚人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统治强大格鲁吉亚王国的是一位女王。今天格鲁吉亚的钱币“拉里”（50 元面值），还印着这位叫“塔玛拉”（Тамара）的女王的头像。面对蒙古铁骑的威胁，格鲁吉亚人是战还是和呢？

蒙古人放弃征服格鲁吉亚

公元 1220 年末，蒙古人离开南阿塞拜疆，进入北阿塞拜疆。生存在北阿塞拜疆的突厥部落，并没有对蒙古人的到来感到恐惧，相反倒是热切希望这些来自亚洲的游牧“兄弟”，能帮助他们摆脱格鲁吉亚人的控制。无论从宗教还是原始属性来看，突厥人跟蒙古人之间的亲近感，都要远高于信仰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人，双方结成同盟也在情理之中。在这些突厥人的“帮助”之下，蒙古人在公元 1221 年初对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发动了第一次进攻。

观察一下第比利斯的位置，就知道为什么这座城市会成为首要目标了。虽然我们说，格鲁吉亚的核心部分是面朝黑海的里奥尼河平原，但第比利斯的位置却是在库拉河上游。相当于在 Z 字山形的中点。很显然，这是一个进可攻、退河守的位置。即使格鲁吉亚不想做整个高加索之王，守住第比利斯也可保其国家存续。当然，不是说有了地利就能够取得胜利，要想抵御住蒙古人的进攻，格鲁吉亚还需要有支强大的军队。

除去大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外，格鲁吉亚能够在高加索地区崛起，技术上的原因在于从钦察草原招募数以万计的游牧者，加入自己军队服役。相比农业定居者，游牧者更像是天生的战士，从欧亚草原输入战士，也一直是中、西亚的诸王朝的常见做法，区别只在于方法不同。比如波斯人、阿拉伯人，喜欢用“古拉姆”奴隶军人的形式。而格鲁吉亚人所采用的方式，则是以服兵役来换取国民权和土地（美国目前在补充兵员不足时，也使用了类似方法）。



成吉思汗西征之高加索征服

数万钦察骑兵的加入，使得格鲁吉亚王国拥有了与蒙古骑兵对抗，甚至野战的资本。公元 1221 年初和年底，蒙古人对第比利斯前后发动了两次攻击，史称“格鲁吉亚之战”（或译“乔治亚之战”）。总的来说，格鲁吉亚人的战损要更大些，损失了近半精锐骑兵。然而蒙古人也意识到，这个山、海之国并不是一两场战役就能征服的。虽然格鲁吉亚王国，并非蒙古人遇到的最大障碍，但问题在于，成吉思汗派出这两万

蒙古骑兵北伐的目标，并不是征服高加索，而是去钦察草原探路。能够顺带征服格鲁吉亚，当然是更好；不能的话，也就没有必要纠缠下去了。最终，蒙古人暂时放弃了征服格鲁吉亚的想法，开始沿里海西岸向北高加索地区进发。元气大伤的格鲁吉亚人，自然也不会不识趣的追击上去。

第六节 北高加索地区复杂的民族结构

北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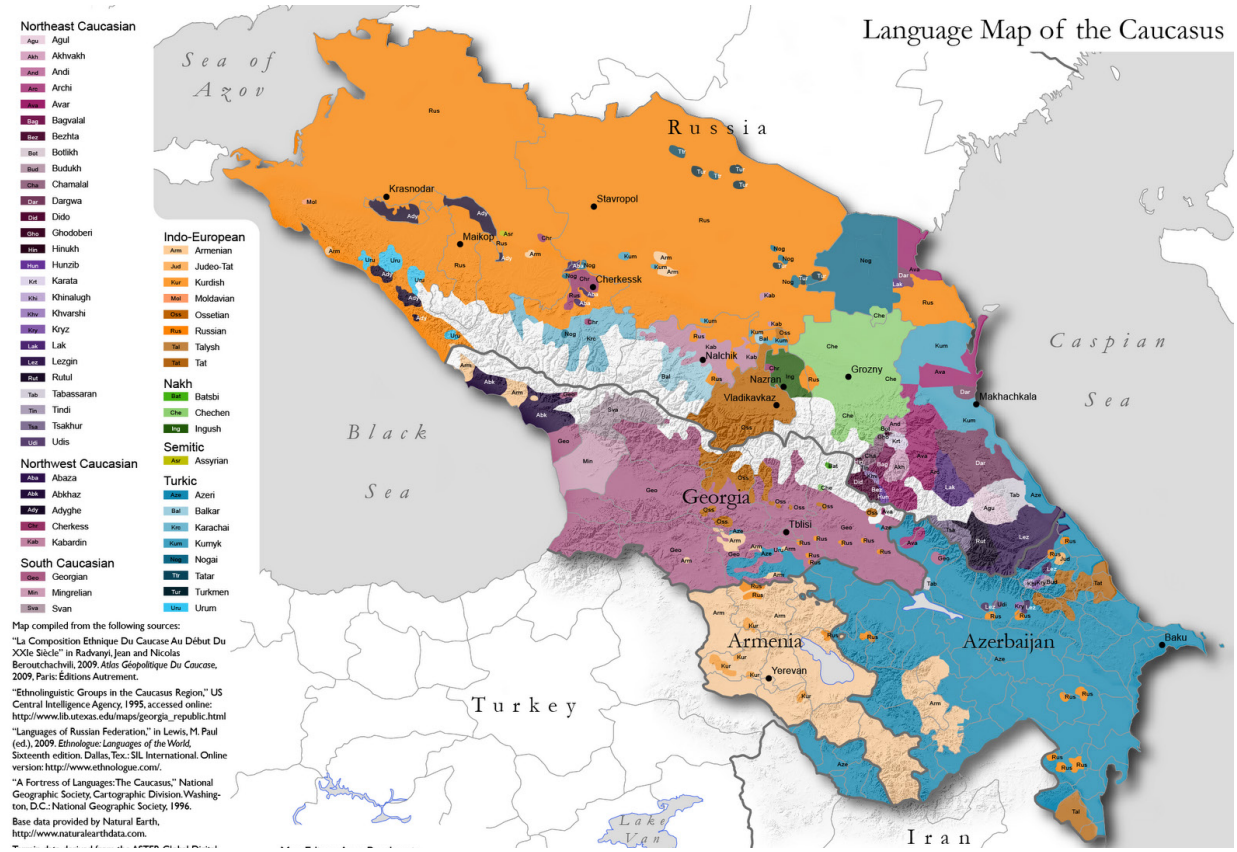
在此我们需要先对“高加索”的地缘概念再做一次解读。通常所说的高加索地区，很多时候也会包括大高加索山脉分水岭以北地区。其中分水岭以南被称之为“南高加索”或者“外高加索”。地缘政治上一般指向所谓的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分水岭以北，则是“北高加索”或者“内高加索”。很显然，这个内、外之别是站在俄国人的角度来划分的。



高加索地区示意图

今天归属俄罗斯的内高加索地区，行政上归属于“北高加索联邦管区”， 面积为 17.2 平方公里，仅占俄罗斯总面积的 1%（人口不到千万）。然而这个弹丸之地，却跻身俄罗斯八大联邦区之列（如果加上还不被国际承认的克里米亚，就是 9 个），可以想见其地缘政治地位有多么的重要。另一个证明高加索地缘政治地位的，是“北高加索联邦区”的成员。这个联邦管区包括：达吉斯坦共和国 、印古什共和国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 、

车臣共和国等 6 个自治共和国，加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七个联邦主体组成的。要知道，俄罗斯境内拥有最高自治权的“共和国”，一共也只有 22 个（另有 46 个州、9 个边疆区、4 个自治区、1 个自治州、3 个联邦直辖市）。



高加索语言分布图

北高加索地区的语系和宗教

每一个北高加索自治共和国的国名，都对应着 1 到 2 个民族，大部为语言上属于高加索语系的土著，并且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为主）。这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逼迫俄罗斯发动两次车臣战争的“车臣人”了。唯一独立于这个“高加索——伊斯兰”体系之外的，是奥塞梯人。从语言上来说，奥塞梯人属于与欧洲人更相近的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宗教上则信仰东正教。知晓了这一点，大家应该能够明白，2004 年车臣分离主义武装分子，为什么选择北奥塞梯，制造震惊世界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了。

身处一片语言不同的高加索土著当中，奥塞梯人选择与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一样的宗教信仰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就像基于同样的理由，那些弱小的山地高加索人选择了伊斯兰教一样。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奥塞梯人是从哪里来的，又与我们正在解读的蒙古西征有何关联？可能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北奥塞梯这个标签，是和“阿兰”一起分享国名的，那么这个共和国的主体民族是奥塞梯人和阿兰人两族吗？答案并非如此，“阿兰”一名，更多代表着奥塞梯人的历史，因为他们是阿兰人的后裔。

阿兰人我们并不陌生。在很长一段历史中，阿兰人成为了欧洲游牧民族，或者说印欧语族游牧民族的代言人。在汉帝国开拓西域的历史，以及日耳曼人入主罗马的过

程中，阿兰人及其所属的游牧集团都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不过在匈人、突厥西进之后，作为欧洲游牧民族的最后代表，阿兰人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在蒙古人到来之时，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北高加索地区，成为了阿兰人最后的保留地。在苏联解体之前，这个俄联邦所辖的自治共和国，全名还只是“北奥塞梯共和国”。1991 年，借助苏联解体所引发的混乱，北奥塞梯人为自己的国名，加上了代表历史的后缀——阿兰。

由于在这片是非之地，东正教信仰的奥塞梯人对俄罗斯有着特殊地缘政治价值，因此这一更名并未造成莫斯科的不安。真正让莫斯科感到不安的，其实是带有强烈地缘独立意味的“高加索”。以至于 2000 年普京将其并入了相邻的“南方联邦管区”。不过这种名称上的改变，并不能淡化这一地区的高加索属性，相反还增加了双方的不信任感。以至于 10 年之后，北高加索联邦管区再次独立建制，七个联邦管区也变成了八个。

对于后苏联时代的俄国来说，北奥塞梯人的存在，不仅是打入北高加索地区的一颗楔子，更可以帮助俄国人在南高加索地区做同样的事。因为奥塞梯人的分布区，跨越了高加索山脉分水岭，在格鲁吉亚境内、第比利斯西北部还有一个奥塞梯人为主的政治体——南奥塞梯共和国。2008 年 8 月 8 日，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的同一天，俄罗斯、格鲁吉亚为了争夺南奥塞梯的控制权，爆发了一场历时十天的战争，全称“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战争结束之后，一直谋求脱离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共和国，正式获得了俄罗斯的承认，并作为俄罗斯的卫星国，保持独立到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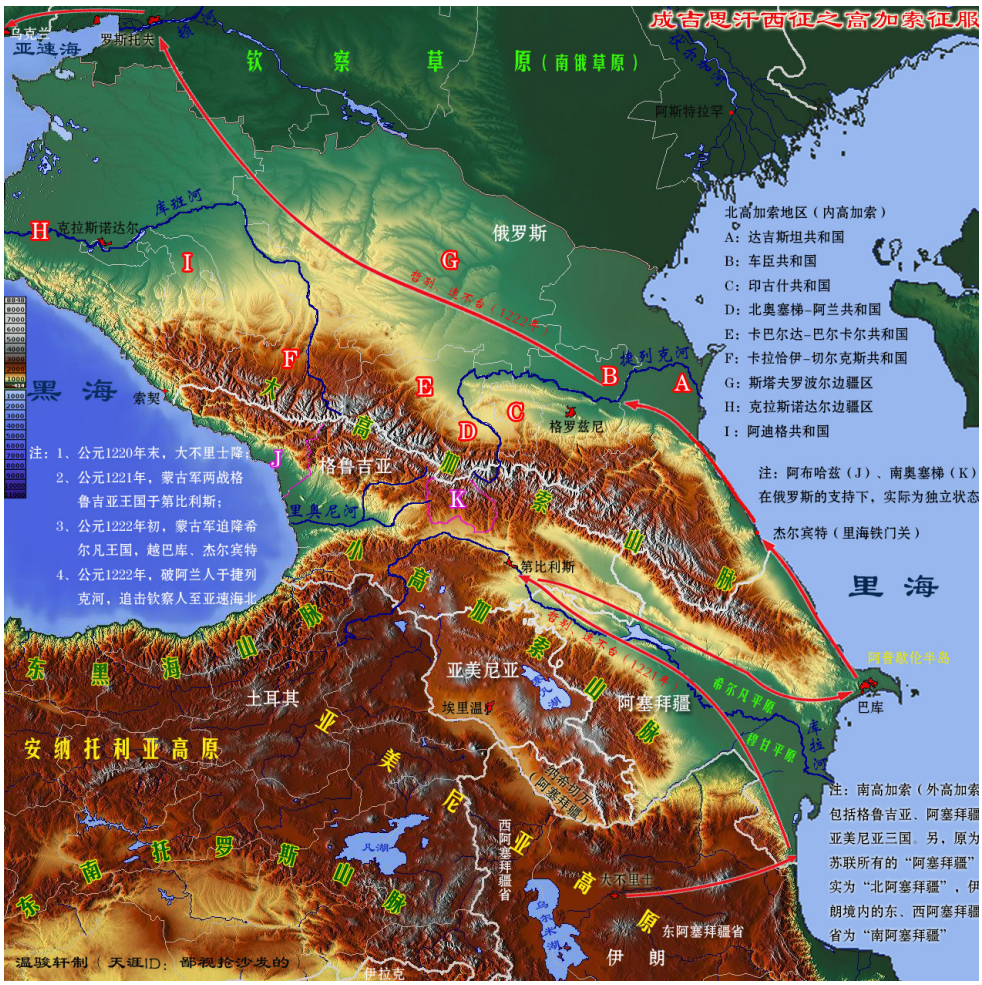
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解读北高加索的地缘结构，是因为蒙古人进入钦察草原的第一站，就是北高加索地区，而当时阻挡他们前进步伐的正是被阿兰人。那么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第六节 蒙古人进入北高加索并击败阿兰人

蒙古军队穿越铁门关进入北高加索

通常情况下，翻越一个高大山脉的办法，是在分水岭两侧各找一条源头相对的河谷，以为天然道路。两条河谷当中的最高点，就是“山口”了。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口，大多也是构筑于此种地形中。不过要是山脉一头与“海”相连，那么山、海之间狭窄的沿海低地带，会更有机会成为沟通山脉两端通道的首选（除非海侵的厉害，没有沿海低地）。比如著名的山海关、温泉关，扼守的都是这样的沿海通道。而高加索山脉两端，恰恰也都有“海”。

高加索山脉东南端直接对应的，是一片叫做“阿普歇伦半岛”的半岛形低地。这个伸入里海的海岬，当下也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巴库”所在地。在蒙古人到来之时，阿普歇伦半岛及库拉河以北的阿塞拜疆地区，是被一个叫做希尔凡（Shirvan，中文资料也译为：失儿湾、设里汪）的王国所有。今天巴库城内，还有一座始建于公



成吉思汗西征之高加索征服

元 14 世纪，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希尔凡宫”遗址。很显然，与阿塞拜疆境内的其它穆斯林王国、部落一样，希尔凡人也无意于与蒙古人硬碰硬。在他们的带领下，穿越阿普歇伦半岛的蒙古军队，继续向钦察草原进发。

位于山脉东南端的阿普歇伦半岛，并非是扼守高加索通道的唯一要地。从地形角度来说，这条将近 400 公里的沿海通道，最紧张的关口是位于其中部的“杰尔宾特”。由于高加索山脉在此有一个突出部伸入里海，与海岸线的距离仅仅只有 3 公里（古时应该更短），杰尔宾特的防御难道是整条通道中最低的，也因此成为了内、外高加索地区的地缘分割点。不过基于可以理解的地缘政治因素，管辖这个战略要点的，是隶属北高加索的俄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而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行政边界，也位移到了杰尔宾特之南，

波斯语中，杰尔宾特有“门”的含义，俄语中则有“铁门”之意。在中世纪，这是一个由两道数公里长城保护而成的城镇，城墙的一头连着高加索山脉，另一头则连着里海，共同护卫着则构筑于山丘之上“杰尔宾特古堡”。由于亚历山大的名气太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的杰尔宾特，也被误传为是亚历山大曾经到过的“铁门关”。但事实上，马其顿军团并未对高加索地区进行过征服。这支强大军队曾经穿越过的“铁门关”，位于中亚吐火罗与河中地区的分割线上，今乌兹别克泰尔梅兹市西北（西域部分曾经详细解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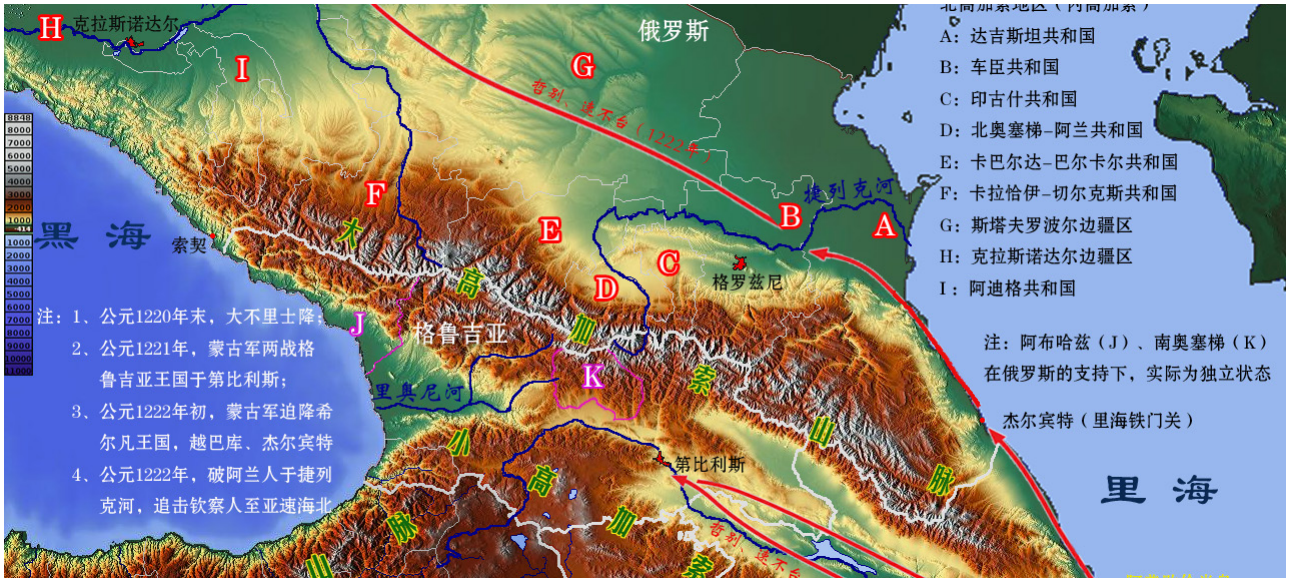
屈服于蒙古人的声威，“里海铁门关”并未对蒙古人的通行造成障碍，然而恐吓并不总是奏效，最起码北高加索的阿兰人，希望在战场上验验蒙古骑兵的成色。现在，我们需要了解一下，阿兰人准备把防线设在哪里。绝大多数有价值的地理单元，境内

都会有一条或者数条河流作为主脉，这些河流也往往是战场所在地。与南高加索的情况一样，北高加索也有东、西两条主要河流。其中发源于大高加索山脉北坡向西注入“亚述海”的是“库班河”；向东注入里海的，是捷列克河。

如果从地缘角度来看，最起码库班河下游及其南部山地，应该都是北高加索的范畴，但需要说明的是，北加索地区在黑海－亚速海的海岸线，在俄联邦的行政编制中，并未被划入“北高加索联邦管区”，而是和亚速海东部的沿海平原一起，归入了“南部联邦管区”中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显而易见，这同样是一个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作出的划分。由于无法完全抹去这一地区的高加索印记，在库班河之南，还有一个完全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包围的“阿迪格共和国”（阿迪格人，也是属于高加索民族）。

蒙古人分化阿兰人与钦察人同盟使阿兰人投降

既然里海沿岸，有一个扼守山海通道的“铁门”杰尔宾特，那么在相对应的黑海沿岸，应该也有这样一个地标了。从位置上来说，最有资格承担这项任务的，应该就是 2014 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主办地“索契”了。不过大高加索山脉与黑海的距离非常接近，沿海通道也要狭窄的多，可以说整条岸线的地势，都有如杰尔宾特那般险要。索契虽然是黑海通道的中点，却也因此没有特别的比较优势。另外，由于黑海与地中海相连，自希腊时代以来，海上交通的重要性都要远高于陆地交通。在鉴于此，索契及其所属的“大高加索山脉—黑海”通道，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远不如东部的“大高加索山脉——里海”通道（索契城的建城史，也只有 16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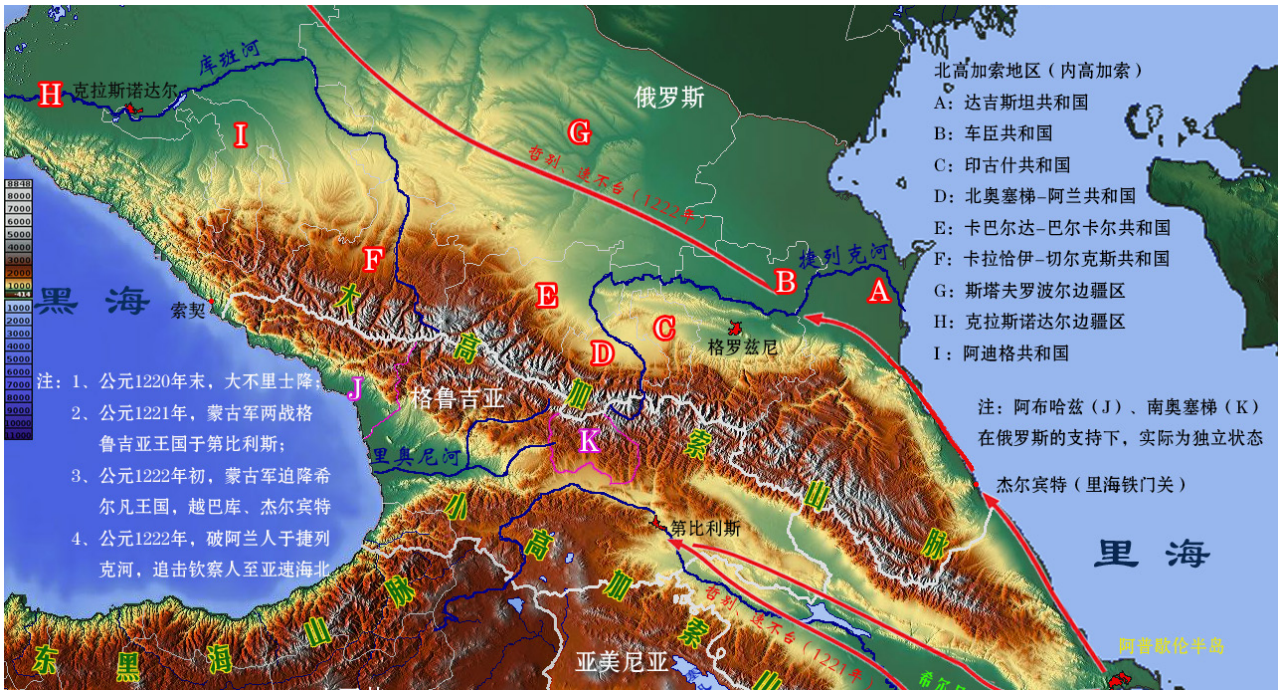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西征之高加索征服

既然已经解读到了高加索和黑海的关系，顺便也说一下这一地区当下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相比封闭成湖的里海，一直希望弥补海洋短板的俄国人，更为重视黑海岸线的争夺。从乌克兰手中重夺克里米亚，便是服务于这一战略。在此之前俄国人还间接从格鲁吉亚境内，分割出了 200 公里的岸线。与这条岸线相关联地缘政治板块，就

是与南奥塞梯一样，因俄国支持而事实独立的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共和国”。前面我们说了，注入黑海的“里奥尼河”是格鲁吉亚西部平原区的核心河流。不过这条河流的位置有些偏南，整个平原区靠近大高索山脉的西北部，并不属于里奥尼河流域，而是由一些较短的独流入海河流所覆盖。格鲁吉亚这个拥有一定地缘独立性的西北角，就是阿布哈兹。

阿布哈兹人也是高加索土著，只不过他们并没有和相邻的格鲁吉亚人一样，信仰东正教，而是和大多数高加索民族一样成为了穆斯林。在奉行民族自治原则的前苏联，当时人口不到 10 万的阿布哈兹人也获得了“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并且在行政上控制了格鲁吉亚一半的海岸线。在苏联解体之时，阿布哈兹境内的多数民族也是格鲁吉亚人。借助苏联解体时的政治混乱，阿布哈兹人也希望乘乱独立。相比格鲁吉亚 400 多万的人口，阿布哈兹人的人口数量甚至很难支撑其自治地位，更别说谋求独立了。只是结果大家也已经看到了，试图在外高加索地区和黑海地区恢复影响力的俄罗斯，成为了阿布哈兹独立的幕后支持者。



成吉思汗西征之高加索征服

作为地缘政治热点，借助蒙古西征了解高加索地区的恩怨，有助于理解相关地区的时政新闻。尤其在普京帮助俄国人重拾帝国梦后，这些定时炸弹一般的热点地区，说不定哪天就会登上全球媒体的头条。不过顺着蒙古人的马蹄，我们现在还是要把视线拉加到北高加索地区的东部。由于蒙古人是从里海沿岸跨越穿越的外高加索，“捷列克河”（ Terek，在很多国内资料中，也被译为“帖雷克河”）自然成为了他们的下一站。

今天的“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正是位于捷列克河上游的山前盆地中，在向东穿越车臣、达吉斯坦之后，河流最终注入了里海。在蒙古人到来之时，主导整个捷

列克河的就是阿兰人。当蒙古人抵达捷列克河下游之时，等待他们的并不仅有阿兰人，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钦察草原的钦察人（北高加索土著部落也加入了联军），随之而进行的战役，被称之为“捷列克河之战”。

面对蒙古人的到来，钦察人和阿兰人因共同的恐惧感而结成同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占据的是欧亚大陆最好的草原地带。基于地缘属性的问题，蒙古人直接入主这片草原的可能性，甚至要大于对那些富庶农业区（农业区更多是采用间接管理的方式）。现在蒙古人的问题来了，虽然蒙古铁骑已经横扫了亚洲大陆，声威也足以让欧洲的对手胆寒，但此时列阵于北高加索的蒙古军，人数至多只有三万。在战术相近的情况下，拥有人数优势的对手如果团结一心的话，那么蒙古人的探路之举很可能就将终结于此。

任何将蒙古帝国的成功，仅仅归结于军事层面的判断都是错误的，蒙古人的机会在于，对手并非铁板一块。在扩张过程中，蒙古人已经无数次展现过，他们在外交层面的手段。这一次也不例外，钦察人与阿兰人相远，却与蒙古人相近的亲缘关系，成为了蒙古人的突破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阿兰人是欧洲游牧民族的一员。白种人+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使其与钦察人的黄种人（部分黄白混血）+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有着明显的差异。相比之下，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黄种人的蒙古人，会更容易让钦察人有亲近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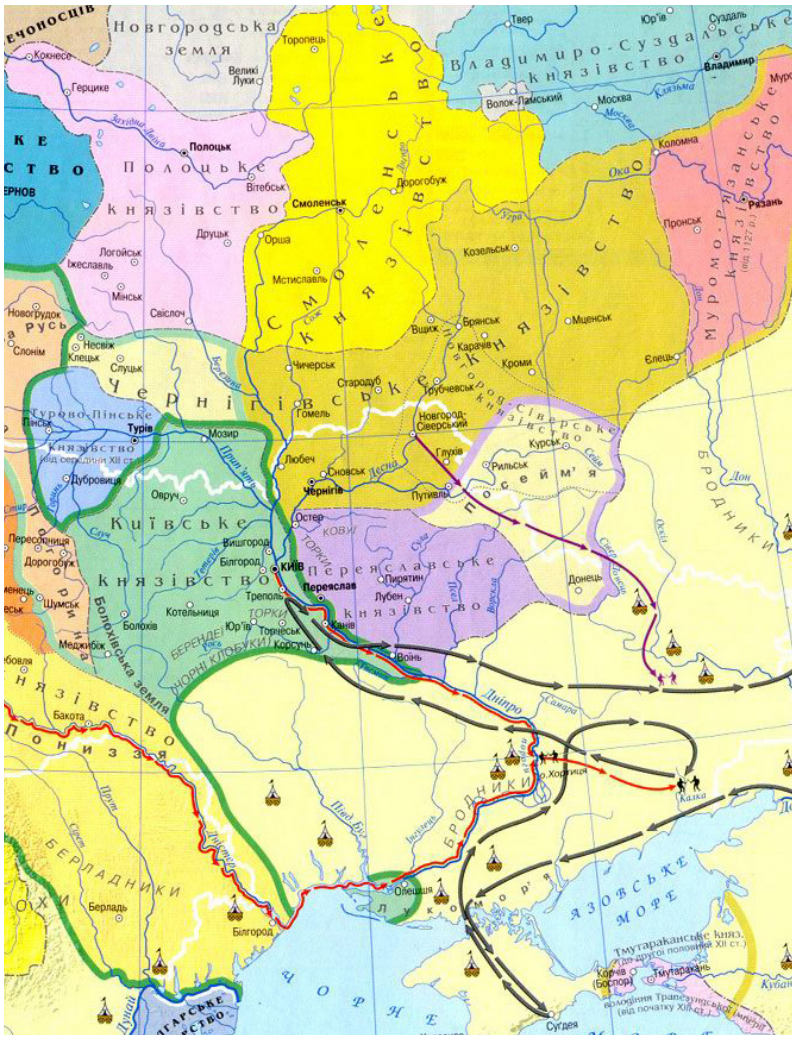
事实上，所谓的“蒙古高原”并非一开始，就为蒙古人所覆盖。在蒙古崛起之前，突厥语族的部落，才是这片高原的最强者（包括匈奴也应该是突厥语族）。在成吉思汗和“蒙古”部落崛起于高原东部之时，高原的西部、中部，都还为突厥系游牧部落所有。只不过，在蒙古统一亚洲草原之后，这些臣服的突厥部落被迁往了中亚（克烈、乃蛮），整个高原也随之成为了蒙古人的根基之地。基于这一地缘关系，蒙古诸部突厥语普及程度、军队中的突厥成分都很高。

蒙古人让钦察人相信，基于两者的亲缘关系，蒙古汗国并无意于入主钦察草原，这次远征的目标只在教训一下阿兰人。钦察人之所以愿意“帮助”阿兰人，正是因为担心蒙古人觊觎钦察草原。现在蒙古人既然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并视自己为同盟，那么钦察人也犯不着再为“异族”的阿兰人而以身犯险了。钦察人的骤然后撤，使得在捷列克河奋力与蒙古人撕杀的阿兰人（包括高加索人）很快陷入了困境，并不得不归降于对手。至于把北加索地区拱手让给蒙古人的钦察人，是否真的能与蒙古人共享欧亚草原，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七节 蒙古人进入南俄草原

蒙古人从亚速海北部进入南俄草原

蒙古人当然不会与钦察人共享草原了。事实上在成吉思汗的这次西征中，分割四



蒙古西征进入南俄草原示意图

大汗国的想法已经有了。作为欧亚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的草原地带是被分配给其长子“术赤”的。这个在第二次蒙古西征时（公元 1236——1241 年）成立的汗国，就是著名的“金帐汗国”（钦察汗国）。虽然征服钦察草原，并不是这次西征所必须完成的任务，不过钦察人表现出来的犹豫，让出征的蒙古将领看到了再进一步的机会。在迫降阿兰人及高加索诸部后，蒙古人开始向钦察人的领地进发。

从多瑙河口一路向东至乌拉尔河的干草原地带，被一系列南北向河流贯穿而过。这些分别注入黑海（包括亚速海）、里海的河流，成为了草原的经脉，无论是领地的划分，还是战场的选择，都与这些河流有关。几乎呈 X 相交的顿河、伏尔加河，是这片草原的核心河流。被称之为“钦察人”的突厥游牧部落，此时正是这片草原的主要游牧者。

驻足北高加索的蒙古远征军，正处在南俄草原的中南部。即可以选择向东北方向移动，以征服伏尔加下游及其以东地区；也可以向西北方向追击，越过顿河向欧洲深处迫近。就一次试探性远征来说，第一方案应该是最合适的选择。即完成了探路工作，又能很快回到亚洲。然而蒙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第二方案，即向亚速海北部进军。做出这样决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钦察人此刻正在向西逃亡。对于势不可挡的蒙古人来说，对手的位置决定了他们出征的方向。

钦察人西逃并说服罗斯人与其对抗蒙古人

钦察人选择向西逃亡的原因有二：一是判断蒙古人不会再从高加索地区返程，而是会从里海北部回到中亚草原。如果此时身处伏尔加河以东的话，必然与之再次遭遇；二是在草原西部，钦察人有可能从基辅罗斯获得后援，以共同对抗这些从亚洲而来的征服者。后者的历史，我们在前面已经解读过了。与欧洲绝大多数政治体一样，由北欧瓦良格人始建，并在 11 世纪初达到鼎盛的基辅罗斯，此时内部也已陷入了割据状态。在蒙古人侵入欧洲之时，十几个各自独立的罗斯公国面临一个共同抉择：到底要不要

卷入这场战争。

总的来说，罗斯人与钦察人堪称宿敌。基于游牧民族的本性，身处南部草原的钦察人，总是会周期性的侵入罗斯人的领地；与此同时，出于与黑海及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的需求，罗斯人也一直致力于穿越草原西部打通商道。不过就此认为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也是有失偏颇的。毕竟基辅罗斯已经分裂为十几个政治体，钦察人的部落也不少于此数。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罗斯诸国与钦察诸部中结成联盟的事并不鲜见。尽管如此，让罗斯人战略性的和钦察人结盟，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联想一下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关系，这种矛盾心理并不难理解。

最终罗斯诸公国中主张与钦察人联合的意见者，还是说服了其它公国。毕竟相比时不时劫掠一下自己的钦察人，蒙古人那毁灭式的征服方式，威胁要大的多。虽然蒙古人这次所派出的兵力，不大可能对罗斯诸国发起远征，但征服南俄草原之后的蒙古汗国，势必会把近在咫尺的基辅罗斯作为下一个目标。到时候罗斯人面对的，可就不是十几个内部矛盾重重的钦察部落，而是一个统一了整个欧亚草原的强大游牧帝国了。就这一认识来说，罗斯人反倒要比后来与蒙古结盟灭金的南宋王朝认识更清。

第八节 罗斯军队与蒙古远征军的交战

罗斯军队渡过第聂伯河进攻蒙古远征军

公元 1222 年冬，由北高加索进入亚速海北的蒙古远征军，攻入克里米亚半岛，并在温暖的黑海之滨度过了他们在欧洲的第一个冬天。钦察人则被迫继续西逃，向答应与之结盟的罗斯人靠拢。面对二者的结盟，蒙古人试图再次施展纵横之术，以让罗斯人相信他们的目标是钦察人。只是钦察人背叛阿兰人后，又遭遇攻击的前车之鉴，显然足以让罗斯人认为蒙古人这是在故技重施，因此双方的问题最终还是只能在战场上解决。

顿河之西的第聂伯河，是南俄草原上另一条重要河流。对于中世纪的罗斯人来说，第聂伯河的地缘地位，远比伏尔加河、顿河要高出许多。因为基辅罗斯的崛起之地，正是在第涅伯河流域（“基辅”处于第聂伯河的中游河畔）。另外，罗斯人自开国以来一直尽力维护的，对接波罗的海——黑海的“瓦希商道”，也必须依托这条河流。要知道，第聂伯河河口的位置就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西北方向。已经渡过顿河河口，并攻掠克里米亚蒙古人，只需再向西一点，便可夺取第涅伯河河口。到时候，即使蒙古人暂时没有沿河北上的想法，也将极大影响罗斯人的商业利益。

基于先发制人的想法，罗斯诸公国（特别是南方第聂伯河流域的公国），开始在第聂伯河河口以西集结兵力，以图与蒙古人决战于国门之外。那些不愿意接受蒙古人统治的钦察人也同样向此汇集，大战一触即发。一般认为，仅罗斯人集结的兵力就有 8—10 万，而他们准备应对的蒙古人，则不到三万之数。以兵力来看，似乎罗斯－钦

察联盟的胜算要大的多。不过，在欧亚大陆纵横多年的蒙古人，又什么时候靠人数取胜过呢？

正常情况下，处于守势的罗斯人应该以第聂伯河为天然防线严防死守，宽阔的河道以及春夏丰沛的水量，将极大增加蒙古人的渡河难度。然而在春天到来之时，主动渡河发起攻击的却是罗斯人。这点倒也不难理解，毕竟集结于此的罗斯军队，不仅都离开了母国，同时对是战是和还心存疑虑。不能速战的话，很有可能会自乱阵脚。出乎意料的是，罗斯人的先头部队竟然击败了蒙古人的先头部队（甚至俘杀了对手的先锋主将）。这无疑极大的助长了罗斯人的信心，本来还在争议是守是攻的罗斯大军很快尽数渡河，准备一战而解决这支蒙古远征军。

关于蒙古先锋部队为什么会败于对手，基于不同的立场，东西方的记录不尽相同。斯拉夫人认为是因为他们作战勇猛以及对手的轻敌，而蒙古人则更愿意将之描述成是故意牺牲的诱饵，其目的是为了诱使罗斯大军远离第聂伯河。不管罗斯人的首战告捷，到底是不是因为蒙古人放水，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蒙古人的确没有立即反动反击，而是以一部保持接触，且战且退的向顿河方向后撤。

罗斯军队在卡尔卡河畔遭到惨败

很显然，蒙古人的确是在诱敌深入。前面我们说了，基辅罗斯的核心之地，是第聂伯河中上游地区。如果罗斯人沿第聂伯河死守的话，那么他们将在战略上能够从基辅方向源源不断的接受补给。更为重要的是，第聂伯河事关整个罗斯民族的利益，其下游保卫战，能够让原本分裂的罗斯诸国紧密的团结起来。从这点来说，蒙古人将战场东移，的确是非常聪明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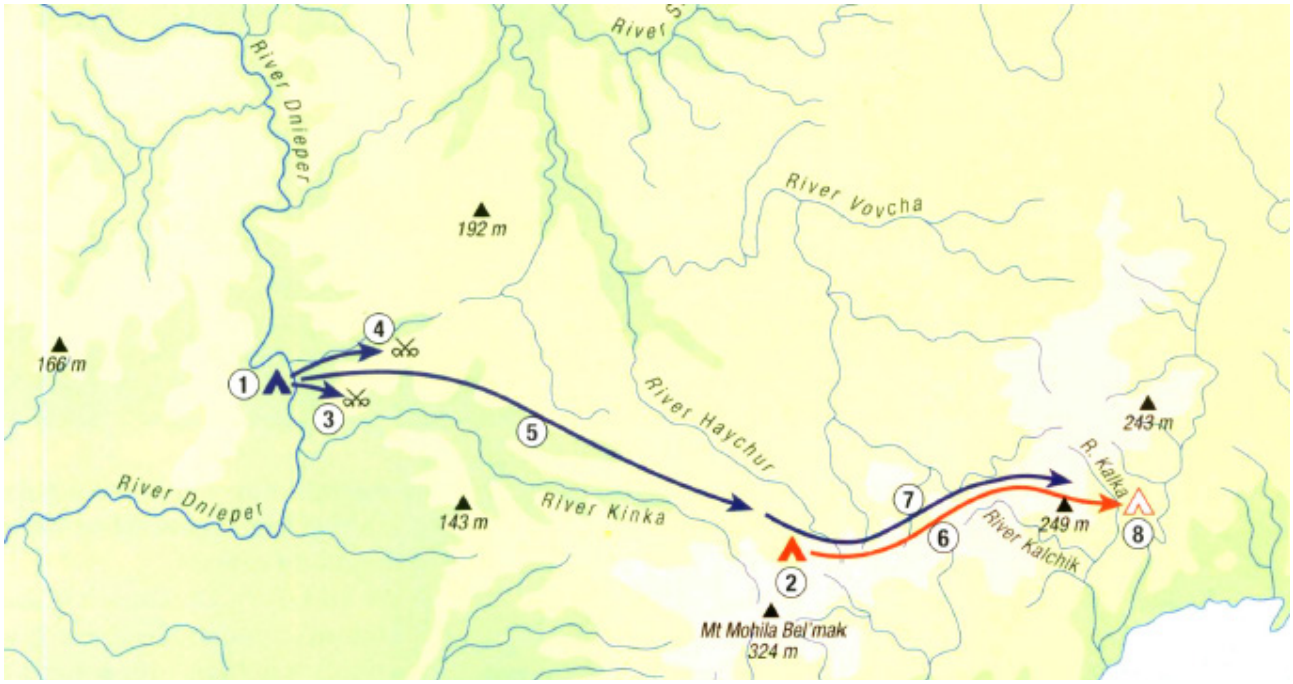


卡尔卡之战

蒙古人选择的决定战场，并不在今天归属俄罗斯的顿河下游，而是在亚速海边“马

里乌波尔”市西北（乌克兰境内）。如果你特别关注乌克兰内战的新闻，有可能会在新闻中看到这座城市。在试图从乌克兰分裂出去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个东部州中，与亚速海相连的是顿涅茨克（后者在其北部），而马里乌波尔就是顿涅茨克及至整个东乌克兰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目前这个战略要地还掌控在乌克兰政府军手中，不过很显然，无论是希望独立的东乌还是背后俄罗斯，都会将其视为势在必得的焦点（已展开了多次进攻）。

回到我们正在解读的历史，滋养马里乌波尔的是一条流程仅 200 公里的河流——卡利米乌斯河（kalmius），河流上游连通的城市，正是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首都顿涅茨克市。不过蒙古人选择的决战地点，并不是在卡利米乌斯河畔，准确说是在它的右岸支流卡尔卡河（Kalka，今 Kalchik）之东（后者在马里乌波尔市注入前者）。这场重要战役，因此也可被称之为“卡尔卡河之战”（中文资料中一般以其俄语发音译为“迦勒迦河之战”）。



卡尔卡河之战示意图

此时距离罗斯－钦察联军离开第涅伯河河口，已有大约十天时间了。从技术上看，主力部队以逸待劳的蒙古人，在战力上会更有优势。更为致命的是，罗斯人内部对是否要深入草原深处，与蒙古人决战一直存在着分歧。随着时间的距离的延伸，分歧也越来越大。这使得十万罗斯大军，不仅与钦察人之间无法有效的协同作战，内部同样亦无法统一指挥。一切，都在朝着有利于蒙古人的方向发展。

有句网络用语叫做“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历史上诸多所谓“以弱胜强”的案例，其强、弱之分，往往是以人数多少来定义。殊不知指挥权如果不统一、结盟者各怀心事的话，数量反而可能会挺累自身。洞悉对手短板的蒙古大军，再次显示出其强大的攻击力。正如我们刚才分析的那样，在先行击溃信心不足的钦察

人之后，溃败的钦察人对罗斯人的阵线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在敢于迎战蒙古人的部分罗斯军队落败后，整个罗斯大军很快便溃不成军。悲剧的是，在草原上与游牧者决战失败，结局很可能是全军覆没。这一点，当年经常深入大漠戈壁与寻机与对手决战的汉军，就深有体会。

最终在这场战役中，罗斯人损失了将近 9 成的兵力。剩余的罗斯人之所以能保住性命，在于他们逃回第涅伯河西岸后，将渡河用的船只尽数烧毁。至此，欧洲草原上的三股力量：阿兰人、钦察人、罗斯人，尽皆惨败于蒙古人之手。对于一支仅承担探路任务的远征军来说，可谓是超额完成了任务。接下了如果还想更进一步，尽灭罗斯诸国，仅仅依靠这支人数不到三万的军队是肯定做不到的。最起码学聪明了的罗斯人，不会再愚蠢到把兵力集中越来，在草原上与蒙古人决战了。

在第涅伯河东岸结束对罗斯残军追击的蒙古军，终于开始了他们的返乡之旅。接下来他们会跨越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横穿哈萨克丘陵，回到他们在蒙古高原的故乡。仍在东线苟延残喘的金国，将成为蒙古大军的下一个征服目标。不过认为蒙古人就会这样轻易离开欧洲的想法却是错误的。因为这负责这次欧洲之旅的蒙古将领，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圆满完成了大汗交给的任务。在回到亚洲之前，他们还要为下一次的西征，再做一点准备。那么，在这片土地上，谁又会倒霉的被蒙古人惦记呢？

第九节 蒙古人与保加尔人短暂交战

到底是谁又碍着蒙古人的征服大业了，答案是保加尔人。那么问题来了，保加尔人不是在多瑙河以南建立了“保加利亚”吗？如果成吉思汗的部下继续西征，保加利亚成为下一个目标倒也说的过去，问题是蒙古人不是已经决定回家了吗？其实仔细阅读过之前内容的朋友，心里应该已经有了答案，我们现在所说的保加尔人，并非生活在黑海之西的“保加利亚”，而是“伏尔加保加尔人”。为了与前者区别，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也被称之为“伏尔加保加利亚”。

公元 7 世纪，由于受到可萨汗国的压力，原本在亚速海北部这块风水宝地建国的保加尔人，开始向多瑙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两个方向迁徙。时间和距离可以改变许多，迁徙至黑海之西的这部分保加尔人，随后建立了我们熟知的“保加利亚”，并在与拜占庭人、南斯拉夫人影响下信仰了东正教并斯拉夫化（其最高统治者也不再称“汗”，而是转称“沙皇”）。至于迁徙至伏尔加河中游的这部分保加尔人，由于远离欧洲文明中心，在人种、语言、宗教上并没有“欧洲化”。为了对抗基辅罗斯崛起引发的压力，伏尔加保加尔人在公元 10 世纪初，选择了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的信仰。

伏尔加保加利亚的领土核心，在今天俄联邦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其首府喀山正是始建于这一时期），今天这些突厥系穆斯林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事实上，伏尔加保加尔人建立的汗国，在地貌上已经算是森林地带了，并不会对从南俄

草原东部回程的蒙古人造成威胁。不过蒙古人向来不是因为受到威胁才四处征战了。作为史上最强大的草原征服者，这样一支还带有草原基因的民族，自然值得他们绕道去看一看的。



蒙古西征回程示意图





古比雪夫水库

基于环境的变化，此时农业和商业成为了保加尔汗国的支柱经济，伏尔加河是他们的生存之本。今天因为农业开发的原因，伏尔加河中游长达 600 多公里的水道，已经变身成了俄国最大的水库“古比雪夫水库”。从西北方向而来的伏尔加河正源，以及东北方向而来的上源“卡马河”，为南俄草原的开发提供了丰沛的水资源。这也使

得很多保加尔城市遗址，变得不可寻了。

汗国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鞑靼共和国南部萨马拉州一带），成为了保加尔人阻击蒙古人的前线。不过归心似箭的蒙古远征军，并无意于深入保加尔人境内，只是想试探一下对手的实力，为下一次远征做准备罢了。双方短暂交战之后，蒙古人转而回到了返程的线路上来。接下来的草原之旅，蒙古人已经没有任何对手可言了。那些原本游牧于伏尔加河以东的钦察部落，大多已经逃往草原西部。剩下来的，只会主动向蒙古人表示臣服。公元 1224 年，在与欧洲远征军会合之后，成吉思汗结束了这次历时 5 年的西征之旅，回到了漠北草原。接下来，结束在中原的战事将是这位征服者所要考虑的了。

第二十三章 蒙古人西征欧洲

第一节 蒙古人进攻罗斯伏尔加河流域

结束中原战事后蒙古展开第二次西征

事实上在成吉思汗率部西征之时，东线也并未迎来暂时的和平（东线统帅为木华黎）。在这段时间里，蒙古大军基本已经控制了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金国则以黄河为界据守半壁江山。后面的历史，想来大家都有所了解了。回到东方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又用了十年时间（公元 1224——1234），相继攻灭了西夏、金两个北方王朝，只要再征服南宋、迫降大理便可完成中央之国核心区的统一了。

解决两个重要对手后的蒙古人，再一次箭指西方，开始了第二次西征之旅。之所以没有能一鼓作气拿下南宋，很大程度在于东亚南部那些纵横的河流，对蒙古人的战术起到了很大制约作用。这实际上也是中央之国所有北方政权在结束南北分裂局面时，都会遇到的难题。虽然这层战略障碍并非不能突破，但需要时间来来克服。相比之下，在第一次西征中，仅用两三万兵马就横扫过一遍的钦察草原，蒙古人认为更有机会快速解决。

此时成吉思汗已经在征服西夏的战争中因伤离世（公元 1227 年），关于他的真正死因，一直有各种传闻。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曾经顽强抵抗的党项人，就此失去了跻身 56 个民族 56 朵花的可能。为蒙古发动第二次西征的，则是帝国第二位大汗、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中国史称“元太宗”）。

公元 1236 年，在“蒙金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总数为 12—15 万的西征蒙古大军集结完毕，开始以欧洲为目标发起新的征程。由于游牧、渔猎民族一直有“幼子守产，长子拓地”的习惯，这次远征也特别将这一特点放大，各级将领尽为各家贵族之长子。为此，蒙古第二次西征也被称为“长子军远征”。又由于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继承人“拔都”是这次西征的统帅（钦察草原是成吉思汗赐封给术赤的领地），这次西征还被称为“拔都西征”。

在上一次欧洲之旅中，最后一个和蒙古人交手的保加尔人，首当其冲的成为这次远征第一个牺牲品。那次交手，中国历史记录认为蒙古人依旧取得了大胜，而俄国人更愿意认为，蒙古人是被保加尔人击败，狼狈逃出欧洲草原的。说起来，俄国人愿意这样想也不奇怪，毕竟“伏尔加保加尔人”的历史，已经算是俄国史的一部分，他们的如果胜也，也就是俄国胜了。不过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是，在那些蒙古长子的冲击之下，立国已有将近 600 年的“伏尔加保加利亚汗国”，彻底成为了历史。

虽然从顺序上来说，保加尔人成为首要攻击目标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不要忘了，保加尔人并不在草原之上，上一次也是特意绕过去试探其实力的。如果蒙古人这次是

为了钦察草原的话，大可一路向西以钦察人和他们身后的罗斯人为目标。那么为什么蒙古人要先拿保加尔人开刀呢？

蒙古人征服伏尔加河流域

如果说第一次蒙古西征的目标是“花剌子模”，那么第二次蒙古西征的目标，就是“罗斯”诸国了。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人，不过是他们完成这一目标的跳板罢了。让蒙古人更倾向于先开辟北线战场的原因，在于接受定居生活的保加尔人，已经通过农业和商业积蓄了大量财富。如果先征服他们的话，保加尔人的那些城镇，将可以成为蒙古下一步行动提供后勤保障。公元 1236 年秋，蒙古人顺利入主“伏尔加保加利亚汗国”。在伏尔加河中游渡过了寒冷的冬天之后，蒙古人于次年春向南扫清了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人，并于当年秋向罗斯人发起了进攻。



蒙古西征欧洲示意图

不过在上次西征中已无限接近的基辅和第聂伯河，并没有成为蒙古人首要目标，征服者最先锁定的是伏尔加尔上游。以地缘板块来划分钟，在蒙古人到来之时，当年瓦良格人为“罗斯人”所开创的领地，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以基辅为中心的第聂伯河流域；二是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伏尔加河上游，以及瓦良格人的龙兴之地“伊尔门湖”流域。依其方位可分别将之称为南罗斯和北罗斯（或东北罗斯）。身为伏尔加河、第聂伯河、道加瓦河、洛瓦季河等河流源头之地的“瓦尔代高地”，是上述两大板块的分水岭。

12 世纪中叶，伏尔加河上游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政治中心“弗拉基米尔”位于莫斯科以东不到 200 公里）逐渐统一了北罗斯，并凭借实力成为了罗斯人名义上的共主。在对抗蒙古入侵的问题上，南罗斯诸公国自然更为上心。当然，如果南罗斯不保，北罗斯的利益也同样受损。因此在上一次蒙古西征中，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也同



蒙古人攻打罗斯城市

样征调了大军。只不过在北罗斯大军还未抵达前线之际，就传来了“卡尔卡河之战”（迦勒迦河之战）大败的消息。这也意味着，被蒙古人消灭的近十万罗斯大军，几乎都来自于南罗斯。

不管北罗斯人的姗姗来迟，仅仅是双方未能协调好的问题，还是其有意观望，总之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的实力都到了保存，只是这次他们再也无法隔岸观火了。在蒙古大军的强势攻击之下，伏尔加河上游的梁赞、莫斯科、罗斯托夫等重要城市，相继为蒙古人所破，都城弗拉基米尔亦未能幸免。显然，作为罗斯诸国中的最强者，蒙古人希望先将其拿下，以震慑其它罗斯国家。

在完成整个伏尔加河流域的征服之后，蒙古人又快速南下北高加索地区，将上一次西征中击败的阿兰人收入账下，彻底完成对欧洲草原游牧势力的整合。做完这一切之后，基辅和它所代表的南罗斯，便再也无法幸免于难了。一般情况下，游牧民族会更喜欢在秋高马肥之际发动战争，而饲料匮乏的冬季则在相对温暖的冬牧场蛰伏。不过凡事没有绝对，如果遭遇重大灾害急需补给，或者出于战术需要，游牧民族也同样会在寒冷的季节发动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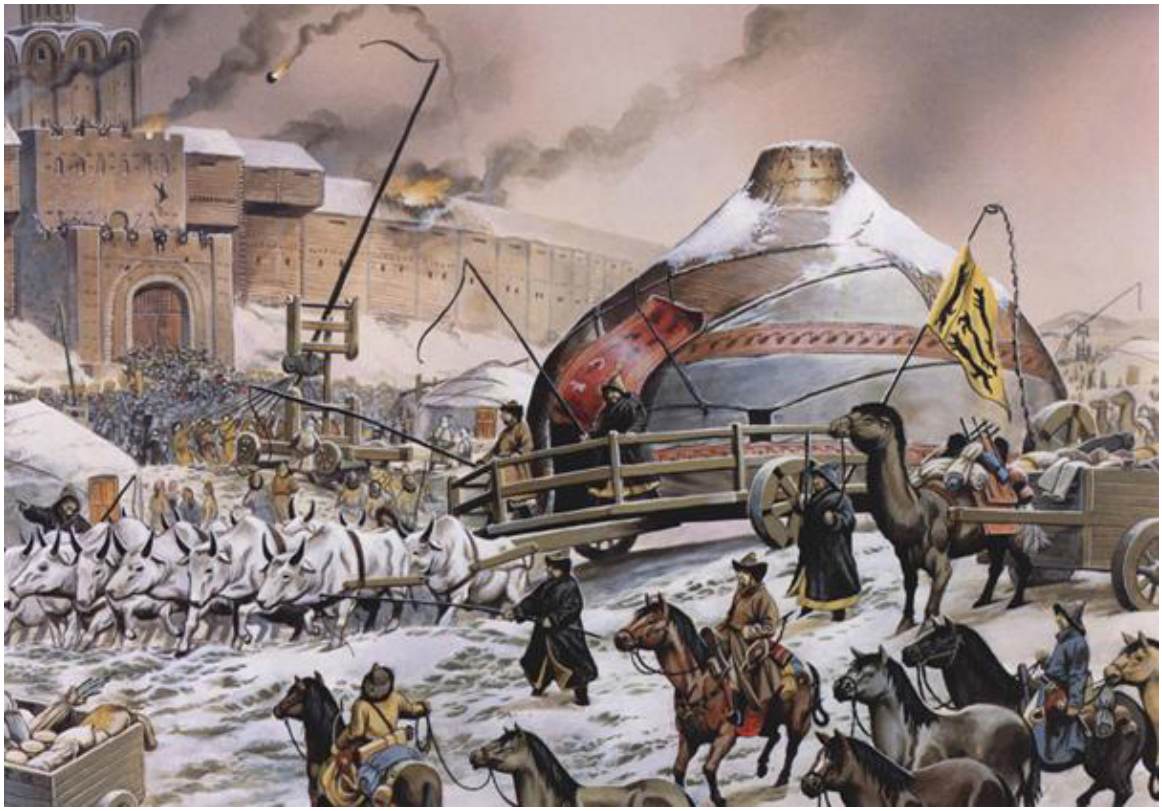
第二节 蒙古人围攻辅及放弃对诺夫哥罗德的征服

蒙古人攻破基辅城

公元 1240 年，蒙古军主力发动了基辅城围攻战，便是在冬天。由于基辅在中国史书中被译为“乞瓦”，这场战役也被称之为“乞瓦之战”。已经拥有强大后勤补给的蒙古军，并不用担心人马的补给问题。选择在冬天进攻基辅，主要是出于战术需要。由于基辅城位于第聂伯河中游西岸，且河道宽阔（上游数条支流在此汇集），渡河将是一个大问题。上一次大破罗斯联军后，蒙古人之所以止步于第聂伯河东岸也正因为如此。而借肋冰封的河面，这一天然障碍将不复存在。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河面能够

结冰的前提下，如果纬度偏低、冬季温度不足以冰封河面，那么河流将会一年四季的帮助防御者。事实上在中央之国，游牧民族和北方王朝征服江淮地区的主要困难，也正在于此。比如要是河面能够结冰的话，曹丞相也就不必吃下赤壁之败的苦果了。

除了借助自然力之外，围攻基辅城的蒙古人，还用到了一项从东方带来的先进技术，那就是火炮。对先进军事技术的极端渴望，也是蒙古大军横扫欧亚的重要原因。蒙古人每征服一地，都会重点收集掌握技术工匠。在结束了对金朝的征服之后，蒙古大军旋即掌握了火炮技术。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技术其实都源自于宋人。凡事都有两面性。尽管蒙古人的征服，对欧亚诸边缘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在客观上也使得，大陆两端的技术交流变得更为高效。



蒙古人攻打罗斯城市

在以火炮、火药为代表的东方军事技术传入西方的同时，古老的中央之国也同样遭遇到的西方军事技术的冲击。这其中，另一种“炮”——回回炮就是典型案例。所谓回回炮，其实就是“抛石机”， 以汉字本意来看，以“砲”来命名倒更为适合。喜欢玩与罗马相关游戏、影视剧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这一武器的得名，是因为蒙军中的操作者，多为穆斯林色目人。在后来的宋蒙“襄樊之战”中（公元1267——1273年），回回炮就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武功盖世、聪明绝顶、义薄云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郭靖夫妇最终也未能帮助南宋保住这个战略要点。

冰封让第聂伯河不再成为天险，火炮又让基辅的城墙打开了缺口。曾经为罗斯“城市之母”的基辅城，终于成为了蒙古人的战利品。这也意味着，蒙古此时西征战略任务的完成。其实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蒙古人的征服也导致了另一个大家的所熟知的地

缘标签“俄罗斯”的出现。在解读基辅罗斯时我们曾经提到过，汉语所说之“俄罗斯”是从蒙古语转译过来的（由于蒙语无法直接发出 R 这个卷舌音，便在前面加个 O 的元音），因此也可以戏谑的说，是蒙古人催生了“俄罗斯”（亦曾译为斡罗思、鄂罗斯）。

虽然从翻译的角度说俄罗斯的诞生源自于蒙古人是玩笑话，但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后来俄罗斯的崛起、壮大与蒙古人有关，却也是事实。今天我们提到俄罗斯，就会想到莫斯科和它所处的伏尔加河上游。古罗斯的地缘含义则被“东斯拉夫”这个标签所替换。基辅城及第聂伯河中下游，成为了“乌克兰”；第聂伯河上游与波罗的地区相接之地，则在立陶宛人的影响下，成为了“白俄罗斯”。基于地缘距离的原因，在后来金帐汗国的统治中，蒙古人对基辅的控制力要远大于森林深处的北罗斯之地。这也使得在罗斯人的复兴过程中，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得以发挥核心作用，并最终成功的让“罗斯”的地缘遗产，从南罗斯转移到北罗斯。

虽然在征服南、北罗斯之后，蒙古第二次西征的战略任务也就算圆满完成了。只是正如上次征服花剌子模之后，成吉思汗派军深入南俄草原进行试探性攻击一样，这次率军出征的“长子”们，也不愿意就这样打道回府。接下来，立马基辅的蒙古远征军有三个战略方向可以选择：一是向南进入多瑙河下游，入侵黑海西岸的保加利亚、拜占庭等东正教国家；二是向西翻越喀尔巴阡山脉，或沿喀尔巴阡山脉北上，攻击匈牙利、波兰，以及德意志这些天主教国家；三是向北，以波罗的海地区为扩张方向。那么蒙古人到底会先选择哪个战略方向呢？

蒙古人放弃征服诺夫哥罗德

在北线，蒙古人的铁蹄暂时止步于伏尔加河流域，没有再深入包括伊尔门湖平原在内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扩张。在后来的历史中，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伊尔门湖平原，也一直是蒙古人在北方影响力的极限。事实上，这块瓦良格人的龙兴之地在基辅罗斯大分裂之时（12 世纪中叶），就已经显露出与罗斯封建体系分离的迹象。一直到 16 世纪末，罗斯诸地的政权都掌握在瓦良格人所创立的“留里克王朝”手中，但在“诺夫哥罗德公国”，公爵们更像是君主立宪体制下的虚位君主（同时负责军事防务），商业力量以及商人们所组成的议会，才是诺夫哥罗德政务的主导者。这甚至使得 12 世纪中叶以后的“诺夫哥罗德”，被外界认为是一个“共和国”。

诺夫哥罗德之所以能够像地中海的威尼斯、热那亚那样，事实脱离“封建”体系，成为共和国，根本原因源于相似的地缘位置。从地缘结构上看，位于“瓦希商路”北端的诺夫哥罗德，是波罗的海与罗斯地区的贸易枢纽。在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商业力量崛起之时，同样愿意遵循商业原则办事的诺夫哥罗德，会更容易与之形成共赢的局面。正是因为诺夫哥罗德历代公爵明智的选择（负面的后果就是被其它罗斯公国视为异类），在汉萨同盟崛起之后，诺夫哥罗德也成为了德意志商人们的重要合作伙伴，并据此抗拒试图统一整个东斯拉夫人的“莫斯科公国”（公元 1478 年，终为莫斯科公国所吞并）。

蒙古人对诺夫哥罗德兴趣不大，主要是因为游牧骑兵在此并没有优势。在解读基辅罗斯部分时我们曾经说过，与东伏尔加河、第聂伯河等南流河流不同的是，由沃尔霍夫河、伊尔门湖、洛瓦季河等于水域贯穿的“伊尔门平原”，水流是向北流淌的，且下游已经处在在寒温带的边缘。纬度和流向决定了在温度回暖之后，越往下游河面的解冻时间就越晚。当上游之水由于春汛暴涨之时，下游却还处在冰封状态。这一方面使得位于平原之上出现了伊尔门湖这样一个，一年中湖域面积能相差 3 倍之多的“中继湖”（能起到调节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得诺夫哥罗德周边的大片土地，常年处于湿冷的沼泽状态（西西伯利亚平原长年得不到开发，也是这种情况）。

从瑞典而来的瓦良格人，当年之所以能够透过伊尔门湖水系，打通与第聂伯河相通的“瓦希商路”并创建“基辅罗斯”，在于他们纵横波罗的海所养成海洋属性（能熟练掌握船只制造、使用技术）。相比之下，更喜欢在干燥地区策马奔腾的蒙古人，就实在难以适应这种环境了。更重要的是，在西、南方向，蒙古人还有大片的想象空间，实在没有必要把精力消耗在这片湿冷之地

第三节 蒙古人进攻前的多瑙河中下游局势

保加利亚王国的复兴

多瑙河口是欧亚草原的西部起点，将统一草原作为首要任务的蒙古人，把势力范围延伸自此才是正常的选择。更何况过了多瑙河，就是富庶的地中海文明区了，在这个方向用兵能取得的收益要大的多。此时的多瑙河南岸，正值保加利亚王国复兴之际。关于保加利亚王国的前世今生，之前曾经有所解读。公元 7 世纪后半叶，游牧的保加尔人渡过多瑙河，并在拜占庭的北方领土上建国。11 世纪初，完成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亚王国为拜占庭帝国所征服。不过在 12 世纪末，借拜占庭人与钦察人战争之机，保加尔人复国成功，史称“保加利亚第二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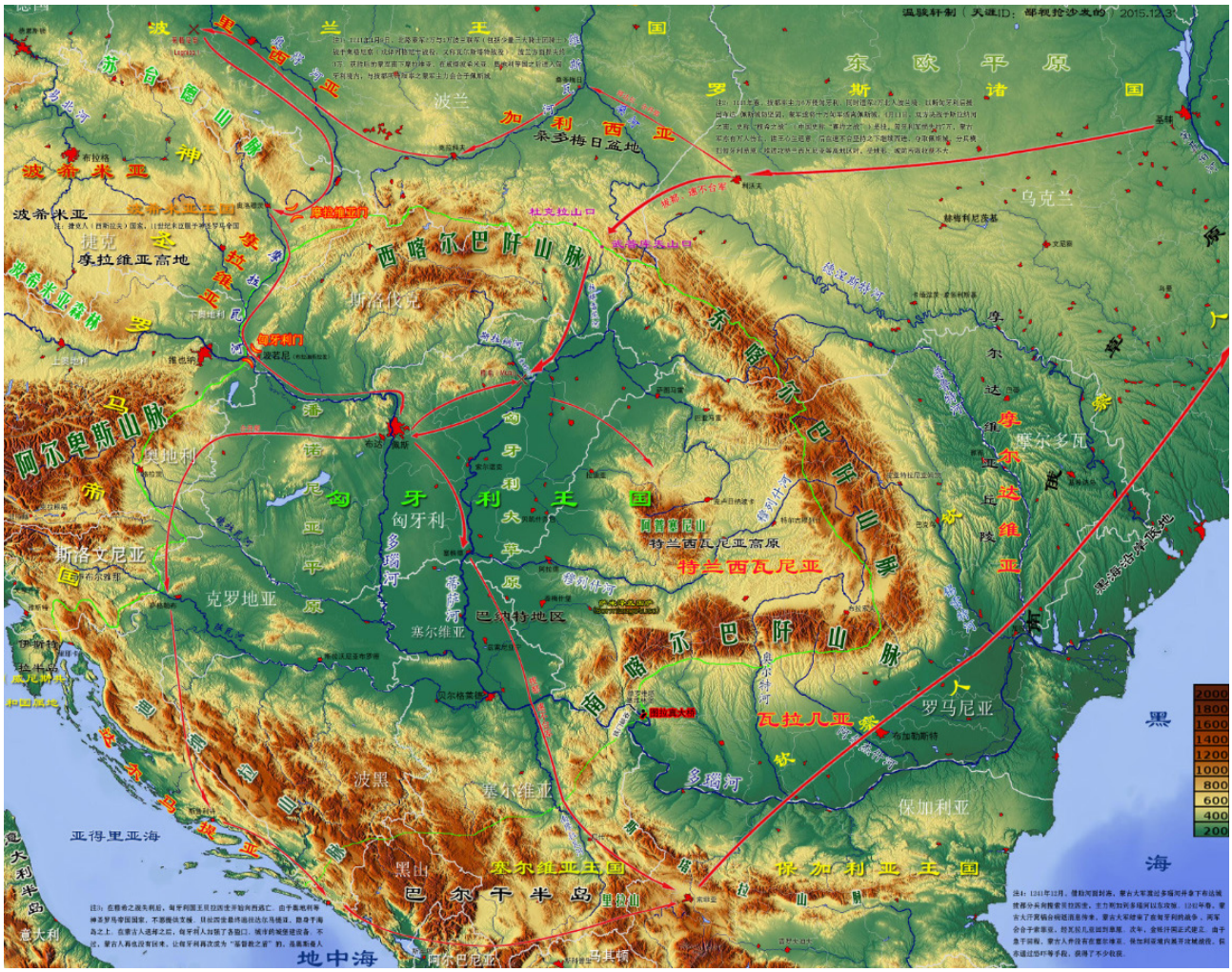
公元 1204 年，在威尼斯人主导的那次“臭名昭著”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君士坦丁堡成为了新生的“拉丁帝国”首都。拜占庭帝国的残余力量，则退至小亚细亚半岛沿海地区，以及希腊半岛西北的伊庇鲁斯地区（建立了尼西亚、特拉比松、伊庇鲁斯三国）。随后的半个多世纪，整个爱琴海、黑海沿岸地区都陷入了混乱状态，直至拉丁帝国瓦解，尼西亚中兴拜占庭帝国后方才趋于稳定（公元 1261 年光复君士坦丁堡）。

借助十字军与拜占庭相争这一背景，重获新生的保加利亚王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得以向包括色雷斯、马其顿在内的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强势渗透。只是在蒙古人入主南俄草原之后，一心向南的保加尔人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一盘散沙、威胁不大的北方草原，反过来成为了最强大的压力源。保加利亚人，则被迫成为了地中海文明的守卫者。然而此次长子出征的蒙古人，却没有

跨越多瑙河口入侵保加利亚，而将另一个草原民族出身的基督教国家——匈牙利作为了征服方向。

匈牙利草原基督教化后成为西欧的盾牌

蒙古人的选择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他们这次走的征服之路，其实就是当年匈人入侵的翻版。诱惑这些亚洲游牧者的，是喀尔巴阡山脉之西的那片干草原——匈牙利草原。被口袋形的喀尔巴阡山脉包裹的多瑙河中游平原东部，是欧亚干草原地带的最西端。由于与南俄草原并不直接相连，它也可以说是游牧民族入侵欧洲腹地的一块跳板。占据匈牙利草原之后，不仅可以沿多瑙河北上入侵日耳曼、西斯拉夫地区，也可向西穿越潘诺尼亚平原进入意大利。当年的“上帝之鞭”阿提拉，就是沿着这样的路线席卷西欧各地的。



蒙古西征之匈牙利之战

不管以匈牙利草原为跳板的游牧者，最后的选择是阿尔卑斯山北还是山南作为突破口，承受压力的都是罗马教廷治下的天主教教区。为了应对游牧民族的战略威胁，天主教世界想到的办法，便是让这片草原的守护者变身成为天主教徒。这项战略任务，最终落到了乌拉尔人出身的游牧者——马扎尔人身上。公元 1000 年，游牧的马扎尔人转变为了信奉天主教的“匈牙利人”，并同时开始为自己注入农业属性。

匈牙利草原的基督教化，为整个西欧在喀尔巴阡山脉之西铸就了一道坚固的盾牌，匈牙利王国也因此被称之为“基督教之盾”。当然，匈牙利人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有了罗马教廷背书，匈牙利王国开始走上了强盛之路。在 12 世纪末，其领土不仅包括“匈牙利门”以东的整个多瑙河中游地区（包括今天的匈牙利、塞尔维亚、斯洛伐克，以及罗马尼亚大部），还向西控制了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波黑、克罗的亚地区，与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钦察人进入匈牙利避乱

一直以来，多瑙河下游以北的“瓦拉几亚平原”（今为罗马尼亚所有），都是游牧者南下渗透的首要之地，也是匈牙利人的天然扩张方向。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匈牙利王国所需应对的游牧者，就是来自南俄草原的钦察人（匈牙利人称之为“库曼人”）。为了防御钦察人入侵，直至将其从瓦拉几亚平原上赶走，匈牙利国王甚至将条顿骑士引了进来（公元 1211 年），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前面解读过了。十几年后（1225 年），这些企图在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南部建国的日耳曼骑士，又被匈牙利人“请”了出去，并旋即被波兰人引入普鲁士地区，开辟“教化”波罗的人的十字军战场去了。

宗教信仰成为甄别敌我阵营标志的中世纪后期，国家的扩张大都打着传播宗教的名义。从这个角度说，在地中海针对穆斯林的十字军战场；除了波罗的海针对波罗的人、乌拉尔人的北方十字军战场之外，匈牙利人与钦察人之间的博弈，也可称之为十字军的中线战场。赶走条顿骑士之后不久（公元 1227 年），匈牙利王国的圣战事业也取得了进展。一部分南下的钦察人（总数约 15000 人），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匈牙利人甚至乐观的认为，整个钦察草原成为天主教区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因此还为钦察草原成立了单独的主教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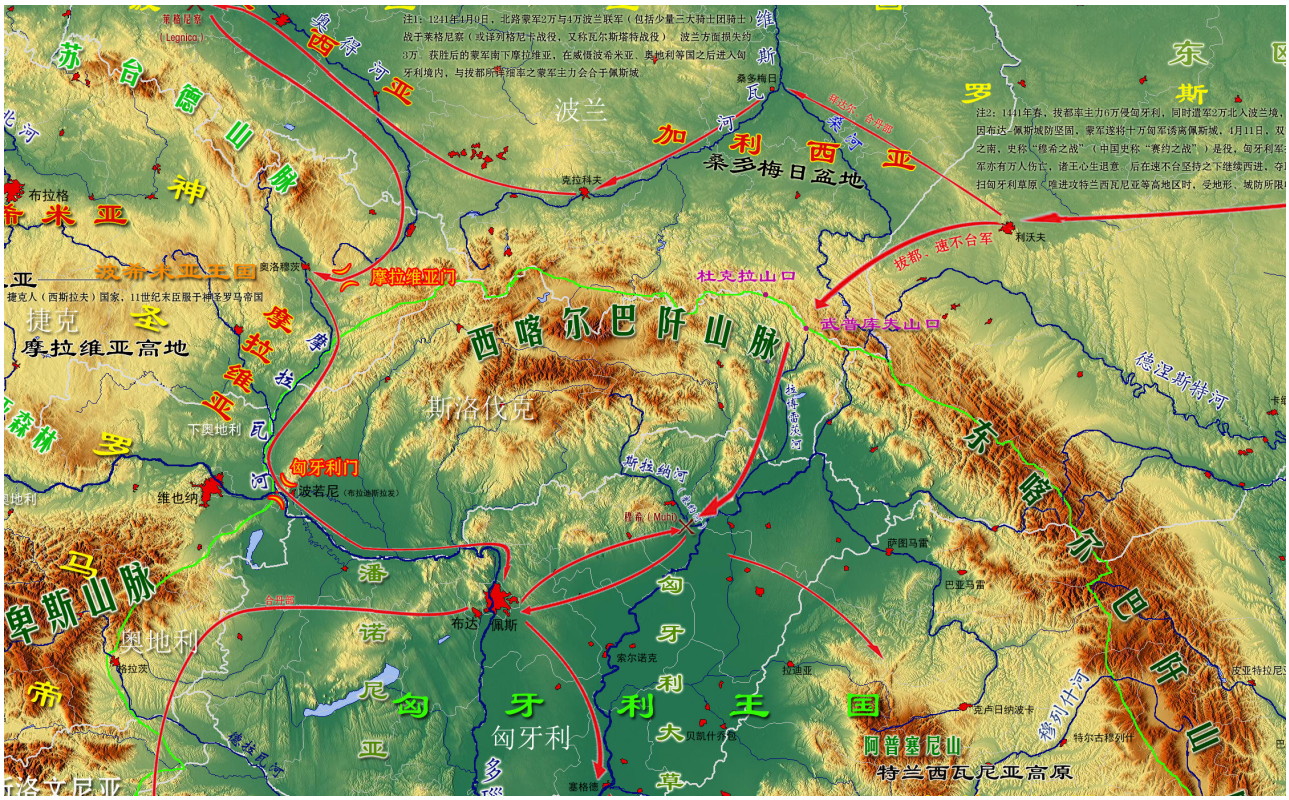
然而结合蒙古第一次东征的背景我们会发现，草原西部的部分钦察人愿意归附匈牙利和天主教世界，其实是因为被蒙古人吓破了胆。同为草原民族，钦察人相信蒙古人一定还会回到这片草原。当北方的罗斯人同样在这次战争中大败于蒙古人之手，南方的君士坦丁堡又为十字军所建立的“拉丁帝国”所控制时，能够在下一次蒙古入侵时为之提供庇护，也就只有喀尔巴阡山脉和匈牙利人了。那么匈牙利人有没有再次成为“基督教之盾”呢？

第四节 蒙古人进攻匈牙利王国

蒙古军队翻越喀尔巴阡山进入匈牙利

弧状的喀尔巴阡山脉一般依方位分为三部分，其中北部被称之为“西喀尔巴阡山脉”（大部位于斯洛伐克境内）；东侧为匈牙利草原、特兰西瓦尼亚高原提供庇护的，则是“东喀尔巴阡山脉”；南部与多瑙河下游平行，并帮特兰西瓦西亚高原围边的则是“南喀尔巴阡山脉”。总的来说，从基辅出发的蒙古大军要想进入匈牙利草原的话，

有三个方向可以选择。一是直接翻越与草原相对的东喀尔巴阡山脉，接入草原核心河流“蒂萨河”上游；二是沿西喀尔巴阡山脉北麓西行，在山脉西端与“苏台德山脉”相接之处，穿“摩拉维亚门”，沿摩拉瓦河南下至“匈牙利门”（多瑙河与摩拉瓦河相交处峡谷），再沿多瑙河西行至匈牙利草原；三是先南下至多瑙河口，然后向西横穿瓦拉几亚平原，经南喀尔巴阡山脉——巴尔干半岛之间的“铁门峡谷”，进入草原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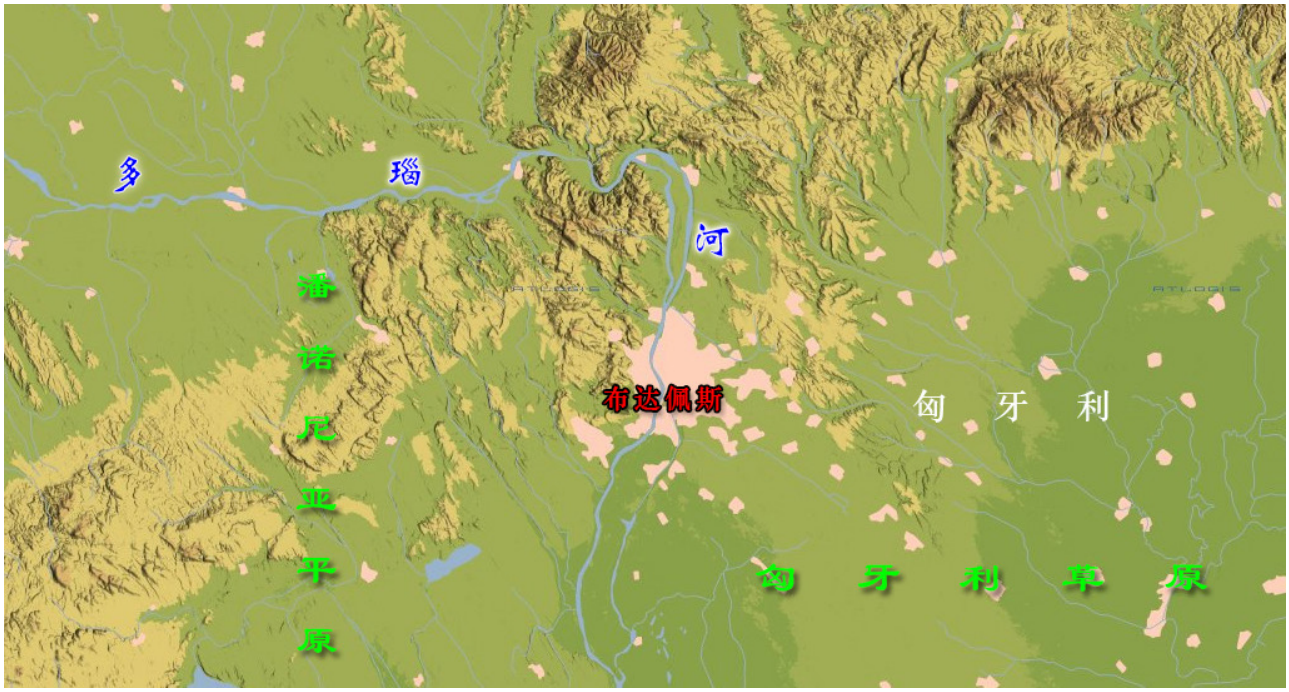
蒙古西征之匈牙利之战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喀尔巴阡山脉有如一道天然长城，庇护着整个多瑙河中游平原，同时亦存在很多可供通行的山口。如果放在东亚，中国人一定会依山势修筑一道长城，并在这些对接两侧河谷的山口之间构筑关隘。不过每个区域有每个区域的特点，同样以骑兵为主的匈牙利人，显然并不适合这种战术。从难度来说，西喀尔巴阡山脉东端（斯洛伐克东北部）是整个喀尔巴阡山脉最薄弱处，其高度、纵深均不到山脉其它部分的一半。在这段山体中有两个比较知名的山口：一个是海拔 500 米的杜克拉山口，另一个是海拔 650 米的武普库夫山口。前者是整个喀尔巴阡山脉的最低点，后者则被认定为是西、东喀尔巴阡山脉的地理分割点。

公元 1241 年 2 月，拔都所率领的蒙军主力（6 万人），决定直接翻越东喀尔巴阡山脉直取匈牙利草原；同时派出一支两万人的部队沿西喀尔巴阡山脉北麓西行策应。为了阻止蒙古大军翻越山口，在入侵危机到来之时，匈牙利人预先以木石将那些常用的山口堵塞。不过很显然，这样的措施最多只能延缓一下对手的行进速度罢了，派驻山口的部队能起到的作用，也只是及时向后方传递情报罢了。很快，拔都所统帅的蒙

军主力便进入了蒂萨河的上游，并横穿匈牙利草原抵达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

尽管匈牙利草原的核心是位于草原中线的蒂萨河，但对于统辖整个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匈牙利王国来说，今天匈牙利首都，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会更适合成为王国的政治中心。罗马帝国时期，整条多瑙河曾经长期承担帝国北方边界的重任。在中游地区，从布达佩斯至贝尔格莱德的这段南北向河道，同时也是农业区（开发前为森林地带）与草原游牧区的分割线。分割线的右岸为潘诺尼亚平原，左岸则为匈牙利草原。当然，草原与森林地带之间，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分割。让游牧民族在多瑙河之东占据优势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地形。潘诺尼亚地区虽然被我们整体称之为平原，但其地形实则为平原、丘陵相间。相比之下，多瑙河以东的匈牙利草原就要平整的多了。这也意味着，更善长筑城防御的农业民族，在多瑙河以西会更有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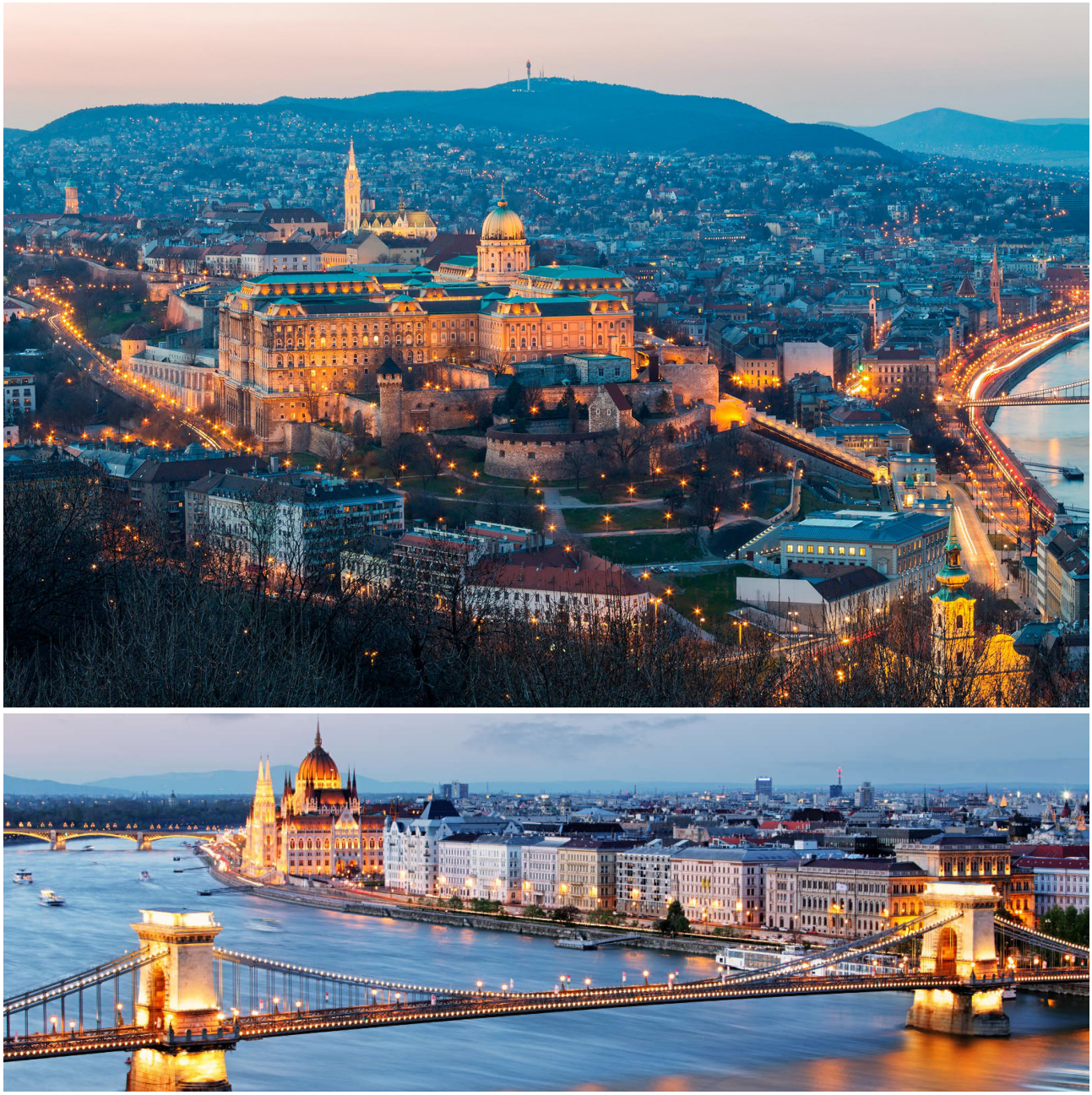


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城的诞生就很好诠释了上述地理特点。这座城实际上由分列多瑙河的两座城所组成：一座是位于河西的“布达”城；另一座则是位于河东的“佩斯”城。其中布达城以丘陵地形为主，佩斯城则主要为平原。两城比较，丘陵广布的的布达城有着更强的防御力。当年罗马人在潘诺尼亚的军事行政中心就在布达城，上帝之鞭阿提拉也曾经以此为都。在马扎尔人成为天主教的匈牙利王国之后，多瑙河东岸的开发便再无障碍了。匈牙利人选择将布达城作为自己首都的同时，也开始在其对岸定居，并最终形成佩斯城。

一直到 1849 年建成第一座链子桥之前，连接两座城市的都是繁忙穿梭于两地的渡船。桥梁的兴建大大促进了两座城市的融合，30 年后两座城市正式合并成为了今天的布达佩斯，由于拓展空间更大，今天佩斯区的规模要远大于布达区。虽然在蒙古人入侵之时，两座城市还未正式合并，但这种共生关系却是一直存在的。类似的情况

在中国也有，最为典型的就是隔汉水相望的襄（阳）、樊（城）两城了。1950 年，两座相伴千年的古城合并而成新的“襄樊市”，只不过很大程度由于金庸老先生小说的助力，2010 年又改名为“襄阳市”了，樊城这个标签则以下辖区的名义得以保留（说起来，布达佩斯最初倒也是叫“佩斯布达”的）。也许若干年后，香港和深圳也会以某种形式融合，只是不知到时候会叫什么名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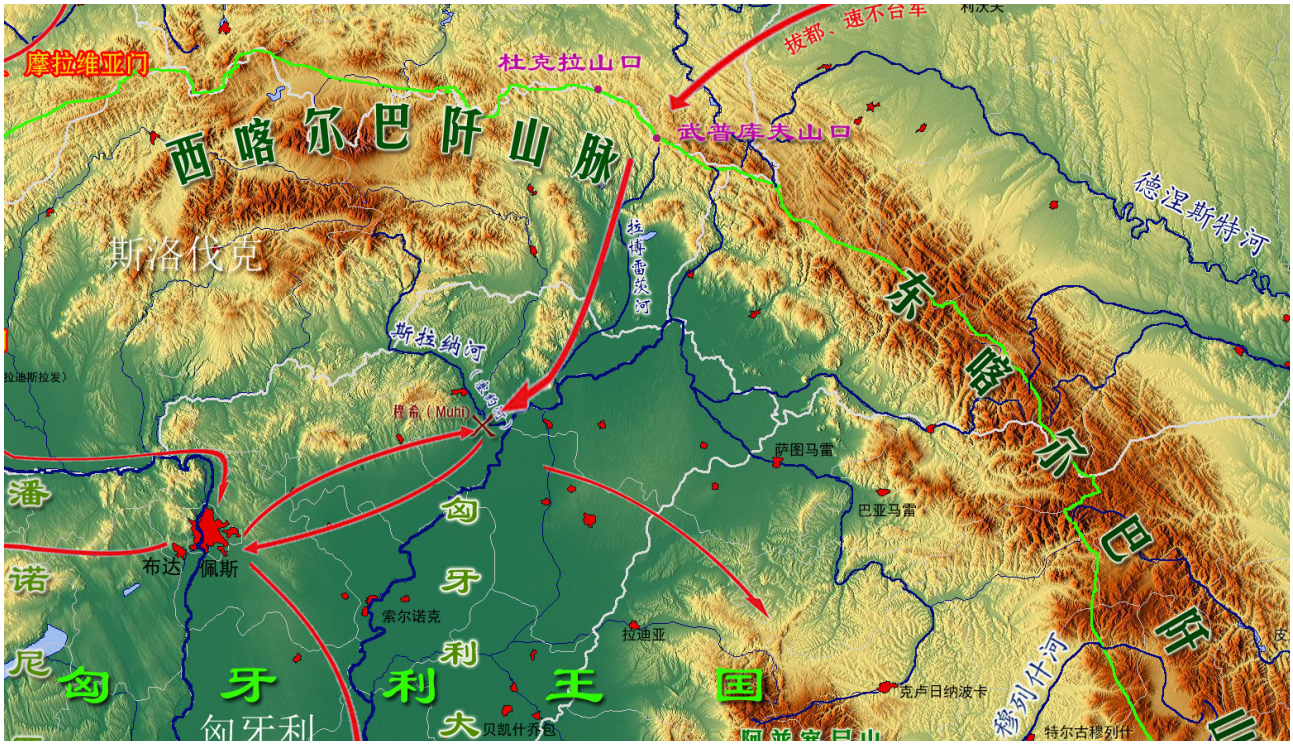
布达佩斯

匈牙利军队惨败于赛约河之战

在蒙古人抵达多瑙河畔时，匈牙利人倒并不十分惊慌。一方面是因为此时河水已经解冻，宽阔的多瑙河成为阻挡蒙古人脚步的天险；另一方面游牧出身的匈牙利人，拥有全欧洲最好的骑兵。此时集结于布达－佩斯的兵力已经多达十万之数（大多数布防于佩斯城）。借助渡船，匈牙利人可以很方便的在两城之间调动兵力、物质，一旦

佩斯城难以坚守，守军也可逐次渡河退入布达城。西征的蒙古人之所以会选择在冬季作战，正是为了规避渡河之难。只是四季轮转，该面对的总归要面对。

在天时、地利、人和占尽优势的匈牙利人面前，蒙古大军并无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是对手离开布达－佩斯城，在草原上决战的话，胜利的天平就将向蒙古人一方倾斜了。在上一次西征歼灭罗斯联军的战役中（卡尔卡尔之战），蒙古人曾经在第聂伯河东岸面临相似的问题。当时蒙古人的做法，是在初战失利后佯装后撤，诱使对手到自己熟悉的环境中野战。这次面对匈牙利重兵打造的多瑙河防线，蒙古人仍然选择了同样的战术，并将主力驻扎于一条叫做“赛约河”的河流之北。最终被诱离出佩斯城的匈牙利大军，在匈牙利草原北部的赛约河畔“追赶”上了蒙古大军，并与之隔河对峙。



蒙古西征之匈牙利之战

很多中文资料将赛约河认定为是“蒂萨河”，并将这场战役称之为“蒂萨河战役”。其实赛约河并非是蒂萨河，而是它右岸发源于西喀尔巴阡山脉南坡（斯洛伐克境内）的一条支流，今天被称之为“斯拉纳河”（捷克语 Slaná）。不过战役的地点位于赛约河下游（南岸），倒也的确与蒂萨河相距不远。由于战场所在地今天为一个叫做“穆希”（Muhi）的匈牙利小镇所有，因此匈牙利人也将这场决定匈牙利命运的战役称之为“穆希之战”。

分隔两军的赛约河面上建有一座桥梁，桥头也成为了匈牙利军队的防御重心。然而相比蒂萨河、多瑙河，赛约河的河道并不算宽，尤其较浅的上游部分还可涉水渡河。公元 1241 年 4 月 11 日，蒙古人开始发动进攻。蒙古人的计划是兵分三路，由拔都亲率中军攻桥以吸引匈牙利人的注意力，其余两路人马由上游和下游河口处，分别涉水、结筏渡河，绕到匈牙利军队的侧后方。东方人狡猾的战术，让习惯了欧洲式正面对决

的匈牙利人，很快乱了阵脚。这场欧亚两洲最顶尖骑兵之间的对决，最终仍然以蒙古人的胜利而告终。

赛约河之战中，匈牙利人的损失据信达到了 7 万之巨，其余部随之退回了佩斯城。然而匈牙利骑兵的作战能力也是很强的，蒙古人在这场战役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至于在是否还要追击匈牙利人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至于蒙古人到底会不会追，后面会解读到。现在我们关心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面“基督教之盾”遭遇了惨败。

第五节 匈牙利人失败的原因

匈牙利的内部重重矛盾与钦察人的逃离

决定一场战役成败的因素有很多。匈牙利人这次的失败主要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战略层面。在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匈牙利王国的扩张在 12 世纪末达到了顶峰。随之而来产生了欧洲“封建”各国都必定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王室与封建领主的权力之争。为了做大王权、约束地方贵族，此时的匈牙利王室更希望借助外来的力量来壮大自己的军力，之前条顿骑士团的引入，根本原因便是为此。

为了应对王室中央集权的企图，英国的贵族推出了自由大宪章（公元 1215 年），而匈牙利贵族也于几年之后（公元 1222 年）逼迫王室颁布了“金玺诏书”，以保护贵族的权力。虽然各国的类似文件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有一层意思却都是明确的，那就是：在合法权力得到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贵族有举兵反抗而不受惩处的权力。这种局面当然不是王室愿意看到的，当蒙古人再次来到欧洲之后，数以万计的钦察人也退入了匈牙利（不仅包括已经归信天主教的钦察人），以期躲避蒙古人的入侵，而匈牙利王室也期望这些游牧者能够帮助自己做大王权。

只是这些钦察人既没有帮到王室，也没有在后来的对蒙作战中发挥作用。在匈牙利贵族和民众的反对声中，王室必须作出选择：到底是靠这些“外人”（甚至是异教徒），还是匈牙利人自己来保家卫国。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要知道，以蒙古人之前在中亚、东欧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来看，这些游牧者在阵前倒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在获知匈牙利人的决定之后（首领为匈牙利人所诱杀），钦察人向南退入了瓦拉几亚平原。此时有能力和意愿为匈牙利人提供支援的（并且不会激化内部矛盾），就只有少量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骑士了。

尽管在蒙古人的压力面前，内部矛盾重重的匈牙利人站在了王旗之下，但那些看似共同对敌的军队，却无法在战术层面有效协同，且不可避免的更注重保存自己的实力。如果战场优势在匈牙利人一边，这一问题倒不会凸显，但一旦形势不利，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就很可能会出现。当然，要把对手的心理逼过这个临界点，蒙古人首先要在战场上占得上风。

匈牙利军队面对蒙古人的军事弱点

让匈牙利人感到大势已去，并向布达佩斯方向溃败的战术原因，不仅仅是蒙古人的两翼包抄战术。我们知道，蒙古人强大的机动能力，受益于他们那身材矮小但耐力极强的蒙古马。为了扩大进攻半径，蒙古战士最少会为自己准备两匹马（换乘）。在借助夜色发动渡河攻击时，蒙古人在这些备用马上绑了穿起衣服的草人，以虚张声势。想象一下，匈牙利人本以为自己的兵力远胜于对手，却突然发现对手的兵力增加了一倍，会造成多么大的心理冲击。更加让人恐惧的，是蒙古人还随身携带了从宋人工匠手中得到的“火箭”。这些火器本身未必能给对手造成多大伤害，但用来引发混乱却是再好不过的了。

另外，除非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否则蒙古人并不会完全包围对手。要知道，把对手逼入绝境的话，自己那些虚张声势的伎俩便难起作用了。“围三阙一”、给敌军留出“生”路的方式，更有利于加速对手阵线的瓦解。而骑射能力出众的蒙古人，则可以在追击过程中，从容的消灭对手。事实上在欧洲日久的匈牙利人，虽然骑术和战斗力依旧出众，但在技术层面已经开始向中世纪的欧洲骑士靠拢了。一方面，他们的装甲变得越来越厚重（虽然没到变态的铁罐头层面），开始追求骑兵正面的冲击力而不是机动力；另一方面，游牧民族所善长使用的弓箭，也逐渐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欧洲人在十字军东征后，向穆斯林所学习到的“十字弓”技术。

当然，战争本来就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蒙古人的这些战术特点，假以时日也会被欧洲人熟悉，并找到应对方法的。不过这些改进都需要时间，不管是匈牙利人还是整个天主教世界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蒙古人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才会停下他们的脚步。要知道，几乎与赛约河之战同时，北路蒙古军在中欧的波兰境内也进行了一场大会战。当年上帝之鞭——阿提拉席卷西欧的场景，似乎已经无法避免了。至于北线战场的结果如何，蒙古人西征的终点又在哪里，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六节 列格尼卡战役

蒙古北路军进入波兰的加西利亚

从技术上看，匈牙利人可以从神圣罗马帝国和波兰王国两个天主教政治体获得后援。蒙古人之所以派军入境波兰，也正是为了牵制这两股力量，以策应主力在匈牙利的行动。对于蒙古人来说，最大的利好是两个曾经强大的天主教国家，此时都已不再强大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分裂性，大家在前面的内容中都已经感受到了。不仅帝国中的意大利北部、波希米亚王国，长期维持独立状态，今天分属德国、奥地利的德意志地区内也是邦国林立。

至于波兰也好不到哪去，在条顿骑士团部分我们曾经提到，这阶段的波兰王国已经依其地缘结构，分裂为了几个公国。当然，无论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是波兰王国，都

还是有帝国皇帝和国王的，只是戴上这顶皇（王）冠的人，并不能调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罢了。在蒙古大军来袭之时，唯有真正受到威胁的板块，才会倾力抵抗。公元1241 年春从基辅出发的蒙古大军，是在德涅斯特河上游开始分兵的。其中承担侧击任务的两万北路军，比之拔都所率领的主力要稍早一点出发，向西进入波兰境内。

800 多年前，波兰人与罗斯人的政治分割线，与今天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国境线大体吻合。从地理的角度来说，北路蒙军相当于从德涅斯特河上游，进入了维斯瓦河上游。后者的上源有两条主要支流，其中发源于西喀尔巴阡山脉西北的西源被视为正源；源自东喀尔巴阡山西北的东源，则被称之为“桑河”。两条人字型相交的河流，所处这块山前低地，地理标签为“桑多梅日盆地”。不过在历史类书籍中经常出现的，是板块的地缘政治标签——加利西亚。

顺便提下另一个覆盖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标签——红俄罗斯。基于地缘位置关系，维斯瓦河与德涅斯特河上游（摩拉维亚之北），一直都是罗斯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三大势力相争之地，这两个上源地区也曾经被政治整合在一起，被称之为“红俄罗斯”或者“红色塞尼亚”。其地缘属性，类似于同样处于族群交融之地的“白俄罗斯”。



蒙古西征之匈牙利之战

蒙古人最先征服的波兰城市是维斯瓦河、桑河相交处的“桑多梅日”城（具体位置在维斯瓦河右岸），桑多梅日盆地之名，也正得自于这座板块枢纽城市。此后蒙古人沿维斯瓦河而上，向加利西亚西端的重镇克拉科夫（1320 ～ 1609 年为波兰首都）发起攻击。波兰人寄希望于在克拉科夫阻击对手，然而狡猾的蒙古人，再一次将不熟悉其战法的欧洲人诱出了城，并利用弓箭消灭了落入伏击圈的波兰军队。



蒙古西征之匈牙利之战

波兰在格列尼卡败于蒙古军队

为了策应匈牙利的战事，拿下加利西亚的蒙古人可以做两个选择：A 方案是从维斯瓦河源头南下，穿过“摩拉维亚门”进入摩拉维亚河流域。此后蒙古人既可以选择向西攻击波希米亚或者奥地利，将神圣罗马帝国卷进来，也可继续南下，通过“匈牙利门”与主力会合；B 方案是继续向西，进入与加利西亚相邻的第二个板块——西里西亚。

事实上，上述两个方案都是蒙古人的选项，只不过是要在执行完 B 方案后，再执行 A 方案。这样做的用意，是彻底让让匈牙利人失去从波兰获取后援的可能性。当然，波兰人并不清楚蒙古人的真实用意，他们希望的是能够在西里西亚完成阻击蒙古人的任务。公元 1241 年 4 月 9 日（比穆辛之战早两日），波兰联军在西里西亚莱格尼察市东南的列格尼卡（Legnickie）列阵，迎击来袭的蒙古军，史称“列格尼卡战役”（又称“瓦尔斯塔特 [Wahlstadt] 战役”）。

西里西里的地理范围为奥得河上游，列格尼卡则位于苏台德山脉与奥得河上游之间，基于位置关系，西里西亚一向为德意志与波兰相争的焦点板块。蒙古人要是能够征服西里西亚的话，也相当于打开了入侵德意志的门户。不过在波兰人紧急备战的时候，德意志诸国并没有出手援助，而是仍然希望观望一下事态的发展。这种各扫门前雪的态度倒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就像列格尼卡战役中，波兰方面的兵力是以西里西亚公国为主一样。

为了准备这场决战，波兰方面共征召、募集了将近 3 万——4 万军队（以重骑兵为主，辅以部分从德意志矿区雇佣而来的步兵）。为了圣战理想，三大骑士团特别是与波兰关系密切的条顿骑士团，也提供了一定支援。从数量上看，波兰联军占据了不小的优势，并且装备精良。不过最大问题仍然在于，这支以重装骑士为主的欧洲军队，完全不熟悉蒙古人的作战方式。

波兰人并非没有和游牧民族打过交道，南俄草原的钦察人同样经常入境波兰袭扰。

甚至在基督教世界的战争中，雇佣钦察人也是常有的事。这些突厥游牧部落给欧洲人的印象是，没有严格的组织性，战术通常以袭扰为主。然而蒙古军队却截然不同，虽然这些亚洲人表面看起来也没什么章法，但实际却有着严格的组织架构和纪律。借助东方战争中常用的令旗，蒙古人能够快速在战场上传达命令、调动军队。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蒙古人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机动能力，并不仅仅是靠蒙古马来完成的。



列格尼卡战役

另外，认为蒙古人在野战中以只用轻骑兵破敌的想法是错误的。最起码在入侵欧洲的蒙古人当中，承担正面冲击任务的重骑兵，已经占到了总数的 40%。在列格尼卡战役中，蒙古人先利用轻骑兵和骑射技术，远距离与波兰联军缠斗，待对手阵线变得散乱不堪时，再利用重骑兵冲阵。虽然波兰骑士的盔甲防护要强于对手，甚至能够阻挡蒙古人在运动当中发出的箭矢，但显然他们没有办法为战马提供同样程度的保护，而被受伤战马掀翻在地的重装骑士们，结局只能是被对手屠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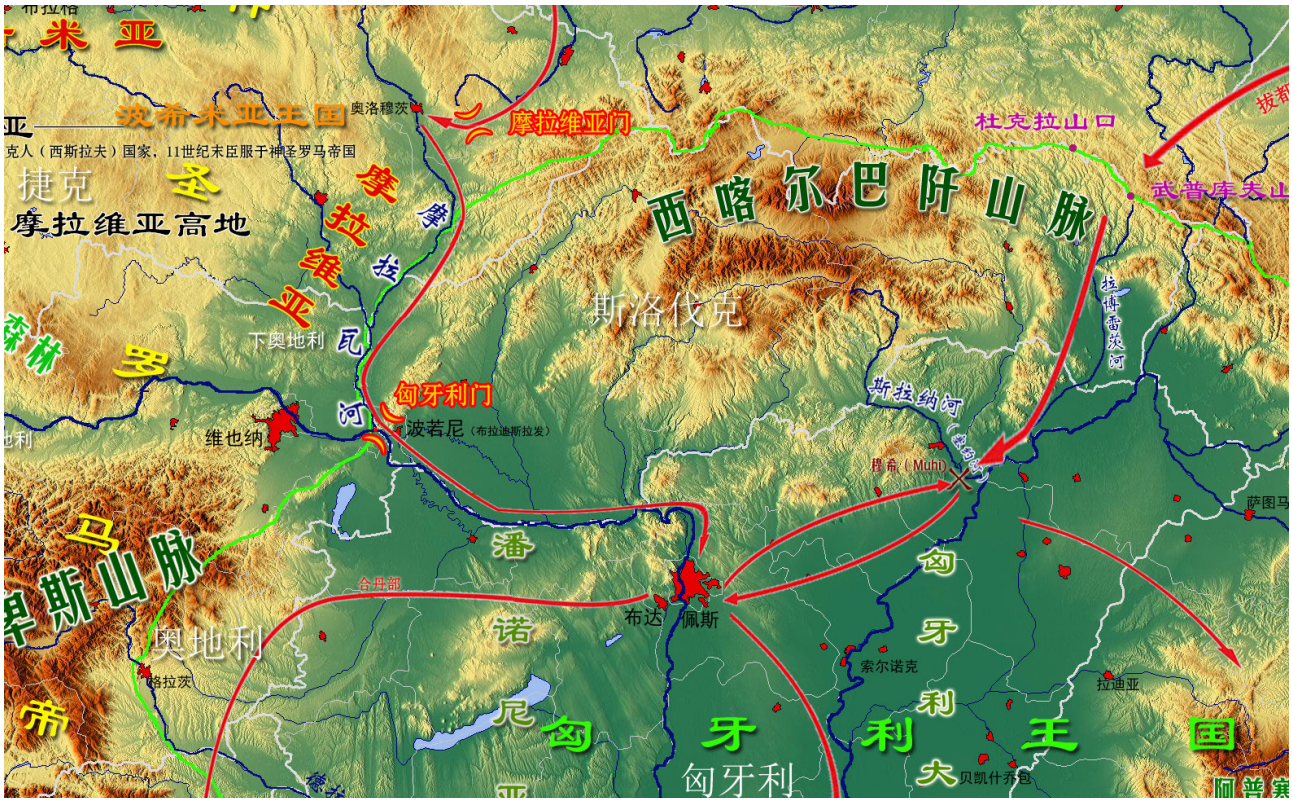
战役结束后，波兰联军至少损失了 2.5 万人。幸运的是，征服波兰并不是此次西征的目标，接下来蒙古人将转而向南，沿摩拉瓦河、多瑙河而下去参加匈牙利的战事了。这也使得列格尼卡战役成为了此次蒙古西征的战争边界。由于后来的金帐汗国，满足于在东欧的经营，没有再对波兰、匈牙利发动大规模入侵，列格尼卡甚至可以算是蒙古帝国所触及到的最西点。

第七节 蒙古人在匈牙利扩大战果

蒙古西路军南下与主力会合作战

今天的摩拉瓦河下游，承担了分割斯洛伐克、捷克，以及奥地利的重任。在13世纪，斯洛伐克则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波希米亚王国也得到了摩拉维亚，成就了今天捷克共和国的版图。这意味着，无论蒙古人是南下还是继续西进，都相当于在波希米亚王国边缘活动。事实上，同属西斯拉夫的波兰人，本来是非常希望捷克人能在西里西亚与之并肩作战的，后者也的确征召了五万兵马准备参战。然而正如前面我们分析的那样，权衡再三之后，捷克人也还是先看下波兰人的战果。

沿摩拉瓦河而下的蒙古军队，让波希米亚王国及南边的奥地利公国非常紧张，并迅速打消了在野战中御敌的想法。蒙古人则在摩拉瓦河上游，试探性的攻击了波希米亚的边境城市。只是善于分化对手阵线的蒙古人，这次并不想真的把“神圣罗马帝国”牵扯进来。在显示出足够的武力威慑之后，北征的蒙古军队很快便穿越匈牙利门，沿多瑙河北岸东行，前往佩斯城与拔都会合了。



蒙古西征之匈牙利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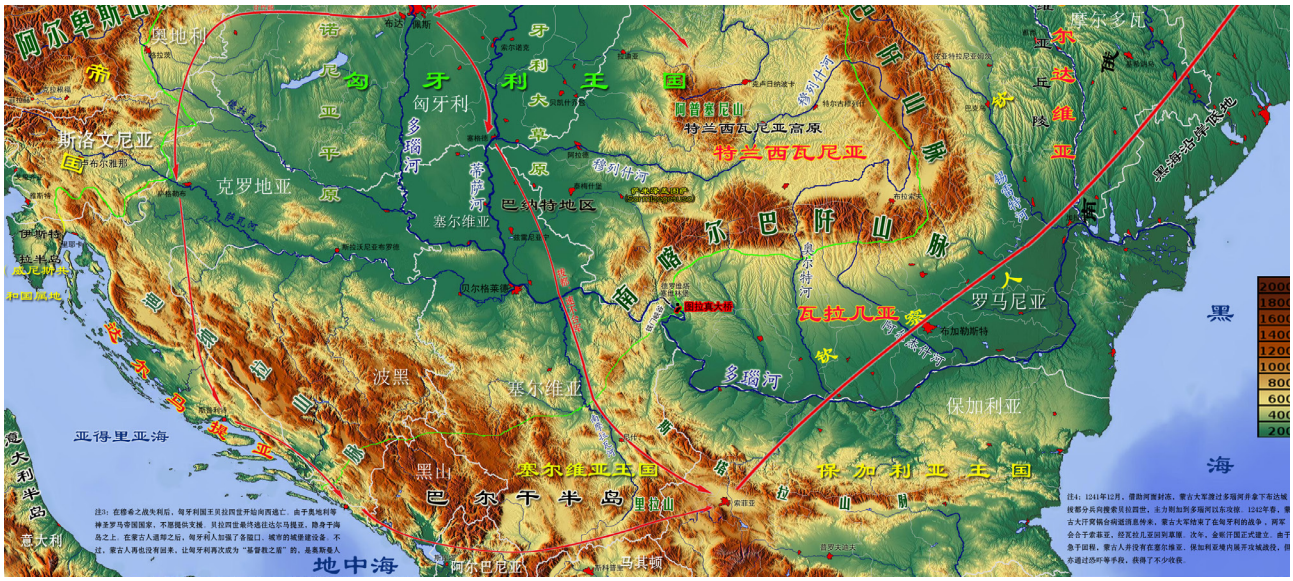
由于进入汛期难以渡过宽阔的多瑙河，穆希之战后的大半年时间中，拔都所率领的蒙军主力都在多瑙河左岸大肆攻掠。总的来说，蒙古人在低地区的收获非常丰富，城镇几乎都被破坏、劫掠。然而在特兰西瓦尼亚高原等高地区，蒙古人却收效甚微。那些依山而建的城镇，极大了影响了蒙古人的攻掠效率。以至于在正面战场无力抵抗

蒙古人的匈牙利人，开始有意识的退入高原、山地保存实力。事实上，蒙古人后来没有再翻越喀尔巴阡山脉，地形方面的顾虑是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钦察汗国在东欧平原的经营就顺畅的多了。

公元 1241 年 12 月，借助封冻的河面，蒙古人渡过了多瑙河，并攻占了布达等城。不久，拔都和蒙军主力则回到了匈牙利草原，以稳固胜利果实。之前从波兰战场南下的蒙古军队，则承担了在潘诺尼亚地区搜索匈牙利国王的任务。无力抵抗蒙古军队的匈牙利国王，试图从天主教世界获得庇护。然而蒙古人早就通过外交途径，让天主教诸国知晓，入侵匈牙利的直接理由，是匈牙利人收留了逃亡的钦察人。出于同样的理由，敢于收留落败匈牙利人的国家，也同样会遭受到蒙古人的惩罚。在整个天主教世界都袖手旁观的情况下，能够帮助匈牙利保留复兴火种的，就只有匈牙利自己了。

蒙古人进入达尔马提亚搜寻匈牙利国王

除了被喀尔巴阡山脉-阿尔卑斯山脉-迪纳拉山脉合围而成的多瑙河中游地区（喀尔巴阡盆地）以外，此时的匈牙利王国还在巴尔半岛的西北部扩张成功。这使得蒙古人希望征服的匈牙利王国，还包括今天克罗地亚、波黑、黑山，以及塞尔维亚（北部低地区）等巴尔干国家在内，并成为了一个地中海国家。当日为了躲避蒙古人的追杀，花剌子模国王选择了逃往里海避难。现在，匈牙利国王和跟随他的残部，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蒙古西征之匈牙利之战

帮助匈牙利王国成为沿海国家的板块是“达尔马提亚”。与亚得里亚海相接的达尔马提亚地区，是由“达尔马提亚半岛”及相对应的巴尔干半岛沿海地区所组成的。在拜占庭的势力退出之后，达尔马提亚也成为了代表海权的威尼斯共和国，与代表陆权的匈牙利王国争夺的焦点。从 1097 年双方爆发第一次战争开始，一直到 15 世纪初，威尼斯人借奥斯曼帝国崛起之机，夺取达尔马提亚为止（匈牙利人要在南线再次充当“基督教之盾”），双方先后进行了不下 15 次战争。

巴尔干半岛具体的地缘结构，以及匈、威之间的恩怨，我们在后面解读奥斯曼帝国崛起时会详细解读。现在的话，大家只需清楚在蒙古入侵匈牙利时，达尔马提亚沿岸基本属于匈牙利王国的领地。这使得匈牙利国王有机会，在达尔马提亚群岛那1000多个岛屿中，选择一个即不受威尼斯人控制，又让蒙古人找不到的藏身之地。

为了完成拔都交待的任务，在潘诺尼亚攻掠的蒙古人，翻越迪纳拉山脉进入了达尔马提亚，不过想要探知匈牙利国王的具体下落，却是十分困难的。当然，蒙古人是肯定不会让自己闲着的，斯普利特等达尔马提亚沿海城市，相继受到了蒙古铁蹄的蹂躏。这也意味着，整个匈牙利王国的领地，都在承受着这场“黄祸”。如果不是一个重大信息从东方传来，没有谁会知道蒙古人还要在这呆多久。至于这是个什么消息，蒙古人后来又去了哪，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八节 拔都结束西征的返程

蒙古大汗离世促使拔都结束西征

公元1241年12月11日，在西征大军跨越多瑙河的时候，成吉思汗的继任者、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却因病离世。着手为蒙古人统治下的各地区建立赋税体制，以及组建完善的驿传体系，是这位大汗生前为帝国所做的两个主要贡献。前者让“蒙古”从一个掠夺者的身份，转换为一个经营者（虽然不成功）；后者则极大加强了欧亚大陆各版块（蒙古统治下的）之间的信息交流。两项工作的完成，表明蒙古人的国家，开始从一个草原游牧体迈进至帝国行列。

帝国首都（蒙古高原上的哈剌和林）与西征大军相隔7000公里，借助高效的驿传系统，身在匈牙利的拔都可能在一个月后就获知了消息。也正是这个消息，让西欧天主教世界得以摆脱这场“黄祸”。很显然，争夺蒙古帝国大汗之位的重要性，要远比劫掠财物重要的多。公元1242年春，西征大军结束了在匈牙利的战事，开始了东归之路。然而这并不代表那些丧未遭受蒙古人侵扰的国家，就此可以松口气了。因为这些游牧者对尚未探索的过的土地，永远充满着好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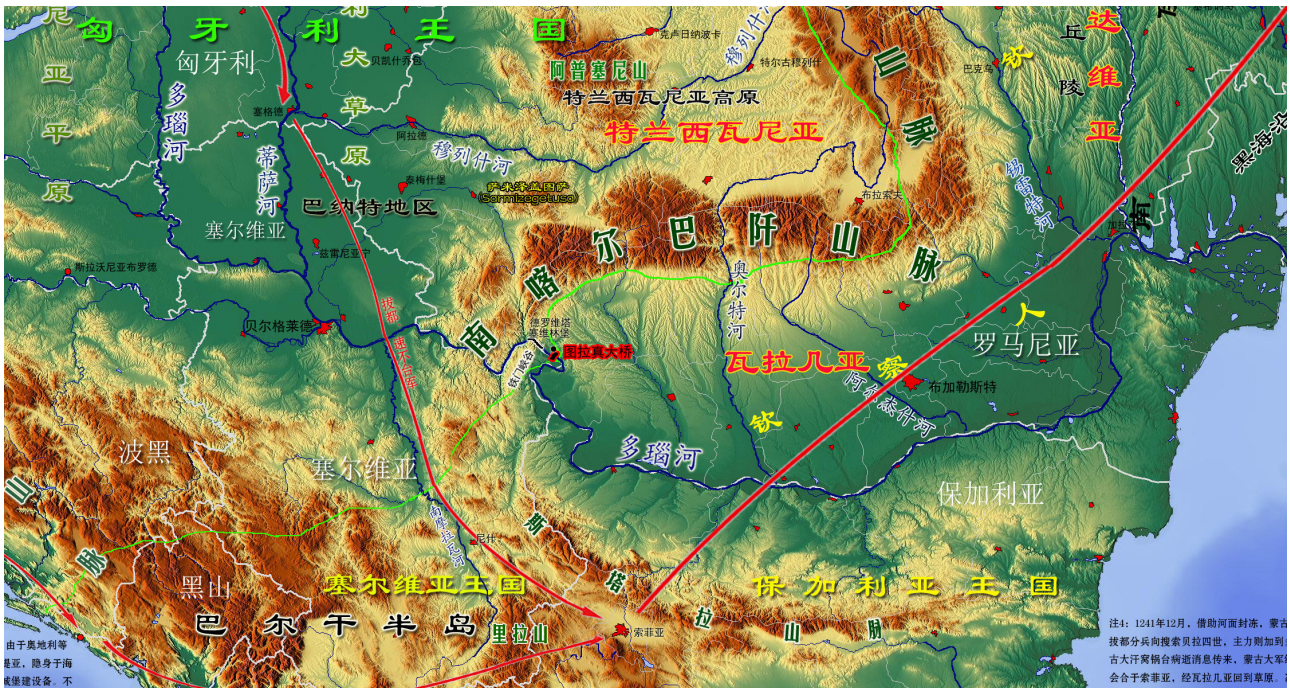
就像当日成吉思汗攻灭花喇子模国后，又派军到南俄草原探路，而探路的蒙古军在先后击败阿兰人、钦察人、罗斯人后，回程时还顺带试探了下伏尔加保加尔人的成色一样，拔都和他的大军也没有原路返回，而是准备透过多瑙河下游回到南俄草原。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地区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首先今天的罗马尼亚在此时还未立国，除了达契亚高原为匈牙利人所有以外，罗马尼亚三大板块中的瓦拉几亚平原和摩拉维亚（摩尔达维亚）丘陵，亦为钦察人所覆盖。至于多瑙河之南，则是复兴之后的保加利亚（第二）王国。

不管是身处匈牙利草原的西征军主力，还是在派往达尔马提亚搜寻匈牙利国王的蒙军，要想进入保加利亚和瓦拉几亚，都得先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北部山地。在这片主

要为“南斯拉夫人”所覆盖的山地中，塞尔维亚人算是政治上的先行者。13 世纪初，借助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所引发的混乱，塞尔维亚人摆脱了拜占庭帝国的控制，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东归蒙古人要想进入多瑙河下游，就需要先进入塞尔维亚。不过此时的塞尔维亚王国与今天塞尔维亚的疆域，所覆盖的板块不尽相同。简单点说，今天塞尔维亚北部，以其首都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多瑙河流域低地区，当时是还是匈牙利王国领土（1284 年，因匈塞结盟关系送给了塞尔维亚）。

蒙古军回程经巴纳特

身处匈牙利草原的蒙古主力，将基地设在了蒂萨河下游的“塞格德”（蒂萨河与其支流穆列什河相交处）。在解读罗马－达契亚战争时，我们曾经提到，塞格德之南、蒂萨河以东至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之间的这片低地区，有个特定的地缘标签——巴纳特地区。除归属匈牙利的塞格德以外，绝大部分为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所有。在罗马帝国征服达契亚后，巴纳特平原也是帝国在多瑙河之北、达契亚高原以西拥有的唯一一片低地，对于连通达契亚、巴尔干、匈牙利草原、潘诺尼亚等板块，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进入中世纪以后，从匈牙利草原而下的马扎尔人、以特兰西瓦尼亚高原有基地的达契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在潘诺尼亚、巴尔干定居的“南斯拉夫人”，都对这片土地施加过深远的影响。



蒙古西征之匈牙利之战

塞尔维亚所分得的巴纳特地区，又被称之为“伏伊伏丁那地区”。之所以把它单独拿出来提一下，是因为这个地区的行政属性比较特别，全名为“伏伊伏丁那社会主义自治省”。在塞尔维亚（包括前南时代）的行政区划中，一共有两个所谓的“社会主义自治省”，除了北区低地区这个以外，还有一个位于西南部山区的自治省，它就是大家熟知的“科索沃”。科索沃的情况，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至于伏伊伏丁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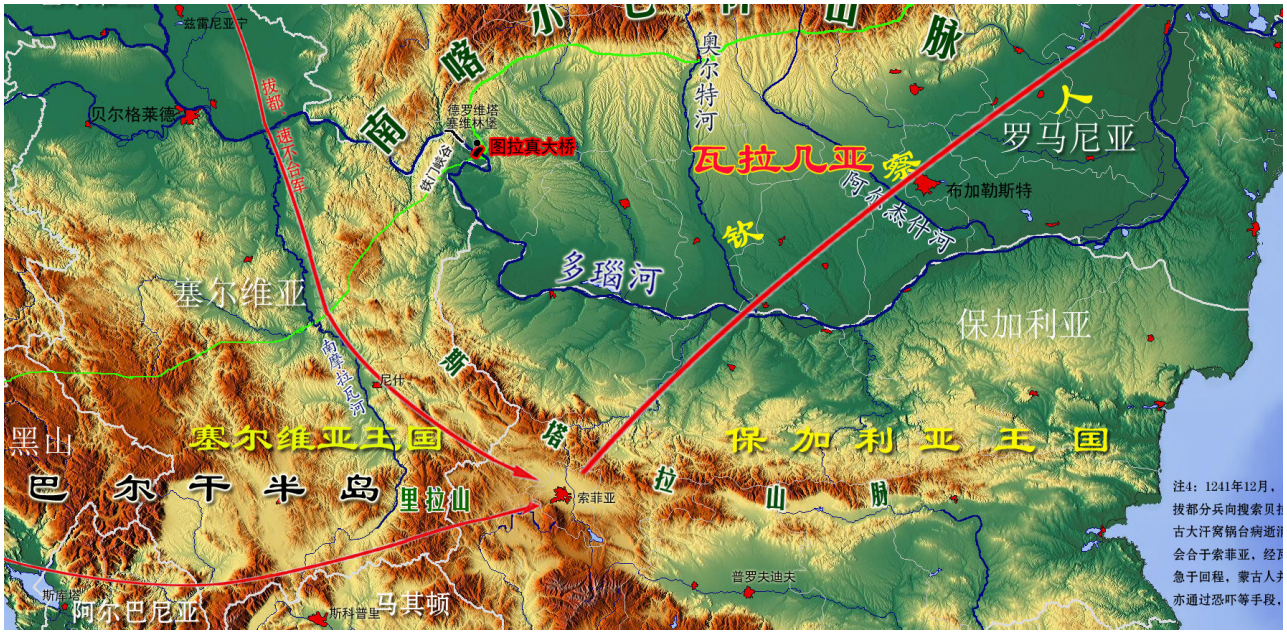
不是有一天，也会成为时政热点地区，倒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在这里提出，更多是让大家关注到它们背后的地缘因素。

第九节 蒙古军经保加利亚返回南俄草原

蒙古军回程时进入保加利亚

在纵穿巴纳特地区、渡过多瑙河之后，蒙古人会看到一条把他们带入巴尔干山地的河流：大摩拉瓦河。这是一条贯穿南塞尔维亚，最终注入多瑙河右岸的河流，由两条发源于巴尔干山地的上源：西摩拉瓦河、南摩拉瓦河合流而成，匈牙利王国与塞尔维亚王国当时的分割线，也正在这个点上。由于蒙古人的方向是东部的保加利亚，所以他们先沿着大摩拉瓦河——南摩拉瓦河而上，然后折向东进入巴尔干山脉（斯塔拉山脉）南麓的保加利亚。

巴尔干山脉是多瑙河流域与巴尔干半岛的地理分割线，同时也将保加利亚分为了南北两部分。在希腊罗马时代，巴尔干山脉以南直至黑海北岸的低地区（马其顿以东），被称之为“色雷斯”。其中南保加利亚为“北色雷斯”（希腊部分是西色雷斯，土耳其部分为东色雷斯）。也就是说，蒙古人的回程路线是先进入“北色雷斯”（南保加利亚），然后翻越或绕过巴尔干山脉，进入多瑙河下游平原。



蒙古西征之匈牙利之战

蒙古人进入南保加利亚的第一站，就是保加利亚名城“索非亚”。这个城市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巴尔干山脉西南麓的山间盆地（索非亚盆地），对南、北保加利亚的辐射力相当，且有山地护佑。其地缘价值，很像第比利斯城在高加索地区的定位。后来保加利亚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独立时，索非亚被定为了保加利亚的首都。同样也正是基于这个枢纽位置，蒙古人也将索非亚盆地定为了两军的会合地。

现在我们该看看达尔马提亚的蒙军，是如何抵达保加利亚的了。收到命令的蒙古人，从达尔马提亚的南端，经现在的黑山、阿尔巴尼亚北部，以及刚才提到的科索沃地区，进入南摩拉瓦河上流，最终进入索非亚与主力会和。由于急于回程，两支蒙军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都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战役。更多是派出小股部队袭掠定居点，并靠着蒙古人恶名威逼沿途城镇缴纳赎金。总的来说，回程时的情况和匈牙利差不多，蒙古人在低地区的收获，与在山地区遇到的困难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没有遭受如匈牙利般的恶运，但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在送走蒙古人时，都被告诉他们还会再回来的（不过后来，蒙古人却再也没有回来）。

拔都西征对各方产生的影响

回到南俄草原的拔都，于次年在伏尔加河下游正式建立了钦察汗国。并在随后的历史中，满足于在东欧平原的经营，没有再试图征服匈牙利及多瑙河流域。从蒙古方面来看，是因为拔都西征的本质，是倾帝国之力在帮钦察汗国打天下。在完成了对钦察草原的征服，并使东欧森林地带的罗斯人、伏尔加保加尔人臣服后，接下来再能走到哪步，就是钦察汗国自己的事了。回到蒙古草原的其它部众，将开始为自己的长远利益做谋划了（后来继承帝国汗位的蒙哥汗，也是这次西征的成员）。而从欧洲方面的情况来看，起到关键作用的，仍然是天主教化的匈牙利人。

从地缘结构上看，当年匈人之所以能够横扫西欧，是因为匈牙利草原还是游牧者的天下。翻越喀尔巴阡山脉的匈人，可以很容易的收服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并以匈牙利草原为跳板，攻掠阿尔卑斯山南北。然而在马扎尔人和匈牙利草原变成“基督教之盾”后，地缘政治的天平开始向基督教世界倾斜。虽然在这次匈牙利之战中，自认为骑兵天下无双的匈牙利人吃了大亏，但蒙古人在高地区的举步维艰，也暴露了自己的板块。

为了防备蒙古人的再次入侵，重整河山的匈牙利王国，开始重视依托山地、山口构筑城堡关隘。比如布达城就依托城内的布达山，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布达城堡”（公元 1247 年始建）。对于后来的钦察汗国来说，他们在战略层面遇到的问题是，匈牙利拥有足够多的山地，一旦对手决定不与之野战，而是依托山地保存实力的话（并在低地区坚壁清野），那么蒙古人自己很可能会被拖垮。

好了，现在大家已经清楚蒙古人在欧洲的扩张边界了。应该说，除了本身还被欧洲人视为野蛮之地的罗斯诸国以外，整个基督教世界并没有为蒙古人所征服。在这两次西征之后，蒙古人又在西亚方向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西征。随后又在东亚吞大理、灭南宋，甚至远征日本等。问题是我们这阶段的任务是解读欧洲，东方的事情对欧洲的地缘结构影响力有限，所以不会在这个方向铺陈了。不过蒙古第三次西征，倒还是需要花些笔墨的，因为这次西征催生出了一个与欧洲为敌 600 余年的强大帝国——奥斯曼帝国。这个对手不仅直接改变了黑海、爱琴海地区的地缘结构，更“帮助”欧洲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大幕。接下来的内容，也将帮大家了解这一切。

第二十四章 蒙古西征西亚

第一节 蒙古人对西伊朗的征服

蒙古远征大理与新月沃地的地缘地位

蒙古第三次西征，发生于公元1252年——1260年之间。两次西征之间的这段时间，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扩张，很大程度是因为汗位之争。公元1251年中，这场历时十年的汗位之争终于尘埃落定，最终获得汗位的是曾随拔都西征的蒙哥（拖雷长子）。内部权力再次集中的蒙古人，马上就开启了他们在东、西两线的新战略。

在东方战场上，帝国开启了一个远征云贵高原之上的“大理国”，然后再从云贵高原沿珠江东进征服岭南，包抄南宋的宏大计划（史称“斡腹之谋”）。这一计划，与当年秦、汉两帝国征服南越之地的设计颇有些类似。有所不同的是，在没有拿下四川、湖南的情况下，蒙古人决定绕过长江中游地区，从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南下攻取大理。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公元1254年），这一史无前例的计划便完成了第一步，云贵高原也就此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

顺便说一下，云贵高原之于蒙古控制中国南方的战略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征服的过程中。事实上，在后来元朝统治中央之国的过程中，云贵高原也一直是其经略重心，并随之迁入为数不少蒙古人、穆斯林色目人。高原温凉的气候、多样性的植被类型，以及多民族混居的文化背景，也为他们的定居提供了有利的地缘环境，并最终地缘孤岛般的，在云南境内形成了聚居性的穆斯林群体。

云南发生的事虽然与我们更近，但毕竟对欧洲没有影响了，所以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在西线，看看蒙古人这次的目标是哪里。其实这并不难猜，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帝国，已经在东亚（中国）、南亚（印度）、西欧，三大边缘板块尝试过了，自然不会放过人类文明的起源之地——西亚了。更何况早在成吉思汗亲征之时，蒙古铁骑就已经叩响过西亚的大门。由于这次西征的统帅是蒙哥的弟弟旭烈兀，因此也被称之为“旭烈兀西征”。

从地缘上看，西亚或者说中东的中心就是著名的“新月沃地”。作为世界文明的起源之地，新月沃地一直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争夺焦点。在麦金德的“世界岛”划分中，新月沃地也是被视为重要的边缘板块。当然，在几大边缘板块的潜力都得以开发后，与荒漠相邻、地力有限的新月沃地，已经没有机会成为一类板块了。比如今天我们再去看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等新月沃地国家，更多是把它们视为大国博弈棋盘上的棋子，即使整合在一起，也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极。

就地理、环境属性来说，小亚细亚半岛更应该被归入欧洲范畴、阿拉伯半岛则与北部非洲实为一体。做出这样划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在新月沃地正是欧亚非三洲相

交之地，不仅是中东的“中原”，更是整个旧大陆各方势力逐鹿的“中原”。虽然蒙古人并不会从地缘视角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最起码他们知道新月沃地的富庶，亦了解这片土地在欧亚非贸易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

蒙古军队进入伊朗高原攻灭后花剌子模

在成吉思汗大军退回东方之后，蒙古人并没有继续深入西伊朗和小亚细亚，而是将势力范围暂时止步于呼罗珊地区。也就是说，成吉思汗这次远征的目标的确是花剌子模。南、北阿塞拜疆及整个高加索地区、欧洲草原的战事，都只是为后来的远征欧洲打基础。这也使得在成吉思汗东归之后，看似已经被灭的花剌子模，得以有机会死灰复燃。尽管从锡尔河到呼罗珊的花剌子模核心区，都已经为蒙古所有，那个敢于挑战蒙古帝国威严的老国王也已饮恨里海，但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在阿富汗全歼蒙古先锋部队，在印度河之战逃脱的花剌子模新国王——札兰丁。

我们知道成吉思汗来袭之时，花剌子模并非处于衰弱期，而是也正处在上升期。虽然在蒙古人的横扫之下，中亚诸国无人能挡，但札兰丁在对阵蒙古人时曾经取得的成绩（成吉思汗在印度河之战时曾公开感叹过他的勇猛），以及花剌子模留下的政治遗产，使得他有机会在蒙古退却之后东山再起，尤其在蒙古人到来之前，花剌子模刚刚完成西伊朗（包括南阿塞拜疆）的整合工作。现在借蒙古人退兵之际，杀回来的札兰丁很快就完成对整个西伊朗地区的征服工作，恢复了花剌子模的半壁江山。在这次复国的过程中，并没有付诸太多的武力。更多是因为被蒙古人吓破了胆的西伊朗诸国，希望有人出来领导他们抵御蒙古人。

我们可以把重生的花剌子模称之为“后花剌子模国”。在控制西伊朗之后，后花剌子模并没有试图光复在中亚的故土，事实上即使札兰丁这样想，那些愿意跟随的国家也不会愿意主动挑战这些恶魔般的游牧战士。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花剌子模俨然又一次成为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甚至整个地中海文明圈的门户。围绕其周边的重要地缘政治势力，由北向南依次是控制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王国”、安纳托利亚高原的“罗姆苏丹国”、以埃及为基地向北延伸至叙利亚地区的阿尤布王朝，以及继续在两河平原维系哈里发地位的“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

此时的花剌子模可以做出两个选择：一是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上述国家结盟，以在危机来临之时获得支援；二是借蒙古人注意力还在东线解决西夏问题时，迅速向西、南方向扩张做大自己。最终札兰丁选择了后者，并不能说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毕竟有那么多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蒙古人对于分化对手联盟可是很有一套的。不过在面临多方角逐的地缘政治局面时，合纵连横还是很有必要的，然而札兰丁却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将上述邻国尽数攻击了遍，这也让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

公元 1227 年，蒙古人在东线攻灭西夏（同时成吉思汗伤故），又经历两年的内部博弈之后，窝阔台成了蒙古第二位大汗，这也意味着留给札兰丁的时间不多了。当 3 万蒙军出现在伊朗高原，准备彻底解决花剌子模问题时（公元 1230 年），这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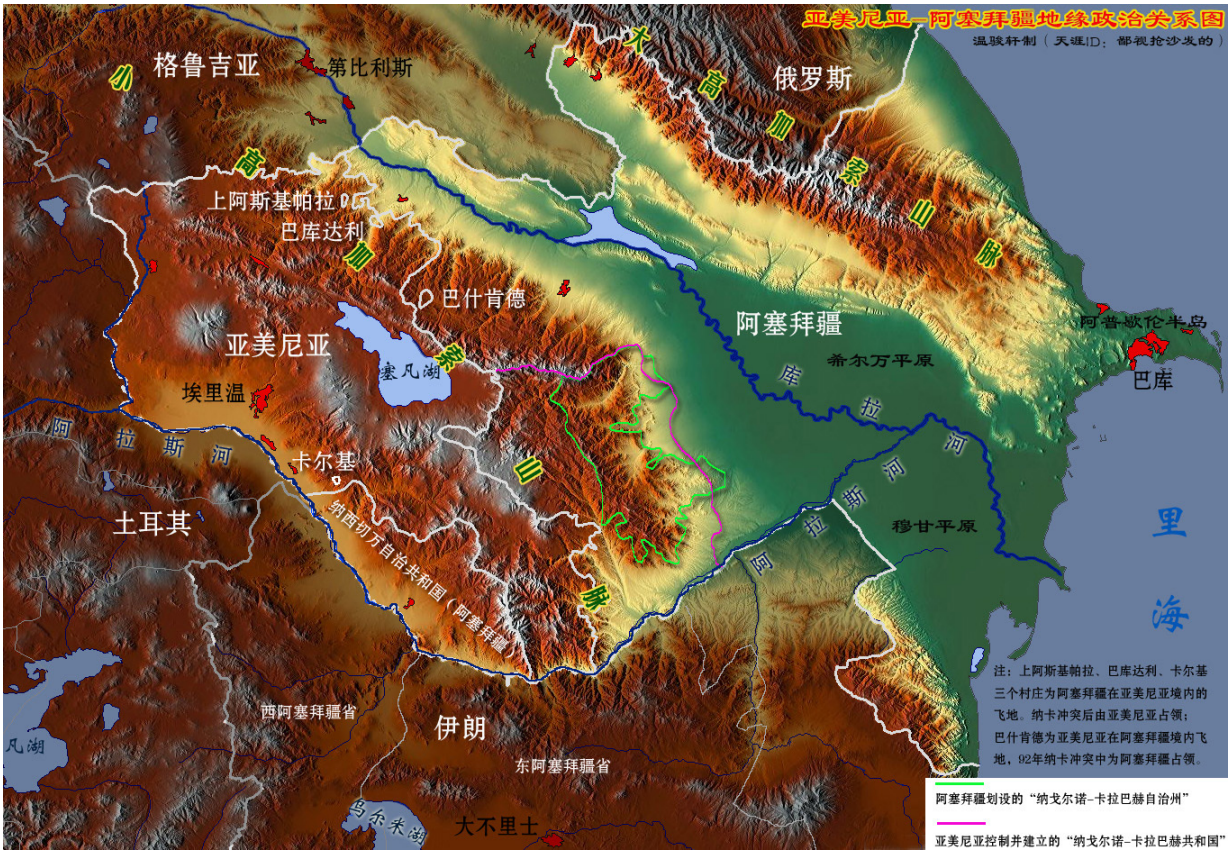
西伊朗重建的国家，在西线刚刚遭遇了重大失败。错误的外交决定，使得札兰丁不仅得到任何外援，还必须在西线面临罗姆苏丹国、阿尤布王朝等国联军的攻击。在这样的局面下，蒙古人很快便攻灭了“后花剌子模国”（札兰丁在逃亡过程中被杀），而原本臣服于其的西伊朗诸势力，也旋即臣服于蒙古人（公元 1231 年）。

鉴于这次军事行动更多是在替成吉思汗的第一次西征善后，出征规模也不大，因此并没有被认定为是正式的西征。不过在随后经略伊朗高原的这 20 年时间中，驻扎于此的蒙古人，也并非毫无建树。

第二节 蒙古入侵罗姆苏丹国

蒙古驻军于阿塞拜疆并使周边地区臣服

一直到旭烈兀西征之前，蒙古人在伊朗高原都没有寻求建立有效的政治统治体系。更多是采取军事威慑的形式，让这一区域的城国臣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花剌子模势力彻底铲除后的蒙古人，选择了在阿塞拜疆驻军，以监控西伊朗和高加索地区。高原之上的南阿塞拜疆、平原为主的北阿塞拜疆，共同为蒙古人保持他们的军事优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地缘政治关系图

身处北阿塞拜疆的“穆甘草原”是大家在阅读相关资料时，经常会碰到的一个地理名词，在前面的行文中也多次出现过。在大小高加索山脉包夹的两块喇叭形平原中，

面朝里海的这部分，是由主要是由库拉河及其支流所润泽的。库拉河本身也成为了一条地理分割线，一般情况下河北被称之为“希尔凡平原”，河南则被称之为“穆甘平原”或者“穆甘草原”。

对于从亚洲而来的游牧民族，肥美而又气候凉爽的穆甘草原是他们最喜欢的驻地。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突厥属性的阿塞拜疆，能够在地缘政治孤岛般存在的重要原因。被吸引的不仅是突厥人，试图在西伊朗恢复旧日荣光的花喇子模，也曾经以此为统治中心。对于突厥人或者花剌子模人来说，包括穆甘草原、大不里士城在内的“阿塞拜疆”地区，即有农业、城镇为之补给，又能帮助他们保持马上民族本性。同时其板块相接的地缘位置，又可以向南俄草原、亚美尼亚高原、伊朗高原等板块延伸影响力。

一如“后花剌子模”一样，驻军阿塞拜疆的蒙古人也没有为周边板块带来和平。不过蒙古人这样做，可是比花剌子模人有底气多了。除了西伊朗诸国以外，格鲁吉亚王国也很快识时务的表示了臣服。在拔都西征建帐伏尔加河以后，蒙古人在这一地区的征服就更加没有后顾之忧了。不过高加索地区敏感的地缘位置，也还是在蒙古帝国内部的政治博弈中有所体现。旭烈兀西征对蒙古帝国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从阿姆河到幼发拉底河的“伊尔汗国”。在诸汗国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内高加索地区也成为了金帐汗国与伊尔汗国的争夺焦点。双方所形成的平衡点，也颇符合地缘规律。

与里海相邻的阿塞拜疆地区，后来则成为了伊尔汗国的属地；在拔都结束西征之后，面朝黑海，与欧洲地缘关系紧密的格鲁吉亚人，则被迫选择归附金帐汗国（公元1243年）。与此同时，阿塞拜疆的蒙古驻军也发动了一场远征，矛头则是指向塞尔柱人最后的政治势力代表——罗姆苏丹国。

在11世纪末塞尔柱帝国解体后，塞尔柱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很多小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塞尔柱小国后来渐渐的被新崛起的阿尤布、花剌子模等王朝所蚕食。比如12世纪末，借助与花剌子模人达成了政治交换，巴格达的哈里发就摆脱了塞尔柱人的控制，让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重获新生。在诸多塞尔柱苏丹国中，能够最后保持独立地位的，就是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罗姆苏丹国”了。

蒙古击败罗姆苏丹国并导致其解体

对于这个塞尔柱国家我们并不陌生，其对小亚细亚的征服，不仅直接导致了拜占庭帝国的衰弱，更可以说是十字军东征的触发点。在塞尔柱人渗入小亚细亚之前，整个半岛曾经长期属于欧洲地缘圈。身处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之间的“亚美尼亚高原”，则是欧、亚两地帝国政治博弈的缓冲地。亚美尼亚王国也因此得以保持了长达千年的独立、半独立地位。

不过这一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毕竟欧洲能对小亚细亚半岛施加影响的主要是沿海低地，而气候干燥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则更有利于欧亚游牧民族渗透。至于到底是欧洲人透过登陆低地，进而得到整个半岛；还是亚洲人通过入驻高地，进而控制沿海低地就不一定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谁也无法得到整个小亚细亚。在蒙古人到来之

时，小亚细亚的情况就是如此。罗姆苏丹国的领地基本是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之上，而沿海的丘陵平原区则为特拉比松、尼西亚、亚美尼亚等从拜占庭帝国分裂出的基督教国家所控制（为了争夺出海口，罗姆苏丹国与这些国家战事不断）。

事实上，我们甚至能够从罗姆苏丹国的名称，看出小亚细亚长期以来的欧洲属性。源自阿拉伯语的“罗姆”二字，意思就是“罗马”。罗姆苏丹国之称，意为建立在罗马领土上的苏丹国。由于苏丹国的都城设在高原腹地的“科尼亚”，因此也被称之为“科尼亚苏丹国”。现在，觊觎这片土地的变成了蒙古人。既然突厥人能够入主这块罗马故地，身为草原之王的蒙古人，自然也是没理由不去尝试一下的。公元 1243 年初，从高加索出发的蒙古人开始向安纳托利亚高原进发。

在希腊时代解读安纳托利亚地缘政治结构时，曾经提到高原东北部与高加索地区相接处，有一条东黑海山脉（又称“庞廷山脉”），其南麓的河谷地带，一向为高加索地区通往小亚细亚的草原走廊。整个走廊带是由两条相向而行的河流：西流的凯尔基特河（汇入耶希尔河并注入黑海）、东流的乔鲁赫河。两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分水岭，也是安纳托利亚高原与亚美尼亚高原之间的地理分割线。这条走廊带，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庞廷走廊”。



小亚细亚半岛地缘结构图

虽然庞廷走廊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为小亚细亚甚至欧洲带入了无数入侵者，但最能让中国人有熟悉感觉的就是蒙古人了。而对于塞尔柱人来说，蒙古人进入乔鲁赫河谷则意味着危险来临。为了阻止蒙古人，塞尔柱人甚至说服了北部的特拉比松帝国，以及部分格鲁吉亚人与自己站在一起，以阻止蒙古人西进。

双方决战的地点，在今天土耳其小镇“克谢”（可用“土耳其 Köse”在谷歌地图上定位）东部山隘处。这场战役也由此被称之为“克谢山战役”（亦有译做“克塞山战役”）。放在地形图中看，克谢以东这个山口的位置就很好理解了。简单点说，这个位于庞廷走廊中点的山口，就是克尔基特河与乔鲁赫河的分水岭。攻破它的话，

蒙古人既可沿着凯尔基特河，攻入黑海沿岸的特拉比松帝国，也可直入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不对付的塞尔柱人和希腊人，这次愿意共同对敌的原因。

公元 1243 年 6 月，双方主力开始在克谢山口接战。身为防御方的塞尔柱人，本来可以依托城堡、地形固守的，不过战场指挥官还是选择了派出一支 2 万的的先锋部队主动出击。然而狡猾的对手在使用他们惯用的诱敌深入之策后，很快便歼灭了这支部队。亲身体验过蒙古人强大的战力之后，剩余塞尔柱联军迅速丧失了斗志。很快，蒙古军队使在安纳托利亚高原长驱直入，并迫使罗姆苏丹国向蒙古帝国表示臣服。

蒙古人的这次入侵直接导致了罗姆苏丹国的解体，此后这个最后的塞尔柱王朝，逐渐分裂为三十多个政治体。原本从属于塞尔柱人的一些突厥系部落，也开始有机会独自立国。其中表现最突出，并最终统一小亚细亚的，就是奥斯曼人（公元 1299 年独立建国）和他们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了。不过奥斯曼人的崛起，是下个世纪的事了。现在我们所处的 13 世纪，还是蒙古人的黄金期。接下来还要看看，蒙古人在西线还能有什么作为？

第三节 蒙古人攻灭木剌夷国

木剌夷人从事剌杀活动

旭烈兀西征要啃掉的第一块硬骨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木剌夷国。“木剌夷”本身是一个教派的名称，在 11 世纪末至 13 世纪中属于什叶派的一个分支，扎根于伊朗高原北部的山脉之中。与其它国家不同，这个国家无论是立国手段还是地理选择都非常的独特，与其说它是一个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极端宗教组织。其在伊朗境内获得的第一个立足点（也是其政教中心），是构筑于厄尔布尔士山脉一座海拔 3000 米的山峰之上的城堡：阿拉穆特堡（ Alamut 意为“鹰巢”）。具体位置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西北（直线距离约 100 公里）。为此，外界多称其政教领袖为“山中老人”。

木剌夷国的立国手段，在于它的非对称作战方式。这一方式简单点说，就是“剌杀”。任何与其有争端的穆斯林国家君主，都会成为了木剌夷国的目标。即使你没有与之有纠葛，你的对手也可能从山中老人处雇佣剌客剌杀你。同时，为了在伊斯兰世界获得口碑，那些服务于十字军的穆斯林首领，也会成为山中老人的暗杀对象。这使得木剌夷国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都可算得上是臭名昭著。

在关于山中老人的传说中，最令世人感兴趣的当属其培养、控制杀手的手段了。在今天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经常发动的自杀性恐怖袭击中，很多袭击者都被灌输过为圣战理念而，死便可上“天堂”的想法。这种洗脑方法，最早便是山中老人们所实践的。区别在于，他们真的山中营造一个遍布美女、美食、鲜花的“天堂”。那些自幼接受训练的杀手在成年后，都会在这个天堂中享受一段时间。只不过，他们进出“天堂”之时都会被以药物迷晕（以使之认为是到了真的天堂）。随后，这些刺客会被告知，

为领袖执行刺杀任务而死，是 “回到”天堂的唯一途径。

当执行刺杀任务者不再珍惜自己的生命，甚至一心求死时，任务的成功率必将大为提升。由此看来，山中老人的立国之术应该并非只是传说。同时，复杂的地形也为木剌夷国的存在提供了有利的基础。13 世纪中叶，从阿拉穆特堡起家的木剌夷派，已经将势力范围从厄尔布尔士山脉向东，延伸至科佩特山脉一带了。在这条山地带中，木剌夷派控制着 300 多个城堡，可用于作战的青壮超过十万。依托这些山堡，整个呼罗珊地区都直接笼罩在这些刺客的恐怖阴影之下。那些往来于中－西亚的商队，成为了木剌夷国的现金奶牛。

蒙古军灭绝木剌夷

尽管沟通中－西亚的丝绸之路，此时已经处于蒙古帝国的保护之下，但自恃有独门绝招的山中老人们，显然并没有把蒙古人放在眼里，除了经常袭掠受蒙古人保护的商队以外，甚至还传出曾派出杀手团前往蒙古刺杀蒙古大汗。很显然，他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到了蒙古帝国的利益。

也许有人会觉得，以蒙古人的强大，怎么可能长期对之无可奈何。其实我们把木剌夷国视作今天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塔利班，蒙古人看成美国人，这一切就很好理解了。以美国的军力和战争潜力，技术上自是可以完全占领阿富汗。而在军事占领之后，辅以蒙古人玉石俱焚的清洗手段，也并非不能把阿富汗境内的极端主义基础连根拔起。问题是，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之下，无论前者和后者（尤其是后者），美国都很难做到。

对于蒙古人来说，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国际环境束缚。能够让木剌夷国逍遥如此长时间的原因，在于帝国的重心一直不在于此，也还没有对整个高原乃至西亚，做好政治规划。蒙古人在两次西征中对西方的心理震慑，让他们能够用以限的兵力在西亚维持宗主的姿态。有很多记录表明，仅仅一小队甚至一两个蒙古骑兵，就足以让一个村镇成百上千的青壮年引颈受戮（这一幕在抗日战场上也发生过）。而一旦遇到木剌夷这种有恃无恐对手，数量有限的蒙古驻军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蒙古西征

公元 1253 年，西征蒙军先锋部队 12000 人（怯的不花部）进入伊朗高原，与驻阿拜拜疆的驻军互相配合，开启了这场中世纪的反恐战争。相比前两次风卷残云般的西征，



阿拉穆特堡遗址

蒙古人这次其实并没有强求以速战来解决木剌夷国。波斯诸国的积极配合，也让蒙古人有了打长期消耗战的资本。由于沿途还担负着建立政治秩序的任务，旭烈兀所率的十余万主力部队，抵达伊朗高原之时，已是公元 1256 年春。在此之前，尽管其先锋部队在征战中消灭了数万木剌夷教派信徒，但还没有动摇这个恐怖国度在伊朗北部的根基。当旭烈兀统帅着总计 15 万蒙古军驻上呼罗珊的土地后，形势开始迅速向有利于蒙军的方向发展。

要想逐个拔除木剌夷教派的山堡，将是一件非常耗时费力的事。不过在战术层面，各方面都占据了优势的旭烈兀军，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兵分三路，在攻取了呼罗珊境内的几个重要据点、打通向西通道之后，将兵锋直指阿特穆拉堡（1256 年 11 月）。感受到蒙古人决心的山中老人，在蒙古军发动总攻之后，很快便做出了投降的决定，并跟随蒙军招降其余未降的城堡。然而这个决定，并没有挽救木剌夷教派的命运。至公元 1257 年 1 月，不管是主动投降还是奋力抵抗的木剌夷教众，都被蒙古大军和仇视他们的波斯人屠杀殆尽。以至于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准确知道这个极端宗教组织的教义，到底是什么面目了。

尽管蒙古人在征战过程中所进行的杀戮，一直为世人所诟病，不过这次对木剌夷教派的灭绝行动，却得到了穆斯林乃至基督教世界的一致称道。也可以说，相比木剌夷教派的“恐怖主义”，“帝国主义”的蒙古人反倒变得更容易接受了。

“帝国主义”的蒙古帝国，之所以比“恐怖主义”的木剌夷教派更容易被接受，是因为它还会有政治原则，懂得以外交手段去获取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木剌夷人的“非对称作战”方式性价比再高，也不可能助其成就一个正常国家的原因所在。我们曾经不止一次说到，任何将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仅仅视为一群武夫或者屠夫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在旭烈兀西征中，这一点再次得到了验证。

第四节 西辽和花剌子模在西亚的复国

复杂的中东局势与西辽异地建国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两个板块概念。包括小亚细亚半岛、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高原，以及新月沃地在内的区域，属于“西亚”的范畴。在地

缘政治划分中，西亚又与中东的范围有着很大的重合。简单点说，把西亚中的高加索板块拿掉，再加入埃及就是所谓的“中东”了。蒙古大汗为旭烈兀定下的远征目标，是最终扩张至尼罗河畔的埃及。从这点来说，蒙古人的野心可以说是征服整个中东。

不管叫西亚也好，中东也罢，这一地区一直都算是这个世界上地缘政治形势最敏感的区域，也是欧、亚两洲势力博弈的核心战场。当一神教在地中海文明圈普及之后，二者之间地缘博弈的外在表现，开始呈现出以宗教战争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眼前。蒙古人对宗教本身并不持固定立场，但如何利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却是蒙古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事实上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此类问题也是欧洲殖民者所一直要面对的。通常情况下，殖民者们在战略层面，喜欢选择与力量偏弱的一方合作，以制约力量强大的一方。比如在完全控制南亚次大陆后，人口总数不到印度总人口 1% 的锡克人，因其与印度教徒、穆斯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强悍的战力，就成为了英印军队 / 警察中最偏爱的族群（包裹红头巾锡克族警察，被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

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后，整个西亚地区几乎尽为穆斯林所有，而基督徒能够保有的主要就是，包括“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在内小亚细亚沿海低地，以及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了。另外，自 11 世纪末开启的基督教圣战（十字军东征），也让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西亚裂谷带，成为了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公元 1229 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列二世所领导的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从萨拉丁所创立的阿尤布王朝手中取回了耶路撒冷，重建了“耶路撒冷王国”。以我们刚才所论证的观点来看，上述处于弱势的基督教王国，倒是很适合与蒙古人结盟。不过在现实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仅用两分法来判断对错是大忌。尤其在中东这种地理、族群、宗教结构异常复杂的区域，考验蒙古人地方要更多。

我们先来看看，在蒙古人准备从伊朗高原下来之前。那场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圣战，进行到了哪一步。说起来，穆斯林世界和阿尤布王朝能够夺回耶路撒冷，还是与蒙古人有关。因为帮助阿尤布王朝攻下圣城的不是别人，正是被蒙古人追歼了二十多年的花剌子模人。当札兰丁在西伊朗重建花剌子模的梦想被蒙古人击碎之后，花剌子模人的残部并没有就此消声灭迹，而是南下叙利亚，试图在混乱的新月沃地再次打拼出一块天地来。其实花剌子人这样想，也是有前例可循的。这些突厥人的前宗主契丹人，就是在东亚被金人灭国之后，在天山南北重建了“辽”帝国（西辽）。在西辽为蒙古所灭之后，契丹人的政治遗产也没有完全消失。残余的契丹贵族在西伊朗东北边缘的“克尔曼”地区，又建立了所谓的“后西辽”政权（起儿漫王朝）。

建立“后西辽”的契丹残余势力，最初臣服于花剌子模。能够在西伊朗谋得一方天地，则得益花剌子模的迅速崩溃。而三起三落的契丹人，能够在夹缝中再次立国成功，得益于两个选择：一是放弃在西亚异类般的佛教信仰，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二是在札兰丁在西伊朗重建花剌子模时识时务的选择倒向蒙古一方，帮助打击花剌子模的残

余势力。这使得公元1224年正式建国的“后西辽”政权，奇迹般的撑到了下个世纪初（公元 1303 年因内乱而亡，由伊尔汗国全面接管）。

花剌子模人帮助埃及夺回耶路撒冷及复国失败

败退至叙利亚的花剌子模人，也想复制“后西辽”的好运。摆在他们面前的机会，就是耶路撒冷。对于阿尤布王朝来说，失去耶路撒冷不仅让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威望受损严重，更让其控制下的叙利亚部分，与埃及部分的联系更加弱化。事实上，这两部分统一在一起的地缘基础本身就偏弱。1958 年，在阿拉伯复兴的大旗之下，埃及同叙利亚曾经有过短暂的合并期，建立了所谓“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合并计划甚至还包括伊拉克。一旦成功的话，相当于将阿拉伯世界最有价值的绿色地带，置于在了同一政权之下。问题在于，即使没有以色列横插其间，要做到这点也是十分困难的。这个承载着阿拉伯复兴梦想的共和国，在 3 年之后便因为叙利亚的退出而宣告解体。

阿尤布王朝之所以急于拿回耶路撒冷，还在于耶路撒冷和它西面的沿海地带，并非是被十字军武力夺取的，而是被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利用阿尤布王朝的内部争斗，通过谈判手段拿到的。这又是一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的烂俗剧情。此时的阿尤布王朝，就如后世昙花一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样，已经大体分裂为了埃及和叙利亚两部分。包括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在内的整条西亚裂谷带，都不在开罗的控制之下。为了应对来自叙利亚的竞争者，在埃及继位的君主将耶路撒冷送给了前来搅局的十字军。

公元 1244 年，在拔都为蒙古帝国征服东欧后不久，花剌子模人也开始帮助埃及的穆斯林（阿尤布王朝）攻夺耶路撒冷。由于耶路撒冷的十字军，实际已经成为埃及、叙利亚两个阿尤布王朝的缓冲区。在十字军被埃及、花剌子模联军攻击之时，感到压力的叙利亚阿尤布王朝向耶路撒冷提供数千骑兵的支援（所以意识形态并不是最重要的）。双方决战的地点则在今天的加沙东北部，史称拉佛比 (La Forbie) 战役。

在花剌子模人的帮助下，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夺取了耶路撒冷（随后又从叙利亚人手中夺取了大马士革）。损失惨重的十字军骑士团们此后也再也无力与穆斯林对战，并逐步丢失了全部的沿海据点，而这也是基督教世界最后一次入主耶路撒冷。为穆斯林世界重夺耶路撒冷的埃及阿尤布王朝，因此获得了巴格哈里发的认定，名正言顺的成为了阿尤布王朝的正统。当然，花剌子模人肯定是不会白出工的。在西亚裂谷带择地建国（以臣服阿尤布王朝为前提），是这些流亡者期待的佣金。

悲剧的是，上位成功的埃及阿尤布王朝却并没有这样的打算。虽然感觉被利用的花剌子模人马上试图调头与叙利亚方面结盟，甚至帮助后者反攻大马士革，但这些凶悍而又危险的突厥人，在西亚已经没有办法取得任何人的信任了。公元 1246 年，在叙利亚霍姆斯，曾经有机会建立庞大帝国，却被蒙古人逼着在西亚流亡了 20 多年的花剌子模人，终于结束了他们的谢幕之战。

现在看来，阿尤布王朝将成为蒙古人完成最后目标的终极对手了。然而事情并没

有那么简单，因为在蒙古的第三任大汗“蒙哥”即将即位，并发出新的西征令之前，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再次发生的重大变化。阻止蒙古西征的终极力量，也随着这次变化而浮出了水面。

第五节 马穆鲁克军人在埃及的上位

马穆鲁克与阉人的区别

借阻止蒙古第三次西征一战成名的，是著名的 “马穆鲁克”（马木留克）。附加在这个标签背后的故事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击败蒙古大军战绩，以及拿破仑的点评：“两个马穆鲁克骑兵绝对能打赢 3 个法国兵；100 个法国兵与 100 个马木穆鲁克兵势均力敌；300 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 300 个马穆鲁克兵，而 1000 个法国兵总能打败 1500 个马穆鲁克兵”。

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已经对马穆鲁克的出现做过解读。简单点说，这是一种源自波斯“古拉姆”制度，经阿拉伯人之手与伊斯兰教育结合起来的，流行于中东各国的军事培养制度。其主要来源是从奴隶贩子手中挑选的非穆斯林民族幼童。自幼经历的严格宗教、军事训练，以及其被切断的宗族联系，使之成为穆斯林君主们最为信赖的一批人。为了确保他们的忠诚，特别是不形成利益集团，这些奴隶军人通常被禁止结婚生子。

抛开古拉姆、马穆鲁克制度的军事色彩，他们的存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东亚古代，经常为帝王所倚重的“太监”（宦官）集团，甚至还流传有马穆鲁克们也是阉人的说法。比如有些看过知名美剧《权力的游戏》的朋友，认为剧情中“无诟者”的原型就是马穆鲁克。其实阉人在中东也是存在的，他们和在东方的同类一样，承担的是对体力的要求相对较小的内庭服务功能。至于被当成军事力量中坚的马穆鲁克，如果用生理致残的方式来保证忠诚，势必会极大损失他们的武力。对他们进行的“手术”工作，其实只是虔诚穆斯林所必须经历的“割礼”罢了。



马穆鲁克骑兵

穆斯林君主并非禁绝他们的生理需求，其实这点也很好理解，深宫中已无生育功能的太

监，尚有和宫女半合法“对食”的情况，又怎么可能真的让生理正常的马穆鲁克禁欲呢？对马穆鲁克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剥夺他们的合法婚、育权，以此来避免形成能够血统、姻亲传承的宗族势力。就这点来说，《权力的游戏》中世代守护绝境长城的“守夜者”形象，倒是更符合马穆鲁克们的处境。

穆鲁克军人在埃及建立马穆鲁克王朝

由于内庭的阉人和外朝的马穆鲁克，都是君主们所经常倚重的对象。无论你在技术上做出何种预防措施，他们当中总会有佼佼者因为这种信任而进入权力中心，甚至觊觎最高权力。唯一不同的是，前者的职业生涯存在“玻璃天花板”。毕竟繁衍子嗣是动物的本能，反映到人类文化中就是“生殖崇拜”。无论是在“家国天下”的中央之国，还是在一神普照的地中海文明圈，阉人都没有被接受为君主的民意基础，能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已是他们事业的顶峰了。相比之下，生理正常的马穆鲁克、古拉姆，则不存在这层障碍。

从波斯属性的“萨曼王朝”中分离出来的“伽色尼王朝”，就是从奴隶军人到君主成功案例。12 世纪末，这个在阿富汗立国 200 余年的王朝为古尔王朝所灭（后者旋即又为花剌子模所灭）。半个多世纪后，埃及的马穆鲁克则再次复制了这一励志过程，而这次被奴隶军人颠覆的，就是刚有中兴之像的阿尤布王朝。公元 1250 年——1254 年之间，埃及的统治权逐步从阿尤布家族手中，过渡到马穆鲁克军人手中。全新的马穆鲁克王朝开始建立。

在这次权力转移中，中世纪唯的一位女性穆斯林国家君主——谢杰莱·杜尔，起到了承上启下关键作用。也可以说，这位女王在这个男权世界不合乎教法的执政（造成内外一片反对之声），使得随后马穆鲁克军人的上位，变得不那么突兀。当然，微观察历史中这种种权力斗争的细节，并非是本文的重心。相比之下，这次权力转移之争的大背景，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第六节 马穆鲁克的崛起与十字军东征的关系

马穆鲁克军人在反抗十字军中得以做大

大多数情况下，军人得势甚至主政，缘自于国家所面临的巨大外患压力。外患压力越大，国家对军事集团就越为倚重，并终至尾大不掉。比如唐之藩镇之祸、清末之北洋崛起，背景都是如此。马穆鲁克的崛起，也与埃及阿尤布王朝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有关。要知道，自萨拉丁帮助伊斯兰世界夺回耶路撒冷后，他所建立的阿尤布王朝便被推向了抵抗十字军的第一线。半个世纪以来，除了威尼斯人假公济私主导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把战火烧到拜占庭以外，第三、第五、第六、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博弈对象都是阿尤布家族及其所统辖的马穆鲁克军人。

尽管萨拉丁所创立的王朝，统治了从叙利亚到埃及的土地，甚至占得了耶路撒冷，

但从安条克到加沙沿海的三个十字军国家，始终是影响阿尤布王朝地缘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中，十字军借埃及、叙利亚之争拿到耶路撒冷就是最好的例证。连绵不断的战事，使得马穆鲁克军人的力量愈发的强大。比如在埃及阿尤布王朝夺回耶路撒冷的战役中，并非只是依靠外援花刺子模人，承担作战主力任务的还是马穆鲁克骑兵。

压垮埃及阿尤布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法国人主导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1254 年）。耶路撒冷的再次失守，强烈刺激了西欧天主教世界的神经，并很快触发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值得关注的是，法国人（路易九世）所领导的这支十字军，并没有选择直接攻取耶路撒冷，而是经塞浦路斯登陆埃及，试图釜底抽薪式的夺取开罗。这一战术的实施并非没有先例，1217 年—1221 年组织无序的第五次东征的十字军（君主们的注意力更多争夺拜占庭遗产上）就这样尝试过。



尼罗河三角洲示意图

十字军当时登陆的地点，是位于开罗东北方向的达米埃塔港（东距苏伊士运河河口的塞得港约 70 公里，西距亚历山大港 200 公里）。不过在拿下尼罗河口达米埃塔后，沿河道进军开罗的十字军，最终还是在对手的阻击下铩羽而归。有了上一次远征的经验，法国人这次也选择了达米埃塔港作为登陆点，并很快再次攻取这个桥头堡。然而他们接下的命运，一如 20 多年前的先驱者一样也没有走到开罗。在尼罗河三角洲中部城市“曼苏拉”，马穆鲁克骑兵击败了来犯的天主教徒，甚至俘获领导这次远征的法王路易九世。

不过在中世纪的战争中，贵族被俘很少会有性命之忧的。在缴纳一大笔赎金之后，这位有“圣路易”之称的模范君主并没有马上回到欧洲，而是前往西亚，试图让在这些地区苦苦挣扎的十字军恢复信心。从结果来看，这项工作还算卓有成效，最起码摇摇欲坠的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以及丢失了圣地的耶路撒冷王国，又坚持了些年头。当然，能做到这点肯定不是因为某位君主的感召了，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十

字军在西亚续命，我们后面讲到。

十字军入侵促使马穆鲁克王朝的建立和壮大

除了对手的内因（比如第五次十字军内部的不和），以及马穆鲁克军人的战场表现以外，埃及阿尤布王朝能够两次度过危机，很大程度也借助了环境之力。比如在前一次攻取达米埃塔时，十字军就曾经差点因旱季水位下降，战船无法靠近城墙而结束远征。而在最后的决战中，熟悉水文状况的穆斯林舰队，不仅能够出其不意出现在对手身后，更是放水让十字军陷入泥泽之中。更为致命的是，两次尼罗河之行，欧洲人都因瘟疫流行而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

法国人之所以敢于攻击埃及，很大程度是因为上次十字军的登陆成功，让他们看到阿尤布王朝已经不再如萨拉丁时代那般强大了。然而让欧洲人始料未及的是，这次远征非但未能更进一步，还直接促使埃及的穆斯林王朝凤凰涅槃，成就了更具活力的“马穆鲁克”王朝。与其它以部族、宗族关系为政治纽带的穆斯林王朝相比，马穆鲁克王朝的军事色彩要更加的浓厚，这无疑使得新王朝在组织上更加的有效率。另外，身处权力阶层的马穆鲁克指挥官们，自然是可以结婚生子，甚至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下一代，但基于控制的需要，约束婚育的马穆鲁克军队结构依然没有变化。而马穆鲁克僭位成权力中心，不仅客观上捅破了这些奴隶军人头上的玻璃天花板，更无形中为整个社会，营造出人才从底层向上流动的大环境。

纵观马穆鲁克王朝 260 多年的历史，其间的权力传承既有血亲继承，亦有更多基于各方实力平衡，而推选出来的君主。理解这种微妙关系，其实可以参考一下清朝终结之后，以“北洋军”为文化图腾的“北洋政府”，以及各路军阀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政治博弈（这一阶段中央之国的军事活力同样被挖掘，人才亦得到更多的展示平台）。至于说依靠马穆鲁克满血复活的埃及，将与正在远征西亚路途之上的蒙古人，发生什么样的碰撞，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七节 蒙古进攻巴格达和叙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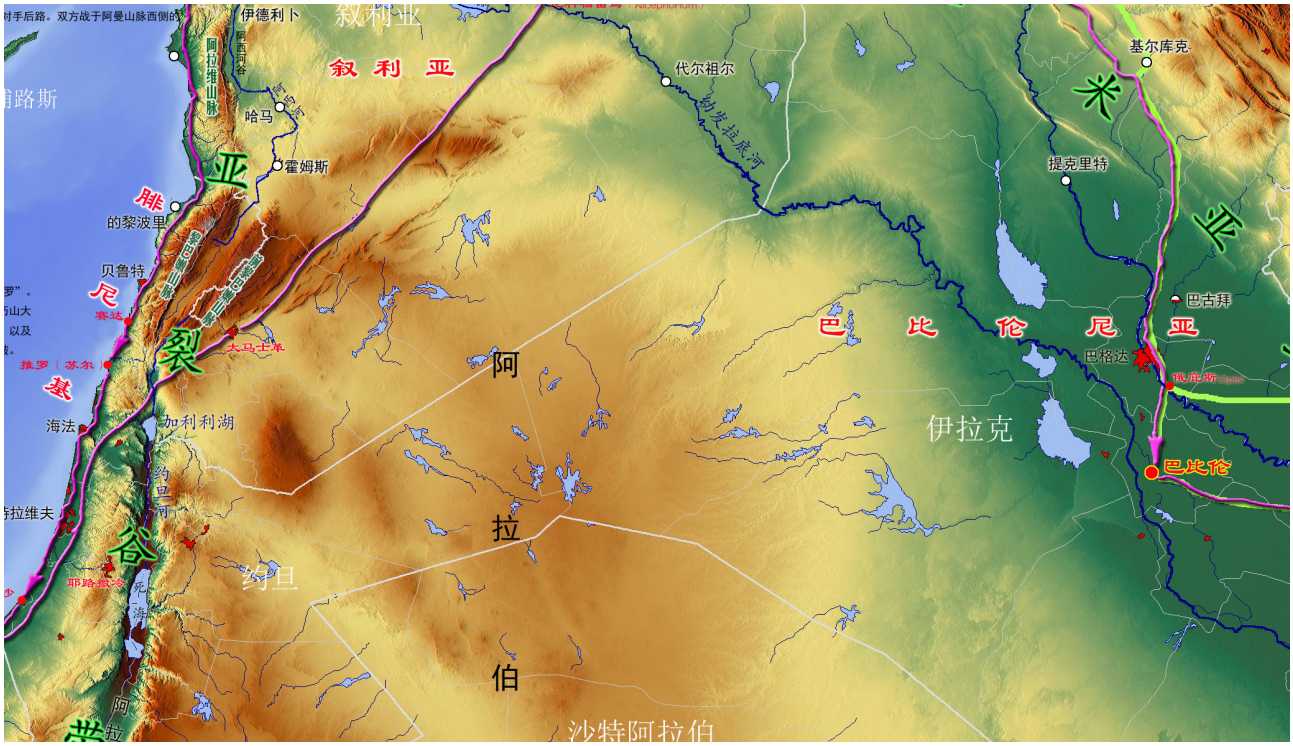
蒙古人攻占巴格达灭亡阿拔斯王朝

在马穆鲁克颠覆埃及阿尤布王朝之后，叙利亚与埃及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也由此变身成为马穆鲁克——阿尤布（叙利亚）两大王朝之间的对角，巴勒斯坦则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在双方最初达成的协议中（1253 年），耶路撒冷及其所处的中央高原，以及海法以南的沿海平原（沙仑平原 + 非利士平原）被认定为了马穆鲁克王朝的领土。自中央高原北部的“以斯德伦谷地”起的区域，则成为了阿尤布家族的保留地。大家尤为要注意的是这片谷地，因为一场影响世界历史的战役，即将在此展开。

很显然，没有任何一方会真的满意这样的切割，谁都会想吃掉对方一统埃及、巴勒斯坦和大叙利亚地区（包括黎巴嫩）。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军政合一的马穆鲁克

王朝将更有可能完成“统一”工作。当然，残留在沿海地带的十字军们，也将一如既往的关注这一切，并依据时局变化选择与哪一方结盟。不过三方都应该已经注意到了，西征的旭烈兀大军，已经开始在伊朗高原的征服工作。这强悍的蒙古人接下来会怎么走，将极大影响西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木剌夷国基本算是蒙古人在伊朗高原上唯一碰到的强烈抵抗者，此后他们在西伊朗的征服更像是一场接收行动。公元 1257 年冬，蒙古人开始向新月沃地进军。正在巴勒斯坦对峙的阿尤布、马穆鲁克王朝暂时还是安全的，因为无论从地理还是政治的角度来看，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拔斯王朝都将是第一目标。巴格达的哈里发并没有因为他神圣的宗教地位，而变得更有抵抗力，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只是在巴格达西北部的底格里斯河畔（提克里克附近）做出一点抵抗的姿态，整个过程可以用望风而降来形容。



巴格达位置图

哈里发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阿拔斯王朝经营了 500 年的巴格达城，以及聚集在城内的 7 万军马了。然而在这种形势之下，坚守一座孤城又有什么意义呢？蒙古人的攻城战仅仅进行到第十天（公元 1258 年 2 月），阿拔斯王朝的第三十六任哈里发，便把自己交给了蒙古人。不过投降并不意味着王朝的覆灭，圣裔家族、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义的捆绑程度，使得哈里发制度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虽然从十世纪起，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就成为各方诸侯的傀儡，但基于其在穆斯林世界崇高的政教地位，入主巴格达的诸多势力，都还是会维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模式。比如同样从欧亚草原而来的“塞尔柱人”。将巴格达、哈里发，与春秋时期的洛邑、周天子相类比，大家应该会更容易理解这层关系。

然而这一次阿拉伯人的想法落空了。因为与那些在入主巴格达之前，就已经完成

伊斯兰化的入侵者不同的是，此时的蒙古人并不是穆斯林。甚至在蒙古崛起之前，这些北亚游牧者对基督教要更为熟悉。比如曾经与成吉思汗在高原上相争的克烈部的王汗、乃蛮部的太阳汗，就都是景教（聂思脱里派）信仰者。这次西征的前锋怯的不花，也是景教教徒。虽然这只是北亚游牧民族对宗教开放态度的一种表现，并不意味着会天然更倾向于基督教世界，但最起码指望他们像以前那些穆斯林王朝一样，愿意把自己置于哈里发之下是很不现实的。最终建立了人类史上最庞大帝国的蒙古人，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借助哈里发来树立在穆斯林世界的威望。随着末代哈里发及其继承者们的被处死，阿拔斯王朝及其所代表的阿拉伯帝国，也彻底走进了历史。

亚美尼亚人配合蒙古人进入叙利亚攻城掠地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蒙古人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在自己的权力之上，再虚设一个“神”的代理人，但却不代表蒙古人无视被征服地区的宗教结构。事实上，以格鲁吉亚王国、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为代表西亚的基督徒，正是旭烈兀西征所倚重的对象。

最主动配合蒙古人行动的，是在奇里乞亚重建的亚美尼亚王国。阿塞拜疆蒙古驻军对罗姆苏丹国的征服，让亚美尼亚人看到了复国的希望。我们知道，亚美尼亚人的世居之地是以塞凡湖、凡湖、乌鲁米耶湖为核心的亚美尼亚高原。在塞尔柱人入主安纳托利亚高原，并建立罗姆苏丹国之前，亚美尼亚王国虽经常臣服于周边帝国，但总体上还是一直能够凭借缓冲之地的特殊地位，维持独立、半独立的地位。而塞尔柱人对小亚细亚的入侵，不仅打破了这一平衡，也让亚美尼亚高原彻底处于穆斯林国家的统治之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是，流亡的亚美尼亚人从战略利益同样受损严重的拜占庭帝国手中，得到了奇里乞亚并最终重建了王国。

基于上述历史，重新恢复亚美尼亚高原的原始政治属性，一直是亚美尼亚人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人，曾经把希望寄托于东征的十字军身上，而后者则投桃报李的帮助前者，脱离拜占庭人控制，并联手对抗穆斯林的压力。然而在十字军的事业明显走向没落之时，并且看到对方为了生存，经常和穆斯林国家合作后，亚美尼亚人已经对这些天主教不再抱什么幻想了。在这种时候，独立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外，甚至成员中还有不少基督教徒的蒙古人的出现，着实让亚美尼亚人有些惊喜。在蒙古人征服罗姆苏丹国后不久，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人（包括国王）就战略性的数次出使蒙古高原，表达了愿意帮助帝国征服西亚的愿望。蒙古人的大汗（蒙哥），也承诺将在帝国范围内保护亚美尼亚人的宗教、经济权力，并帮助他们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失地（前提是臣服于蒙古人）。

公元 1259 年 9 月，蒙古人渡过幼发拉底河，向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发起进攻。在亚美尼亚人的配合之下，征服工作进展十分顺利，阿尤布家族统治下的阿勒坡、大马士革等核心城市，相继为蒙古人所攻占。亚美尼亚人也借机向亚美尼亚高原、叙利亚方向扩张了不少重要据点。然而在上一次西征中发生过的意外，又一次发生了。几乎在旭烈兀开启叙利亚之战的同时，蒙古帝国的第三位大汗蒙哥不幸病逝（1259 年 8

月）。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他是在钓鱼城之战中受伤或者染病而亡的。不管这个说法是否成立，蒙古帝国此时的重心，暂时不再是东、西两线的征服工作，却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认为，窝阔台、蒙哥两位大汗身死之后，拔都和旭烈兀两位西征统帅，很快便返转蒙古高原参与权力之争了，其实并不是这样，两位统帅本身都没有直接竞争汗位的可能，他们所关注的更多是如何巩固西征的胜利果实。当日回到南俄草原静观其变的拔都，最终 从继位的蒙哥汗那里，得到了金帐汗国独立运行的承诺。这次将主力撤出叙利亚的旭烈兀，也同样没有回到蒙古高原，而是则驻军于波斯。在帝国的权力之争尘埃落定之后，旭烈兀得到的回报就是在自己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伊尔汗国”。

随着大马士革的征服，蒙古人的下一个对手——马穆鲁克王朝也浮出了水面。那么蒙古人还有没有可能续写辉煌呢？

第八节 十字军与蒙古人关系的交恶

蒙古人对叙利亚阿尤布王朝的征服，不仅让埃及新生的马穆鲁克王朝压力陡增，更让沿海的三个十字军国家惴惴不安。很多人认为，蒙古人随后的失败，与他们和十字军交恶有关。事实上在蒙古人的既定战略中，十字军和亚美尼亚人一样，都是结盟的对象。然而与试图依靠蒙古人收复失地的亚美尼亚人不同，十字军骑士们并不认为，蒙古人会比穆斯林更值得信任。在蒙古人攻取叙利亚的过程中，甚至有来自黎巴嫩的十字军骑士，主动袭击了蒙古人。这当然极大的触怒了这些征服者，并召来了他们的惩罚（攻陷并洗劫了十字军城市西顿）。

十字军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在西亚 160 年的经历，使得他们早已洞悉了穆斯林世界内部的诸多矛盾，并且善于利用这些矛盾维持自己的存在。相比之下，这些天主教徒对来自遥远东方的蒙古人，则缺乏这方面的了解。二十年前这些游牧者在欧洲的征伐，就已经显露出蒙古人并没有天然跟基督教世界更有亲近感。更为重要的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只有大叙利亚地区和埃及分属两个政权，对十字军国家才是最有利的。

上述担忧可以从圣战开启后，耶路撒冷的数次易手历史中得到验证。公元 1199 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能够成功夺取耶路撒冷，是受益于埃及的“绿衣大食”（法蒂玛王朝）与架空“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塞尔柱王朝之争。后者在十字军启程之前陷入的内部分裂，不仅让耶路撒冷再次易手给法蒂玛王朝（公元 1198 年），更让十字军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的行动变得异常的顺利。

88 年后（公元 1187 年），统一埃及、叙利亚，建立阿尤布王朝的萨拉丁，代表穆斯林世界夺回了耶路撒冷。而在阿尤布王朝陷入叙利亚、埃及两支相争的内乱时，德国人（腓特烈二世）又借机兵不血刃的拿到了耶路撒冷（公元 1229 年）。尽管十几年后，埃及阿尤布王朝在马穆鲁克和花剌子模人的帮助下，再次夺取耶路撒冷，马

穆鲁克甚至还僭越成为埃及之主，但十字军们已经非常清楚，唯有居间维持埃及和叙利亚的分裂局面，他们才有可能重返圣地。任何一个强大的足以统一两地的力量，都将威胁到这一目标。为此，骑士们才会在阿尤布王朝行将就木之时，出手帮助曾经的对手。

尽管与十字军的交恶，为蒙古帝国的西亚征战埋下了隐忧，但就蒙古人本身来说，并不认为这是个大问题。数十年来纵横欧亚的胜绩，让世人都产生了蒙古人不可战胜的心理。就这次西征来说，抵抗者基本都只能据城负隅顽抗，而少有人敢于正面与蒙古军进行野战。这也使得战场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蒙古人手中。在旭烈兀率主力回师波斯之时，甚至自负到只为叙利亚战场留下了两个万人队扩大战果（怯的不花统军）。配合这支蒙古军队行动的，也只是两千亚美尼亚重骑兵，以及数千归降的阿尤布王朝军队。

第九节 马穆鲁克骑兵与蒙古骑兵的对决

马穆鲁克骑兵进入西亚裂谷阻击蒙古人

并不确定旭烈兀有没有给留在叙利亚的蒙古驻军，下达向埃及进军的命令。不过正在势头上的怯的不花，的确开始南下向巴勒斯坦方向进军。从个人角度来说，基于其基督徒的身份，在离耶路撒冷如此之近，希望乘胜一举拿下耶路撒冷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的确是一个既定的战略决定，那么将第一阶段的战事终点设定在耶路撒冷，也能够为下一步主力远征埃及打下良好的基础。做到这点，最起码有机会让周边的十字军骑士们，投鼠忌器的保持中立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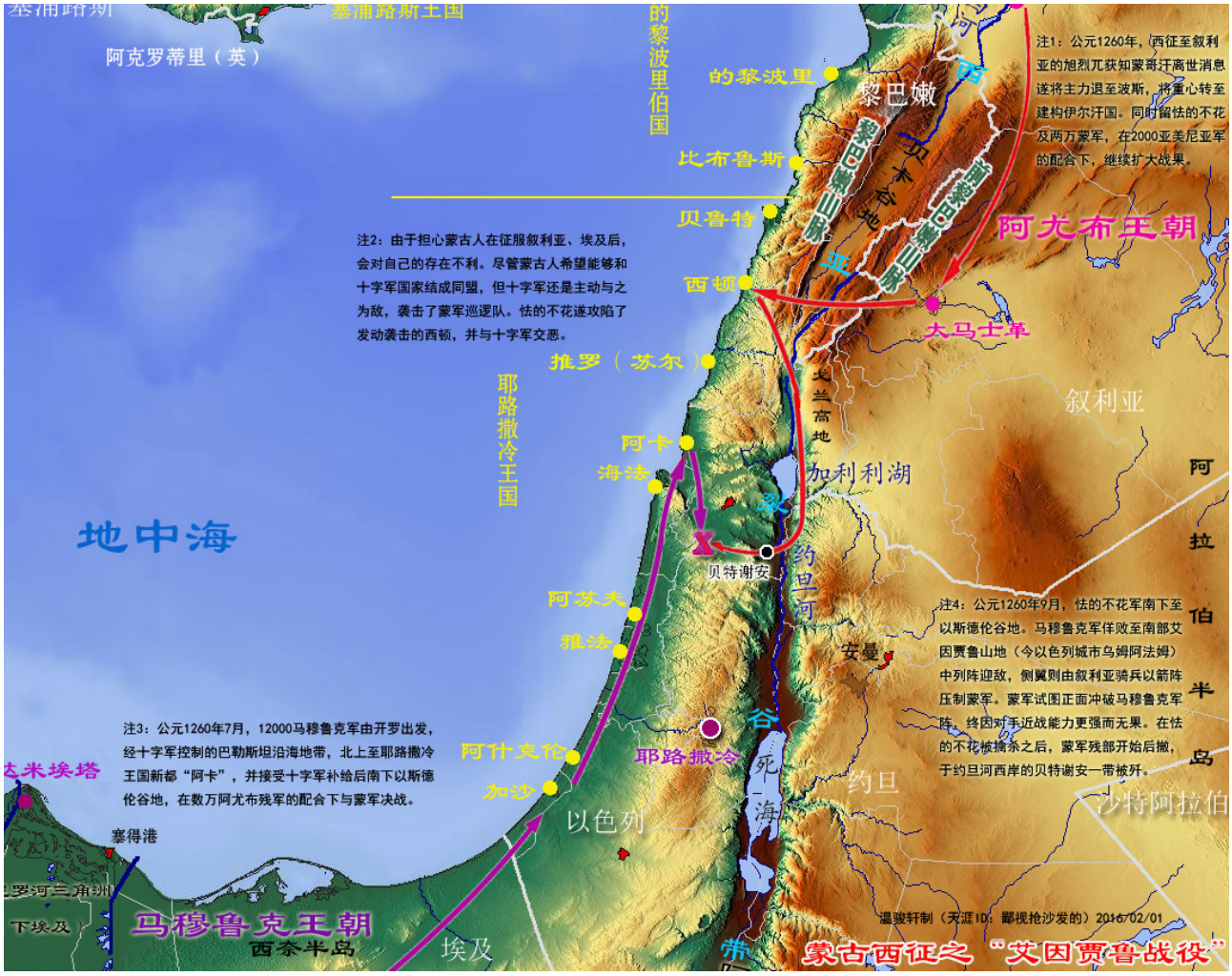
不过将战火从叙利亚烧到巴勒斯坦，势必会将刚刚崛起的马穆鲁克王朝卷进来。这些不再为阿尤布王朝打工，而是开始为自己而战的奴隶军人，出人意料的选择了正面阻击的战术。为了快速北上，从埃及出发的 1.2 万（也有认为是 2 万的）马穆鲁克骑兵在穿越西奈半岛后，直接从十字军控制的加沙地区（非利士平原）借道，穿特拉维夫以北的沙仑平原进入巴勒斯坦北部。显然，在蒙古人的压力之下，盘据巴勒斯坦沿海低地的十字军，已经与马穆鲁克结成了事实的同盟（甚至还为对方提供补给）。



迎南之地地理结构图

与此同时，从大马士革出发的蒙古军，向西南方向经由戈兰高地、加利利湖区，进入约旦河西岸、中央高原之北的平原地区——“以斯德伦谷地”（Esdraelon

Valley)，并与前进至此的马穆鲁克骑兵遭遇。这片平原也被称之为耶斯列谷（Jezreel Valley），是位于加利利山脉与中央高原（耶路撒冷位于高原中心）之间的，非常重要的一片山间低地，数条从两侧高地流淌而下的河流，在谷中相错并最终注入约旦河。在圣经时代，就已经有许多故事发生于这片富庶的土地上了。



艾因贾鲁特战役示意图

其实如果再寻找渊源的话，以斯德伦和耶斯列在圣经中代表的是整个谷地中的不同部分。只不过，除非你非常喜欢圣经时代的“历史”，否则有一个标签代表整片低地就足够了。根据西方记录，这场战役一般被称之为“艾因贾鲁特战役”（或译阿音扎鲁特战役）。如果你用 Ein Jalut 在谷歌地图上定位，可以在山谷中找到一座叫做乌姆阿法姆的城市，城市北边那一大片平原，就是以斯德伦谷地。此时聚拢在马穆鲁克骑兵身边的，还有大量从叙利亚方向败退下来的，原属阿尤部王朝的阿拉伯、突厥骑兵。至于说这支反蒙联军的总数到底有多少，一直不是很明确，从两万到十几万的说法都有。有一点倒是很明确的，两军阵中那些辅从者的人数并不重要，蒙古骑兵和马穆鲁克骑兵之间的对决，才是胜负的关键。

纯粹对比骑兵的战力，双方应该是各有千秋。蒙古人的特点我们会比较熟悉，这些因恶劣生存环境而自幼谙习弓马的游牧者，是天生的战士。远程机动能力，以及在

东方养成的战术纪律，是他们比之西方军队的显著优势；而马穆鲁克骑兵也同样是自幼接受骑术、格斗、弓箭等军事技能训练的军人。在阿尤布王朝晚期，马穆鲁克骑兵的训练已经有了一套严格的标准化教程。全副武装的马穆鲁克骑兵，不仅有不逊于蒙古人的箭法（包括骑射），精于重骑兵式的马上对抗（马穆鲁克骑兵所骑乘的阿拉伯马，在冲刺和负重上更有优势），甚至还能够下马变身成为重步兵战斗。如果双方都不畏战的话，那么成败更多取决于战术方面，谁更能扬长避短了。

马穆鲁克骑兵依托地形优势战胜蒙古人

在蒙古人之前的征战中，我们曾经多次看到，蒙古人使用大范围迂回或者诱敌深入之策，先以骑射之术冲散对手阵线，再追歼欧洲重骑兵的案例。很显然，以蒙古人的战术特点来说，宽阔的以斯德伦平原应该是最合适的战场。然而马穆鲁克也知道，在宽阔的平原区与蒙古军野战并非自己的长处，因此在与对手稍做接触后，他们便开始向平原南部的山地，也就是乌姆阿法姆方向后撤。

蒙古人并非不知道，在一片不熟悉的山谷中作战，将存在一定风险。只是在蒙古人眼中，眼前的这些山地相比波斯高原，特别是木剌夷国所依附的那些山地，实在算不了什么。既然一路从波斯高原到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走来，对手都望风而降（逃），未敢与之野战，蒙古人自然也有理由相信，面前马穆鲁克骑兵即使真想抵抗，也不过是退入城堡死守罢了。



马穆鲁克骑兵和蒙古骑兵的战斗

然而这一次蒙古人却完全低估了对手的战力和决心，在尾随马穆鲁克骑兵进入山地之后，马穆鲁克骑兵很快止住了脚步，并依托两侧山地，展开了决战阵型。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防止蒙古人利用他们的机动优势从两侧迂回。在 1700 多年前，希腊重步兵对抗波斯大军的“马拉松战役”中，希腊人也曾经运用过类似的战术。只不过当时在希腊人阵线两端，为其侧翼提供保护的不是山地，而是马拉松平原上的沼泽地罢了。

对于突入山地的蒙古人来说，压力并不仅仅来自于正面。那些配合马穆鲁克骑兵

作战的叙利亚骑兵，虽然没有胆量和蒙古人正面对决，但让他们埋伏在两侧山地中，用密集的弓箭压制蒙古人却是可以的。当然，他们愿意这样做的前提，是正面的马穆鲁克骑兵能够顶住。一旦蒙古人突破了正面防线，相信这些阿尤布王朝的败兵，会跑得比谁都快。事实上，那部分跟随蒙古人作战的叙利亚人，在看到风向不对时，就已经早早的溜走了。

现在，处于三面包围状态的蒙古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且战且退，原路退出山地，虽然会有一定损失，但却不至于全军覆没。事实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也一直是游牧民族所惯常采用的战术；二是正面强突，攻破马穆鲁克人的防线。选择这样做的话，无论哪方胜利都将是一场惨胜。最终蒙古人的荣誉感，让他们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凭借优势的机动能力以及严格的战术纪律，在遭受重大伤亡后，不少蒙古骑兵还是冲到了马穆鲁克阵前。这种亡命冲锋，也让马穆鲁克的阵线一度濒临崩溃。不过在稳住阵脚之后，奴隶骑兵们在近战中的优势开始发挥作用，胜利的天平开始倒向马穆鲁克一方。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马穆鲁克骑兵在近战中所使用的武器，也让其如虎添翼。除了享誉世界的大马士革钢刀以外，马穆鲁克骑兵甚至还使用了“火器”。当然，这里说的火器并非是蒙古人曾经用来恐吓欧洲人的黑火药武器，而是穆斯林从拜占庭那里“学习”来的“希腊火”。在“艾因贾鲁特战役”中，希腊火的使用无疑让蒙古人和他们的战马受到了一定惊吓。后来在马穆鲁克王朝的技术改进之下，希腊火配方和发射方式也逐渐多元化（包括类似中国式火箭的发射方式）。值得玩味的是，“火器”威慑也好、诱敌深入之策也罢，曾经都是蒙古军队的拿手好戏，在这场战役中，却被对手所熟练运用。

最终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战役中，两万蒙古铁骑几乎被全歼。虽然这些战士致死没有辱没成吉思汗军队的荣誉，但西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就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切开始朝着有利于马穆鲁克王朝的方向发展。

第二十五章 伊尔汗国的建立及与周边的关系

第一节 旭烈兀建立伊尔汗国

艾因贾鲁特战役的意义

很多人认为，是艾因贾鲁特战役阻止了蒙古人的西进。然而此时的蒙古帝国，还正处在巅峰期，他们真的会因为一场战役的失败，就放弃征服埃及的计划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历史上的那些所谓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战役，往往是根据若干年后的政治走势来重新确定它的价值的。要知道，纯粹从蒙古人的损失来看，当年札兰丁在喀布尔之北歼灭蒙古先锋部队的“八鲁湾之战”，并不比艾因贾鲁特战役逊色。如果花剌子模能够在西伊朗复国成功，并把蒙古人阻挡在中亚的话，那么八鲁湾之战肯定也能彪炳千秋了。

虽然八鲁湾之战的胜利，未能在战略上阻止蒙古人对伊斯兰世界的入侵，但也还是为花剌子模日后的复国尝试赢得了口碑（否则也没有可能在西伊朗做大）。现在马穆鲁克的胜利，也使得这支出身低微的新生政治力量，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毕竟在横扫欧亚的蒙古人面前，穆斯林世界太需要一个能服众的资源整合者了。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马穆鲁克僭越之后，许多忠于阿尤布王朝的穆斯林逃往叙利亚，并希望看到伊斯兰世界曾经的守护者——萨拉丁的族人收复埃及。艾因贾鲁特战役之后，人力和资源则开始向伊斯兰世界的新守护者汇流了。

这次胜利的另一层意义，就是打破了蒙古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让穆斯林世界在心理上重拾信心。当然，胜败也是兵家常事，蒙古人只要及时用一场大胜来补救，也还是能再次把穆斯林的信心打入谷底的。就像在八鲁湾之战失利后，成吉思汗马上亲率主力，在印度河之战中擦去这个污点一样，如今身处波斯高原的旭烈兀也希望能用一场胜利，来教训这支敢于挑战蒙古大军威严的穆斯林力量。然而今时不同往日的是，看似如日中天的蒙古帝国，内部已经显示出分裂的迹象，并对帝国在西线的扩张造成了致命影响。

旭烈兀支持忽必烈争汗位获封建立伊尔汗国

在蒙哥死后，他的两位兄弟：驻军蒙古高原旧都哈拉和林的阿里不哥，以及身处中原的忽必列（蒙哥、旭烈兀、忽必烈、阿里不哥皆为拖雷之子）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争夺战。问题在于，这场中止旭烈兀西征的汗位之争，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一场帝国战略方向之争。前者代表的是传统游牧势力，后者则是“汉化”或者说建立中原式王朝的推进者。最终的结局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忽必烈和他所代表的势力取得了胜利（公元 1264 年）。公元 1271 年，蒙古帝国的都城从蒙古高原的哈拉和林，迁往华北平原的大都（北京），不仅标志着元朝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心向东

亚的蒙古本部，开始失去对“西方”那些汗国的控制力。

正是凭借在汗位争夺战中对忽必烈的支持，伊尔汗国获得了合法的出生证。当然，即使站队错误，已经在西亚打出自己天地的旭烈兀也一样可以拥兵自重，前提是他不要贸然回师搅进去。事实上，新生的伊尔汗国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只是独立的代价，就是此后伊尔汗国在西亚的扩张，所能依仗的资源就只能是自己所征服的土地了。虽然这一影响是战略层面的，当下以旭烈兀手上所掌握的兵力来说，应该还可以远征埃及，但所谓祸起萧墙，新生的伊尔汗国很快发现，此时真正对自己的构成威胁的，并不是南方的马穆鲁克，而是西北方的金帐汗国。

第二节 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

金帐汗国开启伊斯兰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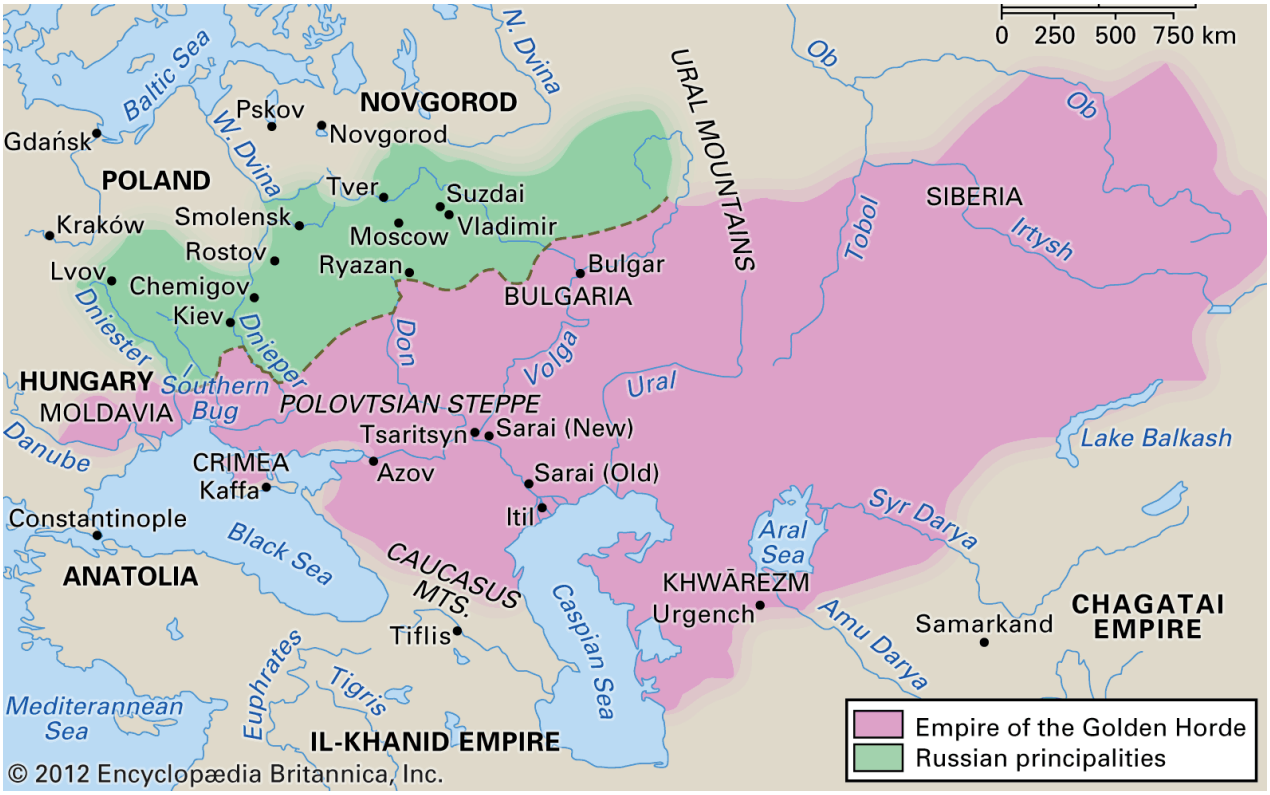
在所谓的蒙古四大汗国当中，最先独立发展的是拔都西征时建立的“金账汗国”。当旭烈兀率军从波斯高原向巴格达进军时（公元 1257 年），已经立国 15 年的金帐汗国正在经历一场权力交接。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年金账汗国推出的新任大汗——别儿哥（拔都之弟）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由此也开启了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进程。

诚如我们一直所说的，蒙古人对于宗教本身的态度是宽容的，这种宽容也使得蒙古人并不执着于一种信仰，也容易被所在地宗教所影响。在蒙古人入主欧洲草原之前，大多数生活在此地的钦察人还并未接受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信仰（与蒙古人一样是原始萨满教的信仰者）。不过以一神教的渗透力和传播欲望来说，这片原始宗教之地被攻陷只是个时间问题。就金账汗国所处的位置来看，似乎基督教传播会更占优势。事实上拔都死后指定的第一继承人（他的另一个弟弟撒里答）就是一位基督徒。不过这位继承者在前往继承的路上就神秘离世，而他年龄尚幼的继承者在上位一年之后也同样离世。最终真正继承拔都之位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别儿哥了。

权力之争中是否有阴谋，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更让人感兴趣的是金账汗国由此开启的伊斯兰化进程，以及这背后支持这一进程的地缘因素。应该说从技术角度来说，伊斯兰教在游牧者中的传播要更据优势。被罗马帝国浸润过，充斥着各种繁琐的仪式和等级制度的基督教，更容易为定居文明所接受。而出身游牧文化环境的穆罕默德，所面临的受众则完全不同。为了适应阿拉伯人居无定所的迁徙生活，也为了更有效的凝聚这些生性自由的游牧者（难度更大），伊斯兰教的教义被设计的更加有控制力（比如有更多的禁忌性规定），但在宗教仪式上却要简练的多。这也使得伊斯兰教在向其它游牧之地传播时，要更具优势。

在金帐汗国的领地里，有两个已经接受伊斯兰教的群体，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们是：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人，以及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人。一方面相比以罗斯人为代表的欧洲人，蒙古人对同样源出亚洲游牧文化的花剌子模人、

保加尔人，会更有信任感和亲近感，他们的选择也因此更容易对蒙古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那些在保加尔人、花剌子模人中传教的伊斯兰宗教团体，也很容易在蒙古人中复制他们的成功经验。如果说在汗位之争中，有汗国内的穆斯林力量做推手也是很自然的。



金帐汗国地图

需要说明的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上位，并不代表金账汗国就此伊斯兰化了。总的来说，此时的金帐汗国的宗教政策还是宽容的，整个草原的伊斯兰化是个渐进过程。金帐汗国地缘属性的真正变化是在半个多世纪后，金帐汗国的第九代大汗“月别哲汗”上位后（公元 1312 年）。经过将近一甲子的渗透，蒙古人的金帐汗国不仅完全接受了伊斯兰教义（政治上开始禁止其它宗教），同时在种族上亦被优势的突厥人口所同化。这种游牧出身 + 突厥语言 + 伊斯兰教属性的族群，也就是欧洲人眼中典型的“鞑靼人”了。

金帐汗国伊兰化后对伊尔汗国的敌对关系

虽然 13 世纪中叶的金帐汗国，还不能说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伊斯兰教在金字塔顶层的布局成功，对西亚及至欧洲的地缘政治结构的影响力，却已经开始显现了。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开始倾向伊斯兰教的金帐汗国，与从基督教世界借力，统治西亚的伊尔汗国反目成仇了。

金帐汗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了他对伊尔汗国态度。二者之间的矛盾，因旭烈兀在巴格达处死哈里发，而开始浮出水面。抛开与金帐汗国关系恶化不说，单从蒙古对西亚征服的角度来看，这种的做法也有些轻率。虽然旭烈兀非穆斯林的身

份，使得“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很难用在西亚，但把这张牌留着最起码也没有什么坏处（马穆鲁克王朝很快就扶植了源自阿拔斯家族的哈里发）。另外，处死哈里发的决定，一定程度也是为了示好基督教世界。不过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天主教世界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更加现实。

从大历史角度看，本身没有强大意识形态支撑的伊尔汗国，最终伊斯兰化是不可避免的。在其还没有这种想法之前，率先迈出这一步的金帐汗国，则一度燃起了入主西亚的想法。为此，金帐汗国的穆斯林大汗，甚至和埃及的马穆鲁克结盟（后者甚至愿意视之为宗主）。公元 1261 年起，两个蒙古汗国在内高加索地区爆发了战争，双方的敌对军事行动，一直持续了六年之久（直至 1267 年，金帐汗国别儿哥汗离世止）。就地缘政治层面来说，金帐汗国对这场战争的希望，是最起码获得阿塞拜疆的统治权。而那些阿塞拜疆的突厥人，看起来也更愿意接受一个穆斯林君主的统治。

如果金帐汗国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上的突厥人和波斯人会容易倒向金帐汗国，更有可能会影响到伊尔汗国的存在。很显然，伊尔汗国的蒙古人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相比之下，让信奉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人归入金帐汗国的势力范围反倒对汗国的安全没有什么影响。此时，远在东方的帝国中央（忽必烈），对于金帐汗国的同室操戈之举，显然也是非常不赞同的。这不仅将影响到帝国在西方的平衡，更会对蒙古人声誉造成成影响。因此，在进行了一系列规模不大的战争之后，随着钦察草原的汗位再次更迭，金帐汗国还是暂时放弃了对阿塞拜疆的想法。尽管如此，金帐汗国开启的伊斯兰化进程，还是对西亚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的深远的影响。比如受制于此，将都城设在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的伊尔汗国，就难以进一步扩张在小亚细亚的统治。

第三节 马穆鲁克王朝和伊尔汗国的博弈

马穆鲁克终结十字军在西亚的存在

从钦察草原的转变中直接获益的，还有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虽然金帐汗国后来战略性的放弃了南进计划，但却维持了与马穆鲁克王朝的盟友关系。这无疑对伊尔汗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当然，外部环境的利好，并不意味着马穆鲁克就一定能够成功。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马穆鲁克们要想成为伊斯兰世界救星，还需要在战场上证明，艾因贾鲁特战役的胜利并非只是被真主庇佑。由于蒙古驻叙利亚军的全军覆没，伊尔汗国又与金帐汗国处在战争状态。乘胜北上叙利亚的马穆鲁克，并没有受到太大阻碍。这也使得马穆鲁克有精力开始处理十字军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对于一直希望在叙利亚和埃及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十字军国家来说，之前蒙古人试图由北向南统一埃及，固然不是件好事；但现在马穆鲁克反攻叙利亚，也同样能够让十字军们遭遇灭顶之灾。在马穆鲁克俨然已经成为了伊斯兰世界希望所在的情况下，

乘势把十字军彻底赶出西亚，可以更加夯实王朝的基石。除此之外，马穆鲁克之所以一定要消灭十字军国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他们成为伊尔汗国的盟友。在失去叙利亚后，蒙古人曾经多次派遣使者前往罗马教庭，以及法兰西、英格兰等国，甚至与拜占庭帝国联姻。为了生存，曾经与蒙古人为敌的十字军骑士国也试图从伊尔汗国那里接受保护。

虽然伊尔汗国“连横”基督教世界，是战略对抗金帐汗国－马穆鲁克王朝“合纵”之举的正确选择，但此时的西欧世界，已经不再对收复圣地抱有任何希望了。最先成为牺牲品，被从地图上抹去的是“安条克公国”（1268 年）。两年之后，曾经组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的法王路易九世，又组织了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东征，不过目标既不是帮助安条克复国也不是收复圣地，而是与法兰西隔地中海相望的突尼斯（仍以失败而告终）。从地缘关系上来看，马格里布地区的确是法兰西对外扩张的首选。在大航海开启后的殖民时代，突尼斯所处的西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也成为了法国对外扩张的重心。只是法国人的务实之举，无疑也宣布了东方的十字军国家彻底成为了弃子。公元 1291 年，随着最后一个十字军据点——耶路撒冷王国首都“阿克”的陷落，十字军在西亚的事业终于成为了历史。

伊尔汗国与马穆鲁克对叙利亚的争夺

尽管伊尔汗国一直想从基督教世界借力，完成他们的征服事业，但真正有意愿又有可能与伊尔汗国共同应对马穆鲁克的，就只有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王国了。为了断蒙古“右臂”，入主叙利亚的马穆鲁克试图以武力逼迫亚美尼亚人放弃与蒙古人的结盟关系。在 13 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间，马穆鲁克军队多次入侵亚美尼亚，并对后者造成了巨大伤害。

应该说，相比其它基督教国家，抱着回归故地目的的亚美尼亚人，算是最坚定的“反伊”国家了。然而能够为基督教世界，在东方保留最后一丝存在的希望，却还是只能寄托在伊尔汗国的蒙古人身上。需要说明的是，金帐汗国并非是伊尔汗国在北方遇到的唯一挑战。陷入分裂状态的蒙古帝国，内部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在与金帐汗国的冲突告一段落之后，伊尔汗国又与其东北方向的“察哈台汗国”发生战争。这使得伊尔汗国再次大举入侵叙利亚的行动，已经是在怯里不花身死十年之后了。

出于将蒙古征服史视为中央之国历史（并以此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缘故，很多人更愿意相信怯的不花的那次失败是出于偶然。然而实际上，职业军人属性的马穆鲁克骑兵，的确在战力方面压倒了蒙古骑兵。从公元 1271 年起，至公元 1302 年的三十年间，伊尔汗国的大军曾经数次大规模入侵叙利亚，并在阿西河谷的霍姆斯以及今天土耳其的东南安纳托利亚等地，以优势兵力与马穆鲁克军队对战，却鲜有胜迹。在战场上的损失，也要大于马穆鲁克骑兵。

不过这支在战术水平上优于蒙古人，并且更有群众基础的穆斯林军事力量，也并没有能够反过来入主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由于培养出一名合格的埃及马穆鲁克骑兵，



伊尔汗国地图

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以及很高的经济投入。这使得马穆鲁克骑兵数量，一般至多只能维持 2-3 万的规模。这种技术属性，很有点像今天特种兵的特色，更是与欧洲中世纪的那些重装骑士很有些类似，受限于规模以及后勤保障，马穆鲁克骑兵和欧洲骑士的存在需要以“城市”为依托，并且作战时间有限。相比之下，游牧骑兵的能够适应的环境，以及扩展空间就要大的多了。

伊尔汗国的伊斯兰化

在罗马帝国时代，帝国曾经长期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划分其与波斯、阿拉伯帝国领土边界。马穆鲁克王朝与伊尔汗国的分界线，大体也是如此。为了打破这种平衡，更为了内部统治的稳定。公元 1295 年，伊尔汗国新上位的合赞汗终于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汗国内的蒙古人集体归信伊斯兰教。在此之前，汗国内力图维持旧信仰，并要求与基督教结盟的力量，一直与认可伊斯兰教的势力争论不休。十字军的完全退出（阿卡的陷落）可以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伊尔汗国的的蒙古人成为穆斯林固然是一件幸事，但却不代表马穆鲁克王朝与伊尔汗国之争就此结束了。毕竟意识形态的选择，终究还是服务于地缘政治。在取信汗国内部的穆斯林之后，伊尔汗国再次发动了对叙利亚的入侵，并且一度迫使马穆鲁克主动退出叙利亚，但最终还是为马穆鲁克所击败，回到了幼发拉底河左岸（公元 1303 年）。事实上，此时改宗的伊尔汗国，已经没有办法因此在伊斯兰教获得更多的群众基础了。马穆鲁克数十年来抵抗蒙古入侵的辉煌历史，使之“伊斯兰教悍卫者”的地位牢不可破，更何况当年蒙古人，还曾经不那么先知先觉的处理掉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将“哈里发”这面金字招牌“让”给了马穆鲁克。

其实蒙古人并非不知道马穆鲁克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优势所在。既然没有可能竞争伊斯兰教宗主之位，那么在波斯更有群众基础，当年曾经助阿拔斯王朝上位的什叶派教义，则再次有了利用价值，成为了蒙古人在伊斯兰世界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法宝。只不过人数有限的蒙古人，终究还是很快被土著族群所融合，最终以什叶派立身于现在中东地缘政治舞台的，还是这片高原的土著波斯人。

对于伊尔汗国的伊斯兰化最伤心的，应该就是亚美尼亚人了。公元 1323 年，马穆鲁克王朝与伊尔汗国正式签定和约，结束了战争状态。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很快都会发现。他们已然不是中东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了，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第四节 蒙古帝国的分裂

四大汗国的产生

曾经囊获所有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并且控制整个欧亚大陆东边缘地区（中央之国）的蒙古帝国，是欧亚大陆历史上版图面积最大的帝国了。由于这个帝国在 13 世纪中期（忽必烈执政时期）将政治中心迁往了华北平原，并为适应新地缘环境呈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化倾向，所以蒙古帝国曾经的政治成就，也“顺其自然”的成为了很多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历史遗产了。

鉴于蒙古人在打通欧亚大陆诸边缘文明交流通路上所做的“贡献”，以及族群与中央之国更为紧密的地缘关系，我们也花了不少笔墨在这些征服者身上。不过在将视线转向另一个源自亚洲草原，却又与欧洲地缘关系更为紧密的帝国——奥斯曼帝国身上时，还是很有必要对蒙古帝国的结构做一个整体解读的。这样做最起码有助于帮助大家了解，到底从什么时候起，生活在东亚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时，不再对西方的世界产生影响了。

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中，四大汗国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这四个汗国分别是：金帐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以及伊尔汗国。那么这些汗国到底属不属于我们所认知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呢？又或者说他们与远在东亚的中央政权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事实上，类似问题在大家阅读诸多帝国历史时都会碰到。按照我们在中央之国所形成的中央集权观念，这些所谓的帝国似乎很少有合格的。

任何王朝、家族要想延续下去，都会遇到一个继承的问题。因继承而起的纷争，也往往是造成帝国衰弱、分裂的主因。通常情况下继承模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一脉相承“集权”模式。赢家通吃，将遗产、权力的主导权集于一人；另一种则是人人有份的“封建”模式。裂土封王，各自建国。前者的典范就是自秦开始，在中原王朝开启的中央帝国模式了；而在查理曼死后一分为三的法兰克帝国，则属于后者。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范围的划分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为了缓和内部矛盾或者尽可能避免分裂。集权体系之下也会容忍一些独立性很大的政治体存在；封建体系中，也会有一个置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称号，以继承、推选等方式在各支中流传。

成吉思汗封建其儿子的领地

可以肯定的是，成吉思汗自己并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中原王朝式的帝国。在继承权的操作上，更多是依照其游牧属性、遵循习惯法来设计的，更符合“封建”的理念。

在蒙古人当时的传统中，继承法并非是如大多数民族所惯用的“长子继承制”，而是“幼子继承制”，即由最小的儿子继承家庭的大部分财产。所谓“幼子继承制”本身，也是基于环境所做出来的自然选择，主要流行于文明层级较低的族群中。其产生技术背景是：当一个族群生存环境恶劣时，年长的儿子一般在成年之后就须自谋生路。能留在家中与父母相处的，很自然是最后一个儿子。同时由于年长者在分家之时，已经带走了部分家庭财产，最后留下的遗产由幼子继承更显公平。

后来当蒙古人站上权力之巅后，为适应艰苦环境而产生的幼子继承制，大多也逐渐被长子继承制所取代了。解读蒙古人在继承问题上的习惯法，有助于我们了解四大汗国的产生背景。不过我们却并不能将所谓蒙古四大汗国，简单的与成吉思汗的四个嫡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相对应。因为这四大汗国以及蒙古帝国后来的地缘政治格局，并非完全遵循成吉思汗的设计。在成吉思汗的预想中，从七河草原到河中之地、塔里木盆地的西辽故地，是二子察合台的家业；花剌子模本部所处的阿姆河三角洲，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阿尔泰山－巴尔喀什湖以西的“西干草原”（包括南俄草原和哈萨克丘陵）为长子术赤的领地。成吉思汗亲自参与的第一次西征，即可被视为帮助最年长的二个嫡子立业。

至于最小的儿子拖雷，则依“幼子守家”的原则，本应获得了蒙古高原本部的控制权。这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三子窝阔台的地位。因为依照后来所谓“窝阔台汗国”的范围来看，其后代所得到的仅仅是阿尔泰山之南，以额尔齐斯河至阿拉湖一带的地区。阿尔泰山之南，“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及其周边地区，向为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向中亚渗透的跳板。在蒙古崛起之时，它在高原的主要对手“乃蛮人”，领地就由高原西部的大湖盆地区延伸至此。当年匈奴人与乌孙人在中亚的争夺，也是围绕着这片山地。

问题在于，对比其它三子在中亚、北亚、欧洲所获得的大片领地，窝阔台所分得的家产，实在与其地位不相匹配。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位成吉思汗的继任者，在成吉思汗还在世时就已经被确认为了“大蒙古国”大汗继任者，而他和他的子孙所获得的最重要土地，就是长城以南广袤的中央之国核心区。

第五节 窝阔台和拖雷在中原及漠北的封地

中原与漠北地缘矛盾使拖雷无法经略自己的封地

理解蒙古高原诸汗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可以参考一下西周王朝的封建结构。封建体系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每个封国本身都是独立运营。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为了保持封国们的影响力，须将最有经济、战争潜力的土地归于自身。周王室的这块根基之地，就是关中平原。不过周王室将直属之地限于关中也会有一个短板，那就是与周朝征服的广大关东地区，尤其是重要的中原之地脱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接入中原的

洛阳盆地同时成为了周王室的直属领地。后来进入中央帝国时期，汉、唐等王朝分别在长安、洛阳分设两京的做法，亦皆源于此地缘政治设计。

基于东亚的富庶，以及蒙古高原游牧区与东亚农业区的垂直相邻关系，1000 多年来，做大之后的北亚游牧政权莫不以入主中原为目标，蒙古人也不例外。参照周王朝的案例，将富庶的长城以南地区看成 “关中平原”；位于三大汗国领地相接之处的阿尔泰山南麓、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视为洛阳盆地，相信就很容易理解上述关系了。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设计之下，漠南地区（相当于除呼伦贝尔以外的内蒙古）也需要归为大汗直属之地。这个道理就跟历代中原王朝，需要将控制力延伸至漠南，才能保证对漠北蒙古高原的优势一样（比如强盛时期的汉、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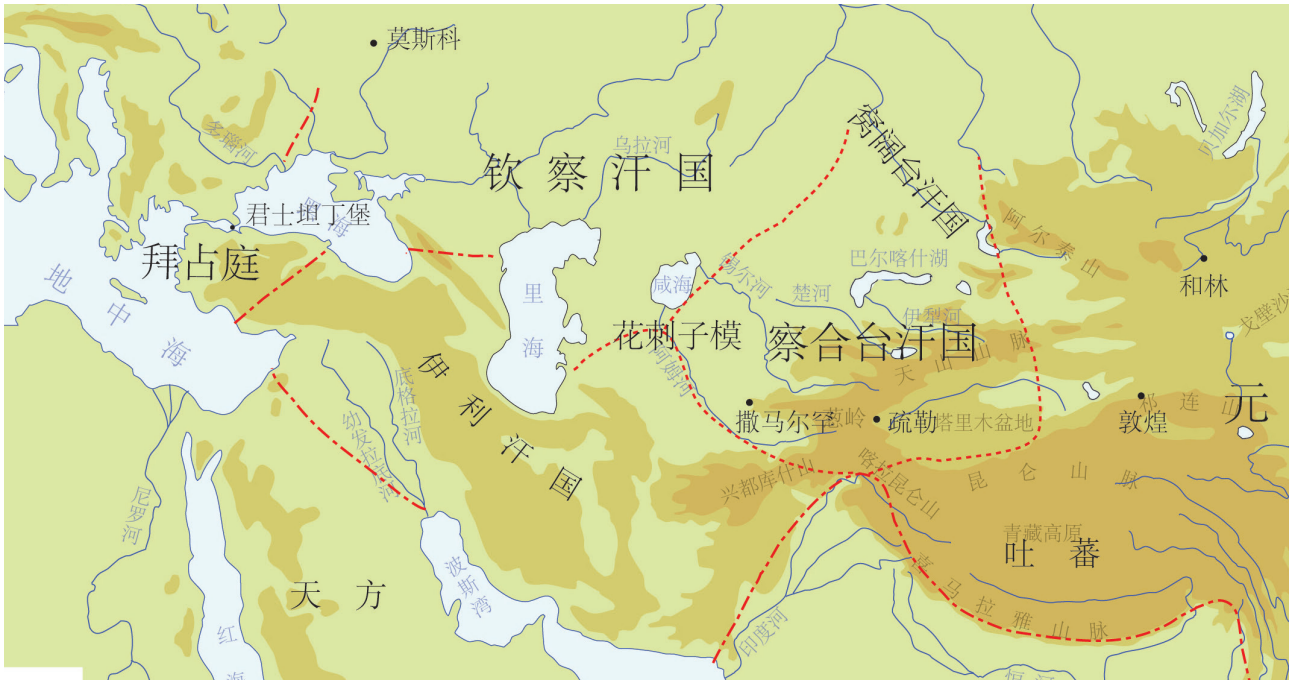
在蒙古征服如此广袤、结构复杂的土地上实施中央集权体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成吉思汗的设计应该说还是很合理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漠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是说，如果拖雷和他的子孙一旦依其法定所得，在漠北建制实质独立的“拖雷汗国”的话。无数次围绕长城一线所发生的博弈，很有可能便会在成吉思汗的子孙身上继续上演。这一地缘政治风险，帝国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并非没有意识到，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警惕。尤其此时的蒙古帝国还处在扩张时期，战争力量大部仍集于高原本部。不过也正因为如此（特别是中原未定），也给了窝阔台将帝国中央继续留在漠北的理由。（公元 1235 年，窝阔台正式建都哈拉和林），使拖雷一脉无法一时像术赤、察合台系一样经略自己封地。

拖雷系控制漠北和中原

对于出身汉地的中原王朝来说，其定居、农耕属性使其很难对蒙古高原，尤其是漠北进行有效统治。相比之下，北方游牧者做到这点要相对容易（比如内部南北分治的契丹人）。最后的结果，也的确如此。在经过一系列内部斗争之后，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被置入了同一统治体系。只是最终成为这两片土地之主的，却并非窝阔台的子孙，而是拖雷的子孙。公元 1241 年，窝阔台离世。十年之后，在经历一系列混乱的权力之争后（其间有窝阔台之子贵由曾继位过），拖雷的长子蒙哥成为了新的蒙古大汗。此后大汗之位，以及蒙古高原和征服后的中央之国（长城以南地区）的统治权，一直为拖雷系所有。公元 1260 年，忽必列将都城迁至华北平原的大都，并很快变身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元朝”。这一事件也标志着 “大蒙古国”或者说蒙古帝国的正式分裂。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窝阔台的子孙们并非不想夺回属于他们的权力和领地。然而就像把关中平原交付给秦人之后的“东周”，没有可能仅凭洛阳盆地继续成为中央之国的宗主一样，偏居一隅的“窝阔台汗国”，最终也被元朝所灭（公元 1309 年）。其悲剧性的结局，倒并非源自于其与拖雷系之间的恩怨，而在于它的地缘位置及潜力。即使不考虑元朝在长城以南的实力，来自蒙古高原的扩张压力，也一直让身处阿尔泰山西南的窝阔台汗国，无法承载一个独立、强大的政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元朝能

够就此获得窝阔台汗国的全部遗产。最起码在额尔齐斯河以南的方向，统领七河草原的察合台汗国会更有优势（最后窝阔台汗国的领地，也大部为察合台汗国所获。一切有如当年的乌孙与匈奴之争）。



蒙古帝国的分裂

最后说一下伊尔汗国[1]的事情。这个位列四大汗国之列的西亚国家，并非源自于成吉思汗的规划，而是在大蒙古国还未分裂之时，由蒙哥派遣其弟旭烈兀西征而形成的。从拖雷系力图主导蒙古帝国的角度出发，在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之后，建制一个由拖雷系子孙控制的汗国，有其现实的意义。最起码在那三个汗国觊觎大汗之位时，能够与东方的帝国中央呼应。不过尽管伊尔汗国建国之后，仍长期遵元朝为宗主，并经常与察合台、金账汗国发生冲突。但这种做法其实已经应该用几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来解读了。

蒙古帝国的分裂，以及帝国重心的东顾，也意味着蒙古人在西方的事业开始衰弱。与地中海文明圈相接的金帐汗国、伊尔汗国，不仅再难从身后获得同族的支援，甚至还需要为内斗而耗费资源。不过，蒙古人攻势的走弱却并不意味着欧洲从此以后再无来自东方的威胁。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很快，以安纳托利亚高原为基地的奥斯曼突厥人，开始沿着波斯人曾经的西征之路，开始了对欧洲的新征程。这一次来自亚洲的“侵略者”能走多远，又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又译伊儿汗国或伊利汗国。

第五部分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与扩张

第二十六章 奥斯曼的兴起及向欧洲的渗透

第一节 奥斯曼的独立

蒙古各汗国的分裂和衰落

在成吉思汗离世（公元 1229 年）100 年后，蒙古人在欧洲大陆各地开创的事业，也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衰弱迹象。像当年的喀剌汗王朝一样，横跨天山的察合台汗国，也分为了东、西两部分；刚刚完成伊斯兰化的伊尔汗国，同样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至于在东亚的帝国中央部分，结局我们就更熟悉了。公元 1368 年，明朝的建立宣布了蒙古人在中央之国统治的终结。不过蒙古人却并没有就此退出东亚的历史舞台，在退回漠北之后，拖雷的子孙们依托蒙古本部之地，继续来往于大漠南北，与中原王朝轮回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博弈。直到下一个王朝“清”建立后，才算彻底解决了蒙古人的威胁。

相比蒙古人在东方事业的衰落，代表蒙古帝国在欧洲打拼的金帐汗国，应该才是我们这阶段关注的重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横跨欧亚的巨无霸汗国，内部其实从一开始就分为两部分的。气候环境相对恶劣的中亚草原部分（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哈萨克斯坦），由拔都的弟弟及其子孙所统领的“白帐汗国”自治。不过虽然环境不太好，但白帐汗国的地缘文化却简单的多，治下基本为与蒙古文化相通的，突厥系游牧民族所覆盖。后来的哈萨克汗国和哈萨克斯坦，渊源的话则算是继承自白帐汗国。

白帐汗国之于金账汗国还不能算是分裂，只能说是基于管理需要所做出的选择。所谓金账、白帐（甚至还有其它帐的细分），本身就是欧洲视角所做出的分类。一般情况下，欧洲人眼中的金帐汗国，仅指的是伏尔加河流域及其以西的区域，也就是拔都及其子孙所亲统的欧洲部分。伴随着金帐汗国衰弱而崛起的，是重新统一罗斯诸国的“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不过对于罗马教廷治下的“欧洲人”来说，罗斯人甚至还不能算是欧洲的一部分，东欧发生的这一切，更像是两股野蛮势力的缠斗。相比之下，他们更关心发生在拜占庭土地上的变化，因为这一地区的变故，才更会直接影响到西欧的利益。

奥斯曼从罗姆苏丹国中独立

在 13 世纪行将结束的最后一年，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要若干年后回头看才知道），应该就是一个叫奥斯曼的突厥部落首领，率领其部从分裂的罗姆苏丹国中独立出来了。鉴于这支突厥人日后所取得的成就，奥斯曼之名成为了整个部族以及国家的标签。需要说明的是，奥斯曼突厥人并非是塞尔柱突厥人的分支，而是塞尔柱人从中亚招募的众多突厥语部落中的一支。其在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之前的居住地，是阿姆河中游的荒漠草原。正因为如此，今天生活于此的土库曼人，以及依照同样路

径迁入的阿塞拜疆人，也被认为是中亚各突厥语部族中，与土耳其人亲缘关系最亲近的。当然，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些突厥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本已开始衰弱的小亚细亚穆斯林政权，怎么又一次开始满血复活了。

在欧洲人的观念中，欧洲史即世界史。他们眼中的“欧洲”，并非是以地中海为界，而须包含小亚细亚、北非、阿拉伯半岛的沿海非荒漠部分（最起码麦金德也是这么认为的）。也就是说，今天被穆斯林所占据的埃及、突尼斯、叙利亚（更别说耶路撒冷），都是欧洲史的一部分。若是从历史来看，欧洲人这样想也无所谓对错，毕竟希腊、罗马人控制这些土地时，阿拉伯人还在荒漠中游牧，伊斯兰教的教义也未形成。当然，从地缘角度来解释这一切，会更加的客观。

从地缘角度看，把穆斯林赶出小亚细亚，能够让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感觉更加的安全，并在经济上获取更大的利益（小亚细亚及东地中海，控制着重要的东西方商道）。尤其相比塞尔柱人200多年的统治，代表欧洲荣耀的“罗马帝国”（包括拜占庭在内），控制这片土地的时间已逾千年了。另外，十字军在圣地事业的失败，究其根源也是因为小亚细亚腹地的伊斯兰化。这使得无论是拜占庭的东正教徒，还是西欧的天主教徒，都必须依赖海路为耶路撒冷和十字军骑士国提供战略支撑。

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以罗姆苏丹国为政治标签的穆斯林政权，所控制的主要是干旱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沿海地带则基本仍由拜占庭帝国，以及因十字军东征（特别是攻陷君士坦丁堡的第四次东征）独立出来的：特拉比松帝国、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等基督教国家控制。无论对于控制外围沿海低地的基督徒，还是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纵横的穆斯林来说，这种新平衡都是脆弱的。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这种让双方都难受的格局终于被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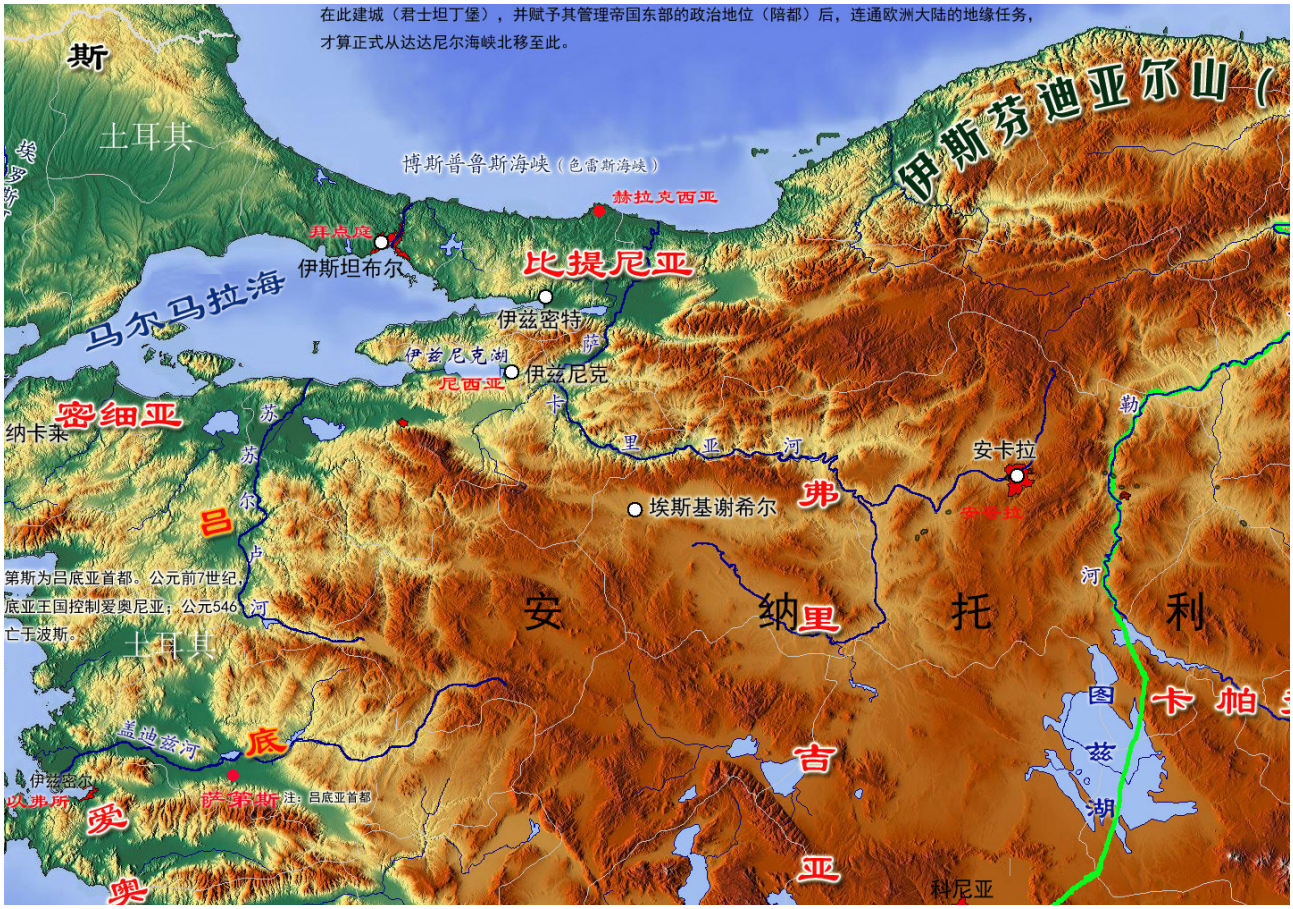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奥斯曼夺取拜占庭领土

奥斯曼人兴起时周边的地缘形势

在受雇于罗姆苏丹国时期，奥斯曼人的驻地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西北边缘的“萨卡里亚河”中游地区。这条土耳其境内的第二大河，一向为欧、亚政治势力角逐的战场。其上游直通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与今天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相接，下游则向北经比提尼亚低地区注入黑海。换而言之，奥斯曼人是被塞尔柱人，放置在了对抗拜占庭的前线位置。大多数时候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待遇（很可能变成炮灰）。比如公元1211年，立志恢复拜占庭帝国荣光的尼西亚帝国，就曾经击败罗姆苏丹国，沿萨卡里亚河推进至安卡拉。此后不久，由于蒙古人对花剌子模的西征，大量原居住于阿姆河地区的突厥部落，开始涌入安纳托利亚高原，使得罗姆苏丹国的力量得以加强，并重新获得了萨卡里亚河的控制权。事实上，奥斯曼人也正是在此之后，被塞尔柱人引入萨卡里亚河地区，帮助罗姆苏丹国戍边的。

奥斯曼人的运气非常不错，一方面拜占庭帝国无可挽回的进入了衰弱期。为了重夺君士坦丁堡，尼西亚帝国的重心一直在西边，并最终在公元1261年重夺君士坦丁堡，中兴了拜占庭帝国。然而拉丁人的势力并未被完全清除出原拜占庭帝国的领地，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在希腊南部和爱琴海诸岛中，依然控制有不少据点。并且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尔人亦借拉丁之乱摆脱了拜占庭的控制，并分别向马其顿和色雷斯方向渗透。欧洲部分的乱局，使得拜占庭人根本无力再对亚洲部分的突厥人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在蒙古人的打击之下，罗姆苏丹国很快分裂为了包括奥斯曼在内的数十个实际独立的酋长国（或以欧洲人习惯称之为“公国”）。罗姆苏丹国君主的领地，则萎缩至了安纳托利亚高原南部的首都科尼亚一带，完全没有办法对那些表面仍尊自己为君主的酋长国发号施令。这种类似春秋时代的政治格局，使得奥斯曼人能够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制定军事、外交政策。不过处在突厥人、拜占庭人，乃至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中间的奥斯曼，比之其它从罗姆苏丹国中独立出来的酋长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要更多。那就是到底是向东扩张，与其它突厥诸强争霸；还是向西与拜占庭人开战。



小亚细亚半岛地缘结构图

奥斯曼夺取尼西亚和比提尼亚

总的来说，奥斯曼人在东线还是保持非常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将扩张的重心放在了西线。比如在罗姆罗丹国最后的君主被蒙古人杀死后（公元1307年），独立不久

的奥斯曼公国也没有像高原上的一些公国那样，急于乘乱摆脱蒙古人的影响，而是继续承认伊尔汗国的宗主地位。东线的稳定，使得“奥斯曼公国”能够集中注意力在西线扩张。对于奥斯曼人来说，这是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决定。东守西攻的做法，让他们有机会成为穆斯林对抗基督徒的圣战者，并以此吸引来自其它伊斯兰地区的圣战者加入。比如那些狂热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就不会让自己卷入穆斯林内战中（就像争夺罗姆苏丹国遗产的那些国家），而更愿意把自己的性命和资源交付给奥斯曼人。

基于自身的位置，奥斯曼人在西线扩张的天然方向，就是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比提尼亚地区了。最早从欧洲方向征服这片沿海低地的，是从海峡对岸而来的色雷斯人（海峡也因此又被称为色雷斯海峡）。同样的，如果奥斯曼人能够拿到比提尼亚，也就反过来获得了入侵欧洲的跳板。在针对比提尼亚的博弈中，萨卡里亚河西侧的伊兹尼克湖畔的“尼西亚”（今伊兹尼克），是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点。当日试图向西挑战拜占庭帝国的罗姆苏丹国，以及被拉丁人夺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人（尼西亚帝国），都曾经以尼西亚为都。

对于奥斯曼人来说，拿到尼西亚和比提尼亚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坐实自己圣战者的身份，更能够帮助奥斯曼人摆脱游牧属性，注入建立帝国的文明基因。同时相比地广稀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这些一直为希腊人经营的沿海低地区，在人口和经济上的潜力要大的多，尤其是像比提尼亚这样一块，与君士坦丁堡战略价值对等的土地。

经公元 1331 年，奥斯曼人终于从气息奄奄的拜占庭人手中，夺取了尼西亚，并旋即迁都于此。250 年多前（公元 1077 年），塞尔柱人也曾经这样做过。不过仅仅过了 20 年，拜占庭人就在十字军（第一次）的帮助下夺回了尼西亚，罗姆苏丹国也随之将都城迁往高原腹地的科尼亚。此后内忧外患的塞尔柱人，再也无力染指这座城市，更别说代表伊斯兰世界登陆欧洲了。现在，重夺尼西亚的奥斯曼人，能不能做得更好呢？

第三节 奥斯曼人向巴尔干半岛渗透

拜占庭被迫与奥斯曼结盟并放纵其渗入巴尔干

公元 1337 年，拜占庭失去了它在土耳其海峡对岸的最后一个据点。定都尼西亚的奥斯曼帝国，从此开始与拜占庭帝国真正形成的对峙状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君士坦丁堡就唾手可得了。要知道这座新罗马城，历史上曾无数次陷入对手的包围之中，除了因内乱而让威尼斯人策动的十字军们攻陷过以外，建都已逾千年的君士坦丁堡还没有被外敌得手过。得天独厚的海、陆枢纽位置，是君士坦丁堡得以成为神话的重要支撑。要想染指，不仅要有强大的陆军，还必须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以切断它的外援。

然而在夺取比提尼亚之后，奥斯曼人与拜占庭人之间的矛盾却并没有被激化，反而开启了一段将近 20 年的相对和平期。在此期间，双方甚至通过了一场政治联姻结

成了盟友（公元 1345 年，奥斯曼帝国的第二位君主乌尔汗，迎取了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的女儿）。鉴于双方的宗教立场，这种做法似乎很不可思议。不过考虑到拜占庭帝国此时的处境，这种选择也就不那么让人意外了。

当奥斯曼突厥人刚开始侵夺拜占庭帝国的亚洲领土时，东罗马的继承者们是非常想从他们身后的基督教世界获得支持，以再次重返小亚细亚的。200 多年前，塞尔柱突厥人这样做时，西欧天主教徒们所策动的十字军东征，就曾经帮助东正教的希腊人做到了这一点。然而时过境迁，教廷和天主教世界，早已不再拥有圣战之心了。诸如威尼斯之类唯利是图的商业国家，更看中的是自己能不能在这场乱局中取利。

对拜占庭人更为不利的是，几乎与奥斯曼帝国崛起的同时，巴尔干西北部的塞尔维亚王国也开始了强势扩张，不断向拜占庭帝国控制下的希腊半岛北部、马其顿地区扩张。这意味着，拜占庭帝国非但没有可能从天主教甚至东正教世界获得后援，反而不得不在东、西两线同时应对两个强势崛起的掠食者。更别说帝国曾经的欧洲版图中，还有保加利亚人、威尼斯人等参与角逐的各方势力了。

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意识形态向来都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基督教世界没有人愿意帮助拜占庭帝国，在后院起火的情况下，奥斯曼人又为什么不能成为拜占庭人的选项呢？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拜占庭嫁出了自己的公主，并且承认了奥斯曼人所侵夺亚洲领土的合法性，后者也以帮助拜占庭帝国抵御外患的理由，派军出现在巴尔干半岛上（同时参与内战，对付那些不希望与奥斯曼人结盟的政治势力）。

很显然，拜占庭人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引狼入室、与虎谋皮。最直接的损失就是，从此难以束缚的穆斯林盟友，经常借机在巴尔干半岛掠夺、破坏。当然，你既然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些损失就只能认为是必须付出的报酬了。从地缘安全角度看，横亘于巴尔干半岛与小细亚半岛的“土耳其海峡”，是拜占庭人的安全红线。也就是说，拜占庭对奥斯曼人的定位更像是“佣兵”。有坚不可摧的君士坦丁堡履行“天子守国门”的义务，帝国的决策者们也很有信心，不至于让奥斯曼人生出留驻欧洲的想法来。最起码奥斯曼人此时的海上实力，还不



拜占庭帝国（公元 1355 年）

足以支撑它在欧洲强行经营几片飞地。

奥斯曼人取得加利波利半岛

然而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却并非是小亚细亚半岛渗透巴尔干半岛的唯一途径，奥斯曼人的想法也绝不仅仅是到欧洲赚点钱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在黑海——地中海、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这个四方相接处，现在被总称为土耳其海峡的这片水域，整体呈现橄榄形。中间是南北宽约 70 公里的马尔马拉海，南北两端则分别为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后者同样可以帮助奥斯曼人，完成登陆欧洲的梦想。

在古希腊时代，达达尼尔海峡甚至比博斯普鲁斯海峡要显得更为重要。著名的特洛伊古城，就在海峡的西南侧。希波战争中的波斯人，以及亚历山大东征中的马其顿人，也都是跨越达尔尼尔海峡发起远征的。波斯皇帝薛西斯甚至还曾经在海峡上历史性架起过一座浮桥。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爱琴海才是当时地缘政治中心。尽管后来君士坦丁大帝，因为黑海及东欧地区重要性的提升，选择了定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但却无损于达达尼尔海峡在沟通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的地理优势。也就是说，如果奥斯曼人能够跨越海峡在对岸立足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避开坚不可催的君士坦丁堡，在欧洲大陆上展现他们的陆战优势。



小亚细亚半岛地缘结构图

达达尼尔海峡的北岸，是一片狭长的陆地——加利波利半岛。控制这个半岛最大的问题，在于这片陆地实在太狭长了（最窄处仅 6 公里多，长度却有 100 公里），几

乎每一个方向都有可能被对手突破。基于我们前面的分析，一旦奥斯曼人想抢占这个桥头堡，并透过达达尼尔海峡打通与亚洲的通道的话，拜占庭帝国是很难再坐视不管的。然而最终，奥斯曼人还是做到了这点，并且开启了巴尔干半岛的扩张之路。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4 世纪中叶（公元 1355 年），奥斯曼突厥人终于向他们建立欧亚帝国的梦想，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永久性的得到了加利波利半岛。这既是突厥人的胜利，也是伊斯兰世界的胜利。从大历史层面说，这同样是东地中海亚洲势力的一个大突破。要知道，上一次波斯人代表亚洲做到这点（希波战争），离这次已经快有一千年时间了。比古波斯帝国更为成功是，奥斯曼人将他们的标注有突厥、伊斯兰标签的国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在衰退之后，仍然保住了最精华部分的欧洲领土。这种一脉相承性，使得我们可以毫无争议的，将“土耳其”这个大家更为熟悉的政治标签，用在中世纪（如果用“伊朗”这个标签来指向古代波斯，则会引发很多混乱）。

第四节 巴尔干半岛的地缘政治格局

塞尔维亚王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

土耳其人的机会，来自于基督教世界在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的内斗。在陆地方面，拜占庭帝国在欧洲方向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刚刚崛起的塞尔维亚王国以外，还有早在10世纪初（保加利亚第一王国）就曾经试图进军君士坦丁堡，甚至自立为“沙皇”（“沙”=凯撒）的保加利亚人。14世纪初，在拜占庭帝国陷入衰弱之后，重生的保加利亚王国（史称“保加利亚第二王国”）也再次燃起了坐实沙皇梦的想法。

最初斯拉夫化的保加尔人，与同属南斯拉夫体系的塞尔维亚人结成了同盟，共同入侵拜占庭帝国。相比保加尔人，塞尔维亚人呆在拜占庭帝国内的时间要更长，12世纪末才获得独立。不过后发者有后发者的优势，最起码塞尔维亚人内部，暂时还没有累积出像拜占庭、保加利亚人那些多的矛盾。借两个对手内乱的政治纷争之机，塞尔维亚王国很快让世人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一个改变巴尔干半岛势力均衡的砝码，而是也想有朝一日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最先出局的是保加利亚人。并且通过战争和联姻手段（公元 1330 年），塞尔维亚人成功迫使其成为了自己的附庸国。此时的拜占庭帝国，正在小亚细亚方向面临突厥人的强大压力（并不仅仅是土耳其人，还有南部的其它塞尔柱国家）。两线面临压力的君士坦丁堡，开始顾此失彼。不久之后便将马其顿地区（公元 1345 年）拱手让给了塞尔维亚人。后者得以将王国的南界推向了马其顿、塞萨利地区的分割点——奥林匹斯山。凭借仅有的海上优势，拜占庭人能够保住的，仅仅是古马其顿王国的旧都、塞萨洛尼基湾畔的“塞萨洛尼基”（萨洛尼加）。

从位置上看，处于希腊半岛－色雷斯低地，以及巴尔干半岛西北山地相接处的“马

其顿”地区，是争夺巴尔干半岛控制权的“心脏地区”。当年崛起于此的马其顿人，不仅向南统一了希腊，更向东扩张建立了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对于现在领土范围仅限于色雷斯和希腊半岛的拜占庭人来说，失去马其顿尤其是沿海平原区的“下马其顿”，意味着自己的核心领土被一分为二。这也导致拜占庭帝国，不得不以放弃亚洲部分为代价，引入土耳其人来制衡塞尔维亚人（毕竟欧洲比亚洲更重要）。

在土耳其人正式登陆加利波利半岛时（公元 1354 年），除了曾经滋养过古希腊三强：底比斯、雅典、斯巴达的维奥蒂亚——阿提卡半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巴尔干半岛中部的伊利里亚、马其顿、伊庇鲁斯、塞萨利等地区，几乎全部成为了塞尔维亚王国的领地。说起来，此时我们应该可以将这个“南斯拉夫人”国家称为帝国了。一方面在拿下马其顿之后，塞尔维亚的君主就迫不及待的加冕为了 “塞尔维亚与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另一方以塞尔维亚的势头以及领土范围，也的确有帝国之象。

塞尔维亚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范围

虽然中国人对于欧洲人那种，喜欢把所有地缘标签加注在头衔中的做法感到可笑，但从地缘研究的角度来看，却为我们了解一个政治体的范围和地缘结构提供了便利。基于欧洲那种模块组合的政治模式，以及巴尔干半岛复杂的民族结构，这种名称背后所隐藏的联合方式（而非真正的集权）倒也是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保加利亚人还给自己戴着“沙皇”的虚位，塞尔维亚人没有再选择罗马皇帝的桂冠（甚至刻意把凯撒的称号赐给封臣）。当然，要是塞尔维亚帝国后来真的能够重现拜占庭帝国的辉煌，相信他们也一定不会放弃这笔罗马遗产的。



塞尔维亚帝国（1355 年）

如果你对“塞尔维亚帝国”的位置、范围仍然缺乏概念的话，那么在地图或者

脑海中，把今天的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以及希腊温泉关以西以北的区域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没有占领希腊全境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拜占庭帝国的顽强抵抗，而是因为在维奥蒂亚——阿提卡半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北部，面对崩溃后的“拉丁帝国”，威尼斯人基于弥补自身陆地短板的需要，依然扶植有两个拉丁帝国时代的公国：雅典公国和亚该亚侯国。尽管两百多年间，这两个国家的控制权也是几经更迭，但却始终是拉丁人的势力范围。在东正教徒内部的这场三国杀中，贸然将这些拉丁人推向对手阵营，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拜占庭帝国（公元 1355 年）

现在可怜的拜占庭帝国，核心领土就只剩下君士坦丁堡所在的“东色雷斯”（今为土耳其所有），以及今天希腊东北角的“西色雷斯”地区了。至于北色雷斯，则早已为保加利亚人所侵占。另外，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科尼亚地区（当年斯巴达所在地），也是拜占庭人的飞地（另有萨洛尼加和若干小岛）。对于东正教三国来说，谁取得最终的胜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内忧外患之中，巴尔干半岛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整合起来。这就好像在站在垂死的阿尤布王朝肩膀上崛起的马穆鲁克王朝，能够帮助穆斯林世界抵御蒙古人的入侵一样。塞尔维亚人要是能够占领君士坦丁堡，一个斯拉夫属性的“拜占庭帝国”就将凤凰涅槃。

对于一个源起于山地的国家来说，想要完全取代拜占庭这样一个海陆兼备的帝国，其最大的短板就是海军。只是所谓“百年海军”，这块短板的弥补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弥补的。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能够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多次涉险过关也是因为自己的海上基础。不过这座千年古都也并非一次都没有沦陷过，当年集合了威尼斯海军以及法兰克骑士的十字军（第四次），就曾经在拜占庭内乱的助力下做到了这一点。如今，一心想入主君士坦丁堡的塞尔维亚人，也把结盟的目光投向了威尼斯人。

第五节 威尼斯与热那亚展开贸易权的争夺战

威尼亚与热那亚为贸易权爆发战争

尽管威尼斯人一手扶植起来的拉丁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但不做赔本买卖的威尼斯人，此时还控制着爱琴海中南部大部分岛屿，包括最大的两个岛屿：克里特岛和埃维亚岛，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拥有据点（迈索尼）。对比当年的情况，“塞尔维亚帝国”的实力也比劳师远征的法兰克骑士更为强大。一旦二者联合起来，那么实力还不如当年的君士坦丁堡，形势就很不容乐观了。

然而借助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拉丁帝国的建立，成功入驻爱琴海的威尼斯人，在这一地区并非没有对手。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所面临的最大对手就是其它同样唯利是图的商人。与威尼斯共和国一样，热那亚共和国和另一个海上共和国——比萨共和国，也是十字军东征事业的受益者。不过进入 14 世纪时，与热那亚同处意大利西北侧（利古里亚湾）的比萨共和国，已经被热那亚击溃。也就是说，威尼斯人海上事业的直接对手就是热那亚人。

如果说威尼斯人在爱琴海及至东地中海事业崛起的基础，在于当年策动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的话，那么热那亚人能够在此和威尼斯人对抗的底气，就在于押宝拜占庭帝国（帮助尼西亚帝国复国）了。其实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并不在乎谁是君士坦丁堡的主人。多方势力交错的爱琴海，各式合纵连横的组合，也远不是简单划分两大阵营那么简单。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威尼斯人还是热那亚人，谁要是想打破平衡通吃海上商业利益，另一方都势必会和它的对手结盟。

从公元 1294 年起，一直到公元 1355 年的 60 年间，围绕爱琴海 - 黑海贸易权，威尼亚与热那亚两个海上强国，共进行了两场全面战争。悲剧的是，原本应该在上述区域有主导权的拜占庭帝国，却像 20 世纪初眼睁睁看着日、俄两国在东北地区争夺利益（日俄战争）的中央之国一样，被迫成为龙套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热那亚 - 威尼斯战争中，我们熟悉的“马哥 • 波罗”（威尼斯人）成为了热那亚人的俘虏。正是在被俘期间，百无聊赖的“百万先生”口述了他在东方的传奇故事，并被狱友整理成我们今天看到的《马可波罗游记》。至于这篇游记里到底有多少是吹牛的成分，马可 • 波罗又有没有真的到过中央之国（还是听别人说的），倒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欧洲人通过这篇游记，触发了对这个神秘东方国度的向往。

拜占庭帝国面临的地缘压力

基于商业共和国的属性，无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本身都没有产生入主君士坦丁堡建立政治帝国的想法。拉丁人之间的博弈，终极目标还是为了商业利益。从这个角度说，尽管拜占庭人的海上实力已经处于两个共和国之下，但只要能够注意维系二

者的平衡，君士坦丁堡的海上风险要比陆地风险更小。也就是说，拜占庭帝国存亡的真正风险，还是在于几乎控制全部拜占庭欧洲领土的、系出东正教-拜占庭体系的“塞尔维亚帝国”。一旦塞尔维亚人长驱直入色雷斯地区，并且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话，无论是威尼斯人还是热那亚人，都只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上述地缘政治推演，只是基于欧洲诸势力来做的。不要忘记了，此时土耳其人已经控制了小亚细亚西北部，并与君士坦丁堡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望。他们的一举一动，必将会对爱琴海地区的政治平衡产生影响。从各方共同利益出发，无论是热那亚人、威尼斯人，还是拜占庭人，都很难坐视异教徒的土耳其人控制了海峡两侧。尤其是在土耳其海峡没有据点的威尼斯人（热那来人有），更是一直希望在土耳其一侧有所收获。只是最终，土耳其人还是成功的跨越达达尼尔海峡，成功的得到了加利波利半岛这个战略要点。

第六节 奥斯曼登陆加利波利半岛

黑死病席卷欧洲

帮助土耳其人取得这个成就的神秘力量，同样源自于东方。这股神秘力量，就是始于 1347 年的欧洲“黑死病”（鼠疫）流行事件。很多历史学者认为，这场席卷欧洲的灾难，最初的源头是公元 1334 年，中国的华北平原爆发的一场瘟疫。正常情况下，基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地理距离，源起于中国的传染病源，并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传播到欧洲的。问题在于此时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仍然处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下。虽然诸蒙古政权之间亦是摩擦不断，但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欧亚大陆的陆地交流（尤其是商道），却依然保持着畅通（中世纪的欧洲人，更习惯把包括蒙古人在内的亚洲游牧者，统称为鞑靼人）。

在黑死病传入西欧腹地之前，东欧平原北部的罗斯，以及欧亚商道的另一个终点——印度，都已成为了重灾区。抛开与鞑靼人紧密接触的罗斯人不说，黑死病最初与欧洲人发生亲密接触的地点，是在黑海北部的克里米亚半岛。作为欧亚游牧文化区与地中海文明区接触的窗口，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克里米亚半岛南部一直都是地中海商人，建立贸易据点的最佳选择。基于与君士坦丁堡长期以来的合作关系，热那亚人在黑海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鞑靼人那里“接力”鼠疫病菌的，也正是热那亚人。当然，热那亚人肯定也并不想这么做。他们也是在抵御鞑靼人对自己贸易城市的围攻之后（1346 年），才不幸成为传染源的（对手因染病而撤退）。

值得注意的是，游牧者是在撤退之时，有意识的将患有鼠疫的病亡者尸体，用抛石机投入城中才造成鼠疫扩散的。这次传播事件，也因此被很多欧洲研究者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场“细菌战”。其实早在公元前的汉匈之战中，草原上的匈奴人就已经常将患病牛羊，置于水源及道路上，以施“巫术”之名阻击汉军了。虽然无法统计出，这



黑死病席卷欧洲

到底给汉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但“细菌战”的做法，在草原上的传承却是可以肯定的。

为了远离疫区，从克里米亚出发的热那亚商人们回到了地中海，并在西西里岛东北部的墨西拿登陆。尽管通过船上的惨状（大部分人已经染病身亡），西西里人意识了到灾难的来临，但瘟疫的传播却已是无可避免了。透过西西里岛这个地中海贸易的枢纽，黑死病开始迅速在北非和欧洲腹地传播。空气湿润、人口密度大（老鼠密度也大）的欧洲成为了重灾区。据信在黑死病传播的高峰期（公元 1347 年——1351 年间），欧洲损失了不少于 1/3 的人口。

人口的锐减，毫无疑问的影响了欧洲的整体实力。对于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商业共和国来说，更意味着大量坏帐的出现（人口损失也同样严重）。只是灾难并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事实上，精明的商人往往认为，灾难同时也是机遇。就像今天跌跌不休的油价，对于每个石油输出国来说，都称得上是一场灾难，但每个石油大国，又都希望对手先倒下，让自己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一样。

威尼斯人和热那人也同样认为，谁能咬牙坚持过这场大灾，并借机击跨对手，谁就将是地中海的贸易霸主。为此，在黑死病恐惧还未消散的公元 1350 年，围绕着黑海——爱琴海贸易权的争夺，双方启动了第二场全面战争。在这场延续 5 年的战争中，两个拉丁国家，也各自拉来不少盟友（包括在君士坦丁堡也都各有盟友）并互有胜负，结果却是谁也没能吃掉谁。然而从更高层面来看，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两个海上共和国之间的内斗，却使得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海上力量，被整体削弱了。

土耳其人登陆加利波利半岛并驻军和移民

谁会是这场天灾人祸的最大受益者呢？很显然是土耳其人。公元 1354 年，当土耳其人偷袭（先头部队甚至是藏身热那亚商船渡海的）加利波利半岛成功，并紧接着抱着永久经营的目的，向这个桥头堡派驻军队、输入穆斯林移民时，没有基督徒会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只是此时此刻，无论是在陆地上玩三国杀的东正教徒们，还是在地中海左右互博的拉丁商人们，都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了。

对土耳其人登陆最为紧张的，自然是守土有责的拜占庭帝国了。帝国内部很快结束了纷争，并致力于将土耳其人“请”出欧洲。同时已经打的筋疲力尽的威尼斯、热

那亚两国，也结束了战争状态（当然以后还是会打的）。为了请求西欧的天主教教友们出手相助，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约翰五世）游遍了天主教各国，甚至还曾经在罗马向教皇表示，愿意皈依罗马天主教。然而刚刚遭受黑死病重创的天主教世界，已经无力再像当年一样发动圣战了。除了一小支由匈牙利人和法国人所组成的十字军，曾经对加利波利半岛发动远征，并一度占领以外（公元 1366 年），没落的帝国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加利波利半岛

同样潜在利益受损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更多还是在以商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如果拜占庭帝国还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对象，他们自然会去投资；如果衰亡已成定局，那么商人们更愿意做的则是，从崩溃的帝国废墟中多抢得一点地盘，以便在和新合作伙伴的合作中，握有更多的筹码。至于和异教徒的土耳其人的合作会不会有问题？这本身会成为问题吗？（尽管不是最好的合作对象）。

既然拉丁人和整个天主教世界，都不可能为拜占庭帝国的存亡出力，那么近在咫尺的塞尔维亚帝国，会不会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救命稻草呢？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当塞尔维亚人极力在巴尔干扩张，而土耳其人又在海峡另一侧时，后者是用来制衡前者的力量；而当土耳其人已经在欧洲登陆时，即使拜占庭人没有伸出橄榄枝，出于驱赶竞争者的目的，塞尔维亚人应该也不会坐视土耳其人在欧洲做大的。那么塞尔维亚人有没有可能做到这点呢？

第二十七章 南斯拉夫民族演变与巴尔干半岛地缘结构

第一节 斯拉夫人进入文明期及其扩张方向

斯拉夫人相对日耳曼人进入文明较晚

塞尔维亚人及其所属的“南斯拉夫”族群，在之前的内容中曾经多次提及。只是鉴于在地缘政治舞台上长久以来的龙套地位，一直没有对南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半岛的地缘结构进行过系统梳理。现在，借着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扩张，以及昙花一现的“塞尔维亚帝国”，我们的视线终于可以聚焦在这个欧洲火药桶上了。现在我们再从源头上梳理一下南斯拉夫人的前世今生。

原始印欧人并非是第一批从南俄草原启程，深入欧洲腹地的族群，不过显然是最为成功的。在语言谱系树上，包括南斯拉夫语在内的欧洲语言，绝大部分的源头都指向的是“原始印欧语”。相比沿黑海进入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半岛的古希腊人、拉丁人，西北方向迁移入较寒冷地带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波罗的海人、斯拉夫人等族进入文明期的时间要晚得多，也因此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地中海文明圈的族群视为“北方蛮族”。这本身也没什么奇怪的，气候温暖的地区总是拥有更丰富的物产，更容易让人类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外，有余力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由于古希腊文明的本质是海洋文明，他们更习惯于以贸易思维经营沿海据点，而无意向内陆发展。这一商业思维反映到政治结构上，就是滋养出了更为讲究民主思维的“共和”体制。向欧洲腹地传播文明的重担，是由崛起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来完成的。虽然身处地中海，并且深受海洋文明影响，但罗马文明的本质为农业文明，这也是罗马人能够在地中海竞争中脱颖而出，建立庞大帝国的源动力。基于西欧平原与意大利半岛地缘距离，居于这一区域（高卢）的凯尔特人，成为了最先接受罗马文明洗礼的北方蛮族。对高卢的征服，也成为了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国”转变的关键。

在罗马征服高卢之后，基于地缘位置的关系，日耳曼人比起他们在东部的邻居——斯拉夫人，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接受文明的影响（比如以雇佣军的形式进入罗马）。后者由于前者的阻隔，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前几乎没有途径沐浴文明的阳光。这一地缘优势，使得日耳曼人能够在罗马帝国崩溃、分裂时（公元 4 世纪末），第一时间成为帝国西部遗产的接收者。而当日耳曼人开始洗白自己成为文明人之时，斯拉夫人就变身成为了下一个，站在“文明”大门口的北方蛮族了。不过斯拉夫人也不必感到不平，最起码他们因加入基督教而成为欧洲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时，还能够向更边缘的波罗的人“传教”。

斯拉夫人向东方和南方扩张

当然，斯拉夫人并不是唯一一个想“教化”波罗的人的基督教徒，同样位于中

欧平原的日耳曼人，认为自己会更有资格这样做。就两族最初在中欧平原的分布来看，如果将今天波兰、德国两国的分界线奥得河视为二者的地缘分割线，大体也是准确的。其中今天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流域，是斯拉夫人最初的起源地。在匈人入侵欧洲腹地之后，斯拉夫人也卷入了因此而引发的民族大迁徙中，并开始向周边地区扩散（公元5世纪末开始）。

由于大量日耳曼部落西迁、南迁，部分斯拉夫人开始向西填补日耳曼人的空间，并渗透到易北河一线。然而也正因为有强大的日耳曼集团存在，斯拉夫人向西扩张的空间始终有限。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崛起，这部分“让”给斯拉夫人的土地，也逐渐被日耳曼人收复。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人和波罗的海的存在，亦让“北斯拉夫人”几乎不可能出现（最多消化掉部分波罗的人）。

既然西、北两个方向的扩张力度有限，那么斯拉夫人崛起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东、南两个方向了。由于东欧平原北部，原为文明层级更低（渔猎）状态的乌拉尔人所覆盖，东斯拉夫人在扩张初期所遇到的人为障碍不算很大（适应气候相对更困难）。若干年后，这部分变身成为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族的“东斯拉夫人”，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最大的。

然而就一开始的情况来说，东斯拉夫人的境遇却是最遭的。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方向不仅远离欧洲文明中心，同时也与亚洲文明区相距甚远。那些往来于东欧平原南部草原的游牧者，倒是有机会经常接触各大文明，只是文明的产生、学习有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定居”。想借助与游牧者的交流步入文明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跟他们做邻居所要承担的压力了）。

第二节 南迁的斯拉夫人的命运

南迁斯拉夫人进入多瑙河中游平原

相比步入蛮荒之地的东斯拉夫人，向南迁徙的“南斯拉夫人”，看起来似乎要幸运的多。最起码他们每迈出的一步，都意味着离文明更近了一步。易北河上游的波希米亚，以及摩拉瓦河流域的摩拉维亚（及东部的西喀尔巴阡山脉南麓），是斯拉夫人南下的第一站。驻足于上述板块的斯拉夫人，成为了今天捷克、斯洛伐特两族的祖先，并与留在中欧平原整合而成的斯拉夫人——波兰人，一起被归类为“西斯拉夫人”。

留在摩拉维亚的斯拉夫人，在后来成就了斯拉夫人历史上的第一个强大国家——大摩拉维亚国。而当日从摩拉维亚继续南下的斯拉夫人，则成为了南斯拉夫人。从阿尔卑斯山脉北麓东流而下的多瑙河，是从西喀尔巴阡山脉与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缺口注入这片低平之地的。因为山地（小喀尔巴阡山）的阻隔，摩拉维亚河也是在这个点上汇入多瑙河的。这个被称之为“匈牙利门”的枢纽点，也成为了多瑙河中、上游的分割点。穿越匈牙利门，南斯拉夫人的祖先算是进入了“多瑙河中游平原”。

基于地理结构、气候的原因，匈牙利门以东的多瑙河中游平原，又被南、北向的多瑙河切割为了两部分：西部的潘诺尼亚平原，以及东部的匈牙利草原。前者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进行了农业开发，后者在斯拉夫人南迁时则还是游牧者的天下。考虑到游牧者的攻击性，很显然即将独立发展的南斯拉夫人并不会考虑去匈牙利草原冒险，而是希望在潘诺尼亚平原寻找机会。



西斯拉夫地缘结构图

公元 5 世纪末，原本定居于潘诺尼亚的东哥特人，强势进入意大利，并最终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国。其身后所留下的空间，也再一次被斯拉夫人填补。然而想在这场乱局中占个好身位的，并不只有斯拉夫人，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来自匈牙利草原的游牧者。悲剧的是，游牧者在这片低平之地要更据优势。定居者若无罗马帝国那样的组织能力，是很难将他们阻挡在多瑙河以东的。

很多人将罗马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归结于匈人入侵所引发的民族大迁徙。或者说，是因为匈人的入侵，迫使原本羁縻于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进入帝国内部，并在那些直接服务于帝国的日耳曼人的共同作用下引发了混乱。不过在经历过“阿提拉帝国”的短暂辉煌后，原本被匈人勉强整合在一起的草原，也很快陷入了部族林立的分裂状态。经过激烈的竞争，从高加索而来的阿瓦尔人成为了匈牙利草原的主人，并进而控制了整个多瑙河中游平原。

然而游牧民族在定居区的统治总是不那么稳定，在保加尔人进入多瑙河流域（并与当地的斯拉夫人结盟、融合），以及查理曼建立法兰克帝国后，阿瓦尔人在潘诺尼亚的统治受到了严重打击，活动范围逐渐向匈牙利草原萎缩。9 世纪末，马扎尔人的到来，则再一次在多瑙河中游平原掀起了一股游牧扩张潮。当然，后面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在新千年（公元 1000 年）决定归依天主教的马扎尔人，完成了自己的华

丽转身。从一支无法摆脱周期性衰弱规律的“游牧之箭”，变身成为了名叫“匈牙利”的基督教之盾。

南斯拉夫人的分化

在阿瓦尔人、马扎尔人的冲击之下，南迁入潘诺尼亚乃至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人”，逐渐与“西斯拉夫人”切断了地缘的联系。匈牙利人与天主教世界的和解，以及他们所能够发挥的特殊作用（游牧基因），又让斯拉夫人与匈牙利人竞争潘诺尼亚时处于下风。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人的生存空间，不可避免的向巴尔干方向挤压了。基于巴尔干半岛复杂的地形，以及多方势力交错的地缘位置，南斯拉夫人最终分解成为了现在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的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波斯尼亚人，以及吸收了游牧基因的保加尔人等族。相比各自仅分为三族的西、东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内部的结构可谓复杂的多。



多瑙河中游平原

凡事都有个起点，族群的分化也是如此。那么南斯拉夫人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开始第一次分化的呢？顺着斯拉夫人南迁的轨迹，我们的视线被带向了潘诺尼亚平原的西南部。在这里，南北向的多瑙河在接收了源自阿尔卑斯山的支流——德拉瓦河之后，开始转而向东流淌，并最终透过铁门峡谷进入瓦拉几亚（平原）。 不过这并不代表在德拉瓦河之后，多瑙河就再也享受不到阿尔卑斯山的润泽了。事实上，在注入铁门峡谷之前，多瑙河右岸在今天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位置上，还接收了一条源自阿尔卑斯山的支流——萨瓦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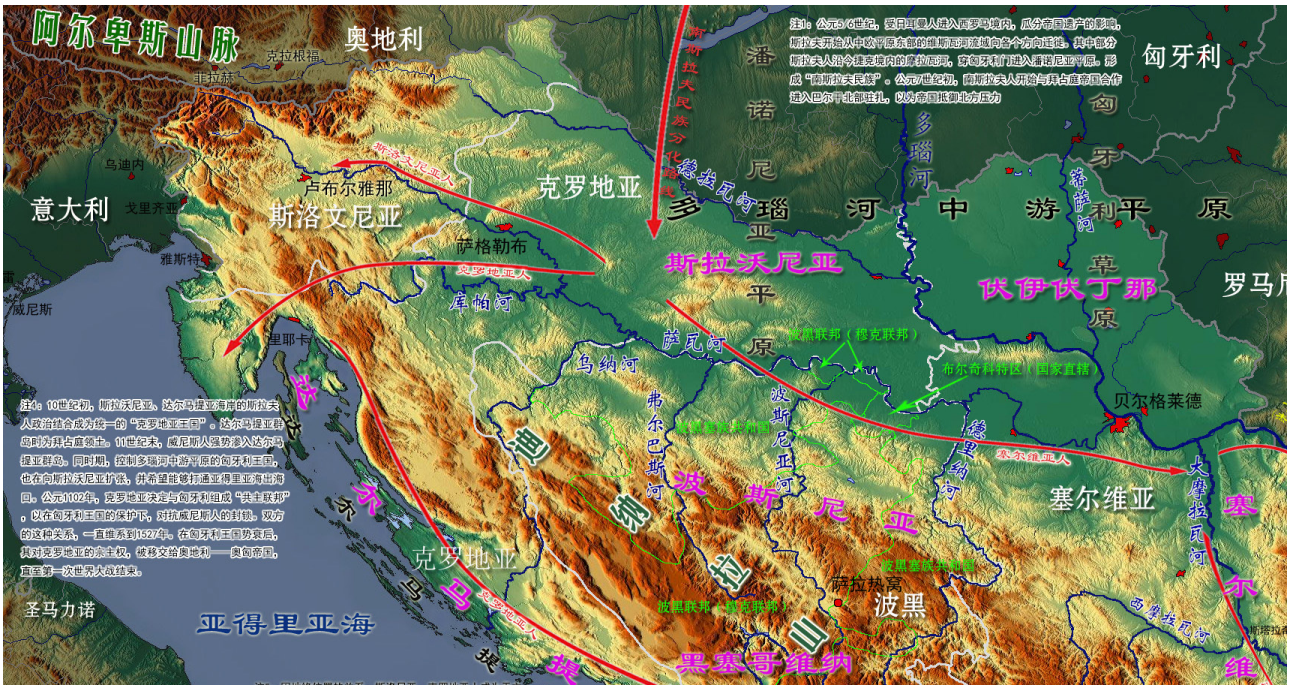
尽管源头指向阿尔卑斯山脉东南部，但萨瓦河水却主要是由巴尔干北部山地“迪纳拉山脉”所供给的。在地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迪纳拉山脉北坡的河流，几乎都北向注入了萨瓦河。关于“巴尔干地区”的范围，或者说北部边界在哪，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说法。从地理关系来看，南向承接巴尔干山地之水的萨瓦河，及其东向的多瑙河应该是最有资格充当这条地缘分割线的。不过被定位为“巴尔干民族”的南斯拉夫人，却并非是在萨瓦河之南开始分化的，今天我们说到“巴尔干”或者南斯拉夫

这个地缘概念，它的界限一般也会扩张到德拉瓦河。而萨瓦河与德拉瓦河之间，这片丘陵广布的多瑙河中游平原区，也有一个与“斯拉夫”（slav）关系极为密切的名称——斯拉沃尼亚（slavonia）。

第三节 克罗地亚王国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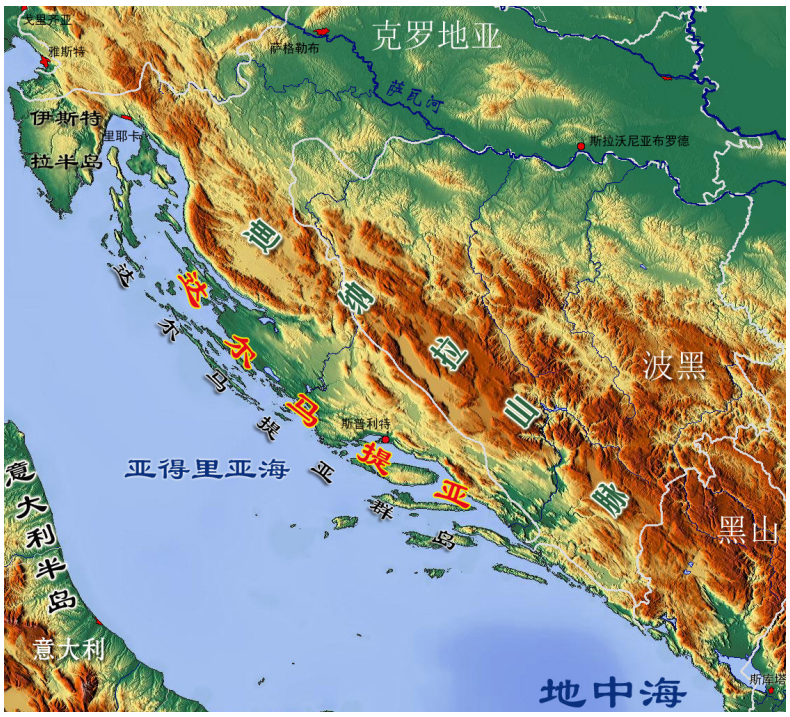
斯拉夫人迁移至斯拉沃尼亚和达尔马提亚

相信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很多源自西方的地名会带有一个“尼亚”（nia）的后缀。这个词尾最初的来源，是拉丁、希腊语中的 ia。意译的话，就是“之国”（之地）了。顺便说下，根据 ia 前一个字母的不同，这个后缀也经常被拼作 lia（利亚）、ria（里亚）、sia（西亚）等音。也就是说，类似罗马尼亚、利比里亚、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国名，都是西方人按照一个模式设计出来的。至于“斯拉沃尼亚”的意思，直译过来就是“斯拉夫人之国”了。



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

关于斯拉沃尼亚这个标签，是什么时间用在萨瓦河与德拉瓦河之间这片土地上的，并不十分确定。不过结合这一板块在诸“南斯拉夫”民族中的地缘位置，将之定位为南斯拉夫诸族分化的原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进入斯拉沃尼亚之后的斯拉夫人，大体上有三个方向可以继续他们的迁徙之路：一是沿萨瓦河向西上溯，然后穿越阿尔卑斯山脉与迪纳拉山脉之间的丘陵地带，进入意大利半岛。历史上由东向西入侵意大利半岛的民族，基本都遵循此线路（如匈人、东哥特人）；二是横渡萨瓦河，翻越迪纳拉山脉北端较薄弱的山体，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三是继续向南、东南方向渗透，在迪纳拉山脉与黑海－爱琴海之间寻找机会。



达尔马提亚群岛示意图

向意大利方向移动对斯拉夫人的运气不大好，在他们之前以东哥特人为代表的日耳曼人，已经在意大利半岛乃至整个西罗马故地上补位成功。如果从公元前 2 世纪末的辛布里战争算起，日耳曼人花了 500 年时间才算等到这个机会。此时再想要进入意大利半岛分一杯羹，几乎没有可能。正因为如此，向意大利方向迁徙的斯拉夫人，最终止步于萨瓦河上游，阿尔卑斯山脉与迪纳拉山脉相接的这片山地中。并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斯洛文尼亚人”。

相比斯洛文尼亚人，向西迁徙至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的斯拉夫人，则获得了更大的空间。这片位于迪纳拉山脉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沿海地区，整体被称之为“达尔马提亚”。内部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伊斯特拉半岛而起的，被称之为“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巴尔干半岛沿海地区；二是长度与其几乎对等的一条群岛带——达尔马提亚群岛。在威尼斯部分我们曾经解读到，达尔马提亚是威尼斯人海外扩张的第一站，也是其势在必得的版块，而匈牙利人曾经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不过这两个海、陆两大强国，最终都没有能够消化这片土地，笑到最后的，是比他们先一步入主这片土地的南斯拉夫民族——克罗地亚人。

克罗地亚王国统一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包括达尔马提亚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亚得里亚海沿岸，曾经是被一支被称之为“伊利里亚人”的印欧语部族所控制。在经历过罗马的统治之后，商业价值巨大的达尔马提亚一带，基本完成了罗马化进程。罗马帝国甚至有一段时间（268 ～ 284），前后有 7 个皇帝来自伊利里亚（史称“伊利里亚王朝”）。这些军人出身的皇帝，曾经一度帮助分裂的罗马抵御住日耳曼蛮族的入侵。

东哥特人在进入意大利半岛毁灭西罗马帝国之前，曾经经营过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地区。这两个板块加上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大体就是后来东哥特王国的范围。公元 6 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攻灭东哥特王国之后，不久便在新来的日耳曼蛮族——伦巴第人的压力下，退出了意大利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不过由于拜占庭的海上优势，威尼斯、意大利南部、达尔马提亚这些重要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仍然长期为拜占庭所控制。再后来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势衰的拜占庭和分裂的意大利，给了威尼



克罗地亚王国（公元 10 世纪）

斯商人坐大的机会，而同为东罗马帝国遗产的达尔马提亚，成为了威尼斯势在必得的板块。

公元 7 世纪初，在君士坦丁堡重建统一罗马帝国的梦想彻底破灭后，转而准备安心做一个东地中海的“拜占庭帝国”时，已经渗透到萨瓦河以南的斯拉夫人，被允许进入了达尔马提亚地区，以在战略上抵御日耳曼人和阿瓦尔人的压力。稍早的时候，在巴尔干半岛的东北部，斯拉夫人也得到了同样的授权。当然，即使拜占庭帝国不这样做，相信也很难阻止斯拉夫人的渗透。

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两支“蛮族”的先后到来，严重挤压了原来的“拉丁化伊利里亚人”的生存空间。公元 10 世纪初（公元 925 年），完成斯拉夫化进程的达尔马提亚海岸与斯拉沃尼亚在政治上统一，建立了以“克罗地亚”为名的王国。今天轮廓呈奇怪 n 型的克罗地亚共和国领土，其内部也正是由这两部分所组成的。统一即意味着强盛，而强盛往往又意味着对外扩张。在鼎盛时期，今天的波黑、黑山两个前南斯拉夫国家，也曾经是克罗地亚王国的征服区。

第四节 克罗地亚王国并入匈牙利

匈牙利和威尼斯对克罗地亚的地缘压力

相比向巴尔干山区的扩张，克罗地亚人当然更希望向地势平坦的潘诺尼亚扩张了。鉴于这个方向属于罗马教庭的势力范围，如何取信于罗马显得非常重要。事实上，在克罗地亚人获得独立地位时，他们就已经心向罗马了（尽管基督教正式分裂是在 11 世纪中叶）。克罗地亚王国的建立，一如波兰、匈牙利等国一样，得到了罗马教庭的正式认定。这种拉丁化的选择，很大程度也与拜占庭帝国，以及保加利亚王国对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企图有关，克罗地亚希望以此从西欧方向获得自己独立的支撑。

然而在克罗地亚王国希望自己成为“南斯拉夫人”的政治代表，并大展拳脚时，马扎尔人的到来，却给了克罗地亚人当头一棒。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进入匈牙利草原的游牧民族，总是会对富庶的潘诺尼亚平原有所企图的。马扎尔人如果沿袭游牧入侵的路线，他们对克罗地来人的压力并不会一直存在。真正能够对斯拉夫人经略潘诺尼亚够成压力的，还是能够从意大利、日耳曼尼亚两个方向渗透潘诺尼亚的日

耳曼人。问题是，游牧的马扎尔汗国很快也完成了华丽转向，变身成为了天主教世界的“匈牙利王国”。

从族群博弈的层面来看，日耳曼人更愿意看到，在南北两支斯拉夫势力中间，夹着一个异类般存在的匈牙利人，以避免在自己的东方出现强大的斯拉夫人集团。更何况这一转变能够解决掉长久以来的东方游牧威胁。基于二者战略上的连横关系，匈牙利很快成为了潘诺尼亚的主导者，并且对克罗地亚人的北方安全构成强大压力。尽管匈牙利是一个标准的内陆国家，但处在欧洲这样一个以海洋文明氛围浓厚的区域，这些马上得天下的新基督徒，也同样希望能够拥有一段海岸线。就地缘位置来说，对接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以及濒临黑海的瓦拉几亚，是匈牙利最有可能完成匈牙利海洋梦的板块。相比后者，能够直通地中海，并且与罗马城所在的意大利半岛隔海相望的后者，显然更能激起匈牙利人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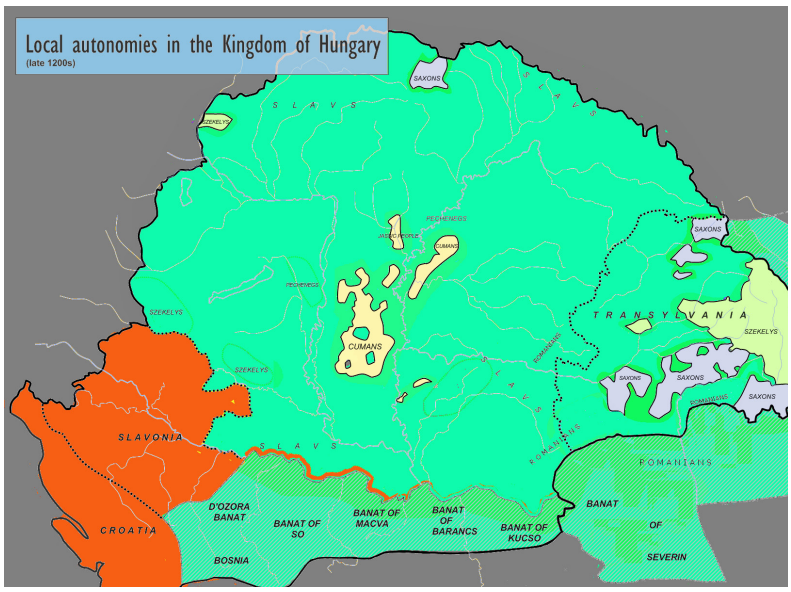
更显悲剧的是，克罗地亚人的压力并不仅仅来自于陆地。在克罗的亚人独立之时，拜占庭帝国仍然控制着达尔马提亚群岛的大部分岛屿。而同样属于拜占庭势力范围的威尼斯，也一直在觊觎着达尔马提亚的贸易利益。公元 11 世纪末，塞尔柱人对小亚细亚的入侵，不仅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实力，更在西欧引发了包括十字军东征在内的，一系列的地缘政治事件。其中对克罗的亚影响最大的，就是近在咫尺的威尼斯人，取代远在爱琴海的拜占庭人，成为了争夺达尔马提亚的海洋势力代表。自此时起，时运不齐的克罗地亚，便成为了匈牙利与威尼斯相争之地。

天主教国家的身份，一定程度能够保证克罗地亚王国的存在，毕竟作为天主教世界的宗主，教廷原则上并不希望天主教国家相互倾轧。然而政治就是政治，这即不会妨碍匈牙利人在斯拉沃尼亚方向，侵蚀克罗地亚的领地；也不能阻止威尼斯商人，渗透达尔马提亚海岸。前者的游牧基因，使之拥有欧洲最为精锐的骑兵，后者则在竞争中逐步成长为，欧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夹在这海、陆两大强邻之间，克罗地亚人面临着一个二选一的必选题。

克罗地亚王国以共主联邦形式并入匈牙利

基于贸易本性，威尼斯人的目标只是达尔马提亚的海岸线（以垄断克罗的亚的贸易），即使与克罗地亚人结盟，也不会真的出力保证克罗地亚的安全。如果匈牙利王国肯放弃往达尔马提亚扩张，相信威尼斯人会毫不犹豫的把斯拉沃尼亚“卖”给匈牙利人的。即使这种最坏的结果没有出现，被封闭为一个完全内陆国的克罗地亚，利益也将受到极大的损害。至于匈牙利人，反过来将达尔马提亚卖给威尼斯人的风险要小的多（并不代表无风险，300 年后匈牙利人的确也这样做了。原因后面会解读）。如果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妥协，即在承认匈牙利宗主权的前提下（同时承担一定义务），保证克罗地亚的实际独立地位，那么与匈牙利人结盟倒是更为有利。

最终克罗地亚人，也的确用上述形式成为了匈牙利的一部分。公元 1102 年，匈牙利国王以“共主联邦”的形式，成为了克罗地亚人的君主。自此以后，克罗地亚在



匈牙利王国（含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国旗

保持内部独立的前提下，将军事、外交权力交付给了匈牙利。类似的组合，在欧洲并不罕见。比如前面解读过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卡尔马联盟”、“波兰－立陶宛联邦”，以及最为知名的“奥匈二元帝国”。不过匈牙利－克罗地亚共主联邦的组合，要比它们早得多罢了。

比之后来的组合，“匈－克”组合不仅时间更早，延续的时间也是最长的，一直保持了 400 多年的时间，直至 16 世纪初（公元 1526 年），匈牙利王国被奥斯帝国击溃、解体时方告终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中世纪的地缘政治舞台上，几乎看不到“克罗地亚”这个地缘政治标签的原因。尽管这样做似乎有些遗憾，不过克罗地亚人的选择，以及普遍存在于西欧天主教世界的，模块式地缘政治组合方式，却在地缘上保证了克罗地亚人的独立存续与发展。以至于一直默默无闻的克罗地亚，今天能够成为一个有历史可以追溯的独立国家。比如很多克罗地来人相信，他们国旗上红白相间的格子盾徽，是源自于 1000 多年前的克罗地亚王国（足球迷应该对克罗地亚的红白格子有印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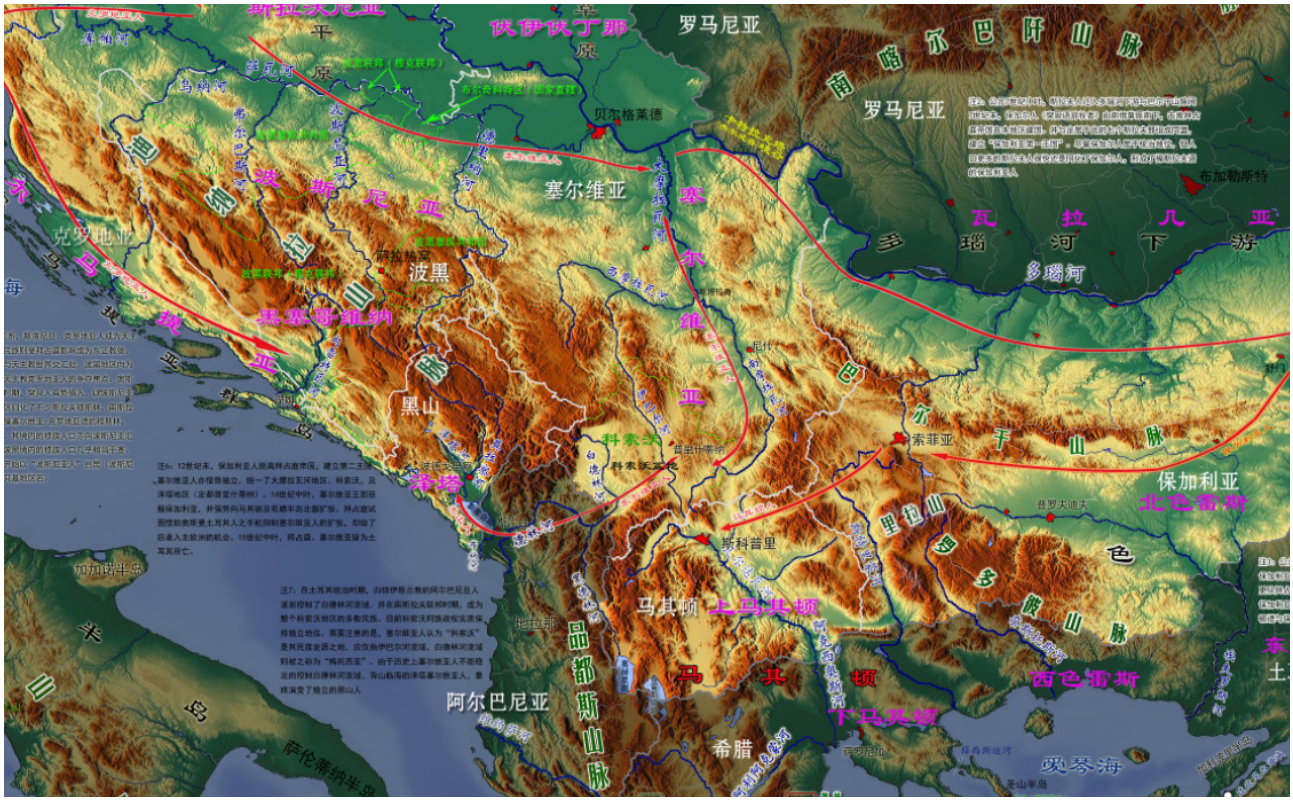
在天主教诸强的阴影下，克罗地亚人没有能力替斯拉夫人出头，那么向东南方向，也就是拜占庭方向渗透的斯拉夫人，有没有机会在政治上做得更好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五节 波黑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地缘结构

波斯尼亚的地缘结构

巴尔干半岛地缘结构的复杂性，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从最基本的山形水势入手，有助于我们拨开迷雾，厘清纷杂的局面。大多数的半岛本身都是一条延伸入海洋的山地，在岁月和雨水的冲刷下，风化的泥土渐次沿大陆架向海洋深处延伸，并形成最有

利于人类开发的冲积平原。巴尔干半岛也是如此，它的主脉是又被称之为“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的迪纳拉山脉。在缺乏山脉的欧洲，这条在中国人看来实在上不了台面的山脉，体量也能排在前四。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我们提到迪纳拉山脉，指向的都是它在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主脉。而它向东、南延伸的部分，则分别有罗多彼山脉、品都斯山脉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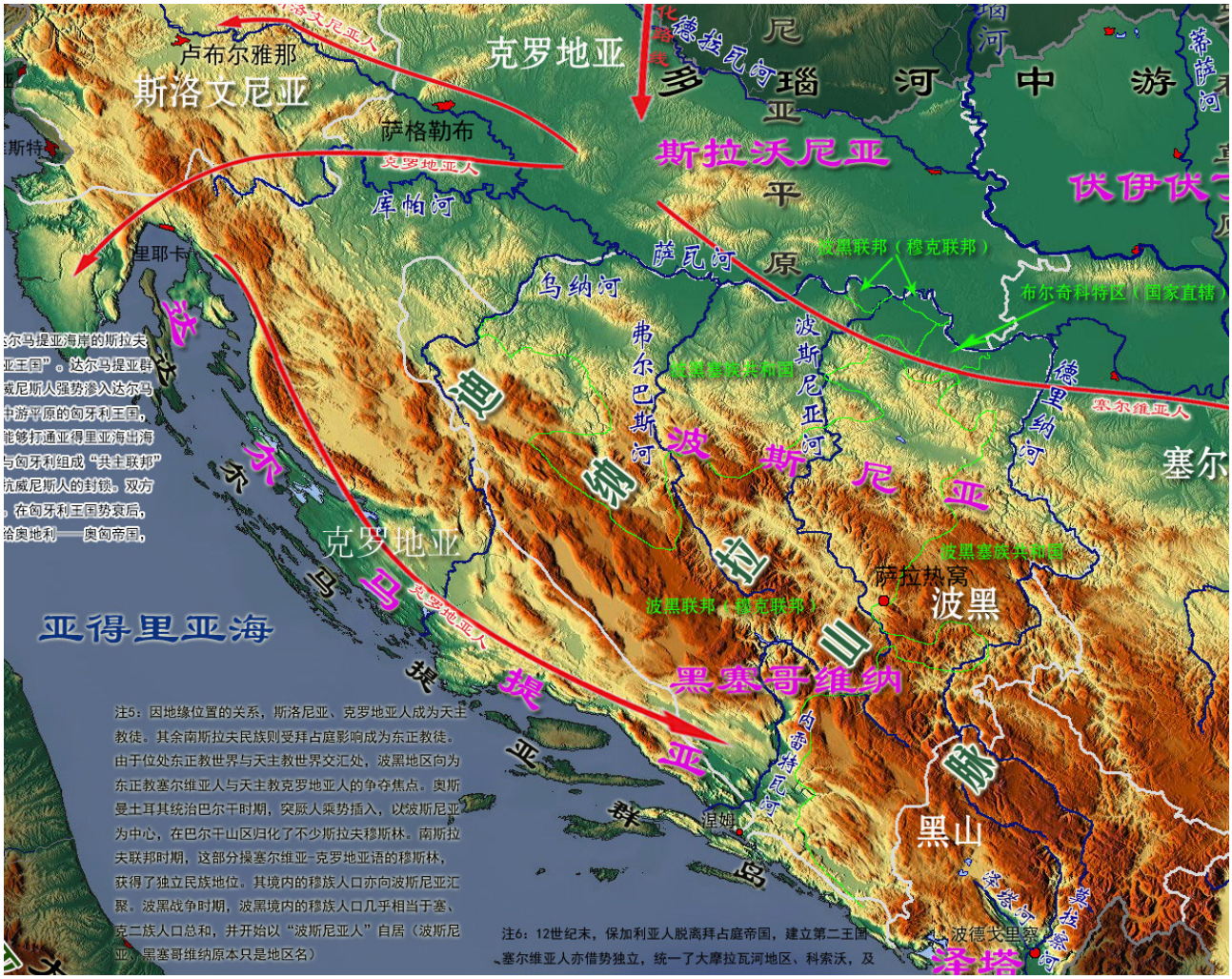


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

在欧洲古典文明史中，迪纳拉山脉主脉对边缘低地所发挥的作用，远不如孕育了古希腊文明的品都斯山脉、分割马其顿与色雷斯的罗多彼山脉那般大。最早控制迪纳拉山脉沿海部分的伊利里亚人，更多是以文明破坏者（海盗）之名，见诸于历史记载，而斯拉夫人覆盖下的迪纳拉地区，也一直以“欧洲火药桶”闻名于世。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所谓的“南斯拉夫”是怎么一步步的变成火药桶的。

从斯拉沃尼亚进入巴尔干的斯拉夫人，首先要进入的是萨瓦河与迪纳拉山脉之间的山麓地带。这是一条从阿尔卑斯山脉，延伸至南喀尔巴阡山脉的山脉丘陵平原区。除了最东部的大摩拉维亚河是直接注入多瑙河以外，其余从迪纳拉山脉北坡流淌而下的河流，都成为了萨瓦河右岸支流。这些河流由西向东排序的话，主要有：库帕河、乌纳河、弗尔巴斯河、波斯尼亚河、德里纳河。对于向达尔马提亚迁徙的克罗地亚人来说，最西侧的库帕河最为重要。这条河流所指向山体，是迪纳拉山脉的最薄弱处。克罗地亚人最初就是透过库帕河上游地区，进入伊斯特拉半岛南部，然后向达尔马提亚渗透。今天克罗地亚境内的两大板块（斯拉沃尼亚、达尔马提亚），在迪纳拉山脉的连接部，也正是库帕河上游所对应的山地部分。

在库帕河以东的萨瓦河右岸支流中，大家会在居中的位置看到一个熟悉的标签“波斯尼亚”。没错，今天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并引发一场残酷战争的“波黑” 地区（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中的“波斯尼亚”，名称正是来源于这条河流。在脑海中搜索 1914 年发生在波斯尼亚河上游城市“萨拉热窝”（也是波黑的政治中心）的那场著名政治刺杀事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个板块的了解。



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地缘关系

从地理角度出发，波黑的范围可以归纳为：从乌纳河到德里纳河的，萨瓦河右岸流域区。换句话说，在此两河范围内，迪纳拉山脉分水岭以北——萨瓦河之间的区域，即为波斯尼亚。那么，现在与波斯尼亚捆绑在一起的“黑塞哥维纳”又是哪里呢？很简单，迪纳拉山脉分水岭以南的山地区，就是黑塞哥维纳了。今天你去看波黑地图，就会发现几乎必须用放大镜看，才能在达尔马提亚沿岸，找到一个出海口（后面会解读来龙去脉）。

正常情况下，高大山脉的分水岭很容易将山脉两侧，分割为两个不同板块的。依照这个原则，波斯尼亚似乎应该跟斯拉沃尼亚结合成一个地缘政治体；而黑塞哥维亚与达尔马提亚，在一起才更为合理。然而达尔马提亚群岛的存在，却让巴尔干半岛西

北部的地缘政治格局，趋向复杂化。对于海商包括海盗（有时候二者并无明显界限）来说，达尔马提亚群岛实在是太适合作为据点了。这条岛链的存在，不仅能够让强大的海洋势力，能够垄断迪纳那山脉及其北部地区的海上贸易通道，更让他们有机会进一步把势力延伸至达尔马提亚海岸，使得整个巴尔干半岛西北沿海地区，成为一个以“达尔马提亚”为名的海洋属性板块。

如果没有达尔马提亚群岛存在，博弈的天平显然会向大陆势力倾斜。即使威尼斯人或之前的拜占庭帝国能够在达尔马提亚海岸获得一些支点，在大陆势力的包围下也很难连成一片。问题在于，这条由 1000 多个岛屿组成的岛链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尽管与匈牙利王国的合并，使得克罗地亚人在大陆后方得到了有利支撑，但作为一个以多瑙河中游平原为基础的巨大陆地国家，匈牙利人在陆地方向，比如与日耳曼属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始终会牵扯更多精力。这意味着，达尔马提亚更像是一个强大时用来锦上添花的添头。一旦匈牙利本身的统治力出现问题，并非属于不可放弃的部分。相反，基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威尼斯对于亚得里亚海对岸的达尔马提亚，却是势在必得。

15 世纪初，乘匈牙利王国的内忧外患之机，威尼斯人终于得到了几乎整个达尔马提亚的控制权，并一直经营到 18 世纪。在威尼斯人控制达尔马提亚期间，利益最为受损的当属以克罗地亚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人了。不仅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不再能够通过海上贸易获利，黑塞哥维纳的“南斯拉夫人”，也被迫在地缘上更倾向于与波斯尼亚的同族加强地缘联系。然而从最本质的地缘属性来看，“波—黑”组合缺乏稳定性的情况是现实存在的。假以时日，又有谁知道“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地缘政治格局，会变成什么样呢？最起码这个经过战争洗礼的国家，当下已实际变成了由塞尔维亚人控制的“塞族共和国”，以及穆、克两族控制的“波黑联邦”两部分。

不过波黑的地缘政治格局即使再重组，也很难简单出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分立的局面。这不仅是因为斯拉夫人内部，分裂为两个互为对手的阵营，更因波斯尼亚东部的迪纳拉山区“伊斯兰化”，变得空前的复杂。要想了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就需要把视线重新转向我们这部分内容的主角——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身上了。

第六节 大摩拉瓦河上游的地理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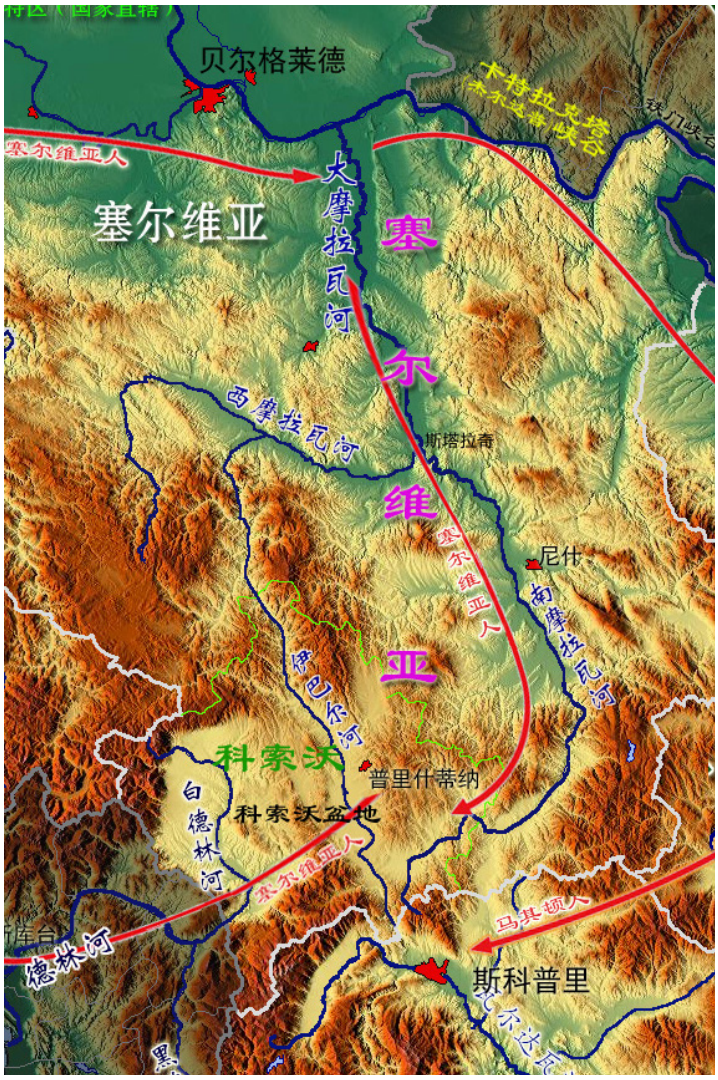
大摩拉瓦河的上源河流

在南斯拉夫族群中，塞尔维亚族的数量最为众多，其总人口比克罗地亚人高出大约一倍。仅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塞尔维亚人之于巴尔干地缘结构的重要性。在最初向巴尔干半岛的迁徙过程中，从斯拉沃尼亚、波斯尼亚方向而来的斯拉夫人，在走出萨瓦河流域之后，遇到一条能帮他们更加接近拜占庭核心区的河流——大摩拉瓦河。而塞尔维亚人，便是这部分斯拉夫人的后代。

看到“摩拉瓦”这个标签，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在匈牙利门与摩拉维亚门之间，那条穿越摩拉维亚，将斯拉夫人带入“多瑙河中游平原”的重要河流，也是叫这个名字。其实正是为了区别于它，多瑙河中游平原之南，将斯拉夫人带出“多瑙河中游平原”的这条摩拉瓦河，才需要要前面加上一个“大”的前缀。就地理、地缘位置来看，两条“摩拉瓦河”是那么的相似，以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年南迁的斯拉夫人是有意识的沿用了这个名称。

相比从波斯尼亚境内，上溯巴尔干半岛的那些河流，大摩拉瓦河中上游河谷要开阔的多。这是因为波斯尼亚境内的河流，都是从迪纳拉山脉的主脉处，直切而下注入萨瓦河的，并没有太多的空间供它们经营。大摩拉瓦河中上游则有所不同，沿着迪纳拉山脉西北麓的丘陵地带蜿蜒北上的河道，要曲折的多。这一方面使得大摩拉瓦河，成为巴尔干半岛流程最长的河流，另一方面也使之总体能够形成更大体量的冲积平原。

与其它大河一样，大摩拉瓦河也有两条上源：一条是从迪纳拉山脉主脉东向而下的“西摩拉瓦河”；另一条则是由南向北，在塞尔维亚中部城市斯塔拉奇与之会合的“南摩拉瓦河”。从流程上来看，两条支流相差无几，所孕育的冲积平原体量也相近。不过与大摩拉瓦河直线连通的南摩拉瓦河，似乎看起来更有机会带着塞尔维亚人的祖先，接近拜占庭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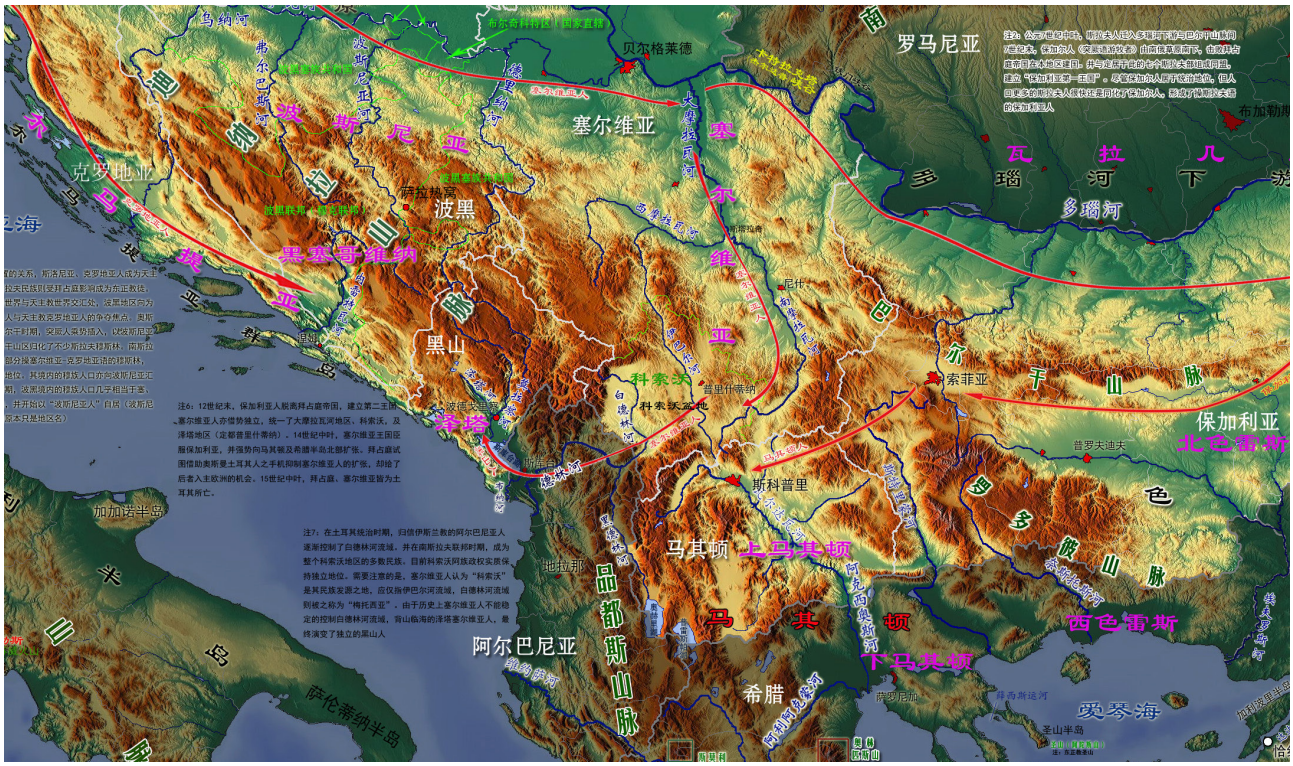
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

摩拉瓦河上游的科索沃平原

中国人喜欢把追溯事物发生的根源，形容为“追根溯源”，通过追溯河流的源头的方式，来探寻人类发展的脉络，也是地缘研究的重要手段。顺着南摩拉瓦河上溯至它的上游部分时，我们会发现，这一区域正是迪纳拉山脉与巴尔干半岛其它山脉的分割处。这些山脉包括：横穿保加利亚中部，东向分割多瑙河下游平原与色雷斯的“巴尔干山脉”；东南向分割色雷斯、马其顿，以及塞尔维亚的罗多彼山脉；南向延伸入希腊半岛的品都斯山脉。

在地理层面上看，除巴尔干山脉一般被认为是南喀尔巴阡山脉支脉以外，其余山体皆为迪纳拉山脉的延伸。

上述山体在巴尔干半岛共同组成了一个“爪”字型的脉脊。如果一定要给巴尔干半岛找个地理中心的话，位于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三国交界处的那段山体，当是有力的竞争者。塞尔维亚境内的南摩拉瓦河，马其顿板块的瓦尔达瓦河（阿克西奥斯河）、斯特里蒙河等主要河流，皆从它所收集的雨水中获益。



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



科索沃平原

然而在巴尔干这片山地密布的半岛上，并没有一个点或者地理单元，能够天然对每一个板块据有地缘影响力。从塞尔维亚人发展的角度来说，迪纳拉山脉与品都斯山脉之间的一片山地盆地区，会更有资格成为他们在巴尔干事业的起点。这片群山环绕

的高山盆地区，有一个想必大家都听闻过的标签——科索沃。我们可以将之称之为“科索沃盆地”或者“科索沃平原”（后者的使用频率更高，不过前者更准确）。

南摩拉瓦河源头所指向的，正是科索沃平原的东南部。事实上，科索沃盆地并非只是南摩拉瓦河的源头所在。西摩拉瓦河的上源——伊巴尔河，也是源自于科索沃平原东部。其在科索沃盆地的流域面积，甚至比南摩拉瓦河要大得多。事实上，纯粹从流程上来看，伊巴尔河——西摩拉瓦河——大摩拉瓦河更应该被定为整个流域的主干（流程略长于南摩拉瓦河水系）。

不管西、南摩拉瓦河谁更有资格，成为大摩拉瓦河水系的干流，科索沃平原在整个流域的地位都已经确立了下来。进入摩拉瓦河流域的斯拉夫人，无论沿哪条支流自然渗透，都会在这片难得的山间平原相会，并结合成统一的塞尔维亚民族。问题在于，仅仅从大摩拉瓦流域内部来看，位于上游的科索沃盆地只是一个边缘板块的定位。除非科索沃能够把塞尔维亚人带入更为富庶、文明的地区。这样的空间是现实存在的。进入科索沃盆地的塞尔维亚人马上就会发现，他们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有机会复制当年 “马其顿帝国”的成功之路。

第七节 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在马其顿的扩张

斯科普里盆地的地缘位置

我们知道，马其顿板块位于希腊半岛与色雷斯平原之间。其沿爱琴海的低地部分，由斯特里蒙河、阿克西奥河（上游被称之为瓦尔达瓦河）、阿利阿克蒙河等河流的下游冲积而成，被称之为“下马其顿”；位于高地的上游部分，则被称之为“上马其顿”。古马其顿王国崛起于下马其顿。不过生活在上马其顿的高地民族，很显然为著名的马其顿方阵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当然，基于文明的向心力，古马其顿人是非常想成为古希腊的一部分的。尽管古希腊诸城邦内心深处，长期以来视马其顿人为蛮族，不过在腓力二世和他那神一般存在的儿子“亚历山大”之后，再没有哪个希腊人会愿意把马其顿排除出希腊的概念了。

如果要为上、下马其顿地区找一条核心河流的话，那么希腊境内（下游）称阿克西奥斯河、马其顿共和国境内称瓦尔达瓦河的这条河流，应该是当仁不让的了。与科索沃盆地在大摩拉瓦河流域的情况类似，阿克西奥斯——瓦尔达瓦河上游，也有一个这样的高原平原区——“斯科普里盆地”（体量相对小很多）。这个高地平原区之于上马其顿的重要性，可以从它今天的人口和政治地位看出：今天位于上马其顿地区的“马其顿共和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此。同时盆地的中心城市“斯科普里”，也是马其顿首都的所在地。

在亚历山大帝国时期，斯科普里盆地是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北部控制终点。对于在欧亚大陆文明区有无限想象空间的马其顿来说，并没把精力耗费在北部这片荒蛮之

地。然而对于入主科索沃盆地的斯拉夫人来说，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斯拉普里离科索沃是那么的近，近到你从西、南摩拉瓦河的源头处出发，只需翻越一个山口，就能看到这片富庶的平原。而控制瓦尔达瓦河和上马其顿，能够给斯拉夫人多大的想象空间，相信已是不言自明了。



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

保加利亚王国经营马其顿地区

其实斯拉夫人并不需要从那么久远的历史（亚历山大帝国）汲取经验，在他们之前的进入扩张期的保加利亚第一王国，在向西扩张至大摩拉维亚河流域之后，就已经在斯科普里定都（10 世纪末），并以上马其顿为基地与拜占庭帝国展开对抗。而在保加利亚第一王国为拜占庭帝国所灭之后，王国的马其顿部分仍然顽强的保持着独立，并建立起“西保加利亚王国”。

从多瑙河而来的保加尔人，之所以能够比塞尔维亚人先崛起，甚至长期统治大摩拉瓦河的塞尔维亚人，盖因为他们的游牧基因。塞尔维亚人并非最先被保加尔人征服的斯拉夫人。在向大摩拉瓦河流域迁徙的同时，一部分斯拉夫人也在继续沿多瑙河而下，进入多瑙河下游平原南部。这种迁徙本身也是得到拜占庭帝国允许的，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帝国抵御从多瑙河以北而来的游牧民族。然而这一策略很快便以失败而告终。公元 7 世纪末，南下的突厥语族游牧者——保加尔人，与居住于多瑙河下游的七个斯拉夫人部落结成了同盟（或者说征服了后者），并开启了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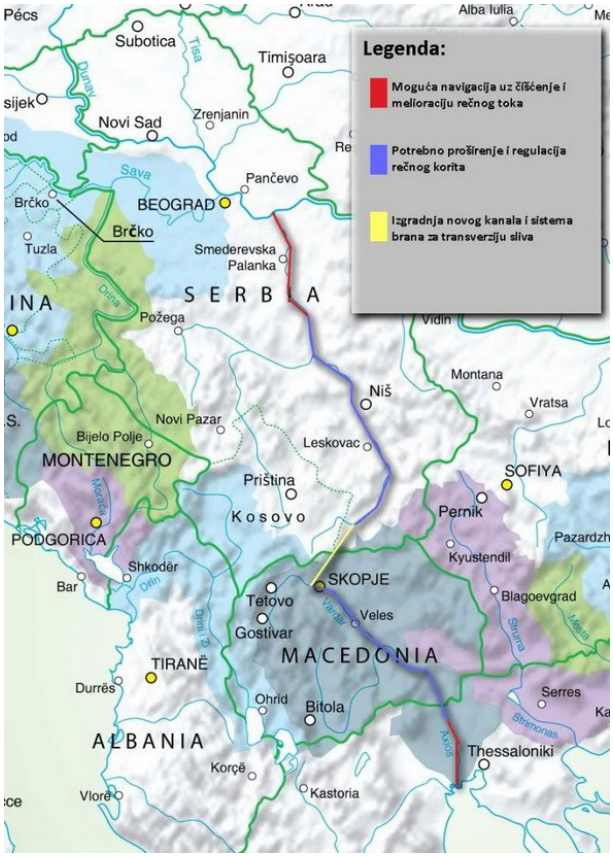
由于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经营历史，今天在南斯拉夫语支内部，马其顿语与保加利亚语的关系要更近，同属东部亚语支，其它南斯拉夫语则都属于西部亚语支。从这也可以看出，在上马其顿地区斯拉夫化的进程中，最初发挥作用的是斯拉夫化的保加

尔人。或者说“斯拉夫马其顿人”（以区别于古马其顿人）的源头，是来自保加利亚境内那 7 支斯拉夫人部落。

塞尔维亚人在马其顿地区的扩张之路

在保加利亚第一王国被拜占庭帝国击败之后，塞尔维亚人随之继续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附庸。不过有着强烈复兴愿望的保加利亚人，在公元 12 世纪末借拜占庭帝国被小细亚亚的突厥人削弱之机独立成功，再次建立了保加利亚第二王国。借助二强相争之机，塞尔维亚人也获得了两面下注，并且乘势崛起的机会。能够摆脱龙套地位，塞尔维亚人还要感谢一下蒙古人。因为在蒙古人统一南俄草原之前，兼具农、游优势的保加利亚人，一直对北方松散的突厥系游牧部落拥有战略优势。而金帐汗国的建立，无疑让保加利亚第二王国的北方防线变得岌岌可危。这意味着，仍然在与拜占庭帝国纠缠不清的保加利亚人，必须同时面对两线作战的局面。

本来被保加利亚人视为小弟的塞尔维亚人，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正如我们之前所解读的那样，14 世纪叶叶，保加利亚反而成为了塞尔维亚王国的附庸。走上崛起之路塞尔维亚人，先是在政治上控制了科索沃盆地，将伊巴尔河东侧的城市“普里什蒂纳”，变身成为了塞尔维亚王国的首都（今天科索沃的首府也是普里什蒂纳）。14 世纪中叶，向拜占庭帝国强势扩张的塞尔维亚人，完成了计划的第二步：沿着瓦尔达瓦河——阿克西奥斯河，完成了他们进军爱琴海的愿望。此后以帝国自居的塞尔维亚，顺势将帝国的首都放在了更有利于南扩的斯科普里。



摩拉瓦运河示意图

不幸的是，塞尔维亚人的扩张之路刚刚开启，便迎来了土耳其的西扩。他们在爱琴海的势力扩张，也如昙花般转瞬即逝。今天，在经历过 20 世纪末的风风雨雨后，继承前南斯拉夫主体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更是被完全封闭成为了一个内陆国。然而这并不代表，塞尔维亚人就不想通过其它方式，打通他们的爱琴海之路。基于摩拉瓦河与瓦尔达瓦河源头是那么的接近，多年来塞尔维亚人一直希望，能够在二者之间凿通一条运河——摩拉瓦运河。这样的话，从地中海、爱琴海方向海运而来的货物，就能够从下马其顿的塞萨洛尼基港（萨罗尼加，希腊境内）进入阿克西奥斯河口，最终透过大摩拉瓦河打通与整个多瑙河流域的通路。

假如“摩拉瓦运河”能够成功的话，

原本没有海洋优势的塞尔维亚，将一跃成为多瑙河流域连通地中海的枢纽板块，经济及地缘政治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基于正在全球崛起的中国，也一直希望向西延伸“丝绸之路”，塞尔维亚人把兴建运河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人身上。从资金、技术及战略上考虑，中国人也的确是最可能合作的对象。然而在地缘政治结构复杂的巴尔干，想要完成这样的大工程，政治上需要考虑的问题要复杂的多。最起码，我们刚才解读到的科索沃，似乎就很有可能成为这条运河的拦路虎。事实上，科索沃之于塞尔维亚的地缘价值，并非仅仅在于打通爱琴海通道的问题上。

第八节 塞尔维亚人渗透黑山地区

塞尔维亚向亚得里亚海海岸渗透以获取出海口

从地缘角度看，伊巴尔河与科索沃盆地对塞尔维亚民族来说都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科索沃”，范围却并不止于伊巴尔河或者说整个大摩拉瓦河上源地区，它的西部还有一条地缘属性迥异的河流——白德林河。简单点说，今天的大家所认定的“科索沃”，大体是由两部分所组成的。即西科索沃的白德林河流域，以及东科索沃的伊巴尔河流域。二河之间只是散布着一些丘陵，并无高大山脉分割，这使得二者有机会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地缘范畴。需要说明的是，在当下的塞尔维亚人看来，真正的科索沃应该仅指东科索沃，而西科索沃则应使用另一个叫做“梅托西亚”的标签。至于为什么塞尔维亚人要这样强调，我们后来会解读到。



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

先来看看，进入白德林河后，塞尔维亚人会走向何方。看到这个“白”的前缀，很多人一定会想，是不是还有一条“黑德林河”。的确如此，如“新西兰”（海外华人一般以其音译应为“纽西兰”）一类音、意结合的译名一样，黑、白二字也是意译。其中白德林河发源于西科索沃，黑德林河则沿着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交界处的山地北行，二者在进入入今阿尔巴尼亚境内后，合流成为“德林河”，再从迪纳拉山脉与品都斯山脉之间的缺口处，西流注入亚得里亚海。

因为山、海分割的关系，整个



巴尔干半岛沿亚得里亚海地区示意图

巴尔干半岛的亚得里亚海海岸区，大体可以分为三段：北段为与达尔马提亚群岛相对应的“达尔马提亚海岸”，今天绝大部分为克罗地亚所有；南段大体对应古希腊文明区的“伊庇鲁斯”的海岸区，范围从阿尔巴尼亚最南部沿海的“萨兰达区”起，至希腊境内；今天黑山共和国及阿尔巴及亚境内的沿海平原，则位于中段。德林河下游所处的位置，正是中段海岸的北部。

仔细观察地形图会发现，巴尔干半岛南、北两段沿海地区都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有一条南北纵深与之几乎对等的岛链相邻，包括北段的达尔马提亚群岛，以及南段的爱奥尼亚群岛。很显然，岛链的存在对海洋文明属性的族群、政治体更为有利。凭借海军的保护，海外而来的殖民者，不仅能够安全的经营海岛，同时也有机会渗透并控制至对应的海岸区。拜占庭、威尼斯对达尔马提亚的千年经营，以及伊庇鲁斯的古希腊化，本质都受到这种地理结构的影响。相比之下，在没有群岛庇护的中段海岸，博弈的天平就会向有山地庇护的大陆势力倾斜。

从陆地渗透的角度来说，在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这些天主教斯拉夫人，垄断了从迪纳拉山脉北部山体薄弱处，进入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的机会之后，德林河谷是隶属拜占庭－东正教系统的塞尔维亚人，最有可能冲破高大山脉阻隔，向西获得地中海出海口的通道；而从防御海上威胁的角度来说，在没有群岛作为跳板的情况下，拜占庭、威尼斯又都很难对德林湾南北发挥影响力。



伊利里亚位置图

古伊利里亚人在德林河下游的存在

虽然从德林河谷突破获得出海口，是塞尔维亚人在地缘上的最佳选择，但却并不代表这个方向就没有任何阻力了。作为一个公元 7 世纪才向巴尔干半岛迁徙的族群，斯拉夫人并没有可能发现无主的“新大陆”。在德林河下游及整个中段海岸与之竞争的原住民势力，就是古伊利里亚人的后裔——阿尔巴尼亚人。事实上，“伊利里亚人”之名，最早正是源起于古希腊人，在登陆德林湾时发现的一支部落。最初的伊利里亚王国，也是崛起于阿尔巴尼亚境内。

由于东部有高大山脉庇护，西部又无岛链封锁，在古希腊时期，无论是雅典引领的海权时代，还是马其顿人异军突起的陆权时代，都没有办法征服品都斯山脉——亚得里亚海之间的这片土地。公元前 3 世纪，借助希腊文明衰弱，而罗马文明尚在与迦太基人争霸西地中海之机，从古希腊人那些汲取了文明因子的古伊利里亚人，开始进入王国时代，并走出阿尔巴及亚海岸向达尔马提亚地区扩张。只不过在罗马人和希腊人看来，这些伊利里亚人并不是商业规模的遵守者，而更多是以一种海上野蛮人——海盗的形象，为害地中海的政治、贸易秩序。

解除迦太基的威胁后，罗马向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扩张的第一战，正是攻灭古伊利里亚王国的战争。在强大的罗马碾压下，地域狭小的阿尔巴尼亚并没有可能幸免。然而征服并不代表同化，相比之前被纳入伊利里亚人势力范围的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地区所处的中段海岸部分，罗马化的进程要困难的多。尤其对于复杂山地的统治，向来是征服者最为头疼的事情。在古马其顿王国时代，亚历山大和他们的祖先们曾经多次试图征服阿尔巴尼亚的伊利里亚人，但最终都只能止步于品都斯山脉分水岭。这意味着纵使从海上而来的罗马人，依托海上优势和强大的战争潜力，控制沿海平原，并拉丁化沿海那部分相对“文明”的伊利里亚人，但在帝国势力消退后，退守于品都斯山地的伊利里亚人后裔，也很快会重新控制这一区域（阿尔巴尼亚人自称为“山鹰之子”，便是几千年来依托山地顽强生存的佐证）。

罗马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塞尔维亚人能够做到吗？向南还是向北，是从德林河下来的“南斯拉夫人”面临的问题。在试错的心理下，他们当然会向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尝试。问题在于，南向迁徙的塞尔维亚人将遇到和罗马人一样的战略问题。相比之下，在德林湾以北，受迪纳拉山脉庇护的这片沿海平原寻求突破，机会要更大些。如果按照今天的政治划分，这个方向所指向的，就是从前南斯拉夫联邦分裂出来的黑山共和国了。从这个结果来看，斯拉夫人应该已经经略成功了。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第九节 黑山地区的地缘结构

斯库台湖的存在和其形成

德林河并非是唯一注入德林湾的河流，还有一条与之紧密相连的河流——布纳河，从海湾的北部注入亚得里亚海。两条河流的距离是如此的之近，以至于在自然力和人力的作用下，今天的德林河水有部分是通过布纳河出海的（也就是说有两个出海口）。不过比之流程将近 300 公里的德林河，想在地图上找到长度仅 40 公里的布纳河是有些困难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条河流的风头，完全被一个中继湖——斯库台湖给抢了。



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

作为巴尔干地区最大的湖泊，斯库台湖距离海洋的直线最短距离，仅仅为 12 公里。将之与亚得里亚海分割开的，是其西侧一条从迪纳拉山脉延伸出来的狭长山体。借助湖南端的布纳河，从湖中满溢出来的湖水得以注入亚得里亚海。这种地理结构，很容易让人猜测，斯库台河在地质时代是不是曾经是一个海湾。事实也的确如此，斯库台湖正是一个因为泥沙在海湾口处淤积沙坝，而形成的潟湖。如果不是期间因地质运动，而造成湖区下沉加深的话（目前最大深度 44 米），斯库台湖也许早就像其它相似地貌一样，变身成为“斯库台



斯库台湖

平原”了（比如德林河下游，就已经淤积为平原了）。

相比了解地质变迁史，我们更关心的是它对人类的影响。斯库台湖的存在，使得它比德林河，更容易成为一个地理分割点，将湖区北部地区，与德林湾及其以南的岸线分割开来。今天斯库台湖及布纳河下游，成为阿尔巴尼亚与黑山之间的边境线，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虽说斯库台湖依然顽强坚守着巴尔干第一湖的荣誉，但在时间的作用下，从迪纳拉山脉西南端奔流下来的多条河流，还在是山湖之间，造就了一片半封闭平原区。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从西北部注入湖中的莫拉察河水系。按照一般的命名模式，这片平原应该被称之为“莫拉察平原”。不过结合地缘来看，把这片平原，以及它所辐射的周边地区更应该被标注为“泽塔”，而不是“莫拉察”。

泽塔地区在黑山的重要性

我们总说，每条大河都有两条甚至更多的上源，莫拉察水系也是如此。除了正源之外，它的西部还有一条叫做“泽塔河”的西源，在今天的黑山首都“波德戈里察”北部与之交汇。平原的淤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为了避免受水患的影响，人类在定居过程中，通常会先选择更靠近山麓的区域，然后慢慢通过水利工程的延伸，对下游地区进行开发。进入斯库台湖北部的斯拉夫人也不例外，尤其斯库台湖在冬季丰水期，湖面面积还会再增加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波德戈里察北部的河谷地区会更为安全。

对比泽塔河谷和莫拉察（中上游）河谷会发现，前者的体量要大的多。这也使得泽塔河谷，更有机会成为本地区的人口聚焦区。当然，在斯拉夫人到来之前，先期定居于此的伊利里亚人肯定也是这样想的。不过渗透并控制这样一个半封闭地理单元的难度，比之在德林湾以南的经营要低的多。更何况在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已经在迪纳拉山脉分水岭北部的波斯尼亚、大摩拉瓦河流域定居成功，可以为泽塔地区的经营提供有利的地缘支撑。

基于地理上的偏安，泽塔地区也是塞尔维亚人当中，最早摆脱拜占庭和保加利亚人控制，建立独立国家的。公元11世纪末，已是塞尔维亚人属性的泽塔地区，开始以“泽塔王国”之名，向迪纳拉分水岭另一侧的波斯尼亚、西摩拉瓦河流域扩张势力范围，以期统一塞尔维亚民族。然而同样是因为地理上的原因，只从泽塔地区努力，就想建立统一的塞尔维亚王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在12世纪末，借助拜占庭帝国的衰弱，以及保加利亚人的再次独立，大摩拉瓦河流域的塞尔维亚人终获政治独立。随后，从西摩拉瓦河崛起的政治势力，在取得科索沃盆地的控制权后，打通了大摩拉瓦河地区与泽塔地区的战略通道。很快，上述三个板块被整合入了以“塞尔维亚”为名的王国并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上。

第二十八章 奥斯曼进军巴尔干地区

第一节 奥斯曼人占领色雷斯地区

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陷入分裂与内乱

公元 15 世纪中叶，在国王斯蒂芬·杜尚的统治时期（公元 1331-1355 年），塞尔维亚王国进入了巅峰期，臣服保加利亚，并控制了包括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伊庇鲁斯、塞萨利等板块在内的巴尔干中部地区。这一时期的塞尔维亚，甚至被历史学者视为了“帝国”。然而正在走向巅峰时期的塞尔维亚，也遇上了欧洲诸帝国（准帝国）几乎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在快速攀上人生巅峰后，为了更好的治理仓促整合在一起的土地，采取分封（采邑制）的统治形式。公元 1355 年，当为自己戴上“塞尔维亚与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皇冠的塞尔维亚君主“斯蒂芬·杜尚”离世后，他所建立的帝国转瞬便进入了分裂期。

一个地缘政治体的形成，无可避免的会经历统一、分裂，再统一、再分裂等，这样周而复始的过程。分裂本身，有时在客观上反而会有利于民族的地缘扩张。比如中央之国在分裂的战国时代，燕国为了自身强大，在东胡之地的辽河流域的扩张；赵国在河套地区的经营等等。然而做到这一切的前提，是一个民族所依托的核心之地，比周边地区有更大的潜力，以使之在战略层面更有机会扩张。不幸的是，巴尔干半岛北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塞尔维亚王国之所以如此之快的崩溃，与土耳其人的西进有着直接的关系。几乎在塞尔维亚帝国开始陷入分裂危机的同时，土耳其人取得了加利波利半岛的控制权，开始正式向欧洲扩张。也正是因为土耳其人的强势扩张，才阻止了塞尔维亚人消化他们刚刚到手的土地。不过塞尔维亚人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保加利亚人也同样遇到了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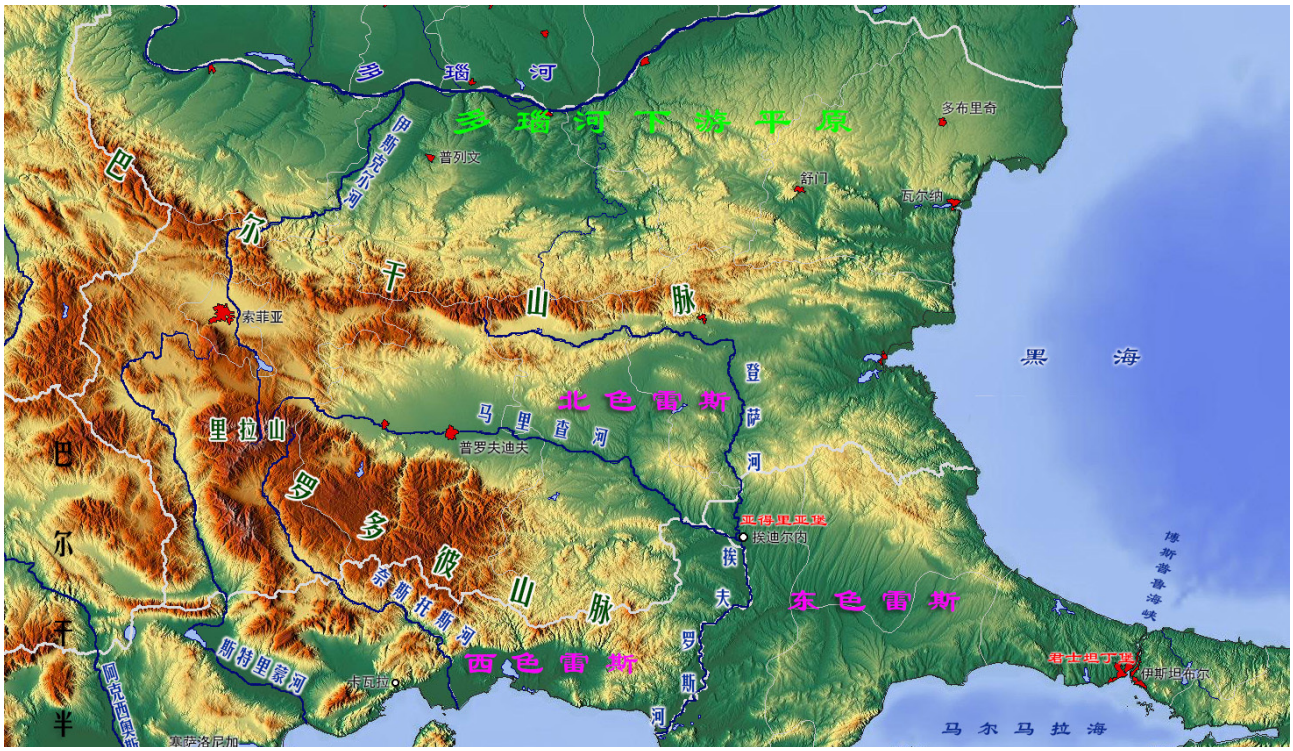
保加利亚人虽然带有突厥游牧基因，但却是南部斯拉夫人中，是最早接受东正教并且建立“帝国”的。这一历史使得塞尔维亚，几乎没有可能真正消化掉保加利亚（拜占庭也没有做到）。在塞尔维亚帝国迅速陷入分裂后，保加利亚也再次迎来了独立。问题是，民族独立与建立统一政权是两回事。为了争夺王国的控制权，重获新生的保加利也陷入了内乱，被实际分割为了三部分。而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个机会实在是太好了。两个有可能取代拜占庭，成为巴尔干和东正教世界主力的国家，都处在内部整合的低潮期。

在公元 1355 年这个点上，除了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下马其顿还残存一点“海外”领地（悲哀的是，这以前都是核心区）。君士坦丁堡能控制的，就只有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东色雷斯，以及希腊境内的西色雷斯了。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已经站在加利波利半岛的土耳其人，可以有三个方向做为第一阶段目标：一是向北进入北色雷斯，入侵

保加利亚；二是向西进入马其顿地区，与塞尔维亚人交战；三就是向东拿下君士坦丁堡，灭亡拜占庭帝国。从位置上看，攻陷君士坦丁堡应该是首选，毕竟就算要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开战，也势必要先侵夺拜占庭保有的色雷斯领土。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实在是太坚固了，更重要的是灭亡拜占庭还会触发天主教世界底线。为此，土耳其人并不急于一定要拿到这座千年古都，而是对君士坦丁堡以外的色雷斯地区下手。

土耳其征服东色雷斯并迁都亚得里亚堡

公元 1360 年，土耳其开启了他们在色雷斯以及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征服计划。所谓“色雷斯”地区，地理上指的是巴尔干山脉、罗多彼山脉东南，与黑海－马尔马拉海－爱琴海相接的这片沿海低地区。整片低地中最重要的水系，是埃夫罗斯河（又名“马里查河”），整个水系的上游部分从巴尔干山脉、里拉－罗多彼山脉收集雨水，在覆盖大部分北色雷斯地区后（除沿海部分），向南注入爱琴海。河流下游部分，成为了东、西色雷斯，以及今天希腊、土耳其的分界线。分割东、北色雷斯的，则是罗多彼山脉向东延伸至黑海的一条丘陵地带。



色雷斯地区示意图

埃夫罗斯河是希腊语的叫法，在保加利亚人那里，这条河流叫做“马里查河”（土耳其人也是从此音）。发源于里拉山的马里查河，东南方向横穿整个巴尔干山脉——罗多彼山脉之间的三角平原区（也是北色雷斯的核心区），在接受了从巴尔干山脉东角而下的“登萨河”之后，转而向下注入爱琴海。很显然，这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将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节点。

事实上，这个战略节点在历史上也的确非常有名。在那位通过修筑长城，以为帝国确定势力边缘的罗马皇帝“哈德良”执政时期，马里查－登萨河口处，筑起了一座

军事城堡——亚得里亚堡（又译“阿德里安堡”，也称“哈德良堡”）。从军事角度看，在多瑙河防线之后，建立以亚得里亚堡为核心，横亘在北、西色雷斯之间的这道防线，将为巴尔干半岛的安全提供双重保障；同时就色雷斯地区的内部结构来看，亚德里亚堡也是天然的地缘中心。

在亚得里亚堡所发生的第一件大事件，源自于哥特人的入侵。由于匈人的西进，原本定居于多瑙河北的哥特人（日耳曼人），开始大规模逃入罗马境内（公元375年）。一方面罗马无力阻止如此大规模的迁徙；另一方面罗马也认为将这些日耳曼人安置在北方边境，有利于阻止匈人南下。所以，这些哥特人被允许定居在巴尔干山脉南北。然而这些越过多瑙河，获得在北色雷斯定居权的日耳曼人，很快便不再满足于为帝国充当炮灰，而是试图强势渗透巴尔干半岛。这使得罗马帝国不得不调集兵力，在亚得里亚堡与哥特人展开决战，史称“亚得里亚堡战役”（公元378年）。

不幸的是，风雨飘摇的罗马帝国，成为了亚得里亚堡战役的失败者。除了损失了数万罗马军人之外，甚至还搭上了一位皇帝（瓦伦斯）的性命。在罗马应对日耳曼人的历史中，战况惨烈程度堪与当年辛布里战争中的阿路西奥之战，以及在日耳曼尼亚的“条顿森林堡之战”相比。也可以说，阿德里安堡战役的失败，直接触发了罗马帝国的崩溃与分裂。在后来的历史中，亚得里亚堡又发生过无数战役。基于其在整个色雷斯地区的重要地位，如果暂时不想动君士坦丁堡的话，那么还在拜占庭手中的亚得里亚堡，就是土耳其人势在必得的第一目标了。

鉴于拜占庭的衰弱，土耳其人做到这点毫无难度，在巴尔干计划开启之初，便拿下了这座重要城市。随后，土耳其人做出了一个足以影响欧洲地缘命运的重要决定：那就是将都城迁至亚得里亚堡（并重新命名为“埃迪尔内”）。这件事明确的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希望充当的，绝不仅仅是个劫掠者。为了保证新都的安全，土耳其人接下来选择了溯马尔查河而上，以期拿下整个北色雷斯。

尽管土耳其人这一阶段入侵的是保加利亚，但暂时身处事外的塞尔维亚人对于土耳其在色雷斯地区的做大，同样感到忧心忡忡。毕竟如果土耳其人控制了整个色雷斯后，马其顿地区很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了。为了双方共同的利益，塞尔维亚人决定在土耳其人的兵锋还没有指向马其顿时，就帮助保加利亚人解决色雷斯危机。

第二节 奥斯曼在马里查战役击败基督教联军

土耳其人在马里查战役取胜

由于进入马里查河谷并试图向亚得里亚堡进军的军队中，还加入有来自多瑙河北岸的匈牙利人和瓦拉几亚人，我们更应该将这支联军描述为“基督教联军”。后者在14世纪初摆脱匈牙利王国的控制，获得了独立（瓦拉几亚公国），鉴于这个国家在对抗土耳其人的过程中，曾经作出的“特殊贡献”，我们后面还会对瓦拉几亚以及罗

马尼亚的历史做一个梳理。当然，联军的主力还是最为紧张的东正教斯拉夫人，毕竟目前他们才是穆斯林西征最直接的受害者。然而事实证明，如果你不能在土耳其海峡，凭借海上优势阻挡东方民族的入侵，那么在色雷斯这样的平原地带，就更难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的希波战争就曾经验证过（希腊的胜利，源自于雅典海军的胜利）。

凭借娴熟的骑射技术，突厥人在平原地区作战的能力，早已比当年的波斯人更为精进，在与拜占庭等欧洲军事力量的对决中，这些游牧者更逐渐增加了重骑兵的比例，以使之能够适应更多的战局。相反，欧洲人如果想增加轻骑兵的比例，以对冲对手这方面的优势，绝大多数时候就只能从游牧者之中雇佣了（很难保证忠诚度）。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数处于劣势，但土耳其人还是在他们的新都之北，顶住了基督教联军的进攻，取得了马里查战役的胜利。据称，在这场战役中，基督教联军方面的损失多达 6 万人。

马里查战役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土耳其保住了亚得里亚堡，更意味着马里查河谷和整个色雷斯地区，从此再没人可以阻挡土耳其人的铁骑了。问题在于，巴尔干半岛最引人注目的地理特征就是山地。如果土耳其人仅仅是在骑兵方面出众的话，那么他们将很难在巴尔干做大。因为即使是当年勇冠欧亚的蒙古人，在巴尔干的山地中也吃过很多亏。而如果放弃对山地的征服，只是一路沿海岸线向马其顿、塞萨利等富庶沿海地区渗透的话，随着战线的拉长，又很可能在山、海两面的压力下，重蹈当年波斯帝国的覆辙。



奥斯曼帝国军队

土耳其人组建由巴尔干人构成的土耳其近卫军

为了能够在巴尔干走的更远，在做出建都亚得里亚堡决定的同时，奥斯曼帝国还

做出了一个军事结构层面的战略决定，那就是组建一支由巴尔干人（主要就是南斯拉夫人了）组成的，步兵属性的近卫军。为了区别土耳其人原有的步兵军团，这支通常被外界称为“土耳其近卫军”的部队，被命名为“耶尼切里”（新军之意）。至于近卫军最初的来源，则是从被俘的基督教战俘中挑选。很显然，身体条件及军事技能只是遴选条件之一，是否愿意改宗伊斯兰教才是首要标准。

这些新加入的巴尔干步兵，为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进一步扩张，发挥了重大作用。不过从战略角度看，从战俘中吸收成员并非长久之计。最起码这些成年后再被迫接受伊斯兰教的军人，能否有足够的忠诚度（包括因狂热信仰所爆发的战斗力）是很存疑的。为此，15 世纪上半叶，土耳其人变更了他们的做法，将“耶尼切里”的来源，改为向被征服巴尔干地区所征收的血赋——未成年的基督徒（通常 5 年一次）。被挑选出来的少年基督徒们，会先交由普通穆斯林家庭中代管。待其成年并变身成为真正穆斯林之后，再进入军队中接受集体生活和军事训练。

看到这一切是不是很眼熟，这是不是就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很早就采取的古拉姆、马穆鲁克“奴隶军人”的翻版呢？的确如此。包括“耶尼切里”不能结婚生子，但可凭军功升至高位的制度，也是如出一辙。只不过当初作为天生的马上战士，突厥少年们才是伊斯兰世界奴隶军人的主要来源。今天，翻身做了主人，自身不缺少骑兵的土耳其人，将这一做法套用在了熟悉山地环境的巴尔干人身上罢了。

不管怎么说，土耳其人已经在军事层面，找到了一条入侵巴尔干山地的办法。现在，已经控制了整个色雷斯，并将拜占庭压缩得只剩下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要开始向山地发起挑战了。

第三节 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的地缘关系

控制马里查河谷后，奥斯曼帝国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北面的多瑙河流域，试图先征服保加利亚（此时保加利亚王国都城位于多瑙河下游平原），而是开始谋划进入巴尔干山地，解决势力更强大的塞尔维亚。就地理结构而言，从马里查河谷向西穿越一个重要的地缘节点，即可进入南摩拉维亚河谷。这个节点在蒙古西征部分曾经出现过，就是今天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所在的“索非亚盆地”。如果说科索沃盆地，是中世纪塞尔维亚民族的枢纽板块，那么索非亚盆地之于保加利亚也是如此。

在索非亚盆地的南边有一座巴尔干半岛最高的山岭——里拉山。里拉山的位置处在索非亚的正南，与罗多彼山脉紧密相接，广义上亦属于后者的一部分。里拉山之所以经常被单独分离出来，一方面因为它是巴尔干的最高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成保加利亚的地理中心。共计有四条大河发源于里拉山，包括：向北穿越索非亚盆地、巴尔干山脉注入多瑙河的伊斯克河；向东经色雷斯注入爱琴海的马里查河；向南流经马其顿注入爱琴海的奈斯托斯河（保加利亚称梅斯塔河）、斯特鲁马河（希腊称斯特里

蒙河）。

从这个角度看，大家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今天的马其顿跟保加利亚的地缘关系更近（而不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也一直视马其顿为自己一部分了吧。事实上，抛开中世纪保加利亚对上马其顿的经营不说，保加利亚在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后，马其顿也仍然是保加利亚的一部分（实现统一的保加利亚建立了第三王国）。不过在摆脱奥斯曼控制之后，基于巴尔干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保加利亚对上马其顿甚至北色雷斯的控制都出现过反复。



马其顿地区示意图

今天，以地势高低来划分的上、下马其顿地区归属国家来看，马其顿这个标签的归属问题，似乎只是马其顿共和国与希腊之间的纠葛。不过虽然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因为在上马其顿的存在，有机会继承古马其顿的地缘政治遗产（希腊自是竭力反对出现这种情况），但保加利亚其实也得到了部分上马其顿领土。

这块隶属保加利亚的马其顿，被称之为“皮林马其顿”。所谓“皮林马其顿”，所指向的就是斯特里蒙河上游河谷地区。它的名字来源于河谷东侧的“皮林山”。皮林山、里拉山，一般都被视为罗多彼山脉的一部分，只不过相比一个有高度、一个有长度的邻居，皮林山的名气不够大，整条山脉因此多被统称为“里拉——罗多彼山脉”罢了。鉴于保加利亚也控制了少部分上马其顿地区，让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垄断“上马其顿”的标签，多少会有些不合适（虽然它是主体）。为了以示区别，与皮林马其顿之称同时出现时，一般会称之为“瓦尔达尔马其顿”。

至于归属希腊的，包括瓦尔达尔河、斯特里蒙河等河流下游的沿海部分，“爱琴海马其顿”是最能表示其地理属性的名称。基于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历史上，都曾经统治过马其顿，今天这种分配方法也不失为一种平衡（源自于 1913 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的《布加勒斯特协议》）。在政治、民族结构复杂多变的巴尔干地区，用地缘的方法划分板块，更有助于我们从纷乱的历史中，厘清彼此的关系。最起码大家能够因此而清楚，每个民族国家与它的邻居之间，矛盾的焦点在哪里。

第四节 奥斯曼在科索沃战役击败塞尔维亚人

土耳其人攻下索非亚并进入南摩拉瓦河谷

既然已经得到了马里查河谷，那土耳其人就没有可能放过索非亚了。在基本的扫清色雷斯（包括西、北、东色雷斯）的抵抗之后，土耳其人拿下了索非亚（公元 1382 年）。需要指出的是，索非亚成为保加利亚首都，只是 19 世纪末的事情。在保加利亚第一、第二王国时期，巴尔干山脉与多瑙河之间的大特尔诺沃、普雷斯拉夫、普利斯卡才是都城所在，上述三座城市并称为保加利亚三大古都。当然，如果现在瓦尔达尔马其顿归属保加利亚的话，今天马其顿共和国首都斯科普里，也肯定会被保加利亚人认定为古都的。



保加利亚三大古都示意图

虽然索非亚这座城市成为保加利亚首都的时间不长，但它地缘位置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占领这座城市，土耳其人不仅能够很便当的通过伊斯克尔河谷，向多瑙河下游平原渗透，同时也能够沿巴尔干山脉南麓，进入塞尔维亚人的南摩拉瓦河谷。13 世纪中叶，因大汗之位出现空缺而结束在西征的拔都，就是透过这样的线路，从巴尔干和匈牙利平原，经由索非亚中转回到南俄草原的。如果不是战略上结束了扩张，蒙古人很有可能在下一次西征中，反向重走一下多瑙河下游平原——索非亚盆地——南

摩拉瓦河谷这条西征之路。不过不要紧，140 多年后，同样出身亚洲游牧文化的土耳其人，会“帮助”蒙古人完成未竟的事业。

算上匈人、蒙古人，这已经是欧洲人面临的第三次“黄祸”了。当然，此时的土耳其人到底还有多“黄”是存疑的，毕竟从塞尔柱时期算起，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经营也有两百年了，土耳其人在应罗姆苏丹国之召进入小亚细亚之前，也在阿姆河中游这一混血之地呆了不少时日（最初建立帝国的塞尔柱人突厥人，最起码贵族肯定是标准的蒙古人种）。其实欧洲人也注意到了这一基因变化，所以在中世纪后期乃至近代，他们更多用“鞑靼人”这一不带种族特征的标签，来形容进入欧洲的蒙古人、土耳其人等亚洲游牧民族，并将这个概念扩张至整个亚洲地区的马上民族（包括满洲人这种渔猎出身的民族）。

从索非亚进入南摩拉瓦河谷的第一站，是今天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尼什”（仅次于首都贝尔格莱德）。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尼什——索非亚就是沟通东西两端的重要通道，蒙古人、保加利亚人完成征服事业时也都走过这条路。控制索非亚之后的奥斯曼帝国，很快便将兵锋指向的尼什，而失去了尼什的塞尔维亚，自然明白自己将大难临头了。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危机并不止东线。已经控制了色雷斯和索非亚的土耳其人，没有理由不对马其顿下手。在与塞尔维亚人进行决战之前，除了最北端的斯科普里盆地，以及最南端那个手掌形的“哈尔基季基”半岛（带三根手掌）以外，土耳其人几乎拿下了整个上、下马其顿地区。



科索沃战役

塞尔维亚在科索沃战役战败成为奥斯曼附庸

最后的决战，发生在我们已经花了不少笔墨的科索沃盆地东部，也就是今天塞尔

维亚人认定的科索沃地区，史称“科索沃战役”（公元 1389 年）。基于土耳其人的给基督教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次不仅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前来参战，基督教联军还包括天主教世界的匈牙利人，以及还没有成为罗马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甚至还有少量波兰人）。然而经验告诉我们，最终的结果还是取决于塞尔维亚人自己的表现。

在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塞尔维亚人的表现不能说不好。他们当中甚至有贵族出身的勇士，刺杀了亲自领军西征的奥斯曼君主（穆拉德一世）。很难说 20 世纪初，萨拉热窝那位塞尔维亚青年的表现，没有受到这次成功刺杀的影响（刺杀者是塞尔维亚历史中的英雄）。然而事实再一次证明，历史并不是由偶发事件决定的。就像即使没有塞尔维亚人，当年对奥匈帝国王储的刺杀，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的欧洲，也一样会有其它事件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

如果说 100 年前的那次刺杀，还的确直接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那么 600 多年前的这次刺杀，对局势的影响就不大了，因为塞尔维亚人还是输掉了这场战争。由于在科索战役中，塞尔维亚的贵族精英伤亡惨重、无力再战，这个曾经怀有帝国梦的王国，战后很快便接受了自己的新命运——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接下来，奥斯曼人开始着手解决保加利亚人的问题，希望能够扩张至多瑙河下游。

很显然，保加利亚亡国只是时间问题，而保加利亚的沦落，也意味着匈牙利将再次履行它“基督教之盾”的责任。问题是，此时的匈牙利王国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在土耳其人进入欧洲之前，喀尔巴阡山脉外围那些说拉丁语的瓦拉几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已经先后脱离匈牙利王国的控制，独立建立自己的公国。那么，匈牙利和天主教世界，就这样看着奥斯曼帝国，在 14 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吞并整个巴尔干吗？当然不是。一场由教皇呼吁组成的“新十字军”，将再次对异教徒开战。

第二十九章 新十字军与帖木尔帝国进攻奥斯曼

第一节 奥斯曼与新十字军展开尼科堡会战

新十字军进入多瑙河下游与奥斯曼人交战

在其它天主教国家做出反应之前，匈牙利人其实已经试图挽救过保加利亚的命运了（公元 1392 年）。不过越过多瑙河的匈牙利军队，并未能迟缓土耳其人的进展。在此情况下，匈牙利希望整个天主教世界能够为之提供帮助。此时的西欧内部矛盾重重，在结束十字军的东征事业后，世俗君主的权力开始凌驾于神权之上。期间甚至连教廷都一度被法国人搬到了法国境内变为傀儡（1308 年到 1378 年，史称“阿维农之囚”）。除去内部一直邦国林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外，英法两国更是处在缠斗的百年战争时期（1337 年 - 1453 ）。只是这次，形势实在太过严峻，在教皇的呼吁下，天主教国家还是集体作出了反应。

“新十字军”的成员囊括了几乎所有天主教地区，包括法兰西、德意志、波兰、意大利、波希米亚、英国等地。在这些外援中，希望通过新圣战确立自己大国地位的法兰西人，数量是最多的。不过这些外援加起来也不过数千之数，匈牙利人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在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的抵抗相继失败后，现在该轮到匈牙利人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了。为了即将到来的决战，作为拥有欧洲最精锐骑兵的匈牙利，集结了 6 万左右兵力。



尼科堡会战

公元 1396 年，以匈牙利军队为主的“新十字军”在多瑙河南岸的尼科堡（今保加利亚城市尼科波尔），与人数相当的奥斯曼军队展开会战，史称“尼科堡会战”。这一会战的规模，也是奥斯曼帝国扩张以来，所进行的最大规模会战。与科索沃战役不同的是，本来应站在十字军一边的塞尔维亚人，这次站在了新宗主一边，并直接为

之奉献了自己的重骑兵部队。同时，塞尔维亚王国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政治遗产，包括马其顿、塞萨利、阿尔巴尼亚、伊庇鲁斯等地，亦皆为奥斯曼帝国所接收。当然，土耳其人肯定是不会把获胜的希望，寄托在塞尔维亚骑兵的帮助上。为奥斯曼帝国进行扩张的骑兵王牌，是被称之为“西帕希”的骑士集团。



尼科堡战役示意图

与中欧西欧所盛行的“军事采邑制”相类似，这些土耳其骑兵也是自己负责装备训练，战时接受征召，并且以战场上的收获的财富和土地（采邑）作为自己的回报。最大的不同在于，西帕希骑士们受封的领地并不能世袭。这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君主，拥有更大的控制力和集权力，不至于像西欧那些帝国那样，很快就因为层层分封而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土耳其人的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并不稀奇。2000 多年的秦国，正是凭借将土地、爵位和军功挂钩，同时又不可世袭罔替的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帝国。

奥斯曼人在尼科堡会战中取胜

在尼科堡战场上，土耳其人又一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希望一战成名的法国骑士，以及承担主力任务的匈牙利骑兵都遭遇了重大损失。如果不是土耳其人暂时还没有水上优势，这种背水而战的后果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生还者乘船逃回瓦拉几亚）。在诸多技术原因中，成分各异的基督教联军无法有效协同作战，总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这次法、匈两军就各自为战）。这也是“十字军”们的老毛病了，当日十字军东征时，就经常因为群龙无首而削弱战斗力。

尼科堡会战的胜利，意味着北起铁门关、南至温泉关的巴尔干地区，尽为奥斯曼帝国领土。现在看起来被穆斯林帝国包围，且无强大外援支援的君士坦丁堡，再也没有理由幸免了。事实上，在“新十字军”出现在尼科堡之前，土耳其人已经开始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尽管这座城防坚固的千年古都（加之对手没有强大海军），抵御住了土耳其军队的进攻，但亦被迫接受在城内开辟穆斯林居住区、修建清真寺等条件（当然还有进贡年金了），以试图在奥斯曼帝国的阴影下苟且。

然而谁也不知道，这些“低调”的做法，能够为君士坦丁堡争取多少时间。君士堡丁堡需要强大的外援来缓解压力，当然这一工作拜占庭的皇帝一直在做，教皇能够号召“新十字军”东征，君士坦丁堡的求助也是重要原因。只是在尼科堡战争失败后，谁还能够帮助日落西山的拜占庭呢？答案却是出乎意料。这次帮拜占庭“帝国”续命成功的，竟然是另一个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帝国。

第二节 帖木儿帝国的崛起

察合台汗国分裂成东西两部

世界从来就不会因为同一信仰而变得更和平，就像教皇再不希望天主教国家内斗，也敌不过因地缘而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一样。同样，穆斯林内部也同样充满着争斗。在向欧洲扩张的同时，土耳其人逐步用政治、军事手段，臣服了安纳托利亚高原那些塞尔柱国家。显然，这并不是奥斯曼帝国东扩的终点，对于一个穆斯林帝国来说，新月沃地和麦加的圣地天然具有吸引力。甚至可以说，土耳其人在欧洲的扩张，最终还是为了有机会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人。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向东扩张的机会也是很不错的。因为曾经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高原、亚美尼亚高原及高加索大部的伊尔汗国，在 13 世纪中叶已经崩溃，并分裂为诸多国家。伊朗高原的波斯人、阿塞拜疆的土库曼人、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人，以及还希望重现往日荣光的蒙古人等，都希望自己能够继承伊尔汗国的遗产。然而正当各方为抢夺伊尔汗国遗产打得不可开交时，一个来自察合台汗国的跛子，却开始规划一个更大的帝国梦。这个跛子，就是差点与中国历史也有交集的“帖木尔”。在历史跨入 15 世纪的大门之时，也正是他的“帖木尔帝国”击败了奥斯曼帝国，间接帮助君士坦丁堡又续了半个世纪的命。

14 世纪中叶，西亚的伊尔汗国分崩离析时，中亚的另一个蒙古汗国——察合台汗国，也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其中河中之地为西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则包括七河草原、塔里木盆地及吐鲁番盆地。就这种分割模式来说，几乎是一个地缘结构上的必然结果。比如 11 世纪中分裂为东、西两部的喀喇汗王朝；12 世纪进入天山南北的西辽政权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后者在西部的领土为花喇子模所取）。

这种地缘政治局面如此周而复始的出现，本质原因在于以七河草原为本部的游牧政权，无法稳定控制富庶且人口密集的河中之地。相比之下，面积虽大但绿洲狭小的南疆地区，控制起来要容易的多。今天以大部为乌兹别克所有的河中之地，人口超过三千万，南疆人口则不到其三分之一的数字对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二者地缘潜力上的差距。基于地理位置，以及波斯文明的先发优势，河中之地与伊朗高原——兴都库斯山脉北部的所谓“大呼罗珊地区”关系要紧密的多。二者在政治上，曾经多次尝试过整合，至于以谁为主进行整合就不一定了。

帖木儿征服周边板块建立起辽阔帝国

花剌子模是从北向南，试图整合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南北的典型案例。只不过他们的运气实在太差，刚刚崛起便遇上了西征的蒙古人。而在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各地统治都遇到危机的情况下，河中之地再次迎来了崛起之机。与花剌子模当年不同的是，担负这一历史使命的帖木儿，是从河中的地缘中心——泽拉夫尚河流域一带起家，然后统一整个河中之地的（再具体点，就是泽拉夫尚河之南的卡尔希河绿洲）。

从民族属性上来说，帖木儿一般被归类为突厥化的蒙古人。之所以没有直接被认定为“突厥人”，有赖于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横行无忌的历史。这段空前绝后的征服史，为黄金家族（铁木真及其直系后裔所属的家族）在后蒙古帝国时期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政治遗产。以至于在欧亚草原文化区（包括边缘的绿洲文明区）进入大分裂之时，为了利用这笔政治遗产，包括帖木儿在内的很多统治者，都希望保留自己的“蒙古”身份，并通过联姻或者附会的方式，跟黄金家族扯上关系。



帖木尔帝国地图

基于河中之地[1]的地理位置，帖木儿帝国可以向西南的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东南印度河流域，这两个具备同等诱惑力的目标扩张。后者要翻越的是兴都库什山脉（阿富汗），前者则要征服伊朗高原（伊朗）。当年的花剌子模曾经试图同时做到这两点，现在帖木儿帝国也同样在这样尝试。在帖木尔的扩张战争中，他成功的学习了成吉思汗曾经惯用的屠城威慑战术。

从 14 世纪 60 年代开始，帖木儿用了 40 年的时间，接收了察合台、伊尔汗国的

1　河中地区：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两河沿线所有农业绿洲。由于位于两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谷，是整个区域的地缘中心，因此中国古代将之命名为“河中”。

政治遗产，并进击印度河平原，击败了古尔王朝在印度的继承者“德里苏丹国”。建立了一个北起锡尔河中上游，西至亚美尼亚高原，南至美索不达米亚，东至印度河平原的庞大帝国。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势力范围已经覆盖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并尝试向亚美尼亚高原扩张影响力的奥斯曼帝国，无可避免的与帖木儿帝国发生了碰撞。

第三节 帖木尔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决战

帖木尔在安卡拉战役中击败奥斯曼帝国

在帖木儿帝国强势扩张的这段时间，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事业亦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数次击败基督教联军，并臣服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之后。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展开了长期围攻。需要说明的是，出于稳固后方的需要，土耳其人虽然也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扩张，但直接控制区却只是向东延伸到了今天土耳其首都安卡纳一线，并没有直接消灭东部那些源自罗姆苏丹国的突厥小国。尽管慑于奥斯曼帝国的兵威，这些国家都表示愿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臣属，但一旦有另一股强大力量介入，他们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就很难说了。

正当土耳其人为如何拿下君士坦丁堡而操心劳神时（公元 1400 年），已经扩张至西亚的帖木儿帝国率先发起了攻击。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那些原本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突厥小国们，几乎没有发挥任何缓冲作用。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相继倒戈加入帖木儿的军队。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突厥小国并没有在奥斯曼帝国的西扩中获得什么好处。相反，如果能够帮助帖木儿取得胜利，那么这些突厥小国就很有机会，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乃至巴尔干半岛分一杯羹了。在这种情况下，萨卡里亚河上游的的安卡拉，成为了奥斯曼帝国抵御帖木儿帝国的前线。公元 1402 年夏，两个风头正盛的穆斯林帝国，在安卡拉展开会战，史称“安卡拉战役”。



帖木儿帝国与奥斯曼帝国

在安卡拉战役中，双方投入的兵力大致相当，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层面上来看，应该都

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役。然而，帖木儿最终却取得了完胜，甚至俘虏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巴耶济德一世）。与其说这是一场军事胜利，倒不如说是一场政治胜利。基于这是两股“突厥穆斯林”势力之间的对决，暂时置身于二者核心之外的其它突厥穆斯林的倾向，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这一点上，从蒙古人的扩张中汲取经验（学到的不光是屠城）的帖木儿，外交手段显然更为高明。最起码他让大家相信，自己的成功能够让整个突厥和伊斯兰世界获益。从技术上看，土耳其人在安卡拉会战的惨败，直接原因也正是负责右翼的两万新征召部队（从东部突厥附庸国征召），临阵倒向了帖木儿一方。讽刺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参战的非核心军队中，反而是东正教徒的塞尔维亚人，表现的最为忠诚。

帖木儿无意在西亚扩张领土

安卡拉会战的结果，使帖木儿无限接近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如果再乘势南下，消灭已经风雨飘摇的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帖木儿帝国，在版图上甚至已经超越了当年的亚历山大帝国。然而亚历山大帝国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在如此复杂地缘结构区域中，你几乎没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帝国。问题在于，帖木儿本人会把自己的政治中心放在哪里，抑或说认为哪个板块才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首先，小亚细亚并不是帖木儿的选项。在安卡拉战役之后，帖木儿并没有顺势消灭奥斯曼帝国，而是“仁慈”的把帝国遗产分配给了那位被俘苏丹的四个继承人（苏丹本人因无法忍受被俘之辱而自杀）。抛开以这一举动对其它突厥小国的安抚之意以外（表明它们也没有被灭的风险），这种安排在地缘政治上所透出的意思，是帖木尔帝国并无意向爱琴海和欧洲进军。

其次，令人意外的是，马穆鲁克王朝以及王朝控制下耶路撒冷、麦加、麦地那圣地，也不是帖木儿的主要目标（尽管他在叙利亚北部击败了马穆鲁克大军）。要知道，作为一个穆斯林属性政权，上述圣地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这样做，最起码证明帖木尔的梦想，并不是复制一个“阿拉伯帝国”。那么到底是什么板块，能够比欧洲和圣地，更加吸引帖木儿的目光呢？难道是印度？ 100 多年后，帖木儿一个绰号叫“老虎”的五世孙“巴布尔”的确这样做了。与帖木尔的四面出击有所不同的是，老虎巴布尔在进入政治战场之后，很快决心成为一个印度的君主。最终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个由外族入侵所建立的印度王朝，就是后来被大英帝国所颠覆的“莫卧尔王朝”。

第四节 帖木尔欲重建蒙古帝国并计划远征明朝

帖木尔占据蒙古帝国西部大部旧地

然而在帖木儿的时代，他并没有想过做一个印度君主。相比那些更合理的地缘政治选择，帖木儿的梦想要更为宏大，那就是重建“蒙古帝国”。尽管身处河中的帖木儿，在文化上已经突厥化、信仰阿拉伯化（伊斯兰化），政治制度上又更倾向于波斯，

但蒙古帝国所能提供的想象空间，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以帖木儿当时的声势来说，似乎也的确有这样的机会。蒙古三大汗国（除掉被元朝灭掉的窝阔台汗国）中的察合台、伊尔两汗国的故地，实际已为帖木尔帝国的所控制。同时，在与奥斯曼帝国对决之前，帖木尔甚至还两次远征过金账汗国，并在汗国的核心之地——伏尔加河完胜汗国军队。在此之前，金帐汗国曾经南下南阿塞拜疆，试图接收伊尔汗国的遗产，而在此之后，虽然帖木儿并没有在欧亚草原纠缠，但却从金帐汗国那里拿走了身处河中之地边缘的花剌子模绿洲。

现在，蒙古在中亚、西亚、东欧的三大汗国，都已经成为了帖木尔帝国的领地（或手下败将）。至于蒙古帝国的中央汗国——元朝，则在帖木儿刚从河中崛起之时，就已为汉族政权“明”王朝击败，（公元 1369 年）。当然，这并不代表守护黄金家族正朔的“元”政权就此消失。退回长城以北的黄金家族，又以“元”的名号，对蒙古高原维系了一段时间的统治（史称“北元”）。不过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之下，黄金家族属性的“元”政权再想维系在蒙古诸部的权威，变得异常的艰难。

帖木尔远征明朝计划未能成行

公元 1402 年，在帖木儿大败奥斯曼帝国之时，蒙古高原上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改变了帖木儿帝国之后的扩张方向。在这一年，非黄金家族出身蒙古鞑靼部首领（鬼力赤），攻杀了第二十代蒙古大汗（坤帖木儿汗），僭越建立了新的蒙古政权（明史以这一年为北元终结）。尽管后来黄金家族后裔，仍有被扶上大汗之位的，“元”的国号也曾经为后来的其它蒙古部落所沿用，但进入 15 世纪后，北亚这片游牧之地陷入四分五裂之境，却是不争的事实。

正统黄金家族在蒙古高原的失势，对于帖木儿来说是一个重现成吉思汗辉煌事业的好机会。这并不代表拥有黄金家族女婿身份的帖木儿（迎取了察合台汗国的公主），下一步一定需要北上整合蒙古高原诸部。相反，帖木儿决定挑战中原的明王朝。这一计划的合理之处在于，如果帖木儿以复兴蒙古之名，攻击明朝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会得到北亚蒙古诸部的支援，并顺势谋得蒙古之主的地位；而如果真的能够入主中原，那么，不管到底能不能谋得一个正统黄金家族的出身，帖木儿“蒙古大汗”身份都肯定是坐实的了。

然而这一计划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历史上入主中原成功的外族政权，都是由蒙古高原或者东北地区而下。直接从中亚，尤其是河中这样的绿洲之地，跨越万里荒漠发起远征，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类似的先例，可以参考一下汉武帝遣李广利倾举国之力发动的“汉攻大宛之战”。以中央之国的集权力和后勤保障能力，尚且只能在费尔干纳盆地取得个惨胜，很难想象只能算半集权性质的帖木儿帝国，能够突破河西走廊的屏障（更别说征服中原了）。

虽然没有理由相信帖木儿有机会入主中原，但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是希望看到这场帝国 PK 的。可惜的是，公元 1405 年，在帖木儿的东征计划刚刚启动、主力尚未出河

中之时之，这位时年已经 69 岁的一代雄主，便病逝于锡尔河畔的“讹答剌”城了（今属哈萨克斯坦）。这项极富想象力的东征计划，也就此成为过去式。

在帖木儿离世之后，他的帝国并没有逃脱一世而亡的命运。尘归尘，土归土，一切的一切都逃不出最基础的地缘规律。包括河中之地，以及与之地缘关系紧密的呼罗珊的中亚部分，成为了帖木儿子孙们争夺帝国遗产的主战场；至于包括西伊朗、高加索、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在内的西亚部分，则成为了拥有军事优势的阿塞拜疆突厥诸部的博弈区（它们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故事，我们后面还会解读到）。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帖木儿帝国的扩张无疑是一场非常大的危机。值得庆幸的是，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因此而衰弱。至于土耳其人后来又是怎么中兴的，又是如何逼着欧洲人去发现新大陆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五节 波兰匈牙利联军进攻色雷斯

奥斯曼恢复统一及匈牙利寻求后援遏制土耳其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帖木儿将扩张的目标放到了遥远的东方，无疑是一件幸事。仅仅花了十年时间，被肢解成四块的帝国就重新被统一到了一起。这并不表明奥斯曼帝国的这次中兴，完全只在帖木儿的一念之中，更多还是土耳其人内部存在很强的统一意愿。这一意愿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帝国在欧洲的扩张事业，正进行得顺风顺水。土耳其人能够由小到大，击败众多欧洲对手，正是得益于它拥有比基督教世界更强的集权力。那些支撑帝国存在，并以土地作为自己最大酬劳的军事贵族，更希望有人能够领导他们获得更多的土地。

当然，如果帖木儿帝国的发展方向也是在欧洲，且有足够的时间布局（他当时已经 60 多岁了），那么引导这一股扩张力，并成为欧洲之敌的也许就是“帖木儿帝国”了。最低限度，也不会让奥斯曼帝国如此之快的复苏。同时期身处明朝之侧的北元政权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对于明朝来说，王朝的安全保障在于蒙古草原的分裂，特别是不能让黄金家族再重新做大（只是却没有防备东北的满洲人做大了）。

不管怎么说，土耳其人算是度过了一次危机。然而东线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拔乱反正，还是让奥斯曼帝国受损颇大，并且需要一定时间来休养生息。这也让欧洲人看到了“拯救”拜占庭的机会。在帝重新国统一之后，直至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几十年前，为了争夺爱琴海的主导权，仍然据有不少爱琴海岛屿的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战争不断。不过威尼斯人，更为关心的是海上的商业利益。把穆斯林从欧洲赶走这件事，从来不是这些精明的商人所关心的。能够威胁到土耳其人的，还是身处巴尔干之北的匈牙利。

在奥斯曼帝国暂停攻势的这段时间里，处于欧洲圣战前线的匈牙利王国，也在寻求遏制土耳其人的机会。对于被土耳其人伤了元气的匈牙利人来说，后方有两股天主

教势力可以成为依托。一是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二是波兰人。后者在 14 世纪末，以共主联邦形式与立陶宛人结成同盟（法律上正式的合并是 1569 年）。从上述两股势力中，先后选取合适的人选继任匈牙利国王之位，是匈牙利人寻求后援的方法。这种做法可能会让中国人感到奇怪，但在模块式的欧洲却很常见。只不过是否能够因此结合成真正的政治同盟（如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克罗的亚那样），取决于这一联合是否能够让两个地缘板块共同受益。

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分裂性，使得匈牙利人并没有从德意志人那里得到有效帮助。从神圣罗马帝国请来的国王，也在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阵亡（公元 1439 年）。相比一直处在内耗之中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处在上升期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似乎更可靠些。合波兰、立陶宛人之力的波兰，在 15 世纪初击败了代表德意志东扩的“条顿骑士团”，并且让后者成为了自己的附庸。这一强势表现，让匈牙利人再次看到了希望，波兰国王很快也成为了匈牙利国王。

波兰－匈牙利联军与奥斯曼展开瓦尔纳战役

对于一直在与德意志人博弈的波兰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好机会。由于同属西斯拉夫属性的波希米亚，被先发的德意志人纳入了“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时期，捷克人也正在反抗德意志人的统治。史称“胡斯战争”），波兰人在战略上一直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也因为如此，才会选择和同样孤军作战的波罗的人代表（立陶宛）捆绑在一起。现在，如果能够借机坐实匈牙利的统治权，那么展现在波兰人面前的想象空间可就很大了。要知道西、南斯拉夫人的分割，正是由于匈牙利人的存在。然而这一切想象空间变成现实的前提，是波兰人能够帮助匈牙利战胜强大的穆斯林对手，他们能做到吗？

在取得了波兰人的支持后，匈牙利人在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中，一度表现的非常神勇。不仅把已经渗透到瓦拉几亚的土耳其人，赶回至多瑙河南岸，甚至还数次远征巴尔干，攻掠塞尔维亚境内的尼什、保加利亚境内的索非亚等土军控制的重要据点。以至于奥斯曼帝国主动放低姿态，愿意在保证塞尔维亚、瓦拉几亚为双方缓冲国的前提下，停战十年。然而在这一系列的胜利鼓舞之下，天主教世界更希望能够一次性的解决问题。公元 1444 年 9 月，总数约 15000 人的波兰、匈牙利军队从铁门峡谷越过多瑙河，开始向色雷斯发起进攻。由于这次战争名义上是由教皇策动（并提供了经济支援），也被视为最后的十字军之战。

从战略上来看，波兰－匈牙利联军是希望最终进抵君士坦丁堡，控制色雷斯土耳其海峡西岸。顺利的话，在失去后援的情况下，那些驻扎在巴尔干各个据点的土耳其人，将很快会被周边看到希望的基督徒们吞没。对于教廷来说，积极参与组织这场圣战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帮助那些异端的东正教徒了。如果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取得了胜利，那么这将是整个巴尔干东正教派基督徒，“回归”罗马教廷的最好时机。同时，唯利是图的威尼斯人，也终于承诺提供一定海上支援（由于对达尔马提亚的争夺，威、

匈长期不和）。为此，联军在渡过多瑙河之后并没有恋战，而是迅速向黑海方向攻击前进。



瓦尔纳战役



瓦尔纳位置图

然而就一场具备决战性质的战役来说，波兰－匈牙利联军的数量着实有些少，即使加上进军开始后加入的志愿军（主要包括4000瓦拉几亚骑兵），总数也只有2万之数。至于威尼斯人的海上支援，则是完全不可信任的。即使愿意履约，他们所能承诺的，也只是和希望看到十字军东征的君士坦丁堡一起封锁海峡。让人感到无语的是，海上封锁计划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不愿意看到威尼斯人做大的热那亚人，又一次偷偷的帮

助了土耳其人（当然是收了很多钱的），协助后者将数万士兵，从小亚细亚紧急运送至东色雷斯。需要说明的是，执行封锁任务的十字军舰队并非没有试图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只是早有准备的土耳其军队，在岸边布置了火炮压制了对手的攻击。

最终的决战发生在今天保加利亚沿海（黑海）的“瓦尔纳”，史称“瓦尔纳战役”。站在波兰－匈牙利人面前的，是数量 2——3 倍于他们的对手。当然，数量从来不是决定一场战役胜利的首要因素。不过从质量上来看，基督教方面也并不占优势。在激战的第二天，领导这场战争的波兰国王（同时也是匈牙利国王）战死于土耳其军队的阵中，随之“最后的十字军”也以一场惨败而收场。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瓦尔纳战役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在这场胜利之后，因帖木儿西征而迟滞了 40 年的土耳其扩张战争，再一次进入了高潮期。这一次，君士坦丁堡还有幸免的理由吗？

第三十章 奥斯曼征服巴尔干半岛

第一节 奥斯曼围攻君士坦丁堡

土耳其人构建堡垒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

一般情况下，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迫退位的公元 476 年，被视为欧洲古典时期的结束，也即中世纪的开端。在此之后，日耳曼人席卷了整个西欧，并最终造就了黑暗的西欧中世纪时代。相较于之前的古典时代，整个中世纪最大的地缘特点，就是地缘矛盾开始以宗教冲突的形式呈现出来。欧洲内部的东、西矛盾，演化成了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共存；欧洲与亚洲的较量，则披上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彼此“圣战”的外衣。

在中世纪的诸多战争中，除了对圣城耶路撒冷的争夺以外，兼有东正教中心地位的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应该是最具“圣战”意味的了。同时，每个时代都有终结的一天，如果说“西罗马”的终结开启了中世纪的话，那么没有比东罗马（拜占庭）的灭亡，更适合为这个时代画上终止符了。公元 1453 年，这个被帖木儿西征拖延了半个世纪的时刻终于来临。集结了 10 万陆军和 300 多艘战舰的奥斯曼帝国，开始了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击。

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土耳其人做了充足的准备。我们知道，君士坦丁堡能够矗立千年，很大程度得益于它那枢纽般的位置。身处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交汇处的“新罗马”城，即使陷入包围当中，也有机会从黑海、爱琴海两个方向获取战略支援。虽然现在君士坦丁堡已经没有什么海外领地了，但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在黑海、爱琴海拥有巨大利益的西欧海商共和国，并不会坐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为了切断拜占庭最后的希望，除了准备强大舰队之外，土耳其人还做了另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

13 世纪中叶的蒙古西征，使得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和火器技术得以传入欧洲。14 世纪，长期处于混战状态的欧洲，开始独立发展出自己的火炮技术，并在技术上逐渐超越中国。这一时期的欧洲火炮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发射石弹为主。在 15 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实心铁弹；二是以前装炮为主。弹药从炮口填入的方法，在当时更能保证炮管的密闭性；三是为精度、射程都较低的滑膛炮（在炮管内壁铸上膛线为线膛炮，可让炮弹旋转增加精度）。由于移动不便、发射效率低，加之精度不高，火炮在中世纪后期的野战中，并没能发挥太大作用。包括以同样原理小型化的“手炮”（火枪），使用上也远不如弓箭一类的冷兵器顺手。然而在诸如围城战一类的，针对某一个固定目标的攻击中，中世纪火炮（包括手炮）的上述缺点，却能够最大限度的规避。

在 14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君士坦丁堡时，土耳其人曾经在博

斯普鲁斯海峡中部最窄处（直线距离 700 米），构建了一座堡垒——奥斯曼堡垒（今称“安纳托利亚保垒”），以便在攻击君士坦丁堡时，切断对手来自黑海方向的外援。尤其主导了黑海贸易，在黑海拥有最多商业据点，并可能增援拜占庭的主要是热那亚人。不过以当时的火炮技术来看，即使距离如此之短，试图以火炮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也是比较困难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半个多世纪后，在君士坦丁堡战役开启的前一年（1452 年）。土耳其人又在奥斯曼堡的对面，抢修了一座更为坚固的堡垒：如梅利堡垒（又称“欧洲堡垒”）。



梅利堡垒遗址

君士坦丁堡独特的都城选址

合两座要塞型堡垒之力封锁 700 多米的水道，黑海而来的欧洲舰队再想增援君士坦丁堡，就要好好考虑一下损失问题了。相比之下，土耳其海峡的另一个出口达达尼尔海峡，最窄处约有 1300 米，封锁起来的难度就要大的多。在以要塞的形式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同时，奥斯曼将舰队陈兵于马尔马拉海海面，以阻击威尼斯人的支援。后者在爱琴海拥有诸多的据点和利益，同样不愿意看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这一策略整体是十分成功的，开战之后，威尼斯人在尝试过几次海上援助都没有成功，便在评估风险后放弃了。不过即使拥有强大的海、陆优势，土耳其人的军队也很难对君士坦丁堡造成全面的压力，这是因为拜占庭人的这座都城选址有其独道之处。

君士坦丁堡构筑于一个直指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接点的海岬之上，整座城市依地形而建，呈现为两面邻水、一面接陆的三角形。除了东、南部与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接之外，城市的北部有一条长约 7 公里的狭长水道——金角湾。

也正是因为金角湾的存在，方才造成了君士坦丁堡的三角形轮廓。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金角湾不仅是一个天赐的良港，更是一个几乎没有防御压力的方向。当拜占庭的海军占有优势时，停泊于金角湾的军舰可以很快出击，击溃来犯之敌；而当形势对拜占庭不利时，又可以在宽约 500 米的湾口拉起铁链、封锁水道。这样的话，整个金角湾就相当于一条宽阔的护城河，能够帮助君士坦丁堡缓解三分之一的压力。就目前的局面来说，封锁金角湾已是拜占庭人唯一的选择。



君士坦丁堡（右上海湾为金角湾）

土耳其人以巨炮轰君士坦丁堡

作为欧洲当时最大的城市，总面积约 16 平方公里的君士坦丁堡，人口最盛时达到百万之巨。然而拜占庭帝国的衰弱，以及孤城的尴尬境地，使得君士坦丁堡在兵临城下之下时，城内仅剩余 5 万人。其中包括热那亚雇佣兵在内的总兵力不到万人（金角湾还有 20 多艘军舰）。坚固的环状城墙是拜占庭人最可依托的屏障，没有海水庇护的西线也是防御的重心，共建有两道坚固的千年城墙。基于从海上攻上城墙的难度更大，部署于西线的土耳其陆军，也是这次战役的主力。为了攻陷这座坚固的堡垒，奥斯帝国总共铸了 70 余门重炮，其中最



土耳其人围攻君士坦丁堡

大的 12 门甚至能够把将近 700 公斤的石弹，发射到 1.5 公里之外。然而，巨大的威力也伴随着低下的效率，你甚至不得不在每次发射之后，重新构筑一个炮台（以至于一天只能发射数次）。这也使得拜占庭守军，有机会在两次发射的间隙修复受损的城墙。

第二节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土耳其人突破金角湾

坚固的城防，以及火炮低下的发射效率，让本以为胜券在握的土耳其人感到焦虑。为此，土耳其人希望能够突破金角湾的铁索，以迫使对手分散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兵力。事实上，铁索横江之术并非拜占庭人所独创。在中国历史上，长江就曾经多次成为这一战术的实施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三国后期“晋灭吴之战”中（公元 280 年），吴军试图以铁索横江阻挡从中游而来的晋国水军。不过这一战术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晋军以火船顺流而下，将铁链烧断的“火烧法”，攻克了这一人造天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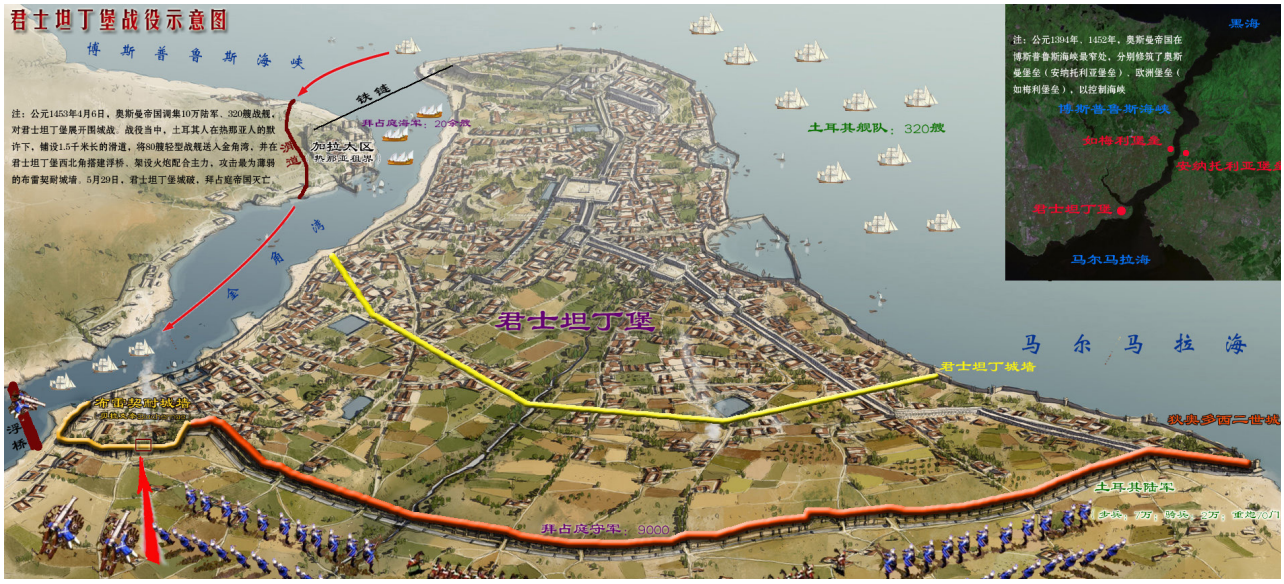
土耳其锡尔凯吉火车站



加拉塔

不过土耳其人并没有想到这个办法，他们用一个更“笨”的办法，而与土耳其人关系微妙的热那亚人，则再次为之提供了帮助。对于一条封锁港口的铁锁来说，君士坦丁堡所能直接控制的是它的南端。金角湾口的另一头，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金角湾包夹而成的另一个夹角，在这个夹角的终端名叫“加拉太”。今天，加拉太区也是伊斯坦布尔下辖的一个城区，而在当时，加拉太是热那亚人的居住区。

金角湾口的铁链横江战术，形成于公元 8 世纪初。铁链的两端被系于湾口南北的两座高塔之上：一头是加拉太的“加拉塔”；另一头则是今天君士坦丁堡锡尔凯吉的“尤金塔”（后来的锡尔凯吉火车站，也是著名的“东方快车”的起点）。很显然，君士坦丁堡和金角湾的安危不仅系于尤金塔，也系于加拉塔之上。在塞尔柱入侵小亚细亚，导致拜占庭势衰之后，加拉太区成为了威尼斯和热那亚争夺的焦点。能够入驻加拉太区，不仅意味着与拜占庭的结盟（同时负担或者说控制一部分防务），更意味着能够主导黑海贸易。最初得到这一特权的，热那亚人。13 世纪初，攻陷君士坦丁堡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威尼斯人曾经从热那亚人手中夺取了加拉太区的控制权。而在尼西亚帝国中兴拜占庭后，押注成功的热那亚人又夺回了加拉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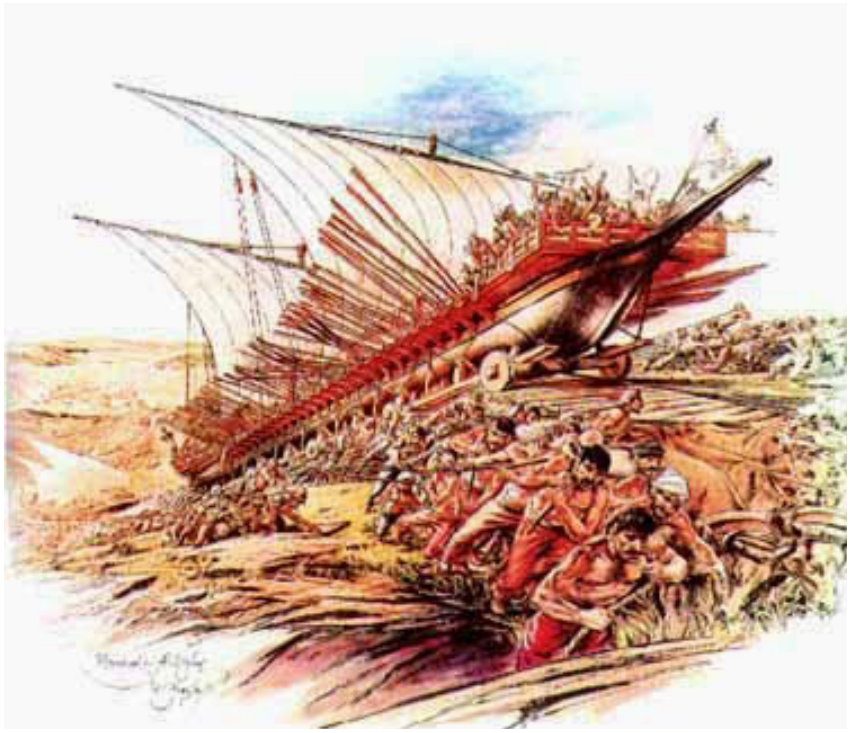


君士坦丁堡战役示意图

如果热那亚人决定投靠奥斯曼，那么金角湾的防线当不攻自破。为了让热那亚人配合，土耳其人也许诺他们在城破之后，将继续拥有原来的商业特权。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安危毕竟不同于以往的一些两面讨好的“资敌”行为，即使是商人本性的热那亚人，也无法作出如此站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对面的决定。只是就此断然拒绝土耳其人的请求，热那亚人又不免要考虑一下，城破之后自己所需承担的后果。为此身处加拉太的热那亚人做出了一个貌似“中立”的决定，那就是即不允许土耳其人从加拉太破坏金角湾防线，也不阻止土耳其人绕过加拉塔进入金角湾。

土耳其人通过滑道将军舰送入金角湾

如果土耳其人只是想把陆军运到金角湾的对面，那么他们并不要去找热那亚帮助。问题是只有把军舰，送进这个封闭的海湾，才能够对君士坦丁堡的防线构成压力。那么真的有这样的方法吗？答案是肯定的。土耳其人在加拉塔之北，用木材铺设了一条长约 1.5 公里的通道，并涂抹动物油脂，然后再以人力将船只拉过这条滑道，送入了金角湾。那就是把船只绕过铁链运进金角湾。比起“火烧法”来，这一做法的确显得有点“笨”。不过就技术层面来说，这个想法仍然不算是土耳其人首创。古埃及王朝



土耳其人将军舰运输到金角湾



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

时期，埃及人曾经用此方法，绕过尼罗河瀑布远征努比亚（今苏丹地区）。这一方法也曾运用到，沟通尼罗河下游与红海的交通中。不管土耳其人的做法是原创，还是从古埃及人那里得到的灵感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成功的把数十艘战舰偷偷的运入了金角湾。

土耳其人在军舰之间铺设木板（增强稳定性），并在木板上架设火炮攻击金角湾内的军舰，并火力支援在西线作战的土军。土耳其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座古城最为薄弱的城墙部分就在西北角。2 个半世纪之前，十字军们正是从这个方向攻破了君士坦丁堡。不过君士堡的上一次沦陷，很大程度是因为拜占庭内部的权力之争，削弱了防守意志。而这次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拜占庭人的抵抗则显得尤为坚决（包括热那亚雇佣兵），甚至包括帝国的末代皇帝也一直坚持在前线战斗（直至战死）。然而在西、北两线强大的炮火攻击之下，这一切都已不足以挽救这座古都的命运了。公元 1453 年 5 月 29 日，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一个屹立千年的帝国轰然倒下。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仅标志的中世纪的结束，同时也对欧洲地缘政治结构造成了巨大影响。此后，东正教和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变身成为了伊斯兰教和奥斯曼的“伊斯坦布尔”（直至今天）。当时之人应该没有想到，这一事件在欧洲乃至世界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会有那么的深远。这些影响也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逐步得到解读。

第三节 奥斯曼攻灭塞尔维亚王国

土耳其开始征服塞尔维亚

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帝国已经真正崛起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而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征程还远没有结束。在巴尔干东正教国家三强中，除了君士坦丁堡战役中被消灭的拜占庭以外，保加利亚王国已经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尼科堡会战后（公元1396年）不复存在了。唯一还在苟延残喘的，就是还在艰难保有大摩拉瓦河流域的塞尔维亚王国。至于塞尔维亚人在马其顿、塞萨利等地扩张的土地，则在科索沃战役之前，就已经被奥斯曼帝国所侵占了。

塞尔维亚之所以能够比保加利亚多续上一甲子的命，是因为在科索沃之战后选择了一个“务实”的做法，那就是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塞尔维亚重骑兵不仅配合土耳其人参与了尼科堡会战，甚至出现在了奥斯曼、帖木儿两个穆斯林帝国PK的安卡拉战役战场上。当然，这并不代表塞尔维亚人就此完全站在了穆斯林一方，并与匈牙利交恶。他们的种种做法，只是为了能够避免自己被奥斯曼帝国吞并。

然而在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塞尔维亚人希望保持的这种关系终于还是打破了。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的苏丹甚至给自己也戴上了顶“罗马皇帝”（凯撒）的头衔。虽然这让人多少觉得有点怪异，但一定要论理的话，似乎也没什么不妥。毕竟凯撒以及之后的罗马帝国（分裂之前），并没有基督教化。既然日耳曼人和希腊人，甚至保加尔人，都曾经试图继承罗马的政治遗产，那么由一个突厥穆斯林君主来这样做，又有什么问题呢？

不管是叫罗马还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欧洲的野心已经不能再容忍塞尔维亚的这种半独立的地位了。从位置上看，如果没有拿下塞尔维亚，土耳其人在欧洲的主要扩张方向，就只能是多瑙河下游的瓦拉几亚；而如果拿下了塞尔维亚，已经算是欧洲腹地的多瑙河中游平原，将为帝国的扩张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基于这个需要，在君士坦丁堡的秩序恢复之后，土耳其人旋即展开了对塞尔维亚的征服工作。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塞尔维亚人选择臣服于奥斯曼，是因为对方给自己留了一条生路。现在这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匈牙利人的支持成为了塞尔维亚人唯一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

土耳其人攻下贝尔格莱德城

在科索沃战役之后，塞尔维亚人没有再敢把都城，放在时刻面临土耳其人威胁的大摩拉瓦河流域，而是迁至了位于于萨瓦河、多瑙河交汇处的贝尔格莱德。在这个点上，塞尔维亚人能够最大限度，从隔河相望的匈牙利人那里得到支援（两河之北为匈牙利领土）。事实上，在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这个重要的巴尔干城市都还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伴随着匈牙利王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塞尔维亚的走强，它被当成一份礼物送给了与之结盟的塞尔维亚人（公元1284年）。



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

公元 1456 年，已经控制了大摩拉瓦河流域的土耳其军队，兵临贝尔格莱德城下，准备拿下这个北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要点。尽管匈牙利人给予了塞尔维亚人很大帮助，但贝尔格莱德这座孤城，还是毫无悬念的失守了。不过放在更大的历史空间中来看，贝尔格莱德的失守以及塞尔维亚王国的覆灭，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让塞尔维亚民族意外的渗透进了匈牙利平原。在贝尔格莱德失守之后，大批不愿意被穆斯林统治的塞尔维亚人渡过萨瓦河、多瑙河进入匈牙利境内，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复国成功。

由于匈牙利方面也希望这些塞尔维亚人能够帮助它固守南疆，避免土耳其人长驱直入，塞尔维亚人成功的在贝尔格莱德之北获得了合法居留权。这种情况，一如当年斯拉夫人被引入巴尔干北部，帮助拜占庭防御北方压力一样，只不过这次的方向正好相反。这片位于多瑙河、萨瓦河、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之间，包括部分蒂萨河下游在内的平原地区，被称之为“伏伊伏丁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以民族自决的名义肢解奥匈帝国的过程中，塞尔维亚人已经占据多数的伏伊伏丁那地区选择加入了塞尔维亚。今天在塞尔维亚的版图中，伏伊伏丁那与科索沃一样属于自治区（也是仅有的两个自治区）。值得庆幸的是，与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两族在科索沃的生死博弈不同的是，在欧洲民族和解的大背景下，伏伊伏丁那地区并没有成为匈牙利与塞尔维亚的争夺焦点。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吊诡，一段失败的经历反而可能成为民族扩张的一个机会，并且随之带来政治上的收获。一如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那段殖民史，反倒成为独立后政治诉求的依据一样。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对于政治家，还是地缘研究来说，只是着眼于政治边界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

第四节 奥斯曼在被统治区的民族和宗教政策

土耳其推行信仰自由和民族自治政策

如何管理被征服地区人民，是征服者永恒的话题。通常情况下，征服者并非意识

不到被征服者与自己民族、文化属性迥异所带来的风险。问题在于，强行融合本身会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尤其被征服地区人口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对于由小亚细亚一隅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奥斯曼帝国来说，如何对待境内繁杂的民族是必须直面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原本的基督教地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土耳其人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那就是在境内推行信仰自由和民族自治政策。一个被统治民族可以在不损害帝国利益的前提下（同时缴纳比穆斯林更高的赋税），保留自己的宗教、语言、文字等民族印记，并对内进行自我管理。这一制度被称之为“米勒特”制度。



圣索菲亚大教堂

在君士坦丁堡的管理问题上，上述政策也得到了体现。作为东正教的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牧首被允许继续驻守在新的“伊斯坦布尔”中。不过牧首原本最正统的驻地，也是东正教的宗教中心：圣索菲亚大教堂，则在被加建了四个礼拜塔（同时去除所有偶像痕迹）后，变成了穆斯林的清真室。另一个次一级的教堂“圣乔治教堂”，保留了下来成为牧首的驻地。很显然，在奥斯曼帝国看来，这样的安排即显示了政治上的主次关系，又能够让境内的基督徒们安心接受统治。

尽管允许被统治民族延续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但并不代表土耳其人就不会在巴尔干进行民族同化政策。除了强行征召入禁卫军的“血赋”（耶尼切里）以外，以及在战略要点迁入穆斯林驻扎以外，土耳其人还延续了阿拉伯人传播宗教时所惯用柔性的政策。那就是你可以选择变成一个穆斯林，接受这一变化的好处，就是可以承担较低的税赋，以及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鉴于穆斯林在巴尔干的统治长达 400 余年，可以想见的是，势必会有人受到这一条件的诱惑。在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希腊曾经和土耳其以宗教信仰为标准进行过人口交换（1923 年），将 50 万穆斯林人口送入了土耳其境内，这其中大部分就是伊斯兰化的希腊人。不过纯粹以人口数量来比较的话，希腊方面并没有占到便宜。因为同时有 150 万主要居住于小亚细亚沿海城市，在“米

勒特”制度下得以保留东正教信仰的希腊人，也被交换入了希腊境内。

不管土、希两国的人口交换到底谁占便宜谁吃亏，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那就是通过这种各取所需的自我“净化”行动，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算是解决了境内的宗教冲突危机。然而在没有进行过类似妥协的“南斯拉夫”地区，情况却变得空前的复杂。因为在这数百年的统治中，有一个敏感的区域成为了巴尔干穆斯林的集中地，那就是“波斯尼亚”。

波斯尼亚地区的伊斯兰化

关于波斯尼亚的地理特点，以及它在南斯拉夫民族分布区中的地缘位置，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解读过了。概括性的说，这是一片位于迪纳拉山脉分水岭与萨瓦河之间，以波斯尼亚河为中心的土地。如果没有土耳其人的介入，波斯尼亚毫无疑问只是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与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之间的问题。事实上，宗教信仰几乎是甄别你是克罗地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的唯一标准。所谓的塞尔维亚语与克罗地亚语，也被语言学家视为同一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二者的区别更多表现在书面上，前者用的是源自希腊语的“西里尔字母”，后者则使用“拉丁字母”进行拼读。看到这里，中国人是不是又为汉字没有“进化”为字母文字，以及当年秦始皇所推选的“书同文”政策感到庆幸？




波斯尼亚穆斯林

在土耳其人统治巴尔干时期，波斯尼亚地区归信伊斯兰教的“南斯拉夫人”数量是最多的。在今天内部分裂的“波黑”，穆斯林人口占据了将近一半。如果仅仅计算波斯尼亚的话，这个比例将更高。这一变化导致生活在波斯尼亚土地上的穆斯林，已经开始使用“波斯尼亚人”作为自己的族名了。很显然，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特别是前者）内心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古老的斯拉夫属性标签伊斯兰化。在这一切成为现实之前，这些同样说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穆斯林，一般被认为只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然而客观现实是，既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主要甄别标准在于宗教，那么波斯尼亚人成为穆斯林的专属似乎也同理可证。

如果不是出于宗教信仰问题，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在民族、文化上，一直在致力于

与土耳其人和伊斯兰世界加深联系的话，波斯尼亚作为一个地缘标签，本来也是有机会剥离出独立政治、民族史的。因为在塞尔维亚崛起的 12 世纪末，波斯尼亚的南斯拉夫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体“波斯尼亚公国”。虽然统一了大摩拉瓦河流域，并向南扩张至马其顿等地的塞尔维亚人，在“帝国时代”曾经征服过波斯尼亚，但后者很快便又脱离了塞尔维亚重获独立。换句话说，波斯尼亚并不是塞尔维亚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在铁托时期，波斯尼亚加上迪纳拉山脉分水岭之南的山地板块“黑塞哥维纳”被合在一起，获得了独立共和国地位的原因（而不是并入塞尔维亚）。

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塞尔维亚之后，波斯尼亚以及黑塞哥维纳地区很快也成为了帝国的领地，并长期成为奥斯曼帝国向匈牙利（包括克罗地亚）渗透的前线地区。波斯尼亚位于天主教世界与东正教世界交汇处的地缘位置，为土耳其人推进的宗教同化政策提供机会。部分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形成政治、民族认同感，又担心被挤压生存空间的波斯尼亚人，心理上有更有动机通过改变信仰，来维持甚至扩张自己的利益。这与土耳其人战略上，希望在天主教南斯拉夫人与东正教南斯拉夫人之间，契入“伊斯兰化波斯尼亚”这棵钉子，以稳定巴尔干北部局面的想法相一致。基于这种微妙的关系，波斯尼亚成为巴尔干伊斯兰化的集中区，并最终形成穆斯林属性的“波斯尼亚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波斯尼亚并非是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上，进行宗教同化政策成功的唯一区域。相比这片南斯拉夫人腹地，伊斯兰教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阿尔巴尼亚的推广，要显得更为成功。不过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土耳其人在这个方向的扩张，并不仅仅影响到了阿尔巴尼亚人的信仰，也让“南斯拉夫人”内部的地缘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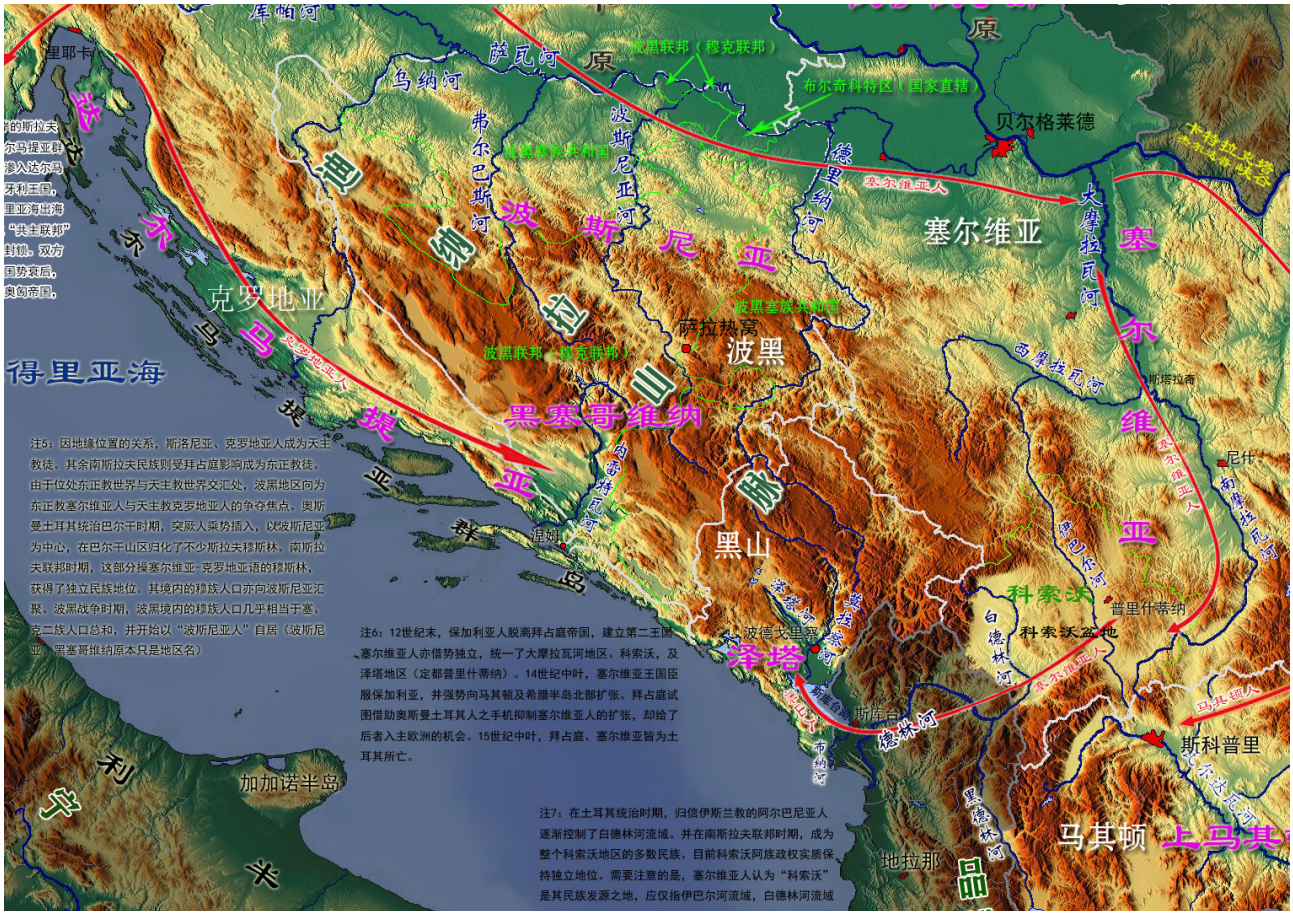
第五节 奥斯曼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扩张受阻

达尔马提亚免遭土耳其的占领

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征服虽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巴尔干地区都成为了穆斯林的统治区。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土耳其人的扩张就遇到了困难。伴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极度依赖东地中海贸易的威尼斯、热那亚，不可避免的进入了衰退期。要知道商业行为的本质，就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获取利益。一个多方角逐甚至混乱的世界，会更有利于商人们的发挥。事实上，这些意大利海上共和国的崛起背景，正是源于拜占庭帝国的衰弱。当东地中海的统治力开始被一个更加集权的穆斯林帝国所掌握时，可想而知会对威尼斯、热那亚这样的商业共和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奥斯曼帝国这个共同的敌人出现，也并没有让这对冤家和解，为了争夺西地中海的商业利益，两个相爱相杀的海上共和国之间竞争反而变得更加的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威尼斯更需要达尔马提亚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巴尔干半岛顺风顺水的奥斯曼，也希望能够拿下达尔马提亚，这样的话整个意

大利就将呈现在土耳其人的眼前。如果土耳其的对手只是匈牙利的话，情况会变得更加简单。只要先拿下了克罗地亚人的斯拉沃尼亚，就可以顺势进入达尔马提亚。问题是达尔马提亚也是匈牙利与威尼斯的争夺焦点，前者在通过共主联邦的形式成为克罗地亚宗主后，得以入主达尔马提亚。进入 15 世纪以后，由于要应对来自奥斯曼方向的威胁，匈牙利与威尼斯在争夺达尔马提亚的博弈中，逐渐落入了下风，后者也终于控制了这片它最为看中的海外领地。这个消息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并非好事，毕竟与爱琴海的情况不同，在亚得里亚海威尼斯人才是主场。



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

黑山保持独立并对抗土耳其人

力保达尔马提亚的威尼斯，并非是土耳其人在亚得里亚海沿线遇到的唯一障碍。有一块天然封闭之地，同样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征服中幸免于难，它就是“南斯拉夫人”的黑山。如果不是因为现在的黑山已经分割成为了一个独立民族，我们本来是可以将之称为“塞尔维亚人的黑山”的。就历史来说，以泽塔河谷为核心的泽塔公国，与大摩拉瓦河流域的政治统一，可以说是塞尔维亚历史的政治起点。15 世纪中叶，在整个大摩拉瓦河流域的塞尔维亚及相邻的波黑地区被土耳其人征服之时，凭借迪纳拉山脉的庇护（这段山体是整个巴尔干半岛最“厚”处），泽塔地区顽强的维持了自己的独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泽塔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开始称自己的土地为“黑山”。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一个音译而是一个意译的名称。由此也可以看出来，维系黑山

人独立的主要地缘力并非来自海洋，而是他们背后复杂的山地。

当然，面临如此强大的压力，仅仅凭借地利是远远不够的。为此，黑山人在政治上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教合一政策（君主同时也是最高宗教领袖），以此来对抗同样这样做的穆斯林政权。基于黑山的群山包围的地理结构，土耳其人很难直接跨越迪纳拉山脉进行征服。最好的战略路线是从科索沃盆地出发，沿德林河而下，从斯库台湖沿岸进入泽塔河谷。土耳其人也的确这样尝试过了，问题还是在于，在这样一个由高大山脉包围的狭小平原上，征服者在低地的统治力会战略性的遭受来自高地的压力，尤其是斯库台湖的存在，更加容易让征服者陷入被切断后路的窘境。在中央之国的扩张史中，类似的处境曾经多次在朝鲜半岛及越南半岛北部出现，以至于最终不得不永久性的放弃这种尝试。

第六节 奥斯曼征服阿尔巴尼亚地区

阿尔巴尼亚人改宗伊斯兰教

相比在黑山地区的困境，土耳其人在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征服反而要顺畅的多。尽管从技术上看，黑山困局也同样应该在阿尔巴尼亚地区上演。然而作为整个巴尔干地区最弱小的民族，这些古伊利里亚人后裔，并没有选择强硬对抗土耳其人，而是整族改变了信仰。作出这种选择的直接原因，很大程度是基于与南斯拉夫人竞争关系的考虑。与之前倾心贸易的希腊人，以及拥有庞大版图的罗马不同，南斯拉夫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之间是生存之地的竞争。如果没有土耳其人的到来，已经控制了科索沃和黑山的塞尔维亚人，势必继续向南蚕食斯库台湖以南的土地，最低限度也要拿到整个德林湾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等于给了阿尔巴尼亚人一个机会。只要接受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那么他们就能够比固执坚守自己信仰的塞尔维亚人，占据更有利的身位。

当然，对于之前已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民族来说，这种改变一般是十分困难的。在奥斯曼帝国的东部，同样被土耳其人统治的亚美尼亚人，就一直不愿意接受这种改变。以至于在上个世纪初，土耳其人用大屠杀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国内民族结构（西部与希腊则是人口交换）。不过这种转变对于阿尔巴尼亚人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上世纪中叶，阿尔巴尼亚人在信仰问题上所作出的另一次彻底改变能够提供佐证。在那次成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转变中，当时的执政者甚至使用了强迫改变饮食习惯（你懂的）的手段进行快速推进。以至于事后他们可以骄傲的对东方的盟友说，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无神论国家”（东方盟友肯定不会认可这点）。

今天的阿尔巴尼亚虽然被一些资料标注为以伊斯兰信仰为主，但大多数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其实尚无特定的立场（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身处一神教的地缘圈内，阿尔巴尼亚迟早有一天还是会成为上帝或真主之地的。具体怎



黑山与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国旗

么选择，就要看时事如何变化了。当然，这么重大的改变，过程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比如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阿尔巴尼亚人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反抗者，包括少部分不愿意改变信仰的人逃往意大利。现在阿尔巴尼亚国旗上的双头鹰标志，就是 15 世纪中叶阿尔巴尼亚反抗者，曾经使用过的标志（源自东罗马帝国）。不过在进入 16 世纪后不久，零星的反抗便已不复存在了。比起誓死抵抗的黑山人来说，这些抵抗的力度着实有限。

黑山能够独立的原因

回到黑山问题上来。一定要拿下黑山的话，土耳其人并非做不到，只是凡事都要衡量一下代价，就像美国实力再强，也不会把精力全耗在阿富汗一样。现在，有了愿意跟随真主的阿尔巴尼亚人协助，不仅可以“以夷制夷”的牵制黑山人，还能够为整个帝国武装提供可靠的兵源。应该说，从民族生存的角度看，彻底倒向穆斯林的阿尔巴尼亚人，成功的抵御住了长期以来对塞尔维亚人的劣势。并且开始顺着德林河——白德林河，向科索沃地区反渗透成功。以至于今天，在塞尔维亚民族源头的东科索沃地区（伊巴尔河谷），阿尔巴尼亚人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并事实独立成了“科索沃共和国”。由此也使得黑山那些“比塞尔维亚人还塞尔维亚人”的古塞尔维亚人后裔，因在与大摩拉瓦河流域的同族沟通时，战略上缺少了科索沃这一环，最终演变成了独立的“黑山人”。

抛开本身的地理优势不说，黑山能够不被奥斯曼帝国所吞并，还受益于它正处在

达尔马提亚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位置。这使得黑山人在战略上，不至于被奥斯曼帝国封锁。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削弱威尼斯才是问题的关键。放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看，削弱威尼乃至打击整个西欧的经济基础，更牵扯到土耳其能不能再往西走的问题。有一个比较普遍被接受的看法是，拿下君士坦丁堡并进而控制了整个东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断绝了与西方贸易往来。并导致欧洲被迫将视线转向大西洋，触发了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

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的确影响了东、西方贸易通道的畅通，逼迫欧洲进入大西洋探险；说它不对，是因为土耳其人固然是利用自己在东地中海的支配地位，打击了西欧的经济，但东、西方贸易并没有因此而禁绝。只不过，被挤压出黑海、爱琴海的威尼斯、热那亚，已经没有可能在地中海贸易中起到支配作用（也就不可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同时，占据了市场支配权的土耳其人，也寻找到了符合自己战略利益的代理人。

第七节 杜布罗夫尼克在海洋贸易上的异军突起

奥斯曼入侵给了杜布罗夫尼克崛起机会

新的地中海贸易中转者名字叫做“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古名“拉古萨”）。对于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会感到陌生。如果你手边恰好有一张巴尔干半岛的地图，它的位置倒也不是很难找。当大家把视线放在巴尔半岛的海岸线时，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波黑所获得的海岸线，与其陆地的纵深远远不成正比。仅仅是在一个叫做“内乌姆”（又译“涅姆”）的城市，延伸出了 24.5 公里的海岸线。事实上，这个长度还是把突出的半岛海岸线给算了进去，这个出海口真正的直线宽度只有 7.5 公里。很显然，这样一个硬挤出来的出海口，一定是某种妥协的产物。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的领地，就是在涅姆与黑山共和国之间的这段岸线上。今天它的归属国是克罗地亚。至于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奇怪的归属，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解读的



波黑海岸线示意图

了。

在斯拉夫人南下之后，杜布罗夫尼克也和相邻地区一样，成为了斯拉夫人之地。从地理属性来看，杜布罗夫尼克属于达尔马提亚的最南端，也是达尔马提亚群岛能够庇护的最后一片土地。有鉴于此，无论是拜占庭人、匈牙利人还是威尼斯人，在取得了达尔马提亚控制权的同时，也都同时将杜布罗夫尼克纳入了势力范围。然而奥斯曼帝国对亚得里亚海的渗透，以及黑山这颗钉子的存在，给了这片三方势力相接处的海岸脱颖而出的机会。



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地图



杜布罗夫尼克

当奥斯曼帝国决定以贸易封锁的方式削弱威尼斯时，杜布罗夫尼克人适时的向土耳其人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并愿意以称臣纳贡的方式，成为穆斯林政权在地中海的商业代言人。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尽管在征服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后不久，就从波斯尼亚方向翻越迪纳拉山脉分水岭，控制了黑塞哥维纳山地，但却仍然无法在海洋属性明

显的达尔马提亚地区战胜威尼斯。在这种情况下，杜布罗夫尼克人愿意主动表示臣服，帮助帝国在黑山与达尔马提亚之间打开个缺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虽然土耳其人也可以尝试一下征服杜布罗夫尼克，不过这样做的意义并不大，只会把对方推向威尼斯人。

杜布罗夫尼克成为威尼斯的海上竞争者

当然，杜布罗夫尼克人对奥斯曼帝国所表示的臣服，并非是真的政治归顺，也并不表示会转变原本的基督教信仰和商业共和国属性，更多是一种双赢的同盟关系。这种双重属性，一方面为他们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取了商业特权；另一方面又使之能够与西欧国家顺畅的进行贸易。而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杜布罗夫尼克共和国”有实力在整个西地中海的贸易中，与威尼斯人展开竞争。回想一下，在整个东亚大陆因为政治原因游离于全球贸易圈外之时，地缘上拥有双重属性的香港，是如何抓住机会成为“东方明珠”的，相信大家就能够理解杜布罗夫尼克，为什么能够成为“亚得里亚海滨明珠”的了。

不管杜布罗夫尼克人，是如何运用外交手段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回旋于天主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做法使之成为了威尼斯人的死对头（这也是土耳其人愿意看到的结果）。由于二者领地相接，这种冲突也让体量较小的杜布罗夫尼克人倍感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7 世纪的最后一年，杜布罗夫尼克将它最北部的一小段海岸线交给了奥斯曼帝国。这样的话，奥斯曼帝国算是为自己统治下的波黑取得了一个出海口，而杜布罗夫尼克则在自己和威尼斯之间筑起了一堵防火境。这段海岸线叫什么，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答案了，它就是今天波黑唯一的出海口——内乌姆（涅姆）。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内乌姆的体量以及它所面临的竞争，这段海岸线始终没有开发成为一个海港城市。今天它的经济，更多依赖于比之周边克罗地亚地区更高的旅游性价比（吸引来的游客）。至于杜布罗夫尼克人，基于他们的海商属性，以及当时东正教世界的衰弱，他们在宗教上选择了天主教。这也使得后来在划分民族及政治归属时，杜布罗夫尼克选择成为了克罗地亚的一员。

第三十一章 奥斯曼向黑海沿岸地区扩张

第一节 奥斯曼吞并原拜占庭帝国其他地区

奥斯曼攻取特拉比松和摩西亚

通过对奥斯曼崛起过程的梳理，我们终于对巴尔干的地缘结构有了个基本了解。相信这个巴尔干火药桶再发生点什么意外，大家在看相关新闻时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当然，我个人是非常不希望看到再有战乱的）。不过回到时间轴上来看的话，对君士坦丁堡和塞尔维亚、波黑的征服，还远不是土耳其人扩张的终点。在扩张这条道路上，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将走得更远。

虽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直被当成拜占庭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君士坦丁堡并不是拜占庭的最后一块土地。从技术上来看，这并不是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陷落。十字军在二个半世纪前的那次征服，就曾经让拜占庭帝国“死”过一回。后来的中兴似乎也在告诉大家，一切皆有可能。就那一次中兴来说，三个没能被拉丁帝国覆盖，且以拜占庭帝国继承者自居的王朝：尼西亚帝国、特拉比松帝国，以及伊庇鲁斯国的存在，是拜占庭能够复国的关键。最终完成这一中兴伟业的，是控制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帝国。



奥斯曼帝国地图（公元 1453 年）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没有在上次中兴之时回归拜占庭的特拉比松帝国，以及拜占庭在伯罗奔尼撒的海外领地（拜占庭称“摩里亚”）是保留拜占庭火种的最后希望。其中摩里亚甚至还在被征服之前，吞并和臣服了希腊半岛上两个最后的拉丁小国：

伯罗奔尼亚半岛北部的亚该亚公国，以及维奥蒂亚－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公国。从地理角度来理解的话，拜占庭的这两个火种一个位于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一个则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东北角。

君士坦丁堡城破之后，上述两个边缘之地成为拜占庭逃亡者的避难之处。假定这次君士堡的征服者，还是如十字军那样的一盘散沙，我们有理由相信拜占庭的这两个火种能够延烧下去。不幸的是，土耳其人来自有专制传统的亚洲，同时这次也没有试图乱中取利的威尼斯商人幕后操纵一切。因此在攻陷贝尔格莱德后不久，土耳其人就拿下了特拉比松和摩西亚（公元 1460-1461）。那些不甘于被穆斯林统治的拜占庭精英们，除了小部分能够躲在杜布罗夫尼克坚持他们的信仰以外，大部分都逃入了意大利，并对西欧已经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拜占庭文明传入西欧

当年在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之时，拜占庭为欧洲延续了罗马文明之光。现在，当“东罗马”成为历史时，结合了希腊、罗马两大文明基因的拜占庭文明，又开始反哺已经日耳曼化的西欧。从这个角度说，认为欧洲文明曾经在中世纪中断，并将之归为“黑暗时代”的想法是过于狭隘的。这种情形，与华夏文明曾经先由北方向南方传递，在中原为蛮族所据时，衣冠南渡者又为华夏文明保留了火种，并周期性的帮助北方恢复华夏的情况有着相似之处。

当然，欧洲文明能否延续，肯定不是奥斯曼帝国所思考的问题。作为历史上最成功的穆斯林帝国，土耳其人所希望做的是尽可能的让真主之光在欧洲走得更远。对于这股源自亚洲草原的政治力量来说，有一个地缘结构上的利好，那就是在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有潜在的盟友可以利用。大多数时候，这个方向才是欧洲感受亚洲压力的主方向。在奥斯曼帝国崛起的这些年里，虽然这片草原的统治者仍然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术赤”系），但却已经完成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程。二者如果能够以某种形式结成同盟，可想而知会对欧洲的基督教世界造成多么大的压力。

第二节 奥斯曼羁縻克里米亚汗国

金帐汗国的分裂

并不是说有同样的出身和相似的地缘属性，就能完成政治上的联合的。大多数时候，双方需要在战场上验证下对方的实力，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主导者。如果不算上退入蒙古高原后不久，就陷入分裂状态（黄金家族甚至失去了主导权）的大蒙古国中央汗国（北元），成吉思汗完整流传至 15 世纪的政治遗产，几乎就只剩下金帐汗国了。能够做到这点，取决于金帐汗国广袤的领土，大多数都处在欧亚草原之上。相比之下，其它几个蒙古政权，都过于依赖定居区了。在帖木尔帝国尝试接收成吉思汗的遗产过程中，曾经在伏尔加河大败金帐汗国，但实际获得的领土却只有花剌子模，就很能说

明问题。这与明朝纵然能够代表汉族光复中原，却也始终不能向草原延伸控制力是一个道理。

虽然比其它蒙古汗国国祚更长，不过金帐汗国也同样逃不脱“合久必分”的规律。15 世纪中叶，在奥斯曼攻灭拜占庭、塞尔维亚前后，金帐汗国彻底陷入了分裂。其中以哈萨克丘陵为核心的亚洲草原部分，裂变出了“哈萨克汗国”（公元 1456 年）；哈萨克丘陵以北的西西伯利亚平原，成为了“西伯利亚汗国”（公元 1460 年）；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割裂出“诺盖汗国”（公元 1440 年）；原为保加尔人所有的伏尔加河中游，变身为“喀山汗国”（公元 1438 年）；伏尔加河下游至外高加索地区则是“阿斯特拉罕汗国”（公元 1459 年）；以克里米亚半岛 - 亚述海为核心的黑海北岸地区，建立起的是“克里米亚汗国”（公元 1430 年）；而继承金帐汗国正统地位的“大帐汗国”，就只剩下伏尔加河以西至第聂伯河之间的草原了。能够让成吉思汗略感安慰的是，这些汗国中的绝大部分仍然是由他的子孙所统领。



金帐汗国分裂的各汗国（公元 1500 年）

看到这么多“汗国”密布于欧亚草原之上，是不是感到头晕？实际情况其实比这还要复杂。不过不要紧，这些游牧政权并非现阶段所解读的重心，将之罗列出来只是让大家感受一下，15 世纪中叶欧洲草原的混乱局面。对于游牧出身的奥斯曼帝国来说，将整个南俄草原纳入自己的治下本来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这其中又以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汗国最为重要。作为东欧与地中海的贸易中转地，草原丝绸之路对接地中海的枢纽点，克里米亚的重要性甚至在古希腊时代就得到的验证。公元 7 世纪的可萨汗国，更是藉此建立了一个商业属性明显的草原帝国。

奥斯曼将克里米亚汗国纳入帝国体系

在巴尔干的局面安定之后，土耳其人曾经尝试过以武力方式征服克里米亚。不过考虑到直接控制这片草原之地的难度，他们很快改变了主意，决定以羁縻的方式将克里米亚汗国纳入自己的帝国体系（公元 1477 年），并同时接收热那亚人在半岛南部的殖民点。对于克里米亚人来说，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并没有什么坏处，这个同

宗（教）同源（突厥）的强大帝国承诺，能够帮助他们成为南俄草原的霸主。有了土耳其人作为后盾，克里米亚人也的确做到了这点。在大帐汗国崩溃后，克里米亚一直以金帐汗国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并成为南俄草原秩序的维护者。

有了克里米亚这个“一致行动人”，奥斯曼帝国相当于在黑海北部开辟了第二战场。这使得土耳其人有机会，将整个黑海变为自己的内海。为了完成这个闭环，穆斯林政权还需要臣服三个基督教属性的板块：格鲁吉亚、瓦拉几亚，以及摩尔达维亚（摩尔多瓦）。其中后两者与特兰西瓦尼亚一起，形成了今天的罗马尼亚。在罗马－达契亚战争中，我们已经解读过罗马尼亚这三大板块的基本属性了。地理上，高原（特兰西瓦尼亚）、平原（瓦拉几亚）、丘陵（摩尔达维亚）错落有致；民族属性上，融入罗马的历史以及语言上的拉丁化，成为了这些“古达契亚／罗马”的后裔，维持独立民族属性的重要标志。“罗马尼亚”这个地缘标签也开始浮出水面。

第三节 奥斯曼征服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

瓦拉几亚脱离匈牙利后被奥斯曼控制

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在多瑙河中游的做大，以及斯拉夫人的南下，对身处喀尔巴阡山脉两侧的达契亚人都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斯拉夫化、东正教化的保加利亚人，与归信了天主教的匈牙利人，曾经是角逐达契亚地区最重要的两股势力。由此，达契亚地区也成为了东正教与天主教交锋的焦点地区。总的来说，匈牙利人在控制特兰西瓦尼亚的问题上更占优势，而保加利亚人控制隔河相望的瓦拉几亚会更为便利。至于摩尔达维亚，它更多要警惕来自南俄草原的压力。比如在沙俄和苏联时期，这片丘陵的东半部就成为了这个东欧帝国的一部分。以至于在苏联分裂之后，独立出来了个与罗马尼亚人同宗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原为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巴尔干地区政治局势（公元 1509 年）

由于 11 世纪初，保加利亚人（第一王国）在与拜占庭帝国的对决中失败，同时匈牙利人又因成为“基督教之盾”而获得了替天主教世界，在多瑙河中、下游扩张的机会，整个达契亚地区很快都成为了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不过以匈牙利核心区的位置来说，控制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还是颇有些难度的。在王国的中央集权力出现问题之后，上述两个板块在 14 世纪中叶先后脱离匈牙利的控制，成为了独立的公国。基于摆脱匈牙利人（包

括后来控制匈牙利的德意志人）控制考虑，这一时期也成为罗马尼亚人彻底倒向东正教信仰的重要时段。不过悲剧的是，处在这样一个四战之地，匈牙利人并不是罗马尼实现民族、政治独立的唯一障碍。

在征服保加利亚以后，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开始了对瓦拉几亚征服。在整个 15 世纪上半叶，瓦拉几亚与奥斯曼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几经波折（时而臣服，时而对抗）。总的来说，这取决于以匈牙利为首的基督教世界是否给力。在集合了波兰－匈牙利之力的“瓦尔纳战役”（1444 年）失败之后，基督教世界已经无力再阻止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做大了。这一战略背景所导致的直接后果，除了拜占庭和塞尔维亚的彻底终结以外，就是处在前线位置的瓦拉几亚再无外援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瓦拉几亚却神奇般的在欧洲历史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弗拉德三世

瓦拉几亚大公弗拉德三世对抗奥斯曼人

很多人知晓“瓦拉几亚”，是因为一个叫做弗拉德三世的瓦拉几亚大公。这个在公元 1448 年——1476 年期间，曾经三度执政瓦拉几亚的贵族，在传说中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称呼：“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在欧洲吸血鬼的传说原型中，有很多是因为身患一种叫做“卟啉症”的病症（俗称“吸血鬼症”）。阳光会让“卟啉症”患者的皮肤感到有灼烧感，并起水泡。大多数患者，能够通过向体内补充血红素来缓解症状。问题在于，当有患者发现能够通过吸食鲜血的方法让自己更舒服点（因为没有输血技术），而这种行为又被其他人看见时，你能够想象这会被渲染成什么样子。

不过弗拉德三世变成为“吸血鬼”却并不是因为“卟啉症”，而是因为他在抗击奥斯曼人入侵的过程中，将战俘用尖木桩穿刺起来，布设于对手前进道路上的恐怖做法。最夸张的说法是，曾经有一次性有多达 2 万名土耳其战俘“享受”取了这种待遇。虽然弗拉德三世的这种抗争，在战略上并没有挽救瓦拉几亚的命运，瓦拉几亚最终还是被亲奥斯曼的贵族所控制，这位反抗者本人也死在了战场之上。然而在整个欧洲都

用恐惧的目光张望着土耳其人时，有这么一个敢于以暴制暴对抗入侵者的人物出现，无疑会触发人们心中的英雄情结。这这种情况下，越是将之描绘可怕，越是能够给自己壮胆。

奥斯曼与瓦拉几亚及摩尔达维亚保持附庸关系

在摆平了瓦拉几亚后，土耳其人开始向摩尔达维亚扩张，同时期归附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汗国，则从东线给予了支持。摩尔达维亚公国所能够得到的最大后援，是身处其北部、控制了加利西亚地区的波兰王国，只是波兰人并不能帮助摩尔达维亚摆脱奥斯曼帝国的压力。幸运的是，有鉴于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这两个“东正教——罗马尼亚人”属性的公国，在奥斯曼帝国与天主教世界之间的特殊位置，土耳其人并没有谋求将二者变为直接领土，而是满足于建立宗主与附庸国式的主从关系。

在这种关系的维持中，整个罗马尼亚民族的东正教徒身份被得到了强化。基于东正教徒以及“罗马”后裔的身份，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很希望能够在宗教、文化上继承拜占庭的衣钵。鉴于君士坦丁堡（包括牧首）已经在土耳其人的完全控制之下，土耳其人认为自己有机会将这层联系用来强化政治控制，并透过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将这种间接影响力向还在天主教世界控制之下的特兰西瓦尼亚渗透。反之，如果土耳其人在宗教和政治上显得不够宽松的话，这种作用力就有可能是相反的了。

第三十二章 波斯萨非王朝的兴起及与奥斯曼的对抗

第一节 阿塞拜疆突厥人建立萨非王朝

伊尔汗国崩溃的波斯政治格局

作为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帝国之一，奥斯曼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止于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很大程度上，土耳其人还取得了阿拉伯帝国的遗产。之所以不能说全部，是因为这个突厥人的帝国并没有拿下波斯。从塞尔柱帝国时起，中亚的突厥语游牧部落，就开始源源不断迁往西亚，即使在伊尔汗国时代，这一进程也仍然没有中止。一如其他几个远离蒙古高原的蒙古汗国一样，已经先期覆盖中亚乃至欧洲草原的突厥语游牧部落，成为了蒙古人在军事上所倚重的对象。气候凉爽，适合游牧经济的阿塞拜疆地区，在这一时期彻底完成了突厥化进程。

14 世纪中叶，在蒙古人的伊尔汗国崩溃后，拥有军事优势的阿塞拜疆突厥人，开始在群雄逐鹿的西亚地区显露优势，先后建立了黑羊、白羊两大王朝，并一西一东的在西波斯以及美索不达不亚展开竞争。在历史资料中，这些突厥人通常被称之为土克曼人或者土库曼人，只是鉴于土库曼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及其主体民族的标签，再用这个标签难免会引发认知上的混乱。

15 世纪后期，在奥斯曼帝国完成对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的整合工作之时，波斯方向的竞争也告一段落。以逊尼派教义立国的白羊王朝，战胜了以什叶派教义立国的黑羊王朝，统一了西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同时，白羊王朝还在高原东北部，中亚属性的呼罗珊地区击败帖木尔的子孙。一个强大而又统一的“突厥－波斯”王朝，成为了土耳其人在东线的强劲对手。

不过白羊王朝后来并没有成为土耳其人在 16 世纪的对手，因为白羊王朝的政治收获很快被另一个王朝——萨非王朝（萨法维帝国）所“继承”。这一微秒关系，大家可以比照一下中国的秦汉、隋唐等关联王朝之间的关系，大致就明白了。如果再做进一步比较的话，会发现萨非王朝在今日伊朗历史上的地位，与汉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借这个机会解读一下，有助于大家深层次理解今天伊朗内政、外交上的诸多疑惑之处。

萨法维教团建立萨非王朝

与黑羊王朝一样，萨非王朝也是一个什叶派王朝，并且也是依托阿塞拜疆突厥人夺取的政权。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是一个由部落体进化而成的君权王朝，后者则是一个从神权切入的政教合一帝国。王朝的统治者“萨法维家族”，在 13 世纪末创建了一个以阿塞拜疆突厥部落为核心的宗教团体（萨法维教团）。发动针对周边基督教民族的圣战，是它向一个军事化组织转变的开端。由于这些突厥裔的教团成员头戴



萨法维教团

十二角红帽，所以也被称为“红头军”（红帽军）。这些特性与十字军时期的那些“骑士团”颇有些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十字军骑士团在宗教、政治层面是受罗马教庭节制，并最终为西欧的世俗政权所压制，而在伊斯兰世界，萨法维教团最终夺取了政权。

事实上，当年的阿拉伯帝国正是凭借政教合一，以教制军的模式迅速建立起帝国的。以此来看萨非王朝的成功，也算是有前车之鉴。然而要想在地缘结构异常复杂的西亚建立帝国，仅仅有被宗教武装起来的“红头突厥人”协助是远远不够的，尤其西边还有虎视眈眈的奥斯曼帝国。当年曾经挑战蒙古帝国的“山中老人”（阿萨辛派）同样是这种模式，却没有能够走得更远。萨非王朝必须从政治、宗教、军事、民族等几方面都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才有机会重新把波斯统一在一起，并抵御住土耳其人的压力。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排他性极强的“一神教”教义成为最高意识形态的地区，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也会体现在不同派别的宗教信仰上。在波斯的分裂时期，这种现象就曾经多次出来过。比如黑羊、白羊王朝，就分别站队什叶、逊尼两派。至于创建于 13 世纪末的“萨法维教团”，也并非一开始就把自己归类于什叶派，而是在 15 世纪中叶开始以什叶派立教。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是萨法维教团作出这一转变的原因之一。

做出这一选择的大背景是，曾经被帖木儿帝国打败而延缓扩张步伐的奥斯曼帝国，又重新在东、西两线开始了强势扩张。在政治上已经十分成功的奥斯曼帝国，并没有选择什叶派的需要。虽然土耳其人十分成功，他们的成功也可以说的上是“突厥之光”，但并不代表每个与之有类似民族属性的人，都愿意接受其统治。尤其是小亚细亚东部那些，原本保持独立的突厥人部族。在这种情况下，打出在波斯建立“什叶派政权”旗号，并且在军事上已经显示出强大战斗力的的“萨法维教团”，对他们就很有吸引力了。

公元 1501 年，萨法维教团的红头军队攻陷了白羊王朝的都城。并在阿塞拜疆的大不里士正式建立“萨非王朝”。此后不久，萨非王朝得以站在白羊王朝的肩膀上，迅速统一整个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稍晚一点，帖木儿的子孙“巴布尔”也夺取

了印度的统治权，建立了突厥－伊斯兰属性的“莫卧儿王朝”（公元 1526 年）。这样的话，在十五世纪初，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这条文明带上，就同时出现了三个强大的“突厥－伊斯兰帝国”。三大帝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处理内部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



伊朗萨法维帝国

第二节 萨非王朝在民族和宗教的政策

萨非王朝为巩固政权在宗教和民族融合上的设计

在如何处理民族和宗教的问题上，相比奥斯曼帝国和萨非王朝，莫卧儿帝国所遇到的问题算是最小的了。一方面，自雅利安人入侵南亚次大陆以来，印度就建立了一套凝固社会阶层的“种姓”制度；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所面临的被征服境地，让印度社会在接纳新征服者的问题上，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案。简单点说，每一个新征服者都只是相当于为印度增加了一个隶属“刹帝利”的亚种姓，只要不刻意去破坏原有的印度教种姓制度，那么控制印度社会思想的“婆罗门”阶层，就会帮助新政权来稳定新政权。至于奥斯曼帝国，他们遇到的挑战算是最大的，毕竟要统治那么多完全处在对立面的基督教民族。维持信仰自由的高度自治政策，是土耳其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与上述两大帝国不同的是，萨非帝国对内遇到的最大问题，并非是宗教方面的差异，而是民族问题。阿拉伯人传播的伊斯兰教，已成功的使得波斯人和突厥人都成为了穆斯林。此外，与奥斯曼帝国同处西亚的萨非帝国，还面临着对外与奥斯曼帝国正

面争夺伊斯兰世界话语权的问题（印度反倒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萨非帝国在技术上做出了如下设计：

一、萨法维家族声称自己是阿里的直系后裔，同时拥有波斯萨珊王朝的血统（尽管这两点都十分牵强）。这使得政教合一的统治家族，既有了觊觎伊斯兰世界最高政教权力的可能，又成为了满足波斯人民族自豪感的波斯皇帝（波斯语“沙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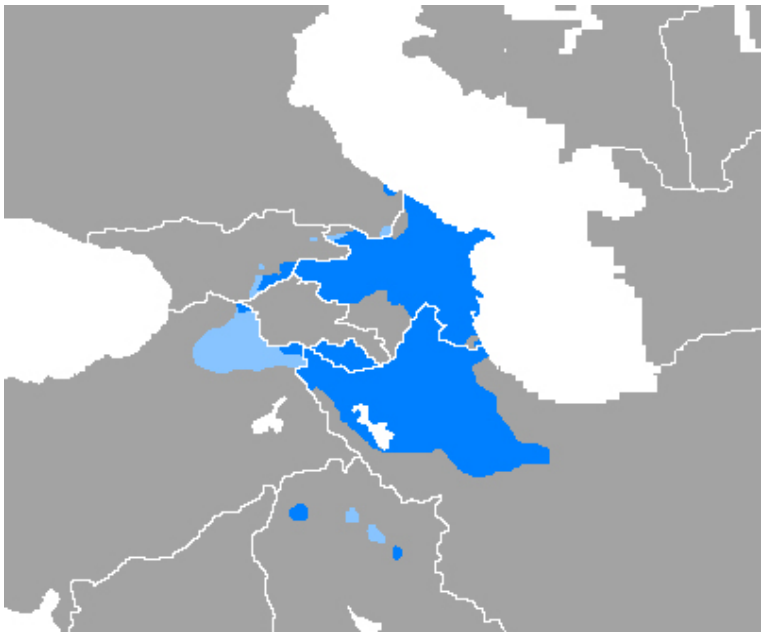
二、进一步确立什叶派教义的国教地位，而不是像阿拔斯王朝那样，借助什叶派上位后再成为什叶派的敌人；

三、在维持“红头”突厥人军事地位的情况下，将政治、宗教方面的权力向波斯人倾斜。甚至从 16 世纪末开始建立新的军事体制，以避免拥有军事特权的突厥部族尾大不掉。

基于波斯文明的厚度，波斯人在异族统治王朝中，主导文官系统已是常态，萨非王朝的贡献，在于让波斯人第一次看到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争夺政教主导权的希望。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在什叶派的六大圣城中，除了逊尼派也认可有麦加、麦地那两大大圣城之外，还有今天位于伊拉克境内的纳杰夫、卡尔巴拉，伊朗境内的马什哈德、库姆四座圣城。在伊朗高原建立一个带有“波斯”属性什叶派政权，扩张至什叶派有优势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最终觊觎阿拉伯半岛西侧的麦加、麦地那，并非不可完成的任务。事实上，今天重拾政教合一制度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向外扩张势力范围的。

萨非王朝对伊朗民族融合的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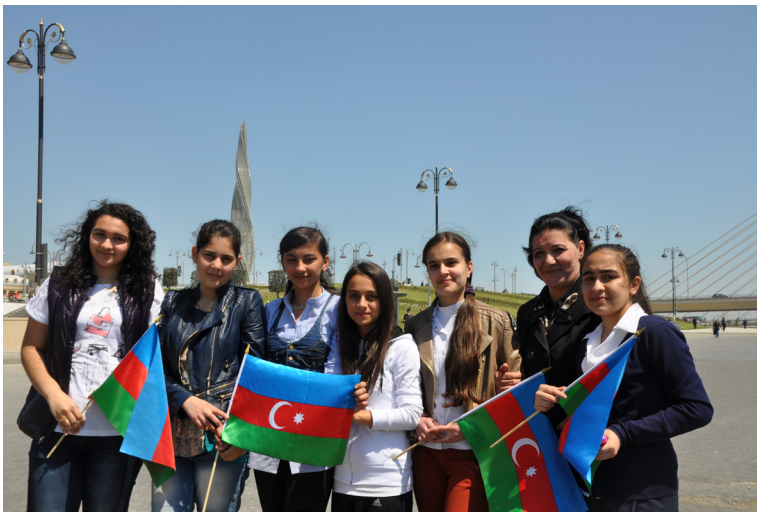
当然，就萨非王朝内部来说，阿塞拜疆突厥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民族鸿沟依然存在，1736 年，不甘心被边缘化的“红头”突厥人颠覆了萨非王朝，建立了新的阿夫沙尔王朝（史称“红头王朝”）。其后，波斯的君权又在突厥人和波斯人之间倒换过两次，直至最后的王朝“巴列维王朝”（1925—1979）被伊斯兰革命所颠覆。然而经过萨非帝国 200 多年的融合，波斯人和阿塞拜疆突厥人，已然形成了共同的国家意识，上述王朝更迭的性质也被归于内政（而不是像伊尔王朝那样的异族政权）。



阿塞拜疆人分布图

数百年的融合，虽然让阿塞拜疆突厥人在种族上高加索化，但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还是会让他们与传统的波斯人有所区别。尤其在北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人

现在独立成国，西边又有民族上的近亲——土耳其存在的情况下，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民族划定、国家认同问题，也变得十分微妙。萨非帝国所打造的共同历史记忆，以及区别于伊斯兰主流信仰的什叶派教义，是维系伊朗内部民族团结的关键所在。你可以说居鲁士大帝所开创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只是波斯人的；也可以说以“波斯第二帝国”自称的萨珊波斯只是波斯人的，但波斯历史上的第三个辉煌时代，让波斯就此摆脱阿拉伯人宗教主导权（以什叶派立国）的“萨非帝国”，却是由波斯人和阿塞拜疆突厥人所共同创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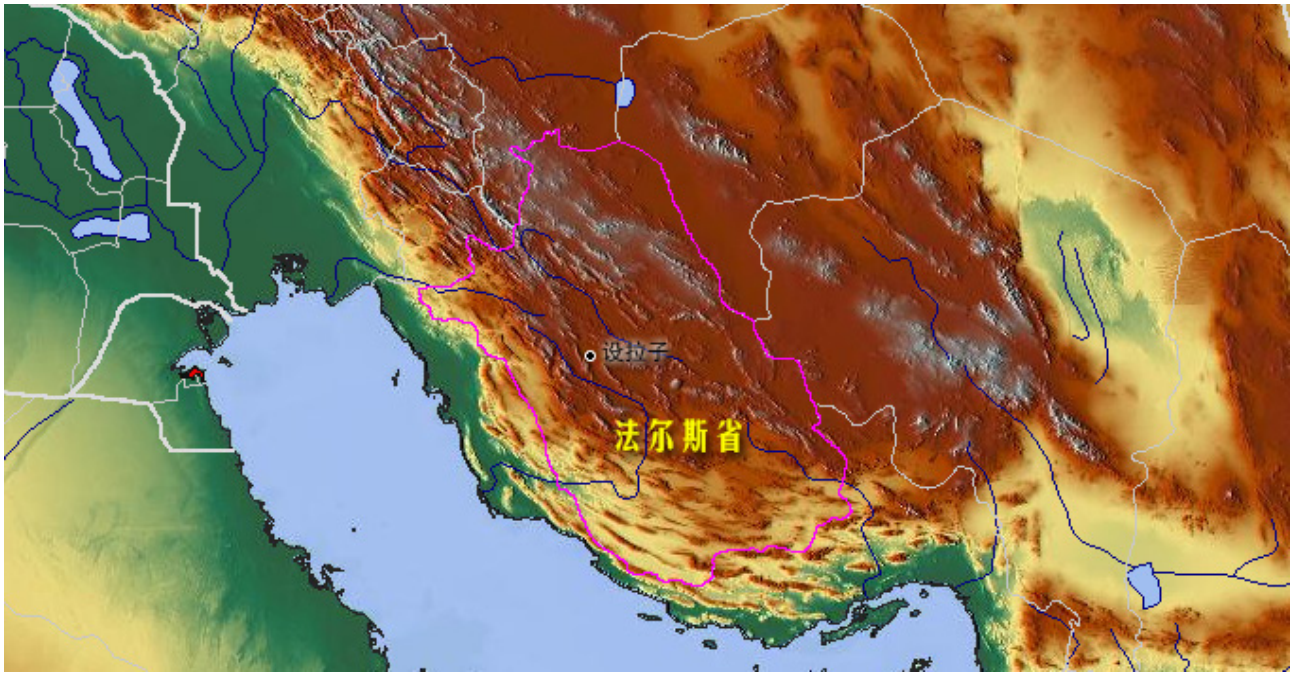
经过上述解读，相信大家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说萨非王朝之于伊朗，与汉朝之于中国有共同之处的原因所在。后者正是因为政治上源自楚地的汉朝的建立，彻底填平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间的障碍，让中央之国在文化层面上实现了南北统一；前者的“什叶派波斯”，是今天伊朗的立国之本。要知道，今天的伊朗除了占总人口数量 2/3 的波斯人，还有占总人口数量 1/4 的“阿塞拜疆人”。如果没有了宗教，没有了什叶派这个纽带，伊朗不仅在向外扩张地缘影响力时，会缺少专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武器，更有可能造成国家的分裂。追根溯源的话，上世纪 70 年代末，试图将伊朗世俗化的巴列维王朝之所以会遭遇一场“伊斯兰革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第三节 库尔德人的历史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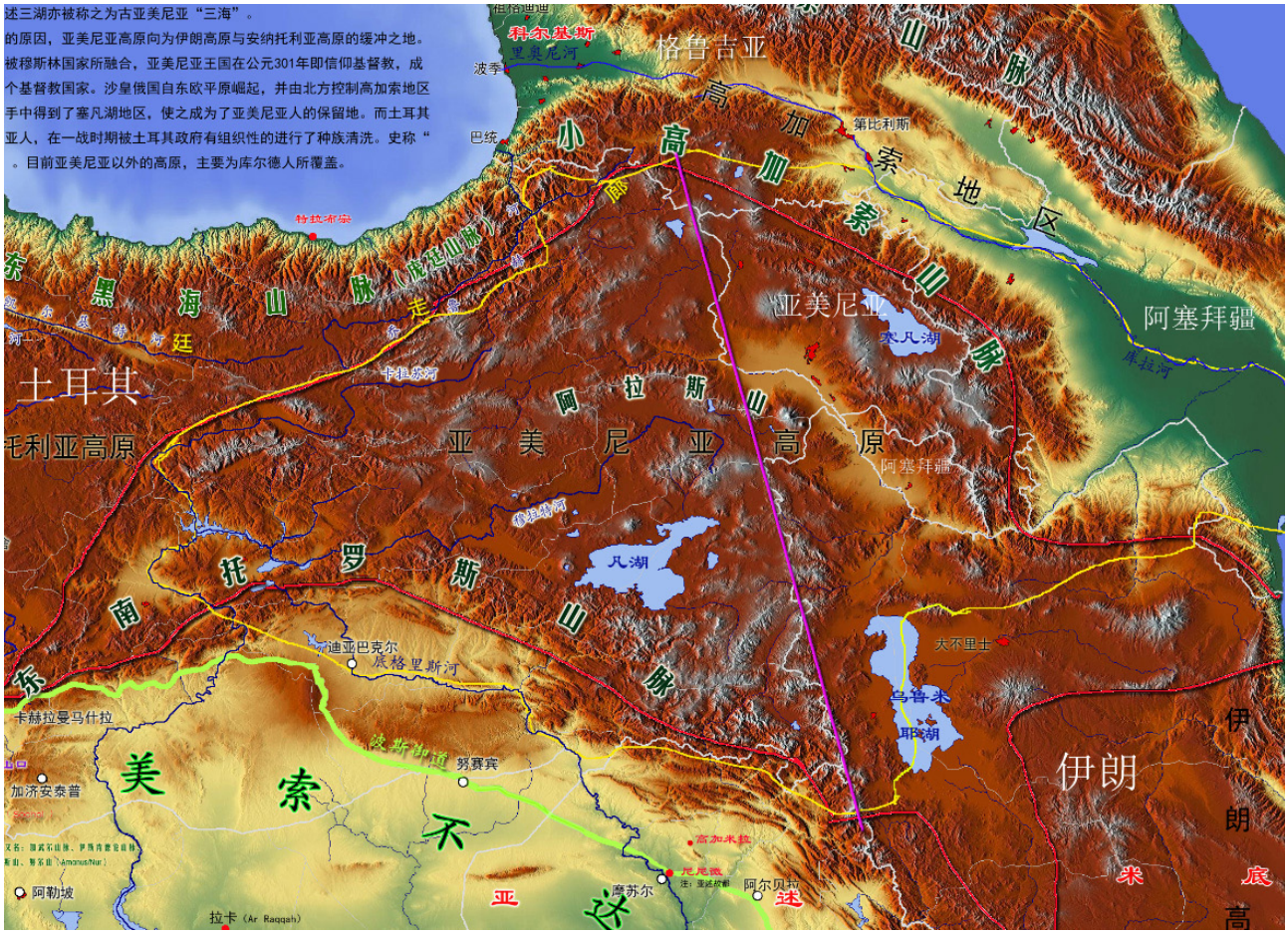
亚美尼亚高原上的族群及其之间的博弈

基于位置关系，阿塞拜疆的什叶派突厥人，总是处在对抗奥斯曼帝国的第一线，而处于后方的波斯人则为整个帝国提供生存的基础。这种战略上的共生关系，成就了今天以什叶派信仰为核心，融入了阿塞拜疆突厥基因的“伊朗”。 由此，解决了民族、

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萨非波斯”，算是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法。最起码土耳其人要是声称，自己是突厥人或者伊斯兰世界唯一代表的话，不会对萨非帝国和波斯造成政治上的影响。



伊朗法尔斯地区



亚美尼亚高原—高加索地区地缘结构图

顺便说一下，基于在共同的国家意识之下，“波斯”这个标签应该属于双方共同的历史记忆，所以阿塞拜疆人不太愿意看到那些说伊朗语的同胞单独垄断它。也因此在伊朗的阿塞拜疆人，更愿意称外人眼中的“真正波斯人”为“法尔斯人”。正如我们以前所分析的那些，高原西南、以“设拉子”为省会的法尔斯地区，是古波斯的发源之地。说起来，这种认定对于伊朗来说也不算坏事，要是哪天阿塞拜疆人试图把自己的历史，剥离出波斯文明的传承体系，那才是真的出问题了。显然，阿塞拜疆突厥人与波斯人共生关系的产生，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绝不是个好消息。原本有可能发生的民族战争，也变成了以什叶派、逊尼派信仰为划分的“圣战”。

在这场延绵二个半世纪的战争中，位于伊朗高原与安纳托利亚高原之间的“亚美尼亚高原”再次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焦点。所谓“亚美尼亚高原”的位置，大体就是黑海——里海之间的这片高原地带。不过想在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印度洋的这条高原带中，准确定位亚美尼亚高原的位置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从水系的角度切入会让事情变得简单些，整个高原包括：呈“品”字型排列的塞凡湖、凡湖、乌鲁米耶湖，以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上游地区。曾经覆盖上述地区的古亚美尼亚，也因此号称“三海”之国。





库尔德人

需要注意的是，在经历过伊斯兰教和突厥人的反复洗盘之后，古老的“亚美尼亚”民族，早已不再是这片高原的唯一地缘代表了。亚美尼亚人最先失去的，是东南部的“乌鲁米耶湖”地区，在古波斯时期（包括米底时代），这个方向就是波斯西扩的首要之地。在塞尔柱人所引发的民族大迁徙中，以大不里士为中心的乌鲁米耶湖地区，与其北部归属高加索范围的库拉河平原一起，最终成为了突厥人定居的“阿塞拜疆”。不过真正对亚美尼亚人的生存空间造成致命压缩的，却并非是从中亚而来的突厥人，而是跟他们做邻居时间更为久远的“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的边缘化及其与俾路支人的比较

关于库尔德人的族源问题，一直以来都很模糊，你甚至很难搞清，他们和亚美尼亚人祖先谁先到达这片高原。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库尔德人在上古的竞争中是一个失败者，在凡湖、乌鲁米耶湖南部的扎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山地，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就像同一时期，在阿拉伯荒漠中骑骆驼游牧的阿拉伯人一样。尽管土耳其人非常想将之归类于“突厥人”范畴，但库尔德人所操的语言无疑是属于印欧语系，与波斯人的族源关系要近得多。简单点说，库尔德人和波斯人的祖先一样，都是最初从中亚、高加索方向南迁的印欧游牧部族的后裔。只不过，后来定居条件较好的伊朗高原，发展出了强大的文明，而条件较差的边缘山地中，还有部分保持相对原始状态的部族存在罢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多少有些类似于汉、羌之间的区别。

库尔德人的情况并非孤例，在伊朗高原东部边缘、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交界之处，还有一支没有被波斯文明融合的“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游牧部落：俾路支人。与库尔德人生存之地被称之为“库尔德斯坦”一样，俾路支人也有个“俾路支斯坦”，并同样将之延伸到谋求独立的层面。如果说有高大山地保护，是库尔德人得以保持独立民族特征的基础，那么俾路支斯坦让周边强大政权融合无力的原因，就是极端干旱的气候了。尽管印度洋近在咫尺，但不幸的是印度洋季风并没有青睐这片土地。

事实上，俾路支语与库尔德语之间亲缘关系，比之二者与伊朗语之间要更近。考虑到二者类似的地缘属性，这种微妙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原始的游牧属性，也注定没办法留下文字记录这一点）。虽然原始属性一致，但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面临的挑战，以及生存之道却不尽相同。相比之下，库尔德人比俾路支人的位置要敏感的多。几千年来，其位置一直是周边各方势力的角逐之地。他们的近邻——亚美尼亚人，也先发性的通过控制高原上的河谷、盆地，早早的进入了文明阶段。可以说，在山地中游牧的库尔德人要想保持独立甚至出头，需要比俾路支人运用更多的政治技巧。

第四节 库尔德人登上历史的舞台

阿拉伯帝国兴起和塞尔柱人入侵带给库尔德人的机会

很多时候，恶劣环境所养成的军事本能，是边缘民族进入文明区“进化”的主要筹码。如果内部整合好了，对手又恰好处在衰弱期，那么这种“进化”就有机会自上而下的，通过政治征服来完成；如果情况正好相反的话，那么通过为相邻文明政权“出售”武力的形式，也有机会做到这点。库尔德人在历史上，并没有建立过强大的政权，他们更多是通过后一种方式，进入人们的视线。实际上，这种情况才更为普遍，只不过诸如匈奴、突厥、蒙古这样的成功者，总是更容易被人牢记罢了。

库尔德人以一个整体民族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是在公元 7、8 世纪的阿拉伯帝国时期。贴近耶路撒冷的地缘优势，是阿拉伯人有机会从荒漠游牧者，快速以征

服者姿态进入文明期的根本原因。阿拉伯帝国的迅速扩张，也第一次给了库尔德人进入文明视野的机会。尽管被阿拉伯帝国征服的“萨珊波斯”，为阿拉伯帝国和文明的崛起提供了自己的“肩膀”，波斯人也能够在阿拉伯人的宫廷里，帮助构建成熟的官僚体系，但同时将军事权力也交给波斯人，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为了平衡这一关系，阿拉伯人青睐于从中亚草原，高加索、库尔德的山地中，寻找意识形态如一张白纸般的游牧者，来构建自己的军事体系。

从中亚而来的突厥人及高加索人，一般是通过奴隶买卖的方式，成为“奴隶军人”，库尔德人则更多是整体转化成穆斯林的前提下，以出租武力的雇佣军形式进入各穆斯林政权服务。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被完全消除了部族记忆，后者能够一直维持民族意识。这点至关重要，我们会看到，突厥人生存之地的扩张，最终还是依赖于土耳其这类，依托部族的政治扩张者。至于“奴隶军人”们，他们当中即使会依来源地划分阵营，甚至能够夺得政权（如马穆鲁克王朝），但却终究不会有民族扩张层面的价值。

塞尔柱人入侵之后所造成的混乱，是库尔德人迎来的第二个历史机会。在催毁阿拉伯人统治之后，并没有做好准备的“塞尔柱帝国”，转瞬之间也陷入了分裂状态。对于出售武力的库尔德人来说，混乱代表着更多的机会。库尔德人在地缘政治上的进展，是从塞尔柱王朝那里，得到了“库尔德斯坦省”的行政标签。这标志着“库尔德斯坦”，开始正式出现在西亚地缘政治舞台上了。

在这一阶段，代表穆斯林世界夺回耶路撒冷的萨拉丁，算是库尔德人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代表了。然而萨拉丁并非出身于传统的库尔德地区，他的成功也没有给库尔德人带来实质利好。萨拉丁更愿意把自己塑造成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导者。这从库尔德佣兵虽然也存在于阿尤布王朝中，但却没有取代“马穆鲁克”的地位就可以看出。客观的说，将自己窄化成一个库尔德民族主义者，的确会显得格局不够大，参照一下富贵还乡的项羽最终落得什么样的田地，就能够理解萨拉丁的做法了。

库尔德人站边奥斯曼并扩张生存空间

真正让库尔德人扩张生存空间，并以3000万人口成为中东第四大民族（阿拉伯、波斯、土耳其之后）的机会，来源于奥斯曼帝国与萨非帝国的对决。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需要找到新的土著力量，来帮助他们赢得这场伊斯兰圣战。从地缘结构上来看，这已是周期性出现的模式了。当年罗马与萨珊帝国、拜占庭与阿拉伯帝国也都是如此。这种东、西博弈模式的再现，逼迫生活在亚美尼亚高原的族群再次面临抉择。

基于古老的基督教信仰，处在两大穆斯林帝国，或者说逊尼派突厥人与什叶派突厥人包夹之中的亚美尼亚人处境是最为尴尬的，不仅无法取得一个独立缓冲国的地位，更无法取信于任何一方。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选择一个看起来不那么严苛的宗主。以民族和宗教政策来说，已经在欧洲实行宽松民族、宗教政策的奥斯曼帝国，要比萨非帝国更有吸引力，后者甚至会强迫逊尼派改宗什叶派（更别说基督徒了）。

收服亚美尼亚人的人心，让奥斯曼帝国可以将势力线扩张到阿塞拜疆，甚至一



库尔德斯坦地图

度夺取阿塞拜疆。然而从战略上看，亚美尼亚地区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在东线，统治力最薄弱的区域，阿塞拜疆则情况正好相反，是萨非帝国绝不可放弃的核心板块（尤其对于红头突厥人来说）。这种情况导致奥斯曼帝国很难透过亚美尼亚，真正拿下阿塞拜疆。更大的风险在于，亚美尼亚人本质上不属于任何阵营，他们愿意倾向于土耳其人，只是因为能够获得更宽松的政治、宗教环境。这一点，萨非帝国意识到的话，也有可能做出调整。把自己的东部安全寄托在亚美尼亚人身上，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种背景之下，土耳其人把目光投向了高原南部山地之中的库尔德人。在这场圣战之中，库尔德人并没有选择跟随波斯政权。说起来他们这么做也是有历史了，否则早就被波斯人同化了。决心站在逊尼派一边的库尔德人，成为了土耳其人在东线的重要支撑。对于高地民族来说，向自然条件更好的低地渗透本身就是一种自然选择。唯有在获得人口承载容量更大的低地之后，高地民族才有可能摆脱边缘民族的地位，成为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以库尔德人的位置来说，他们有两个方向可以扩张：一是向底格里斯河中游平原的摩苏尔、基尔库克一带渗透，从阿拉伯人那里寻找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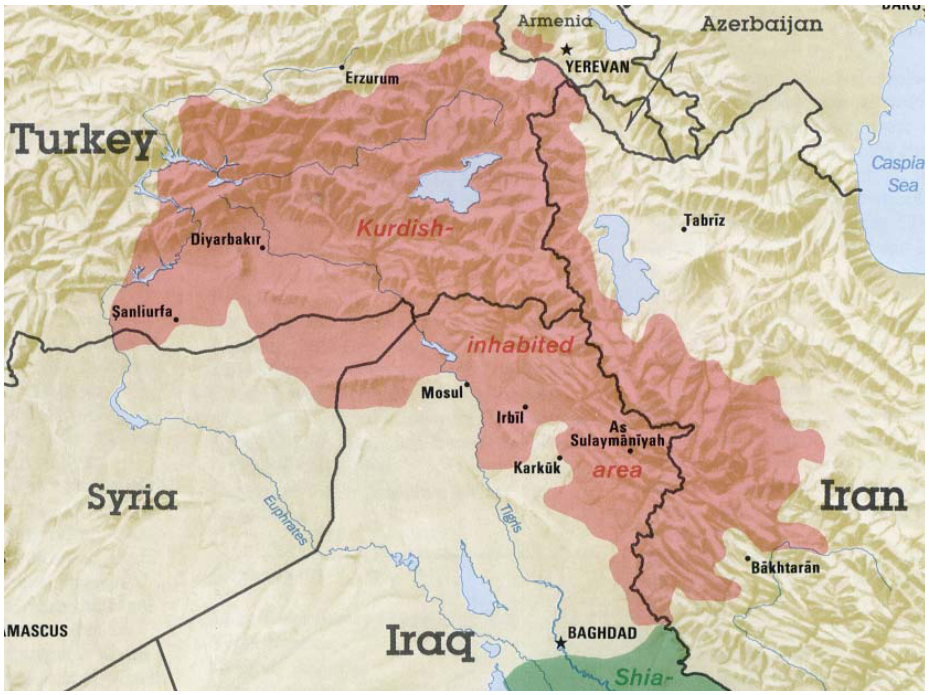
凭借与土耳其人的合作，现在库尔德斯坦的概念已经覆盖到了底格里斯河中游，摩苏尔、基尔库克等底格里斯河中游城市，成为了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争夺的焦点。二是在亚美尼亚高原，从亚美尼亚人那里争夺生存空间。在这片高原之上，很早就进入文明阶段的亚美尼亚人，主要定居于高原上的河谷（湖盆）低地区。相应的，游牧民族在山地之中的优势则相对更大些。不过在亚美尼亚王国还能保持独立的状态下（虽然一直有宗主国），这种渗透会遭到亚美尼亚人的抵制。

第五节 库尔德人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的角色

11 世纪初，在塞尔柱突厥人席卷西亚之时，亚美尼亚王国在高原上千年独立地位终于成为了历史，部分亚美尼亚人开始在拜占庭帝国的保护下，在奇里乞亚重建王国。虽然留在高原的亚美尼亚人仍然在努力坚持他们的信仰，但已经没有办法阻止，

穆斯林民族的渗透了。基于从巴尔干到阿塞拜疆的土地上，突厥人都取得政治优势，在亚美尼亚高原的边缘山地游牧，并不会成为他们的选项。有着穆斯林背景库尔德人，开始慢慢北上填补这一空间。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亚美尼亚人与库尔德之间逐渐在亚美尼亚高原形成了杂居之势（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

很显然，基于宗教原因土耳其人更愿意看到库尔德人逐步压缩亚美尼亚人生存空间，就像他们在巴尔干，帮助转变信仰的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一样。量变引发质变，在奥斯曼帝国的东部，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 20 世纪初（一战期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在这场屠杀之中，亚美尼亚高原、奇里乞亚、特拉宗布宗等地的亚美尼亚人，被有计划的清洗。19 世纪初并入沙俄的“东亚美尼亚”（塞凡湖地区），成为了亚美尼亚人最近的避难所，并最终在苏联分裂后独立为现在的“亚美尼亚”。



库尔德斯坦地区

在亚美尼亚高原的清洗过程中，库尔德人成为了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至于在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过程中，库尔德人究竟和土耳其政府谁更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已经很难判定了。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土耳其完成了自己的宗教净化工作，却没能因此解决东部的民族分裂危机。在亚美尼亚人曾经世代经营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游及凡湖地区彻底成了“库尔德斯坦”的一部分后，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很快便凸显出来。一战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本来是库尔德人获得独立地位的最佳时机，只可惜当时的西方列强认为，将阿拉伯人从奥斯曼帝国剥离出来，就足以肢解奥斯曼帝国了。库尔德人希望建国的土地，除大部被留在土耳其境内以外，主要被分配给了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境内也有部分）。

在 20 世纪掀起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库尔德人一直坚持的独立民族意识，无疑是触及到所在国的敏感神经，尤其在四国交界的所谓“库尔德斯坦地区”，库尔德人口已经达到了 3000 万。这使得无论是在波斯人的伊朗、突厥人的土耳其，还是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叙利亚，中央政府都试图压缩或取消库尔德人政治自治权。当然，这并不代表库尔德人在政治上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伊拉克战争以及现在仍在进行的叙利亚

战争，是这两国库尔德地区获得半独立地位的又一个战略窗口。不幸的是，除非土耳其也面临相似的境地，否则“库尔德斯坦”的独立之梦，还是遥遥无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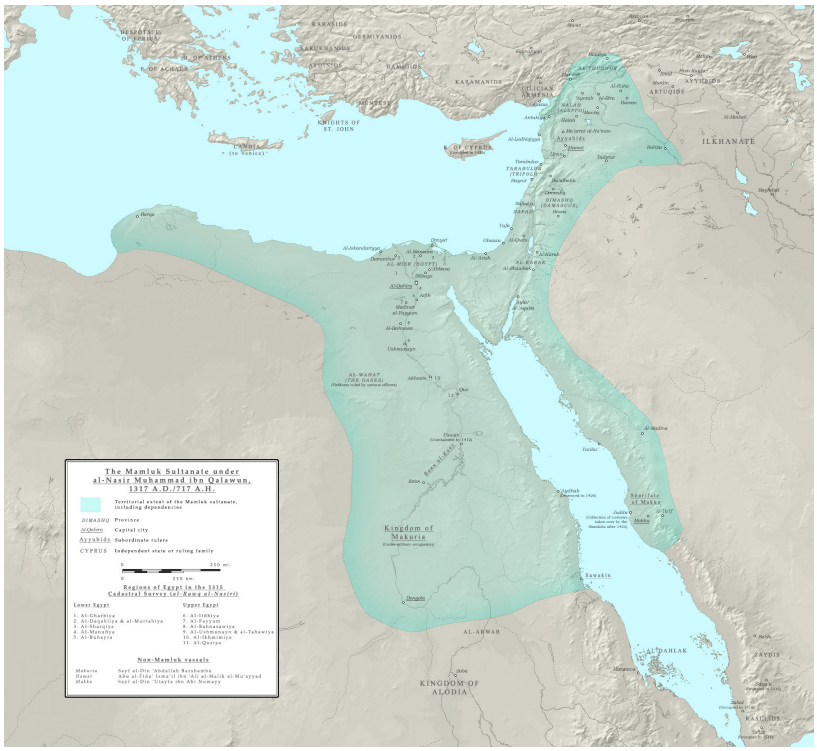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章 奥斯曼向埃及和多瑙河中游扩张

第一节 奥斯曼灭亡马穆鲁克王朝

奥斯曼帝国从叙利亚进军征服马穆鲁克王朝

亚美尼亚人的归附，以及库尔德人的助力，让土耳其要在争夺美索不达米亚的博弈中，逐渐占据了优势。在罗马与萨珊波斯争霸时期，两大帝国曾经长期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切割新月沃地。尽管罗马帝国曾经一度占得两河平原，并设立美索不达米亚、亚述两行省，但很快就退了回来。没能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就是亚美尼亚的战略性中立。现在的话，战略的天平显然开始向小亚细亚的方向倾斜了。不过不要忘了，在有关新月沃地的博弈中，叙利亚才是问题的关键。事实上，让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归附的前提，也是要拿下叙利亚。否则这两族要做的，可不就只是二选一的选择题了。

在奥斯曼帝国之前，谁是叙利亚的统治者呢？答案是埃及马穆鲁克王朝。以地缘属性来看，马穆鲁克几乎就是阿尤布王朝的翻版（也是直接继承者）。值得玩味的是，由于这片从安条克到尼罗河的土地过于狭长，并且包含了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三大圣城在内，如果没有为伊斯兰世界作出过重大贡献，想在此建立稳定政权是很有些困难的。当年阿尤布王朝得以创立，是建立在萨拉丁击败十字军夺回耶路撒冷的基础上；而马穆鲁克能够上位成功，同样是因为他们以职业军人集团的面目，代替服务对象抵御住了蒙古人的进攻。这两项针对“异教徒”圣战功绩，是两股政治力量得以收服民心的基础。也可以说，后来者想要做到这点的话，也必须有同等级别的贡献。



马穆鲁克王朝疆域图

相比抵御十字军和蒙古人的贡献，奥斯曼把拜占庭帝国扔进历史，几乎全取巴尔干的业绩要更为让人侧目。前者更多属于被动防御，而后者则是一次完完全全的主动扩张。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比如实力，比如马穆鲁克进入衰弱周期），土耳其人想进军埃及的话，在民意上也已占得了先机。征服马穆鲁克的战争，发生在公元

1516—1517 年间。如果不是帖木儿西征带来的影响的话，奥斯曼的军队本来已经在一个世纪前进行过尝试，并且在叙利亚击败过马穆鲁克了。不过不要紧，好饭不怕晚，实力已非昔日可比的奥斯曼帝国以摧枯拉朽之势，从叙利亚一路进军至开罗城下，征服了这个奴隶王朝。

奥斯曼苏丹僭越哈里发

从奥斯曼带领族人，正式从罗姆苏丹国独立出来（公元 1299 年）算起，土耳其人用了 218 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对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这几个宗教、地缘政治意义重大的城市的征服，让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有资格认为，自己的成就相当是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相加。基于这一成就，土耳其人做出了一个始无前例的决定：僭越哈里发。

“哈里发”一词的原意为“代理人”、“继承者”，在先知穆罕默德离世之后，阿拉伯人曾经依部落传统，先后推选过四任哈里发，并使这一头衔成为伊斯兰世界最高政教领袖的代名词。此后，关于哈里发一职是否应考虑圣裔家族血统问题的争议，导致了伊斯兰世界的分裂。最先让阿拉伯人进入帝国的时代的“伍麦叶王朝”（白衣大食），就与圣裔家族没有血缘关系。事实上，作为阿拉伯旧势力的代表，伍麦叶家族曾经是穆罕默德最大的敌人。这也使得伍麦叶家族的“哈里发”之路困难重重。后来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之所以能够取伍麦叶王朝而代之，与其统治者属于穆罕默德所出身的“哈希姆”家族有莫大的关联。由于统治者所属的 “哈希姆家族”身份，（始祖“哈希姆”为穆罕默德的曾祖），让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名正言顺（阿拔斯家族，源自穆罕默德的叔父，而非其后裔，建立王朝者为先知叔父后裔）。

对于什叶派来说，阿拔斯王朝的出身也不是最正。在什叶派看来，哈里发一职只能由血统最为纯正的阿里、法蒂玛后裔继承（前者为穆罕默德堂弟，后者为先知之女，两人结为夫妻）。后来占据埃及与阿拔斯王朝争锋的法蒂玛王朝（绿衣大食），便是以此身份自居。不过不管怎么说，在伊斯兰世界里，哈里发之位与穆圣血统之间进行捆绑已经是个事实存在。尽管一定要从原教旨的视角来看，古兰经和穆罕默德本人都没有作出过明确的指示。大多数入主西亚的外族穆斯林王朝（如塞尔柱、阿尤布）也认为，让出这个一个虚位并不是坏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并不是只有曹操才有。一如日本幕府时期的权力争夺再激烈，争夺的也只是“征夷大将军”之位，而不会试图颠覆天皇体制一样。

然而，土耳其人并没有遵循这个习惯法，或者说认为自身已经强大到，不需要哈希姆家族这块招牌了。在他们攻灭马穆鲁克王朝之后，马穆鲁克们所扶植的最后一个“哈里发”（系出阿拔斯王朝）被带到了伊斯坦布尔。在其死后，奥斯曼帝国的君主正式接任“哈里发”一职。一直到 20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前的 300 多年时间里，这一伊斯兰世界最高政教领袖的头衔，都为土耳其人所把持。一个相当于东罗马与阿拉伯帝国相加的奥斯曼帝国，也的确有底气这样做。从技术上看，罗马帝国“皇帝”

与伊斯兰世界“哈里发”一样，都只是奥斯曼君主的一个头衔而非全部。

类似的案例在中央之国也可以找到。尽管中国人一直沉醉于自己强大的同化能力，并认定每一个外族入侵政权，最终都不得为自己寻找一个华夏出身（汉化的重要标志），但蒙古人却是一个例外。统治中央之国的蒙古政权，虽然依中原王朝的习惯取了一个“元”国号，并一定程度延用了旧体制，但这种入乡随俗的做法与他们在中亚、西亚、欧洲的汗国并无二至。中国“皇帝”的头衔，也并不对另外几大汗国拥有天然的宗主权，享受这一权力的是“蒙古大汗”之衔。理解这一点，甚至有助于“帮助”大家打破所谓外蒙古回归的梦想。最起码生存在漠北的蒙古人有理由相信，当年只是接受爱新觉罗氏为他们的大汗，与同样奉其为“皇帝”的汉人是两个互无归属的政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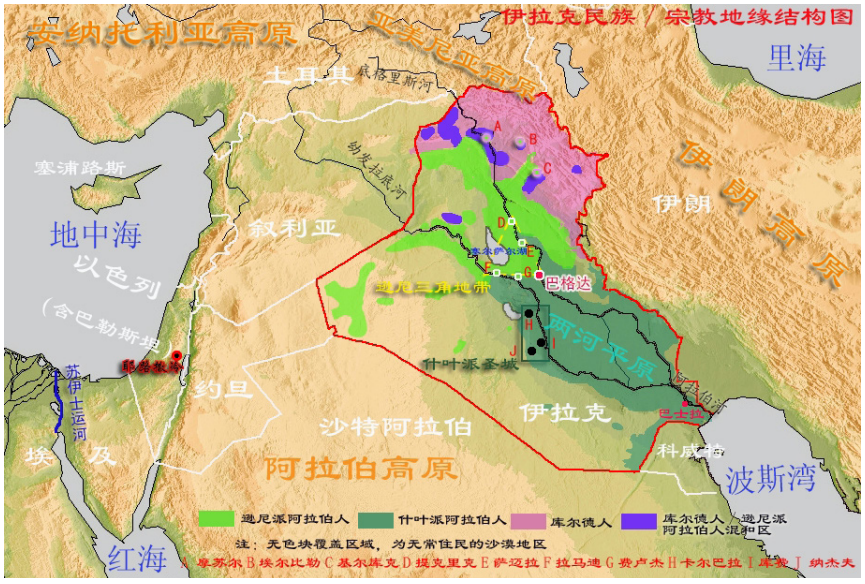
上述问题所潜藏的地缘政治含义，一般只是在大分裂时期才会凸显出来。就像苏联当年在设计联邦体制时，绝想不到设定“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属性，以及内部划定的共和国边境，会为今天的俄罗斯带来如此之大的困扰。

第二节 奥斯曼帝国在东西线的的控制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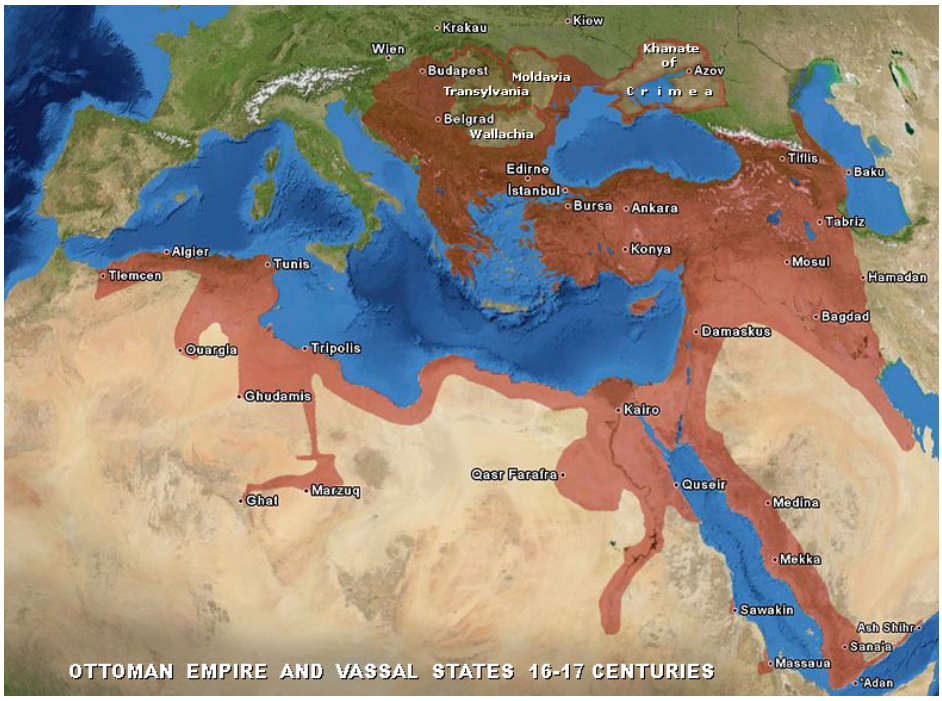
奥斯曼帝国与萨非帝国的平衡线

在奥斯曼帝国如日中天时，世人更关注的只会是它对周边国家尤其是欧洲造成的压力。在东线，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了奥斯曼帝国与萨非帝国争夺的焦点。在经历过长期战争之后，双方在 17 世纪中叶通过条约确定了一条平衡线。在放弃染指阿塞拜疆的同时，奥斯曼帝国得到了阿拉伯人为主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不仅意味着土耳其人几乎控制了整个两河流域，也意味着几乎所有阿拉伯人，都置于奥斯曼的统治之下。今天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三国的边界，大体也是继承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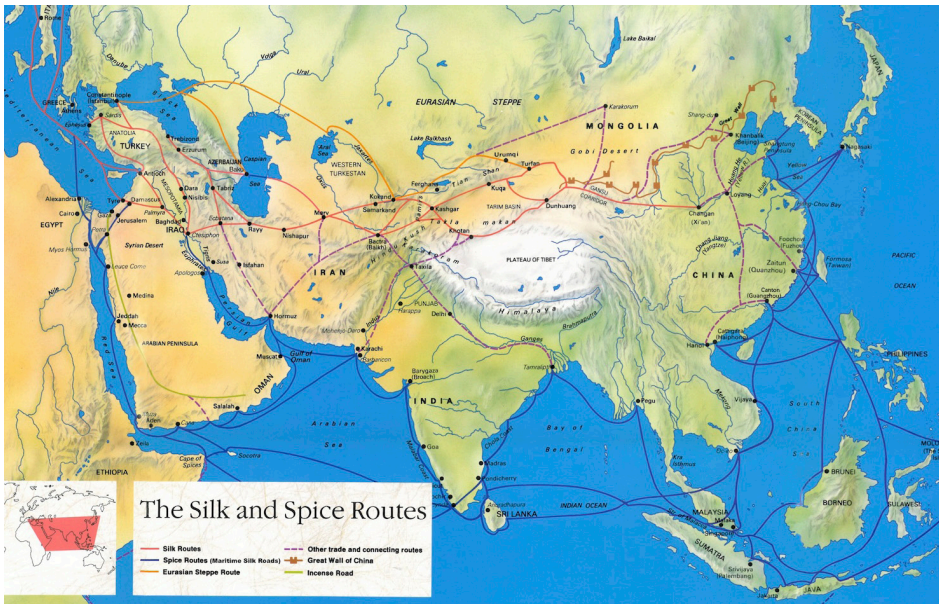
萨非帝国和波斯人并非在美索不达米亚一无所获。今天伊拉克的人口中，什叶派阿拉伯人占比达到 60%。如果除掉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少数民族，只计算什叶派阿拉伯人的比例的话（在伊拉克阿拉伯人中），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将近 80%。仔细观察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布特点，也能看出奥斯曼、萨非帝国影响。巴格达以东容易受伊朗高原影响的两河下游地区，是什叶派的



伊拉克民族宗教地缘结构图



奥斯曼帝国



欧亚贸易通道

地盘；而巴格达以西，更靠近叙利亚和亚美尼亚高原的区域，则是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同样归属逊尼派的库尔德人的天下。

奥斯曼帝国控制欧亚贸易通道

在西线与欧洲的博弈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奥斯曼帝国由此控制了欧亚贸易通道。那么土耳其人真的能够做到这点吗？情况的确如此。中国人喜欢从自己的视角，将贯穿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称之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主线，主要是沿天山南北，经河中入伊朗高原，再由小亚细亚或者叙利亚接入地中海和欧洲。这其中又可衍生出许多支线来，比如进入中亚地区后，也可一路向西，从咸海南北进入欧洲。这条取道欧亚草原的通道，被称之为“草原丝绸之路”。除此之外，还有经由印度洋，从波斯湾、埃及登陆的海上丝绸之路。随着克里米亚汗国的归附，以及对埃及的征服，奥斯曼帝国完全可以从技术上切断这所有的“丝绸之路”。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并非是这些商道上的唯一终端，地缘位置更为接近的印度，也是上述商道的一环，甚至对于欧洲人来说更为重要。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渐完成对东、西方商道各中转板块的控制，商品的议价权也随之为土耳其人所有。这意味着，整个欧洲无论再想获得来自印度还是中国的产品，都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对价。有记录表明，这一价格的前后差异，甚至会高达 10 倍。很显然，这一利润足以驱动欧洲的商业资本，

作出任何疯狂的举动。那么他们到底做了什么疯狂的事呢？

第三节 奥斯曼向多瑙河中游平原扩张

奥斯曼在莫哈奇战役中击败匈牙利

伴随着奥斯曼帝国对东西方商道的垄断，欧洲人会被迫作出什么样的疯狂举动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因此而引发的“大航海时代”，以及“地理大发现”。不过在将视线转向西地中海和大西洋之前，我们还要交待一下，奥斯曼扩张对中欧地缘政治的影响。因为在这个方向，土耳其人推倒的一系列骨牌，最终成就了一个庞大的中欧帝国——奥地利。

马穆鲁克王朝的覆灭，让奥斯曼帝国所拥有的资源又有了一次质的提升。想象一下从尼罗河到安条克这条沃土带，能够为之提供多少人口和财富，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了。这使得土耳其人有机会，让他们在欧洲的事业更进一步那么，奥斯曼帝国的下一个目标是谁呢？很显然是有“基督教之盾”之称的匈牙利。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处在抗击穆斯林入侵第一线的匈牙利，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多瑙河南岸、萨瓦河口的贝尔格莱德，是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城市。这座城市也是不愿屈从穆斯林统治的塞尔维亚人最后的希望。不过这一次，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不仅拿下贝尔格莱德（公元 1521 年），使之在今后三个半世纪内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更一鼓作气横扫匈牙利。双方决战的地点，位于多瑙河西岸、匈牙利南部城市 “莫哈奇”，史称“第一次莫哈奇战役” （公元 1526 年）。



多瑙河中游平原地区

在这场战争中，匈牙利人损失了将近 2 万精锐（包括被屠杀的俘虏）以及上千贵族。一如科索沃战役让塞尔维亚人“大塞尔维亚帝国”梦想破灭一样，莫哈奇战场的失败，也让匈牙利王国失去了独立地位，并从此走向衰弱。按照思维惯性，我们很容易把土耳其人的胜利，理解为亚洲游牧骑兵的又一次成功突破，而将匈牙利人的失败理解为他们的欧洲化。然而在 16 世纪，情况却并非完全如此。骑兵固然还在战场上发挥



莫哈奇战役

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欧洲人对黑火药武器熟悉、改进，这种远程武器已经完全能够决定欧洲战场的胜负了。

事实上，在稍晚时候的亚洲战场，从欧洲技术“返销”回来的黑火药武器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明朝的红衣大炮、日本的铁炮（火绳枪），都曾经在战场上书写浓墨重彩的篇章。就欧洲的情况来说，土耳其人比起他们在亚洲的远亲，更有机会接触这一先进技术。长期的扩张战争，又让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对军事技术的进步保持着高度敏感性。在攻灭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中，土耳其火炮就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在第一次莫哈奇战役中，让土耳其人取得大胜的关键因素，也正是他们更为优势的火炮、火枪部队。

奥斯曼帝国向奥地利推进

以匈牙利的地形来看，并没有逐级抵抗的资本（特兰西瓦尼亚高原除外）。取得决战胜利的土耳其，很快便北上拿下了匈牙利重镇“布达”，并随后穿越“匈牙利门”推进至奥地利的维也纳（史称“维也纳之围”）。对于西欧天主教世界来说，这是自“上帝之鞭”阿提拉西征以来，最严重的地缘政治事件。基于维也纳盆地的地缘位置，神圣罗马帝国体系内的“奥地利”（时为大公国），是德意志人向东扩张的桥头堡。

如果说匈牙利是“基督徒之盾”的话，那么奥地利也可以说是“德意志之盾”了。要知道，上次蒙古帝国虽然也横扫了匈牙利，但却没有再进一步挑战维也纳和神圣罗马帝国。随之而来的分裂状态，使得直接对欧洲构成压力的金帐汗国，能够调动的资源基本只限于钦察草原。在这种情况下，东欧森林里面的罗斯人反而能够“独善其身”。而被喀尔巴阡山脉保护，并且有天主教世界作为后盾的匈牙利人，却成为了钦察蒙古人的主要施压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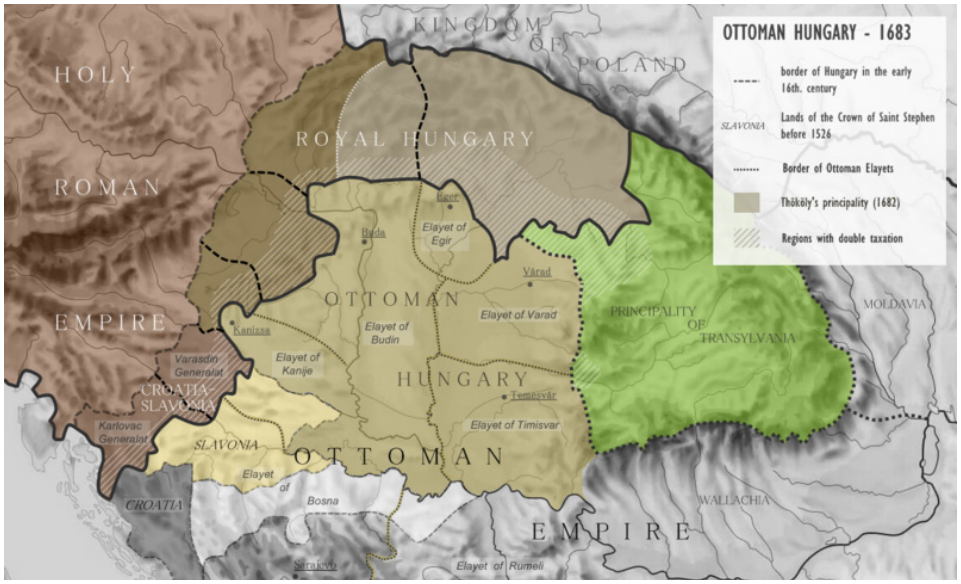
然而这一次，情况却有所不同。已经自认为取得东罗马合法继承权的奥斯曼君主，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整个罗马帝国政治遗产的唯一继承人。基于这个认知，土耳其人甚至在外交层面一度不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合法性。当然，欧洲

人也同样不会认可，一个穆斯林君主有资格在自己的头衔里缀入“凯撒”的称号。谁能够更有底气，还是要看战场上的结果。

第四节 奥斯曼在匈牙利扩张对欧洲的影响

奥斯曼在匈牙利的控制范围

在公元1529年的“维也纳之围”中，土耳其人并没有能够拿下这座“德意志之盾”。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土耳其军队还曾经数次进军至维也纳，但却始终未能如愿。没能做到这点的根本原因，在于土耳其人没有办法消化掉匈牙利。在巴尔干半岛，将帝国首都迁往君士坦丁堡的政治选择，以及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伊斯兰化的成功，使得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形成了能够维持其统治的、稳定的“穆斯林三角区”。问题是，每一个地缘中心的辐射力都有它的边界。无论从地理还是宗教角度来看，君士坦丁堡的地缘有效控制力，至多覆盖至整个巴尔干地区，对信奉天主教的匈牙利人来说，影响力就十分有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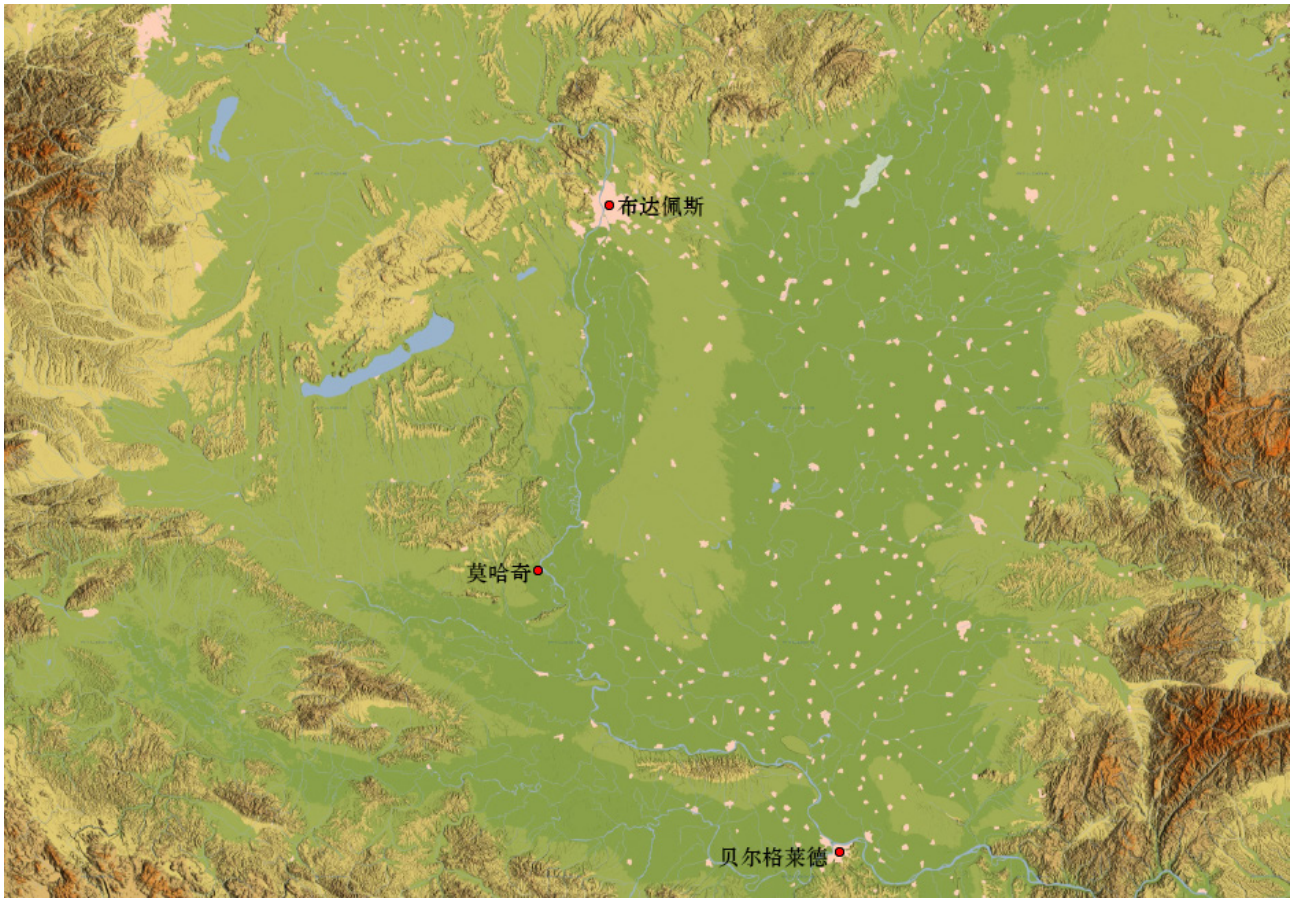
奥斯曼控制下的匈牙利形势图

将政治中心进一步西进至匈牙利，比如放在横跨多瑙河的布达－佩斯，是控制整个多瑙河中游地区的不错选择。匈牙利草原以及从南俄草原引入的钦察系穆斯林游牧部落，能够帮助土耳其人巩固在匈牙利的统治。不过这样做的风险，在于势必会削弱帝国在东地中海的控制力度，将之转回为一个大陆国家。最好的情况，也可能是出现蒙古帝国那种汗国分立的状况。为此在权衡之后，奥斯曼帝国还是没有吃下整个匈牙利，而是在控制了匈牙利中南部平原地带（包括克罗地亚的斯拉沃尼亚）的同时，在特兰西瓦尼亚扶植出亲土耳其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支持后者争夺匈牙利的王位）。至于奥地利人，则控制着包括斯洛伐克（当时属匈牙利王国）在内的匈牙利北部地区。

奥斯曼在匈牙利扩张促成了奥地利的发展和壮大

奥斯曼帝国在匈牙利的扩张，对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的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于奥地利以及它背后所依靠的德意志，成为了匈牙利人复国的直接希望，匈牙利王国的王冠开始为奥地利大公所有，而获得匈牙利的统治权，又反过来增加了奥地利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发言权。后来的奥地利帝国、奥匈二元帝国，乃至再后来的德国、奥地利分立局面，追根溯源的话，都可以从“第一次莫哈奇战役”说起。



莫哈奇位置图

值得一提的是，莫哈奇这个近乎“多瑙河中游地区”地理中心的城市，并非最后一次成为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战场。一个半世纪之后（1687 年），奥地利人率领欧洲联军在它的附近与奥斯曼帝国又进行了“第二次莫哈奇战役”。与上次战役结果相反的是，土耳其人成为了失败的一方，并被迫退出了匈牙利。奥地利则取得了整个“大匈牙利地区”的控制权。

不管怎么说，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足以傲视包括阿拉伯帝国在内的，所有源自西亚的帝国了。不过被土耳其人统治的阿拉伯人，心里肯定还是会有所不服的，因为在西地中海以及伊比利亚半岛，奥斯曼帝国并未能再现阿拉伯帝国的成就。为之添堵的，就是曾经长期游离于欧洲地缘政治核心圈的“西班牙”。接下来，我们的视线也将转向这个欧洲之角，并拉开“大航海时代”的序幕。